

一個 港人 自講 的故事

蘇穎睿 著





作者簡介

蘇穎睿牧師畢業於香港大學，
獲一級榮譽文學士(B.A.)及哲學博士(Ph.D)，
並獲費城西敏寺神學院道學碩士(M.Div)，
普林斯頓神學院碩士(Th.M)及
福樂神學院教牧博士(D.Min)。
現任三藩市播道會顧問牧師。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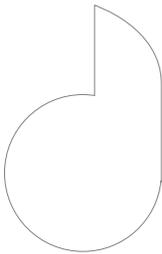


目錄



自序		5-6
序	蘇劉君玉	7-8
序	林修榮	9-12
第一章	借問客從何處來	15-23
第二章	一江春水向東流	26-32
第三章	最是倉皇辭廟日	33-39
第四章	人有悲歡離合	40-47
第五章	金三角·調景嶺·農藝所	48-57
第六章	活在恐懼中	58-66
第七章	洋相	69-76
第八章	宰相腹內可划船	77-87
第九章	讀書郎	88-95
第十章	入鄉隨俗	96-104
第十一章	可喜可悲	105-109
第十二章	同是天涯淪落人	110-115
第十三章	Hail Alma Mater	116-127
第十四章	難兄難弟	128-135
第十五章	大逃亡	136-143
第十六章	末代豬農	144-148

第十七章	明德格物與香港大學	149-158
第十八章	基督徒學生運動	159-170
第十九章	消失了的當案 - 六七暴動	171-179
第二十章	等待	180-190
第二十一章	更美的家鄉	191-200
第二十二章	銘賢歲月	203-212
第二十三章	踏上征途	213-220
第二十四章	承受清風	221-231
第二十五章	異鄉客	232-240
第二十六章	70年代的香港	243-252
第二十七章	窩福的故事	253-269
第二十八章	牧師這一行	270-281
第二十九章	重逢	282-285
第三十章	馬照跑，舞照跳	286-296
第三十一章	幾度夕陽紅	299-307
第三十二章	三藩市播道會的故事	308-320
第三十三章	金山客	321-330
第三十四章	失憶的一代	331-345
第三十五章	我是誰？身份的迷惘	346-358



第三十六章	巴別塔2.0	359-370
第三十七章	1997 - 夜幕低垂的大英帝國	371-378
第三十八章	最是橙黃橘綠時	379-386
第三十九章	死蔭的幽谷	387-397
第四十章	父親的眼淚	398-408
第四十一章	岳母與我	411-421
第四十二章	又是另一個十年	422-434
第四十三章	風雨中的教會	435-452
第四十四章	一宿雖然有哭泣	453-462
第四十五章	瘸腿能行、瞎眼能看	463-470
第四十六章	治與亂(1) 世界秩序	471-478
第四十七章	治與亂(2) 的聖經觀	479-489
第四十八章	香港的突變？	490-503
第四十九章	港方式大遊行	504-512
第五十章	止暴制亂？依法管治？	513-524
第五十一章	新常態的香港	525-536
第五十二章	我的香港夢	537-546



我是一個牧者，在過去數十年牧養生涯中，曾主持過不少紅黑二事；所謂紅事者，乃婚禮也。所謂黑事者，乃喪禮也。聖經教導我們，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傷的人同哀。然而，當兩事在同一日發生時，上午主持喪禮，下午主領婚禮，在情緒上就吃不消了！可幸在我的經歷中，這是非常罕見的情況。我倒有一個習慣，每逢主持婚禮時，我總喜歡問一對新人這樣的一個問題：「你期望在婚後是辛辛苦苦的捱世界，抑或舒舒服服的嘆世界？」然後，我問會眾中所有已婚者同一條問題，看看他們的答案是什麼。有趣的，男性通常都以為婚後會是辛辛苦苦的捱世界，女性則期望舒舒服服的嘆世界。究竟男女何竟有如此的分別，我就沒有深入研究了！

其實，一個人幸福與否，不在乎他周圍的環境，而在乎他的心態。這就好像半杯水，你可以為到只有半杯而不是一杯而感到失望、不快；但同時你亦可以為到還有半杯水而充滿感恩。有些好朋友對我說：「你的一生，真是多災多難。自幼失去母親，又與弟弟妹妹分離，家庭多次遭遇不幸。」但亦有些好朋友對我說：「你的一生真是幸福，一生都沒有經歷戰爭的蹂躪，政治運動的驚恐，也沒有捱飢抵餓的日子。相反的，在香港長大，有機會受良好教育，享有各方面的自由，如此人生，還有何求？」自從我在中學信了耶穌後，我對人生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變。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然而，「神造萬物，各按其時，

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去的事，重新再來。」（傳道書三章11-15節）所羅門王這番話，解開我心中的結，讓我看清楚，神是我的主宰，若要過一個幸福的人生，就要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領受祂給我的份，不是應份，也不是過份。我盼望可以從心底裏面講一句：在我的生命裏，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在寫作的過程中，蒙太太君玉的鼓勵，得以完成，實在要感謝她。此外，不少好友看過了初稿，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令我受益不少，我也要感謝Donna和Michelle替我輸入電腦。這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不少書籍，其中包括周永新教授的《回首香港七十年》，江關生的《中共在香港》，陳鈞潤的《殖民歲月》，陳秉安的《大逃亡》，呂大樂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陳喜謙的《在這些年間》等，這些著作都給我很大啟發。最後，我衷心的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機會去見證祂在我身上的作為，願榮耀歸給祂。



序

蘇劉君玉

穎睿一生最喜歡研究的有兩個學科：一是聖經；一是歷史。兩者有著同一的特點，就是兩者都是尋求真理。聖經是神的話語，研究聖經就是要明瞭神向人啟示的真理，並有關人生的真諦。研究歷史，是要尋找歷史的真相，真正發生的事蹟，了解真相後，很多時可以預測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勢。

在大學期間，穎睿主修中國歷史，副修中國哲學。但由於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忙於研讀聖經和牧養教會內外的人，沒有時間鑽研歷史。但終於在他退休之後，用了3年的時間，研究中國近代史及中國教會史，於2016年獲香港大學頒發哲學博士學位。這個歷史的研究和背景，促使他近期寫了兩本書，一本是他父親的傳記，名為《尋找更美家鄉的故事》，另一本就是這本自傳。兩本書都以當時發生的歷史為背景，敘述當事人在這歷史、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洪流中，親身經歷和體會的有血有肉的故事。並且以流暢、活潑的文筆描述。讀來不但使人挑起無限的回憶與共鳴，更有時熱淚滿眶，確是一本很值得閱讀的著作。並且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本書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寶庫。

穎睿經歷了人生那麼多的窮困、艱難和心靈的創傷，然而他可以成為一個好牧者、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是難能可貴的事。這全因為他在少年時認識了獨一的真神，主耶穌把他從一個自卑、無安全感

的人，改變成為一個有憐憫、恩慈、忍耐、情理兼在的領導者。神呼召他作牧者，牧養祂的子民，這全是神的治療和恩典。

我誠意推介這本書，盼望這本書成為多人的祝福，榮耀我們的神！

蘇劉君玉博士

寫於2022年9月21日

林
序

林

修

榮

20多年前我剛離開職場事奉主，被一家教會邀請做理財講座，是與該教會的主任牧師配搭，由他先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貪財。當時我有兩個感受，第一，這個教會十分謹慎，未聽理財之道先為教友「打防疫針」，免得他們因追求財富而起貪念。第二，就是牧師所舉的例子。他告訴會眾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兄弟姊妹在香港新界繼承了一塊土地，後來政府通知他要收購，牧師在台上說，他第一個念頭就是：不要告訴兄弟姊妹。牧師的提醒是：即使是牧師也會有貪念。我在台下聽到牧師的自白，感到這位牧師（當時已經相當有名望）是一位坦誠和謙卑的人。當然，這位牧師就是蘇Sir，這件事在本書中也略有提到（第267頁），該聚會後不久他全家搬回香港。

其實我早已認識蘇Sir（當然他不認識我）。70年代我在Berkeley大學學生團契領查經，當時也曾參照「福音性研經」。80年代的「四二六」事件（第302頁）發生時我也在灣區，我認識不少那間教會的會友，所以相當注意那件大事。蘇Sir 2013年從香港返回灣區，我與他和師母偶然有接觸，但我真正認識蘇Sir，是一位姊妹將本書的原稿按時傳給我閱讀。

蘇Sir本身是讀歷史的，因此本書有不少歷史的篇幅，由抗戰勝利到國共內戰，由解放到六七暴動，一直講到六四到改革開放，沙士到反送中運動到新冠肺炎，涵蓋近80年中華近代歷史，其中不少是讀者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親身經歷的，由蘇Sir生動地講述，讀的時候份外親切，也會為你帶來酸甜苦辣的回憶。蘇Sir寫歷史並非只是敘述，他的分析和所持的立場是很鮮明的，由此我相信沒有基督教文字機構敢出版此書，但這恰好就是本書可貴與可讀之處。

書中亦有不少篇幅提到在中國與香港的校園福音運動，其中提到艾得理 (David Adeney) 牧師，70年代艾牧師退休後定居於 Berkeley，經常到我們的大學團契講道，我們也時常到他家中拜訪，讀到蘇Sir對艾牧師的那部份特別覺得親切。

但本書對我來說，最寶貴的是蘇Sir的故事給我屬靈的教訓。

上面提到蘇Sir的「真」和謙卑，這樣的人是經常感動流淚的。不但如此，他們也是時刻對聖靈的提醒和責備很敏感的。大學二年級（當時蘇Sir只有20多歲），他申請獎學金，無意中在答一條問題時言過其實，他事後深感不安與後悔，他寫道：「獎學金固然重要，但人格豈不是比金錢名譽更重要嗎？」（第155頁），於是他主動向負責人坦誠認錯。獎學金丟失了，卻因此得到工作和終生伴侶。的確，「...神...察驗人心，喜悅正直。」（歷上二十九章17節）

另一件事，他與小學校友們聚會，人家問他做甚麼職業，他生怕人家看不起他，便大談他的履歷，他寫道：「正當我滔滔不絕講及我的履歷時，忽然我醒覺過來，問自己：我現在說什麼？我其實是對我的同學說：『我雖然沒有咭片也只是一個窮傳道，但你們不可輕看我，我也有著輝煌的成就』。其實，這是我的自卑感作祟。」（第271頁）蘇Sir勇於承認自己的不是，就如他寫到：「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自己的軟弱、掙扎、矛盾、和幽暗面」，「作為牧師，最大的挑戰：就是要

誠實面對自己，承認自己是個軟弱人，了解自己的陰暗面，做個透明人，而不是去扮演聖人的角色。」

第二個屬靈的教訓是：不論你的出身與過去，神都可以大大使用你。書中蘇Sir詳細講述他艱苦的出身：自幼喪母，長大時缺乏安全感，四歲時跟隨母親逃到香港，第二年母親與弟妹返回中國，豈料邊界被封鎖，母親被迫害自殺而死。蘇Sir如此記述：「但在我腦海中，一點有關母親的事情都沒有，無論是她的容貌、個性及言行，完全一片空白。我想，可能這是太痛苦了，就不自覺把這些遺下的印象都洗除淨盡，不留下一點痕跡。」，「...生離死別，實在是太痛苦了，想不到這陰影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長。」因這事故，蘇Sir的父親「...常在內疚、抑鬱和怨恨之中。」父親受到多方攻擊，以致「常活在一種恐懼當中」。蘇Sir在這種環境長大，加上50年代香港社會因左右兩派之爭而充滿危機和暗湧，令蘇Sir一家生活在惶恐中：「我們不但是難民，也是充滿恐懼的『逃亡者』！」

可是，神卻逐步帶領蘇Sir走出困境，讓他逐漸溶入社會，受到良好教育，從大埔官立小學到皇仁中學，再進入香港大學，蘇Sir如此形容這段過程：「『大埔官立小學是我走出狹隘人生的第一步。』從『中國逃亡到香港之難民心態』到『沒有國民身份』的『香港人』心態了！」在新界生活了十年，蘇Sir一家才搬入市區，之後考入港大，再到美國接受神學深造。神要用一個人，就像聖經中的大衛，寒微的出身並不妨礙神的工作。神後來在香港和美國大大使用蘇Sir，在香港創立多家教會，在美國也是果實纍纍。

書中有許多篇幅是有關他父親的生平，和他與父親的相處（特別是他帶領父親信主的往事）。蘇Sir的弟弟後來到了香港，起初與父親

的關係很緊張，其中因為父親似乎偏愛蘇Sir，對弟弟比較嚴苛。蘇Sir在家中要負起調和的角色。在蘇Sir與父親數十年共處中，看到他的孝心與愛心。書中有關父親養豬的記載，才知道原來蘇Sir對養豬也頗有心得（第16章）。蘇Sir父親的一生也是十分精彩，從當兵到建立孤兒院，從作「末代豬農」到追求真道而成為基督徒。要更多認識蘇Sir父親的生平，可閱讀蘇Sir「更美的家鄉」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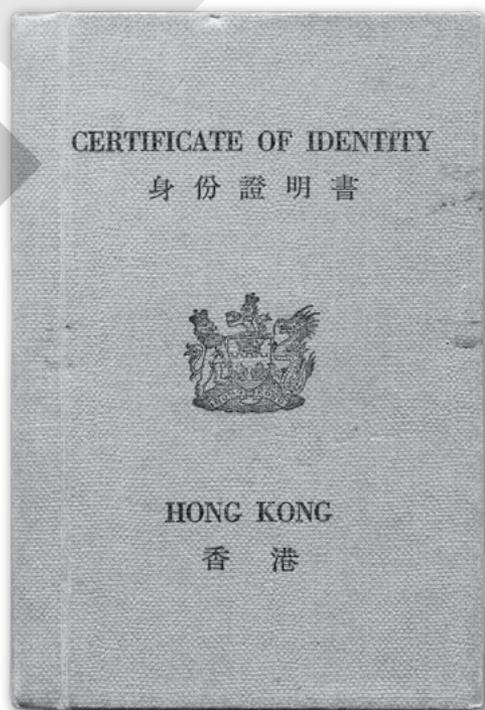
另一個屬靈的教訓是：忠心服侍主的人也會面對人生的苦難，但神必然賜充足的恩典讓我們可以渡過，並且讓苦難成為我們的祝福。蘇Sir和師母近年都曾經歷健康嚴重的問題，兒媳在生產時更意外離世，但在這些痛苦的歲月，卻更感受到主的大愛與恩典。蘇Sir如此記述：「回首向來蕭瑟處，並不是『也無風雨也無晴』，而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這就是有神與無神的分別了。回望過去幾年，君玉曾歷經6次手術，兩次是髖關節手術(Hip Replacement Surgery)，4次是眼部手術，還有在這期間染上Covid-19病毒，真是驚心動魄，但又是何等大的恩惠。」

蘇Sir的一生是積極的和勤奮的，保羅勉勵提摩太的話也可以用來總括蘇Sir的一生：「...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提後六章12節）蘇Sir現今雖然已屆高齡，卻絲毫沒有退下來的計劃，反而訂下了服侍的大計（他稱之為「夢境」）。在本書結束前，蘇Sir如此鼓勵我們：「但我希望藉此，有更多香港人，認同這異象，投身成為其中一個造夢者。」的確，基督徒都是做夢者，然而靠着主我們的夢想都可以變成理想，而憑著信心和委身，理想也可以成為事實，這是本書給我們的功課。

林修榮.....2022年最後一天

前言篇

第一章



第一章
借問客從何處來

我是隨我的父親在1950年移居香港，並在這東方之珠長大，受教育，工作，結婚。及至1972年來到美國唸神學，4年後才返回香港，在中國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當牧師，並且生兒育女，直至1985年移民美國。2000年，兒女都長大了，我們夫婦二人再重返香港，我繼續在窩福堂事奉，直至2013年退休，才返回美國三藩市灣區定居。

雖然我在香港長大和生活多年，但奇怪我一直都不大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更不以香港人這個身份自豪。有時到別處旅行和遊覽，通常會有人問：你是從哪兒來的？我一口便回答：我是從三藩市來的。在有意無意之間，企圖隱藏我作為香港人的身份。或許這與港英政府的政策有關。何解？港英政府不會頒發BNO給予所有非香港出生人士。雖然我們和那些在香港出生人士同樣是香港居民，享有所有香港居民的權利，持有同一的香港身份證，但我們卻沒有資格申請英國海外人士護照(BNO)，取而代之是一本稱為CI(Certificate of Identity)的證明書，作為旅行證件。但可笑的地方是：有一回，我到倫敦旅行，拿著我那CI入英國境，那海關的官員竟然問我：「這是什麼證件？這不是一本護照，我要詢問我的上司才可以批准你入境？」我常用自嘲的方式對人說：「這不是Certificate of Identity，而是Certificate of NO Identity。」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但自從幾年前的「反送中運動」以來，我的心態奇蹟地改變了許多；我不再以自己為香港人而自卑，而且心底裏有著從沒有過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我忽然體會到，無論我怎樣一直以來否定「香港人」這個身份，但這身份似乎已牢牢的印在我心底裏。尤其看到這幾年香港的轉變，覺得心痛，難過和低落。特別在這一年來，我的情緒往往隨著香港所發生的巨變低沉下來。腦海中一幅幅百萬人上街抗議的圖畫，就是在夢境中也揮之不去！

什麼叫做香港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國際都會，中國海岸的一個城市。1997年以前是英國殖民地，到了1997年後，香港便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又是與中國不同的部份，即所謂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中國是河水，香港是井水，河水不犯井水；(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地區，可以維持原有的制度50年不變)。香港既不是一個國家，美國有Americans，中國有Chinese，英國有British，但香港卻沒有Hong Kongers。然而，據大部份人的研究，香港人都不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我意思是如大陸的中國人)，當然也不覺得自己是英國人，1997年之前如是，1997年後也是如是。或許我們可以說：「沒有身份，便是香港人的身份」，就如CI(Certificate of Identity)所帶給我們的印象。

在1997年前，鄧小平屢次對香港人說：「馬照跑，舞照跳」，我始終不大明白鄧小平這句話的意思，難道他以為「跑馬」「跳舞」便是香港人身份之特徵？抑或他是保證香港會一直保持繁榮安定？若是後者，難道香港的繁榮安定只能維持50年嗎？若是前者，我就更摸不著頭腦了！因為大部份香港人都不跑馬，也不跳舞，「跑馬」和「跳舞」都絕不是香港人的特色。那麼，香港人的特色又是什麼呢？

當中英在 1984 年開始談判有關 1997 年後的香港問題時，雙方討論的焦點在乎香港的治權問題，英國所提出的方案是主權歸中國，但治權仍由英國管理；就好像租屋一樣，屋權歸業主，但治權卻歸租客。租客既住在那兒，當然是有權管理家中的佈置，使用等。中方對此建議強烈反對，以為主權與治權是不可分割的。然而，雙方都體會到：若中國收回香港，視香港為中方一部分、法制、經濟模式、教育制度等等都與中國大陸接軌，毫無分別，這會引起極大的震盪，帶來極度不穩。他們怎樣最後可以獲得共識，雙方同意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中英協議呢？原來這是因為中方代表李瑞環講了一個故事，英方代表立即明白過來，並且願意簽署這個協議，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李瑞環說：「中國昔日有一個窮老太太，非常貧窮，連兩餐也成問題。然而，她家傳一個宜興紫砂小茶壺，起碼有 200 年歷史，所以積聚了不少茶垢，就是不加茶葉，只要倒上滾水於茶壺內，即可以有茶香的味道。她為了生計，就決定賣掉這家傳之寶。一個有錢人，用了 3 兩銀子的高價購買了這茶壺，老太太非常高興。當那個有錢人取這茶壺時，她看著這個家傳之寶，有點看不順眼，因為這茶壺實在太殘舊了，滿壺茶垢，不好看，於是決定為這有錢人効勞，把這茶壺除垢，擦得乾乾淨淨。怎料，當這個有錢人一看到這乾乾淨淨的茶壺，極度不快，對這老太太說：『我不買了，你現在的茶壺完全沒有茶垢積聚下來，連一個仙也不值。』」

英國人聽了完全明白過來，以為中國一定會存留著英國在過去 100 多年來在香港所留下茶垢，不會輕易把它擦掉。因為一擦掉，香港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英國人就安心簽上那中英協議：一國兩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會犯井水！

究竟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香港茶垢是什麼呢？除了「馬照跑，舞照跳」或港式奶茶，香港還有一些什麼特色呢？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那本“East And West”一書中有云：

「香港的成功與特色，在乎它擁有一個廉潔而公開的政權，一套健全的普通法法制，及人人都有機會參與和批評的政府，市民又享有新聞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和一個尊重人權的管治。」

彭定康所說的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我總覺得香港人的DNA主要並不是這些硬件配套，而是一些較深層次，較貼地的香港人精神；我們亦可以從香港人的語言、生活、文化、電影、音樂，傳媒等略窺一二。

首先談談香港的廣東話。彭定康一書的書名是“East and West”。香港的確是一個華洋雜處，不中不西，但卻又能融和華洋中西之結晶品，而且非常巧妙地融和在一起，舉世無雙。或許有人反駁說，香港並非世界唯一說粵語的地方，這又有何獨特之處呢？香港的廣東話是不一樣的廣東話，因為它象徵一種融和四海，古今中外的語言，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我意思是廣東話現今只作口傳，不可書寫)。

1) 首先，它蘊藏著濃厚的古典風味。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 隔離鄰舍—「隔離」一詞原來是唐朝常用的詞語，就如杜甫《客至》一詩有云：「隔離呼取盡餘杯」！
- 即係一莫以為這是俗鄙之語，原來這個詞也是古語。《水滸傳》有云：「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
- 老公—香港人稱丈夫為「老公」，莫以為這是粗鄙之俗語，

《水滸傳》24回：「王婆對西門慶說：『大官人怎樣不認得？她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買熟食。』」

• 老豆一老豆者：老竇也。老竇是對尊敬的父親竇燕山之稱謂：「竇燕山，有義方，其五子，名顯揚！」《三字經》

- 2) 它亦融化了不少英文詞彙，成為我們香港人的普通對話常見之香港話，什麼的士，波士，Ben士，K士(Case)，芝士，卡士(Cast)，Mat士(Maths)，沙士(SARS)，tay士(taste)，巴士，Pa士(pass)，總之那些「士士」聲的大多是來自大英帝國。
- 3) 它也融洽了日本語，香港人稱日本人為「㗎仔」，因為日本人在問話中常用「㗎」這字作為一個問號，於是我們香港人的對話中，我們亦模仿了日本人的句法，往往加上一個「㗎字」作為問號，或許你有懷疑我們的講法，便問道：「係咪㗎？」
- 4) 自九零年代，中港交流漸趨頻繁，自然我們香港人的日常語中也加上了不少有中國特色的廣東話，什麼「打的」「中聯辦」「特首辦」等等都是其中一些例子。

所以，我們可以說，從「香港話」中，我們也可以畧窺香港文化的特色，香港是一個能包容及融和各類文化而「炒埋一碟」的特有文化。正如梁錦松說：我們的語言，不但是融合各種不同的字彙，而且我們更是兩文三語，所謂兩文是指中文和英文的二種官方語言，我所謂三語是指我們所用的是口講的廣東話，書寫的白話及背書的文言文。

論到教育方面，香港的教育制度真是舉世無雙。先論數學中的錢幣制度，平日我們所講的是「一蚊一毫」，回到學校書本上卻找不到一蚊一毫，而是一元一角。到了中學，我是唸英文中學，數學教科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來自英國，所用的錢幣再不是一元一角了，而是一鎊，一先令，一便士，一鎊有20先令，一先令有12便士，真是麻煩到極，更麻煩的，一個便士稱penny，多過一個便士卻不是pennies，而是pence。為什麼不叫pennies，而叫pence，我就不得而知了！還有，21個先令稱guinea，5個先令叫crown，2先令6便士叫做half crown。更莫明其妙的是：pound(鎊)的簡寫不是頭一個字母p，而是類似2的一個符號£，但先令卻又是用英文頭一個字母s，但pence卻不用p，而是用d，這簡直是折磨我們一群在香港從不用鎊，先令，便士的香港學生，我們這輩子有幸受此種教育，卻訓練出我們如此包容和精打細算，明察秋毫，一分一毫都分辨得清清楚楚。而且，這更叫我們能跟隨孔夫子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格言，在街市我們懂得用一蚊一毫，在會計上用一元一角，考試時則改用鎊，先令和便士了！

如果我們說錢幣制度混亂，那麼其他度量衡的制度就更複雜了，到上環買布疋，我們用中國傳統的尺和寸，更大的有丈和里，成語中更有仞。但上數學堂，我們則用英制的哩了，一哩有1,760碼，即5,280呎，一碼有3呎，一呎有12吋。此外，有所謂的furlong，league等，喜歡跑馬的人便知道furlong是什麼，至於league則非常罕見。原來一個league有3哩，從前有一套電影叫「海底60,000哩」，英文是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所以中文便譯作海底60,000哩。因為非常麻煩，現在就改用公尺，公里了。

至於容量就更麻煩了，在街市買餸是半斤八兩，轉頭去超級市場卻是磅和安士，現在卻是什麼千克等，難怪像我這樣一個數學不太有恩賜的人，一來到數目，通常我都會出錯！

我引用這些例子，是要說明在這種教育制度下，訓練出香港人

一種能融和和適應的能力，我們習慣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作選擇：古與今之選擇，中與西之選擇，但在諸多的選擇中卻又能保持融和。所以在殖民歲月的香江，我們中學有中文中學，英文中學，在學校有文科與理科的選擇，我們對專一，獨一，毫無選擇的管治帶著一種強烈的反感，我們崇尚自由，不希望在上的剝奪我們這選擇之權利。所以，香港的特色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沒有身份的身份，沒有民主的自由」，英國人作為一個殖民統治者，在這方面是做得非常精明的。

我想再談談「沒有身份的身份」這香港人特色，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因懼怕中國共產黨統治而逃到香港，所以在屢次的民調中，都指出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是低的，我們就以香港大學在2018年作過一個民調，隨機用電話訪問了1,200個香港人，結果如下：

50%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25%認為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

13%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11%認為自己是香港的中國人

從廣義來說，有75%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只有24%的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從歷史的背景看，這數字一點也不出奇。然而，香港人雖然被英國統治了超過100年，但幾乎大部份的香港人都不會認同自己是英國人；事實上英國政府也從不以為這殖民地的居民是英國人。面對著這「沒有身份的身份」的香港人，香港人的態度又如何？

香港人從中國落難來到香港，父母之輩都切切吩咐我們不要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攬事」，作個順民。我們這一輩在金字塔式淘汰的教育制度下，過了一關又一關地上到高等教育階段，終於得到大學學位，這對我們的前途有著很重要的影響。所謂得來不易，就要小心翼翼地保持這個「精英」階層的特殊地位，這樣我們就當起港英政府的護航。然而，心有不甘者，就非常隱晦地表達我們的「不順」，這種隱晦表現(subtlety)往往從一些好似無關重要的事情上表露無遺。

我們就以中環的皇后像廣場為例。昔日，維多利亞女皇的銅像放在這廣場上，因而定名為皇后像廣場，英文名叫Statue Square。那個作翻譯的師爺，竟然一筆把尊貴的女皇貶為皇后。英文的Queen可作女皇，亦可作皇后，真是幽他「事頭婆」一默。這舉動卻為日後的羅大佑看穿，那從台灣來港的羅大佑，不懂我們香港人的subtlety，竟然唱出「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真是不知好歹。不過，現在皇后像廣場的像也不是皇后像了，取而代之是上世紀匯豐銀行最有功績最具影響力的一名大班員臣(Thomas Jackson)，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維多利亞女皇的像被日軍「俘虜」了，成為戰利品。戰後才由英軍迎回，並改而放在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內大石台上。

不過，我們看到港人這種Subtlety，是做人處世之道，難怪香港人最善長做「白手套」，左又得，右又得，中又得，英又得；心有不順時便把總督MacDonnell譯作「麥當奴」，咒他當奴隸，他也懵然不知，這就是香港人在殖民歲月下的生存之道！

當然，並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是如是，但最近再聽《獅子山下》這首廣東話歌，不禁流出眼淚來，或許這是否就是我先所講的香港精神？但這精神是否仍在？

人生中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我想最佳答案還是看看香港由1949-2022的歷史，正因如此，我決定
把我在這70年來的所見所聞所經歷記錄下來，以作分享！

七十年來家與國，
三地兩岸山與河，
千里尋根何處覓？
萬古磐石為我開！

難民篇

第二至六章



第二章

一江春水
向東流

(1946-1949)

我生於1946年2月17日，即農曆正月十六日。小時候，不少長輩都對我說：「你真是幸福啊！抗戰時代，你仍然可以躲在母親的腹中，不用經歷那些艱辛的日子；一出生，天下太平了！」我本以為他們說得對；但年紀稍長，對歷史稍有認識，我心中不禁起了疑問：我真的幸福嗎？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在降書第2款寫著：「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明明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以及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此日舉國歡騰，在大街上遊行，百姓以為他們終於擺脫了屈辱，不僅是解除了身體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得到自由。他們放鞭炮，挑燈籠，大聲喊著說：「我們終於不用每天在家裏還是擔驚受怕，進出城門，都要向日軍敬禮，成年人還須出示良民證。」

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在美國「密蘇理」號巡洋艦簽署降書。陸軍上將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名確認。中國舉國歡慶，國民政府確定了9月3日為紀念日。上海和全國在頃刻之間變成狂歡之海。國民政府及蔣介石本人均對此勝利慶典高度重視，並積極籌備祝捷大會。9月3日上午，在陪都重慶鳴放禮炮101響。國府官員齊集

國民政府禮堂，文官著長衫馬褂，武官穿戎裝，蔣介石則穿上特級上將制服，率領文武百官，向東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國父孫中山。並向全國發表勝利文告：

「全國同胞們，日本已向我們正式簽定降書，世界反侵略戰爭至今已經完全結束了。我們中國人八年來艱辛的抗戰，到今天總算是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歡騰的一天，也是我全國同胞在飽受艱難，非常痛苦之餘，應該慶祝鼓舞的一天。我們遙祭國父，告慰我們中華民國開國導師在天之靈；也可以告慰國民革命先烈和抗戰中慷慨捐軀的軍民先烈之靈。

我全國軍民經過八年來無比的痛苦和犧牲，才結成今日光榮的果實。是全國同胞每一個人所應該十分尊重和保持的。只可以使之發揚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損害，以至於喪失！中正個人感懷過去全國的奮鬥，看到當前的滿目瘡痍，更覺感慨萬千，不知所云。在此從戰爭到和平的緊要關頭，我們正與各盟邦結束50年來日本侵略主義釀成的險惡局勢，共同締結東亞與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和安全。我們更需在四鄰親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殘局，恢復秩序，救濟修復區苦難同胞，撫卹死傷軍民的遺族，醫治疾苦。而且為使過去犧牲真正有代價，更須在此時際開創民主憲政之規模，鞏固國家一統的基礎。我全國同胞在過去曾團結一致支持抗戰，爭取勝利。在今後必能團結一致，使民主與統一共底于城，使民生主義的政策與計劃在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得以貫徹實施」。

其後，蔣介石率文武百官，乘車在市區巡遊，接受國民的致敬。一路上，軍樂大作，儀仗隊持槍致敬；國民則歡呼鼓掌，這是蔣介石一生最榮耀的一刻。正如他在日記中有這樣的描述：「…沿途民眾，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其發乎內心之一種情緒，對余所表示敬慕愛戴之精神，狂歡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與奮鬥，惟見好略得安慰矣！」

其實，這種情形不只是在重慶發生，幾乎全國都有類似的捉捷氣氛。就如上海，據上海圖畫新聞的報導：全市500萬市民，在天氣晴朗之破曉中，即聞爆竹聲，如連珠般此起彼伏，全市振奮，莫可名狀…繼有8年來首次大規模遊行，遊行隊伍路過之處，沿途市民熱烈加以鼓掌歡呼！入夜慶祝牌樓及各機關各商店，燈彩大放光明，空前盛況。

然而，1946年是否如蔣介石所說「共諱永久和平和安全的契機呢？」歷史告訴我們：短短的3、4年，國民黨就完全崩潰，蔣介石敗走台灣。不少人都會問道：「蔣介石可以抵抗強大的日本有8年之久，最終獲得勝利。為什麼他不消3、4年就敗亡於那個在軍力上遠遜國民黨軍隊的共產黨手下呢？」著名的加拿大歷史學家戴安娜教授 Dr. Diana Lary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蔣介石以為日本只不過是皮膚病，共產黨才是心臟病。所以他推出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然而他錯了！日本不是「皮膚病」，乃是「皮膚癌」。經過了8年的孕育，癌病已發展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在戴安娜教授那本《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一書中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1937-1945)，生動地刻畫出一幅中國人民抗戰八年苦難深重的流離圖，令人讀後深深感動。她是這樣描述這場侵華的大災難：

「八年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動盪、混亂時期之一，這是個勇氣和犧牲年代，也是個受難和損失的年代。這場戰爭的規模，和他帶來的犧牲之慘烈，全都是空前而巨大，估計有2至3千萬人喪失

生命，國軍官兵死亡達3百多萬人。人民財產巨大損失，無法統計。中國社會架構全面崩潰。1945年抗戰勝利時，中國已打得國困民貧，經濟上通貨膨脹失控，人民元氣大傷。這一場勝利可說是慘勝」。

然而中國要付出的代價，並非一些冷冰冰的研究數字可以表達出來。而是中國人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苦楚，一個一個的大悲劇故事，盡在眼前。戴安娜教授這本書述及抗戰所引發的社會變遷 social transformation。她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報導、回憶、文藝作品、電影、歌曲而寫出一個一個動人的故事。看到中國此時此刻，已經到了一個無可挽救的地步。國民政府處理這殘局的手段實在令人民太失望太憤怒了。其中「一江春水向東流」這電影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此電影拍攝於1947年，分「百年離亂」和「天亮前後」上下兩集。蔡楚生是編劇及導演，並由當年極紅一時的明星白楊、陶金領銜演出。這部電影於1947年10月在上海公映，反應極為熱烈，創下國產片最高上座紀錄，觀眾達70多萬人，佔全上海市人口的14.39%！何解？因為這故事講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在8年抗戰所付上的沉重代價和悲慘遭遇。

素芬是上海某紗廠女士，在夜校讀書時結識了教師張忠良，結為夫婦。婚後1年，抗戰爆發。他們的孩子出生，取名抗生。忠良參加救護隊，奉命隨軍轉移。素芬則與婆婆及孩子到家鄉居住避難。但當日軍進佔他們的家鄉時，忠良的父親被日軍打死。忠良的弟弟忠民與教師婉華加入了抗日遊擊隊。素芬和兒子、婆婆來到上海。素芬在難民收容所照顧孤兒。

忠良後來到了重慶，流落街頭；哀求之前認識的交際花王麗珍，並在王的乾爹開設的公司覓得一職，其後更與王麗珍同居；並升為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乾爸的私人秘書。在上海的素芬，日子真不好過，難民收容所被日軍強行結束，他們屢受日軍監禁。

抗戰勝利後忠良與王麗珍返回上海，住在王麗珍表姐何文艷家。忠良又與何文艷有曖昧關係。這時素芬生活困難，來到何家當起女傭。何文艷舉行家宴，忠良和王麗珍翩然起舞，為素芬發現，一時心酸，失手打落杯盤；四座中譁然，素芬從混亂中逃出。回家後接忠民來信，喜報與婉華結婚，並向兄嫂祝福。素芬讀信，泣不成聲。始把實情告知婆婆。婆婆氣憤之餘，攜著素芬母子二人找忠良，母親聲淚俱下，力勸他不應貪新忘舊。此時王麗珍從樓上直衝下來，猛擱忠良耳光；極盡侮辱之能事。忠良軟弱，唯唯諾諾，不敢抵抗。最後素芬在悲憤之餘，投黃埔江自盡。老母與抗生在江邊號啕痛哭。全劇終於悲劇結束。

「一江春水向東流」不過是千千萬萬中國人其中的1個故事。八年抗戰結束，中國人民並沒有嚐到勝利的果實。旋即國共內戰，戰爭再延續四年。人民厭戰心理，再加上通貨膨脹，生活艱苦，失業破產。造成大量失望幻滅的民眾。戴安娜教授引述夏志清在他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一段話：

「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一股腦兒推到無能的貪污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黨宣傳的欺騙。」

我父親在抗戰期間，跟隨廣東名將伍觀淇在威整一帶抗日。伍司令是父親亦師亦友。他奉命成立廣東第一區遊擊縱隊。所有番禺、從化、花縣武裝團隊均受他指揮。中日戰爭結束前1年，番禺縣長黃蘭友委派父親為禺北敵後區長。中日戰爭結束後，父親接收禺北區偽區公所，

辦理善後工作。經過年餘，區公所奉命結束。父親繼任為禺北行政區指導員，後來他辭去官職，專心創辦禺北抗屬孤兒院。

父親之所以離開軍政界，專心創立抗屬孤兒院，是有著一段非常痛苦的掙扎，然後採取果斷的決定。中日戰爭結束後，國民政府並沒有顧念陣亡將士的遺孤，很多孤兒寡婦流落街頭，飢寒交迫，生活困苦。其實，就是那些倖存的官兵，勝利後即遭遣散，但卻沒有遣散費。當時市面蕭條，經濟不景，不易找到工作。於是生活非常困苦，憂柴憂米。這些官兵在抗日時犧牲了家庭、職業、甚至生命來保護國家。但勝利後卻遭如此涼薄的待遇，實在不合情理。伍觀淇曾與後方醫院院長馬仰乾前往廣州，與余漢謀將軍見面，力陳當日的時弊。但結果，官兵所得的遣散費仍是不足；尤其那些孤兒寡婦更是苦不堪言。父親有見及此，決心創辦抗屬孤兒院，收留抗戰時官兵的遺屬。

抗屬孤兒院屬慈善組織，並沒有得到政府的補助和津貼。開辦費及經費完全靠自籌。然而當時戰後經濟一片蕭條，元氣大傷，所籌的有限。但入院的兒童每日俱增，所有衣、食、教師薪津需費甚大。父親把自己的積蓄取出來，只夠半年之用。令他真有羅掘俱窮之嘆！

父親當時雖非基督教教徒，但與禺北中華基督教會教友素有往來；因為中日抗戰末期，禺北地方治安極其紊亂。父親當時在敵後工作，所有教會機構，在直接和間接之間，常倚賴父親及其部隊之保護，因此建立了一個互信的關係。教會得聞孤兒院經濟困難，乃主動與父親商量解決方法。時牧師紐西蘭人鄭信榮介紹了父親給美華兒童福利會的美國人牧師李士認識。李士牧師於是親自來到江村孤兒院視察，看到到孤兒的情況，深受感動；並答應予以救援。並鼓勵抗屬

孤兒院加入該會，成為該會所屬孤兒院之一。因此，抗屬孤兒院便改名為美華兒童福利會禹光孤兒院。所收孤兒名額100人，按月撥助孤兒院的全部費用。

禹光孤兒院經費有了著落，又陸續得到世界救濟會之物資供應，遂得以迅速擴張與發展：先後闢有農場30餘畝之地，種植果樹，飼養牛隻與肉豬。更準備籌備基金，建築新的院址，不用再租用鄉間祠廟為孤兒院基地，準備在五年內建成一所有規模的孤兒院院址。這是父親的夢，然而1946年至1949年期間國內戰火四起，國共和談失敗，中國再捲入戰爭的漩渦中。經濟更是暗淡，但我們身居南方，情況比較穩定。我們一家尚算平安渡日。父親日以繼夜的忙於禹光孤兒院工作，母親則在家中開設留產所，替人接生。家姐穎儀開始在紐西蘭差會開辦的德基幼稚園讀書，弟弟穎智與妹妹穎微相繼出世。同父異母的大家姐穎川則已成家立室，大哥穎聰在廣州師範學校唸書。但父親心裏一直憂心著：不知這些太平日子還可以持續多久呢？

第三章
**最是倉皇
辭廟日**
(1949)

1948年，中共攻打長春時，因強攻不得手，於是改變策略，改用圍城絕糧的方法，逼使長春守敵投降。林彪在5月30日下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守長春的是鄭洞國將軍，他是1943年駐印新一軍軍長，也是孫立人將軍之夥伴，他拒絕投降。由於城裏50萬平民的存糧只能維持到7月底，於是鄭將軍要平民離城。

但林彪的策略是嚴禁城內百姓出城，只有帶槍和軍用品的人才能放出；一方面是鼓勵國民黨軍人投誠，另一方便務使平民耗盡所剩糧食。這策略果然奏效，造成市內嚴重糧荒，百姓只靠樹葉青草充飢，餓死的超過12萬人，他們都是平民百姓，也是這場內戰中的犧牲品。而携槍逃亡的國民黨官兵及其家屬却受到特別歡迎，沿途關照優待，就是因為這政策，以致解放軍的實力越來越強，不少國民黨的官兵倒戈相對，以致形勢突然逆轉；再加上蔣介石這回沒有實行焦土政策，只帶走了一部份寶貴的故宮文物和飛機，甚至所有重要的工業設施都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裏，所以毛澤東繼承下來的不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而是1,000座「幾乎未有一點破壞」(陳毅語)的工廠，礦山及整個工業體系，包括68家軍工廠，而那些國民黨的降兵也成為日後韓戰中共抗美援朝之「志願軍之骨幹！」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長春失守，11月再攻克瀋陽，全東北都落在林彪手中。這場所謂遼瀋戰役就啟開了共產黨勝利之門。到了1949年1月10日，中共再一鼓作氣，再次發動淮海戰役，重創蔣介石的黃伯韜，黃維和杜聿明3個兵團，佔領了整個中原地區，其後又展開平津戰役，攻克天津，解放北平。經過此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已經徹底失敗。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橫渡長江，23日進入首都南京，國民政府從南京移師廣州，又由廣州遷到台北，國民黨的統治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突然出現了一個紅色的中國。

龍應台在她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序言有云：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
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
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倖存的，一生動盪，萬里飄零。
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
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
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頭播種，
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我也是一個「失敗者」的下一代。父親本可在秘魯安居樂業，但在正茂的年華，被國家感動，回到故鄉棄商從戎。8年抗戰，歷經數以百計的大小戰役，終於抗戰勝利。但目睹昔日同袍遺屬，流離顛沛，不得撫恤，毅然又再放棄軍政界，投身在國家重建的行列中，銳意創立禹北孤兒院，照顧那些無家可歸遺屬，但未幾，國家又陷內戰，父親頓然感到茫茫然，面臨人生至大的抉擇。

當長春失守的時候，父親在南方正忙於發展禹北孤兒院事務，而南方亦比較平靜，但他心裏却一點平靜也沒有。一方面在長春城內的守軍，不少是前新一軍的士兵，而守將鄭洞國更是新一軍的將領。父親一向對孫立人將軍非常敬仰，以為他是一個極出色的人才，他兒子有幸跟隨孫將軍在緬甸與日軍作戰而感到驕傲！雖然大哥在從緬甸回中國期間，吃了野味而染上急病逝世，但想到他不少同袍都葬身在遼瀋之役中，父親心裏總是有點不好受，尤其他要面對人生中最大的抉擇：去抑或留？

抗戰後，父親親手創辦了禹北遺屬孤兒院，收容抗戰時陣亡官兵家屬兒女，並接到美華兒童福利會之經濟援助，院務蒸蒸日上，並預備在五年內建成一所宏偉之孤兒院院址。而母親亦開始經營留產所，父親更與友人合資經營永成杉店，情況大好。要一下子放棄所有這些，真不容易。再者，他亦師亦友的伍觀淇將軍，曾力勸父親留在大陸，並把他去函廣東省省長葉劍英為父親寫求情信稿給他看。伍將軍是父親非常敬佩的上司，又是一個研究《大學》《中庸》的學者，他與李濟琛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老同學，有深厚的感情，他們二者都有左傾思想，常常討論及研究馬克斯主義的書籍。1935年李濟琛因提出與中共合作，與蔣介石鬧反，李出走香港，與陳銘樞，蔡延錯等在香港建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李濟琛為主席。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取消對李濟琛的通緝，1945年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但旋即爆發國共內戰，李濟琛前往香港，公開反蔣，並號召國民黨黨內人仕，「站出來改正反動派錯誤」，再被開除國民黨黨籍。在1947年，父親陪同伍觀淇應鄭彥芬之邀請，同來香港找李濟琛。據父親所透露，那時李濟琛的寓所是位於香港的羅便臣道，他們來港主要目的，是邀請李濟琛斡旋國共和平談判。事實上，李濟琛不但沒有答應，反而說服伍觀淇加入共產黨行列，並於1948年5月，赴東北解放區，1949年1月22日發表時局聲明，響應共產黨提出召開「新政協」，並於9月參加中共發起第一次政協會議。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廣州，翌年冬天，李濟琛通過統戰部，邀請伍觀淇進北京，他到了北京後，一直都未獲妥善安排，他只能閒居中協助梁漱溟編纂出版大學禮記篇。據父親所說：「他雖得到李濟琛維護，但受良心譴責，傷心患病而死，他有許多抗戰時的部下都被害死。」而伍觀淇則於1952年冬，因胃病惡化而死亡，終年63歲。然而，自1948年至1951年中間，他不斷地說父親從香港回國，為新政權効力。據父親所載：母親之所以自盡，相信她也是因為被逼寫信勸父親回國，她為了父親及我和家姐，就寧願自己犧牲。

父親起初還是有點躊躇，但當他又深知自己在禺北也算是一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在軍政界也相當活躍，在共產黨的政權下，正被視為「罪孽深重份子」。再加上李牧師既為他預備了後路，便決定

趕快離開，加入1949大江大海行列，並留在香港。因為他離開時太倉皇，只拿著300元來港，其餘一切產業及現金都留在江村。父親先行，隔了一陣子，母親帶著我們一家5口忽忽離開江村。

1949是大撤退時期，龍應台在她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這樣的描繪：

「...一路的狼狽過徙，從火車站到火車站，過江過河過大山...終於來到混亂騷動的碼頭上，洶湧的人潮拚命地要擠上大船.....沿海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炮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奉命負責掩護撤退的部隊，邊打邊退，好不容易，最後到達碼頭，却只能在岸上看著軍艦迅速起錨逃難。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船上的人，不得不淚眼汪汪，看著掩護自己上船的袍澤被拋棄。碼頭上的傷兵絕望地倒在地上放聲痛哭，沒負傷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邊緣，後面是家鄉阻隔在萬里烽火以外，前面是完全背棄了你的汪洋大海。上了船的，這時也傻了，也不知船要開到那兒...」

這是一幅多淒慘的圖畫，我們一家雖然也是倉皇而逃，也是從火車站到火車站，在火車站中也是洶湧的人潮拼命地要擠上火車，城外還有零星的槍炮聲，但比起那些從海南島撤退的軍民，似乎是幸福得多。

1949年10月14日國軍將領余漢謀及薛岳與他12萬部隊從黃埔坐船離開廣州，前往台灣。該晚，解放軍即從大北路入城，基本上解放軍不費一兵一卒便解放了廣州。24日廣州市委員會成立，葉劍英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任書記，28日廣州市政府成立，葉劍英任市長。

1950年初一個大清早，我們四兄弟姊妹還在睡夢中，母親便叫醒了我們。但見她面色蒼白，好像非常緊張似的。她吩咐我們趕快收拾簡單行李，我們要趕著離家，一同前往香港與父親團聚。父親在廣州解放後不久，便決定自己先去香港，預備一切，等時機來時我們便前往相會。那時家姐穎儀6歲，我4歲，穎智兩歲，穎微初生，不夠6個月。

來到廣州，已經差不多是中午時分，火車站內人山人海，拖男帶女，氣氛非常緊張，那時沒有中港直通車，火車載我們到深圳，然後過關進入香港。我不記得在廣州火車站等候了多少時間，我只記得似乎夜已黑火車才啟程。火車內非常擠逼，幾乎所有乘客都預備前往香港，但每個乘客都非常安靜，火車全部燈光都熄了，我們5個人緊在一角，心裏有莫明的恐懼，我們終於到達了深圳。

深圳河是中英的交界，深圳河自梧桐山發源，從東北往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37公里，河最寬處有75米，最窄處僅為2米，人一躍可以跳過去。1949年以前，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雖然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它是香港與內地來往的唯一法定通道，但兩地居民一般不走羅湖橋，他們習慣牽著牛，揸著犁越過深圳河，想從那裏下水就在那裏下水。兩地的人，常是同一個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結親聯姻。但1949年後情形完全不同了！1949年7月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令葉劍英傳達解放軍部隊，為避免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滾滾洪流南下的數十萬解放軍，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帶不再南下，從此，深圳河北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深圳河南岸隸屬英國政府轄下的港英政府。港英方面開始在邊境中建起鐵絲網，並有尼泊爾廓爾喀僱傭軍駐防，中方也在深圳河邊設立檢查崗哨，

由解放軍公安一零師三零團駐防，而那條羅湖橋便從此成為中港的主要通路了！自1949年下半年，羅湖橋頭突然變得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每天過境人數不下有10萬人之多。

至於通關方面，中方是比較寬鬆的，那年頭，大多的檢查員只在行李上按一下，用生理感應一下包中的藏匿，有些連按也不按就蓋印通關。相對來說，港英方面的檢查就比較嚴格得多，除了檢查出境證件外，還要檢查行李，看看有沒有違禁品。

港英警方在我們過關時，訂了一個非常奇怪的「過橋標準」——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人則不可以，通常他們是看看你能否操流利的廣東話而作制定，就是因為這樣，不少人被拒來港。1956年9月6日的《文匯報》，就有這樣的新聞：

「深圳橋頭，隔河相望，許多人被拒來港」。其中有一段寫著：
「英警藉口，口音不像台山話，一婦人李樹芬難到香港。」

我們一家都操廣東話，過關沒有多大問題，但經過整日緊張，又舟車勞頓，但來到香港的粉嶺，看到父親正在火車站等候我們，我們一家重聚，非常開心，但前面的路向如何，我們一群小孩子似乎不太關心！

第四章 人有悲歡離合 (1951)

1951年12月下旬，父親在香港接到襟弟盧松從廣州來信，報告母親蘊芳死亡的噩耗。信中，他說據女傭人亞大稱，蘊芳是於12月13日晚上，在樓上睡房自縊身亡的。亞大還說：「蘊芳在死前的一天，被當地的區管會傳去問話；回家後沒有出聲，也沒有吃晚飯，很早便回到樓上睡房休息了。」

她的屍體到翌日上午8時，當亞大往樓上打掃時才發現，後來怎樣埋葬，蘊芳為何自殺，盧松並沒有提及。

我們一家豈不是在1950年已經到了香港，怎麼母親又會返回廣州，以致自縊身亡呢？父親從來沒有直接告訴我們。但從他的日記及遺作中，我亦可以猜到箇中因由。

1949年底，廣州淪入共產黨政權後，美華會的美國人李仕牧師，通過友好李啟榮牧師催促父親盡快離開中國，否則會有危險。他又為父親在香港鋪了後路，聘請父親來港協助開辦信愛孤兒院。他先隻身到港，稍後母親才帶領我們四兄弟姊妹一同來港會合。

信愛孤兒院是香港基督教兒童福利會轄下的一間孤兒院(即前身美華兒童福利會)，院長姓顧，是從上海逃難來香港的。他嫉忌之心很重，他知道兒童福利會的主持李仕牧師素來與父親相熟，又信任他，

便對父親產生懷疑。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以為父親有意來奪取他院長的地位。再加上不少院內孤兒都是從廣州逃難來港的，非常尊敬父親，這更令顧院長不安，以致父親在信愛孤兒院期間，非常困難和不安。況且戰後的香港，也是生活困難，不少難民從中國湧來香港，引起不少經濟和社會問題。信愛孤兒院屬於慈善機構，薪水微薄，每月港幣120元。後來在1950年底，福利會美國總會准許父親在新界大埔新創另一間孤兒院，名為農藝所，收容從大陸逃來香港的孤兒學生及在港的孤兒；不過初辦的農藝所，經費相當困難，大部份員工都未能支付全薪，每月只得少許零用錢。父親說：「在這千頭萬緒、經濟困難的時候，便作出母親暫時帶弟弟和妹妹回大陸一趟之決定。」

不過，經濟並不是他這樣決定的主因，而是他內心的爭扎和愛國的情懷驅使。父親之所以離開秘魯，放棄他在異鄉較舒適的生活，是因為他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維催迫他返回故鄉，投身在國內政治和軍事之中。同樣，要他離開在中國建立了的基礎，跑到來這個彈丸之地香港，大有寄人籬下之感，心裏極感不安。再加上在信愛孤兒院不愉快的經歷，更催迫他有回國之念頭。

恰巧此時，他的上司，恩師好友伍觀淇頻寫信勸他回國。伍觀淇是一位研究《大學》，《中庸》的學者，他與李濟深是老同學，感情深厚。李濟深曾任教於黃埔軍校，但在1933年，他提出國民黨應與中共合作，又反對蔣介石，事敗出走香港。1937年國民政府撤銷李濟深之通緝，被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大戰結束後，他前往香港，公開反蔣，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為榮譽主席。1949年，加入共產黨，並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李濟深對伍觀淇的影响頗大。因着李濟深，他常閱讀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對共產黨產生同情之心。當抗戰結束後，伍觀淇也曾應鄭彥芬之邀請，來到香港，請李濟深協助國共和平談判。父親此行也有陪同伍觀淇來港，他還記得那時李濟深是住在港島半山區羅便臣道。

因着這種關係，在抗戰結束後，伍觀淇便加入了共產黨，他不少部下也追隨他。伍觀淇寫信勸父親返大陸，並保證父親安全無恙。在來信中，他並附上他寄給廣東省省長葉劍英為父親求情的信稿，以茲為證。

當時父親心情複雜，一方面他一直都追隨着這位亦師亦友的伍觀淇將軍。現在他更提出如此的保證，他真的心動了！再加上在香港無論在經濟上、事業上、生活適應上都面臨極大的問題。現在豈不是一個黃金機會，為建立新中國而効勞？但另一方面，他始終對共產黨有極大的保留；更何況他是國民黨政府官員，曾當過16,000餘人的蚌湖鄉鄉長，及30餘萬人的區長；也曾指揮過18大隊的敵後武裝部隊？這樣的背景，正是共產黨視為人民公敵，應該受到清算的敵人。再加上好朋友李仕牧師，李啟榮牧師不住的勸喻，他不敢貿貿然返回中國，這實在太冒險了。

就是在這樣的內心掙扎中，他最後想出了一個他以為是最佳的解決方法。父親和母親商量後決定母親帶着弟弟穎智和妹妹穎微回國一行，看個究竟，若情況不佳，可趁此機會變賣鄉下物業，然後再回香港團聚。他們以為這是最佳的決定，但想不到1951年初，剛剛過了農曆新年的時候，也正是他們回國不久之際，中共突然封鎖深圳中港邊境，阻止人民自由出入，從此，父親便與母親失去聯絡，永遠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至於為什麼母親既帶着兩個幼小的兒女，怎會還想到自盡呢？依父親在他遺作中記述，他知道母親是個生性沉默的人。她內心的痛苦，從不輕易向人申訴，總是自己去忍受着。照父親的推測，他死亡的前一日，曾到過區管會一次，說不定她是區管會迫得透不過氣來。他們迫她引誘父親回大陸，而她知道若父親一回大陸，必遭清算。為了保護父親和在港的兒女，寧可自己犧牲，替父親死。又據弟弟後來告訴我們，母親的確曾被公審，被不少人辱罵，被咒罵為地主，及偽政府官員之家屬，母親受不起這些虐待，就昏迷了。那些人就用牛尿把她淋醒，然後再次的辱罵，更慘的，鎮內沒有一個人，甚至是至親的，也沒有一個人夠胆出來，或是暗地支持她。她就好像一個完全被隔絕的「黑五類」，任人蹂躪，欺壓，辱罵，最後就決定自盡身亡，我就這樣失去了我的母親。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已經5歲了，應該是有些記憶，但在我腦海中，一點有關母親的事情都沒有，無論是她的容貌、個性及言行，完全一片空白。我想，可能這是太痛苦了，就不自覺把這些遺下的印象都洗除淨盡，不留下一點痕跡。唯一我能記起的就是一天，我醒來時，已經不見了母親、弟弟和妹妹；我當時年幼，不敢問，也不想問，因為生離死別，實在是太痛苦了，想不到這陰影一直影響着我的成長。

父親和母親由結婚至死別只有短短17年，而且在這17年中，總是聚少離多。他們是在1934年4月間在廣州西濠口桃李園舉行婚禮的。父親當時尚在軍校深造，每星期日只放假一天。到了1935年，他畢業後，又受到省政府派到各縣視察；到了年底，他才在廣東農村合作委員會委派為番禺南海合作示範區主任，並兼任北區第五區的區長。合作示範區是新辦的事業，所有農村合作社的利益和組織，均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宣傳和組織，而且北區第五區的區域相當遼闊，差不多佔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北區人口之四份一，工作非常繁忙，所以鮮有機會給父親顧及家庭。

母親是高等小學畢業，但文學根底很好，而且寫得一手好字，在中日戰爭父親任挺進第四縱隊後方主任，而母親正是他辦事處的書記。在未結婚之前，她當過小學助教，後來在廣州圖強產科學校畢業，畢業後在江村開設留產所。

母親是父親同事沈培生的親戚。當沈培生得知父親有意續絃，就介紹母親給父親認識。母親貌雖不揚，但也不算醜陋；父親覺得她為人沉默、誠實、堅忍，是一個賢內助。她為人柔和謙卑，很少與人吵鬧，每一個雇來的傭人，都能與她和洽相處，絕鮮更換。在結婚初期，父親尚在軍校，家中尚有一位70多歲的母親，及前妻遺下一子一女（那時大哥已經當兵去了，二哥亦早夭折，只剩下蘇穎聰和蘇穎川尚在家中）。婚後，她結束了留產所業務，專心侍奉家中各人。那時父親家境尚在貧困之中，雇不起傭人，母親於是負起全責照顧家中大小。抗戰前夕，父親的母親年事已高，常患病在床，母親便權充她的私人護士，最後她因病進入江村普惠醫院留醫，病情惡化，最後與世長辭！

抗戰初期，廣東軍情告急，敵機不斷轟炸軍事目標地區，北區軍民趕緊組織及訓練民眾，因此父親的工作壓力也愈來愈重。母親因有醫護背景，也加入了普惠醫院護士行列，負責部份訓練民眾一些護理工作，大家都是非常忙碌。

廣州終於在1938年淪陷，父親部隊的防綫駐於三水四會及禺北花縣一帶，距離廣州約百餘里。由於他們是打游擊戰，敵退我進，敵進我退。部隊家屬沒有安定棲身之所，常常要逃亡；有時更在三更

半夜逃亡，祠堂、廟宇破屋或甚至叢林往往都是逃亡家屬棲身的地方。而父親更因隨從部隊鮮有機會關照家屬。記得有一次，敵人突然進攻三水鹿和，而父親當時正與部隊在埠街和大塘隔河與日軍對戰，父親是負責在鹿和錦咀兵站處理槍械和物資疏散，詎料敵人沿大塘上流，渡河偷襲。母親當時正在鹿和，在半夜聽見機槍聲驚醒，便帶同兒女越山入四會黃村，臨時在破舊豬屋後面暫住。黃山附近大山夜間常有野獸出現。有一天早上，母親醒來，發覺豬屋的一頭幼豬被老虎吞噬，地上還有豬的殘骸及血跡滿地。

後來敵人再攻四會威整，母親又要帶着兒女們逃難，這回母親帶着兒女，隨着其他家屬，沿曲江河而下，倉皇出走，在附近的鄉村藏身，直至敵人離開後，再返回曲江。當他們返回曲江，發現滿目瓦礫、灰燼，只能棲身於破舊的木屋內。她身上所攜帶的錢，亦用盡於逃難當中，幸得當時有親戚返回曲江，不得已向他們求援，借了一些本錢在曲江作些小買賣維生。

父親當時駐軍於從化，適逢上級有令帶同一小隊前往三華，以迎接美國十四航空隊視察員進入前綫偵察。三華距離曲江只有3日路程，父親於是趁此機會偷入曲江，帶母親及子女來到從化溫泉，暫住在林團長府上。幸好當時日軍勢力已大為削弱，各線亦只僅守據點，不敢出擊，事實上，中日戰爭已接近尾聲了。

在抗戰期間，父親除了短暫時間充任後方主任外，其餘大部份時間均往來前綫，或是敵後一帶工作，甚鮮有享受家庭相聚的時間，而母親亦因常在走難當中，又擔心兒女之安危及父親在前綫作戰的危險，如此生活，就猶如杜甫之詩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
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
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歔。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這正是我父母當時之寫照！

母親的離去，對我們一家影响非常深遠，在我認識的父親，他常在內疚、抑鬱和怨恨之中。記得家姐唸小學的時候，她在學校學了一首歌，回到家裏就唱起來……「人家有母，唯獨我無。」父親聽到，不問情由，就一掌重重打在家姐臉上，大聲喝着：「不許唱！」家姐當時年幼無知，不知自己犯了什麼錯，令父親如此暴發脾氣。但我看到父親當時眼中充滿淚水，有着極大的歉意，但他始終沒有向家姐道歉，也沒有向她解釋！

—— 父親在他晚年時，有這樣的描述！ ——

「自從蘊芳死後，我始感到人生最大的悲哀，孟子說：「鰥寡孤獨，天下之貧民而無告者。」俗語又說：「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中年喪偶。」我正是過了中年，而不幸的事情，又重臨到我身上，此後我續娶呢，還是鰥居呢？續娶；蘊芳遺下4個兒女，我怎肯將他或她交在繼母的手上呢？鰥居嗎？那麼這四個兒女，最大的不過7歲，一教一養，達到她或他們能夠自立，最低限度還有十餘年的悠長歲月。我要蘊芳能夠瞑目於九泉，我要負起兼顧父母的責任，寧可忍受痛苦，忍受孤寂淒清，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已立下決心了。」

他又寫着說：「蘊芳代我死亡，替我承擔罪孽，我雖然在這年老的時候，過着孤清寂寞的日子，也難補償我的罪過。」

父親除了充滿內疚、孤寂和痛苦外，還要面對諸多從中國來的壓力和辱罵。排山倒海的辱罵和控訴，紛紛出現在國內的報章上，父親被控訴騙走孤兒離國逃到香港，甚至指控他是「劫走」孤兒往香港的。又指控父親當孤兒院院長時虐待孤兒，把不聽話的禁閉在黑房，廁所，豬舍中。又在學生的飯中加沙粒，為的是節餘糧，供彼私囊。總之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都加諸他身上，並呼籲把他帶回國內公審。

父親在港期間，特別是在1950年代，常活在一種恐懼當中，為了保護自己，他改名為蘇森，並與昔日在中國的朋友儘量減少來往。我和家姐就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常活在一種恐懼和不安全的心理狀態中，若不是我們認識了主耶穌，心中得享安寧，否則我真不知對我們有多大負面的影响。

第五章

農藝所
調景嶺
金三角

1994年，我和三藩市播道會幾位弟兄姊妹到泰北的難民村作短期宣教工作，有機會認識了何以高，馬小雲宣教士夫婦和他們在泰北的事工，腦袋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雖然何牧師已經蒙主寵召，但他給我們所講述的故事，卻啟蒙了我許多人生道理；何牧師和我年紀相若，我們的父親，都是國民黨軍隊士兵，我父親駐守廣東，他父親則駐守雲南。解放後，我父親帶領我們一家來到香港，而何牧師的父親則匆忙跟隨李彌將軍部隊退到緬甸，後來轉輾來到泰北，這就是有名的「孤軍」了！

1949年，國共內戰三大戰役後，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軍事優勢。當時雲南省長盧漢已經秘密與中共聯絡，預備倒戈投共。12月9日，盧漢施計，召所有軍事首腦於當晚在他公館舉行緊急會議，出席的有第8軍司令李彌和26軍軍長余程萬。會議期間，盧漢把李彌和廿六軍軍長余程萬拘押，並同時宣佈起義，效忠毛澤東。12月12日，李彌答應「反正」，而被釋放，但他獲釋後立即回到第8軍，並進攻昆明，此時余程萬仍被拘禁，但國軍已經攻至昆明以北，並開始包圍昆明，盧漢只得於12月14日釋放余程萬。到了1950年1月11日，解放軍進攻昆明，發動滇南戰役，並擊潰第8軍，不少將領投誠，但第8軍23師的少將李國輝及26軍93師的譚忠成功突圍逃出，一路自雲南，廣西，貴州南部跋涉，退至緬甸境內，那時兵力約有1,500人，後得其他逃兵及

地主武裝加盟，兵力增至3,000餘人，成為緬泰邊境地區最大一支武裝部隊，並稱為「中華民國復興部隊93師」。

這支孤軍留在緬甸境內，引起緬甸政府不安，於是便發出通牒，要求「孤軍」撤出緬甸，但被孤軍拒絕。1950年6月至8月間，緬甸國防出動空軍及炮兵進攻在「大其力」的孤軍，卻為李國輝部隊所擊退。蔣介石有見及此，乃暗中支援，企圖建立反攻大陸基地，故此金三角地區的孤軍不斷壯大，到了1953年春天，緬甸政府不惜重金雇來原英屬的國際軍團，向孤軍進攻，雙方投入10萬兵力，這場名為「旱季風暴」的攻勢，可算是金三角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沒想到這支孤軍竟然再勝利，國際軍團全軍覆滅，總指揮丹尼開鎗自殺。緬甸政府乃向聯合國控告孤軍。聯合國要求孤軍退出緬甸，而蔣介石在國際壓力下，不得不停止援助孤軍。

孤軍當時處境非常尷尬，重返共產黨所控制的中國形同尋死，緬甸又憚忌孤軍這支武裝部隊，視之為心腹大患，儘管孤軍一再聲明他們對緬甸絕無佔領緬甸領土的野心，緬甸仍不相信，更不惜用盡方法趕絕他們。而蔣介石在此時又不再加以援手，往台灣的希望也屬渺茫，真所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正是當時在異域孤軍的寫照。他們如「過街老鼠」，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

據一些孤軍家眷的回憶，這段日子真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傷痛；他們隨部隊逃到緬甸，不少就如如何牧師一樣，童年沒有歡樂，半生逃亡，記憶中盡是泥濘，空襲，炸彈，死亡的片段。他們到處流竄，每逃到一個新據點，第一件事就是總動員挖坑挖洞，大小孩子都要落手落腳挖，因為敵軍飛機來襲毫無預警，提早作準備，挖防空洞避避，是戰時求生的關鍵。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雖然蔣介石於1950年以飛機運載了約7,000名孤軍及家眷撤至台灣，但仍有不少孤軍留在異域，他們更名為「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由李文煥、段希文率領，他們離開緬甸，進駐在泰北清萊，美斯樂等地，此時這地，屬窮山惡水之處，我們發覺在美斯樂之泰北義民文史館有碑載：「為了生存，奮戰於窮山惡水之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凡十有餘年」，他們是正式無身份之難民。雖然台灣安排了第二次撤離，有5,000多人撤至台灣，但仍有不少孤軍滯留山區，並且再得不著台灣任何的援助，真是一支名副其實的孤軍！

此時，泰國邊境之共產黨游擊隊活躍，泰國政府曾屢次進行剿共，均告失敗。孤軍首領段希文，李文煥乃與泰國政府協議，答應出兵協助泰國政府剿共，以換取在泰國的居留權。據何牧師說：這孤軍為求生存，置死地而後生，經過多次掃蕩，終於在短時期內消滅苗共與泰共，成功換取了在這窮山惡水之地之居留權。在這次剿共行動中，數百名孤軍壯烈犧牲，身負重傷者亦不計其數。在東南亞諸國中，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地先後赤化，唯獨泰國免此災難，實拜這支孤軍所賜。直至1981年，泰皇確認孤軍地位，准許部份孤軍歸化泰籍，何牧師才有機會成為泰國人，然而，其餘未獲入泰籍的孤軍及其後裔只能獲得泰國的難民證；並只限留在泰北窮山惡水之地，渡過餘生。

當孤軍及其家眷留在這異域，由於土地並不肥沃，農耕困難，生活艱苦，後來有些人開始種植鴉片，大麻等，因而發達，並供應全球毒品，這就是著名的金三角了。那些不願從事這行業的，仍舊過著非常困苦的生活。1994年我們往泰北作短宣的時候，發覺不少兒童過著非常貧窮的生活，他們從沒有洗澡，漱口的習慣，所以不少染上

了皮膚病;更沒有機會受教育。然而,有趣的地方,幾乎每條鄉村都有基督教教堂,不少外國宣教士都來到這兒宣教,其中一位便是馬小芸宣教士,她是從香港來的,後來認識了何以高,並結為夫婦,一生在這異域,服侍那些孤軍的後裔,他們大多是半夷半華,不少孤軍是隻身隨部隊進入緬甸,當他們落腳之後,就娶了一些少數民族的婦女為妻,其中有苗人,拉胡人等,生下這些半夷半華的子女,據稱至今有20多萬人口,散居在各鄉各鎮中,如回馬村,美斯樂,滿星疊等地。

這兒生活困苦,一方面是毒品橫流,他們雖然不是從事鴉片生意,但卻染上毒癮。此外,因他們教育程度低,不少男男女女偷偷地跑到曼谷和清萊「唱歌」,原來他們所說的「唱歌」是指作男妓女妓,不少不到幾年,便因AIDS而死亡。我還記得在年卅晚,我們有機會探訪一個家庭,那個家庭只有一個40多歲的婦女,她本來有一個女兒,兩年前去了曼谷「唱歌」,滿以為她會回來過年,但到了年卅晚也不見她的踪影,那兒的傳道人告訴我們,其實她的女兒因AIDS在半年前已經死了,只是沒有人敢告訴她這消息!真是可憐,難怪在區內,我們絕少見到超過15歲的少男少女,有的只有兒童和他們的父母,這些沒有身份的難民的遭遇,真是聽者流淚,聞者悲痛!

究竟有何良方解決?我想他們主要是面對兩大問題:身份和教育:他們是一大群沒有身份的難民,山區就好像一個不設防的監獄,他們只有無奈地在這監獄裏渡過一生。泰國當局不是不知道問題之所在,但這是一個相當敏感的政治課題,維持現狀似乎是他們所採取最佳方法。另一方面,我們發覺不少年青人,冒著違法之險也偷偷地跑到曼谷等大城市工作,但由於教育不高,語言也有問題,他們所能幹的就是當男妓女妓,在曼谷的紅燈區中,就有不少從山區而來的少女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少男，他們賺到錢後，就滙回家中父母，在滿星疊建屋，預備日後返回老鄉享晚年，但可惜的是，不到幾年便傳來噩耗，她們染上了AIDS病逝。何牧師夫婦建立寄宿學校，讓這些兒童可以受良好教育，有了教育，就不愁找不到工作，有了工作，這便是脫貧之良方。再者，他們聽到福音，知道我們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兒女，教會會友是他們的弟兄姊妹，這正好解決了他們身份危機的問題，只可惜能分享何牧師夫婦異象的幾希矣！

在金三角住了差不多一個月，挑起我不少童年的回憶。第一次踏足在清萊街市，我立即便想到小時往大埔墟街市買鏹的景像，太像了，九零年代的清萊街市，竟是五零年代大埔墟街市的翻版。不但如是，在何牧師的寄宿學校住了幾天，使我想起初來香港時在農藝所的生活，太像了！事實上，我和何牧師同是天涯淪落之難民！不過我在香港，他卻是在金三角！

當1949年中國解放後，不少人匆忙離開中國，主要是撤往台灣，也有一大部份人撤往香港和泰北。香港在二次大戰前約有70萬人口，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約有一半人口逃往大陸。戰爭結束後，幾10萬原先在香港居住的人陸續返回，另有1百萬人為了逃避共產黨的政權而來港棲身，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過2百萬人了！一如泰北，一般人稱這些從大陸走難來港的為「難民」。「難民」的名稱不是香港人發明的。50年代間，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特定一筆捐款給香港政府，在難民集中的地區建社區中心，今天仍在的有：黃大仙、大坑東、觀塘、荃灣、柴灣等，有些人更以「難民」這身份移民至美國。

在這大批難民中，不少都好像我父親一樣，是國民黨軍隊的國軍部隊及其眷屬，他們在堅尼地城鐘聲游泳棚及加惠台搭建棚屋，依靠

行乞或東華三院救濟，為數多達3,000多人。到了1950年，政府將他們安置在摩星嶺道域多利兵房及舊機關槍堡壘內，作為棲身之地，東華三院繼續為難民供應飯菜。在1950年6月18日端午節，約有80名左派學生來到摩星嶺難民營，大跳「秧歌舞」，向老兵挑釁，因而引起流血衝突，港英政府於是在6月26日利用渡輪把這些難民遷往調景嶺，當時的調景嶺是一片荒蕪之地，無水無電，也沒有公路前往，好像與外界完全隔絕，半點生活條件都沒有，這一點與孤軍在金三角的山區有點相似。後來台灣的民間組織，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後改名為中華救助總會)有見及此，乃仗義為他們提供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對那些難民來說，救濟總會就儼如當地政府，也視他們為台灣政府代表。這做成調景嶺以後幾10年強烈親中華民國的情緒和意識形態。此外，不少教會也開始進入區內，辦學，社區中心，教堂，派救濟物資，日後調景嶺約有20%是教徒也基於此因，不少人稱調景嶺為「小台灣」。這時調景嶺約有6,000人以上，大多數是男性，年齡介乎20歲至40歲之間。其中一個特色是：傷殘人士竟達1,763人，因為他們大多是退伍軍人，也有不少是政界及學界人仕，甚至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中學校長等，但他們一般都不會露透他們過去在大陸的身份。到了1950年底，調景嶺人數已達1萬人。

隨後的幾年，港英政府也開始參與救援工作，他們在村內設郵局，消防局及警署。1956年，開闢了寶琳路，以致區內居民可以乘車往九龍市區，不過，無可否認，教會是穩定調景嶺社區的重要支柱，不少傳教士都是隨難民從大陸逃到香港的，到了香港後，透過差會的協助，在短期內建立了數間學校，包括調景嶺中學(嶺中)，天主教鳴遠中學，慕德中學(即調景嶺信義中學)，又協助區內居民就業，更重要的是提供他們在心靈上的需要和飽足。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每逢雙十節時，嶺內排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港英政府也從不干預，這種情形一直維持了差不多半個世紀；他們由始至終，還是覺得自己不是香港人！

雖然我和那些在金三角，調景嶺的難民有著同一的身份，背景，但我在農藝所的童年比他們幸福很多了！1950年我隨父親來到香港後，起初幾個月是在粉嶺的信愛孤兒院，但未幾基督教兒童福利會便委派了父親在大埔墟近郊開始了農藝所。

農藝所是美國「基督教兒童福利會」(Christian Children Fund)創辦和管理的孤兒院。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因著八年抗戰，中國滿目瘡痍，無數家庭慘遭破壞，產生了不少孤兒寡婦。微勞士牧師(Rev. John Russell Mills)是加拿大來華的宣教士，目睹淒涼的境況，他就在廣東省把一個一個的孤兒收留在空置的學校和祠堂，改成為「兒童收容所」，後來他有機會認識了有同一負擔的美國牧師嘉樂博士(Dr. J. C. Clark)，於是他們成立了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總部設在美國維珍尼亞州。1951年，微勞士牧師被迫離境，移居香港，繼續從事開辦孤兒院事工，其中一間便是我父親開辦的農藝所，除農藝所外，還有粉嶺的信愛孤兒院，大埔的惠光孤兒院，元朗兒童院等。

農藝所位於新界大埔的南坑村附近，佔地甚廣。從南坑村向著「光禿山」走，約10分鐘路程即達。這本來是屬大埔鄉坤朱德馨的物業。他以較低的租金租給基督教兒童福利會。這物業名為漁樵型墅，倚山建築，有3座樓宇，主樓共有兩層，間開了3個單位，共有6個大房，後有廚房，廁所等，至於另兩座，樓的面積較細，只有1層，但父親在這其中一座樓前建了一個大型的禮堂，供集會，飯堂及其他用途。除此之外，父親還建造了男生宿舍，辦公樓等，在大樓前有

一大片空地，亦可作集會之用。在另一座樓之後面，父親開闢了1個球場，專供兒童玩耍。此外，有菜地8畝、稻田6畝、荔枝園1所、橄欖樹2百餘株，山地1百餘畝；適合農藝和畜牧之用。再加上位處山腰，背山面海，風景極美。

起初，農藝所的學生主要是來自父親昔日在江村開辦的禹光兒童院孤兒，他們大部份是跟隨父親逃難來香港的。後來因著邊界遭到封鎖，來港的孤兒銳減，而農藝所的學生來源主要是香港社署轉介來的兒童，他們大多都是孤兒，或是失去父親的難民，每一個孤兒都背著一個非常辛酸的故事。

在五零年代的香港，有著千千萬萬流離失所的兒童，但農藝所只能收留約100個兒童，在農藝所中，他們不愁兩餐，又有瓦遮頭，更可以受教育。農藝所設有小學1年級至6年級，6年級畢業後可往大埔墟的中學繼續學業。他們除了一般的科目外，還可學習農業，工業等實際課程，以備他們將來謀生之用，他們比較那些在金三角或調景嶺的難民幸福多了！然而，50年代的香港，還有許多流落街頭，身無一物的難民，他們更是可憐！我記得我唸1年級的時候，父親與農藝所的教職員1年1度往大埔墟的大排檔吃晚飯，以為酬謝他們1年來的辛勞。席間，我忽然看到1個中年男人，領著3個看來是他女兒的女孩子，來到我們面前賣唱；最大的一個與我年紀相若，約有7歲。但見他們衣衫襤褸，面色赤黃，一看便知他們是吃不飽，穿不暖的。唱罷向我們討飯，父親給了他們少許金錢和飯菜，他們連聲道謝後便離開了。這幅圖畫一直留在我腦海中，心裏問：「他們的媽媽在那兒呢？難道她們也像我失去了她們的媽媽嗎？」

在眾多孤兒中，其中以從江村禹光孤兒院來的與父親有著相當相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深的友情與關係，他們畢業後也常與父親聯絡，其中王汝河更後來受聘於父親開設的農場，與我們親如兄弟。其中嚴翠芳和嚴翠霞兩姊妹印象深刻。嚴翠芳後來攻讀神學，並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當女傳道。譚德材是我的舅父，他也是隨父親來到農藝所；後來負責教導兒童織藤器，後來整個農藝所搬到烏溪沙兒童新村，他仍任教於工業部，直到退休為止。至於其他學生，不少是來自不同的木屋區，大火後喪失家園，或是失去父母，被送到農藝所，他們的遭遇很可憐，其中一位叫譚有才的，他是一個孤兒，又是弱智，但他非常純真，極其可愛，是我的好朋友！

在孤兒院平淡的生活中，有幾件難忘而又是令人興奮的事，如今想起來也有陣陣歡娛的感覺。每逢夏天暑假的時候，父親1個星期便聚集全體學生開晚會兩次，1次是他講「薛仁貴征東」的故事，一次是我哥哥蘇穎聰主講「女俠黃鶯」的故事。蘇穎聰在廣州唸師範學院，後跟父親一同逃難來香港，並在農藝所任教。如今我也記得父親所講那個吃3斗米的大食王薛仁貴，他怎樣遠征高麗，大破蓋蘇文，那時人人都聽得津津有味。至於女俠黃鶯，我卻一點也記不下來了！

另一件事是每年暑期，孤兒院都邀請1間香港神學院的神學生，來到我們中間主領暑期聖經班，我們非常享受聽聖經故事，做手工，唸金句，玩遊戲，那些導師都非常有愛心，暑期聖經班為期兩個星期，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我們總是依依不捨的。每逢農曆新期間，全港的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孤兒院都齊集在九龍麥花臣球場，舉行一個大型的歡樂聚會，各院都有表演，又有豐富的午餐，喜氣洋洋，皆大歡喜，有時孤兒院又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動，由農藝所一些董事贊助的，我們當參觀過綠寶汽水廠，每人可以免費喝一樽汽水，容龍型墅則款待

我們吃海鮮餐，華僑日報則贈送我們一份華僑日報。既有教育意義，又有得吃，真是賞心樂事。

農藝所的生活是平靜的，沒有戰爭的威脅，不愁溫飽，更有集體生活，不覺孤單寂寞，父親雖然中年喪妻，但卻能把全副精神寄託在發展農藝所發展上。在眾多難民中，我們算是幸福的一群，但另一方面，農藝所位在偏關的大埔山區，與世隔絕，甚少與外間往來。一如調景嶺，我們與整個香港文化是脫節的，我們每一個都不覺得自己是個香港人，我們的文化是一種香港的次文化(Sub-culture)，既有濃厚的「舊中華民國色彩」，也夾雜著基督教的一些文化，如暑期聖經班，集會時唱聖詩，吃飯前祈禱等。那時我們大部份人都沒有領取到香港身份證，論到香港身份證的歷史，1949年之前，香港政府無限制中國大陸移居香港，一般人皆可以隨意往來香港與中國大陸兩地。香港亦沒有對中國籍居民進行人事登記，所以在這時根本「香港人」這觀念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但解放後，大量中國人從大陸湧入香港，一方面香港政府開始實行邊境管制，另一方面又開始發出身份證。首次登記於1949年展開。但當時的身份證，只是一張以人手填上資料的紙張。我是1954年(8歲那年)才領取到兒童身份證。由於我沒有出世紙，父親又替我申請了一張宣誓紙，宣誓我出生的日期來代替出世紙。拿著那張身份證，雖然可以增加我少許安全感，但我完全沒有「成為香港人」的感覺！我仍是一個難民的身份，寄居在這東方之珠的一角！這種感受，與在金三角和調景嶺的難民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鴻一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是張戎一代三家的故事，細緻地描繪出這一代中國人心中的恐懼；也是20世紀中國社會與歷史的縮影。它反映了億萬中國人在大動亂和大變遷中的悲劇命運。

第六章
活在恐懼中

作者張戎的姥姥生於1909年。當時中國仍是封建社會。她自幼纏足，15歲那年被利慾薰心的父親獻給軍閥為妾，生活在幽禁狀態下，常常活在恐懼之中。1932年，軍閥病死，她有機會帶著幼小的女兒逃出了生天，之後嫁給一個滿族醫生。

張戎的母親在日軍統治下的滿州長大。抗戰之後，國共內戰期間，她開始參加地下活動，冒險為共產黨送情報，她曾經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被推到槍決隊前，與被行刑者並排站陪殺，可想她當時是常活在恐懼中。

後來她獲釋，東北易手，在共產黨的新政府機關裏，碰到一個滿懷理想的革命幹部，很快結成夫婦。南下四川，隨著毛澤東獲勝，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推動史無前例的社會革命。張戎是這樣的環境成長。

但文化大革命爆發，父母被奪權，被批鬥，拘禁，勞改，受盡折磨，精神和健康都受傷。她當過紅衛兵，也曾下鄉當過赤腳醫生。後來父親捱不住死了。文革過後，她被工廠推介入了大學，在四川

大學攻讀外語系，1978年考取到留學資格，往英國深造，並在英國 York University 獲得英國文學博士學位。

在《鴻一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跋，張戎有這樣的描述：「1983年至1988年，我每年回去探望母親，每次我都不勝驚喜地發現，毛澤東治下生活的主要特徵—恐懼—已在戲劇性地消失了。1989年春，我從中國南部遊歷到北部，在成都和天安門廣場，我都目睹了示威隊伍，使我深深震動的是：恐懼似乎被忘記得一乾二淨，百萬人中居然沒有幾個感到危險迫在眉睫，大多數人在軍隊開槍時都好像大吃一驚。我在倫敦看到開槍殺人時，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恐懼回來！」其實恐懼始終沒有離開中國人的心！

張戎的描繪，對我們一家來說，是何等的真實。小時候，我總不明白為什麼父親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驚恐中活著，他來了香港後，就埋沒了自己的真名，改名為蘇森，他又揀擇了偏僻的大埔墟南坑村作為他的居所，他甚少與昔日在中國的朋友交往，甚至在大陸的親戚也甚少通訊，他也很少講及他從前在中國的情況，對母親的死亡更一句也不提。他看到香港有左派人仕發起暴動的時候，他就會終日忐忑不安，好像要隨時離開香港似的。他的個性本來是好出鋒頭，但在香港却一改常態，判若兩人。凡事都非常低調，他對共產黨尤其恐懼，他不信任共產黨政權，也不相信任何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人仕，他更不會鼓勵我們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我當時以為父親的憂慮是杞人憂天。那時中國被視為鐵幕，雖是近鄰，但却又好像天邊那麼遠，既神祕又與我們毫無關係。香港與中國是河水，與井水之別，互不往來，絕不對峙，既是如此，又何足為懼呢！父親不但是個難民(Refugee)，從心理狀況來說，他更是一個逃亡者(Fugitive)，終日都活在恐懼中！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但當我年紀稍大，尤其接觸過這段時期的香港歷史，我開始明白他的恐懼，絕不是沒有理由的。翻開中港的歷史來看，中國和香港絕不是如此隔離，而是充滿了鬥爭，和危機。香港之仍由英國政府統治到1997年，絕不是理所當然，實在是一個奇蹟。中國自1950年以來，沒有一日不是定睛注目著這粒東方之珠，我們大概可以從三方面看。

首先我們看到在香港所發生之港版「國共內爭」歷史，表面上是香港內之「土共」與「難民」之爭；但其實情形並非這麼簡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兩個多月，香港便發生了電車公會發動工人罷工。表面上是勞資糾紛，但現在面世的文獻却告訴我們，指示這場工潮的竟是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此時，毛澤東正訪問蘇聯，劉少奇曾致函毛澤東，請求指示；函中有這樣的話：

「香港電車工人罷工月餘，要求增加工資，資方頑強不答覆，並宣佈關廠。一月三十日已發生流血慘案。此事我前已指示港澳不要提出政治要求，只作經濟要求，並在有理有利有條件下，求得工人要求的相當滿足復工。現已發生慘案，工會總尚未發生聲援通電，通訊社說工人要求毛主席適當途徑向港政府抗議。此事如何表示？望告。

劉少奇 2月3日2時」

其實，這只是一宗香港工潮，而解放之初，國內百廢待興，理當有許多重要的緊急事情處理，怎會這樁香港小事居然可以直達天庭。從毛，劉兩大巨頭具體而微的指示來看，可見中共的眼一開始就直盯著香港。難怪當時的港督葛亮洪在他的回憶錄說：「這個糾紛是有政治

動機的。」但從劉少奇那一句「不要提出政治要求，只作經濟要求」，可見當時的中國還是採取一個比較務實的政策，適可而止，只作監視，而不作強取，這與1967年的暴動有極不相同的地方。

第二件事是1951年11月所發生的石硤尾東頭村大火事件，這回真的嚇破了父親的胆。事緣於1951年11月12日，石硤尾東頭村木屋區發生大火，一萬多人無家可歸。廣州市的人民團體發起慰問團，成員中包括幾位當初港英政府遞捕出境的人仕，前來香港災區慰問，在港的左派群眾於是組織成大隊前往羅湖迎接慰問團。港督葛亮洪恐怕釀成暴動，便派出一批軍警，沿羅湖，上水佈防，並且通告禁止慰問團入境。結果引起迎接慰問團的群眾不滿，雙方發生衝突。警察向群眾開槍，紡織工人陳達儀被打死，多人受傷，100人被捕，18人被判有罪，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警告港英政府向中國人民挑釁，要負全部責任。

這事之後還有餘波。香港《大公報》全文轉載《人民日報》全文。港英當局以《大公報》刊登煽動性文字，查封《大公報》，《文匯報》和《新晚報》，並傳訊督印人費彝民，承印人鮑立初和編輯李宗瀛3人。代表大公報的辯護律師陳丕士在庭中指控港英逮捕費彝民等人是非法的，但結果仍被判罪名成立，並罰以重金，停刊半年，費彝民不服，向高院合議庭上訴，合議庭裁定停刊令停止執行，其他則維持原判。

這件事有重大的意義，在審訊期間，中共給予港府極大的壓力，港英在此不得不讓步，沒有對左派報紙加以監察及管制，這導致日後1967年暴動之擴張。港督葛亮洪也提及此事，香港左派人士的活動大為增加，他們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以為香港政府怕得罪北京而不敢對他們怎樣，事實上若中共要揮軍取回香港，真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港府是深明她所處的境況。

第三件事是發生在1958年，情況就更為惡化。隨著國內發生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香港的左派人仕，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開始搞鬥爭，再加上梁威林被調任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所謂新華社其實是中國駐港的官方機構，也即日後的中聯辦。新官上場三把火，在香港聯合這些左派人仕採取較激烈的行動。港英政府立即採取行動，禁止左派學校在校掛五星旗，唱國歌，及利用學校作政治活動，更把培僑中學校長兼校監杜伯奎遞解出境，到了8月，更宣佈香港中華中學校舍為「危險房屋」，企圖迫使該校關閉。8月26日，港府突然派大批警察到該校，強行封閉該校校舍，並與當時採訪之新華社，文匯報，大公報及新晚報的記者發生衝突，警察毀壞記者的攝影器材。中國外交部於8月27日立即向英國抗議，要求賠償損失。在中國政府的抗議下，港府同意在9月23日重開中華中學，直至1968年終於宣佈取消該校的注冊。

凡此種種，都令人有一種感覺，中共一直都想控制香港，不過他們的政策並非以國家名義直接干預，而是利用香港的左派人仕進行顛覆的工作，這一點是使父親感到混身感到不安。尤其是他身為孤兒院院長，就更恐怕有左派學生滲入，那就更麻煩了。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當農藝所在1958年遷往烏溪沙兒童新村後，他就決定提早退休，返回大埔經營農場。因為烏溪沙規模大了，受左派滲透的機會更多，為安全計，他寧願辭去一份鐵飯碗的職業，冒險去經營農場。

第二方面，在50年代的香港，並非只限於港府與土共之間的矛盾，其間的錯雜國際關係，真非一般香港人所能知悉。在這彈丸之地，不但有中共特務活躍，也有國民黨特務之滲入。父親不但沒有與國內

朋友聯絡，也沒有與他一些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舊同事來往；他儘量置身度外，明哲保身，有關港版之「國共內爭」，以下一些史實可見一斑。

我想最著名一事莫過於「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了！1955年4月，台灣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獲悉周恩來總理將會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前往印尼出席亞非29國政府首腦萬隆會議，於是便策劃在機上安放計時炸彈，企圖暗殺周恩來。「克什米爾公主號」是屬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包機：從香港起飛至耶加達，再轉赴萬隆。機上有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11人。飛機於1955年4月11日起飛，離開香港約5小時後，在18,800高空爆炸，機上除了副駕駛員，領航員，機械師3人生還外，其餘16人遇難。但周恩來却不在其中，因為周恩來根本就沒有上機。何解？據中共官方的解釋是：周恩來剛做完手術，又要應印度總理尼赫魯之邀請，往緬甸與他見面，所以周總理便要取道飛往緬甸的仰光，然後再赴萬隆，以致幸免於難。但人人都知道這並非事實，中共在香港的情報人員懷疑有台灣特務在機上放置炸彈，但又不想打草驚蛇，恐怕港府當局知道中共在香港有相當活躍的情報人員。但16條人的性命就此犧牲了，來保留周恩來的性命！由此可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特務雲集香港，真是謀影重重！

第三方面，在整個50年代的香港社會，瀰漫著左右兩派之爭；在文化界中，尤其特顯了這現象。首先是談到報紙方面，50年代的香港中文報刊，可說是琳瑯滿目，就以1957年來說，中文報紙共有42家，每日報紙銷量約50萬，當時香港人口約250萬，平均每5個人便擁有一份報紙，可見報刊的社會影響力是相當巨大的。由於香港政府相對自由和寬鬆的言論管制，以致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我們看到有兩大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陣營，一是右派，其中以《工商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較為普遍；另一派是親共產黨的左派報紙，以《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新晚報》等，雙方立場鮮明，互相攻擊，儼如一個港版式的「左右之爭」。父親則是《工商日報》的忠心讀者。《工商日報》的董事長是何世禮，於1946年復刊，並定位支持中華民國的報紙，與當時的《華僑日報》，《星島日報》視為香港三大報紙，並設有《工商晚報》。我自少便閱讀《工商日報》，我發覺《工商日報》並非一些古老報章，尤其是掌舵的是何世禮的兒子何鴻毅，他在美國完成新聞系碩士學位，改革這老舊報社，採用外國報章的新聞報導手法，再不用「本報訊」，而是「記者某某報導」。

除了報章外，電影圈內也成了「必爭之地。」50年代的香港電影製作，可分為國語與粵語，自解放後香港開始取代上海的地位，尤其在國語片方面更為顯著；中共便趁此機會透過這「軟實力」來大事宣傳。香港政府不是不知道的，所在50年代港府驅逐了不少左派電影人，其中以司馬文森，舒適，沈寂等先後被遞解出境，其中司馬文森最負盛名。他編寫了六部電影劇本；《海角亡魂》，《海外尋犬》，《火鳳凰》，《南海漁歌》，《血海仇》和《娘惹》，他也寫過不少長篇小說，如《雨季》，《風雨桐江》，《南洋淘金》等，擁有大量觀眾和讀者。當他被遣返中國後，1955年被調往外交部任文化參贊。文革期間，奉召從法國回返，一下機北京機場，便被人五花大綁，被鬥，於1968年被迫害去世，死時只有50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五零年代的香港是充滿了危機和暗湧，一則諜影重重，一則社會分化，左右分明；不過最令父親憂慮的莫過於余程萬被殺一事了！當余程萬於1955年8月27日被槍殺時，父親曾向

我提及此事，他似乎非常不安，唯恐他自己也會有同一的遭遇。余程萬是國民黨一個出色的將領，在抗日戰爭中，被列為五大王牌將領之一，他所率領的七十四軍，更被稱為「抗日鐵軍」，而在七十四軍中，第五十七師更被稱為「虎賁」師，非常著名，而余程萬正是這王牌師的師長。在抗戰期間，「常德血戰」是其中最慘烈的一役，當時守常德的軍隊正是五十七師，共有8,000人，但攻打常德的日軍的六十八師團却有10餘萬，真可以說是以寡敵眾，余程萬死守城面南一角，他發了一封電報給上司孫連仲：

「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指揮官、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主任等固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第七十四軍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余程萬見形勢危急，便留下百餘人守城，自己率領百餘人渡江突圍，以圖與援軍會合。結果援軍及時趕至，把日軍擊退至長江北岸，而五十七師的8,000子弟，僅得83人生還，非常慘烈！事後，蔣介石以余程萬棄城保命，揚言要將余程萬槍決，但經多方勸阻，才打消了這個念頭，但余程萬自此役後，不再得蔣介石重用。

1948年，他被調往雲南，擔任26軍之軍長，1949年，雲南省長盧漢宣告投共，並扣押李彌將軍及余程萬將軍，後雖獲釋，他既不投共，也沒有跟隨蔣介石赴台，而在香港居留，在元朗郊區開了農場，種菜養雞，希望安逸渡過餘生。

誰料在1955年8月27日晚上，他年青貌美的太太遭匪徒綁架，余程萬剛從外面回家，便企圖單槍營救。時警察趕至，與匪徒發生了

槍戰，余程萬不幸在暗中被槍殺至死。余程萬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謎。有人以為是台灣特務所為，亦有人以為是中共特務所為，但無論是誰，對父親來說，這是一個警號，叫他心感不安；要更加謹慎小心。

父親的不安情緒，對我有著深厚的影響，我發覺我亦常發惡夢，驚恐失去父親，只剩下我和家姐二人。我記得我二年級的時候，父親發現胃潰瘍出血，需要入院施手術。那天我放學回農藝所，心情非常沉重，恐怕傳來噩耗，父親一去永不返，在途中我不禁大哭起來，當時的心境，就是過了60多年，也沒有忘記，每逢想起這事，心中那驚恐的感覺又浮現出來。我又記得60年初，家姐在九龍的伊利沙伯中學唸書，每當她稍晚回家，我便踏單車到大埔火車站接她。有一回，我到火車站接她，那是最後的一班火車，我便站在火車站門口等她出閘，那時已差不多晚上11時了！但所有乘客都出了閘，仍不見她踪影，我在閘口足足呆了差不多15分鐘，心中非常驚恐，生怕發生了什麼意外，並想著：一個女孩子，深夜在九龍無處棲身，這豈不是非常危險？一想到這裏，不禁哭起來。回到家裏，告訴父親，他那晚整夜不眠，因為那時代沒有手機，無從聯絡，只有心急如焚，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才捱到天光；到了稍後，見到家姐自己一個人返回，我們才舒了一口氣。原來她那晚因參加一個學校音樂會，趕不及最後一班火車，便獨自兒跑到灣仔的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找嚴翠芳投宿，過了一晚才乘火車回家，但我和父親就這樣過了一個永世難忘的一夜。我相信這種「沒有安全感」的心態，多多少少都是與父親這種「恐懼感」有關的！

在50年代，我們不但是難民，也是充滿恐懼的「逃亡者」！

殖民篇

第七至二十一章



劉姥姥進大觀園 「洋相」盡出！

我是於1950年隨家人來到香港，一直深居在大埔郊區的農藝所，甚少接觸香港的真貌。農藝所的師生，大多是從大陸逃難來港的難民，我們的心態好像仍活在昔日廣州的世界，談不上認同香港這個殖民地。雖然在8歲那年，我取得了香港兒童身份證，但對香港這塊殖民地認識極有限。更不覺得自己是身處在一個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土地上。

1954年是我難忘的一年，不但可獲得了香港政府所發的兒童身份證，至少在法律上而言，可被視為香港永久居民。同時，這一年父親帶我到香港遊覽；這次遊覽讓我有機會一嚐香港殖民地的風味。

首先讓我談談那些英式的建築物，使我大開眼界。當我坐在天星小輪過海的時候，最觸目的莫過於那座舊匯豐銀行，它的外形與昔日上海灘的匯豐銀行極相似。在匯豐銀行大門口，坐著那雙獅子銅像，一隻獅子開口，另一隻是閉口。人家說：開口埋口都係獅子銀行最威！獅子銀行的威望，一直維持到今天，足足有70年之久。但不知哪隻仍開口的銅獅子，還可以保持現狀有多久呢？談到匯豐銀行這座大廈，其實是第3次重建的，於1935年10月落成。那時是全港最高的一座大廈，也是香港第一間裝置全冷氣的大廈，更是一個典型的英式建築物。

在匯豐銀行對面，是昔日的高等法院。現改為終審法院大樓。此大樓比匯豐銀行大廈更古老。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於1912年建成。建築風格呈現新古典主義，揉合了遠東的建築特色。大樓上蒙上了雙眼的泰美斯女神像，右手持天秤，左手持劍；代表大公無私。

第三座有趣的建築物竟是維多利亞監獄。這座監獄建於1841年，位於中環上面的比利街。這是香港第一座監獄，後與舊中區警署，前香港中央裁判司署組成一大建築群，現港府改為古蹟及藝術大館。談到這座監獄，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北越首領胡志明曾於1931年被囚在這監獄中。這監獄於2006年已被關閉，現被列為古蹟，可供遊覽。

第四座著名的英式建築物，便是位於中環花園道的聖約翰座堂。此聖堂建於1849年，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之母堂兼主教座堂，也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基督教會建築物。此堂以青磚及石材建成，從座堂的尖頂拱，呈肋型線條的構件和幾何圓形鐵柵窗花格等裝飾特色，可見其設計是受英國早期或中期哥德式風格影響。聖約翰堂座堂於1996年列為古蹟。

我這個劉姥姥，真是大鄉里出城。呈現在眼前的，是這些非常宏偉的英式建築物，真是「洋相」盡出，令我嘆為觀止。其實這些建築物象徵著英國人留給香港幾個寶貴「宜興紫砂茶壺的茶垢」，高等法院和維多利亞監獄象徵英式的法治精神，匯豐銀行象徵金融中心的地位，聖約翰教堂象徵著基督教的信仰，這都是不可除掉的茶垢。

另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香港的街名，非常古怪。我們在大埔墟所用的街名，都是非常中國化的；如仁興街、懷仁街、崇德街、大埔道等。但香港和九龍卻完全不同，香港的大道，有英皇道 (King's Road)、皇后大道 (Queen's Road)、九龍有太子道 (Prince Edward Road)，這都

是與英國皇室有關的。此外，歷代港督的名字，都有街名留念。如砵甸乍街(第1任港督)、般咸道(第3任港督)、羅便臣道(第5任的Hercules Robinson和第11任的William Robinson)、麥當勞道(第6任港督)、梅道(第15任總督Henry May)、比利街(第18任港督Peel)；只要我們稍為在港九走一轉便立即發現香港的確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只是我們藏身在大埔郊區，沒有這樣的體會罷了！

我要談談50年代的香港交通工具。那時香港有火車、巴士、電車、渡海小輪、山頂纜車等。談到九廣鐵路，正好反映了香港和中國關係的演變。早在1898年，中英銀公司已獲特許權興建香港至廣州的鐵路，香港人稱為九廣鐵路，廣州人則稱為廣九鐵路。昔日中國和香港雖然分治，但雙方在邊境都不設防，兩地居民可自由往來。但到了1950年，省港兩地的列車服務中斷，分華段和英段，以羅湖橋為界，兩地政府設立邊境檢查出入境，而一般列車互不相通，至於貨運火車則屬例外，從沒有間斷，一直都是直通的。所有客運車乘客到邊境時，必須自行下車過境。雖然1950年初，雙方曾商議恢復直通火車，但因政治運動等多種因素，一直無法達成協議。直至1979年初，雙方再商議，並於4月4日港穗直通車再次啟用。

我在八歲那年，隨父親到香港一日遊。坐在火車上非常開心，因父親在孤兒院工作，香港政府特別給他一張免費的二等車票，我跟他也可以享受免費優待。普通乘客多是坐三等車廂，二等車廂是高一級的。那年代英段鐵路仍用蒸汽火車頭，到了1956年才改用柴油火車頭。經過獅子山隧道時，烏煙瘴氣進入車廂內，很難忍受。所以一般乘客一經隧道，便立即關窗，保持車內空氣清新。

火車的終站是尖沙咀，尖沙咀鐘樓具愛德華時代古典復興建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風格。於1915年建成，樓高44米，頭頂裝有7米高的避雷針，鐘樓頂部為八角形設計，並築有圓拱形屋頂、紅磚與週邊白色的古典裝飾，非常美麗。香港政府於1990年定為古蹟，也成了香港的地標。

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政府，有意把祖家那一套全搬來香港。後來我有機會到倫敦旅行，很驚訝香港和倫敦有那麼多相像的地方。最佳的例子是中區皇后像廣場和大會堂之間那一個和平紀念碑，簡直是倫敦哪一個的翻版。其餘似曾相識的，還有舊高等法院那圓頂，好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聖約翰大教堂也是倫敦西敏寺的縮影。不過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那些雙層巴士。這可以說是香港與倫敦的特色。香港人稱公共汽車為巴士，乃是音譯自英文的bus。香港中華巴士公司及九龍巴士公司設於1933年。起初只用單層巴士。到了50年代才開始啟用從英國進口的雙層巴士。當年的巴士，除了司機外，還有「一夫當關」的售票員。他守住車門，控制上落客；乘客要上車就先要過他那一關。所謂「權力使人腐敗」，不少售票員喜歡以留難乘客為樂。當然他主要的職責還是售票。一上車、乘客就要先付錢給他，由他用打孔夾子把車票打了孔給乘客。不時有稽查上來查票，沒購票搭霸王車的要送官究治。不過最有趣的倒是那些巴士站了。那時的巴士站標記是鐵柱上一個圓鐵牌，當時是落足本錢、真材實料的實心鐵。牌上有英文刻著：All Buses Stop Here。中文是「巴士停留處」，後期才更正為「巴士站」。有些巴士站的翻譯更古怪：例如在天主教墳場外那段黃泥涌道有個白鐵圓牌，上面的中文是：「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真是可圈可點的港式中文，實屬經典名作！又一如倫敦，香港時至今日，行車都是左上右落、右軚駕駛。相信到今天，在北半球，除了港英兩地外，相信所剩無幾！這又是英國留下給香港的「茶垢」了。

我自小不大喜歡坐巴士，因為我容易暈車浪，很不舒服。但我對電車卻情有獨鍾。香港電車於1904年成立，初時只有26輛；時至今日，已經擁有165輛了，每日平均接載客20萬人次，是世界上仍在服務中最大雙層電車車隊。在今日的世界，只有英國的黑池和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擁有少許雙層電車服務，但其規模及車隊遠遜於香港的電車車隊。

在這次旅程中，其中我最享受的是乘搭天星小輪過海。維多利亞海兩岸的天際線不斷蛻變，但天星小輪卻不變。120多年來穿梭於香港與九龍之間，它既是香港人平價便宜的日常交通工具，更是各地遊客休閒賞景拍照打卡的必遊景點。2016年我帶著我在美國土生孫兒到港一遊，他同樣是天星渡海小輪的「粉絲」。天星渡輪於1880年，由企業家米泰華拉創立，當時他以一首名為「曉星號」的蒸汽船接載乘客。到了1898年，商人吉席、保羅、遮打爵士購入該公司的四艘小輪，正式成立天星小輪公司。現在共有九艘雙端船，每天往返中環、尖沙咀和灣仔。目前所用的船隻都是在1950年代啟航的，設計方面與起初的「曉星」分別不大，真是超50年不變。然而，維多利亞海港已變了不少。50年代我們過海時，還可以看到海鷗在海面飛翔，如今已消失了。那時維港的波浪不大，常常風平浪靜，沒有暈船浪的感覺。但因這幾十年不斷填海，海港窄了許多，波浪亦較以前洶湧。所以昔日每年一度的渡海泳都要改道舉行。天星小輪分兩層，樓上一層較寬敞，座位很特別，椅背可以向前或向後推，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意念；因為乘客可以根據行程而自行調整座位的方向。然而我總喜歡坐在下層；一方面較為便宜，票價只是上層的一半，而且不用上梯級，路程較短，給那些趕船的人方便。雖然下層較嘈，柴油氣味也比較濃，但可以享受親近大海的感覺，而且更喜歡看著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那些親切、穿著藍色制服的水手們，如何協助拋擲那些粗重的繩索給在碼頭上的水手作泊岸之用。他們的技術純熟，總不會失手的。

從船上眺望維港，風光真無可比擬，稱之為「東方之珠」實是受之而無愧。壯觀的天際線一覽無遺，讓人看得如痴如醉。在這煙稠密、熱鬧繁榮的香港，難得有片刻的安寧；只花區區同牌價，便可以有如此享受，實在一樂也！

這次旅遊當然沒有錯過兵頭花園一遊啦！雖然它正確的名字是：香港動植物公園，但香港人仍然慣用「兵頭花園」這個稱謂。原來早年的香港總督，大多數是軍人出身。香港開埠初期，常有賊亂，因為作為香港眾兵首領的港督，被香港人稱為兵頭。由於港督當時沒有一個固定的辦公室，而港督砵甸乍與戴維斯，曾在這植物公園辦公。所以不少香港人便稱這個公園為「兵頭花園」，直到1975年才正式命為「動植物公園」。談到兵頭花園，我們小時候常常聽到兵頭花園的鬼故；其中最為人訛傳的莫過於石獅成精，吐石傷人。話說兵頭花園門後有四隻石獅，其口中含石珠。某日，有情侶經此門時，忽然被飛石擊中，頭破血流。途人見有人遭石擊傷，而獅子口中的石又不翼而飛，於是便流傳出獅子吐石傷人的故事。當時有人報警投案，警察以其迷信而不理。後來有警察到此地巡邏時，遭石擊斃。這回弄出人命，而且又是警察的性命，於是官員不得不請來風水先生，仔細調查此事。風水師傅提議除去石獅口中的石，公園再沒有此等邪事出現。但我翻閱昔日舊報紙，卻沒有發現如此的記載，相信這只是坊間流傳的故事。可能在這石獅所在之處，正是抗戰華人殉難紀念牌坊的地點。這令人想起昔日的傷痛，因而聯想這些鬼怪事情，也不足為奇。

兵頭花園本來是香港總督官邸，直至1864年才開放給公眾。起初只是局部開放，到了1871年才全部開放。花園以植物為主，但同時亦有雀鳥和哺乳動物。在日治期間，日本人把它改名為「大正公園」。到了1958年，英國人把英皇佐治六世的銅像放在其中，並設有兒童遊樂場，鳥舍、植物溫室、噴泉等。其中雀鳥數目最多，有400多隻；全園佔地5.6公頃。在新界長大的我，天天目睹樹林、雀鳥、花草、昆蟲等，兵頭花園並不是我的最愛。除了聽父親講解有關兵頭花園的故事外，印象並不深刻。

這次旅遊當然少不了吃喝玩樂。這回父親竟然帶我到著名的蓮香茶樓飲茶。50年代香港老式茶樓最著名的有兩家：陸羽和蓮香，陸羽給上流人士，蓮香是給市井之輩。飲茶是香港人主要的文化。香港第一間茶樓叫杏花樓，建於1846年，位在上環大馬路水坑口。1950年代香港，茶樓如雨後春筍般湧出，其中不少茶樓還聘請一些當紅的女伶演唱粵曲。建於1918年的蓮香樓便是其中一家著名的茶樓，其實香港的蓮香是廣州的蓮香分支；但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得中國政權，廣州蓮香樓被改為公私合營。香港的蓮香樓亦開始獨立經營。蓮香樓最著名的有豬潤燒賣、叉燒包、大包、糯米雞、荷葉飯；這都是我的最愛。蓮香樓位於中環威靈頓街，共有4層，層層樓價錢都不同，但其實點心茶茗卻是一式一樣，我就摸不著頭腦，既是同樣的點心，為何價錢層層有異呢？原來那時沒有電梯，最貴的是二樓，其次是三樓，最便宜的是四樓了；所以我們發覺二樓多是長者。我和父親當然選擇更上一層樓，在四樓父子兩人可品嚐香港大茶樓的風味，價錢亦較便宜。

總括來說，這次出城叫我體會到香港的殖民色彩，也淡化了我

難民的心態；我以為香港當是我的家，也應該是培植我香港人心態的時候了。但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何解？請看下回分解。

第八章
宰相腹內
可划船

這兩張照片是父親的珍藏，與他握手那位英國人，便是1947至1957年出任香港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這兩張照片應該是攝於1956年，當時葛量洪總督親臨農藝所參觀。這事以後，父親在《童聲》這本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所出版的刊物，在「猜謎語」這一專欄中，出了一個謎語給讀者猜：「宰相腹內可划船—猜一香港人物」。原來謎底是「葛量洪」，「葛亮」乃指諸葛亮，一個傳奇性的宰相，他料事如神，是位極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劉備三顧草廬，始獲他輔政，遂與魏、吳成三國鼎足之勢。而「洪」這個漢字，是一個形聲字，其意思與水相關，即大水之意，亦引申為「宏大之意」，如「洪福」。父親想到「宰相腹內可划船」來暗喻葛量洪，真是可圈可點。我忘記了有沒有人猜得對，但他這個謎語，相隔了60多年，還是清楚留在我腦海中，真是不可思議！



葛亮洪港督探訪農藝所。
右為父親。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父親迎接葛亮洪港督。

事實上，一如其名，葛量洪確是一位有雄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全名是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在未任香港總督之前，他對中國及香港事務已經非常熟悉。他自幼在中國天津長大，父親在天津設立了一個律師事務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病逝，母親改嫁給一位挪威人，他任職於中國海關。後來他們全家搬往北平。1922年他在香港任職於輔政司署，直至1935年，調往百慕大、牙買加、尼日利亞及斐濟等地，1947年任職香港總督，一直至1957年，除麥理浩外，他是一位任職最長的港督。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一如其名，充份表現出他的睿智。他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擊敗蔣介石之國民政府。但這場內戰及結果，深深的影響香港，無論在人口、社會、政治及經濟各方面，出現了深且巨的轉變。50年代的香港確是非常複雜，不但兩岸在香港的衝突，和政治事件中迭起；其後爆發了韓戰，中國被禁運，香港變成為中、美、英角力的地方。再加上香港戰後百廢待興，社會基建受到嚴重的破壞，而英國本身亦面臨戰後種種問題，尤其在中東以巴問題、印度、

緬甸、非洲等問題，大英帝國正面臨一個非常嚴峻的階段，無暇集中處理香港的問題，這都使葛量洪面對著極嚴峻的考驗。

最近我有機會閱讀有關葛量洪向位於紐約的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三次演講的記錄 (Princeton University's Mudd Manuscript Library)，第一次是1954年9月，第二次是1956年9月，最後一次是1958年4月。從這些演講，及他的回憶錄 (Via Ports: -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我們可以看到50年代的香港，及它的特殊關係，讓我明白到為什麼我以為可以在香港作個永久居所的幼稚，更明白香港能夠維持英殖民地的地位一直至1997年，是與葛量洪的卓越眼光和政策有極大的關係，我希望從以下幾件大事中看到其中的端倪。

早在1945年8月，蔣介石強烈表明，日軍當將香港歸還給中國。事實上，自從日軍投降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便積極的在香港活動，勢在必要收回香港。所以在香港設立航空、航運、銀行、交通、外貿等29個機構，到1949年底，資產淨值約2.43億港元。然而，中共同時也看到這個英國殖民地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窗戶，是統戰、宣傳和對外的一個難得的基地，不少當時客居香港的政治人物，如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雲南省主席龍雲、廣東省政治人物李濟深，其實都是投共的國民黨前官員逃到香港避難；後來解放後都是先後回歸中國。又據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所載，自1948年2月至1949年初，中共在香港開辦了13期培訓班，人數約10餘人，成員包括吳學謙(後來任中國副總理、外交部長)，王漢斌(人大副委員長)。面對著這種東西冷戰、國共爭鬥的情況，英國採取什麼策略呢？英國的決定是明確的，雖然1945年蔣介石強烈要求日本歸還香港給中國，英國還是迅速的接管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香港，而葛量洪更於1947年被委派為香港總督。作為一個中國通的英國外交官，他是看好中國共產黨的，他與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商討，並且訂下協議，於中共執政後，中共是不會使用武力奪回香港的，也不會鼓動香港回歸大陸(參看陸恭蕙著—《地下陣線》P.91)，葛量洪看得準，在那時中共須要利用香港這個特殊地位，建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陣線；況且，若收回香港，只會引起西方國家強烈反對，給西方列強以軍事干預中國內戰的藉口。而英國呢？1949年後，英國公司不能繼續留在大陸，香港便成為英國與中國貿易往來的最大基地。所以對中英雙方，維持現狀，香港仍歸英國管治，似乎是一個雙贏的決策，就這樣，中共解放中國後，並沒有派兵來香港！

葛量洪是深知中共的底線，正如他向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美國聽眾表明，中國遲早都會收回香港，問題只是時間吧了！香港始終都是租界，是一塊借回來的土地，英國只希望在一個這樣特殊的環境和時間中，平衡各方的利益，極力維持現狀，這就是他為英國政府訂下的香港策略了！

1949年11月9日，發生了所謂「兩航起義」，這是一幕驚心動魄、曲折離奇、生死攸關的國共、國際間諜史。這對香港政府來說，是一大挑戰。

1949年11月9日早上6時，香港啟德機場燈火輝煌，機聲隆隆，中國航空和中央航空公司12架飛機，陸續呼嘯而起，騰空後不久，即轉向北飛，避過了港英政府和國民黨特務的耳目，飛行6個小時，橫越大半個中國，於中午12時分別到達天津和北京機場。這次兩航起義震驚中外，影響深遠，是中國建國一個多月來最大的喜訊。

首先，談談中國航空公司，這是一個中美合資經營的航空公司，擁有員工4,800多名，運輸飛機60架，在當時的世界航空公司中排名第6位。而中央航空公司，則屬歐亞航空郵運股份有限公司所擁有，員工2,700名，飛機42架，其中6架是美國最新式的康維爾240型，也是亞洲極強的航空公司之一。自解放後，中航總公司遷往台南，而央航則遷往香港。由於國共雙方都急需大量飛機調兵遣將，及運輸物質，這兩間航空公司便成為國共爭奪的焦點。這兩間航空公司本來是駐上海的，他們留下的資產為中共接收，不但如此，中航的總經理劉敬宜及央航總經理陳卓林都曾秘密與中共聯絡，以致促成這次起義；但他們二人沒有隨起義的機師回中國，仍留在香港。

這次兩航起義引起香港一大政治風波。兩航在香港留下大批資產，包括其中70多架飛機和兩間廠房。11月13日，周恩來總理發表聲明，指出兩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擁有，以為所有留在香港的資產只有中共政府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置，兩航在港資產若被侵犯、移動或損壞，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承擔所有後果。

11月16日，港督葛亮洪表示，在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不准兩航飛機飛回內地。11月24日國民黨政府透過沈德壁、載安國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凍結了兩航在港資產，於是國共雙方都不能動兩航在港資產。

此時，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止中共接收這資產，以350萬美元的價格，將兩航留港的71架飛機和其他資產賣給陳納德Clarie Chenault和魏洛爾Whiting Willauer。並且成立了美國民用空運有限公司(簡稱CAT)，並把71架飛機轉售給CAT，並取得美國對這些飛機的註冊登記。12月19日，CAT負責人陳納德向香港高等法院要求接收兩航資產。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1950年2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駁回陳納德的申請，理由是「英國政府不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在法律上和事實上的政府，只有中國（中共）政府才享有央航資產。而中航雖不直接屬於中共政府，乃屬中航產業，只有中航才有權出賣」。於是宣佈解除臨時禁制令，陳納德不服，乃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上訴，但遭駁回，維持原判。

但事實不因此而得到解決，1950年4月2日，7架中國民航飛機在香港啟德機場被炸毀，周恩來總理隨即發表聲明，指出香港政府應對此次中國的損失負全部責任。

美國國務院於5月23日發表聲明，因為聯合國對中共禁運軍用物資，所有兩航飛機不能向中共輸出，陳納德同時向英國樞密院上訴。在美國政府的干預下，英國樞密院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在1950年1月5日，在此日之前，英國政府依然承認國民黨政府為中國法律上的政府為由，改變了香港法院的判決，把兩航的產權全判給 CAT。

對於上述的判決，引起中共外交部極大的反應，除了提出嚴重的抗議外，還宣佈沒收英國在上海的英聯船廠及馬勒機器造船廠的全部財產，英商的上海電車、自來水、煤氣公司等全部財產，及在廣州的太古輪船股份、碼頭、倉庫及房屋的全部財產，以為報復。

港督葛亮洪對整件事有何反應呢？由他的反應，我們又可以看到他在管治香港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他所著的《葛亮洪回憶錄》，就有這段說話：「美國人還派來了自己的律師，其中最有名氣的是當奴雲 Wild Bill Donovan 將軍，他在戰時是戰略部的主管，這部門相等於英國的秘密行動部，它主要工作是破壞敵人的工作。他怒氣沖沖地跑到我的

辦公室，差點兒拍枱對我說話，堅持要立即把所有的飛機交給他。因為，假如不是美國的話，英國在大戰時已經戰敗了。此外，他還說，假如我不依他的吩咐去做的話，他會到倫敦為我製造許多麻煩。我一點也不為所懼。這個問題必定要循法律途徑來解決。毫無疑問地，他在其他的事情也用這套辦法。而且很成功，但是我和律政司是不吃他這一套的。

最後法律站在中國政府那面的，可是美國的利益團體施以壓力，迫使美國國務院插手這件事，並向倫敦表示，無論如何這些飛機是不能交給中國的。英國政府便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一方面是法律問題，而英國一直以來都尊重法治的；不過另一方面，這樣做會觸怒華盛頓政府。英國一貫都是實際的，假如他們幹了一件極可能蒙羞的事的話，他們便會用法律的外衣把它裝飾起來。因此，樞密院下了一道法令，推翻自己所維護的法規，實際上是做了一條新的法規，最終是把那些飛機交給了美國人。我作為一個殖民地屬土的港督還有什麼權可以反對呢？而且假如我真的這樣作，會有什麼好處呢？無論如何，我感到很不高興！總括來說，這件事實在太差勁了！」

我們看到作為一個殖民地總督，在其回憶錄中，坦然不同意祖家政府的決策，把華盛頓對香港及倫敦施壓的細節和盤托出，並斥倫敦是使用法律的外衣為裝飾，去實行一些違背法治精神的政治需要，令他感到非常不高興！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他管治香港的方法。首先，一如一個典型的英國人，非常注重法治精神。他以為「法治」應凌駕於政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務實主義者。表面看來，他傾向中共那邊是因法律需要，但其實他是沒有選擇的餘地，對他來說，香港的生存有賴中國的「恩惠」，因為正如他說，中國隨時都可以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取回香港，中國之所以不這樣作，是因香港仍有其價值的存在，扮演一個對外開放的「窗戶」之角色。若中共一怒之下，改變初衷，香港這殖民地必在歷史中消失。所以，他絕對不想因這事，尤其是與香港利益有關之事上；作這麼大的犧牲，於是他便基於實際的利益上作出如此的決定。而倫敦呢？他們似乎沒有葛亮洪這份對香港的承擔與感情，若要他們作個犧牲，他們就寧願犧牲香港，也不犧牲美國這個盟友，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英國也象徵式的遣兵參加了韓戰。

爭產一事其實還有餘波，中國民航透過外交部向英方進行交涉，直至1987年6月5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關於解決歷史遺留的相互資產要求的協定》，英方向中國提供380萬美元補償費，但在這筆賠款中，英國人以中國扣除英國在中國所沒收的財產作為賠償的一部分！表面看來，葛量洪是較同情中共政權，但從其他事件看來，這似乎又不屬實，我們可以從三件事看到他的矛盾：

- 第一件事是 1949年底和1952年初所發生的「羅素街血案」。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僅兩個多月，香港電車工會發動工人罷工，要求資方加薪。12月28日，資方宣布封閉廠房，工潮進一步擴大。到了1950年1月30日，港九共有38個左派社團，合共3,000多人，舉行支援電車工人大會，港英警察到場鎮壓，釀成流血事件，28人重傷，80餘人輕傷，公會主席等47人被捕，警察並闖入公會，撕毀中共國旗及毛澤東像，並遞解公會主席劉法及總糾察隊長植展宏出境，遣返大陸。葛量洪在其回憶錄中定性這事「是有政治動機的」。事實上，表面上工人是為了生計而罷工，然觀其訴求，是要求資方付出增加工資一半的津貼，價碼叫得非常高，不合情理。所以港督

葛量洪以為這是中共給英國人一個下馬威，測試港英政府的反應，而葛量洪卻全力鎮壓！

- 第二件事是1951年11月21日，九龍東頭邨發生了一場大火，造成萬人無家可歸，廣州市於是便組織慰問團，帶同救濟物品來港。港英政府聞訊，立即採取果斷行動，禁止慰問團入境。這引起在港的左派人士不滿，在九龍佐敦道一帶與警察發生衝突，引致警察開槍鎮壓，一工人被打死，多人受傷，100多人被捕，不少人被遞解出境。事實上，除了一些左派工會領袖被遞解出境，不少文化界人士，包括馬文森、劉瓊、舒適、狄梵、楊華都先後被遞解出境，從這方面看，葛量洪對付這些左派人士也絕不手軟的。
- 第三件事便是有關英軍駐守香港一事，50年代的香港，共有英軍12,995人，其中陸軍11,235人、空軍1,135人、華人砲隊537人、婦女後隊88人、警察3,841人（其中3,326人為華人）。飛機方面、噴火轟炸機23架、轟炸機3架、偵察機3架。（參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P.59）我們會問道：為什麼英國要派駐一個不多但也不少的軍隊在港？若中共以武力進攻香港，這支軍隊絕沒有可能守得住；既不是為了防衛解放軍入境，究竟其用意又何在？香港史學家劉蜀永以為「1949年夏季英國匆匆忙忙向香港派遣援軍，完全是虛張聲勢的做法。」我想他的說法不正確，我相信這些軍隊是表明英國有決心管治香港，一方面他們以為中共以香港的特殊地位而不會輕易改變，但另一方面卻又有備無患，不想像澳葡政府那樣被動，隨時束手就擒，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在1967年暴動，我們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1956年，葛量洪有機會訪問北京，隨後應邀在紐約向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講述了以下幾點，非常有趣：

- 他以為19世紀屬英國，20世紀屬美國，21世紀屬中國。他並不以為蘇聯會有任何成就。
- 他以為中國的共產黨是務實主義，而非思想形態主導。他預計中國一定會與蘇聯分家。
- 他不以為中共會用武力奪取台灣。
- 他以為中美關係一定會改善，但會是經過一漫長的日子。
- 他以為1997年後，香港必歸回中國，由於中國深信香港遲早都回歸中國，他們無意改變現狀，他深信中共不會在1997年前取回香港。
- 他又以為在香港，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反共，但卻又不認同台灣政府。換言之，在文化背景上他們可以認同中國，但在政治上他們絕不認同或左或右的中國政權。
- 當被問及香港為什麼沒有民主政制中時，他強調香港雖然沒有民主，卻有自由。他又解釋說香港人不熱衷政治！

在1958年，是葛量洪最後一次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演講，那時他已經退任。在這次演講中，他強調香港是具有其特殊的條件，中國是倚靠這個「南風窗」生存，對西方國家來說，也是前往中國，打開中國竹幕的前哨站。香港就是利用這個「借回來時間」「借回來

的地方」發展成長！而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一群，只能活在一個「沒有身份的身份」「沒有民主的自由」的一個環境中。

總括來說，5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滿了明爭暗鬥、你虞我詐的時代，政治上如是，社會上也是如是。港英政府面對諸多不明朗因素，再加上大部分港人都屬於難民，他們無暇釐定一個長遠政策，也沒有想到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對他們來說，維持現狀，便是他們的主旨，也是最佳生存之道。

而我們一班難民，來港的目的是為了避難，逃避中國大陸發生的動亂，希望在香港找到新生活，不受驚怕，安穩的謀求三餐一宿。在這方面港英政府總算給了我們所求。正如周永新教授所說：「作為避難所，香港不算是安樂窩，在這裏還得忍受各種『風風雨雨』；但香港的好處是沒有戰火蹂躪，生活在這裏，你不理睬政治，政治不會找上門，而使難民嚮往的，是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工作，三餐就有著落。」（參看周永新所著的《回首香港七十年》p.15-16）

第九章
讀書郎

「小嘛小兒郎，背著那書包上學堂。
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
只怕先生罵我懶哪
沒有學問，無臉見爹娘。
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
沒有學問，無臉見爹娘。」

小嘛小兒郎，背著那書包上學堂。
不是為做官，也不是為面子光。
只為窮人要翻身呀，
不受人欺負呀，不做牛和羊。
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
不受人欺負呀，不做牛和羊。」

1953年9月，我開始進入大埔崇德小學一年級攻讀。沒想到，一入學就要學識唱這首「讀書郎」，而且是用國語唱的。試想想：一個只有七歲操廣東話的小孩子，竟然要唱這一首充滿艱深漢字的兒歌，而且又是用國語唱的，真不容易！但奇怪，我記得我們這一班小朋友很快便學識，並且背誦了整首歌，而且唱起來，蠻有感情，非常激昂。何解？原來這首膾炙人口的兒歌，是作者宋陽在抗戰期間在貴州安順根據安順城郊汪家山的苗族蘆笙音調與歌詞改編創作而成。這首兒歌是在國家面臨最黑暗的一刻寫成的作品！在老師的講解下一同學唱這首歌，那種心情至今仍存在我的腦海中。



崇德小學位於大埔墟崇德街，於1926年由鄉議局(原名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所建，有3間房舍，一切費用來自鄉議會及地方人士捐募。到了1950年代，獲政府津貼，因為1949年後，香港人口激增，學額嚴重短缺，政府顯然著手建立新的官立學校，同時也鼓勵民間團體辦學，加以津貼，香港稱這類學校為津貼學校。政府傾向後者多於前者，因為政府只需支助津貼學校一半的建校費用，及學校教職員薪金，其餘有關老師的福利，退休金等不予資助，所以開辦津貼學校的費用，遠遠少於官立學校的費用。因此我們看到1950年起，不同形式的津貼小學都在港九新界出現。崇德小學在抗戰時停辦，1948年春復課，分上下午班，共有14班，學生500多名，但崇德的校舍比較陳舊，風格也非常保守，更缺乏各類設備，成績並不是卓越。就以1959年升中會考作例，當年崇德小學派出22名畢業生參加小學會考，雖然當中有19名獲得合格，但能得到中學派位的，只有3人，(參看《工商日報》1959年8月24日)。但反觀大埔官立小學，那一年參加會考的畢業生有差不多120人，幾乎有超過一半的學生被派往皇仁中學、伊利沙伯中學、拔萃女校、拔萃男校、英皇中學等名校，其餘的也被派往各港九、新界中學。正因如此，父親就把我於三年級時轉往大埔官立小學就讀。記得當年有千多學童報名，取錄僅90人，我是其中的一個。

大埔官立小學是我走出狹隘人生的第一步，父親帶我往港九遊覽只是見一麟半爪的殖民風光，但在大埔官立小學的四年，讓我更體驗到這英國殖民地的面貌。大埔官立小學成立於1946年，是大埔區歷史最悠久其中的一間小學，1952年，校長馮銳詔，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官，在未任大埔官立小學校長之前，曾任教於皇仁中學多年。據一些老師告訴我們，馮校長有一個異象，希望在大埔建立一間不一樣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小學，按他的履歷，足可以任中學校長，更可況他也是一位地位崇高的官守太平紳士；他出任為大埔官小校長，就是懷著這樣一個理想。

究竟馮校長的異象是什麼呢？只要你有機會參觀我們的學校，你就很快看出這確是一間不一樣的學校。校舍位於大埔運頭角里的山上，即與大埔理民府為鄰。三年級學生在如今之大埔滙豐銀行右側之麥當奴樓上兩個單位上課，四年級開始便要往新教舍上堂。我從沒有見過有如此廣大的校園，有後山、有球場。後山更闢有好幾塊梯田，是男生上農業課的地方。我們課程中，有農業、木工、家政等課目，是全港獨有的。我們男生要鋤田，每天都要澆水，到了收成時候，個個同學開開心心把收成的蔬菜，粟米帶回家，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對我這個在農藝所長大，土頭土腦的「鄉下仔」來說，倍感親切！

大埔官立小學是一間全日制小學，由三年級至六年級共有20班，三年級有兩班，四年級以上各三班。莫以為我們這間耕田的小學是一間學術低劣的學校，非也！它是全港數一數二之名校，成績斐然，就以58年小學會考為例，每年全港只有榜首的150名學生獲得五年免費教育獎金，大埔官立小學一間便獨佔了12名。

事實上，大埔官立小學的老師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三年級的班主任是陳永鈿老師，她就是李思敬博士的母親，也是李非吾牧師的妻子。她剛柔並存，學生們都非常尊敬她。我身為班長，頗得她垂青。我還記得：有一回，陳老師在國文課叫我們以「準確」一詞作句，我寫著：「火車的時間是非常準確的。」居然獲得她讚賞，在課堂中把我的句子唸給全班同學聽，並謂她家住九龍，每天都要乘坐火車來大埔上課，若火車不準時，她就無法按時回校上課了！現在想起來，覺得這句子是有語病的，因為「準確」不同「準時」，「準確」是完全沒有

錯誤的意思，即英文的 accurate，」而「準時」是沒有誤點的意思，即英文的 punctual。然而，陳老師卻網開一面，反而稱讚我。

埔官是一間非常獨特的官立小學，男生是要學習農業和木工課程，女生則學家政課程。張鳴老師是我們的木工老師，課室堆滿了各樣木匠工具。我還記得在四年級那年，我做了一張椅子，不用一釘，全用入榫工夫，這椅子便成為我在家中的勝利品。更有趣的，後來我在三藩市教會事奉的時候，得悉張老師原來也移居在灣區，而且也信了耶穌，真是神的恩典。

昔日在香港，三年級的學生才開始學習英文，第一位老師教我們英文的是一位操國語的董博士。他是從上海來的，是一位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多才之士。他疼愛我們一班學生，每逢我們能背誦一些英文句子，便賞我們糖果，所以直至現在，我還記得「A man and a pan. A pan and a man. This is a man. Is this a man? This is a pan. Is this a pan?」這些英文課本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插圖及內容全是以馬來亞為背景。港英政府便順使用諸於香港小學教育上，完全沒有想過這是否適用香港這個文化背景的問題。

不過，印象至深刻的還是教我們英文的何老師了，何老師畢業於皇仁中學，他常常在我們面前誇讚皇仁，並鼓勵我們申請入讀皇仁。在那時候，每個小學六年級學生都要參加小學會考，後來改為升中試。教育司署便按著學生的成績及其志願而派位至各港九新界中學，包括政府中學，補助中學及津貼中學。於是不少名校，如皇仁、英皇、伊利沙伯、男拔萃、女拔萃、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聖約瑟、英華男校、英華女校、聖瑪利、瑪利諾、聖保羅、聖保祿、香港華仁、九龍華仁等都成為熱門選項。新界人仕多數是選擇伊利沙白中學，因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位於九龍洗衣街，非常接近油麻地火車站，我家姐蘇穎儀便是在1957年考入伊利沙伯中學攻讀。

何老師極有教學心得，以致我們對英文學習蠻有興趣，他更不惜在放學後，因材施教，挑選一些他以為天賦較高的學生補課，希望他們在會考的成績卓越，我有幸亦被選上。一年下來的辛勞，終獲回報，我們大部份同學都被派往心儀的學校，受何老師影響而考入皇仁的竟有7位之多，其中鄧漢樞更獲葛量洪獎金，這是極高的榮譽，全港排名前20名的考生才獲此殊榮。事實上，在我們那一屆的畢業生中，有不少成為香港優秀人才，其中吳靄儀大律師便是我們大埔官立小學59年度的畢業生！

在四年的埔官生活中，有一件難忘的事。1956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時我正讀四年級，突然聽到學校報告，學校要提早關閉，各同學要立即回家！這消息來得非常突然，而且老師們都好像非常緊張似的。原來那天早上，九龍發生了暴動，這次事件，緣於九龍石硤尾徙置區事務處一名低級職員，從不准張貼標語的牆上，撕下中華民國旗幟，引起群眾不滿，要求徙置區職員燃放爆竹，以示道歉。及至下午，更有暴徒闖入徙置區辦公室，毆打各職員，於是警察防暴隊出動，彼此發生衝突。此時騷動範圍擴大，雖然警方施放催淚彈，但未能制止，於是到了11日，警方於早上突施戒嚴，九龍和香港之間的渡輪停航。該日下午，瑞士駐香港副領事歐安氏特夫婦所乘的汽車，在大埔道被暴徒包圍，並且被澆上汽油燒毀，結果司機及歐安氏特夫人同被燒死。該晚，英軍出動坦克和裝甲部隊，向暴徒投擲催淚彈，到了12日，有3,000暴徒在荃灣寶星紗廠搗亂，縱火焚燒工廠，更有婦女被暴徒輪姦後殺死，不少大陸百貨公司及左派工會及勞工子弟學校均被襲擊，

晚上葛亮洪總督發表廣播，表示要嚴懲暴徒，直至16日才告平息！

這次暴動導致59人死亡，443人受傷，1,241人被判入獄，被洗劫的工會，學校，工廠及商店不下300家。究竟這次暴動的起因是什麼呢？港英的看法與中共的看法很不相同；周恩來在10月13日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對香港英國當局未能制止國民黨特務分子製造暴亂，提出了嚴重抗議；因為他們以為國民黨特務是這次暴動的主要黑手。而葛亮洪在其報告書中，則指出此暴動乃不法之徒所煽動，乃屬犯罪行為，而非政治及其他作用。港府企圖把暴動的責任歸咎於黑社會和難民身上，並指出本港難民約50萬人，彼輩都有反共意念，然而這次暴亂，只為一己之利益及勢力著想，沒有證據證明這是國民黨策劃的行動。

誰是誰非？至今仍是一個謎。然而，在我們一班小朋友心目中，我們身居新界一切都較為平靜，以為香港是一個頗為安全的地方，也是可永久安居之處，但這次却叫我們心中起了不少疑惑。然而，國民黨在港活動開始「受到抑制」，在港政治影響逐漸淡出。相反的，中共經過此番衝擊，重組加強駐港的政治機構，新華社更成為中共在港最高行政機構。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體會到自己的弱點，一次事件是以可引發大的暴動，即使暴徒沒有武器，並非有預謀，也可以叫社會失控，若非軍方及時鎮壓，單靠警方的實力，難以控制，這是隱藏著一大危機，也是為1967年的暴動寫下了伏筆！究竟港英的策略是什麼呢？

現在年紀大了，回想從這一段時期所看，所聞，所經歷加以分析，也未嘗不看到港英深謀遠慮的策略。據英國聯合情報局部（Joint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Intelligence Bureau，簡稱 J. I. B)於1956年呈交英國國防部的文件看來，他們看到香港的危機在四方面：

- 共產主義—在香港中共地下黨的活動和外國組織。
- 極端國民黨分子及民族主義—主要是那些從大陸來港的難民。
- 勞工和農民騷動。
- 種族和宗教所引起之衝突。

從這報告來看，港英政府要解兩大問題，才可以維持香港的安定：一是身份問題，二是民生與經濟問題。論到身份問題方面，若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共或是台灣一份子，這都帶來殖民地社會的不穩定，56年暴動是極端民族主義所為，尤其是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難民，而50年初的電車罷工及1958年的中華中學事件則是左派所引起的騷亂。當然日後1967年的暴動更是更大的威脅。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港英政府一定要除去港人歸附中國(左或右)之身份認同心態，教育便是一個最佳方法了！我現在開始明白為什麼我們在香港唸書，唸中國歷史時缺少了中國近代史這一段史實。無論是小學，中學及甚至大學，我們唸到清末時便終止了；有關國民黨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我們的腦袋中全是空白的；甚至日治時的香港也甚少涉及。看來，港府已成功地把香港人「認祖」的心態降至最低的温度，但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也無意叫香港人認同英國，若香港人以為自己是英國人，那麼祖家又如何阻止大量的香港人移民英國呢？正因如此，只要香港人甘心作個沒有國民身份的香港人，香港就穩定下來。當然，民生與經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70年代的麥理浩總督就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而葛量洪是解決身份的問題的主要設計師。

我現在回憶起我在崇德小學及在大埔官立小學的那段日子，我開始明白我當時所存而又不大明白的心裏問題，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在大埔官立小學時，不會唱「讀書郎」這類的歌，如果我比較讀書郎與大埔官立小學的校歌，我們便會看出港英政府的心意！

桃李芬芳，向學勤奮，大埔官校，百年樹人，
全人教育，各展所長，志深立身，敬業樂群，
貫徹向學，心堅守禮訓，友愛切磋，以增進學問，
學校家庭同牽手，發揚我校，教育精神。」

在這校歌中，我們看不到「不是為做官」「不是為面子光」「只為窮人翻身」「不受人欺負」「不做牛和羊」等滿有民族尊嚴的字句，坦白說，事隔60年，我仍不忘記「讀書郎」的歌詞，但大埔官立小學的校歌，我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若不是查閱有關大埔官立小學的歷史檔案，我也記不起原來我們的小學是有校歌的！

此外，我也開始明白，為什麼我們的英文課本是採用英國人為馬來亞人撰寫的，原封不變的搬到香港使用；我更明白我們大多數的老師都是年輕的一代，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在香港葛亮洪師範學院畢業的一代，對中國近百年憂患絕少提及的一代，而作為他們的學生，我們似乎也和他們一樣的成為「沒有國民身份的香港人。」這方面，葛亮洪政府是相當成功的，這就是我與先前所說：「大埔官立小學是我走出狹隘人生的第一步。」從「中國逃亡到香港之難民心態」到「沒有國民身份」的「香港人」心態了！

我們一家自從1950年定居於農藝所，經過了八年平淡的年日，父親終於在1957年有了突破。父親一向的異象，是建立一所有實用課程的孤兒院，除了教導一般文法學校之課程外，並有一些工藝，農藝等實用課程。男的學織藤、造鞋。女的學縫紉、烹飪等。更設有農場，教導學生種植、養豬、養雞的農藝，務使他們將來有一技之長，謀生較易。農藝所就是本著這異象而設立。但可惜地理環境狹小，資源缺乏，未達理想。然而，他這異象却深得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總幹事微勞士的欣賞。微牧師認為現有的幾間孤兒院，雖然能暫時能解決急需的兒童救助工作，但這並不理想。他構想設立一所有規模的兒童院，內有家舍。每一家舍由一家長管理，角色有如母親。每個家舍有若干不同年紀的男女兒童，猶如家中的兄弟姊妹，讓這些痛失家庭的孤兒，一嘗家庭的溫暖。此外，又設多種工藝，農藝，訓練他們有一技之長。早在1952及1954年間，他曾選中了在元朗八鄉附近的一個農場，地點就是今天的嘉道理農場；農場的主人因經營不善，打算出售。微牧師曾與他洽商，希望轉讓，但可惜當地的鄉紳父老反對，此事就告吹了！

但到了1954年，在父親之協助下，微牧師終於找到一個理想的地段，作為一間有規模的兒童之基地。這就是位於馬鞍山烏溪沙之紅綿嶺。這塊地原屬官地，香港政府準備拍賣這地。在公開拍賣前，

微牧師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陳述他的夢想，希望投得這塊地，建立一個亞洲規模最大的兒童新村。結果，在拍賣的那天，只有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出價，其他競爭者却都全部沒有出價，微牧師順利以12萬港元投得這塊地。

1954年開始籌劃建築這個命為「兒童新村」的孤兒院，1954年尾開始動工，1957年8月建成，正式開幕。內有66間房舍，每個房舍有一個大廳，四個睡房，還有廚房和浴廁室，除了房舍外，還有辦公大樓，班房，大禮堂，體育館，音樂室，禮拜堂，工藝室等及一個大球場。兒童新村於1957年開始運作，一直至1972年結束。在這短短14-15年間，培育了數以千計的兒童，不少成為社會棟樑。而兒童新村這地方，基督教兒童福利會慷慨地把它贈送給男青年會，作為營地。雖然在法律上是一項賣買手續，但實際出售價格只是港幣1元，所以其實是贈送的，並改名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面對著這樣一樁大工程及大挑戰，父親本應是非常雀躍的；因為整個農藝所將會聯合其他一些基督教兒童福利會轄下的孤兒院一同遷入兒童新村，而父親有機會担当更重要的職責。事實上，在1957年，他帶領一班農藝所的教職員及學生，一起到烏溪沙參觀，那時工程仍在進行中，但已略見規模，確是令人鼓舞和興奮的。但見父親神采飛揚，準備大展拳腳，實現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但到了1957年，兒童新村落成後，父親却決定我們一家不隨農藝所搬遷，而是搬往距離農藝所不遠的一個新建農場。父親把它命名為森園。起初，父親一人遷往烏溪沙兒童新村，每星期回家一次與我們相聚，我和家姐則住在森園，由一位Y師奶照顧，而農場則由一位隨父親來港的禺光孤兒院學生王汝河打理。這種情況維持了不夠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幾個月，父親決定辭職離開兒童之家，返家主理森園農場事務。我們一家也不用分離了！父親告訴我們，他是因為在馬鞍山水土不服，患上了哮喘病，所以決定辭職不幹。但我總覺得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按我所知，兒童新村人事相當複雜，父親亦不願捲入人事鬥爭之中，於是才決定提早退休，專心打理農場事務。我們從1957年開始，離開了環境封閉的農藝所，搬入森園。森園位於大埔南坑村。我們又要適應香港新界鄉村的的文化，所謂入鄉隨俗。原來我發覺新界的鄉村文化與難民的文化 and 港英的文化截然不同。

或許我未提及這「新界鄉村文化」之前，我先說說歷史背景。1898年6月9日，英國與清廷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根據此約，英國從中國租借了廣東省新安縣內從沙頭角到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線以南，直至九龍界限街以北的一大片廣大地區，以及包括大嶼山在內的附近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水域，租期99年，後來命名為新界。

在當時的新界地區，散佈了不少鄉村，大概來說，有3類不同的鄉民，即本地，客家及蛋家3類人，其中以本地人勢力最大，而他們亦是土地的擁有者，其中以姓鄧、文、彭、廖幾個宗氏大族勢力至大。至於客家，他們大多是從大陸南移，最後落腳於新界鄉村，而森園所在的南坑村，則大多是客家人，他們操客家語為多。至於蛋家，則多屬水上人家，以打魚為生，而其餘的本地人及客家人則以務農為生。

據新界鄉議局在1997年於大埔海濱公園的回歸塔建有一銅碑，上面刻有以下的新界歷史典故：

「香港新界，乃鄉民立根之地，創業之源。百年前，列強入侵，滿清無能，喪權辱國，割讓港九於前，租借新界於後。租借

之初，先民保鄉衛土，慘烈犧牲。香港淪陷，鄉人對日抗爭，顯耀功勳。香港重光，新界發展，鄉民積極參與，為社會繁榮，作出重大貢獻。

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簽訂，97年7月1日，國家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殖民管治，宣告結束，前恥去。國運當興，此歷史性時刻，對新界原居鄉民而言，意義重大，是以新界鄉議局倡議並贊助興建此回歸紀念塔，作為香港回歸之獻禮。」

這裡提到「租借之初，先民保鄉衛土，慘烈犧牲。」是指發生於1899年4月的「新界六日戰」。1899年，當時的香港總督是卜公，他打算按中英所簽定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於1899年4月17日在大埔正式接收新界。在此之前，香港政府曾與新界鄉民見面，以便接收，但鄉民不清楚接收後政策而深覺憂慮，而港府亦未能及時釋疑，致令鄉民更為不安。及至港府警察於屏山高處設置警局，屏山鄉大族鄧氏更為不滿，以為這是破壞風水，於是組織武力反抗，並且得到夏村鄧族與錦田鄧族加入，本來他們亦有邀請其他大族及鄉村加入，但不獲支持，只願捐錢，不願派人加盟。由於英國當局全無預備，只有在大埔駐有少量軍警。4月14日鄉民在大埔發難，主要戰場是大埔，林村，八鄉等地，英國多次戰事失誤，人數遠少於當地鄉勇，英軍遂陷入苦戰，但英軍始終武器精良，火力威猛，鄉民武器落後，不少鄉民陣亡，終於4月19日，雙方和解，香港政府亦無追究，4月21日撤軍，新界局勢亦趨和緩。港府有見及此，乃一改其策畧，一方面按中國傳統起用各族士紳，間接統治鄉民，這種懷柔政策，一直沿用至1997年！

又據此銅碑所提及「香港淪陷，鄉人對日抗戰，顯耀功勳」，乃是指在日治期間東江縱隊抗日的英勇事蹟。在香港新界沙頭角的「烏蛟騰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烈士紀念園」及在香港新界西貢一公園都有「抗日英烈紀念碑」，兩座碑都由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題詞，記述在抗戰期間港九大隊浴血殺敵，氣壯山河的傳奇歷史。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簡稱為港九大隊，於1940年9月建立，是一隊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組成，隸屬共產黨屬下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員大多是農民與學生，主要在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人數約有6,000成員。當英軍在日本進攻時撤退，把他們一些武器交給這游擊隊，他們主要工作包括：

- 建立地下聯絡系統，他們利用日軍佔領香港初期兵力不足，無暇顧及鄉村之有利時機，派出大批民軍隊員深入到新界650多個村莊，組織和武裝群眾，以游擊方式偷襲日軍，正如曾生所說，他們多打人仗，打巧仗，時聚時散，神出鬼沒。
- 在日治期間，日本往往是透過香港這轉運站，把物資送往東南亞等國，他們目的是破壞日軍的運輸線。雖然他們只有一挺輕機槍和十來支長短槍，條件有限，他們却化裝為漁民，施行突襲，屢見奇功，據朱姝璇在《炎黃春秋》所撰一文「港九大隊：插入香港敵後的尖刀」所言，他們在3年間共擊沉敵船7艘，俘獲43艘，擊斃日軍52人，俘36人。
- 營救知名文化界人士及盟軍。他們先後營救了20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3名丹麥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及1名菲律賓人及一些英美的飛行員。此外，他們亦協助了600多名知名的文化界人士離開香港。
- 他們亦扮演一個重要情報站的角色，派遣特務觀察日軍船隻進出港口情報，提供給美軍之情報人員。

從以上的歷史看，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港英政府對新界原居民有如此懷柔的政策：英國聯合情報局1956年一份給英國國防部的文件中提到，他們特別注意到香港四個組別：

- 共產黨—包括工會，教育，報章等
- 極端國民黨分子
- 勞工和農民騷動
- 種族，宗教和部落的緊張

起初我不明白為什麼港英政府要特別留意在新界鄉村的農民，為什麼他們會懼怕有農民騷動，但細看新界鄉民的背景與歷史，便知道他們與中共是有一種特殊的關係，難怪我在50年代每逢十一國慶，見到不少新界鄉村都掛起五星旗慶祝，在新界村落中，我們是甚少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調景嶺的情況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然而，港府這種懷柔政策將引起日後「官鄉勾結」的政治問題！

大埔南坑村是一條客家村。客家人源自中原，他們曾經六次南遷。第一次是在秦朝時期，B.C.221，秦始皇統一中國，派兵60萬南征，到達今之揭陽縣北。到了B.C.214，再派50萬兵到達廣東及廣西地區，這些士兵不少留在當地，成為首批客家人。第二次南遷是在東晉時期，在中原的居民因逃避戰亂，遷至福建及廣東一帶。第三次則在唐朝末年，因著安史之亂及黃巢之亂，大量中原人士再度南遷。第四次是宋朝時期，金人入侵，臣民被逼南遷，蒙古人入侵，更多中原人仕逃至粵東及粵北一帶的地方，到了清朝康熙，為了爭取南方居民的支持，乃鼓勵實行墾荒，並贈與銀兩若干來資助，不少四川人南下開墾，是為第五次南遷。第六次南遷發生於太平天國時期，國內戰火連連，部份客家人更遷至東南亞一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香港原屬廣東省寶安縣，也是客家人聚居之地，他們早在17世紀時已經遷至香港，是香港未開埠前的原居民之一。客家人原居的村落，香港本地人稱之為客家村。據2010年普查，香港客家原居民約有20萬至30萬，若加上那些在1949年才來港的客家人，則有100萬之多，客家原居民多散居在新界大埔，沙田，北區，西貢，荃灣和屯門。

香港的客家人大多是操「粵台片梅惠小片」的客家語，與惠州，河源，台灣的客家人相同，但元朗南部的客家村則以操平婆話為主，屬福建省平和縣汀州片客家語，據2010年之普查，香港人以客家語為母語的約有62,340人，佔香港人口0.9%，但通曉客家話的則有259,738人，佔香港人口4.7%，在新界631條原住民鄉村中，客家村佔341條。在1950年時代，客家人的比例則更高，而我們所在的南坑村，幾乎90%是客家人，都是操客家話的！

客家人多以務農為生，在50年代以種植稻米為主，後來則改種蔬菜及水果。他們大多生活樸素，刻苦耐勞。男女皆穿著簡單藍色或黑色衫褲，最見特色的便是他們的黑色「涼帽」，並用花帶綁著固定。客家人日常飲食簡單清淡，遇有節慶，則會做茶粿賀節。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客家的梅菜扣肉和盤菜，現在盆菜已成了香港特有菜色，由「客家」轉為「本地」菜色了！

新界的客家村與本地村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本地村(如上水的廖姓，八鄉的鄧姓)是非常排外的，外圍人士是比較困難融入在他們中間，他們有著非常嚴謹的宗族關係。但客家村則比較開放，外來人士也比較容易與他們融和。所以我們居住在南坑村，也不大覺得有不受歡迎之感覺！正因如此，他們被同化的機會也大了，尤其青年一般不再務農，他們也漸漸失去「客家人」的本色，所以「客家」一名真是名符其實！

正因客家村是比較開放，自十九世紀以來，不少西方傳教士開始在客家村落傳道。我記得年少時，村民看到有傳教士來到南坑村的廣場，放映福音電影，他們便歡歡喜喜一家前往觀看。我還記得那電影名為「萬王之王」。巴色會是眾差會中最活躍的一個客家差會。早在1860年他們便出版了一本客家話的馬太福音，除了聖經外，這些西方傳教士還出版了宗教啟蒙教材，有關客家人的《百科全書》，及《客英大詞典》，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作品。

父親在農藝所當院長的時候，已經與南坑村一些鄉紳認識和建立了一些關係，他們對這位「蘇院長」也頗為尊重，這回父親離職在南坑開設農場，也是無限歡迎。雖然森園是位在南坑村的外圍，但父親却主動與他們聯絡，父親有見南坑的客家人多以務農為主，其中不少是養豬的，但他們養豬的方法是比較傳統和古老，遇到豬瘟或其他疾病時又不懂得處理，再加上客家村多是各自為政，組織散漫，往往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失。於是父親便與一些鄉紳商量，組織養豬合作社。父親在過去十多年來都是在中國攬合作社的，無論在組織方面，養豬知識方面，都極賦經驗，再加上港英政府在此年代積極加強新界管治，在1951年2月通過「合作社條例」（香港法例第33章），鼓勵新界農民成立合作社以期提高農業產量，同時也希望藉此防止中共滲透香港新界的農村。此外，又加強當時的漁農處的發展，1964年更升為一獨立部門，改名為漁農自然護理署（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簡稱AFCD）發展香港的農業和漁業，後來更加設郊野公園。港府的策略：透過政府的協助，幫助新界農民成立合作社，父親找著這時機，便與南坑鄉紳商量，組織養豬合作社，又透過利用政府農林處的資源，協助豬農發展他們的業務。

父親很聰明，他不願擔當大旗，只願做個副手，結果主席，副主席等崗位仍歸南坑村的鄉紳，他却擔任合作社的文書一職，並且負責聯絡政府農林處。據父親所說，他非常欣賞當時漁農署署長姬達(Jack Cater)及他的副手陳方安生。我們知道，姬達後來成為香港廉政公署第一任署長，深得港人愛戴和欣賞。

這個養豬合作社的功能是什麼呢?主要是聯絡漁農署，提供技術：如防疫，人工受孕，養豬新知，銷售豬隻，及衛生等問題。同時又成立「供會」制度，「供會」又名「標會」，凡是合作者的會員定期供款給合作者的「會金」，若某會員因經濟需要，可向合作社「會金」申請援助，並按月連息償還。利息自然較低，而且還款的機制也得到保證，如此便可杜絕一些地主從中藉高利貸取利，這也成為合作者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

所謂「入鄉隨俗」，自從我們搬入森園後，我們也漸漸成為半個新界鄉民，雖然我們的客家語還是有限，但總可以與本地人用客家話溝通。我們的菜色也漸受客家人的影響，什麼扣肉，梅子鴨例牌成為我們過時過節的佳餚。然而森園始終還是在南坑村的外圍，除了幾個是我們在大埔官立小學的同學較相熟外，我們始終還是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我們的身份，無論在他們的眼中，或是在我們的心理上，都永遠不是新界鄉民。



第十一章

然余居於此，
多可喜，
亦多可悲

明朝文人歸有光著有項脊軒志，文中有云：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讀歸有光之《項脊軒志》，心中有同感。我們一家居於森園，多可喜亦多可悲。雖然森園並非室僅方丈，也不是百年老屋，但却是塵泥滲漉。每逢打風下雨，雨澤下注，我們都非常狼狽，真是「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然而，森園這家却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父親從鄉紳朱德馨租這地時，原是一個番石榴果園，倚山而建，由南至北有差不多3,000多呎，由東至西也有1,500呎，面積相當廣闊，園內種滿了番石榴樹。父親租下了這農場後，就大興土木。首先築了一石屋作住宅用途，一廳兩房，頗為寬敞。此外，又建了兩座豬舍，都是木屋，一在西、一在北。在住宅和在北之豬舍間，他蓋了一個頗大的半開放式房子，側有廚房，後有儲物室。前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飯廳，另外還間了一間小房間，後來父親就搬至這房子居住。廁所、浴室則在住宅旁。後來父親又加建了3間大木屋，一間是大哥一家的住宅，另一間則作出租用途。

屋後都是密茂的番石榴樹，木瓜樹等，而屋前則是一排排的竹樹，所以家中常有陣陣涼風，竹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又常有小鳥來啄食，真有世外桃園之感！

不過，在鄉村地區，既無自來水，亦沒有電力供應。父親在森園前面的農田中鑿了一口井，這兒水源甚豐，永無制水。養豬是需要很多水，父親就安裝了一副電動水泵，安裝喉管，把井水源源不絕供應我們一家所需。不過，農場的衛生條件很差，豬糞的味道薰天，而且處理也不易，再加上沒有水廁，糞便的處理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附近住有一些耕作的農夫，我們就全賴他們從農場中收取糞便作為耕田之肥田料。由於環境關係，園內之蚊，蒼蠅，蟲蟻特別多。每逢夏天日落之際，蚊子就開始活躍起來，我們就用滅蚊劑撲滅，並睡在蚊帳內；這一切對身體是有負面的影响，我在中四那一年曾經大病一場，我相信是與環境有着極大的關係。而父親在晚年時患上的哮喘病，皮膚病等，也是與此有關的。50年代的新界鄉村，仍沒有電力供應，晚上我們都用火水燈，燈光微弱，所以我們大多一早就上床睡覺了。至於煮食方面，我們則用木糠和木柴。在大埔舊墟有一間木鋪，任憑街坊免費取木糠，我就常常獨自兒用單車把一袋袋木糠送回家。父親想出一個非常創新的方法，他利用那些救濟奶粉的罐當作火爐，中間則留下一個通風的洞，作點火之用；其餘的則塞滿木糠；每一罐木糠剛好煮熟一頓飯，非常有趣。至於木柴方面，就要上山砍柴，若砍無可砍，就要花錢購買了。

然而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首先談談可喜的事。我記得在那段日子，我們沒有電腦，電視，手機等，但我們却有整個大自然與我們在一起。我想到與家姐一起到大埔海邊拾蜆，到附近農田地塘捕捉田雞，往山上採摘野果等等都是刺激，有趣和開心的經歷。不過，最開心的莫過於看見農耕的收成。森園原是一個番石榴果園，每逢到了8月至10月，便是收成時間。番石榴的學名是 *Psidium guajava*；澳門、珠海等粵語地區叫花稔、番稔；廣州同香港人稱雞屎果；台灣人叫芭樂；原產地是美洲熱帶地區，在中國華南地區非常普遍。番石榴樹不高，容易採摘。我不大喜歡吃，因為我以為令我消化不良。但我們會出售給商人，希望增加多一點收入。此外，Y師奶也種植了生菜、芥蘭和菜心。這些蔬菜既新鮮，又可口，是我的至愛。我們主要是養豬的，豬隻長到約100斤，我們便把牠們出售給豬農，我們一早便起床，讓這些出售的豬隻狂食牠們最後的一餐來增磅。然後父親便帶我們到大埔蔡兩利茶樓飲早茶。事隔了數十年，這影像還歷歷如在目前。此外，我們還養雞，我每天早晨，例牌都先去雞舍拾雞蛋，然後才返學。這是最喜愛的差事。

既有可喜的事，亦有可悲的事。想起那段日子，最難忘的是颶風季節的時候。森園大多數的房子都是木屋，屋頂都是採用瀝青紙 (Asphalt paper) 所蓋，既防水，又防潮。在香港的木屋，這是常見的。然而，瀝青紙屋頂因輕身，受不住颶風吹襲，往往整個屋頂都被大風吹毀。當颶風襲港，我們在屋內眼見屋頂搖搖欲墜，非常驚險。有好幾次，屋頂真的被颶風吹倒了，屋內所有東西被風雨吹到雞飛狗走，狼狽不堪。我還記得1962年，溫黛颶風襲港，天文台掛起10號風球，風力非常強勁，我們有數間木屋的房頂都被吹毀，損失慘重。可幸沒有山泥傾瀉，人命也保，這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是神的恩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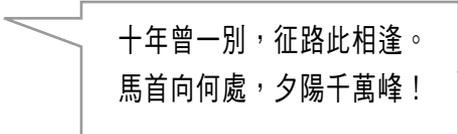
另一件可悲的事是「火災」，在森園後面是一座不高不低的山，叢林密茂，而且有不少村民的先祖墳墓，每逢清明或重陽，有不少孝子賢孫，前往拜祭，燒祭物而留下火種，在重陽時候天氣乾燥，容易引起山火，火乘風勢，不可收拾。記得有一年，是我剛進入香港大學讀書那一年，森園的後山忽然火光熊熊，而且迅速向我們的方向蔓延。雖然有不少消防員前往搶救，但火勢仍然非常猛烈。看來我們難逃一劫。父親眼看如此，不知所措，他忽然對我說：「穎睿，設法把剛新買的那座鋼琴搬走！」原來那座鋼琴是父親買給家姐的，因為家姐很想有機會學習彈琴。我對他說：「為什麼我們不拿走一些重要文件，證件及財物，而只顧及這座琴？況且，這座鋼琴這麼笨重。我們怎能把它搬走！」原來在父親的心目中，這座家姐的鋼琴是這麼重要的！還好，那時風向改變，化險為夷，我們只得一場虛驚！

在我的記憶中，最淒慘的一件事便是「陳嫂」的去世。「陳嫂」是替父親打理農場的女工。她身世非常可憐，有兩個兒子及1個女兒。丈夫在香港工作，從沒有回家，也沒有養家。據云，他在外面有了新歡，拋妻棄子，一家四口只靠陳嫂維持。更不幸的，她的小兒子是個弱智的兒童，這更加添她不少壓力。還幸，她的大兒子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青年，雖然讀書不多，但却能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幫補家庭的開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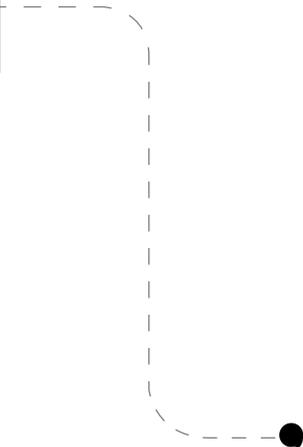
陳嫂為人和順，非常忠心，是父親的好幫手，也是我們一家的好朋友。在我唸中四那一年，不幸患癌病，身體逐漸衰弱。雖然她體力愈來愈衰退，却仍然堅持要返工；這令父親心有不安，最後父親承諾給她有薪病假，叫她在家好好養病，而「河哥」自己一個人兼負了她的工作。「河哥」是從廣州孤兒院的學生，解放後他跟隨父親來到

香港。先在農藝所，後來離開孤兒院，輔助父親開辦農場。最後，當父親年老退休，便把整個農場交付他經營。他和陳嫂是最佳拍檔。陳嫂的病及其後去世，對我們一家及河哥都有極大的打擊。我常常奉父親之命探問陳嫂，並向她分享基督教福音，眼見她一日比一日消瘦，整天都要臥在床上，一切大小家務都倚靠一個不夠12歲的女兒身上，真是聞者不安，見者有淚；但想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若不是我們有基督所賜永生的盼望，人生就只是一片虛無，轉眼就過去。

自從在1957年搬進森園，一直到1968年父親決定搬往九龍居住，足足有10年之久。這也是我成長的一個重要年階。其間所發生的事：如Y師奶的離開，弟弟穎智從中國偷渡來港重聚，父親開始年老及體力衰退，我的大病，要入住醫院一段日子，家姐中學畢業進入護士學校等，都影響著我們整個家庭。然而，在這10年，我在皇仁中學及後在香港大學接受英式教育，並目睹其間香港社會的改變，令我對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的意義更覺迷惑。正所謂：



十年曾一別，征路此相逢。
馬首向何處，夕陽千萬峰！





第十二章
同是天涯
淪落人

「自從蘊芳死後，我始感到人生最大的悲哀。孟子說：「鰥寡孤獨，天下之貧民而無告者。」俗語說：「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中年喪偶。」我正過了中年，而不幸的事情又重臨到我的身上。此後我續娶呢？還是鰥居呢？續娶？蘊芳遺下四個兒女，我怎肯將他們交在繼母的手上呢？鰥居嗎？那麼這四位兒女，最大的不過7歲，一教一養，達到他們能夠自立，最低限度還有十餘年的悠長時間。我要使蘊芳能夠瞑目於九泉，我要負着兼顧父母的責任，寧可忍受痛苦，忍受孤寂淒清，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已立下決心了。

蘊芳死了半年後，有些朋友先後勸我續絃，還介紹相識給我。但我有了決心，續絃的滋味，始終不敢嘗試。」

這是父親所寫當時的感受，一方面他感到非常內疚，正如他又寫着說：「蘊芳的死，我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假如我當時認識了共產黨的真正面目，又假如我不是只為了到香港後的生活打算，或者能夠犧牲了在大陸的微薄家產，舉家留在香港，這又何致累死了蘊芳呢？」他內心有愧於母親，以為自己是個「罪孽深重」的人，叫母親替他死亡，所以他說：「我就算過着孤清寂寞的日子，也難補償我的罪過。」或許是這個原因，他決定不再續絃，過着孤清寂寞的歲月來彌補自己的罪過。

但另一方面，他却要付出一個極大的代價——孤清寂寞的日子。我小時候，發覺父親不但是內心充滿恐懼的逃犯心態，也是一個充滿掙扎和孤清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但却有一個紅顏知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她是一個很神秘的人，父親從沒有告訴我們她的背景和與她的關係。但我們兄弟姊妹都知道和體驗到她和她的子女事實上是我們家庭中的一份子。我們稱她為Y師奶，父親對其他人則介紹她為我們家的管家。她有3個子女，大女兒在外居住，只是久不久才來與母親相聚。其餘一子一女都住在我們家中，他們的年紀也與我們相若。有時，有些陌生人以為我們是兄弟姊妹，令我感到非常尷尬，也不知如何應對。

父親在1972年3月14日離世。他離世後，我有機會整理一下他的遺物，無意中發現他所寫的一篇文章，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虛構的小說，細看之下，驟然發現原來這就是Y師奶的故事，我才知道他們的關係，原來他們都是天涯淪落人，有着辛酸的故事。

1949年，正是大江大海的震盪時候，Y師奶因着婚變，在晨光曦微的一天早上，帶着悲忿的心情，攜着失去了父愛的3個兒女，靜靜地離開廣州，來到陌生的香港，前路茫茫，棲身的住所，全家的生活，兒女的教育費都重重壓在她的身上。她想到輕生，覺得人生一切都是夢幻，臥死港九鐵路便一了百了，但看到自己親生的兒女，她又怎可以拋棄他們而去呢？

她的祖父，原是廣州市有名的商人，擁有西濠口的蘭亭酒店，並在興隆街設有頗具規模的火油供應站。可惜中年時染上鴉片煙癮，生意也一落千丈，她的父親是一名慘綠少年，不獨不能承繼父業，更是終日花天酒地，揮金如土。後更帶着一位妓女和祖父大部份的家財，逃到上海去了，只剩下Y師奶的母親和3個子女在廣州。不久，祖父也離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母親為了減輕負擔，便把她寄養在姨母家裏。姨母早年孀居，膝下無兒女，所以把她視為自己親生的女兒，生活也算安定。她就這樣渡過小學和中學的階段；不幸在她還沒有完成中學課程，姨母便去世了。她只有返回母親那裏，共同捱苦，常常在飢寒交迫之情況下生活。直至18歲那年，母親就把她許配了給一個30餘歲的中年男子。

這位當律師的丈夫，是一個好色而又狡猾的人，婚後不夠1個月，他已經原形畢露，每晚放工藉口應酬，其實是出外胡混。她從此過着悲慘而又痛苦的生活。在抗戰期間，她帶着兒女到處逃難，而丈夫却不見踪影。戰後，他們在廣州相聚，以為可以過着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誰料丈夫死性不改，甚至提出離婚要求。未果，他索性一走了之，沒有再與妻子和兒女來往。

1949年，他們一家來到香港，最後，Y師奶在信愛孤兒院找到一份工作，她的兒女也隨她入了信愛孤兒院。父親就是在信愛孤兒院認識了她，後來父親開始創辦農藝所，邀請她加入，負責整個孤兒院的膳食及女生的舍監。後來，父親提早退休，在大埔開設農場養豬，Y師奶一家亦搬來我們家中，和我們一起生活，父親對別人說，她是我們一家的管家，事實上，她也是照顧我們一家的飲食，衣著和家務。

我年紀漸大，對父親和Y師奶的關係也愈來愈感迷惑，但又不敢開口查問。

然而，在我童年的日子中，有幾件事留下深刻印象。我記得早年在農藝所的時候，家姐每晚都陪Y師奶的女兒一齊步行到南坑村她祖母的家住宿。Y師奶的母親年紀老邁，一人獨居在南坑村內，需要有人陪伴，於是Y師奶便安排她的小女兒每晚與婆婆渡宿。然而她年紀

又小，更由於她患了小兒麻痺症，行路非常不便。再者從農藝所到南坑村，需要至少20分鐘，因屬郊野之地，小路難行，特別下雨天時，泥濘不堪，舉步為艱，所以父親便吩咐家姐每晚陪她一同到婆婆那兒渡宿，翌日一早返回農藝所，直到吃完晚飯後又再返回南坑村。我記得有一次，當她們往南坑村途中，在路上遇到1條蛇，真是把這兩個小女孩嚇得魂不附體。家姐是個很和順的孩子，父親所吩咐的總是遵從，但我心中却為她抱不平，以為父親和Y師奶這樣作太過份了！

每逢年卅晚時，Y師奶總是為我們預備美酒佳餚團年。父親和我都非常喜歡吃扣肉，她也確是一流的廚師。父親的學生「河哥」是替父親打理農場的，他也是住在我們家中，每次團年飯時他總是飲到醉昏昏，當他飲到有點醉，就胡言亂語，我們一班小朋友覺得非常逗笑，他也樂意奉陪。那時我有點疑惑，不知他是真醉抑或假醉。然而，有一年，當我們正興高采烈吃團年飯之際，Y師奶的妹妹是住在我們農場附近的。她們兩姊妹不知何解一向都是感情不佳的。那一年，Y師奶的妹夫在我們正吃團年飯的時候，突然破門而入，大吵大鬧，弄到場面混亂，父親企圖調解，也無濟於事；最後還是不歡而散。但我們一班小朋友都嚇到胆破，那年的團年飯是最不開心，但又是最難忘的一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我知道就是他們兩姊妹，從那晚開始就再沒有來往了。

無可否認，Y師奶確是一個很能幹的女人，她的廚藝、家政都是一流的，對我們姐弟也算尊重和愛護。在某一程度上彌補了我們所失去的母愛。她對父親更是照顧周到，無微不至，使到父親孤寂的心情得到一點慰藉，他們委實同是天涯淪落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們姊弟二人與Y師奶子女的關係却有點微妙，Y師奶的大女兒年紀比我們長差不多七八年，再加上她又常在九龍居住，見面時候不多；她中學畢業後攻讀護士學校，也算是學有所成。我們對她都很尊敬，而她對我們也相當友善。然而，我對Y師奶的兒子是有點偏見的。我總覺得他能力不高却又自負，而且有點自私，對家姐大不客氣。至於他的妹妹，是在大埔官立小學的同班同學，她資質不高，在班中我往往是名列前茅，她却是排在榜末。她因身體有點缺陷，自卑感也頗重，很多時我也不知如何與她相處。事實上，我們的關係實在是太尷尬了。每當有同學或老師問起我與她的關係時，我總是迴避不答，所以在學校裡，我是有意無意間儘量與她疏遠。

我開始在皇仁書院唸中學時，心中對父親與Y師奶的關係也愈感迷惑。有一次，我鼓起勇氣問父親這問題，想不到他反應極大，對我說：「你大哥(同父異母的哥哥)是因為這問題與我關係破裂，難道你又想步他的後塵嗎！」我連聲說道對不起。以後就不敢再提這件事了！

父親去世後，我無意中發現他所寫的一篇文章，正是講出他們的關係。正如我所猜想的，他們絕不只是患難之交，更不只是主人與管家之關係。父親是深愛她的，也希望與她廝守一生，正正式式結婚為夫婦。但Y師奶雖然也非常愛父親，也深深感謝他在她們至艱辛的時候伸出支援之手，而且也曾作過誓言與他廝守一生，但最終她還是拒絕了父親，並於1962年搬離農場，一家人住在九龍，後來更隨大女兒移民加拿大，從此彼此也再沒有見面了！父親對這段感情有這樣的描述。(他轉達Y師奶的話)

「森是我一生中最難得的朋友，不獨能共同艱苦，共同危難，但這次我們相處18年的期間，而竟永遠離開，這是否上天的安排，抑或是我的環境迫成呢？他年老了，我也青春消逝了。他將會受到了老年人的孤寂生活，我慚愧，我對不住良心，大海茫茫，我真想投入波濤，掩蓋我的良心，遮住我面上的慚愧。」

為什麼Y師奶會有如此的抉擇呢？從他那文章來看，我得悉Y師奶的丈夫在解放後隨蔣介石來到台灣，並在台灣繼續他當律師之行業。不知什麼緣故，Y師奶的大女兒與父親是有聯絡的，他們又沒有正式離婚，正因這樣，她一直不敢答應父親的求婚。到了1964年，Y師奶收到大女兒從加拿大寄來的信，安排了他們在台灣見面，並且簽署為他遺產的承繼人，但條件是她要證明她是沒有重婚。Y師奶到了台灣，簽署了文件，然後返回香港，帶同她的子女，一同移民加拿大，與大女兒會合。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是為了他們的兒女，決定犧牲他們的愛情，各奔前程，一個帶着內疚和歉意離開，一個仍是孤清寂寞的留在香港。

父親在68歲那一年，有這樣的描述：

總計余六十餘年來，一起一伏，不下數次，生當亂世，而人生波折，往往如是。蘇東坡文章，其妙在有時像高山，而有時也像流水。身經波折，在苦難中求生活，在波濤中求掙扎，才有意義，余今年已六十有八，一生經歷，已達行程過半。

第十三章

Hail Alma Mater

Hail Alma Mater
Long Life to Queen's College.
Kindly instructor and guide of our youth.
Lighting the land with the bright beams of knowledge.
Teaching thy children to reverence truth.
Bound in close brotherhood all thy collegians.
Cherishing memories tender and strong.
Scattered asunder in various regions,
Q.C.'s and old Q.C.'s join in the song.
Q.C.! Q.C.! Q.C.! Q.C.! Q.C.!!
In that cry what a magic is found.
Let us roll out the glorious sound. Q.C.! Q.C.!!

Hail Alma Mater 是我母校皇仁書院的校歌，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崇德小學的讀書郎和大埔官立小學的校歌，我們很快便察覺到它們的分別。「讀書郎」是一首充滿愛國和儒家思想的兒歌，是宋揚寫在八年抗戰國難之時；而大埔官立小學的校歌，是以中國傳統觀念為本的校歌。但皇仁書院的校歌却截然不同，它的大英帝國殖民色彩極濃厚。一開始劈頭第一句便歌頌母校 (Alma Mater) 永垂千古。她是青年之善導，她的知識光芒四射，訓練子弟崇尚真理，他們既屬皇仁子弟，就親如兄弟，並散居四海，同頌這歌，一如魔術般發出榮耀之聲！這母校就是皇仁一大英帝國女皇之仁德！

皇仁書院校歌的旋律也是取材自英國著名公學 Harrow School 的校歌 Forty Years On，而歌詞則出自代理校長 Mr. William Kay 於 1920 的手筆。鮮為人知的，在原作中，還有第二段和第三段，只是我們大多不唱這兩段。這兩段特別強調皇仁書院的使命是融滙中西，創造奇蹟：

Thee who so skillfully blended,
Lore of the Orient with Western art.
We will not falter nor fearfully wonder,
Nurtured by thee we feel valiant and strong.
Sons of Cathay, raise your voices in thunder,
Q.C.'s and O'Q.C.'s join in the song.

皇仁書院前身是中央書院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於 1862 年創校。在此之前，第 2 任香港總督於 1847 年選定當時 3 所私塾作為官立學校，由政府提供教室和師資，學生無需交學費，只付銅 25 元作為茶資之用。到 1859 年香港的官立學校已經發展至 19 所。1860 年，政府把其中 4 所官校學校合併成「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校舍座落於中環歌賦街與城皇街交界，即今聖公會基恩小學位置。

首任校長是史釗域博士，當時除了當中央書院校長一職，還兼任視學官，其後他轉升為布政司。那時的中央書院，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研究中國古典書籍。

到了 1864 年，中央書院有學生 120 名，分為中文部和英文部；中文部學生必須學習四書五經。而英文部學生則除學習英語，地理，算術及歷史外，還要學習五經與史記。後來 1869 年，港督麥當奴則加設化學和幾何等科目。1885 年，中央書院新校舍成立，4 月 26 日由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港督寶雲主持奠基儀式。孫中山為當時的學生，也有出席這典禮。這新校舍到1889年才完工，這新校舍位於中環鴨巴甸街及荷里活道交界之處，並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此校舍較為寬敞，設備也完善，共有21個課室，實驗室，活動室，兩個球場及一個有蓋球場，可容納900名學生。1894年，再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並一直沿用至今。

在日治期間，皇仁書院於1941年底被逼停課。教舍則被徵召為陸軍醫院。直至1947年2月，皇仁終於重開，但上課地點則改在堅尼地道26號，同時並於銅鑼灣高士威道興建新校舍，1950年完工，新校舍由港督葛亮洪主持開幕儀式，並一直沿用至今。

在皇仁160多年的歷史中，孕育了不少精英。事實上，皇仁舊生，一如其校歌所云，遍及全球，不少在中國政、商、學界上叱吒一時，著名的有孫中山、周壽臣、何啟、何世禮、霍英東、何東、何鴻燊，唐紹儀、顏成坤、利銘澤、張達明、黃仁龍等；但同時皇仁亦培育了一些「漢奸」，其中以下兩位是比較有名的：第一個是溫宗堯(1867-1947)，此人善於順應潮流，是個典型的「世界仔」，他一生政治取向，變化極多，常常「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在晚清期間，他當洋務官員，赫有大名，到了民國初年，他開始活躍於外交界，但到了30年代末期，却參加日本在華的傀儡政權，結果抗戰結束後，因通敵面臨審判，最後鬱鬱而終。第二位是陳錦濤(1871-1939)，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任財政總長，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經濟學家，他皇仁書院畢業後，曾到美國哥倫比亞留學，並在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但在日治期間，改投日本偽政府，任財政部部長，在任內逝世。

我是於1959年9月進入皇仁讀書，1964年會考，並繼續在皇仁

唸 Form 6及 Upper 6，1966年考入香港大學。在這7年的皇仁生涯中，對我個人的成長有著重大的影響。我人生不少「第一次」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並且與皇仁有著極大的關係。記得我初入皇仁，到了換冬季校服的時候，我要結領帶，我從沒有結過領帶，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那年我已經是13歲了！我家沒有有電力供應，所以家裏沒有電話，在那個時代，當然沒有手機這回事！我記得在Form 3那年，我有要事致電一位朋友，但我又從沒有用過電話，於是我便請求一位同學陪我到皇仁舊生會會址(在皇仁校園內)借電話用。我撥了幾次電話，但對方完全沒有回應，連電話的鈴聲都聽不到，於是我對我同學說：「可能這個電話壞了！」他對我說：「讓我看看吧！」他撥電話給他家人，電話是通的，一點問題也沒有，怎麼我用電話却有問題呢？後來他發覺問題之所在：原來我用聽筒作為講筒，把講筒作為聽筒，所以便聽不到對方的回應！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鄉里！」那年我已經是15歲了，真是落後人半過世紀！

不過，在皇仁7年的生涯中，最大的影響是因為參加了基督徒團契而認識了耶穌。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不但影響了我的一生，也影響我整個家庭，包括我父親和弟弟。還記得基督徒團契每年都為皇仁附近的蓮花宮木屋區兒童開辦為期6個星期的識字及聖經班，在60年代的時候，蓮花宮後山是污煙瘴氣，黃賭雲集，罪惡温床的地方，這正是蘇絲黃世界之所在。自50年開始，數以百萬難民自中國南渡香江，自行於山頭搭建木屋，由山腳蔓延至山頂，居住環境極為惡劣。事實上，蓮花宮山的地質並不適宜興建這樣大批木屋，每逢遇上颶風或大火，則做成嚴重的傷亡。木屋區內充滿了黃賭毒的架步，威廉荷頓，關南施主演的「蘇絲黃世界」正是蓮花宮木屋區的寫照。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們有見及此，本著基督徒應當在社區內作光作鹽之宗旨，便每年都為木屋區內的兒童舉辦識字/聖經班，一方面是免費教他們識字，另一方面又帶領他們認識福音。每期所收的兒童都超過100人，除了上課，還有遊戲及午餐供應，深得區內居民所歡迎。整個計劃，都是由我們一班基督徒學生帶領，學校除了借出地方給我們使用，其餘則任由我們自己辦理，從不過問。我記得有一年，校長司徒莊(John Stokes)曾親自參觀我們識字/聖經的情況，讚口不絕。我在中五那一年，擔任這聖經班的校長，一方面聯絡一些慈善機構，請他們捐助物資，無論是紙筆，用具，飲料和食物都免費贈送給我們，其中一間美國基督教差會的總幹事Rick Giles更是我們的得力支持者，在物資方面源源不住的供給我們的需要。至於師資方面，由於皇仁是男校，我們極需要女教師的援助，便向庇利羅士女校及伊利沙白中學的基督徒團契招募。由策劃、組織、招生、編排課程、財政支付等等都是由我們一班中學生負責，這正給予我們一個極好的訓練機會。

雖然這6個星期非常辛苦，因為我家居新界大埔，每天一早，天還未亮，便要出發，先踏單車到大埔火車站，再坐火車到尖沙咀，過了海後又乘電車往銅鑼灣皇仁校址。每天在路程上已花了4個小時，其實我每天上學都是如此。然而，目睹這一班兒童有機會享受這段美好時光，心中安慰和喜悅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到了完結的時候，計算一下，竟然有超過一半的孩子願意接受耶穌，真是喜出望外。其後，我自己會作一些跟進的工作，放學後到蓮花宮後山探望一些學生，那兒的小孩，看到一個穿著皇仁書院校服的哥哥到訪，覺得非常雀躍；這些景像，直至現在也活現在我的腦海中。

蓮花宮的木屋居民，每逢一兩年便遇上一次火災。但每次火災後，

港英政府仍准許原址重建房屋，政府沒有協助或長期的規劃，所以不少人不但在那兒居住，還建鋪頭，售賣各式的生活用品，更甚者有飼養豬隻，以致有一次在大火中，燒掉了900多間木屋，燒死的豬隻達50頭。政府終於倡議把蓮花宮及天后廟一帶，改闢為高尚住宅區！在這過程中蓮花宮木屋區轉變甚大，我亦與那兒的兒童失去聯絡，不知道他們是否在火災中喪了命，或是被徙置至秀茂坪。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遷徙，開闢，至今蓮花宮山終成為一處高尚，靜謐之住宅區，有誰會想到這原是昔日的蘇絲黃世界呢？

在皇仁的那段日子中，我也參加了足球隊，為學校乙組隊參加香港校際比賽。我一向好動，尤喜愛玩英式足球。我們皇仁足球隊不是強隊，但也不是排行榜尾的弱隊，每次球員都肯力拚，每每創造奇蹟，其中以對新法書院一場尤為經典。新法書院足球隊是勁旅，隊中有張子岱、張子慧，他們兄弟二人都成為日後香港足球名將。但我們拚勁十足，僅以1球見負，可謂雖敗猶榮。

不過我最開心的，莫過於被揀上負責在港府大球場拾球，我還記得在一次南華與巴士的大戰中，我們皇仁書院足球隊被派往球場拾波，我們8個人，站在球場的4邊，每逢足球出界，我們就負責去拾回皮球，交給比賽的球員。如此我們便可以在近距離看到球賽表演。我是南華隊的「粉絲」，尤其欣賞南華的「三條煙」，即小黑姚卓然，肥油何祥友和莫牛莫振華，後來加盟南華的「牛屎」黃志強更是我的偶像，他們的三角短傳，雙翼齊飛，都令我看得如痴如醉，有時看得出神，忘記了立即去拾回界外球，被過萬的觀眾「噓」，才猛然醒起自己的責任。「拾球」不但有免費球賽欣賞，而且更有12元的獎金和1支維他奶，真是最大的享受，只可惜1年只有1至2次機會吧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除了參加皇仁校隊外，我還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新界同學組成一隊足球隊，取名「力克」，到處出賽，走遍上水，粉嶺，大埔和各球場。由於我常常要出外比賽，父親是有點擔心的，唯恐我的功課追不上。還好，皇仁書院的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自立，不施加任何壓力，所以功課和測驗都極少。事實上，我在皇仁中1唸到中7，從沒有遇過測驗，1年考試2次。在百週年紀念那年，校長對我們說：「這一年較為特別，有許多慶典和活動，老師們太辛苦了，所以今年不用考試，學期尾時全體學生可以自動升班。」其中一位老師更坦然對我們說：「如果我勤力，你們就太過依賴，不肯自己研究，這對你們是無益的，所以為了成全你們作過既自立又勤力的學生，我就犧牲我自己，不會為你們預備太多筆記了！」這樣的歪理，竟然得到我們全班同學鼓掌！但奇怪的，皇仁却製造不少極出色的學生，每年考入香港大學的，可說是居全港之冠！

正因為皇仁有如此的文化，我可以輕易對父親說：「我做完功課了！」事實上，大多時都沒有功課的。還幸我也知道自律，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猶感興趣，常常在這方面下苦功，父親對我的影響也極深，知道我對中國文學有興趣，他就在晚上與我一同唸《古文評註》，其中一些文章對我影響很深，如韓愈《祭鱷魚文》《送孟東野序》《雜說上下》《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周敦頤的《愛蓮說》，蘇軾的《方山子傳》《前赤壁賦》《後赤壁賦》，文天祥的《正氣歌》，劉基的《賣柑者言》。雖經數十年，印象猶深！日後我入香港大學攻讀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可說是父親對我的影響所致。

自1966年離開皇仁後，至今已經50多年了，這幾年來，我不住

思想一個問題：究竟皇仁給予我一個怎麼樣的教育呢？究竟她塑造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當然，我明白我的家庭背景，我的際遇，我的信仰都是一些重要塑造我的元素，但無何否認，這7年的中學教育也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 首先，皇仁書院是港英政府實行「精英教育」下的產品。
據 Grace Hing-yeet Kwong 在她那篇碩士論文中說，在60年代的香港，每年小學會考生約有7萬至8萬人，而中學學位又只得2萬5千至3萬個學位，那時香港有所謂英文中學與中文中學；在1961年英文中學共有99間，學生約4萬多人，而中文中學則有93間，學生約2萬7千人，但到了1970年，英文中學已經增加至231間，學生約15萬6千人；而中文中學則有121，學生4萬8千人，英文中學的增長遠超中文中學，何解？
很明顯，港府是有意加強以英文為主的教育。

此外，港府又把中學分為四類：

- i. 政府中學
- ii. 補助中學(政府補助一些辦學團體辦學，大多是那些歷史悠久的教會名校，如拔萃中學，聖約瑟等。)
- iii. 津貼中學(一樣受到政府資助，但由辦學團體辦理教務，但這都是新興的學校，而非傳統的名校)
- iv. 私立學校—沒有接受任何政府資助的，如新法書院，港府似乎對政府學校及補助之各校特別看待，無論在資源上，老師的薪津及福利上都遠勝其他類別的學校，很自然，它們往往成為學生及家長們的心儀學校！至於入學資格，純是以會考成績計算。因此，那些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政府學校及傳統補助名校便招收了成績最優異的學生，而皇仁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學生的質素當然是較高一籌，難怪他們的入港大成績卓越！

(參看 A Period of Trial: Hong Kong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1960-1970 by Grace H.Y. Kwong A M.A. these 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oyola University)

- 其次，皇仁是一間英文中學，而其學制，書本等基本上是跟隨英國的教育制度。這裏引伸一個問題，幾乎90%的皇仁學生是從中文小學升上來的；在小學時，老師是以廣東話授課，只有英文科例外，在平日我們也是用廣東話交談的，但一旦升上皇仁，我們便要自動「轉台」，在課堂是用英語，下課則改用廣東話了！據香港大學Rev. Erik Kvan教授所研究，這樣的制度只會大大削弱學生的學習能力，他以為這樣的制度只會製造「死背書」的學生，而不能訓練學生們思想的能力；因為在課堂裏，他們受限於英文的表達能力，於是便減少參與討論。(參看 Rev. Erik Kvan Problems of Bilingual Milieu in Hong Kong, reported in Hong Kong :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ed. by I.C. Jarvi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334) 既是如此，為什麼一般學生與家長都喜歡入讀英文中學呢？原因很簡單，香港在60年時代只有英文才是官方語言，在社會上，無論是公文，政府檔案及信件往來，法律文件等等都以英文為主的，在社會上要找一份好的工作，英文的書寫能力是必要條件，是基於這個原因，一般學生與家長自然是響往英文中學，更何況要考入香港大學，英文一科一定要合格，對那些在中文中學畢業的同學，能考入香港大學的，只是鳳毛麟角！

Kvan教授的研究是正確嗎？我以為未必盡然。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雖然在Form 1那年是有點困難，從一間中文小學轉到一間英文中學的確是一個挑戰，但進入Form 2後，我發覺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何以見得？在皇仁同學中，有不少是印度裔同學，他們是唸英文小學，不少在家中也是以英文溝通的，但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現象：因為這些印度裔同學的英文表達能力強一些以致他們在讀書的成績上較華人優秀，或許在港府的「精英教育制度下」英文中學的制度也不大成問題！我相信一個資質中上的孩童，同時學習兩種不同的語言，並不是一件壞事，在美國加州所推行的所謂Immersion Program便是一個明證。

- 在皇仁七年的學習中，有一個問題從沒有人討論過或質問過的；就是有關中國歷史問題。第一，為什麼中國歷史在會考的課程中不是獨立的一科，而只是「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的一部份。在60年代的中學會考課程中，有一科是中國語文(Chinese Language)，主要是作文，第二科是中國文學與中國歷史(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History)，中國文學是佔大部份，而中國歷史是佔小部份。所以，很明顯，港英政府是不大願意加強學生對中國歷史的認識。
- 第二，中國歷史的課程是到清末時便完結了，我們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什麼軍閥時期、北伐歷史、國共之爭、八年抗戰、國共內戰、解放後的中國一句也不提及。何解？很明顯，這都是敏感的政治問題，最佳的方法是置諸不理，不讀就不知，不知就不理，不理就太平！我不知這是否港英政府當時的想法，如果這是他們的策畧，我可以肯定的說：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這種愚民政策」只會帶來不良的效果，對歷史不理解，不知情，只會帶給我們盲目的跟隨。

- 皇仁給人一個感覺，有著濃厚的階級制度，普通學生不得從大門進出，只有領袖生(Prefects)及F.6, 7學生才可以。未經老師同意，學生不得在教員休息前的走廊走動。我記得有一次，我不知因何原故誤闖禁區，結果被一個愛爾蘭籍的老師罰企，每個老師出入教員休息室也望我一眼，這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至今隔了50年也沒有忘記，這樣看來好像是有點不近人情的規矩。然而，學校又有很多頗有人情味的寬容政策；比方來說，凡住在新界的學生，雖然遲到也不用留堂；因為校長體諒我們要一早起床回校，偶一遲了，趕不及乘搭早班火車，就會遲到，所以訂下這樣寬容的政策。有同學因家境問題，不能按時交學費，校長就特別開恩，豁免他們學費。不少老師也與我們建立友情，就是畢業後仍有往來，絕不是高高在上。廖慶齊老師是我在中7那年教我們中國歷史的，雖然他的教學並非一流，但他為人謙虛，和易近人，又開設天文學會，邀請同學到他上水家鄉觀星。後來我們在三藩市灣區重聚，一同吃飯，他還送了一張他最近拍攝到一的流星照片，非常珍貴，更難得的他後來成為一個敬虔的基督徒，可惜他早我們一步去到更美的家鄉。蘇輝祖老師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師，我之所以選讀中國歷史，也多少受他的影響，無可否認，我們眾同學却公認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師，我曾到溫哥華探問過他，他是我們一位良師益友。又有一位老師，在我入讀香港大學

那一年，因急一筆金錢，他竟然仗義伸出援手，替我解困，我令我非常感動。

最近我有機會看 Netflix 的一套影片，名叫 Crown，看到伊利沙白女皇在皇宮的趣事，就使我想起不少在皇仁的經歷，這種規規矩矩，冷冰冰的制度揉合著一些溫情和寬容的表現，似乎這正是女皇與女皇書院 (Queen's College) 的特色了！

- 最後，我有一個不解的問題：為什麼同是出身皇仁，有些是愛國的革命份子，如孫中山，有些却是媚日的漢奸如溫宗堯呢？所謂 Bound in close brotherhood all thy collegians 似乎只是一個夢想吧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某某君也是皇仁舊生，就見怪莫怪了，因為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奧秘！

父親有8個子女，第1個妻子給他生4個，我的母親也給他生了4個。家姐穎儀和我在香港與父親生活。弟弟穎智和妹妹穎微則在大陸長大。穎智在12歲那年才來港與我們重聚，他的童年十分淒涼。據他所說：當媽媽死後，同父異母的家姐川姐與工人亞大暫時照顧他。他們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囑他，切不可向人透露他的身世。然而，當他開始在番禺九區中心小學讀書的時候，該校的主任在入學前對他說：「原來你就是蘇少毅的兒子！」當時他的心跳得很快，不知道如何回應。主任就瞪著眼對他說：「你父親是偽政府官員，屬「黑五類」！」從那天開始，他就懼怕返學。起初，有幾位同學與他一同玩，但當他們知道穎智的身份後便開始疏遠他。在班中，他就好像是眾人的仇敵一樣，任人踐踏。他決定不返學了，到處遊蕩，打發時間。過了幾天，學校的主任找川姐，告訴她蘇穎智已經有好幾天沒有返學了。川姐就用雞毛掃痛痛地打了他一頓，他也完全不懂得如何回應。從那時候開始，川姐虐待他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最嚴重的一次，是他與川姐的女兒「亞華」在流溪河的一個沙灘玩水，回到家中，被川姐發現，結果遭她痛打；並且更剝了他的衣褲繼續追打。當他逃出街外時，竟然有2隻狗追着他不放，並咬他，幸有一些鄰居看見，拿着棍子驅狗，他才逃過災難。這些經歷一直困擾他多年。直至他日後在香港認識主後，才較體諒川姐的難處。

心想：若沒有她照顧，境況可能更差。她曾向穎智表達過：親戚中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們兄妹，她是迫於無奈才擔此任務。1986年他有機會回鄉探望她，給她一些錢，以表謝意。

其實，父親只是區區的1個區長，並不是什麼大官，何竟會受如此的對待？但據我們的四叔公所說：當時在江高鎮清算的政府官員中，父親的職位最高，所以便成為鬥爭的重要對象，視他為人民的公敵。更甚者，媽媽死後，有關部門在我們所住的地方發現有槍械及軍刀等武器，就認定父親是嚴重威脅人民政府安全的偽政府官員。其實，這都是無中生有的荒謬指控，全無事實根據。

穎智在江村還沒有讀完一年級，川姐便送他到黃榜嶺姑母那兒照顧。姑媽非常疼愛他，視他如自己的兒子一樣，他感到非常溫暖。除了穎智外，姑母還收養1個女兒，比穎智大5-6歲，亞平其實是川姐的小兒子，所以人稱姑母「楊北平母親」。黃榜嶺村是蚌湖鄉的1個小村落。村子雖小，但卻有間學校名為「黃榜嶺小學」，在這小學渡過了5年的時間。開始的4年，算是風平浪靜，但從第5年開始，他的身世又再被揭出來，再加上當時政府推行人民公社制度，生活非常艱苦，穎智的前途十分暗淡。促使他開始萌生偷渡的念頭，並開始勤力地在村口的1個塘練習長距離潛水，同時也在塘裏捉魚，補充糧食的短缺。

1955至1958年是政府推行「大鳴大放」及「大躍進」的時期。人民被迫去田間、山上採鐵礦、採煤、然後擔回市鎮在土壩煉鐵。家中的所有鐵造的東西，都要交給政府製造鋼鐵。這引起公憤，但是村的幹部並沒有聽他們的聲音，還是堅持他們的做法，他們說「我們是聽命來做的」，「你敢不聽嗎？」這樣一來，家中所有鐵造的容器及工具：包括鋤頭、鏟、錘、煲、鍋。全都拿到政府哪裏去，把它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溶化。其實製造出來的完全是無用的。那些錘若是被用來碎石，石未碎，生鉄製成的錘已經碎了。但人民的生活最需要的東西卻是沒有了！因為在1958年，一般的老百姓的家裡什麼都沒有了，鄉村就出現了人民公社「大鑊飯」。村民每天自己拿着自己個碗去排隊拿飯菜吃，1日2頓，農曆年的時候才有較豐富的飯菜。開始1年還不算太差，但1年以後每況愈下。每人只能拿自己的砵（較深及大的碟，用漆寫上自己的名字），公社便有人在每1隻砵放下少少米，拿自己的砵去加水，再放入蒸爐去蒸飯。蒸出來的東西粥不像粥，飯不像飯，再加上沒有肉，很少菜，沒有油，所以在1959年越來越多人餓死。穎智也曾經試過水腫、虛脫、情況十分不樂觀。盡管餓死的人很多，但每天還是聽到非常多「超英趕美」及「大豐收」的假新聞，什麼3千斤的牛，1千斤的豬，10多斤一棵菜，10斤一條番薯等等的假消息到處傳播。但傳得越多，人們就越反感。但幹部的生活卻沒受影響，他們常常沒收村民所養的豬、雞、甚至鵝，宰來自己吃。據歷史家的考證，在這大飢荒中，全中國至少有4千萬人餓死。

在這段艱難的日子中，在香港的父親也略知國內的情況。他請了一個名字叫「梁姑」的水客，1年大概都會探問他們一兩回。每次來的時候，總帶一些米、油等給他們。但遠水不能救近火，杯水車薪，怎能解決嚴重飢荒的問題呢？那個時候，穎智深知惟一的出路就是：偷渡。但同時他也知道，那是非常危險的一樁事。

從1959年開始，穎智就在黃榜嶺開始練習潛水，務求一口氣可以潛40碼。其次，因為黃榜嶺村口的湖裏有魚，順道學習用當時鄉下種的蔴造網來捕魚。週末的時候，他差不多大部份的時間都與志同道合的往外跑，每個月3次，都是到高塘、江村及沿着流溪河的分支小溪

進行練習；平均1個月也有一次需要過夜。所到之處，都會捕魚、捕蝦、蛄等。有一次他用長柄網捉了一條1斤多的鯉魚，竟然可以換1條單車內胎，喜出望外。至於其餘的魚、蝦、蟹，賣了以後，就按着一些前輩的指引，買到1個水壺，1把摺刀等去裝備作未來的逃亡之用。

第一次逃亡的是失敗的。他們深夜在一個離開下水的地方約有2小時路程的地方稍作休息；但穎智整晚都睡得不好，心很懼怕。到了一早，天還未亮，所有人都帶著非常簡單的東西起行，每人1條內胎，1壺水，當時一起的有6個人，2個大人，其餘都是少年人。他們行得很快。路上漆黑一片，根本看不到路是怎樣的。穎智有好幾次跌倒了，覺得很痛。走了約半小時，他們到達了1條小溪，就沿着小溪往海的方向繼續行。豈知行了約1個多小時，在左手邊突然之間有2個人拿着手電筒照著他們，並大聲喊著：「停！」「停下來！」當時穎智的腳軟了，完全乏力，自然的反應是跳進了小溪，動也不動抓着溪邊的草。當時水並不太深，站在溪中，水深約到胸口。很快，其中1個人就把他拉上去，見到他個子很小，就問「你想做什麼？」「我是跟着一些阿叔他們來的。」後來他被關在一個附近的小房間，差不多到天亮的時候見到其他同伴也被關了進來。當時他們的身體濕了，但是口袋裏仍然有手網，所以他們堅稱自己是為生活，一起捕魚、捉蝦、摸蛄。他們又被問及鄉下在哪裏。他們沒有隱瞞，照直說了。囚了4天，警告了一番，就安排1輛貨車送他們回黃榜嶺去。

回到黃榜嶺，穎智編造了1個故事給姑媽聽，企圖掩飾逃亡之事。但姑媽見到他身上有多處傷痕，就已經知道他在說謊。但仁慈的姑媽不再說什麼，只忙於替他包紮傷口，又勸他不要偷渡。1961年的8月，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生活越來越艱苦，偷渡的人也越來越多。他們幾個人約定再次偷渡。因為9月便要升到華僑中學寄宿，不能繼續在黃榜嶺生活，他就與幾位朋友決定在8月底前盡快進行。這回，他們是做足準備了，除了用布袋收起單車內胎外，還帶著長柄網、手網、一隻約直徑一呎多的木盆（用來裝載魚載魚獲），目的是途中要是被人捉到，他們就說是在捕魚、蝦，摸蜆等。經過大半天的時間到了廣州，再過2日才到達邊境。在那裡稍作休息便起行。過了約1小時，他們到海邊了。當時天色十分暗，一到海便拼命扶著木盤向前游，但求盡快去岸遠一些的地方。偷渡的滋味十分不容易受，帶著車胎在身上，前進十分困難。那些浪衝進嘴裏去，很鹹，很難受。喝了些海水，很不舒服，也很口渴，但是為了離開大陸，便竭盡力去撐水。但不久他體力開始不支，竟然嘔吐起來，更甚者，右腳開始有些抽搐。他儘量用左腳，不用右腳。木盆當時是靠山，若是沒有木盤，他可能已經淹沒了。又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他開始感到全身戰抖，這是十分不妙的情況。他心中開始體會不可能再繼續前進了！於是便轉向左邊靠岸游去。在海裏不知過了多久，天開始亮了，突然看到前幾百碼便是陸地！他好像找到了生路，用盡餘力向陸地游去，雖是筋疲力盡，終於抵達。那地方是什麼地方？完全不知道，但相信還是在大陸。上岸後，越過一些短叢林，右腿被刺傷了。正走進大路時，就被公安發現捉住了，被關在1個小房幾日，關起來的還有很多偷渡客。日子難受極了，整天沒東西吃，到第2天還開始嘔吐及肚瀉，令到全房的人怨聲載道，整天用粗言罵他，虐待他。很不容易捱過了2天的時間，就被調到另1個房間。吃了一些粥水，就有人來盤問。穎智再次告訴他們，他們本來在公明鎮原水貝下村附近的1條小溪捉魚，他更在小溪旁邊留下1個長柄的魚網，2個公安便車載他到公明鎮看過究竟，果然找到了那

長柄的魚網。公安看見那長柄的魚網在草叢中，就相信他所說的話。當日下午，他們就用1輛貨車接他返回黃榜嶺去。回到黃榜嶺，什麼也沒有告訴姑母，吃了些東西，就整整睡了2天。第2次偷渡又告失敗，但生命仍得保存，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1961年9月左右，穎智放學回家，姑母告訴他，「梁姑」從香港來探他們，又帶了些米、油、餅乾來。「梁姑」走的時候，姑母及穎智一齊去到廣州，替他拍了一些照片，交給了「梁姑」，跟着他們就回黃榜嶺去。到了1962年2月左右，姑母連續幾天對他說：父親想接他去香港。那兒除父親外，還有家姐穎儀，哥哥穎睿及年紀較大的同父異母哥哥穎聰。姑媽又告訴他，屆時盡量保持緘默，以免被人發現他的鄉音；更不要走散，要緊緊跟着「梁姑」。農曆年前的一個早上，姑媽一大早便叫醒了他，給他穿上很厚的衣服，便一同往廣州去會合「梁姑」。到了廣州，已經是下午的時間，他們就住在愛群酒店。在附近吃過晚飯，就回酒店休息。當天晚上，他失眠了。姑母是大恩人，從沒有罵過他，更沒有打過他。穎智覺得對她有很多虧欠，但卻不懂表達出來。只是眼裏充滿淚水。第2天一早，「梁姑」已經來到，她拿了1件新的「飛機恤」給穎智穿上，又介紹1個小女孩給他，說是他的妹妹。他們吃過一點早餐，便一起出發往廣州火車站東站。車站並不很遠，但塞滿了人，他們很不容易才擠進車站裏面，回頭看姑母，她仍在望着他們，其實他心裏很想大聲多謝她，但總說不出口，轉眼她就不見了。這是穎智最後一次見姑母。

穎智是在1962年來港與我們團聚。這團聚當然帶給我們一家不少歡樂，但另一方面卻帶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挑戰。他曾目睹母親懸樑自盡，繼而受盡穎川家姐的虐待，加上在中國所受的歧視和欺壓，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造成他一種非常倔強的性格。他很聰明，也非常獨立，但卻不受教。他初來香港的時候，我是負責教他英文，他屢屢不聽我的管教，令我感到非常氣憤。記得有一次，我吩咐他去溫習，他不但沒有聽從，反而跑去與Y師奶的兒子玩水戰。我正想阻止他繼續玩，他竟然把水潑在我身上，令我衫褲全濕。我真的忍不住了，便打了他一記耳光。他沒有哭，但立即離家出走，正走到南坑村口，遇上了父親，便把我「虐待」他的故事，全盤托出。父親氣喘喘的回到家裏，不問情由，便罵我打他，我本來正想解釋，但看見他眼有淚水，像是對我說：「兒啊！你弟弟這麼困難才能與我們相聚，怎麼你會如此待他呢？」我便閉口不言，從此我們兩兄弟再沒有打架了！

然而，穎智與父親的關係卻是愈來愈惡劣！一方面是穎智的長大背景，從沒有人好好管教過他，另一方面，父親為了肯定他的權威和地位，往往對他是過份苛刻。不過，他最大的問題，還是他的偏愛。他對我特別寵愛，凡事都與我商量，而我又體會他的心情，處處遷就他。他沒有安全感，我後來出來工作時，就把我的收入全部存入一個我與他聯名的戶口，並由他去負責家中開支。我認識了君玉，就一早告訴他，並與他商量，以致愛屋及烏，他對君玉也特別寵愛。我從不會與他頂嘴，再加上我讀書成績優異。當考入香港大學時，他到處告訴親戚朋友說：「全新界只有我的兒子穎睿和他的朋友考入香港大學」。當然，這並不是事實，只是他要在親友面前炫耀他的兒子吧了！他這樣的偏愛，對我反而感到有點不舒服。

然而，他對穎智卻是非常苛求。穎智初來香港就在大哥穎聰所教的小學元朗商會小學唸書；年年名列前茅，並且在升中試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皇仁書院。但父親卻沒有在親友面前炫耀，反而常常提醒

他說：「不要驕傲，驕兵必敗！」他的偏心，可見一斑。

事實上，他們2人常常發生極大的爭執，為了一些我以為是瑣事，便會大吵起來。所以，當我們後來遷到九龍居住，穎智常常借故返大埔森廬，每逢周末便離開九龍的家，說要返教會不見了踪影。為了這事，父親與弟弟不知吵過多少次。每逢吵架時，父親的哮喘病便發作了，所以我屢屢勸弟弟「奉茶認錯」，來順一順他那度氣！不過父親有時的反應確是不可理喻的。我記得有一次，弟弟負責買燻煮飯，他很喜歡吃魚，尤其是那些多骨的小魚。他吃魚很有恩賜，從不會鯁骨的，但我則剛好相反，笨喉笨舌，就要是大魚，也常會鯁骨。有晚是海鮮餐，全是魚蝦蟹，我一看就已經皺眉頭了，果然不久就中招，鯁了魚骨，屢吞不下，只有立即去見醫生，勞煩他略施手術，把那條魚骨鉗了出來。那晚父親大發雷霆，大罵弟弟，我不小心鯁了魚骨，但穎智卻要挨罵，這就是父親偏愛的一個好例子了。

然而，神卻改變了穎智的生命，正如他所說：「感謝主！經過5、6年的追尋、辯論、探索，心中一個一個的信仰疑問，神在最合宜的時候，安排最合宜的人給我解答，而且安排了一些愛我的人關心我，待我如同他們的兒子及弟兄一樣，使我全然釋放出來。逐漸地，越來越多爸爸曾關心我的地方，一幕一幕出現在我的腦海中。」他後來信了主，並且成為一個神重用的牧者，這完全是神的恩典。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30年不斷有大陸的難民偷渡來港，其中由深圳河邊的大外逃尤為嚴重。逃亡的包括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幹部、軍人及那些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飢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着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及遠至黑龍江。實際人數超過百萬。

1949年以前，草深葉密的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是通往香港的唯一通道。河的內邊都有不少村莊，而他們的田地是互相交叉的。換句話說，中方的村莊有田地在港英方，港英方的村莊也有地在中方，兩地農民常要過河對岸去工作。

但到了1949年，情況突然變化。到了10月，由陳賡率領的數十萬解放軍由廣州向南挺進，直通深圳。香港當局頓時緊張起來，於是兩個精銳英軍師團從南洋群島的叢林移師海港邊境，以防萬一。但到了11月，毛澤東，周恩來下令葉劍英向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傳達命令，部隊停在深圳，不再往南。從此，深圳南岸仍歸港英政府統治，但深圳河北則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管治。

在1949年之前，邊境檢查非常寬鬆，幾乎不需要證件便可過關。但1949年，蔣介石敗走台灣，出於

對共產黨持着不信任的成千上萬大陸百姓，便像潮水般湧往羅湖橋，每月過境人數不下10萬；包括了我父親一家。那時，港英政府訂了一個很奇怪的「過橋標準」：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人則不可以。而中共方面，因成立之初，財政拮据，糧食、生活物資供應緊張，又怕那些國民黨殘餘份子上山藏匿頑抗，為了維穩之故，也樂意採用較寬的策略，任由他們來港，估計從1947年至1950年，大概有200萬人逃到香港。

但到了1950年3月，在深圳發生了所謂「隔岸村慘案」。有從香港來的國民黨特務，槍殺了深圳官員，再加上深圳一帶治安欠佳，殺機密佈，於是在1951年3月15日，中國政府決定要對深港邊界實行封鎖，整頓邊防。就因為這樣，我母親及弟弟妹妹就被困在國內，不能來香港與我們重聚，而母親更因為受不住疲勞的公開審訊，被打壓，最後懸樑自盡。

中共在深港邊界設有3道防線：第一道是邊防線，第2道是禁區線，第3道是警戒線。3道防線的戒備步步升級，越來越嚴密。邊防區東起大鵬灣，西至茅洲河，南從深圳河起，北至山廈，橫長91公里，縱深19公里，任何人一定要持有通行證方可進入。然而，這些防線卻未能阻擋成千上萬的逃亡者，冒着生命危險，偷渡來港。

據寶安縣委的統計，由1951年2月至1954年止，偷渡去香港的有1,382人，1955年則有594人，1956年703人。但到了1957年，內地實行公社化，外逃的增至6,000人，由1956—1958年，3年內偷渡的有20,105人；出走的大多是青壯年，以致邊防村落成了「女兒國」「老幼院」。不過，偷渡至高峯時期是1962年，近6萬人成功偷渡來港。原因是1959年到1961年是大飢荒。香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馮客(Frank Dikotter)估計在這次大飢荒中，有4,300萬至4,600萬人餓死。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接下來又是另一次偷渡高潮，在偷渡者中，包括了兩位著名人仕—中央音樂院院長馬思聰和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醫生。文革結束後，又是另一次偷渡高潮，由1976年至1980年短短4年間，約有30—40萬人從大陸偷渡來港。

當鄧小平南巡時，他的回應是：「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不是部隊所能管得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事實也是如此：我們就以1978年來計算，深圳農民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是13,000元，差距實在太大了，所以當時有話流傳「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就是因為這樣，鄧小平就堅決推行四化，務使中國富強起來。而深圳也成為他計劃中的特別經濟區。然而，經濟並非唯一的原因促使內地居民偷渡來港，不少是因為他們嚮往香港的自由和機會，就正如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部書記文富祥對來深圳巡查的習仲勳說：「香港那邊比我們好。第一，我們這裏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農民一輩子都是當農民，不僅如此，子子孫孫都只能做農民。香港那邊不一樣，能從事很多職業，東家不做做西家，還能當工人。第二，那邊東西多，甚麼都有得買。我們這邊買甚麼東西都要證，而且有證還不一定能買得到。第三，那邊賺錢多，買東西便宜。我們這裏分配低，又買不到東西。所以老百姓都說那邊好。」言下之意，政策和治國之道出了問題，這才是人民出逃的主因！

記得於1983年，我有機會第一次回鄉旅行，那時我們是隨旅行團前往，應該是相當安全的。但火車將到達廣州時，不知怎的一陣陣驚恐的感受冒在心頭，全身出汗，與我同行的太太有見及此，以為我

有什麼不適，其實我是忽然想起30多年前逃離中國的情景。雖然我已經忘記當時的情況，但那驚恐的感受卻歷歷如在目前，尤其在進廣州之際，這感受又重現在心頭。

那次逃亡，詳細的經過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記得那天天還沒有亮，母親便非常緊張地叫醒我們，稍稍收拾行裝，忽忽離開家園，過了那渡木橋，乘坐公共巴士前往廣州火車站，坐火車到香港。那時應說是1949年下半年，正是廣州淪陷之際。一路上，母親神色凝重，非常緊張。她拖着我們4兄弟姊妹，切切吩咐我們不要走散。火車站人山人海，堆滿了走難的人。上了火車，就躲在車廂的一角，原來我們就是千千萬萬從大江奔至大海之一。我還記得途經石龍車站時，火車停留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母親便趁此機會買了一些叉燒飯給我們吃。現在我翻查資料，才知道石龍火車站建於1911年，那時有港穗直通火車，而石龍站是其中一個固定靠的車站之一，而且停車時間也是各站之中最長的，原因是為蒸氣機車加水，這港穗直通車於1949年10月14日便中斷服務，直至1979年4月4日才恢復，但現時的直通車已不再在石龍站停車了。換言之，我們是在中斷服務前夕乘坐直通車逃港的。

我們到了羅湖橋，港方海關人員先檢查車票，看行李，看看我們的皮膚顏色，長相，然後用廣東話問我們：「去邊度？」原來他們是要查看我們是否廣東人，原來港英當局在那時訂了一個奇怪的「過橋標準」-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人則不可以，所以我們就輕易地過了關，踏入香港境。火車到了粉嶺火車站，父親一早便在火車站迎接我們，我們亦有機會重聚！但這重聚卻是片刻的重聚，過了不夠一年，母親帶同弟弟穎智，妹妹穎微回大陸。誰料這次一去不回：直至後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穎智偷渡來港，我們才有機會相聚，至於妹妹一直至1983年我們在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況下找到了她。兄弟姊妹再有機會重逢，但父親與母親早已不在人間了！這是後回的事！

弟弟穎智是1962年成功偷渡來港的。1962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自從農曆新年剛過，成群結隊的內地居民開始非法越過陸路邊境進入香港：他們主要來自廣東境內的廣州、惠陽、東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也有從外省聞風而來的。十多萬偷渡者。破圍走陸路的翻山越嶺，越過梧桐山。水路則有泅泳或坐船，坐船有兩條線：東線出大鵬灣，西線過后海灣，目標都是香港。每天從各地湧進邊境的有4、5千人，最多一天超過8千人。在逃亡者中，不但是農民、甚至知識份子、工人、黨員都在逃亡之行列中。由於香港的大街小巷「偷渡客」陡然增加，對治安構成諸多問題。港英政府要嚴陣以待，出動大量警力，24小時巡邏，加強盤查無證人員，並將大量偷渡者遣返。

為什麼1962年是偷渡潮之高峯呢？據時任寶安縣委第一書記李富林說，那幾年全國普遍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政策存在一些錯誤，糧食減產，生活困難，很多人民吃不飽，只有逃亡，而廣東省比其他省較為開明，不把逃亡者當作「盲流」叛國，加以處分，而是放寬出口，甚至發放證明書予以通行。

我弟弟穎智也是在這一年成功偷渡來港，與我們滙合。然而他偷渡的方法，既不是翻山越嶺，越過梧桐山，也不是泅泳或坐船來港。他是直接從廣州坐火車來港的。由於在1962年，大陸放寬邊境，不少港人想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方法，幫助他們在內地的親人來港。原來在那個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從事一項非常特別的生意，就是替在香港

的居民運送一些糧食、衣物或金錢接濟在內地的親戚。我父親在大埔找到一位從事這項生意的大嬸，替我們運送一些物資到在內地的姑母及弟弟。這一年，她告訴父親說，由於大陸出境比較放寬，她有辦法偽做一張香港身份證，叫弟弟冒認為這大嬸的兒子，然後公然的帶他到香港來。當然父親要付出一筆可觀的費用，因為這也是一樁相當冒險的工作。就這樣，弟弟順利過關，來到香港與我們團聚。

面對着成千上萬的難民，源源不絕的湧入香港，究竟港府採取什麼態度呢？為了阻擋「洪流」，一方面港府出動邊境的警察，軍隊共達5千人，並出動百條警犬，18架直升機。甚至在邊境手牽手結成人牆，阻擋冒死衝來的群眾，又使用警棍、警犬吠…。只欠沒有對人開槍。至於那些偷渡成功的，港英政府採取「攔截遣返」政策。但出於人道因素，港府會讓他們好好吃一頓飽飯，然後才遣回。當局在新界一帶臨時建立幾個收容所，草草搭起帳篷，供給一頓豐富的晚餐，有魚、有肉、也有麵包、香腸，採取自助餐形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但民間的反應顯然較政府當局更為仁慈和體諒。查閱一下當時報章的報導，看到當時不少感人的故事。就如《明報》在5月15日有這樣的記載：「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明報》，狹窄的報館彷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救援中心。」《華僑日報》的報導是：「拘留所中哭聲震天，51人不免遣返，難民跪地求情。」

我們的家在大埔墟的郊區，附近也出現過不少逃亡者的踪影，甚至摸進森園門口，要求接濟。通常父親給他們一些糧食及少許金錢，便叫他們離去。但有一天父親竟然收留了一個叫「阿旺」的逃亡者，在我們家中。「阿旺」是一個40多歲的女人，看來受教育不多，有點土頭土腦，我不知為什麼父親要收留「阿旺」，是基於同情心？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是找個廉價勞工？我真弄不清楚。當時我們家中有不少成員都感到不高興，因為「收留」「窩藏」逃亡者是犯法的。報章曾記載一件案，一個香港警官的太太葛施梅，看到一對逃亡的母女捱飢抵餓，無依無靠，而那個女孩子只有4、5歲，楚楚可憐，這仁慈的太太就動了慈心，招待他們到自己的家，並希望丈夫回家後與他商量如何安排。誰料丈夫回家，發現妻子窩藏逃亡者；2人就起了爭論，丈夫堅持要守法，太太堅持要有人道，「法」與「良心」發生激烈的碰撞。最後，他們想到一個解決方法，由丈夫出面向法庭控告妻子違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陸偷渡人仕。然後，妻子向法庭認罪，請求從寬處理。接着，他們又幫助這母女向法庭申請，基於人道原則，免于遣返，並給予居留權。最後，李扶蓮法官認為被告葛施梅乃出於同情，並無收受任何費用，值得原諒。雖然罪名成立，只輕判罰款50元，另簽保行為3年。或許是父親從報章上看到這案件，「阿旺」在我們家中逗留了約1個月就離開了！

據《炎黃春秋》雜誌主編楊繼繩所寫：「如果僅僅是廣東一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採取與廣東省委一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國際輿論一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5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任的工作來抓。

廣東省於是執行指示，從5月22日開始，從各地調派了1萬多名幹部，民兵和解放軍戰士，把從香港送返回來的群眾和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遣返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

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塞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從5月22日至7月8日，一共遣過51,395名外流人員回鄉。通過沿途層層攔截，這股逃港風潮暫時停息下來。但到了1976年，這逃亡潮又再重演，事實上，正如1984年鄧小平在第一次南巡深圳，珠海2個特區時說：「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事實上，隨着內地改革開放，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偷渡情況基本上已得控制。



第十六章

“末代豬農”

蘇東坡名句「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是父親的格言。但對他來說，食肉和居竹都是同等的重要，缺一不可，所以他應該是比蘇東坡更懂得享受人生。在森園農場，我們不但有一排排密茂的竹林，給予我們視覺享受，並在炎熱的夏天帶來涼快的感覺。父親更利用這些竹作許多用途；他最喜歡用竹幹雕刻一副一副的對聯，掛在牆上。父親的隸書與精美的雕刻，相映成趣，增加我們家的書香氣味。我們所用的蓆，椅都是竹製成品。竹更可以作担挑和魚竿之用，這都是森園之獨特竹的文化。至於肉方面，父親最喜歡豬肉，尤其是東坡肉、扣肉、菜乾豬肉湯都是我們過時過節時必備佳餚。所以，父親離開了烏溪沙兒童院，在大埔開設豬場，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香港的養豬業，60年代是黃金時期，但踏入70年代後，隨着工業開始迅速發展，再加上養豬條例越來越苛克，養豬業開始衰微。到了80年代，一個一個豬場倒閉，養豬業從此一蹶不振。所以，我們可以說，父親是末代豬農。但在我腦海中，養豬這個行業留下不少深刻的印象。事實上，父親在養豬技術上，突破了昔日中國鄉村養豬之古老方法，發明了不少創新技術，他曾把他的經驗寫成一本《養豬新編》，可惜時不與我，當他寫成這書的時候，也正是香港養豬業開始走下坡之際。所以這本書稿一直沒有出版，也鮮為人知；如今我只能把所看到的

一鱗半爪寫下來。

父親的農場養有百多頭豬，大概可分為肉豬與母豬2大類。肉豬品種繁多，有純種和雜交兩類，我們所飼養的以雜種居多。尤其是第一代雜種豬優點至多。所謂第一代雜種豬是指純洋種豬公配合純本地豬母。通常牠們生長快，抵抗力強，飼養容易，而且所產下的豬苗數目較多，總是超過每胎10頭以上，而且肉味較鮮甜。至於母豬則以本地純種為主。在60年代，豬農開始採用人工受孕，而香港政府的農林署亦積極推行。人工受孕之優點甚多：

- 可避免豬公的毒性之傳染
- 可以選擇優良的品種
- 在交配時，不會受到巨型豬公傷害
- 沒有因豬公精子稀薄而致所產豬苗過少之弊

然而，人工受孕亦有其弊端，主要是豬農應具有判斷母豬的春情期之能力，因為豬的交配不是隨時可以進行。要待母豬青春期間(新界豬農稱為起水)才可以交配。所以準確地判斷豬母是否已經進入青春是豬農必須擁有的知識。否則就會錯過機會。在60年代的新界村莊，我們常見農林署的職員，騎着電單車，到處為豬農提供人工受孕的服務，既安全，又方便，這是科技帶來的好處。

在森園農場，最興奮的事情莫過於替母豬接生。我自小父親已經傳遞那接生技術給我，所以我常常誇口自己是豬的產科醫生。我的記錄是一胎接下27隻小豬！我相信這也是森園的紀錄。通常一胎是12隻，或多或少，但那一次這隻母豬竟然一胎誕下27隻小豬，而且1隻也沒有夭折，真是難得。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母豬的懷孕期通常是114天，有時或早或遲1、2天。母豬通常是在夜間生產的。我們往往要通宵工作。自開始生產至胎衣排出需時5、6個小時。母豬將要分娩時，常起臥不安，在開始生產3、4隻小豬時，常起身站立，後來多生幾隻後，即感疲倦，不再起身，通常每隔10餘分鐘便誕下1隻小豬，若母豬過肥或年紀過老，則相隔時間會長一些。若母豬遇有難產時，我們會立即給牠注射催產針，或進行施手術。不過，我們會儘量避免施手術，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因衛生環境欠佳，很容易受感染而致命。在我記憶中，在多年來只有1隻母豬是因難產而致身亡。

當母豬誕下小豬時，我們會立即把牠抱起，用布拭乾身上的粘液，尤其是鼻孔部份，以免窒息死去。假如發現小豬呼吸困難，便要立即施行人工呼吸。所謂人工呼吸，是輕輕用手按在豬的胸部，然後一鬆一緊地按摩，或許可以把牠救活。

當接過小豬後，用線在距離臍部2、3吋地方紮緊，然後用消毒過的剪刀將臍帶剪斷，並在剪口處塗以碘酒，然後將小豬放在有禾乾草的籬中。待全部小豬都出生後；就替牠們剪去牙齒，以免因吃奶令母豬感到痛楚。

在小豬吃奶之前，我們通常是先將母豬身體抹乾淨，用火酒抹過乳頭，然後把小豬放在母豬身旁，幫助牠們第一次吃奶。同時我們又要留意母豬排出胎衣。一旦見胎衣排出，便要立即拿掉，否則很多母豬都把它吃掉，這對母豬的健康並無益處！

小豬出生後3天，父親會為牠們注射三王針，每隻1毫升，以防感冒。同時亦開始餵以貧血膏，每星期1次，直到能吃飼料為止。這大概

是7個星期之後的事了！至於餵豬的飼料，包括麥糠、粟米粉、米碎、大豆餅、魚粉及米糠等。這些豬隻每個月增重差不多30磅；4至5個月便可「出欄」，通常父親是賣給那些豬商，他們專收購豬農的豬，然後送到屠場去宰割。

豬農最感頭痛的，就是豬的疾病。香港位於亞熱帶地區，冷暖不常，天氣又潮濕，最容易生病。香港豬隻的傳染病，計有豬瘟、腸熱、口蹄病等。預防勝於治療，所以我們特別注重豬舍的衛生，又經常消毒，勤於沖洗，儘量保持豬舍乾爽，食水清潔等。其實，人獸同住一地，對我們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影響。我在中四那一年，突然患上嚴重的感冒，要入醫院住了2個星期。出院後要差不多半年時間才完全康復。我想很有可能我的病毒是從豬隻的細菌感染而來，或許我現在身體內也有不少抗體，這與我小時居住的環境有關。

通常肉豬長到150磅左右，我們便把牠們賣給豬販，運往屠場宰殺，我們稱之為「出欄」，這也是一家高興的時候，因為終於見到昔日的投資有回報，也是父親出糧的日子。在「出欄」之日，我們一早起來，餵飽「出欄」豬隻，這不但是給牠們享受最後一餐，而且又可以增磅。因為豬的價錢是按「斤計」，豬重1斤，價也高一些，所以我們都儘量餵飽牠們。運豬的貨車去後，我們一家便到大埔墟茶樓飲茶。父親一定叫了幾隻糯米雞來慰勞我們一早之辛勞。現在想起來，好像是昨天所發生的事，歷歷如在目前。

父親除了忙於管理豬場，他還有時間參加南坑村的養豬合作社，他是任該合作社的書記。在1950—1960年間，香港政府鼓勵民間成立合作社。這些合作社是民間組織，但由政府的漁農署監督，其中以養豬合作社及漁業合作社最普遍。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貸款給有緊急

需要人仕。合作社會員每年繳交會費，合作社便把這些會費存在銀行，作為合作社之基金。若社員有急，需要金錢支付，他們便可以向合作社申請貸款。然後每月連低息歸還。在60年代的香港，這是非常普遍的，也解決不少豬農遇上銀根短缺時的難題，一切借貸事宜都是由政府的漁農署監管的。

在1970年代及1980初，全港4千個豬場，年產80萬隻，但現時全港只有43個豬場，年產量不到10萬。為什麼一踏入70年代中期，香港的養豬業開始衰落呢？一直以來，馬來西亞、台灣和泰國都有出口生豬到本港，但因運費高昂，所以本港養豬業是有其市場，但到了80年代，內地豬開始供港。由於價格低廉，造成龐大競爭，而香港政府對豬農的支援也開始削減。70年代，漁農署還會對豬農提供配種，注射疫苗，診治豬隻等服務，但到了80年代，政府已取消了這些服務。再加上本港河溪水質污染嚴重，政府推出多項改善水質的環保措施，豬場必須領有禽畜飼養牌照，領取牌照其中一項條件是設有排污設施，使污水達至標準，大量家庭式或小豬場無力添置這些設備，他們寧願接受政府特惠補償金，放棄養豬行業。如此，香港的養豬業便式微，而我父親亦成為香港的末代豬農！



第十七章
明德格物與
香港大學

「明德格物」是我母校香港大學的校訓，而拉丁文是 *Sapientia et Virtus*，先談談「明德格物」。「明德」「格物」二語乃出自四書中的《大學》，《大學》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闡明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說，《大學》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理學家朱熹以「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為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所謂「條目」者，乃實踐三綱領的八個步驟，今日我們所稱三綱八目就是這個意思。

或許我們會問：「明德格物」與香港大學的教育理念有何關係呢？「明德」是指人生俱來光明皎潔的德性，「明明德」就是發揚這德性，推己及人，使天下都能彰明其德，同歸於至善。拉丁文的 *Virtus* 是來自希臘文 *arete*，是指一個人的美德 (*virtue*)，這與「明德」一詞不謀而合。至於「格物」，是指窮究事物之原理，而「格物」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讀書，即《大學》所謂「致知」了。當一個人能飽讀詩書，明白事物之原理，就能明明德於天下，如此天下便太平了！所以「格物」是知識的領域。拉丁文 *Sapientia* 是指人的智慧與知識，此拉丁文源自希臘文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sophia，這個字正是影響整個歐美思想的元素，這與「格物」乃不謀而合。

我不知道最早期港大先賢何以用這兩個訓言作為港大的校訓，但我們現在推想，中國人以「明德」為先，「格物」為後，這是表明中國人的教育核心仍是以德育為主。簡言之，我們讀書是學做好人。而西方教育，則以Sapientia為先，Virtus為後，這表明西方教育始終還是以「知識」「科學」為主，德育次之，而港大卻是中西合璧，既注重知識，科學，但同時亦重視中國傳統的德育和治國之道！難怪香港大學不獨栽培不少科學家、醫生及學術頂尖兒人物，更培育了不少優秀的政務官，為港英殖民地政府效勞。

早在1880年，港督軒尼詩已經提出在香港建立一所英國式大學。不過當時的教育委員會以為香港尚未具備設立大學條件，此計劃也遭擱置。直至1905年，中國清政府改革教育制度，取消科舉考試，並引入西式學制與課程內容。不少中國讀書人紛紛轉習西學，不但國內有不少基督教及天主教團體辦學，也有不少中國人到海外留學。此時，無論是英商或是英政府，都以為在香港建立一間大學，可以維護及擴展英國人在亞洲的利益。1908年時任港督盧吉便公開提出創辦香港大學。

此計劃一經提出，各方人仕紛紛協助募捐經費，當時有居港的印度籍商人麼地率先捐出15萬元建築費，及3萬元營運經費，隨後太古，滙豐，怡和等商業機構都出資贊助，甚至中國內地亦籌得20多萬元，於1910年開始施工，1912年正式啟用，由港督盧吉主持開學典禮。初建的港大，歸併了本已開辦的西醫書院和香港工學院，另加辦文學院，共有三所學院，第一屆學生有72人，大部份學生都是華商和士紳的

子弟，全部學生都是男寄宿生，住在聖約翰堂宿舍及本部大樓的頂樓，直至盧吉堂宿舍建成後才取代之。1916年12月，香港大學舉行第一屆畢業禮，有23位畢業生，及5位榮譽畢業生，全部都是男生，一直至1923年，港大才出現首位女性畢業生。

香港大學發展至今，已是一間頗有規模的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2016年港大排名世界第35位。而2021 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排在22位。本科生有學生17,106人，研究生則有9,813人。開創時，港大只有醫學院，工程學院及文學院，現時已有10所學院。即建築學院，文學院，經濟學院，牙醫學院，教育學院，工程學院，法律學院，醫學院，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

我是在1966年考入香港大學，主修中國歷史(6 papers)，副修中國哲學(3 Papers)；1969年畢業，到了2013年，我在退休那年再回母校攻讀中國近代史，2016年獲得哲學博士。有不少人以為香港大學是一所英式大學，尤注重醫學及科學之發展；怎麼會入港大攻讀中文呢？其實，這是一錯誤的認知，香港大學的中文系(後升格為中文學院)歷史悠久，建樹良多。

早在1913年，即香港大學文學院成立後一年，中文系已經成立，由賴際熙太史任中文系主任。起初規模尚小，但到了1927年不少海外華僑捐款建立一個頗有規模的中文圖書館，名為「振永書藏」，是記念星加坡華僑陳永捐贈中文系二萬元巨款。到了1931年，本港富商鄧志昂捐錢興建了「鄧志昂中文學院」，而1931年馮秉芬父親馮平山捐錢興建了「馮平山圖書館」，圖書館於1932年12月14日由港督貝璐爵士主持開幕。「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以中文書為主，旁及東亞其他語文，日文及韓文。至2017年，館藏超過110萬冊，期刊則有13,000種，中文報紙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包括中國，台灣，日本及東南亞各地之代表性報紙170種，此外，還有各類縮微膠卷5,400多種，縮微膠片超過1,000種及視聽資料超過20,000件，電子資源的數目亦日益增多，重要的中文數據庫包括：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文淵閣四庫全書，中國期刊網，全國報刊索引，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工具書雜錦在線，中國資訊行、慧科電子新聞庫、讀秀學術搜索、中文集獻及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新方志等等。

此外，馮平山圖書館有另一個特色，內中藏有不少善本書，超過700種，14,000冊，包括宋、元、明刊本、稿本、鈔本等珍籍。此外又有族譜400餘種，其中廣東，香港，新界各族姓者佔大半，為研究廣東及本港史地提供極寶貴資料。凡此種種，都讓香港大學師生在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地理，哲學上有極大的幫助。

我記得在1968年，我們有幾個同學，蒙余秉權老師之邀請，協助他編寫《中國史學論文引得》一書，那時沒有電腦，這類引得及索引是研究不可少的工具，我們有機會涉獵這門學問，真是難得的機會。

香港大學中文系不但有得天獨厚的圖書館，更有不可多得的師資，這就是所謂「北學南移」現象。八年抗戰後，香港大學復校，但不少教師在戰爭期間已離去，再加上英國當局傾向聘請一外國人担任中文系主任，這引起不少中國學者不滿，就如郭沫若所說：「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上，中國史料，中國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是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更貼切的接近。」然而，郭沫若這話是否對呢？中國人有話：「千里馬常有，而百樂不常有。」換言之，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發展則有賴其領導者是否一個有灼見的領導，多於他的國籍。林仰山教授正是一個有灼見的領導者。林仰山

教授 (Professor F. S. Drake) 本於濟南齊魯大學任教中國美術與考古。1952年受聘為香港大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他就趁著北學南移的風潮，聘用了不少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學者，這包括擅長國學的劉百閔先生，長於詩詞及甲骨文研究的饒宗頤先生，又增聘唐君毅先生講授中國哲學，楊維禎老師教授翻譯，羅香林先生講授中國歷史，余秉權講授中國歷史，1960年唐君毅辭去兼職，林教授改聘牟宗三為專任講師，講授中國哲學。後增聘美國人金薩靜博士 (Dr. G. E. Sargent) 為副教授 (Reader)，負責策劃研究的工作，再加聘羅錦堂博士教授中國文學。於是中文系在林仰山的領導下，為學生們提供「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翻譯」及「中國美術考古與地理發現」五大領域。他又於1952年正式成立東方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專門從事有關中國與東方的研究，又設立語言學校 (Language School)，為英國派駐香港和遠東的人員提供國、粵語的訓練，還成立馮平山博物館，邀請出生於武漢的英國人陶美擔任館長。並創辦學術刊物「東方文化」(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他自己擔任主編。在林仰山任內十多年中，就奠定了中文系在香港大學的地位，不少傑出的港大畢業生，如趙令揚教授、單周堯教授、陳學霖教授、黃繼持教授、黃霑、李直方等都是香港大學中文系培育出來的。

話雖如此，當我初入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考究過港大中文系的歷史，也沒有因為它有如此的背景而入讀。事實上，當我在皇仁念中6的時候，獲剛成立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接受我申請入讀中文系；後來我決定留在皇仁讀中7純是經濟原因：在崇基就讀要家庭負擔我昂貴的學費4年之久，而繼續在皇仁攻讀中7，不但不用交學費，更有每月70元的助學金，更何況若考入港大，3年就可以畢業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無論港大的排名，或是有多少出色的畢業生，對我來說，毫無關係。不過，三年的港大生活，卻改變了我的人生和思想，這是我初入港大時從沒有想過的。

先談談港大宿舍「玩新生」的鬧劇。我一年級時沒有入住宿舍，但到了二年級時，由於我在青年會夜中學教書賺點生活費，趕不及乘搭尾班火車回新界，所以便在大學盧吉堂宿舍寄宿。雖然我不再是港大的新生，但對宿生來說，他們一視同仁，也視我為新生，遭「欺凌」是在所難免。Ragging(玩新生)是西方大學傳統，美國大學稱為Fraternities或Sororities，英國則稱之為Ragging。Rag這個英文字可解作「取笑」「玩弄」(to make fun of)，但漸漸可解作欺凌(to bully)，香港大學自30年代已盛行這種Ragging的鬧劇。倡導這些鬧劇的以為這是融合眾宿生的最佳和最快捷的方法，既可挫那些新生的銳氣，也可以把整個宿舍的宿生聯繫在一起，不致散沙一盤，好像酒店一般。通常Ragging是維持兩個星期，在這個所謂Greenhorn Period，新生要得到每1個舊生簽名才能成為宿舍會員，享有所有宿舍的權利，正因如此，有不少舊生便趁此機會去欺凌那些新生。如

- 每見到一個senior時，要向他請安，請安時不得用「我」這個字，而要用「Small Greenhorn」代之，以示次他一等的。
- 在宿舍吃飯時要“square food”的吃法，意思時，所有食物入口前都先要夾著食物劃一個四方形才能進口。
- 有些較惡作劇的Seniors，甚至要求那些Greenhorns作一些不大合理的事，如送雪糕到他女朋友家，但又沒有說明她正確的地址，要那Greenhorns自己去尋找。
- 到了Greenhorn Period結束，新舊生同聚一堂慶祝，

晚飯前 Greenhorns 要作最後兩個禮儀。第一是到校園的荷花池浸禮，每個都跳入荷花池中，全身濕透才可上來更衣，第二是在晚飯前飲「升仙杯」，杯內有茄汁，辣醬，可樂等混合，喝完了便正式成為 Senior，所以叫做「升先」杯。

我對這些鬧劇是非常反感的，雖然大多數舊生都不參與，一早便簽上他們的名字，但有些卻是非常不友善，屢屢以 Senior 身份自居，欺凌新生。我們中間有一位新生，他個性非常倔強，完全採取不合作態度，最後引起極大的衝突！這位同學住了兩個星期便搬回家！事實上，我不以為這類的鬧劇可以融和所有宿生，相反的，這只會分裂宿生，令人反感。這傳統一直維持到 2017 年，因有新生被辱及受傷，大學方面便採取嚴厲措施，取締一些有關 Ragging 的活動；從此，Ragging 便絕跡於 HKU 的宿舍內。

另一件影響我深遠的事是發生在二年級上學期。有一天，羅香林教授召見我，通知我有關申請蜆殼公司獎學金事宜，原來他推薦了我們 5 位同學申請這個獎學金，每年有 5,000 元港幣，足夠我們的學費和宿費之用。然而，獎學金只有 3 個，5 人中有 2 人落選。我計算一下，我的機會應該是大的。到了面試的那天，除了羅教授外，還有其他 4 個人，我都是不認識的，他們問了我許多問題，其中一條是：你曾否寫過一些學術論文登載在一些期刊中，我的答案是：「有」。他們就沒有繼續追問下去了！

回到宿舍，我心感不安，因為我的確是寫過一些文章在香港大學學生報「學苑」登載，但這絕非一些學術文章，而《學苑》也不是什麼學術期刊，我實在是虛報資料。當時我很後悔作出此舉；獎學金固然重要，但人格豈不是比金錢名譽更重要嗎？於是我便立即去找羅教授，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向他認錯，並請他告知其他委員。羅教授非常仁慈，並說難得我可以坦然告之，他會曉得如何處理。結果，我落選了！但我心卻有莫大的平安。因著失去了獎學金的機會，我便在青年會夜校任教英文，我教週一，三，五，另一位港大同學教二，四兩晚。我們兩人因此而相熟，再加上我們二人都是基督徒，有心向那些學生（他們都是成年人）傳福音，於是我們便與那些同學開辦了一個福音性研經班，我們兩人輪流帶領，不少同學都因而信了主，直至現在還有與我們聯絡，我這位「拍檔」名叫劉君玉，她在港大唸歷史和心理學；君玉也即是我日後的太太！原來神不讓我得著那獎學金，是為我預備一樣較獎學金更貴重的——我的配偶！還有，我們其後整理這些查經資料，寫成了我們第一本著作《福音性研經》，香港學生團契在1972年為我們出版了此書，一直至今已出版了超過20多版了，真是奇妙！

我在港大讀書之時，正是香港學生運動之始，所以1960年代被形容為「火紅年代」之序幕，這個學生運動對當時在校的學生有某一程度的影響，首先讓我們看看為什麼在60年代香港的大學會孕育這樣的一個學生運動。自1960年代開始，隨著政府助學金和貸款的增加，來自基層的學生也能入讀香港大學。這一輩的青年人，大多是在香港長大，沒有像他們父母經歷過在大陸的各種政治運動，也未必有像他們對共產黨那種恐懼感。他們的父母視香港為他們的避難所，雖然社會上有很多不公平的現象，他們總覺得比在大陸生活安全和幸福得多。但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基層青年，不少以「認識祖國」和「關心社會」為己任，因此他們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適值1966-1976是中國文化大革命，1968年所發生的「布拉格之春」事件，1969年的港大校政改革，香港的中文為官方語言之運動，以至歐美等地的學生運動，凡此種種都促使年青的知識份子對政治的醒覺，這就是1960

火紅年代的背景。

按香港大學呂大樂教授所言，明原堂宿舍是香港大學學生運動之搖籃，其宿生有不少為當時的學運領袖，明原堂(Old Halls)是合併了Lugard Hall, Eliot Hall及May Hall，因著1966年因暴風及山泥傾瀉而破壞一部份，後來修建而合併3院舍，並改名為Old Halls(明原堂)。我當時是Lugard Hall的宿生。60年及70年代在明原堂宿生包括曾鈺成、程翔、劉迺強、何俊仁及馮可強等學運領袖，當時的學生分為兩大派，一派稱為國粹派，他們思想左傾，認為在當時推行的中國社會主義，有不少施政都值得參考。他們主張推行愛國和社會主義意識。另一派稱為社會派，他們主張反資反殖，認為學運應該針對香港急切社會問題，以推行社會改革為己任。

在60年代，學生運動仍屬早期，影響有限，尤其對那些非寄宿生，大部份同學也不大關懷，但1966年抗議天星小輪加價；《學苑》提倡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言，及刊登不少有關社會問題及大學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問題之討論，都引起同學們廣泛的注意。到了70年代，也是學生運動最興盛的火紅年代，無論在保衛釣魚台運動，金禧事件，反貪污捉葛柏等事件上，港大學生也成了當時學運一股不可輕視的推動力，但1976年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國粹派失去了精神支柱亦趨沒落；學運亦偏向「社會派的理念」，但到了80年代，學生運動改走向民主之路！

基於我的家庭背景，我當時對著那染有紅色色彩的學生運動不大感興趣，但當時發生另一個學生運動卻帶給我，甚至整個華人世界有著極大的影響——這就是鮮為人知的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在下章我會詳細討論這學生運動之始末和對我的影響。

總括來說，港大3年生活啟發我的思想，叫我開始想到人生的意義，香港人的身份等問題，雖然港大的殖民氣氛極重，但卻給予學生極大的自由與空間去探索，討論和辯論，而《學苑》便成為學生們的平台，這是英式教育的特色。然而，目睹這幾年港大的改變，禮崩樂壞，令人心感傷痛！



1969年畢業於香港大學。

第十八章 基督徒 學生運動

2013年，我年屆退休年齡，便決定重返香港大學深造，專門研究中國內地會來華的傳教策略和歷史。其中一章特別是研究一個非常重要，但又是鮮為人知的課題：「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及50年代的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這運動影響非常深遠。王怡牧師的研究，他以為中國家庭教會的興起及發展與這個時期的學生運動有著極大的關係。（參看《屬靈復興與世俗化-對中國家庭教會評價》一文）。事實上，這學生運動亦帶來香港學生工作之興起及香港教會的轉型；我便是其中一個見證人和受惠者。

翻閱中國近代史，學生運動對整個中國近代史有著極深遠的影響，無論是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九一八學潮、一二九運動、1981年內蒙古學運，八六學潮及八九學運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學生率先走上街頭，抗議暴政因而引起舉國震動，直接影響當時政局。我們覺得奇怪的一件事：學生（特別是大學生）人數只佔全國人口0.01%，何竟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澳洲籍的中國歷史學家C. F. Fitzgerald在他那本*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 p.20便有以下精闢的見解，他以為中國歷史的轉朝換代，是有著兩個關鍵性的元素：一是農民起義；漢朝之黃巾之亂，唐朝的黃巢之亂，太平天國，李自成之亂都是其中的例子，因著這些「農民起義」，朝廷便倒下來了。但這革命是否成功，則有賴另一個重要元素---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的參與；太平天國及李自成之所以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失敗，是因為得不著士大夫階層的參與，終於失敗！

到了清末，清廷取消科舉制度，西式的教育制度取而代之。不少社會的精英都是來自大學校園，據 Jeffrey N. Wasserstrom 在他那本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20 所述，由於這些大學生多是中上層社會人仕之子弟，又常以自己是將來社會的棟樑，當他們目睹暴政，就會挺身而出，甚至率先上街抗議，他們在校園裏有組織，又有資源和理想，他們便成為一股極大的政治勢力。

蔣介石是了解當時的情況，也深知毛澤東是積極滲透校園，搏取知識份子的支持。所以在中日戰爭期內，不少著名的大學開始西移至雲南、四川等大後方；其中以雲南的昆明、四川的重慶，和貴州的貴陽為主，數以萬計的學生，離鄉別井，在兵荒馬亂中西遷至大後方，其中的苦況，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孫元良將軍回憶抗戰時逃難情景，有如此的描述：

「我們在抗戰初時，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然而對忠義的同胞沒有作妥善的安置，對流離失所的難民沒有稍加援手，任其亂跑亂竄，自生自滅……我從漢中長途行車回援貴州時，發覺滿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流亡學生與教師。……道上塞了各式各樣的車輛-從手推車到汽車應有盡有。道路兩旁的農田都擠滿了人，踐踏得寸草不留，成為一片泥濘，車輛不是拋了錨，就是被壞車堵住動彈不得。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一空，當地人民也驚慌地加入逃難行列。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夾雜著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兒童啼飢號寒的悲聲，沿途到處是倒斃的腫脹屍體，極目遠望不見一幢完整的

房屋，頓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得墮入悲痛驚愕的心境，剛勁之氣隨之消沉，對軍心士氣的打擊是不可低估的。」

至於那些有幸平安抵達大後方，生活也不是容易，一方面是離鄉別井，不知還留在戰區的父母之安危，感懷「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另一方面，生活困苦，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全靠政府公費生存，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更慘的還要常捱日軍的狂炸，其中著名的是1941年6月5日，日機夜襲重慶市，校場口大隧道發生窒息慘案，死傷約3萬餘人，事後發現不少死者在窒息前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臉上刻滿掙扎痛苦，生還者甚少，看後令人感憤怒悲傷。事實上，1941年8月開始，日機幾乎每天日夜不停的轟炸，每日1百多架分炸四川各地，慘不忍睹，不少學生就是這樣地捱過這段艱難的日子。

當時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艾得理(David Adeney)，賴恩融(Leslie Lyall)及孔保羅(Paul Contento)夫婦開始改變了他們的策略。在此之前，內地會事工集中在草根階層，但此時他們開始展開學生工作，在各大學的校園開設查經班，吸引無數的青年學生和教授參與。孔保羅夫婦在西南聯合大學每天都有數個福音性研經班，共有120名學生參加。在1943年，他們舉辦夏令會，有200人參加，賴恩融在安順的醫學院開設中英文研經班，星期日舉行崇拜，數以百計的參加，不但如此，這些信了主的信徒生命有極大的改變，就如Mary Contento在內地會的刊物China's Millions記述幾個動人的故事：一個青年人，本來在一個富裕的家庭長大，現在離鄉別井，生活艱苦，感到非常孤單寂寞，後來他更病倒了，入了醫院治療，Mary Contento有機會領了他歸主，給予他人生的希望和意義。另一位也是個非常睿智的青年人，父親是醫學院教授，自小以為基督教信仰不科學，毫無興趣，但自從父母先後在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戰爭中死亡，只剩下他一人在大後方，舉目無親，他因參加了校園的查經班，信了主，在洗禮的那天，超過100多個同學來參加他的水禮，深受他的見證感動。類似這裏的故事，數以千萬計。於是他們覺得有需要把這些查經班聯絡起來，在趙君影牧師的領導下，成立了學聯會 (China Inter-Varsity Fellowship)。趙君影為總幹事，而內地會的艾得理牧師為副總幹事。

八年抗戰結束後，各大學紛紛回歸原處，而學聯會總部亦遷往南京，並繼續在各大城市的大學發展學生工作，自1944年成立至1950年短短的六年間，學聯會已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學生團契。全國有40多間大學都有基督徒團契；人數無法估計。此外，賴恩融亦開始在北京與王明道合作在北京各著名大學開設查經班及團契。北平基督徒學生會成立於1947年，他們非常聰明，沒有加入「學聯會」，因為他們覺得當時的政治環境，不適宜過份依賴一個組織，而且他們大多是由學生們自己領導；包括張錫煥、王長新、邊雲波等人，所涉及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協和醫學院，這都是全國精英所在之地，也是最戰略性的地方！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敗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於10月1日成立，學聯會亦開始遭受極大的壓力，趙君影離開中國，企圖把學聯會總部遷往香港，遙控國內學聯會事工。當然這只會帶給學聯會同工更大的壓力，起初艾得理牧師主持大局，但到了1950年中，內地會大部份的宣教士都被迫離開中國，隨著韓戰爆發，形勢更趨惡化，最後在1951年6月學聯會同工徐超塵被捕，而學聯會被解散，但北京的學生團契因不是學聯會的成員，得以繼續，直至1955年王明道被捕後才解散。

當王明道被指控時，全國只有北京學生團契站出來公開為王明道辯護，他們這樣作當然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第一個被捕的學生會成員是郝洪光，其後石昇華等領袖亦被捕。然而，不少成員四散全國，並且在各地設立家庭教會，其中邊雲波在西南傳揚福音，建立教會，他在1948年10月，創作600多行的長詩《獻給無名的傳道者》。這首長詩在10年後，由學聯會副總幹事艾得理牧師在香港出版，對60年代海外華人教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除了在本國外，這學生運動對海外也有極大的影響，學生團契成員查逸錕後來移居台灣，在台灣開設了校園團契，對台灣的教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而學聯會領袖滕近輝牧師及副總幹事艾得理來到香港，揭起了香港的基督徒學生運動，這可以說是繼中國國內基督徒學生運動的第二波！

艾得理牧師於1950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推廣美國校園團契的學生工作，5年後重返亞洲，負責發展東南亞的學生工作。他駐於香港，以便他們可以近距離觀察中國的動態和發展。但艾牧師抵港後，他發覺香港是一個極挑戰的地方，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為了逃避共產黨而移民來到香港，這是福音工作難得的機會，所以他雖名為東南亞學生事工的副總幹事，但他大部份時間與精力都花在香港事工上。他在1957年與一班從海外學成回港及港大的畢業生成立了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raduate Christian Fellowship GCF)，這個團契在香港的學生運動上起了關鍵作用。在GCF的鼎力協助下，艾牧師先後成立「中學生基督徒團契」(Inter-School Christian Fellowship ISCF)及大專學生基督徒團契(Inter-College Christian Fellowship ICCF)，所有這些團契都是FES(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一員。

先談談中學生基督徒團契及對我的影響。ISCF照顧的團契不下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十間，皇仁書院的團契早在1954年便成立了，在當時來說，這個團契可以說得上是其中最茁壯的一個中學生團契，我們每早晨都有祈禱，每週五有團契聚會，每逢聖誕節我們會在大禮堂舉行佈道會，參加者往往超過500人，每個暑期我們都招收附近蓮花宮木屋區的兒童參加我們舉辦的兒童聖經班，全由我們團契的弟兄負責籌備，並且邀請庇理羅士女校的團契姊妹參與教導行列。ISCF是我們的顧問，他們在皇仁附近設有一個閱覽室，供給我們借閱基督教書籍及刊物，又提供同學們輔導和聚會。

ISCF有兩位從美國來的宣教士，給予我有極大的幫助，Ada Lum是從夏威夷來的土生華僑，她教導我們歸納法研經，令我大開眼界，培育我對研經有極濃厚的興趣，日後我從她那時所學到的與太太君玉合寫成《福音性研經》一書，由學生福音團契出版，自1973年出版以來，至今已超過20多版，銷量亦數以萬計；這是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當我看到學生福音團契同工何盛華為我們所寫的序，我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恩。

「這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書。我毛遂自薦替它寫序，實在有違我一向的低調作風，不過，我與這書的淵源太深了，心中有話不吐不快，非為它寫序不可。我信主廿多年來，一直喜歡私下讀聖經，也喜愛小組查經。或許是這個緣故吧，我竟不知天高地厚，信主三數年之後，居然就帶領起福音性查經了……但經過多年的磨練，我越來越懂得善用這本書了。我明白書本是死的，我才是神所使用活的器皿。所以每次帶領查經之前，我都會默想經文，深思反省，讓神透過那段經文向我說話，我又勉勵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那段經文的真理，親身體會其豐盛和意義，以致在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那段經文，好能帶出神話語的

時代信息。不單如此，我更要磨練自己對人敏銳，嘗試按受眾的年齡，背景，人生經驗和小組中的反應，來活用這些素材，靈巧地帶領討論。因此，時日雖久，但對我來說，帶領福音性查經仍然是一件滿有趣味和充滿挑戰的新鮮事情。每次我都非戰戰兢兢地倚靠聖靈不可，是祂把更新而活潑的信息賜給我，又加添我口才智慧，幫助我對別人有敏銳的心；不過比一切都更重要的，是銘記惟獨祂才能改變人心，賜給人生命。

就是這樣，靠著神的恩典在歷屆的福音性查經班，先先後後我目睹超過60多人信主。我曾經向神請求，每年讓我帶領一個人認識祂，但神的賞賜却遠遠超過我的所求。最令我感動的，是離開查經班之後，聖靈繼續在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工作，他們絕大部份日後都長得很好，有理想的教會生活和事奉，有當團契職員的，有當主日學教師的，有當教會執事的，有奉獻自己進修神學的，更有使用這書工具當帶領別人信主的，他們靠賴聖靈的培育和弟兄姊妹的幫助，各自發展自己曲折動人的信仰故事，結出永恆的生命果子！」

盛華這番話不但鼓勵了我們，更提醒我們這完全是神的恩典和聖靈的工作，我們只能為到神仍可以使用卑微的我們而感恩！也多謝Ada的教導，叫我們也可以成為他人的祝福。

第二位是來自美國費城的Mildred Young，她教導我們一班弟兄希臘文，促使我進入神學院攻讀，改變了我一生。再者，Ms Young是一位非常有耐心和溫柔的老師，她教導我們研習聖經，使我們獲益良多！

如果皇仁書院的團契及ISCF給予我不少的聖經知識，香港大學的基督徒團契則改變了我的一生。中學時期，無論在思想上，環境上都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比較單純，大部份同學的理想就是考進香港大學。但在大學裏，環境比較複雜，尤其住在宿舍裏，更看到人生百態。有些終日想著玩樂，每逢宿舍舉行舞會，總是吸引了不少人參加，有些則在政治圈中活躍，尤其在67年暴動期，更是積極參加抗港英運動，與我同宿舍的曾鈺成便是其中一個活躍份子，有些則埋首讀書，什麼事情也不理會，林林總總，各式各樣，非常複雜。另外大學的自由度也濶了許多，每個同學都可以自由發揮他們的意見，《學苑》更成為我們的平台，暢所欲言，學校也從不干預；再加上圖書館藏書及刊物甚豐，隨時可涉獵一些外間不能接觸到的資訊，方便我們作研究，更何況在大學中，多有小組研習(tutorial)，導師們往往都鼓勵我們積極討論，這都叫我們創新思想，也帶來我們不少的思想衝擊。

首先，我的基督教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基督教所說的「信心」可以從3個層面來看。第一是有關我們的「感覺」(feeling)，這就好像一個人，當他覺得身體不適，他就會去尋醫吃藥，以求藥到病除。同樣，當一個人覺得人生有缺陷，感到迷惘，不安或空虛，又或者他不知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何在，他就尋求信仰上的答案。正如耶穌說：「無病的人用不著看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五章31-32節)若一個人不覺得有何需要，一切都可以靠他自己解決，他自然對宗教信仰也沒有多大興趣！第二是有關理性方面的信服，就如我們看醫生，我們也要弄清楚這醫生的背景，學歷，經驗和醫德，不會隨便看一個無德無能的醫生。所以，當我們尋求宗教信仰時，我們也要弄清楚這是否可信，而不是盲從迷信。理性上的信服是「信心」的基要條件；正如使徒保羅論及基督教之信仰核心(耶穌從死裏復活)時，他說：「若基督沒有復活，你們所信的便是枉然。」(哥林多前書十五章14節)。第三是有關意志的

決定。就如看醫生，雖然醫生告訴你，你的病需要動手術，請你簽字讓他進行手術。如果你在理性上真的相信這醫生可以藉手術醫好你，但你却肯簽名讓他動手術，這「信」是完全枉然的。同樣的，信耶穌也是一樣，我們不但在感覺上，理性上，也要在意志上作個抉擇，「把心一橫」委身給基督，這才是真正的「信心」。

在中學時期，我的信心是比較單純，傾向在「感覺」方面，覺得人有悲歡離合，並非在我控制之內，聽到這福音，再加上看到周圍的基督徒都非常善良，友善，我就相信了，沒有花太多時間思想到理性上的信仰問題。但入了港大，情況就很不同了！無論在「中國哲學」或是「英文」小組討論上，我們往往都涉及宗教信仰問題的討論，中國哲學的老師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他以為人的理性可以克服罪惡，他對基督教的看法是比較負面，以為這是過份的dogmatic，而儒家是「道德的宗教」，較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更為優勝。而在英文小組討論中，往往也提及宗教信仰問題。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其中一位同學，在參加宿舍活動時發生意外，撞車身亡，他是一位基督徒，我們在小組討論中便討論到死亡與宗教信仰問題，這都對我的信仰有極大的沖擊和挑戰，我曾有一段時期感到非常混亂和沮喪。

港大的基督徒團契，有見及此，便開辦了許多讀書小組，深入討論基督教的理性根據，我們念過多本非常有趣的書，其中John Stott的Basic Christianity；C.S. Lewis的Mere Christianity；J.I. Packer的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F.F. Bruce的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Paul Little的Know Why You Believe都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這是我信主以來一直沒有想過和接觸過的護教問題；這就好像打開了我的眼睛，有機會認識基督教的理性根據，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不但增加我的信心，更幫助我在傳福音時講得更清楚，令我感到非常雀躍。

在港大團契的經歷，使我看到香港教會的問題，一方面是教牧訓練的問題，香港的傳道人大多是畢業於本地的聖經學院，入學資格是中學畢業，在學術上及理性的訓練上不足，再加上那時保守派的教會常持著一種「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的心態，並不鼓勵信徒提出任何信仰的疑問，所有「懷疑」都是出於那惡者，對「神學」更視之如猛虎，如此叫不少知識份子却步，也不願參加教會，因此在60年代及70年代，學生團契與地方教會有著一大隔膜，這是非常不幸的事。其實這種教會風氣是承襲了昔日中國教會的遺風，想到陳獨秀未投身在共產主義之前，曾參加過基督教教會，希望在基督教裏尋到一條解救國家及他個人危機之良方，可惜那保守的中國教會，把這樣一個尋道的知識份子拒之於門外，真是可惜。

在另一方面，60零年及70年代的教牧人士，薪津並不高。我記得從美國完成神學課程後，準備回港在一間頗有規模的教會事奉。當我們提及薪津的時候，真把我嚇了一跳！原來他們給我的薪津不及一個住家傭工。那見我的長老也覺得有點尷尬，忙對我說：「我們會為你預備宿舍居住，並退休後有退休金。」我心裏想著：「你家的傭工也有「宿舍」，我才是30歲，怎會想到退休金呢？」或許是這個原因，那時的香港教會是很難吸引到大學畢業生投身在教牧行列；更不幸的，他們以為這種想法是太屬世，做傳道人就應該有受苦的心志呀！

然而，在港大團契的讀書小組的確對我有遠的影響，畢業後，我們幾個弟兄姊妹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成員包括我，劉君玉(她後來成為我太太)、林榮洪、劉文昭、陳詠恩等，我們先後完成 John Bright 的

History of Israel，L. Berkhof的Systematic Theology，Donald Guthrie的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等巨著。想起來，我們小組成員日後都投身在教會事奉，他們大部份都是投身神學教育，唯我仍是堅持在教會作牧養工作；感恩的，日後有不少港大、中大的畢業生都開始投身於教牧行列，而到了80年代教會對傳道人的待遇也大大改變過來；這是我在60年代從沒有想過的！

此外，港大團契於1967年的夏令會對我有深深的影響，每年團契都在長洲建道神學院舉行夏令會。這一年非常特別，因為六七暴動之故，整個香港都陷在非常緊張的局勢，那年的夏令會講員是艾德理牧師，主題是His Calling, My Commitment(祂的呼召，我的委身)。艾牧師親身經歷學聯會怎樣面對中共新政權的壓迫，對我們在此政治動盪之際極有同感，更甚者，我們一些同學在早上看到有浮屍漂到岸上，形狀非常恐怖，這更引起我們對中國國內的文革情況憂慮。有關67暴動的情況，我會在下一章詳細討論，但在大學的基督徒圈子內，雖然同情此次的暴動者極少，但却喚起基督徒對國家及社會的關懷與認識的情懷，事實上，香港的教會在殖民地的教育下，對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好像是距離我們有千萬里的陌生地方。正如前中國內地會宣教士Arthur Glasser說：「對我們周圍的政治問題不聞不問是罪」(Indifference to political questions is a sin)(參看 Arthur Glasse and Eri Fife “Missions in Crisis” 一書 p.31)

所以，當我在窩福堂及三藩市牧會時，我寫上一副對聯，貼在入口處，以提醒我自己及眾弟兄姊妹

■ 歌聲，禱聲，讀經聲，聲聲入耳， ■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最後，我可以說，80年代以後的香港教會領袖大多是從60年代70年代學生團契培育出來的，不但如此，從香港學生團契培植出來的信徒，不少移居到美加、澳洲、紐西蘭、英國等地，在那兒開設查經班及教會，其影響已達全球，一切都沿於40年代的中國學生運動，真是不可思議！

第十九章

消失了的檔案
六七暴動

今年是「六七暴動」後54年，想不到超過半個世紀前的一段驚心動魄，改變香港歷史的騷亂，竟然又再困擾著不少香港人。最近導演羅恩惠花了4年多的時間，重整在2小時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紀錄片於2017年3月8日晚在中文大學首映，其後有200多場在不同的場合放映。千千萬萬跨越不同年代，目睹這一段傷痛的歷史，也有不少故事與真相是多年鮮為人知的，看後叫人感到沉重，迷惑和不安，尤其在這幾年香港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躁動不安，更叫人心中了疑惑：香港會否在歷史洪流中消失？

「消失的檔案」這紀錄片固然是相當震撼，但羅恩惠所製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叫人更疑惑和不安。當她花了很多時間往香港檔案中心查閱有關檔案時，竟然發覺幾乎所有關與六七暴動的人物紀錄不翼而非，而且是很明顯被人有計劃，有系統地「被消失」，剩下只有21秒無關痛癢的片段。這不禁叫人問道：「為什麼現今香港政府要如此關注這些檔案被傳開？難道與現今一些權貴領袖在當時所作所為有關？」更令人不安的，這種手法似乎並不陌生，還好羅導演可以從英國的檔案中找出那些消失了的原本，重整這個駭人的故事！

1967年之暴動，發生在我剛入香港大學唸書之際，記得每天都從大埔返港大上課，經過市區，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都要小心翼翼，恐防有「土製菠蘿」（炸彈），又要儘量避開人群，尤其見到一大群穿白色襯衫，藍褲的更要「走為上着」，每天都是如臨大敵。再加上有不少巴士及電車罷工，出入困難，校內氣氛也很緊張，又常聽見謠言，解放軍很快便要進佔香港。回到家裏，父親神色凝重，極憂心，更有移民的意念。所以當家姐提出想移民加拿大時，他立即贊成。總之這8個月都是渡日如年，人心惶惶。

事實上，1967的暴動是香港開埠以來其中一次最嚴重的政治騷動。究其原因，是內地文化大革命之伸延，這種文革狂飆橫掃千軍如捲席，港澳也劫數難逃。《華僑日報》於1968年出版的《香港年鑑》對「六七暴動」有這樣的總結，這總結也反映了當時香港市民的主流看法。

「1967年這一年，香港遭遇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顛覆活動，可是，因為大多數居民擁護政府，終於把暴亂平息。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繁榮，並未受到這次暴亂的嚴重影响，令人感到快慰。

香港一小撮人，可能受了大陸「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活動的影响，更把澳門事件作為一個例子，便想一舉把香港鬥垮…。香港政府在平亂開始就獲得英國政府的支持，全國社團的擁護，廣大居民的合作，放手去對付那一小撮人，由冷靜、容忍的對付，轉入嚴厲，強硬的對付，經過八個月的小心謹慎應變，終於把暴亂平息。」

但從現今面世的檔案看來，六七暴動並非如《華僑日報》所報導的那麼簡單，而是一場非常複雜，危險及極具爆炸性的鬥爭；不但在香港和澳門，更在中國內地。據《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一篇文章記載，雖然只有1版紙的內容，前所未見，十分震撼。這記載是講及

1967年7月上旬由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及一些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中一致通過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方案提到有3種收回香港的可能方式：

- (1) 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
- (2) 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
- (3)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佈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這會議決定採取第1和第3種方式，並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清、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

到了1967年8月20日，陳伯達所領導的小組完成了各項的佈置和計劃，決定用2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1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了3千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預備接管各部門。

寫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厲松，我覺得此文可信性頗高。港澳辦主任魯平在1994年5月6日在香港5大商會午餐會上講了一番與這文章類似的論調，他說：「你們可知道1967年是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嗎？」，在此，魯平只不過把罪名加在四人幫身上，而不是中央政治局。

又據這篇文章所述，周恩來得悉此事，他感到事情重大，便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及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因為此時收回香港，對中國絕無好處。周恩來又曾7次會見毛澤東，要求他停止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計劃。結果毛澤東接受了他的提議。

由此可見，當時的形勢非常險峻。

為什麼六七暴動會8個月後草草收場？一方面是領導人開始體驗這極左的思想和路線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面，中國在金錢上大量支助這騷動是不化算的，李後就有下列的評述：

「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之聯合人數由28萬減至18萬，《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的銷量下降，不及十分之一之全港報紙總銷量，不少愛國電影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六七暴動時我年紀還輕，對中國內情及歷史認識不深，一如其他香港人一樣，以為這是大陸文革的餘波，鼓勵了一些本地左派人士攬事。如今事過情遷，港人亦可以安居樂業。但現在看來，事情絕不是這麼簡單，六七暴動仍有許多謎未破：究竟幕後的黑手是誰？謀殺林彬的兇手是誰？這麼多炸彈的製造是誰領導和主使的？要支援這個運動及支付罷工工人的金錢是從那裏來的？事情雖經過了50多年，卻仍未得到答案，反之似乎不少有勢力人士都極力繼續隱瞞真相，並且消滅證據，難怪羅恩惠在搜尋有關檔案時遇上了這麼多麻煩。

究竟這次暴動對整個香港及我和我的家有何影響呢？無可否認，這是一場非常血腥的騷動，自1967年7月9日開始，一直至12月6日，持續了近5個月的炸彈狂潮，日日上演炸彈浪潮不但是針對警察，更擴散到整個社會，從報章上看到其中兩宗使人極感不安和難忘的慘劇。首先，兩名年僅8歲及2歲的姊弟在北角清華街玩耍時，被炸彈當場炸死，血肉模糊，令人極大公憤。另一宗是商台播音員林彬與表弟

駕車離開寓所，被暴徒潑油縱火，兩人傷重不治。何解？因為林彬在暴動期間主持18樓C座節目，經常斥罵左派暴徒。事後有左派報章指自稱「鋤奸突擊司令部」承認殺人，兩宗慘劇的兇手及幕後主持人至今仍逍遙法外。但大多數的香港人，很快便察覺到這場暴動絕不是什麼工運和社運，而是由左派組織的龐大群眾運動，目的是迫使港英政治屈服，像1966年12月澳門發生暴動後的澳葡政府一樣。從新聞的報導來看，左派暴徒的殘忍和仇視非我族類，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懼，對共產黨政權更不信任；對我們一家來說，香港似乎並不是像我們以前想像那麼安全。所以，當家姐提到欲移民加拿大，父親是非常贊成的。

然而，事情卻非這樣黑白分明，一面倒地吧責任推到左派人士方面，正如李怡所說，在參與騷動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抱著理想和愛國精神參與這運動，也有不少是無辜及被人利用的。其中是有關我的母校皇仁書院兩位學生李繼潘和何安頓的遭遇，實在使人不安。1967年6月21日，香港大公報和文匯報同時有此報道：

「6月20日中午12時左右，皇仁書院的愛國學生以迅速的行動，在正門的牆上張起一幅6呎多長的紅布白字標語：「粉碎奴化教育！」在橫門的牆上又張開一幅標語：「粉碎反華課本、言論」，並在校內外散發「告皇仁同學，工友，老師書」，也在校內貼起各式返迫害鬥爭標語。頓時整個皇仁書院都翻騰起來，同學和校外觀看的同胞都歡叫起來。

當天晚上，皇仁門委會各戰鬥隊，組聯合起來，組成了「皇仁書院學生反對港英迫害鬥委員會」，並發表全港同學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但事情是這樣的，1967年10月17日，李繼潘指著校長司徒莊(John Stokes)用英文大聲斥責，原來李繼潘是中5學生，因在校張開標語而被學校開除，他便回校與校長理論，結果被教師攔阻，校方更召警察將他拘捕，並被控五項罪名

- 毆打老師 M. J. Kaynes，
- 毆打老師 T. F. Lewis，
- 在警署內撕裂警員何國旺的恤衫
- 阻礙便衣警察黃順執行職務

他不認罪，也不肯簽保。結果全部罪成，共判入獄22個月7日。

而何安頓也是被學校開除，返校時被控擅闖皇仁書院廣場，結果罪成，被判入獄4個月，其實這都不是大事，他們又是高材生，但因入獄就斷送了前途，這是非常惋惜的事！其實，事情也並非如《大公》，《文匯》的報導，當時在校的同學，大多不知道這些事情。

參與這次騷動的大多是工聯會轄下成員、左派學校學生，至於其他學校只有零星的抗議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庇理羅士中學，有14個女同學被捕，判刑入獄，其中1名是曾鈺成的妹妹曾勵予。至於當時我就讀香港大學，是最早表態支持港府的團體之一。5月17日，發表「我們要求安定」的社論，其中學生領袖科大衛更表明港府絕不應該向中共低頭；並且更強調大部份的香港人都不認同這種血腥的暴亂！

不過，這次暴動也反映了香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貧富懸殊，貪污問題，住屋問題，周永新教授有這樣的評述：「1966年和1967年的騷亂，迫使英國政府重估對香港管治方式，在此以前，香港殖民地的色彩可說無處不在，在麥理浩之前，所有港督都是殖民地官員，離不開

殖民地的一套，主要官員也由英國人出任，但自從六七暴動後，英國已決定改變其管治香港的模式，不再視香港為即將被放棄的殖民地，而是英國在亞洲最具戰略價值的基地。因此，香港政府必須安撫當地居民，增強他們對英國的歸屬感，從民生的角度看，1967年確是巨大的轉折，無論是公共房屋政策、提高市民的教育水準、增設大學，及推行9年免費教育，企圖使中產階級突起，隨著房屋政策之推行，及教育水準的提升，香港的家庭結構也起了極大的變化，由一個中國傳統的家庭演變為「核心模式化」的家庭，祖父母與子女及孫兒同住的情況幾乎絕跡，踏入70年代，香港的經濟冒升，與南韓，台灣及星城稱為四小龍。這一切一切都是緣於六七暴動的影響。」（參看周永新之《回首香港七十年》p.41-66）

雖然六七暴動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的事，而且不少的當時人也承認其中的錯誤，其中包括：

羅孚是新聞界和文化界名人，也是中共左派文鬥悍將。他在抗日期間加盟《大公報》，1948年加入共產黨，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升任副總編輯，1950年《新晚報》創刊，羅孚出任總編輯。1967年暴亂期間作為兩報《大公報》與《新晚報》的高層，同時也是報社鬥委會執委會執行小組組長，担起文鬥大旗。當時他有一句名言「不到赤柱非好漢」，不但如此，他還率領全家反英抗暴，兩名十多歲的兒子海曼和海沙組織戰鬥隊，四處派傳單及放「假菠蘿」（假炸彈），他筆下的時評被外國傳媒形容與「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相似，但晚年時他大胆認錯說：

「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
他並向六七暴動的受害者道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羅孚是一個奇才：出任《新晚報》總編輯期間，一手捧紅了梁羽生及金庸兩大武俠小說大師。但他卻又是一個悲劇的人物。1982年5月這位外表儒雅的羅孚竟被中共控以間諜罪。他當時接獲北京來電，被邀返內地出席學術交流會議，但一到場即遭軟禁，一年後被控作美國間諜，判囚10年。直至1993年才獲釋返港。著名作家蕭乾有此評論：

「這是巴金《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劉銳紹也稱讚，羅孚是第一個六七暴動事件向受害者及香港市民道歉的左派人士，他一生致力開拓言論及新聞自由，值得肯定。」

此外，港深辦副主任李後在他那本《百年屈辱史的終結》有云：

「發生於1971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雖是如此，當眾人以為對六七暴動已有一個定性的評價，但自回歸之後卻有逆轉的趨勢，下列幾件事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 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竟然宣佈在六七暴動擔任總指揮的工聯會理事長揚光獲頒大紫荊勳章，此引起香港廣大的憤怒。
- 特區政府在2016年大幅修改有關六七暴亂的官方網頁，刪去不少內容及詞句，「鬥委會」「毛語錄」等都不見。
- 檔案館不少有關六七暴動的檔案也消失了。

這一切一切都好像是一些有權位的勢力人士企圖改寫歷史，這是令人感到非常不安和疑惑！對我來說，這次騷動，提醒我要了解和

明白中國近代史真相之必要。在殖民地的香港長大，我們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事實上，無知只會帶給人的愚昧，這正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悲劇，也是我們每一個渴望「追尋真相」的人之挑戰！

等待

希臘文 Hupomone 這一個字通常譯作「忍耐」，但同時亦有「耐心等待」的意思。在新約聖經中，往往與另一個字 makrothumia 連在一起使用(如歌羅西書一章11節)。Makrothumia 是指對人的忍耐，故中譯作「寬容」，而 hupomone 則是指對環境、際遇的忍耐，故此有耐心等待的意思。這個字在古典希臘文中並不常見，但在新約聖經卻是非常普遍，出現過至少有45次之多，而且往往是與「患難」(羅馬書五章3節)、「信心」(雅各書一章3節)和「盼望」(羅馬書五章4節)連在一起。由此可見，hupomone 絕不消極，一個有 hupomone 的人，不會只曉得消極地等待著暴風雨的過去，也不只一味逆來順受，而是充滿盼望和忍耐，是一種能把逆境轉化為榮耀與盼望的能力。

我們都活在這個「即食世界」「高速公路」的文化世界，根本不知道「等待」是何物。我們只要求「立即滿足」，「即時見效」。但是，一個不懂「等待」的人，是一個既膚淺又危險的人物。試想想，假如我們不曉得交通燈前等候綠燈亮起，這是多麼危險的呀！同樣，一首音樂，需要有休止符才能顯出樂章的美麗，人生也需要這樣的等待，才顯出生命的豐盛。

然而，「等待」並不容易，它就好像一個空中飛人，放了原來的韃鞬，正在等候另一個韃鞬的到來，在半空中，沒有什麼可持，也不可以作什麼，只能

耐心的等候，這種「半天吊」的心情是極不好受的。在我的人生中，有多個「半天吊」的經歷，令我畢生難忘，也令我成長了不少！

第一件事是有關我的婚姻大事。當我在1967暑期，剛剛完成第一年的大學課程，正當我在家中無所事事之際，大學團契的一位團友竟然老遠跑到我在大埔的森園，問我願否承繼他在香港青年會夜中學教授英文，每星期三晚，另外兩晚則由另一位同學執教。由於我家沒有電話，他無法接觸我，就決定親自到訪，令我非常感動，他來回時間足足花了幾個小時，剛好那時我正籌算來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份收入足以為我支付一切開支，所以便欣然答應。

其實，我本來並不打算半工半讀，而是專心讀書的。在學期尾，羅香林教授推薦了我們5位同學申請一個獎學金，我是5位中的1位，而這獎學金是由3人分享，我以為自己得獎的機會頗高。在面試的時候，教授問我有沒有曾經投稿給一些學術期刊，我說：「有」。我的答覆是有點不誠實的，因為我只投稿《學苑》(香港大學學生刊物)，而非什麼學術期刊。之後，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這是有欺騙的成份。那天下午，我決定去找羅教授道歉。雖然我終得不著這獎學金，但我卻感到非常平安，這種平安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因為如此，當這位團友到訪時，我立即體會到這是神豐盛的恩典。日後，當我回顧整件事情，我更體會到神不但供給我不夠金錢，叫我可以完成大學的課程，神更藉此機會為我預備了我的終生伴侶——與我一同執教的另一位老師，就是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劉君玉！

青年會夜中學是專為那些在職的青年人提供英文學習，他們大多是因為家境問題，或其他原因而未能普通文法中學唸書，而要踏進社會工作賺錢養家！他們都是長進的年青人，所以晚上便在夜中學讀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特別是在英文方面，如果會考英文科合格，在社會可找到一些較有前途的職業。正因如此，不少學生的年紀與我們相若，而讀書的態度也較認真。

當我和君玉在青年會夜中學任教的時候，我們有時約這些學生在週末一同行山，大家建立了相當的友誼；我們都有同一心志，希望向他們傳福音，在不同的場合中，我們與他們談及人生和信仰的問題。其中一位學生，他人生經驗相當豐富，自從來到香港後，就在一間象牙鋪當學徒，學習雕刻象牙，後來他竟然成為一名出名的師傅，更自資開了一間象牙鋪，把製成品運至國外推銷。他覺得因生意來往，英語是缺不了的，於是便來到青年會夜中學讀書，我們從師生關係進而成為好朋友。有一晚放學後，他陪我一同行回港大宿舍。忽然他問我：「蘇sir，究竟人生有何意義？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但我不想涉及宗教信仰。」我回答他說：「我的答案很簡單，請你用些時間去想想：世上有什麼東西是有永恆的價值呢？你想想後我們再談這個蠻有意思的問題吧！」。隔了兩天，我們放學後一同行回港大宿舍，他對我說：「我想了整天，我沒有答案，所謂『變幻原是永恆』，世上那有永恆的東西！」我對他說：「我認同你的看法，我想除了上帝以外，世上那有永恆的呢？若你想查究人生意義的問題，除了從宗教信仰入手，我也無話可說，或許你對宗教信仰沒有興趣，但你一定對人生的意義這課題感到興趣，你不妨可以用一個批判的眼光去研讀聖經，看看基督教信仰是什麼，或許你會得到一點啟迪！」

正是因為這同學的問題，激勵了我和君玉為這些同學開設了一個福音性研經班，我們對他們說：「我們的目的，不是要說服你們接受我們的信仰，而是讓你們自己先看看信耶穌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然後

才作決定。信仰是你個人的問題，若你要相信，沒有人能攔阻你，但若你要拒絕相信，亦沒有人能強迫你。但無論信與不信，我們必先客觀的認識這信仰，才作決定，這才是理智之舉！」

想不到這福音性研經班帶給不少同學的祝福，我們更把這研經班的資料加以修輯而寫成《福音性研經》一書，帶給很多人的祝福。不過，最大的祝福還是我和君玉，因為藉此機會，增進了我們彼此間的友誼，最後組織了我們的家庭。當我發覺自己對君玉有愛意，但又不敢啟齒有所表示，便找我所尊敬一位團友尋求輔導，他只是簡單對我說：「『等待』是基督徒最寶貴的美德，最佳的方法乃是在神面前謙恭等待，看看祂的帶領。」跟著他分享他自己的經驗，他也有一位心儀的姊妹，但還沒有向她表示，只是耐心的禱告，等候著神的帶領。

既是這樣的忠告，我就不敢有何表示，只是等候著，但要等到那時呢？我並不知道，我只是天天禱告等待著，我就是這樣等待了差不多兩年之久。

「等待」真不是一件易事。我記得有一個故事，一位居住在倫敦的作家因城市喧鬧，使他無法安寧，也缺乏靈感寫作；於是他便決定搬到近郊的一個農莊居住，那兒沒有車聲，鬧市的雜音，非常寧靜，他滿以為從此可以專心寫作。誰料隔鄰養了一隻公雞，每逢天未亮時就啼叫，令他感到煩燥不安，於是他便向鄰舍投訴。鄰居對他說：「我這隻公雞每天只花不夠3分鐘啼叫，極其量牠只煩擾了你3分鐘，何竟你會如此煩燥不安呢？」那作家就對他說：「你錯了！不是雞啼的3分鐘煩擾我，而是我整晚等待那3分鐘啼叫的那段時間煩擾我，使我無法入睡，精神不振，嚴重影響我的寫作。」這作家所講的，相信不少人也有類似的經歷。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在這等待期間，心裏也常存著這樣不安的心情，自己不時會自問：她是否有了男朋友呢？她對我的印象又是如何呢？她的家境看來是不錯的，而我出身寒微，她的父母又能否接納我這個窮家子呢？但在另一方面，在這段等待期間，我學懂完全依賴神，相信祂只會為我找一個最適合我的配偶；更可以叫我冷靜的客觀的認識君玉，又可以讓她對我有更深的認識。我發覺我們二人的友誼越來越深；到一個程度，不論婚嫁才是一個大意外！我覺得這團友的提議是非常有智慧的。

君玉的家庭屬中產階級，父親從前是做生意的，已退了休，大哥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但當實習醫生那年，不幸得到腎病而離世，對他們整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傷痛的事。二哥在香港大學唸電機工程，她還有兩個妹妹，大妹小時因患腦膜炎，雖然沒有喪命，但卻成為智障/殘障人士，一生都要母親照料。另一個妹妹是同父異母，但她們的感情相當不錯。君玉，妹妹與「阿姐」（她父親的妾）同住在家的隔鄰，但全家卻是天天同枱吃飯。在她的全家中只有她是基督徒，後來她的父母，阿姐，二哥先後都信了主，這是日後的事，但卻是神極大的恩典。我們家庭背景雖很不同，但在信仰上，價值觀上和文化背景上都很相似，而且大家無論在青年會教學上，帶領那些同學福音性研經班上，大家都有共同目標和志趣，合拍得非常好，而我們的友誼也越來越深了！

我等待了兩年，終於覺得是時候了！於是我便寫了一封信給君玉，表明我的愛意，並且坦白對她說，我有心志預備將來作個傳道人；並且希望她能夠與我同走這條奉獻的道路。那時我們都畢了業，她在政府民政署工作，我則在銘賢中學教書。翌日，我要到她家裏替她妹妹補習中文，預備投考中文大學。臨走前，她交了一封信給我，我不好意思

在她面前拆開來看，出了門口，我便立即拆開來看，一睹為快，果然是佳音！原來她已經為我們之間的感情禱告了一段時間。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中，連忙致電給她，彼此傾訴良久才收綫，我告訴父親這大好消息，他也為我們感到高興。

愛情的力量真大。那晚12時許，我收到一個電話，有教會朋友告訴我，一位弟兄突然失常，很明顯他是患了精神病，而且他又是獨居，形勢非常不妙，於是我立即趕到他的家，送他往醫院急症室接受檢查和治療，我知道這弟兄經濟拮据，我留下了2,000元給他作應急之用。那天晚上，我整晚陪伴著他，心中總覺得既嘗了這愛的滋味，就有一股暖流湧溢出來，而且一點都不像很疲累，這是我初嘗愛情之力量！

我和君玉，終於在1971年8月14日舉行婚禮，我的外父外母非常仁慈，他們體諒我家境並非富有，所以沒有向我索取什麼聘金等，而且還把婚宴的禮金全數交回給我們，這是他們對我的寬容和愛戴，當然君玉在他們中間也作了很多功夫，愛屋及烏，我實在為此而感謝她和我的主！

第二件難忘的「等待經歷」便是女兒凱欣的出生。這應該是多年之後的事了！1972年我們離開香港，來到美國費城的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神學。1975年畢業後我再往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1976年夏天回港，在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事奉。在Princeton期間，我們的長子凱頌誕生，我們一家3口返回香港，開始作植堂的工作，到了1977年初，君玉再次有了身孕，這時我們才猛然醒起君玉還沒有注射預防德國疹。那時，君玉對我說：「不知會不會染上德國疹呢？」當我們想到過去在美國的經歷時，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心中不寒而慄。記得那時君玉正懷孕8個星期，有一天與樓下小孩子玩耍，後來他母親才告訴我們，這孩子是患了德國疹的，我們知道，一個懷孕1個至3個月的孕婦，若患上了德國疹，是很有可能影響胎中的嬰孩，或是心臟病，或是腦病，或是瞎眼，或是聾啞，後來，雖然兩星期後驗出君玉並沒有染上此病，我們才安心。但在等待的那兩個星期中，真是渡日如年，畢生難忘。

經過此次經歷後，本應待孩子出世後便立即注射預防德國疹，但因君玉是母乳凱頌，不能注射，故一直拖延到回港，及第2次懷孕時，還沒有注射。

不知怎的，德國疹就好像追著我們一樣。1977年3月至4月期間香港發生德國疹疫症，君玉任教的學校亦發現有數個學生染上了，我們真是極其驚恐。才懷孕9個星期，要到12個星期才算是安全，我們應怎麼辦呢？最後，我們商量結果，為了胎兒的安全，君玉決定向學校告了兩個星期假，以避此疫症。於是她獨自搬往娘家，因為那兒出入人少，比較安全。但這決定來得太遲了，兩星期後(約懷孕第11個星期)，她全身起了紅色的斑疹，還有微燒，後來驗血結果，證實她真的染了德國疹。這消息真是晴天霹靂，兩口子整天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

神真好像有意和我們開玩笑。那星期日我在教會講道，研讀馬太福音六章24-34節的一段經文：「如何勝過焦慮。」我記得當時我對會眾說：「我相信在我們中間，我是最沒有資格和大家講述這個課題，因為我自己在這兩個星期來未嘗沒有一刻不憂慮著，但我仍然相信這是神的預備，叫我在最軟弱最憂慮之際，和大家思想這方面的安慰。我雖然憂慮，軟弱，但我相信神仍是神，每當我想到孩子的健康時，心裏就很驚怕，很消沉，當我看到君玉流淚、內疚、自責：為什麼

不一早去注射防疫針，心中很難過，又不知如何安慰她，想到前面還有6個月的漫長日子，真不知如何渡過。但當我想到神的信實，祂寶貴的應許，心又似覺得平安；在這等待期間，我心中就常處在這樣的爭戰中……」說到這裏，真是強忍眼淚。講完道後，吳太太領會眾為我們禱告，她懇切祈求甚至落淚，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受。

一天晚上，電話響了，君玉接了電話，和對方談了差不多15分鐘，看她神色甚差，有點呆滯，我忙問個究竟。原來是我們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打來，提議我們墮胎，君玉忍著眼淚對她解釋說：「我們是基督徒，不能為了自己免麻煩就隨意結束自己兒女的生命，我們深信，神只會給我們至好的兒女，永不會給我們次好的，假如這孩子真的是盲，或是聾啞，或是心漏，或是智障，我們相信這也是神所賜，是祂認為是至好的。」

其實，在這幾個星期來，有不少好友都勸我們墮胎，一了百了，免得自己長期受苦，起初我們聽了很氣憤，心想，「為什麼他們不鼓勵我們，安慰我們，反而搖動我們在神面前的決定呢？」但回心一想，他們也是因為愛我們，才這樣的勸我們；為什麼我們不欣賞他們的關懷，反而視他們為敵人？有時苦悶的時候，又覺得他們所說的未嘗無理，落了孩子，便可以免除一切憂慮，這又有何不好呢？「啊，主啊！赦免我們一切的疑惑，求祢叫我們認定，祢仍是神，仍是看顧我們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神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一章4節)兩位曾遭患難，而又嘗過神安慰的弟兄姊妹，從遠處得悉我們面臨的試煉，就寫信安慰我們。他們的安慰實在激勵了我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谷醫生(Dr. C. E. Koop)是美國著名的外科手術專家，他以成功分割一對連體女嬰而馳名世界，後來他更擔任在布殊總統內閣的Surgeon General，他是我們在費城第十長老會時認識的。我們不但欣賞他的醫術，更為他的愛心和信心感謝神，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從伊太太得悉Doris的情況！覺得有寫此信給你們的必要。讓我告訴你們我個人的經歷，我的媳婦是在化驗室工作的，當她發現有了身孕時，不幸接觸了大量的德國疹病毒。當我們正替她檢驗，看看有沒有真的染上德國疹，我心中就盤算著應否替她墮胎呢？當我的兒子知道我有這意念，就對我說：「爸爸，我們不相信神會賜我們一個殘缺的孩子，但要是祂真的如此，我們亦會盡力的撫育他，因為他也是神所賜的。」自此以後，以及其他種種因素，我開始強烈的反對墮胎，最後更促使我寫下《生死之權》一書(The Right to Live, The Right to Die)，我希望神不會賜你們一個殘缺的孩子，正如祂保守我兒子和媳婦一樣，我對你們不作墮胎的決定實在感到驕傲，讓我們完全信靠吧。若有任何地方我可以效勞的，請隨時與我聯絡好了！」

茱莉是我們在費城惠斯敏特神學院一位同學的太太，她從學校報告板上看到我們的通訊，就立即寫信安慰我們：

「.....我很明白你們現在的焦慮和不安，我想藉此信安慰和鼓勵你們，希望你們繼續持守你們的信念，墮胎絕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當我母親懷著我11個星期的時候，也染上了德國疹，結果我的左眼有少許毛病，不大可以辨別遠近，其餘則沒有人多大影響，我是何等多謝我的母親沒有墮胎，除掉我的生命。

我相信神一定保守敬畏祂的人，我們在神學院一班弟兄姊妹，正為你們和你們的孩子禱告。」

這是多麼安慰的話！

1977年10月7日，清晨3時許，凱欣在香港播道醫院出世了。在產房中，金醫生(Dr. Margaret Crumpacker)抱著凱欣，細心為她檢查心臟及其他器官，看來似沒有大礙，她的樣子很甜，像媽媽，金醫生把孩子交給君玉，就在產房領我們一同禱告：「天父，多謝你，賜他們這樣美的孩子，多謝你奇妙的保守……」我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受，眼中已充滿了淚水！我們給孩子起名為凱欣，英文名是Charissa，是恩典之意。事隔了40多年，凱欣現已成家立室；有2個孩子的母親，她現在於羅省公營醫院行醫，是個內科醫生。至於她的身體，除了聽覺上有少少問題，其餘都是非常正常。當她在加州大學醫學院讀書的時候，當同學們討論墮胎的課題時，她就對他們說：「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沒有墮胎，除掉我的生命，以致今天我可以仍然生存，工作及過著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她的同學聽了，頓時啞口無聲，不再討論這話題了！」

「等待」的確是一個寶貴的經歷，正如以賽亞書四十章31節說：「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聖經用「鷹展翅上騰」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少人都問道：「為什麼鷹可以不用很大氣力便能展翅上騰？」這是因為他們能夠利用上升的空氣，趁勢展翅上騰，近地面的空氣，因為受地面的熱氣而上升，又或者氣流遇到高山上升，鷹便利用這些上升的熱氣趁勢展翅上騰。

換言之，牠們不是靠自己的力，而是靠外來的力量，這可以使牠們飛得更高，更可以使牠們省力，不知疲乏。這就是以賽亞的意思了。若我們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少年人、強壯的，久而久之，必會氣力衰退，感到疲乏，最後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像鷹等候上升的熱氣(在希伯來文，氣、風和靈都是同一個字)才展翅上騰，我們也可以靠著永不疲乏的神，重新得力，奔跑不致困倦，行走也不疲乏。這是何等安慰的應許！



與初生的兒子凱頌攝於
Princeton Seminary。

第二十一章
更美的家鄉

1944年9月2日，1架美國戰機在日本父島被日軍擊落，機上9個飛行員墮入海中，當中8人被日軍俘虜後被處決，其中4人更被煮熟吃掉。至於9人中惟一倖存的是1名20歲年輕人。他在海上漂流幾日後被美軍潛艇救起，帶返家鄉。這位死裡逃生的年輕人在65歲那年，當選為美國第41屆總統，他的名字是喬治布殊。

24歲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唔和布殊一樣，在同一時間及同一的戰場上，但其命運卻完全不同。他是個台灣阿美族人，在台東東河鄉長大。1943年被日本徵召入伍，再被送往印尼摩洛泰島與美軍作戰。在布殊被救後13天，美軍登陸摩洛泰島，和日兵短兵相接，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在混亂中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隊，又害怕被敵軍發現，於是在叢林中愈走愈深。

1974年的一天，印尼摩洛泰島的居民向警察報案，發現叢林裡有一個幾乎全裸的野人。印尼警方搜索30小時後終於找到這野人，他就是史尼育唔。當他被發現的時刻，他身邊有2枝步槍，18發子彈，1頂鋼盔，1把軍刀，當時他還以為被美軍找到了他。

史尼育唔是他的阿美族名字，從軍時他的名字是中村輝夫，1975年回台灣家鄉時，改了個漢名李光輝。到機場接機的有他的兒子及已改嫁的妻子，因為30年前，日軍通知她丈夫陣亡，所以改嫁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從叢林回到家鄉的李光輝已經56歲了。為了謀生，他在阿美族的文化村做出「野人」的樣子，供日本遊客拍照。當有人問他怎樣可以在叢林中苦撐31年。他回答：「我一定要回到家鄉。」

在同一時期，父親正在廣東一帶跟隨粵中儒將伍觀淇進行抗日游擊戰。一如布殊及史尼育唔，他也渴望早日返回家鄉，尤其當時正值是家姐穎儀出生之年，是父母親第一個愛情結晶。1945年，抗戰勝利，舉國歡騰。父親帶著興奮的心情回鄉，並且準備為國大幹一番事業。誰料隨即發生國共內戰，死傷無數。最後國民黨慘敗，蔣介石敗走台灣。身為國民黨的一個官員，他決定帶著一家，再次離開家鄉，逃往香港。來到香港後，生活困苦，思鄉之念又起，再加上他所敬重的上司伍觀淇不斷致函邀他回國，效忠新中國。他心裡因此有極大的掙扎，最後決定由母親先帶著弟弟穎智及妹妹穎微回鄉一行，看過究竟。若一切順利，我們一家再回鄉重聚。但這次的分離，卻是死別。他們回到家鄉，即被公安拘禁，並控告母親為地主，經過幾個星期慘無人道的公審，母親終於在一個清晨自殺身亡，遺下兩個幼小的兒女過著非人的生活。

自此父親再沒有在我們面前提起過家鄉了。對他來說，家鄉是一個咒詛，一個令他感到無限內疚、痛苦的地方。從這個角度看，史尼育唔比他還幸福。

我們人生在世，就如客旅，家鄉—永遠是我們情感最眷戀的歸宿。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父親結果沒有返回家鄉，但感恩他在晚年找到了一個更美的家鄉——這就是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所預備的永生之道。

父親自小受儒家思想熏陶，後來入讀政治深造班，熟讀孟子、論語，對孔孟思想尤其嚮往。孔子名言「未知生，焉知死」深深影響着他。現實問題，比靈魂身後的事，更為逼切。況且，他以為凡事有良心就夠了，何必花時間在一些虛渺的事情上呢？正如孟子有云：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意思是凡事盡了良心，就能體現了人性，就明白了天道。）

儒家思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士大夫，一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父親一向對政治及國事都非常熱衷，所以早年棄筆從戎，又拋棄在秘魯安定的生活，回國投身在政壇之中。但在這一切的努力下，他始終都覺得「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凡事都是虛空」。到了中年，國破家亡，自己流落在香港，活在內疚和恐懼中，他不得不認真去思想人生和信仰的問題。

我想到孟子與齊宣王的故事，齊宣王自認又愛好錢財，又喜歡打架，又貪戀女色。孟子要說服齊宣王實施他所提倡的仁政，真是難若登天。孟子很聰明，他向齊宣王遊說：「這一切都不要緊，人大大都是這樣，只要推己及人，辦好政治，讓老百姓各方面都得到合理的滿足，便是仁聖之君了！」俗語說：「狗口長不出象牙！」要叫一個貪財好色，撩是鬥非的昏君去推行仁政，攬什麼推己及人，務使百姓得到滿足，是否有點不切實際！所以孟子的失敗是必然的事。我想在中國歷史上，不知多少人就好像父親一樣，起初抱着大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投身在治國平天下的偉大工程上，結果弄到焦頭爛額，退歸故鄉，或是看破紅塵，依歸佛道！然而，父親對佛與道並沒有多大興趣，也沒法信仰，以致他感到苦惱。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父親在抗戰之後，因有意興建立孤兒院，收留那些在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孤兒，因而與那些志同道合的紐西蘭來華的宣教士接觸和合作。他也因此而接觸基督教的信仰。早期有不少蚌湖鄉人士出洋紐西蘭謀生，並在那兒信了耶穌，也因此而興起一些紐西蘭基督徒來華傳道的異象。他們組織了紐西蘭差會，在20世紀初年至解放前，先後在禺北一帶建立了11間教堂、醫院1間，名為普惠醫院，設於江村，另於從化有1間分院。此外，他們亦從事教育事業，先後建立德基小學，磐基小學及德基中學，它們都是隸屬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第7區會。

在他們云云的宣教事業中，其中影响最大的莫過於創辦普惠醫院和分院；他們從事鄉村醫療、衛生防疫和抗日救護工作，此醫院建於1917年，有100張病床，耗資1萬5千英鎊，自1917年一直至1951年服侍區內人民。事實上，這是當時廣州近郊唯一的現代西醫醫院，設有婦產科、小兒科、內外科、門診及住院設備。並且醫生和護士，更乘坐一輛醫療車，到白雲區花都及從化等鎮巡迴醫治病人。據1935年紐西蘭長老會資料記錄，該年住院病人共822人，門診2,827人，手術308宗(不包括婦產科數字)，又據紐西蘭籍華裔女醫生畢振華回憶，她每天要看50名病人，除了畢醫生外，還有5名中國籍醫生，其餘都是紐西蘭來華的醫生傳教士。普惠醫院設有護士學校，幾十年來，培訓了大量及格的中國籍護士，藥劑師，助產士和初級醫護人員，我們一家和普惠醫院有着深切的關係。母親曾在這兒接受助產士的訓練，我們幾兄弟姊妹都是在普惠醫院出生的。1951年解放後，國家接收了這醫院，並且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09醫院。

除了醫療事工外，紐西蘭傳教士亦積極辦學，先後建立德基小學，德基中學及德磐小學。家姐穎儀曾在德基幼稚園唸書。德基學校培養了

不少人才，並使很多女姓得到造就，他們畢業後不少從事助產士、護士、教師及醫生行列中。抗戰後，父親與伍觀淇籌辦孤兒院，得蒙這些傳教士經濟支援，以致他們建立非常密切的關係。在云云紐西蘭傳教士中，父親與鄭信榮牧師，顧愛理姑娘和李愛蓮姑娘較為相熟，並且透過鄭信榮牧師，認識了李仕牧師，成為深交。他之所以決定離開中國，帶着一家大小來到香港，也是李仕牧師的催迫和安排下而成行的。

因着這樣的關係，父親參加中華基督教會之崇拜，並且也參與一些事奉，特別在慈惠工作方面，他更熱心參與。到了香港後，他因着工作關係，便帶着農藝所的學生一起每星期參加大埔墟的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是朱義信牧師。然而，父親表面上似乎是一個熱心的教徒，甚至常常擔任崇拜的主席。但其實他外表是一個基督徒，裏面卻是一個儒家的跟隨者。他相信世上有獨一的真神，於此他絕沒有懷疑，但對於耶穌的神性，聖經中所載的神蹟，及因信稱義的真理，他半信半疑，他以為基督教是一個勸人為善的宗教，基督教博愛的精神是值得推崇。至於什麼罪得赦免，耶穌再來，天堂地獄等觀念，他始終都不以為然，我可以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掛名基督徒。但由於他在一個基督教創辦的孤兒院工作，他便每星期都參加教會崇拜聚會，後來他退休，不再在基督教機構工作，他就不再參加教會聚會了！但在他心底裏，仍自覺自己是個基督徒，所以在所有的表格有關宗教信仰一欄，他仍寫着「基督徒」。

我是在皇仁中學唸書的時候，透過參加基督徒學生團契而認識主。並且立志相信祂，事奉祂。後來我加入了大埔浸信會，並受浸成為會友。我和父親有一個習慣，每逢吃完晚飯後，我們父子兩人總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到海邊散步，天天如是，風雨天則例外。在散步時，我們總不免談天說地。但有2個話題是大禁忌：宗教和政治。父親不願談政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宗教也是禁忌，我就完全不理解了！我曾數度故意提出信仰的話題，他都直接對我說：「不用再說了！」所以我內心是感到非常不安的。

1966年，我開始進入香港大學讀書，因為家居新界，放學後我又要往青年會夜校教書。放學後已經是晚上9時了，無法趕火車回家，於是我便決定寄宿，每星期六才回家，星期日晚才返回宿舍。1968年的農曆假期，我留在家裏渡過農曆年，到年初四才返回宿舍。那晚天氣忽然轉冷，又下着毛毛細雨，還有寒風陣陣。父親患有哮喘病，每逢天氣轉寒，他的哮喘病又發作，氣喘如牛，又不住咳嗽，非常辛苦，目睹他要在極大的氣力才吸到一啖氣，心裏很難過。但我又要撇下他返回宿舍，心情就更惡劣。回到宿舍後，我實在忍不住了，一面流着淚，一面寫了一封非常激動的信給他。

「父親，在我們的家中，生離死別是一件多麼痛苦的事，我今晚離家時，看到你哮喘病發作，非常辛苦，心中極難過，在你最需要兒女在身旁時，我又要離開你而去，心感歉疚。但當我想到有一天，我們要永遠分離時，我不禁流出淚來，恨不得我早你一步離開這世界，這或許我會因此而避開這分離之苦楚。然而，我是基督徒，相信在基督裏有永生的盼望，聖經說我們信主的人會到更美好的家鄉，永遠不會再分離。我何等渴望你也能打開你的心門，讓主耶穌進入你心裏，作你的救主和主宰，這也是我天天在神面前的祈求……。」

翌日，我心裏有極大的掙扎，不知應否把這封信放在郵筒裏。但最後我鼓起勇氣，把這封信寄出。隔了幾天，我收到他的回信，只是

簡簡單單幾句，說他把這信給家姐看，看後，大家都流着淚，非常不安，並切切囑咐我不要再提這些事了；如果不提，大家快快樂樂渡日，這便是天堂，一提這些事，大家不開心，這就是地獄了！

我收到這信，呆了半天，心中極失望和難過。剛好這時我一位同學來宿舍找我，我和他分享這事，他安慰我說：「他心底裏一定會思想你所寫的。」然後大家一同為父親懇切的禱告。

到了星期六，我返回家中，父親和我都沒有提及這事。但大家都好像心事重重，而且有點隔膜。猶如陌路人一樣。但奇怪的事卻陸續發生。我發覺他開始偷偷地拿我書架上一些基督教書籍來看，但他又是恐怕我發覺，所以一切都是秘密進行。我把這一切都看在眼內，就把握機會，故意靜悄悄地把一些好書放在桌上，「引」他去看。到了3月時，我想到葛培理所寫那本《漫天烽火待黎明》一書，是余也魯翻譯的，正是他的好讀物。當葛培理來港佈道時，他也曾往大球場聽道，會後對葛培理讚口不絕。當我星期六回家時，他竟然不再隱瞞他的行徑，直接與我討論葛培理在書中所論及的救恩。他又大讚余也魯的翻譯一流，並對我說：「基督教正需要這類的著作。」

我聽到他的改變非常高興，並趁此機會向他提議在家中和他一同研讀聖經。想不到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到了星期日，我和弟弟穎智，父親一同研讀詩篇90篇。詩篇的信息，真的打動了他的心，「我們的生命，真的如水沖去，又如睡了一覺，也如早晨發芽的草，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強壯的可到80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摩西所寫的，簡直是父親的人生寫照，那年他剛滿70歲！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相信是聖靈在他心裏動工，他也顧不及那些所謂父親尊嚴，那天早上他就在兩個兒子面前認罪接受了主。我還記得在他認罪禱告中，他提及先前所發生的一件事。我有一個同學，因為患了血癌，需要有人輸血給她。我的血型正是她所需要的，便預備前往瑪麗醫院輸血，我臨走前告訴他這事，他反對我輸血，以為畢業試在即，這會影響我的身體和學業。我一再向他保證和解釋，他最後只勉強答應。後來我回家時告訴他：「不用輸血了，因為我去到醫院時，才知道在前一晚她已過世了！」在禱告中，他向神認罪，深覺自己太自私和太不近人情，我聽了他的禱告，心裏甚覺安慰！

自從父親信主後，他明顯有了改變，他對人比較和順，內心也比較平靜，尤其我結婚後，搬到在衙前圍道一間比較寬敞的住宅。隔鄰又是九龍仔公園。當我們都返了工或返了學，他就獨個兒往九龍仔公園散步運動，隨後便往九龍城街市買餸回家。我在石硤尾銘賢書院教書，每個中午都回來吃午飯陪他，然後趕回學校上課。這時，家姐的第一個兒子出世，每逢孫兒來探問他，總是歡歡喜喜跟承翰玩門鈴，每次他按鈴，承翰就笑了，他也隨着笑起來享受一下弄孫之樂。

那時，我開始對神學感到興趣，並在播道神學院選修一些校外課程，又把所學到的寫成一些護教文章及研經資料，福音性研經一書便是在這段時期君玉和我寫成的。每逢我寫了一些文章，總是請他批閱。一方面他也樂意効勞潤飾我的文句，並提出他的意見，另一方面我是藉此希望幫他對基督教信仰有進一步的認識，再加上我們儘量每星期舉行家庭崇拜，請他當主席，我則帶領研經，如此他在靈命確有成長。如保羅說：「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不久之前，我有機會看到他在這個時期所寫過的一篇手稿，是他寫給

友人李士牧師的信，心中很得安慰。他說：「我日中無聊，除了寫字讀書外，總是覺得空虛，我很願意還有微力的時候，將這空間奉獻給上帝，今年暑假開始，我將願意把在嘉樂路的屋宇收回，計劃開一所小規模的佈道所，因為當地徙置區的兒童，如果沒有人向他們傳福音，這真是將來有莫大的危險。」他寫了這封信幾年後便離開世上。1980年代，香港政府收回父親所說的屋宇，賠了一筆可觀的數目給我們，之後，我亦按他的意願把這筆賠款之部份奉獻給我所服事的播道會，在屯門開設了蘇森幼兒院，並在該院開始了播道會山福堂。

父親到了一生最後一程，身體雖然漸趨軟弱，但想不到他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竟然排除心理及生理一切障礙，活得精彩。他在68歲那一年，曾有這樣的感受：語云「鳥倦知還，人生總有作息的時候，回首68年期間，對國家、對社會、對朋友，在功在過，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由今年68歲以後，在世之日多久，能否再幹一番事業，或從此湮沒無聞，且待我和認識我的人，留待作一定論。」作為他的兒子，我可以說，他末後這幾年，因着主耶穌的恩典，雖不致是「再幹一番事業」，但卻非常有意義地投資了他的生命，正如蘇東坡所說：「荷盡已無擎雨蓋，殘菊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我和君玉一直都打算赴美攻讀神學，希望好好預備自己作傳道人。然而，一想到父親的情況，我們又怎能把他丟在香港呢？家姐已成家立室，穎智仍在就學。我們實在不忍心留他而去，所以一直都沒有告訴他及家中任何成員，只在禱告中默默地等候。然而，踏入1972年，我們便正式向美國費城的西敏寺神學院申請入學。

1972年3月14日，我早上起來，正預備返工之際，父親忽然對我

說：「我昨晚發了一個很奇怪的夢，夢見與鄭信榮牧師及顧姑娘等一同歡聚，吃飯。正當我們很高興傾談時，忽然感到心口一陣劇痛。我就醒過來，片刻間便恢復過來。我問他：「你一直都有與他們保持聯絡嗎？」他答道：「沒有，自從1950年以來，我們已經失去聯絡，他們亦早已安息主懷，我也不知何解他們竟然在我夢中出現。」

那天中午，我回家吃午飯，父親精神很好，而且還一早預備好飯鏇，吃完飯後，我便要趕回學校上課。到了下午，因為和學生一起玩籃球，所以直到5時許才回家。他一看見我就說：「穎睿，我今天覺得不大舒服，你可否到街市買一些魚煲粥給我吃！」我當時有點疲倦，便對他說：「你中午還是非常精神，怎麼這快便感到身體不適？這是否你的心理作用呀？」他聽了很不高興，便說：「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怎麼心理作用呢？如果你不願意去，算了吧！」我知道我說錯了，便連忙向他道歉，然後趕快往街市買魚給他煲魚粥吃。回來的時候，他問我是否感到很疲倦，我們父子2人和好如初，彼此握手，大笑起來！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傾談，那晚，他心臟病發。起初我還以為他坐在椅上打瞌睡，便想扶他上床，才發覺他已經昏迷，呼吸也很微弱，我有點恐慌，連忙送他入了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但經醫生檢查後，證實他已經離世，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早我們一步去到更美的家鄉！在世享年七十有三！我猜想他在前一晚也曾有心臟病發，可能已經上了天堂與他的好朋友重聚，神卻叫他在世多渡一天，與我談心後才返回天家！不但如此，我也不用擔心在我們去了美國後他會如何面對孤寂的日子；想起來：假如他是在得悉我們往美國後才離世，我們一生都會感到內疚。「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這話是真的。

異民篇

第二十二至二十五章



第二十二章

銘賢歲月”



在2020年間，我無意看到香港左派報紙，刊登了差不多有百多名人仕的名單，指控他們是搗亂香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在這名單中，赫然發現我昔日在銘賢中學教書時的校長京力士(Rex King)榜上有名，這真使我摸不著頭腦。京力士是紐西蘭人，他在香港數十年，曾擔任過銘賢中學，英華中學校長之職，後來轉到香港考試局任副秘書長，他早已退休，返回祖家，現在於澳洲定居。他既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在2019-2021年之學生運動期間，他根本就不在香港，也沒有發表任何有關這次學生運動的言論，怎會是搗亂香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令人感到莫明其妙！

經過一連串搜索，我終於找到這些建制派人仕的理據和因由，他們的邏輯思維，實在使我大開眼界。現在的特區政府，把這學生運動歸咎於港英政府於90年代所推行的通識教育，而有些人以為京力士是通識教育科的祖師。他不單構思了6大單元的名稱(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於1990年為該科擬定課程範圍，並於1994年更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開設高級補充程度的通識教育科。據京力士稱：「通識教育科有先進的意念，我們推出這科目，是為了嘗試打破死記硬背的傳統學習方式。當時的中6課程通常分為純理科和純文科，我們也希望改變這種不適當的專門分科情況。這科目可算十分創新，其課程範圍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全由問題組成，故後來為了回應教師反對聲音，我們以註腳形式提供如何教授各項議題的建議。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宗旨與目標，是訓練學生的獨立思考，創意思維，擴闊視野，並認識世界在發生的事情。以突破其他科目專門但狹窄的世界。」

當京力士極力推介這通識課程時，為了協助教師了解這新科目，就印製和派發通識教育科的小冊子，在這小冊子中，出現了一幅漫畫：當校長宣佈這新科目時，全體老師都爭相逃避，有些藏在枱下，有些甚至偷走！這漫畫引起當時很多教師抗議，京力士有見及此，便立即改了這幅漫畫，把逃避和偷走的教師改為積極參與討論，舉手發問和發表意見，這才平息這場風波。京力士後來接受訪問說：「或許這就是「鬼佬」的幽默感與中國人的幽默感相異之處。」我想，時至今天，問題倒不在文化上的差異，而是對教育理念之不同：究竟我們教育學生有獨立和批判的思考能力，抑或教育只不過是統治者洗腦的工具吧了。但若是如此，便把「搗亂香港，分裂國家」的罪名加諸於京力士身上，實在令人感到可恥和可笑！

事實上，京力士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教育家。我和他在銘賢中學共事3年，我對他的為人，教育理念和對學生的關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本來是以一個傳教士的身份來到香港，初期在何福堂中學任教，1966年中華基督教會在石硤尾開設銘賢中學時，他便被委任為創校校長，我是於1969年畢業於港大，隨即開始在銘賢執教，主要是教授中國歷史、聖經、翻譯和國文。

我初到銘賢任教時，學校年日尚淺，最高是中5，只有兩班，其餘中1至中4都有4班，當時的香港中學有四類：

- 官立中學(如皇仁中學)
- 補助學校(如華仁中學)
- 津貼中學(如銘賢中學)
- 私立學校(如新法書院)

所謂津貼中學，是指學校管理交由辦學團體負責，他們要負起籌辦費用，其餘教職員薪津及經費等都由政府承包。大部份的香港中學都屬於津貼學校，而中華基督教會是一個頗具規範的辦學團體，轄下共有25間中學，其中包括最具資歷的英華書院。

在70年初的銘賢，大多是年青的老師，而校長京力士也只不過是30出頭的年青人。初到銘賢時，我發覺銘賢是一間與眾不同的中學，廁所竟有廁紙供應！（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我在皇仁中學讀書的時候，廁所是沒有廁紙供應的），更令我感到驚奇的，學校設有一位全職護士駐守，負責全校學生之護理工作，不但如此，每星期一次有一位醫生臨校替學生免費診症，和提供藥物。我相信銘賢是全港唯一的中學有如此的學生福利，我不禁問道：「經費是從那兒來的呢？」後來我聽聞其中的因由，原來京力士是紐西蘭教會差派來港的傳教士，他的房屋，生活均由教會提供，於是他便把他所有當校長的薪金，全部捐給學校，以支付那些額外的費用！究竟這是否屬實，我沒有考究過，但觀其生活簡樸，及其教育理想，雖不中亦不遠矣！

銘賢有一個特別的傳統，由於它位在石硤尾與東頭村之間，這都屬舊型徙置區，大多數的學生都來自貧窮的家庭，他們要申請免費學額攻讀。所以每年學期初，全體老師都要出動家訪，實地調查他們的家庭狀況，然後向校長作出報告。我覺得這家訪非常有意義，一方面可以查實他們的家庭及經濟狀況，一方面更加強我們對學生的認識。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是透過這些家訪，與一些同學建立了關係，他們也樂意來找我解決他們一些家庭問題，我想到一位住在東頭村木屋區的同學，在一次颶風襲港中，痛失家園，不少家具都被大水沖走。我們組織一隊救援隊，一同到他家中清理泥沙，修補破屋。幾十年後我們仍保持聯絡！這份友誼是非常珍貴的。

作為一個留在香港作傳教士的京力士，他有一大缺點；就是不懂廣東話，我有時要權充他的翻譯，與他一同走訪一些有問題的家庭，印象至深刻的是一位中5姓袁的學生，他很沉靜，而且非常孤獨，他在銘賢創校時已經入讀，但成績非常惡劣。我們老師們只知道他每天放學後都要留在校長室做功課，當京力士校長放工時，便和他一同回到校長的寓所渡宿，每天都是如是，只有在週末時才回自己在石硤尾的家。1971年京力士放長假，要回紐西蘭探望他的母親，所以這同學也返回自己的家。我沒有教這同學，與他也不相識，但我有一個學生與他是好朋友。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約了這位同學一同到政府大球場看南巴大戰，他希望我也邀請這袁同學去看比賽，我欣然答應。但到了星期日下午，他爽約，沒有來和我們一同赴大球場，也沒有告訴我們的原因。翌日回到學校，我才知道這同學在星期日傍晚在石硤尾被人追殺，砍了幾刀，傷重身亡。後來我才得悉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兇殺案。原來袁同學是在荔園舞廳當巡場，他以前也屢屢犯案，校長於是要他每天放學留在校長室做功課，並且跟他回家渡宿，企圖協助他離開那複雜的環境，誰知京力士因要回祖家一行，袁同學就出了事！我後來有機會和校長家訪袁的母親，才發覺原來他已結了婚，並且有一個1歲大的小孩。這真是一個悲劇。

其實，在銘賢，有不少學生來自非常複雜的背景，有一位中4的女

同學，母親離了婚，與一個男士同居，她晚上要到一間舞廳當舞女，這同學不久就輟了學，失去了音訊。在70年的香港，像這樣的家庭，比比皆是。位在石硤尾的銘賢書院，實在起了極大的作用，不少同學非常自愛，出於污泥而不染，他們家庭背景雖然複雜，家境貧寒，但因努力讀書，學有所成。家庭環境得以改善，以致銘賢在過去50多年歷史中，製造了不少傑出人才，如資深大律師陳志海，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系教授黃寶財，東華三院呂潤財記念中學校長叢蔣漢等。

銘賢是中華基督教會轄下的一間津貼中學，然而它的基督教氣氛並非十分濃厚，早會時有約5分鐘的靈修時間，課程中亦有聖經科，學校亦有基督徒團契，學校隔鄰是中華基督教深愛堂，牧師是郭乃弘，他也是港大畢業生。然而，深愛堂與銘賢是沒有多大往來，河水不犯井水。所以，校內教師並沒有感到任何來自教會的壓力，其實大部份老師都不是基督徒。我在銘賢執教3年，除了教授中4，中5的聖經科外，還協助團契的發展，與我一同事奉的還有幾位老師，但我是唯一一個團契的男導師。

在70年代，香港政府在中學會考中設有Biblical Knowledge (B.K.). (聖經知識)一科。主要是研讀共觀福音書其中一書。大多數的學生對此科興趣不大，況且在會考的成績表上，此科是優是劣對學生的前途絕沒有影響，可說是「可有可無」，只不過學校規定要選修B.K.他們只有無奈地接受，但對教授這科的老師來說，卻是一大挑戰。我發覺若我同時教導他們中國歷史一科的，同學們愛屋及烏，也比較容易接受我教授B.K.這一科。然而，這一科的設計及目的，就存在著很多基本的問題。由於這一科是不問神學立場，也不涉及教義上的分歧，無論天主教、基督教都答同一試卷，所以所有問題都盡量避免經文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釋義上的分歧，而集中問及一些皮毛、表面、字面上的知識；這是非常枯燥乏味，也毫無意義的。老實說，不但學的難以投入，教的也不覺有趣，只是為了滿足學校的需求吧了！所以，當我教授這一科時，盡量提及一些與他們切身的問題，與他們討論，然後派發一些筆記，幫助他們應付會考之用。

然而，我發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銘賢教書的時候，每星期都在課餘時間舉辦一些福音性研經班，歡迎所有同學或老師參加。在全盛時期，我曾經一個星期開辦了4-5次這樣的研經班，參加者都是自願的。他們的反應與B.K.課堂時的反應真有天淵之別，他們積極的參與，討論發問，而且對我們討論到的人生問題，信仰問題都發生極大的興趣和反應。何解有如此大的分別呢？我們讀的同是福音書，是有關耶穌的言行，但在B.K.課堂中，他們毫無反應，也不感興趣，但研經班中，卻是截然不同，極感興趣。究其原因有下列幾點：

- 一是自願，一是被迫
- 一是小組討論，一是課堂聽老師齋講
- 一是粵語對白，一是英語授課
- 一是有切身關係，一只是聖經常識傳播

所以，我是非常質疑基督教中學教授聖經這一科的效用和目的。

我除了教授B.K.這一科外，我主要是教導中4至中6的中國歷史，預備他們會考和港大入學試的中國歷史科。在我中學時代，中史附屬中國文學與歷史這一科的，只佔全卷的20%-30%，但到了70年代，中國歷史便成為會考和大學試獨立的一科了。港英政府設立了一個非常古怪的制度，在英文會考的課程中，有歷史(History)這一科，

但同時也有中國歷史這一科。其實，歷史這一科並不只是涉及歐洲歷史，而不少課程是涉及中國歷史的，其分別是：「歷史」是用英文，「中國歷史」是用中文；這是模仿港大文學院的分科制度，在港大文學院中，設有歷史系和中文系。歷史系是用英文教授，但其中不少的課程是涉及中國歷史的，而在中文系中，則設有文學，翻譯，考古，哲學和歷史，所有這些科目都是用中文的，正因如此，在中學會考和港大入學試中，便有「歷史」和「中國歷史」這兩個不同的課程。

嚴格來說，「歷史」與「中國歷史」之區別並不止於語文之不同，他們的歷史觀及對歷史研究的看法也有極大的差異，前者是用西方治史方法，後者就用中國傳統的治史方法。我還記得在港大讀書的時候，科大衛(David Faure)在《學苑》發表了一篇文章，狠批中文系中國歷史治史方法，對中國歷史教授的著作更評為不合流不科學。究竟這位日後成為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的科大衛是否言之有理呢？作為一個港大中文系主修中國歷史的畢業生，及在中學教授中國歷史的老師之我，又如何回應這問題呢？

無可否認，歷史教學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嚴肅的課題，歷史教學則與我們對治史的方法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方學者所稱為Historiography正是指我們如何去闡釋昔日所發生的事件，這包括它們的真實性，相關性和意義。套用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說，所有事件都有著一種連帶或因果關係，歷史家便要嘗試把這些事件(dots)連在一起，以此來解釋歷史發生之來龍去脈(connecting the dots together)，對von Ranke來說，所有事件都是上帝安排發生的，缺一不可，彼此相互效力，一同讓上帝所導演的這齣戲得以開展下去，這就是「神本主義」的歷史觀。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雖然現在不少歷史學家對這種「神本主義」歷史觀有所質疑，但他們並沒有否定Von Ranke所提出的事件內在關聯性(internal connectedness)，他們只不過用另一種前設(presupposition)去連結這些事件，這前設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律了(law of nature)，以自然(nature)來抗衡超自然(supernatural)的歷史觀。套用前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李弘祺的話，他們用一個客觀和自然的律例去連結所有這些事件。我試用下面一個例子來闡釋，以色列於587 B.C.亡於巴比倫大帝國，舊約聖經的作者則歸咎於以色列人背叛神，神就藉巴比倫來懲治以色列。這絕對是一種神本主義的治史方法，但今日歷史學家則歸咎於以色列國的積弱和巴比倫在經濟及軍事上之擴張來解釋以色列亡國因由，這就是李弘祺教授所說的客觀化治史法，也是西方主流的治史法。

然而，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所謂「客觀」其實也是一種主觀的前設(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西方歷史家以這一套自然律去連結所有這些事件；中國史學家也有他們的前設(presupposition)，我們就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為例，這是一本投考港大入學試時常用的教科書，這書是一本帶有強烈民族使命感，令經歷過抗戰的中國人血液沸騰的作品。他的前設就是以儒家思想和民族主義來連結這些歷史事件。然而，當學生預備投考港大入學試的歷史(History)科時，他們大多會採用Mary C. Wright的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興：中國儒家的最後抵抗)。跟隨錢穆的歷史學生，當然不能接受Mary Wright對儒家的看法了！因為他們的前設根本就有差異。

今日的香港教育局，對中國歷史科又再加大修改，他們卻有著另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前設與使命，這當然與我們昔日讀歷史的人，無論是採

儒家思想為前設的或是西方自然律例的前設都感到沮喪。

作為一個基督徒，又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學生，我倒接受耶魯大學教授Harry Stout的看法(“Biography as Battleground: The Competing Legacies of the Religious Historian,” Books & Culture 2 (July/August 1996) pp.9-10)他把歷史分為二類：第一類他稱為Temporal or Mundane History。第二類他稱為Providential History。所謂Temporal or Mundane History是指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如經濟、社會狀況、政治，或其他自然因素去連結所有這些歷史因果關係。所謂Providential History是第一因，一切都是出於永生神之手，祂是掌管一切宇宙萬物，也包括歷史的進程。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歷史觀，其分別就是在這裏，基督徒不但相信第二因，更相信第一因，但非基督徒就只相信第二因，把上帝踢出歷史以外！

我相信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我們必須持著一種謙虛的態度，歷史會不斷改寫，沒有所謂「蓋棺論定」這回事，我們莫以為一旦修入正史，就可說是「論定」了，但隨著不斷有新資料出現，我們對歷史的真相及正確會有不同的看法。就好像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少時砍斷櫻桃樹的故事，不少美國人以為是真的，但現在絕大部分的史家都懷疑它的真實性。正因如此，我深信政府應該退出歷史課綱的編制，讓史學家有著自由空間作研究，而學生也不用全盤接受老師的結論，視之為經典。就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為例，雖然是一本難得的歷史書，但它的內容和結論，其實有許多可以檢討的地方，作為一個歷史教師，我們要教導學生們有批判，獨立的思想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為了分數而犧牲這寶貴的求真慾望！

話雖如此，當我在銘賢教中國歷史這一科時，很多時我還是要預備

學生應付會考，要求他們牢記一些史實，而沒有時間去討論一些有趣及深入的歷史研究。不過最令人感到遺憾的，就是在整個中、大學的中國歷史課程中，竟然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中國近代史摒於門外，似乎有意令我們這一輩的香港人對我們身處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空白一片，究竟因由何在？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制度下教授下代中國歷史，是否有其價值？3年後，我決定離職前往美國攻讀神學了。



費文拉比(Rabbi Edwin Friedman)在他那本Fables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稱是「橋」(The Bridge)。

有一位仁兄，早年生活潦倒，胡胡混混，浪費大好青春，後來他痛改前非，決心找一些有意義的工作。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找到一份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於是他便收拾行裝，踏上征途，預備過一個新的生活。

在旅途中，他要經過一條橋，橋下面是一條激流，波濤洶湧，若不留神，跌下河中，命不保矣！正當他小心翼翼渡過這橋，忽然看到迎面而來一個陌生客。當他們行近時候，這仁兄發覺這陌生人竟然與他極相似，無論相貌，身裁，衣著都非常相似。再行近的時候，發覺這陌生人有點古怪，他全身被一條長若30多呎的繩索纏著。難怪他走路時有點蹣跚，但見他一手執著繩的一端，一見到這位仁兄時，喜出望外，便對他說：「對不起，不知你可否幫幫忙，替我執著這繩端，以致我可以鬆解那纏著我的繩索！」這位仁兄當然欣然答允。這陌生人連聲多謝，並再三吩咐說：「請千萬不要放手，你要雙手牢牢的握緊這繩端！」誰料，他行不夠幾碼，忽然一股很大的力把他扯後，他望望後面，發覺這陌生人已跳下橋，在空中吊著，並且大聲呼叫說：「快快把我扯上橋！否則我會墮入河中！」這位仁兄大聲對他說：「你作了什麼？為什麼會墮下？」這陌生人回答說：「不要問！你答應我永不放下繩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若你不把我扯回橋上，我會墮入河中死亡！」這位仁兄極力企圖把他扯上橋，但他無法做到，相反的，他反而一路被扯往橋邊，形勢非常危急，若他不放手，他自己也會一同墮入河中！於是他企圖尋求一些方法可以救那陌生人，但四處無援，也沒有找到一些東西可以借力。忽然他想到一個方法，於是便大聲對下面的陌生人說：「如果你想不墮入河上，你一定要盡上你的本份。我在上緊握繩端，但你必須盡力沿著繩索爬回橋上，我在此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你必須盡上你的責任和本份，否則我也無能為力，生與死的關鍵，就在乎你的抉擇，是你的抉擇，不是我的抉擇！」誰料那陌生人說：「這是你的責任，你不可這樣自私，食言，你必須把我扯回橋上，否則我會墮下死亡，你一生都會內疚。」這陌生人完全不理會這仁兄的提議，一點也不動，只等待這位仁兄把他扯回橋上。

最後，這位仁兄只能對他說：「這既然是你的決定，我也不能作什麼了！」於是他便放下繩的一端，那陌生人立即墮入河中不見了。他繼續踏上征途，期望著一個新的生活！

我對費文拉比這個寓言有以下解讀：

1) 這是有關身份的問題 (The questions of identity)，簡言之：

「我是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過去的我」(The past self) 及「現在的我」(The present self)。這個「陌生人」就是這位仁兄的「過去的我」，而這仁兄是「現在的我」，這「過去的我」往往被長長的繩索困綁著，叫「他」失去自由，我稱之為人的幽暗面，這可能是我們的家庭背景，人生不幸的際遇，失敗的經歷等；以致影響我們對自我的看法及與人相處之道。

我母親的死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5歲那年，一早起來就發覺

母親和弟弟妹妹都不見了，只剩下父親，姊姊和我3人；父親只是輕輕的告訴我們，母親已經帶著弟妹返回鄉下。未幾，我們便聽到母親受害，受壓及最後懸樑自盡。除了看到父親的悲傷，恐懼，憤怒和內疚外，我一點也不敢追問，對整件事情也一無所知；只知道弟弟由在鄉下的姑母撫養生活非常困苦，妹妹則不知所踪。我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境況中長大；雖然在我腦海中有意無意把我童年的回憶及有關母親的記憶完全除掉，但心中的不安全感，生怕忽然在一剎那間便失去最親的人，一直纏在我心中。我長大後，我這種「過份保護」的性格影響我與家人的關係。若不是我信了耶穌，對生命有著不同的解讀，否則這幽暗面會一直纏者我的一生。

- 2)第二是有關「抉擇」的問題，這位仁兄如何解決他的掙扎和矛盾？他一方面要面對他良心的問題，他既應承這陌生人要手握著繩端不放，他就不能食言，這是誠信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他沒有理由與這陌生人同歸於盡，更何況他正在踏上征途，立志過一個新生活。陌生人就看到他這矛盾，把責任推在他身上，他個人的存亡就繫於這仁兄之抉擇！然而，這仁兄巧妙地把這責任推回到陌生人身上，他不是陌生人生死存亡之關鍵人物，這陌生人才是他自己生死存亡的決定因素，他向陌生人提出一個挑戰，他要決定是否沿著繩索爬回橋上，這仁兄只是一個輔助者，而不是一個決定者，若那陌生人決定不願負上這責任，不去盡力沿著繩索爬回橋上，他也無能為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Victor Frankl 是世界著名的精神科醫生，當他被納粹德軍囚在集中營時，親眼看到那些像禽獸般的納粹德軍取去他的父母、妻子、自由、尊嚴，當他感到最軟弱、最憤怒、最無助之際，他突然悟出一個真理：無論德國人有多大的能力，他們總不能剝奪他內心的抉擇能力，他可以選擇放棄、自憐，亦可以選擇繼續奮鬥下去；他可以選擇憎恨，亦可選擇寬恕，這抉擇的主權是沒有人可以奪去的。正因如此，他勇敢地面對最惡劣的環境，成為世界著名的精神科醫生，他所創立的 logotherapy 成為千萬人的幫助。

不少人以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切都是命運注定，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認命。一位牧師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婦人，丈夫拋棄了她，兒子吸毒，女兒離家出走，她一無所有，內心充滿苦澀、憤怒，整日借酒消愁，她覺得自己命運不好，無力繼續生存下去，牧師對她說：「你覺得世界很不公平，你好像被囚在獄中，什麼也不能作，對嗎？」婦人對牧師說：「對呀！你真的了解我！」牧師跟著對她說：「你有何打算？」婦人說：「我可以作什麼？我落在如此地步，命運偏偏針對著我，我還可以作什麼？我只有坐而待斃！」牧師對她說：「不要忘記，監獄的門匙是在你手中，你可以選擇破門而出，你亦可以選擇在獄中渡過一生！這是你的選擇，除了你以外，沒有人可以替你作此決定！」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個抉擇，一個生死的抉擇，我們稱之為「決志」。這正如存在主義大師祈克果所說，信是一個跳躍 (faith is a leap)，跳出深淵，跳出昔日纏著我們的幽暗，憑著信朝向新生命的方向走。1972 是我一生的轉捩點，這一年，我決定與太太離開了我們的安樂窩，拿著不夠一年的費用，毅然前往費城的西敏寺神學院攻讀神學。為什麼我們會

作如此的決定呢？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多大安全感的人，我不會隨便冒任何險，「維穩」是我人生的座右銘。此時我和太太都有優薪厚職，正如不少香港人一樣，期望買樓買車，生兒育女，安安樂樂，平平穩穩在香港渡過餘生。現在想來，也驚訝自己有如此勇氣，突破自己的幽暗，踏上征途。然而，我肯定這並非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帶著使命和異象投身在這從上而來的召命。

1960年代的香港教會，因著基督徒學生運動之興起而興旺起來；其中有不少從中學及大學團契認識了基督教信仰的青年，開始加入地方教會；並且很快成為教會的領袖，他們不少是從事醫生、律師、教師、工程師、社工等專業，是社會的精英和骨幹，但是當時香港大部份的傳道人都是沒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學畢業後便進入聖經學院接受訓練；大多數傳道人都沒有在社會工作的經驗。在聖經學院的訓練亦未必能體會不少這些知識份子的掙扎和需求，於是教會便往往起了矛盾和衝突。另一方面，教會長執往往是非常保守，他們常錯引聖經說：「知識叫人自高自大，唯有愛心能造就人」，他們反智的態度更令這些知識份子反感，以為他們的信仰與社會格格不入。相反的，他們在校園團契所領受的，令他們大開眼界，以致不少教會長執視校園團契如洪水猛獸，這是極不幸的。

自從進入香港大學後，我參加了港大團契的讀書小組，先後唸完不少頗有份量的神學經典，包括 C.S. Lewis 的 *Mere Christianity*, John Stott 的 *Basic Christianity*, Louis Berkhof 的 *Systematic Theology*, F.F. Bruce 的 *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John Bright 的 *The History of Israel*, J.I. Packer 的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 Donald Guthrie 的 *New Testament Documents*，令我大開眼界，對神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後，我常被邀請到各教會的青年團契講道，帶查經等，使我對牧養工作感到極大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興趣，再加上我在銘賢學生中，及教會中不時當起輔導工作，我更開始考慮應否當牧養工作。這呼召是來得非常自然，漸進和肯定的；到了1971年，我心志上已決定了，我不是問：「我為什麼要當傳道人？」而是問：「我有什麼理由去拒絕這個呼召？」是因為這個異象和使命，催迫我突破我自己內心捆鎖，願意憑著信離開我的安樂窩，接受神這個呼召！

話雖如此，我亦要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才能成行。我心儀的學校是費城的Westminster神學院，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的：人的青春是寶貴的，我既預備投資我幾年的青春來接受神學訓練，我當然是揀選我認為最好的學校！Westminster神學院有許多頗有份量的教授，而且秉承了加爾文改革宗一派的神學精髓，這正是我心儀的學校，所以我決定離開香港，踏上征途，闖闖天下！

首要實際問題便是君玉的看法，若她並沒有這負擔和異象，這一切的理想都是枉然。所以，當我決定表明我對她的愛意時，我坦白清楚和她分享我這個計劃和異象。感謝主，原來她早在半年前已經有此負擔和異象。想起來如果我不是聽那弟兄勸我耐心等待，早於兩年前提出，可能君玉那時還沒有預備好，會因此而拒絕我（參看第二十章《等待》）。真是「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第二個問題則更是困難---照顧我父親的問題，我記得當我與君玉打算結婚，曾想過離開父親和弟弟穎智，自立一個家。當父親得悉我們有此計劃，他整天忐忑不安，非常憂慮，我們有見及此，再三在他面前保證我們婚後仍與他和弟弟同住。剛好那時，一位朋友因公務要舉家赴英兩年，又不想空置在港的居所，於是便以便宜的租金租給我們，於是婚後我們便搬到這間一廳三房的單位。如果我們在此時要離開他遠赴美國，他一定非常不高興的了！所以我們只能按兵不動，對我們赴美攻讀神學的計劃，

完全保持緘默。我們是在1971年8月14日結婚，婚後一切如常，內心只有禱告等候適當時機，但自1972年初，我們已經靜靜地開始申請學校了！我們與家人共同生活了超過大半年，生活相當愉快，父親非常尊重君玉，我們一家每星期都有家庭崇拜，只是弟弟常返回大埔，所以未能常與我們一起。

1972年3月14日，父親突然心臟病發，息勞歸主，雖然我們心裏非常難過，但想到他已經去到一個更美的家鄉，正如在第廿一章所說，神真眷顧我們，為父親預備一個最適合的地方，以致我們不用為他孤寂在港而感到焦慮和內疚。我們亦可以無憂無慮的踏上征途！至於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得蒙一對剛結婚的朋友替我們承租一年，而業主亦欣然答應，我們便於8月離開香港，是我們人生中第一次橫渡太平洋，遠赴美國。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創校1929年，當時，普林斯頓(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學院新約教授J. Gresham Machen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包括John Murray, Oswald Allis, Robert Dick Wilson及Cornelius Van Til眼見普林斯頓神學院偏離傳統的改革宗信仰，改而容納自由派神學壟斷整個學院，他們毅然離開普林斯頓，在費城創建了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自創校至今，已經有90年的歷史，在過去90年，培育了不少出色的神學家和牧師，對整個美國，及整個福音派的世界有著極深遠的影響，其中Francis Schaeffer, Harold Ockenga, John Frame, Tim Keller, Wayne Grudem, Vern Poythress，鮑會園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父親去世後不久，我們收到Westminster神學院來函，正式接納我和君玉入學，更令我感到喜出望外的就是給予我一個足夠支付我整年學費的獎學金，另附上美金\$400的旅費，對我們來說，真的減輕了我們不少經濟

負擔。此外我們所屬的教會般含道福音堂，有不少弟兄姊妹非常關懷我們，願意愛心奉獻，幫助我們所需。雖然數目不大，但這對我們來說，卻是極大的鼓舞！我和君玉就在1972年8月，懷著興奮的心情離開香港，踏上征途，啟開我們人生新的一頁。



與同學攝於
Westminster Seminary。

第二十四章
承受清風

我和君玉是在1972年8月抵達美國費城，寄宿於費城西敏寺神學院的宿舍，一直至1975年畢業。其後一年，因成績卓越，獲西敏寺神學院獎學金，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深造一年，於1976年才返回香港，正式開始我牧會的生涯。在美國四年，無論是讀書，在教會實習都令我們大開眼界，叫我們不但在神學訓練上得造就，更擴闊我們的視野。

70年代的美國是重要的一個年代，我們剛抵步不久，便從電視新聞知道轟動整個世界的慕尼黑慘案。此事發生於1972年9月5日第20屆夏季奧運會的西德慕尼黑，是一宗駭人的恐怖事件。策劃這次恐怖行動的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黑色九月」，而襲擊的對象是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因營救過程中慕尼黑德國警察出現嚴重失誤導致代表團11人全部身亡。在這次事件中，除了11名以色列代表團成員被殺外，另外5名恐怖份子及一名德國警察都被殺身亡。有3名恐怖份子被捕，但同年在一次西德航機被騎劫中，西德政府順從劫機者要求，把這3名恐怖分子移交利比亞釋放。事件發生後，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梅爾夫人，下令以色列情報特務局（簡稱摩薩德）特工組成的「天誅行動」，暗殺11名黑色9月之武裝人員，成功把其中10名除滅。

這本來是一件大事，但奇怪的在神學院裏，甚少人（無論是老師或是同學）提出及討論如此震撼的一件大事。不但如此，在學院裏也很少有機會聽到老師及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同學們論政及陳說政教問題。回顧70年代的美國，其實在國內或國外都充滿了挑戰，國內反越戰的情緒越來越高漲，新任總統尼克遜卻以為立即撤兵會是一種示弱的表現，他更下令猛炸北越，並派兵入侵柬埔寨，企圖迫使北越談判；而另一方面又施壓南越政府負上更大的防衛責任。但這卻激發起學生暴動，於1970年5月4日在Kent University引起示威者與警察衝突，有兩名非裔學生示威者被殺，國內的反戰運動越來越激烈，尼克遜決定在1973年開始撤兵。

不過，在美國歷史上最轟動的莫過於水門事件了。尼克遜於1972年大勝獲選連任。但在1972年6月，警察發現尼克遜競選委員會下令竊聽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競選委員會的辦公室。尼克遜不但沒有處理事件，更下令FBI停止調查此事。終於在1974年4月，國會通過彈劾總統。在未進行審訊程序之前，尼克遜決定辭職，由副總統福特代任總統，並不追究尼克遜是否有犯罪，這引起國內不少美國人反感！

其實，在70年代的美國，隱藏著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所謂「被壓制的團體」，如非裔人士，同性戀人士，女權主義者等紛紛出來要求平權，國內更湧流著一股「自由主義」的風氣，崇尚性開放、吸大麻、重視個人的權益，這種嬉皮士的文化充斥整個年青人的世界，尤其在西岸更甚。但另一方面，國內又呈現一種「新右翼」的政治運動(New Right Political Movement)。他們反對這種自由主義，更不滿社會離棄傳統的價值觀；強調政府要還政於民，不應事事由政府操控，反對一個大政府政策。這種對立孕育於70年代，隨後的幾十年，就越來越明顯了！

我大感迷惑的地方是：為什麼在神學院裏，老師和同學們是極少討論這些課題，並提供一個基督徒的立場呢？我以為我們在香港這殖民地，身份不明不白，既不是英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更沒有「香港人」這個意識，

又怎會談起當政的問題呢？況且，香港又沒有民主制度，誰作「總督」，我們都沒有份兒參與，能夠在香港擁有自由，似乎大多數香港人都心滿意足了！為什麼那些擁有民主制度、選舉權、自由的美國基督徒，好像我們香港人一樣，國事、天下事、事事不關心呢？有趣的地方是：我們在神學院經常聽到的課題是：自由神學(liberalism)，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等，似乎是與社會脫節，是極離地的！我心中有著疑問：這樣離地的信仰，怎樣可以訓練一個牧者在這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牧養他的群羊呢？

經過3年的神學洗禮，尤其是 Van Til 教授的護教學，我開始明白西敏寺神學院的理念和策略。首先，我們要明白在20世紀70年代，基督教教會面臨的是什麼挑戰。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指出，20世紀兩個思想主流：進化論、心理分析都是非常世俗化，叫人拋棄一切超自然的信仰。

我們先談「進化論」這問題，自從19世紀以來，自由派神學主義是受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影響，所謂自然神學是指反對一切有超自然元素(supernatural elements)的神學和信仰，他們以為一切不合乎科學根據的都不是真的，只是神話吧了！一個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怎會相信死人復活、五餅二魚吃飽5,000人、一句「你潔淨吧」就可以治愈患癲瘋病的人？這都是不合乎科學的神話故事，不是真的，在自然神學的影響下，科學至上，不少神學院開始轉向自由派，他們高舉理性，否定聖經所載的神蹟，視為神話故事；到了20世紀初年，不少美國的神學院及教會都走上這條自由神學的路。不但如此，達爾文的進化論更是席捲整個美國，引起不少保守派的基督徒不滿，最後導致在1925年著名的所謂Monkey Trial事件。

這訴訟對整個美國，尤其是美國的教會有著極深遠的影響。事緣於1925年3月25日，田納西州議員 John Washington Butler 是一位農夫，也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World Christian Fundamental Association的主席。這組織是美國長老會的信徒設立，目的是為了維護聖經的權威，強調聖經的創造論才是真理，反對一切有關否定聖經權威的教導。他就是利用立法程序，成功地立下所謂Butler Act，禁止所有政府中學老師在校教授進化論，他後來坦然承認對進化論所知無幾，只知道不少學生在學校聽了生物學老師教導進化論後，回家告訴父母：聖經是錯謬的。

美國的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對此法案極表不滿，於是乃與一位田納西州代課老師John Scopes合謀，故意在校教導進化論，因而被控，在Dayton這個小鎮受審。雙方都聘請全國著名的律師替他們答辯，控方有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是長老會信徒，也曾3次競選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是當時著名律師與政治家。而代表Scopes的是Clarence Seward Darrow，他是當時著名律師，也是ACLU的主要成員。經過12天的審訊，陪審團只用了9分鐘時間便決定判Scopes罪名成立，被判罰款100美元(相當於今天1,500美元)，而Bryan在這審訊結束後不夠一個星期中風身亡，究竟這審訊與他的死亡有沒有關係，則不得而知！

表面看來，教會好像是在這次訴訟事件中勝了一仗，但歷史卻告訴我們，美國保守派教會卻是因這場官司而慘敗。何以見得？只要我們看看以後歷史發展便一目了然：

- 這次審訊的氣氛真有點滑稽，每天法庭都坐無虛席，超過600人聽審，主審法官John Ranlon企圖在室外進行聆訊，以便有更多人可以聽審。周圍都貼滿海報，橫額，寫著「神是愛」「每天讀聖經」「你往那裏去尋永生？」「你需要神」，儼如教堂外佈道會的宣傳，每天都有不少國內國外記者到場報導審訊情況，遠至倫敦及香港都有記者報導，而最後的結果也出人意外，陪審員只花了9分鐘

時間便判Scopes罪名成立，法官判Scopes罰款100美元。然而，田納西州最高法院推翻此判決，以為凡超過50元罰款的，只有陪審員通過才能決定。最高法院並有此評語：

「這樣奇怪的審訊，不適宜再花時間延續。」

- 1968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另一宗類似的個案Epperson V. Arkansas，以為這是違反第一修正案；其實早在一年前(1967)田納西州亦推翻了Butler Act。
- 1960年，荷里活導演Stanley Kramer根據這個Monkey Trial拍了一套名叫「承受清風」的電影，雖然這是一本好像小說的劇本，但任何人一看便知這是針對這Monkey Trial而拍攝的。雖然片中人物全部都改名換姓，但明顯在導演心目中，這是一套好像記錄片一樣。但當我們細看這電影與歷史，便發覺許多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然而，這電影卻告訴我們，經過30多年後，美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是怎样看基督教。
- 電影中提及Scopes被判下獄，其實是不對的，這只是誇張那些「愚拙信徒」，為了維護他們的無知信仰，而誇大他們的邪惡，也令觀眾為Scopes抱不平。
- 電影中說Scopes是大學畢業，專攻Science，其實是不對的，他是讀法律，而非Science，更不是Biology老師，他只是代課老師。
- 電影中把主控官Bryan描繪為一個愚蠢，虛偽，不誠懇，沒有耐性的人，以下是電影中一些對白：

□ Darrow: 我相信你沒有唸過The Origin of Species一書？ □
□ Bryan: 我對這些不信者的理論，毫不感興趣。 □
Darrow: 你從沒唸過嗎？
Bryan: 沒有，我以後也不會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事實上，Bryan熟讀達爾文的The Origin of Species而且對進化論一點也不陌生，相反的，Darrow卻從沒有唸過這書，也對進化論無知。

所以，我們看到這電影的導演有意以這個故事來嘲諷基要派人士，以為他們是無知、愚拙、迷信。電影名字稱為「承受清風」是引自《箴言書》十一章29節「擾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風；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僕人。」意思是擾害自己家庭的人，不可能有機會承繼任何遺產，他能承受的只有「清風」，這樣的愚拙人只會為奴為僕。Kramer有意指出那些保守的基督徒企圖立法阻止在中學教授進化論，是「擾害己家」的行為，這樣愚昧的人，只能承受清風，為奴為僕。事實上，基要派(Fundamentalism)也成為一個帶著負面涵義的辭彙！

我相信有兩個主要原因，導致保守的基督教信仰成為70年代美國人的笑柄。首先，1920年代的信徒，特別那些稱為Fundamentalists的保守信徒，企圖以政治及立法程序，把他們的信仰強加於整個社會，田納西州的Butler Act是一例，Blue Laws又是另一例，所謂Blue Laws，是指政府立法禁止星期日出售一些東西，因為星期日是安息日，理當停止這一切的商業行為。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是1920年至1933年美國推行的全國性禁酒令，禁止釀酒，運輸和銷售全酒精飲料，這些法案都是由保守的基督徒發起的。但結果如何？政府不但損失了稅收收入，禁酒令也絲毫沒有使酒精的消耗量減少，反而使私釀酒猖獗；更甚者，甲醇假酒氾濫導致民眾失明，甚至死亡，無辜百姓淪為罪犯，執法官員收賄腐敗，黑手黨藉運販私酒而致富，因而引申了無數的社會問題。不少社會人士歸咎於那些Fundamentalists身上，對基督教信仰也產生反感，終於在1933年12月5日結束禁酒令，禁酒時期一共持續了13年10個月又19日，但對基督教教會的影響，一直伸延至60及70年代。

其次，20世紀初年的基要派信徒，往往給人一個印象，是一種反科學，反理性的信仰，Richard Hofstadter在他那本*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3)第五章特別討論到反進化論與反理性主義的關係，他以為美國群眾反理性及反精英運動(anti-rationalism and anti-elitism)主要的動力乃是來自美國的保守教會(p.434)，他這本書是在1963年出版的，1967年，田納西州取消了Butler Act；1968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類似Butler Act的亞肯斯州的法案為不合憲法；1970年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亦有類似的裁決。相反的，美國中學的生物學老師卻不許在課堂中教授「創造論」，以為這是宗教課程，而非科學課程。

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心裏有點疑惑，當那些從英國移居美國的清教徒，當中不少是知識份子。事實上美國著名的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都是基督徒創立的，何解在短短的時間，基督教竟然被視為一種反理性的宗教信仰呢？正如上述，歐洲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是一大因素，他們反對一切有超自然元素的神學信仰，以為一切不合乎科學根據的都不是真的，只是神話吧了！這風吹到美國來，不少神學院都受這此影響，教授們一窩蜂地轉向自由派神學(liberalism)，否定聖經一切的神蹟，耶穌的復活和再來！這引起民間信徒的不滿，開始組織他們所謂的Fundamentalist Movement，強調聖經絕無錯誤，但他們卻又未能答辯從科學帶來的挑戰，也未能從學術及理性角度去抵抗自由派的挑戰；相反的，一般信徒開始傾向當時開始流行的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神學，套用Wheaton大學的Mark Noll教授在他那本*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所說，他們採用“plain reading”讀經方法，一切只從字面解釋，忽略聖經的文化及歷史背景，改用那種“misguided quasi-scientific approach”去理解聖經，與那些自由派人士抗衡，於是便做成1920年代基要派與自由派的對抗局面，也給人一種印象，基督教是反知反科學的信仰。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然而，當時以 John Gresham Machen 為首的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們，包括 John Murray, Oswald Allis, Robert Dick Wilson 及 Cornelius Van Til，不滿普林斯頓神學院傾向自由派新神學主義，決定離開，並在 1929 年在費城創立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西敏寺神學院)。他們既不同意自由派神學，但另一方面又不是走基要主義的神學之路。他們提出另一條出路，一方面是維持舊普林斯頓傳統，以加爾文改革宗的神學為基礎，秉承普林斯頓 Charles Hodge 及 B.B. Warfield 的神學思想，更重要的是打開了一條新的護教學方向，一個以 Cornelius Van Til 為首的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當我在 1972 年入讀 Westminster 時，Van Til 仍然是任教護教學；他對我的神學思想有著極大的影響。

我在此並不企圖去解讀 Van Til 的護教學，事實上我有許多是看不明，聽不明白，不知他所以言，只記得他在黑板上劃了兩個圓圈，上面一個是大的，下面一個是小的，然後他寫著：創造者與被造者的分別 (Creator and Creature distinction)。有一次，下課後，我對他說：「我是唸中國哲學的，聽不明你說這麼多西方哲學，我當如何辦？」他笑笑口對我說：「那你就勤力讀書吧！」老實說，我無論如何努力，還是聽不明；但奇怪的，他那幅兩個圓圈的理論，卻解答我不少心中的疑惑！直至今日，當我再讀 Van Til 的書籍時，還是不大明白，但他所說的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對我在牧會和傳福音上有著莫大的幫助。

我發覺每一個人的思想是受其前設 (presuppositions) 影響，你戴著黑色眼鏡看東西，一切都是黑的，你帶著紅色眼鏡看，一切都是紅的，如果你帶著「有神」的眼鏡看，神蹟的出現也不再出奇，但如果你帶著「無神」的眼鏡看，一切神蹟都沒有可能，都是假的。所以，「神蹟」的可真可假，乃在乎你的前設是什麼；也即是你站在哪兒看萬事萬物。

Van Til的兩個圓圈，一個是代表神的世界，一個是代表人的世界，如果我站人的世界看神的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合理，不可能，這就如Philip Yancey所講的一個例子：鯨魚是有語言的能力，假如有一天，海洋生物學家能與鯨魚溝通，並對鯨魚說：「我想約定你在三藩市漁人碼頭見面，屆時我想請你到唐人埠飲茶！」那鯨魚當然不明你說什麼，因為人的世界與鯨魚的世界截然不同，如果鯨魚要明白人的世界，它一定要相信有一個世界叫做人的世界，而你又是從人的世界來的，你所講有關人世界的東西都是真的，唯有這樣，鯨魚才可認識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同樣，我們若要明白神的世界，也要相信耶穌是從神的世界來，祂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間滿有恩典，在人的世界，知識的源頭來自「眼見」，但在神的世界，知識的源頭卻來自信心。這正是科學與神學之別。或者有人會問道：「究竟我怎知道誰的前設是對的？」Van Til以為作為一個護教者，我們可以是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他的前設，並且指出他所持的前設其實是有許多未能確實的假定，正因如此，不少科學理論都先後被人推翻，要不住更新。我們以為聖經所載的神蹟是神話，並不科學化，這是因為我們的前設是沒有神，也不以耶穌為神而定出的結論，但科學能否證明神的不存在呢？他們又憑著什麼實據證明神是不存在的呢？所以，我們是可以用理性去抗衡科學帶來的挑戰！然而這並不等如我們否定科學的價值！

此外，70年代的信徒也開始看到20年代信徒企圖用立法手段把基督教的價值觀強加於我們這個多元化的社會，是不智之舉，也會帶來不少禍害。因此70年代的保守派信徒走走另一個極端，以為政教分離，教會於社會問題，國事上都不加注意，反而被自由派人士影響整個美國的政治，文化和學術界，到了80-90年代，我們看到在福音派的圈子內起了另一個轉變。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據湯恩比的分析，20世紀面臨的挑戰，不獨在科學的領域上，更在心理學及社會科學上帶來的沖擊，如果我們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對基督教的信仰起了一大沖擊，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較達爾文的影響更大。一如 Benjamin Gilbert Sandler 所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提供另一套對人行為的釋義，取代了傳統的基督教。究竟基督教如何面對日益普遍的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帶來的挑戰？是抗拒？是和合？這似乎也是70年代基督教會要面對的問題。

Westminster神學院的一位教授 Jay Adams，他是教牧學教授，他除了教導講道學外，還教導教牧輔導，他所創立的 Nouthetic Counseling 吸引不少人士來上課。我曾把他的理論向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其中一位是精神科醫生，他的反應相當強烈，以為 Adams 的理論一無是處，那時，我對心理輔導及精神病一無所知，但總覺得他的理論有點不妥：

- Adams 對心理學及心理輔導是外行，他的 Ph.D 是有關 Speech 的，他憑什麼去批判一些他認識不深的專業呢？這是我的疑問。
- 他的名言：「精神病學是心理學的私生子」(Psychiatry is the illegitimate child of psychology) 未免太武斷了，單憑一句話就把整個學科及專業如此貶低，既無實據，也沒有任學科學根據，令人難以接受。
- 他把一切情緒病，無論是抑鬱、焦慮、狂燥、幻覺等歸咎於罪，這是令人難以置信！不但如此，如果我是一個病人，找他輔導，劈頭就說我是因犯罪而引至此病，我不但不會得到治愈，可能病況更惡劣。
- 他強調 Nouthetic Counseling 是按聖經真理的輔導方法；也是受 Van Til 的 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 影響，我個人以為

他是錯誤認識和應用 Van Til的護教學。沒錯，不少輔導理論是基於一些世俗的前設，但這不等如他所說全是錯誤，正如一個佛教徒，或許他深受佛教思想影響，但不等於他對人生的洞悉都是錯謬。同樣的，心理分析，Skinner, Carl Rogers等理論都是世俗化，但不等如他們所說的全是錯謬，改革宗所強調的「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正是否定這一種偏面的看法？

我個人總覺得 Adams 這種看法，正正是犯了1920年代那些 Fundamentalists所犯的錯誤，這是非常可惜的。事實上心理輔導五花八門，各有說法，但大多都屬理論，沒有多大的數據來支持他們的看法，我以為這幾十年醫學證明精神情緒疾病與生理因素有莫大關係，這是一種疾病，一如心臟病，若說是因犯罪而引致心臟病，這是完全錯誤的，也難以令人接受。但可惜今天仍有不少信徒對心理輔導和精神科治療，持著極負面的看法，更有一些靈恩派人士，以為這些精神病患者都是「鬼附」的現象，他們需要牧者為他們驅魔，多於醫生為他們以藥物治療，這是一大不幸！

總括來說，這4年的神學訓練使我與君玉得益不淺，尤其在聖經的認識上，更令我大開眼界。我在西敏寺神學院畢業後，因名列前茅而獲 Westminster Fellowship，再往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新約，一年後畢業回港開始我的教牧生涯，君玉則兩年後獲西敏寺神學院頒發碩士，其後繼續攻讀心理輔導。不過，這4年在美國生活，不獨在知識領域上大開眼界，這四年生活接觸到美國不同階層人士，在他們中間事奉，更是極寶貴的經歷，有關這方面則要下回分解了！

第二十五章
異鄉客

當我們寄宿在西敏寺神學院已婚宿舍時，一天我正回家，看到一名非裔的女子拿著幾件大行李，正準備搬入樓下的一個單位。我看她一人獨力拖著這幾件大行李，頗感吃力，於是我仗義伸出援手，幫助她把行李搬入屋內。我本以為她一定連聲多謝；怎料她不發一言，也沒有笑容，樣子極不友善。回到家裏，見到君玉，立即投訴那新搬入的女子是一個種族歧視者；若不然，為什麼她竟然這樣沒禮貌的對待我！

過了一個星期，我參加了神學院一個祈禱會，聽見有人提起這個女子的身世，才知道她是從非洲烏干達逃到美國，投靠我們的同學磯法一家。她今年才18歲，在烏干達時，被狂人亞敏總統的士兵強姦，有了身孕，於是冒險逃離烏干達，來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並投靠我們的同學烏干達人磯法一家。她是一個基督徒，以為墮胎並不合乎聖經的教導，再加上她以為小孩子是無辜的，所以她決定忍辱的繼續保持胎兒，並且準備撫養他成人。我一聽到這消息，感到非常羞愧，在不知情下亂加判斷，以為她是一個種族歧視者，我覺得自己太不像樣了！

談到磯法這位弟兄，他的為人，敬虔，和愛心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來是在烏干達當牧師的，他在荷蘭取得了Ph.D(藝術)後，便返回烏干達老家牧會。他教會有超過一萬人，非常興旺。但在1971年，狂人亞敏 (Idi Amin)將軍率軍政變，推翻Milton Obote總統，

並且實行鐵腕手段統治人民。烏干達本來是英國的殖民地，於1962年獨立，當時亞敏是軍隊將領，到了1965年，他擁有軍事大權，便推翻時任總統Milton Obote，並於1971年宣佈自己為烏干達總統。他是一個暴君，濫殺無辜，並於1972年，驅走所有亞裔人士離境，導致國家經濟崩潰，他又公開侮辱西方國家領袖，又一改昔日與以色列友好態度，又親自指揮騎劫一架法國航機來烏干達，他在位期間，超過30萬人被殺，另外有不可勝數的人慘被虐待，其中不少是基督徒，他們整天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亞敏的軍隊隨時都會把他們下獄，強姦，或殺死，於1977年2月16日，更把聖公會大主教 Archbishop Janani Luwum謀殺。磯法就在這混亂期間逃亡至美國，一方面在西敏寺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另一方面又儘量接濟從烏干達逃亡至美國的人士。這18歲女子便是磯法接濟的一位。

磯法是一位非常敬虔的牧者，很有愛心，我們有什麼問題，總喜歡找他分享；他雖是烏干達一位大牧，但為人卻非常謙虛，幽默，和好學。我還記得他在課堂中，很喜歡舉手發問，但當教授問他：「磯法，現在輪到你發問了，你的問題是什麼？」他竟然說：「教授，對不起，我已經忘記我的問題了！」引得全班同學大笑！

亞哲尼古是另一位從非洲來的同學，他是來自尼日利亞，他本來是尼日尼亞南部一間聖經學校的校長，携同妻子及兩個子女一同來到西敏寺神學院。一如烏干達，尼日利亞也曾一度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深受英國文化影響，在19世紀末年，非洲西部受英國的Royal Niger Company管治，在1899年英國政府以£865,000英鎊從Royal Niger Company取得統治權，並且在1900年設立Southern Nigeria Protectorate及Northern Nigeria Protectorate及Lagos Colony。Lagos就是尼日利亞舊的首都。尼日利亞的南部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發展是比較北部迅速。到了20世紀中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一股非洲國家獨立的浪潮席捲整國大陸，英國亦於是1960年10月1日讓尼日利亞成為獨立的國家。然而，尼日利亞有超過250種民族(ethnic groups)。每一民族有他們的地盤，有些在那兒居住了很久的外族人士，他們始終都被視為外人。大概來說，其中3大族是the Hausa-Fulani, the Yourba及the Igbo。Hausa-Fulani大多居於北部，差不多3/4都是信奉伊斯蘭教，而Yourba族大多居於尼日利亞的西南部，而Igbo族則大多居於尼日利亞的東南部，尼日利亞南部則以信奉基督教比較多；大致來說，全國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各佔一半。

尼日利亞於1960年獨立後，局勢非常不穩，屢屢發生政變。結果在1967年發生了內戰，直至1970年才結束。但在這次內戰中，有一百至三百萬人死亡，尤其在東部情況更為嚴重。1970年後，軍人執政，局勢也漸趨和緩，再加上尼日利亞是個產石油國家，這對國家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始終內部的不穩和腐敗，也成為尼日利亞的隱憂。

1970年對尼日利亞的教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代。在1930年時，尼日利亞的教會經歷大復興，信主的人數突增，其中以主流教會(聖公會，循道會，長老會)增長更快，不少尼日利亞人放棄他們傳統的信仰，改信基督教。但自1935年，教會漸趨呆滯。但到了1970年，一方面內戰結束，另一方面福音派的教會漸趨興旺，尤其在學生工作上，特別是大學當中，深受英美的學生福音工作影響。我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1969年)，認識了一位在港大唸Ph.D(Physics)的尼日利亞同學，他是一個非常敬虔，有深度，有思想的信徒，原來他在尼日利亞大學裏是一位出色的基督徒學生領袖。除此之外，從美國來的靈恩派教會，也起了極大的影響，然而不少這些教會在神學上是比較粗淺，尼日利亞的教會在此時亟需的是一個有深度和純正的神學教育。

正因如此，亞哲尼古便來到西敏寺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他來自長老會教派，篤信改革宗神學。有趣的地方，他是嚴守安息日條例，他相信作為一個基督徒，就要嚴守十誡中「當守安息日」的誡命；在1年級，每一位同學都是唸希臘文，每逢星期一都有測驗，亞哲尼古在星期日整天都不會溫書，預備明天的測驗，因為他深信安息日是不可工作的。然而，他一直等到午夜12:00，立即拿起書本來溫書。當然，夜已深，人也有點疲倦，成績當然不理想，我不是出身於這樣一個傳統，雖然我尊重他的信念，但我總覺得這未免有點「離地」，心中問道：「為什麼不在星期六好好溫習，星期日安息，早點上床，星期一才有精神預備測驗！」我更不禁問道：聖經教導我們守安息日，是如此教條式的嚴守嗎？想到耶穌所說，安息日是為人而設，不是人為安息日而設。我對這種守安息日的方式是極有保留的。

在我們的宿舍裏，還有一對夫婦是來自北愛爾蘭。他本來是在北愛的Belfast牧會。在安息年來到西敏寺神學院攻讀一年的Th.M課程，他們為人溫和，友善，但卻是非常沉默寡言；很少提及北愛的情況及教會的問題，我們眾人都能理解，在1970年代，北愛充滿了血腥的暴亂，愛爾蘭分為愛爾蘭共和國和北愛爾蘭，北愛仍屬英國領土。愛爾蘭大多數是天主教徒，而在北愛，大多數是基督徒。當時北愛的IRA(Irish Republican Army)是一個武裝組織，企圖用恐怖手段襲擊在北愛的英軍及北愛領袖；北愛人民亦組織RUC(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和UDR(Ulster Defense Regiment)對抗，彼此廝殺。自1960年代開始，每年都有超過1,000人被殺，一直至1994衝突才告結束。1972年，也正是我們開始在西敏寺神學院就讀的那一年，是北愛最血腥的一年，有超過2,000次炸彈爆炸，更灰暗的，這衝突似乎永不停止，人心惶惶，可見當時牧會的教牧人士是何等困難去牧養他們的群羊！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回顧在西敏寺神學院的外國學生中，不少是來自大英聯邦國家，如尼日利亞，烏干達，紐西蘭，北愛，印度及香港等。一方面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在某一程度上受英國教會影響，以致基督教得發展。但另一方面，不少國家，在英國人離去後，都發生內亂，政變，及血腥事件，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烏干達，尼日利亞，愛爾蘭，緬甸等。我不禁會問：原因何在？香港是英國所剩無幾的殖民地，究竟他日英國人離開香港後，會否遭同一命運呢？早在70年代，我已經開始思想這問題了。

海外學生始終還是佔神學院一小部份，大部份同學都是美國本土人士，有趣的地方，幾乎90%以上都是白人。西敏寺神學院是一間頗保守的學校，在我們入讀前幾年才開始收女生入讀，所以在70年代，女同學只是佔全校不及5%，君玉便是其中一個。然而不少同學對宣教工作及Urban Ministry頗感興趣，我想這與Professor Harvey Conn有極大關係，Conn教授是一位極出色的老師，無論在他的課堂中，或是講道中，都極有啟發性，他曾在韓國當宣教士10多年，並以韓文著書立說，對韓國教會影響頗大，在韓戰結束期間，韓國的經濟衰退，人民生活窮困，不少女孩子被賣到妓院當妓女。Conn教授就與他的妻子跑到那些妓院中傳福音，屢屢被那些妓院老闆驅趕及毒打，但他們仍不氣餒，領了不少妓女逃出火坑，而且信了耶穌，成為美好的見證！而其中一名妓院的老闆竟然因Conn教授的愛心而改邪歸正，接受耶穌為他的救主。

1973年發生了一件觸目驚心的事，我班一位同學，於那年携同他的妻子往非洲埃塞俄比亞當短宣，他妻子是一名護士，在當地醫院作短期工作，訓練那兒的護士學生。不料一天，反政府的游擊隊突擊醫院，擄走了一批醫生和護士，他們目的是要這些醫務人員去治理他們受傷的同胞，而這位同學的妻子便是被擄去的其中一名。此事震驚了整個學院，我們不住

為她禱告，終於在幾個月後，那些游擊隊竟然奇蹟地釋放了他們，整個學院的師生都為此而感到歡喜，衷心感謝神！

每逢星期六，我們乘坐公共交通前往西費城近賓州大學附近的地方，參加那兒的華人基督徒學生團契，晚上則在我們同學周功和的家中渡宿，星期日則參加在市中心的第十長老會崇拜，然後才乘公車回家。這學生團契是專為賓州大學的中國學生而設，他們主要是來自台灣，而我和君玉則負責主領一個專為香港學生的查經班，後來因為有些只懂英語的人士來參加，我們則改用英語進行。其中一位朋友是來自越南的西貢，她在費城的Drexel大學唸書，在查經班中信了主，後來她覺得要學成返回越南，但我們彼此仍有通信。1975年越南西貢淪陷前夕，我們收到她的來函，寫著：

「我每早晨醒來，知道自己生命猶存，房屋仍在，家人仍在一起，我就深深的感謝神，但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維持多久。當我寫這信時，外面漫天烽火，戰火連天。我想到自己在過去的日子，沒有好好的愛主，沒有好好的傳福音，我為此而感到羞愧，趁著還有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把握良機，因為時候不多了！」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音訊；聽聞她曾投奔怒海，究竟是生是死，我們也不知道，但無論怎樣，相信將來在天家會再見到她！

第十長老會是一間歷史悠久的教會，Boice牧師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牧師，講道也很有恩賜，我們從他的牧養中也甚得幫助。後來我們去找他，並毛遂自薦教成人主日學，Dr. Boice欣然應允，並任由我們設計課程，於是我們決定查考福音書有關「天國」信息的真理。在開始的時候，來參加的人寥寥可數，令我們有點失望，想不到一間數千人的教會，來參加我班主日學的不夠幾個人。有一次，一個中年白人女子來到我班見到只有幾個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她問我：「誰是這班主日學的老師？」我對她說：「是我，歡迎你參加！」她一聽到我是主日學老師，就不發一言，掉頭走了！我們感到非常失望：我不知這與我是亞裔人士有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沒有因此而放棄，繼續我們的事奉，後來有一班年青人，他們都是 Temple University 醫學院的學生，每星期日都來到與我們一起研經，還有一位長老的女子，她常常對我們說：「在你們的查經中，我學到很多寶貴的真理，非常多謝你們！」她的鼓勵，實在增加我們不少信心，事實上，在他們中間事奉，是我們寶貴的經歷！

到了暑期，我們有機會到三藩市金巴崙長老會作實習，為期兩個多月，這是我們難得的機會。金巴崙長老會位於三藩市唐人埠之中心，在東華醫院隔鄰，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兩三個月間，竟然有許多人信了主，又有不少信徒得著復興，無論是在中文部或英文部，我們都見到神的作為。以下是我們一些難忘的故事：

黃太是一位50多歲的女士，丈夫因心臟病發而離世，不過她5個子女都已成長，因著她大女兒和女婿都信了主，我們便有機會透過他們認識了黃太，並在她的家開始了福音性研經。她對福音極感興趣，後來更信了主，因著她的信主與改變，她另外3個女兒也開始參加了我們另一個福音性研經班。想不到在不同的場合中，她們3人都決志信了主，還有其中一個女兒的男朋友也決志信了主，就在短短一，兩個月間，她們整個家庭也改變過來，真令我們感到驚訝！

此外，另一個團契的一位姊妹，她的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於是我們便邀請他與我們一同查經，神的話語真是利害，他在尋索了一段短的時間就決志信了主，並且後來更成為長老。又有一個家庭夫妻婚姻不和，他們

兩個兒女對父母吵吵鬧鬧感到非常厭煩。有一天，那個只有9歲大的女兒告訴媽媽：「我真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比活著痛苦更好！」女兒這番話驚醒了這對夫婦，開始來參加教會聚會，並接受輔導，這個家庭得以改變，簡直是個神蹟！

此外，我們在不同的青年團契中開設了門徒訓練班，強調「委身基督」的重要性，又鼓勵他們用心研讀聖經，我們又與他們一起露營，建立友誼；當我們見到他們開始對信仰認真，令我們感到非常興奮。金巴崙長老會有一特色，整天都有許多青年人留在教會中，他們無所事事，只是不願意回家，於是教會便開始不少活動給他們，組織合唱團，帶領他們到各處教會演唱及佈道，這方法果然奏效，吸引不少青年人來教會，並且因此而信了主。然而他們只喜歡到處演唱；對信仰的根基較淺，對讀經不感興趣，這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們便舉辦查經班，每星期數個，想不到他們不少開始對查經感到興趣，也喜見他們生命的改變。

金巴崙長老會在70年代對三藩市唐人埠起了一定程度的影響。70年代的唐人埠，其實是充滿血腥事件的年代。在1972年的農曆新年，黑社會頭目 Joe Fong 脫離另一個黑幫集團華青，一般人稱他們為“the Joe Boys”。自此，這兩個黑幫進行不住的廝殺，在5年內有差不多50多人被殺，大多是發生在 Grant Street 及 Pacific Ave。最著名的金龍事件發生於1977年9月4日，Joe Fong Boys 於半夜3:00a.m. 亂槍橫掃金龍酒家，因為他們以為華青幫在此宵夜，當時金龍有75人，結果有5人死亡，11人受傷，他們全部都不是黑幫人氏。金龍事件引起三藩市當局關注，The Joe Boys 黑幫解散，隨那華青黑幫亦被警方取締。

事實上，不少從香港及澳門移民來美的年青人，來到美國後，遭土生華人及其他種裔人士歧視，再加上他們無心向學，於是黑幫便成為他們的

「家」。教會能夠「提供」另一個家給那青年，給他們一個健康和正常的人生觀，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使命。我們能夠有機會參與這使命，這實在是神給我們的福氣。

歸
民
篇

第二十六至三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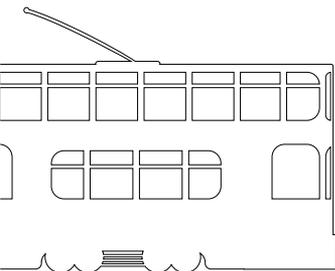


第二十六章
70年代的香港

1970年代香港正由發展中的一個殖民地，蛻變為一個先進經濟體，為踏入80年代的香港開放新的一頁，更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實，不但在經濟上起飛，香港人在70年代開始對民生，自身的權利及民族身份問題之關注日益提高，不少的社會運動在此時期大量出現，故70年代又稱為火紅年代。

據周永新教授所說，1966年和1967年的暴亂，促成了港英政府採取一連串改革行動。政府明白到：香港到了60年代中，已如一個爛到入心的蘋果，如不徹底的更換，香港將無法管治下去。所以，香港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的進行改革，不再單純視香港為殖民地，而是一處英國必須保衛自己利益的地方。一旦從這個角度去考慮，香港呈現的各種問題，如政治架構，經濟發展，社會階層組織，都必須重新檢視，盡快採取解決的辦法。（參看周永新：《回首香港七十年》P:54-55）

70年代的改革不但是由港英政府帶頭，香港的市民也覺得有改革之必要。他們不能再以過客的難民身份在這裏寄居。他們覺得20多年來忍受的艱苦夠了！不少人仍住在環境異常惡劣的私樓，較幸運的被安置入住公共房屋，但必須與鄰居共用廁所和浴室，每人的居住空間佔不到25公呎；子女未必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就算有書讀，校舍可能設在天台或鄰近溝渠的公共屋邨底層，工作每天十多個小時是平常事，難有什麼正常的家庭生活。所以自六七暴動後，整個香港社會瀰漫著一片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渴求改變的聲音。

無可否認，7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英國政府對香港前途的一項政治決定。自二次大戰結束後，大英帝國解體，昔日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到了70年代剩下的殖民地所餘無幾，香港是碩果僅存的殖民地中最有經濟價值的一個。但要管治香港，政府一定要考慮香港市民的呼聲和要求；以抗衡來自大陸透過《大公》，《文匯》等的宣傳和影響。所以，香港政府的政策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安撫市民的需求，增強他們對英國及香港本土的歸屬感，讓他們感覺他們的生活得到政府的保障，故政府銳意改善市民的生活；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要監控輿論，不容被左派人士鼓動群眾對抗政府，政府必須有自己的宣傳機器，並且設立鮮為人知的政治部，嚴密監控一些「壓力團體」。

港督麥理浩在這改革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故稱為「麥理浩年代」(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用語)。麥理浩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出生，畢業於牛津大學，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先後派駐馬來亞、廈門等地，之後調返英國外交部。1971年被委任做香港總督，連任三次，總共10年5個月，至1982年5月才離港，是歷來任期最長的港督。

麥理浩其中最大的政績是他在1972年所推行的「十年建屋計劃」。在60年代，香港市民的居住條件十分惡劣，不少人仍住在木屋區，而50年代及60年代所建成的公屋，沒有獨立的廁所和浴室，但他們能入住在公屋中，較那些沒有水電供應的木屋居民及居住在散房的唐樓人士已經好得多了！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確是大大改善了香港人住屋問題：由1973年至1982年間，為180萬香港居民提供設備齊全，有合理居住環境的公共房屋單位；政府公屋的質素亦大大改善，尤其發展的新市鎮，如屯門、沙田、荃灣三地，大興土木，每市鎮都有他們的學校、醫院、社區中心及各類社區

服務，是一項非常出色的政績。

然而，不少學者以為麥理浩亦未能實際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王于漸，《1980年代中期以前之長遠房屋策略》)，尤其未能有效地控制非法移民的問題，以致在70年代，香港每年有10萬人從中國移民來到香港，以致香港人口由1973年的411萬躍升至1987年的558萬，升幅是150萬，以致麥理浩的10年建屋計劃，未能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麥理浩諸項政策中，最為人賞識的是廉政公署的成立。60年代及70年代香港經歷急劇的轉變，當時人口快速增加，社會發展步伐迅速，製造業蓬勃發展，經濟飛騰。而對著這些轉變，政府一方面要維持社會秩序，解決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然而，因人口不斷膨脹，社會資源又有限，這種環境助長了貪污的歪風，於是「走後門」「黑錢」「派鬼」「茶錢」等名堂層出不窮，成為當時盛行的賄賂之風。我記得我姐夫考車牌，明明他準確地泊了那部車在白界內，但考牌官卻對他說：「泊得不好，相差3呎。」姐夫不明其所言，明明是泊得好位，怎麼相差3呎？他就因此而考牌失敗。後來他才明白，3呎者乃300元也，沒有300元的賄款，是考不到車牌的。

貪污無疑是香港當時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市民已經忍無可忍，於是公眾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污，尤其是警界方面，問題更嚴重。

1973年，總警司葛柏被發現擁有430多萬財富，懷疑是從貪污得來，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個星期內解釋其財富來源。但葛柏竟然輕易地離開香港，引起千萬市民不滿，手持「反貪污，捉葛柏」的橫額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緝拿葛柏歸案。麥理浩有見及此，於1973年10月在立法局會議上，宣佈成立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名為廉政公署。廉署於1974年2月正式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成立，以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的方式打擊貪污。廉署成立，首要任務是把葛柏逮捕歸案。1975年受審，罪名成立，判監4年。

反貪污調查展開後，一石激起千重浪，警務人員涉貪污的惡行亦被越揭越多，大批警務人員被揭發集體貪污，罪行更互相牽連，這給予警察極大壓力。1977年11月前，被控的警察有260人，當時警隊人心惶惶，不少人提早退休，或逃至海外。這引起警隊對廉署怨恨。終於在1977年10月28日，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遊行至警察總部集會，要求警務處處長施禮榮向港府施壓，停止調查。集會期間，有百多名警務人員衝入位於金鐘夏慤道和記大廈的廉政公署，打爛辦公室的玻璃門，闖入辦公室大肆搗亂及破壞，並毆打廉政公署人員，有5名廉署人員受傷，此舉引起大批市民對警察極表不滿。麥理浩曾經希望駐港的英軍介入，但為英軍指揮官反對。考慮到大局，麥理浩終於決定對過去幾乎全部個案發出局部特赦令，但表明這赦令只此一次，不下為例，此事才告平息；但廉署的士氣卻因此而受到嚴重打擊，一向以硬朗見稱的廉政專員姬達於1978年7月辭職。雖然麥理浩旋即挽留，並委他任布政司，但二人的關係始終是蒙上陰影！自廉署成立，香港的公務員也走向廉潔的風氣，這對香港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1990年香港被選為全球最廉潔的城市之一。

麥理浩對香港教育的發展也作出巨大的貢獻。他上任後不久，於1971年實行6年的強迫小學教育，於1979年則推行9年的強迫免費教育；他亦重視工業和理工教育，以配合香港的工業發展，先後在1975年創立了葵涌工業學院和觀塘工業學院，1977年創立黃克兢工業學院，及1979年李惠利工業學院，致力培訓更多工科學生。此外，於1972年，他更提升香港工業專門學院的地位，改組為香港理工學院，也即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前身。在大學教育方面，他對香港兩所大學也作了不少變革。其中包括於1972年

委任黃麗松教授為香港大學創校以來首位華人校長，他更把中文大學的管治模式由原來的「聯邦制」更改為「單一制」，意味著中文大學不再由聯合、新亞、崇基3家院校各有自己的行政權力，而是歸於中文大學一身，這引起新亞書院不滿，最終有9名新亞書院校董辭職。

70年代最矚目的教育事件莫過於1977年所發生的金禧了事件！1977年初，天主教寶血會金禧中學多名教師揭發校方財政混亂，且涉嫌斂財和挪用公款。於是教協司徒華陪同這些教師往廉署舉報；部份師生要求校長梁潔芬修女解釋。當時教育司陶建(Kenneth Topley)向全體師生發出警告信，揚言教師再次罷課，會面臨吊銷教師資格，這引起教協不滿，要求收回。寶血會此時宣佈退出管理金禧中學，由主教直接委派新任校長主持校政。1978年2月，法庭裁定金禧師生指控屬實，判前任校長梁潔芬修女貪污罪成入獄，但獲准緩刑執行。而金禧校方仍維持強硬立場，並罰批評校方的4名學生停課，這觸發起400多名師生不滿，並向港督麥理浩請願，又向教區主教胡振中抗議。教育司署以事態嚴重，署理教育司許瑜於5月宣佈「封校」，並在原址另辦德蘭中學，變相的解僱金禧中學舊有的老師。

此舉引起港人不滿，一連串集會、絕食、請願隨之而來，在5月28日更有萬人參與在維園集會抗議。麥理浩於是委任一個以港大校長黃麗松為首的3人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建議另設五育中學，由原金禧中學的教師任教，學生可自由選擇就讀五育中學或德蘭中學，整件事才告平息。

有趣的地方是：在此次金禧事件中，其中一位參與抗爭的年青人竟是鄭月娥，年輕的她，本著“*I believe in it, so I do it*”的信念，以民眾運動的方式表達訴求。在某一程度上金禧事件與近年的學生運動有相似的地方，但港英的處理手法與特首鄭月娥之手法完全不同；結果當然也不是一樣。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主要的分別是：麥理浩能聆聽市民的聲音及訴求，成立一個3人調查委員會，而鄭月娥堅拒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反而用高壓的手法鎮壓年青人。據黃麗松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證明校方理財不當為整件事件的關鍵，又批評政府的教育司署處理手法不當，但對那些年輕的老師卻有高度的評價，以致能很快平息這次事件。

70年代的香港，也是工業和商業飛躍發展時期，由於大量女性開始投入勞動人口中，「工廠妹」一詞便成為當時流行用語。工業的發展也帶來香港經濟的起飛，70年代的工業，主要有電子產品、玩具、鐘錶等。我們就以鐘錶業為例，1970年香港鐘錶出口總值1.35億港元，至1979年已繳增至43.54億港元，到了1980年香港從事製造業的人口有990,000人，佔總就業人口的42%。但80年後，工業北移，香港本地工廠規模不斷縮小，製造業不斷遞減，2000年香港從事製造業下跌至230,000人，佔總就業人口7%，而香港的經濟亦轉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更有趣的地方，香港的富豪大多起家於60年代至70年代，他們在這時期大量囤積土地，坐享地產紅利置富，因而成為香港頂級富豪。

我是在1972年8月離開香港，前往美國攻讀神學，1976年暑假回港，目睹香港這幾年確有極大的改變。觸目的倒不是沙田、屯門和荃灣的新市鎮，或是中環的酒店和金融大廈之出現，而是香港人的改變！

50及6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的色彩非常濃厚，不少地標，街道，政府建築物都滿有大英帝國的色彩，我在皇仁書院讀書的時候，早會還要唱God Save the Queen，政府用的公文袋都印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硬幣和郵票上都有英女皇的肖像；英語是官方唯一語言，香港的法律也是英國法律，法庭上仍是用英語進行裁判。然而，極少香港人會認同他們是大英帝國的一份子。他們都是難民，來港的目的是要避難，他們的願望是

在香港找到新生活，安穩的謀求三餐一宿，而英國在香港殖民地的手法 and 經驗，並沒有給大多數香港人什麼痛苦的經歷，對殖民政府沒有深仇大恨，這一種沒有身份的身份便成為50年代及60年代香港人的心態。所以，到7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大量新的建設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不少在中環的英式老建築大量拆卸，這似乎完全未能引起香港人重大的迴響，相反的，他們似乎是漠不關心，不覺得這些建築物或是殖民文化是他們的一部份！

但到了70年代，我們這一輩的香港人，既沒有我們父母在中國所遭遇的艱難日子，也未能認同為大英帝國一份子的心態。不但一般老百姓如是，甚至那些憑著努力，進入大學讀書，受惠於香港的「精英教育」，收入較豐厚的中產階層，在各行各業成為社會的翹楚，他們仍是問道：「我是誰？」六七暴動給我們一個醒覺，我們既不能認同一個受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特別是看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害，又不能認同於大英帝國（或說大英帝國也不會認同這一群香港人），那麼我們唯一的出路：似乎是確認自己是香港人，但香港始終都是一個借回來的殖民地，也沒有深厚的文化基礎，這正是70年代香港人面對的身份矛盾和掙扎。

最能表達這種香港人的矛盾莫過於70年代的電影及電視片集。1974年的電影「大鄉里」是一套很能反映當時社會的創作。一般市民為現實生活憂柴憂米，在普及文化中尋找寄託、投射和逃避。「自從物價漲後人消瘦，三餐茶飯惹人愁。日常費用唔多夠，啲酒家起價直情未說緣由；房租加到六百難以承受，為因入息有限痛心疾首.....。」這套由譚炳文、李香琴主演的電影，原本是「歡樂今宵」趣劇之一，上述的歌詞正是該片的主題曲。電影內容是有關滿口鄉音的譚炳文和李香琴，從鄉下來到香港這個大城市的經歷。該片在1974年初上畫，票房收入達180多萬元，是當年排行第5位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港產片。不過票房收入最勁的還是1974年10月上畫的「鬼馬雙星」，收入竟達620多萬元，這電影是許冠文自編自導自演，和弟弟許冠傑拍檔演出。故事是講及許冠文飾的鄧國文是監獄常客兼老千一名，他同倉的劉俊傑（許冠傑飾）十分佩服文的賭博騙術，故欲出獄後與文合作騙財。出獄後傑安排了一個賭局，本以為勝券在握，怎料反被文串通舞女珮珮（丁佩飾）贏去。窮心未盡的傑繼續死纏著文，又迫他要合作，終於他們設計了一個天衣無縫之妙計，並計劃向城中大惡爺大哥全下手。為了籌集資本，傑本來要參加電視台之有獎問答遊戲，但在參加前夕，他因在沙灘出千被人打穿頭，迫得由文代替。雖然遊戲過程中笑料百出，但最終文贏得\$12,000。他們便與大哥全在賭局上展開一場龍爭虎鬥，但計劃無意中被一流浪漢發現，於是大哥全派人追殺文傑兩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文用意想不到的方法脫身而出。

這類小人物及諷刺時弊電影頗有意思，它準確的呈現70年代香港人不再甘於當時寄居在人浮於事的殖民地，又不願整天怨天尤人，轉而諷刺香港人之心存僥倖，一意夢想發財心理。總而言之，70年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年代，電視文化主導的年代，亦是一個由難民身份走向結構本土身份的年代。但這身份又是不清不楚，像許冠文那種自作聰明，死扮老大的「認叻」心態，正好代表70年代經濟急速冒升的大時代小人物的浮世心態，又如「天才與白痴」的主題曲中：「邊個係天才，邊個係白痴，扮嚟定蠢材，亞茂至知」，這正是道出香港人在社會打滾的兩面性，既是諷刺，又是無奈。這是一個非常精采的描述！

不過我認為最能顯示70年代香港人歸屬感的問題，則莫過於香港的足球運動。70年代是香港足球運動的興盛期，1973至於1974年的一季，論入場球迷人數是1968年以來的高峰期，達110萬觀眾；再加上電視盛行，

TVB在1967年啟播，掀起有線與無線電視之競爭，因無線是免費的，較平民化，影響也較大。70年代再有「佳視」CTV加入戰團，「看電視」便成為港人的一大享受。在70年初，電台「講波」與「聽波」仍屬主流，大多數香港人未必肯花錢去「睇波」，但「聽波」也是極娛樂性，尤其講波的葉觀楫的評述，青筋暴現，喊破喉嚨，往往比在現場看更緊張。及到了70年代後期，港人開始在電視睇波，TVB講波的余安，相當攪笑，他說：「呢一角球斬出，落點奇差....哩？點知個前鋒企企得好，居然頂入咗！」聽眾摸不著頭腦，「既是落點奇差，又怎會頂入呢？」真是有波睇，有笑話聽，正式是雙料娛樂，難怪70年代是足球運動的高峰期。

或許我們會問：足球運動與我們的身份認同又有何關係呢？在70年代之前，不少香港較有名氣的球員，都是代表中華民國的身份出席國際賽事，而香港隊主要是由年青新秀所組成，在50年代及60年代，中華民國（即香港的A隊）屢創佳績，甚至在亞運取得獎牌；但自從70年初期，隨著中國大陸加入了聯合國，以致台灣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地位有著極大的變化，香港球員以中華民國代表的身份也隨之而消失了；相反的，年青一輩的球星，都是以香港代表身份參與國際賽。換言之，隨著台灣撤出國際體壇，香港隊的地位得以確立，而香港人對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亦大大的提升了，然而，這不是說他們有公民意識，對社會及香港有任何承擔，事實上他們也沒有「話事權」，因為香港是一個有自由，但卻沒有民主的殖民地，作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也不知道有什麼權利和義務。所以區議會會在80年初引入直選議席後，登記做選民的不到合資格市民的一半，首兩屆出來投票的只有一、兩成，大多香港人都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對大眾的事一般十分冷漠，除非對自己的利益有切膚之痛。然而，這並不是說香港人缺乏愛心，每逢過年時東華三院或其他慈善機構籌款；不少樂善好施的香港人都願意慷慨捐助；這是80年代以後的香港少見的現象！

許冠傑的歌似乎是最能闡釋70年代香港人這種無奈，迷惘及矛盾的心態。

浪子心聲

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共享榮華，
簷畔水滴不分差。

無知井裡蛙，徒望添聲價，空得意目光如麻，
誰料金屋變敗瓦，

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雷聲風雨打，何用多驚怕，心公正白壁無瑕，
行善積德最樂也，

人比海裡沙，毋用多牽掛，
君可見漫天落霞，名利息間似霧化。

第二十七章

窩福的故事

在上一章，我們談過70年代的香港，這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型期，隨著經濟起飛，中產階級開始崛起，一股新的文化亦在香港孕育而出。昔日的一代，大多是從大陸移民香港的難民，他們飽經戰亂之折磨，先是中日之戰，後是中國內戰。他們一家逃到香港，往往有一種寄居的心態，對香港的歸屬感不大，對政治及社會問題也不大關心。他們以為，能夠在香港安居樂業，生活得到溫飽，便已經心滿意足了。他們常常教育子女說：「你們要好好的讀書，不要搞事，因為你們這一代比我們幸福得多了！」所以1967年的暴動，無論左派人士拿出什麼「港英走狗」、「愛國無罪」等口號，對香港的市民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然而，到了70年代可不同了。這新一代，既沒有前一代的經歷，也未嘗戰爭的洗禮。他們所受的是英式教育，思想比較開放、批判和進取。因此，在社會上湧起不少「社會運動」：什麼「關社認祖」、「爭取中文為官方語言」等運動接踵而來，他們也開始關心香港所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艇戶事件、徙置問題、貪污問題等，也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再者，無線電視的崛起與普及，迅速地把香港的特有文化普及，而最後表達這種文化特徵的，莫過於電視上的肥皂劇和它們的主題曲，就好像以下一些例子：

家變：「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

大亨：「你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追到什麼，找到什麼，找到又如何？」

網中人：「唯望到一朝，盡破金光燦爛名利網，猶像鳥飛廣闊天，
網開衝出不再返！」

在香港人心中，雖然是遍地黃金，但我們卻又是網中人，一切都在變，變幻原是永恆，既缺乏安全感，又沒有目標，一切都好像在幻變中，我們都是網中人。但奇怪，香港人仍有一股勇氣，希望盡破金光燦爛名利網，仍要在追，仍要在找，這就是香港7、80年代香港人的特色了！

我於1976年8月與君玉及兒子從美國回港事奉，在窩福堂擔任傳道人。窩福的全名是香港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它是在1970年代開始的一個福音基址。在70年代，窩打老道山可算是一個頗安寧的住宅區，位於何文田市區，交通方便，區內都住滿了中層人士，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是在商場上稍有成就的商家，有些則是開山寨廠發跡的。他們大多屬中年人士，一家數口，上有高堂，下有子女，每逢放學的時候，總見那些校巴穿梭於山區之間，往來不息，也見到不少菲傭來到街口前接送兒童上學。

有一對從美國來的播道會宣教士夫婦，名叫嘉理信牧師和嘉師母，他們正是窩福堂的開拓者。說起嘉理信牧師，我就想起一個感人的故事，是嘉牧師親口對我說的。話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嘉牧師夫婦及他們初生的嬰孩，來到中國廣州傳教。他們都是美國播道會差會派來的宣教士。可憐這對年青的宣教士，來到中國還不夠兩年，廣州便淪陷了，他們也成了日本人的階下囚，被囚在集中營中。嘉牧師在一處，嘉師母和兒子又在另一處，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他們的心情當然是壞極了。在香港的播道會同工鄭德音牧師得悉此事，毅然煮了嘉牧師夫婦所喜愛的雞，從香港步行到廣州探望他們，並且以美味的家鄉雞作慰問。我們要知道，那是打仗的時候，從香港到廣州不但路途遙遠，而且非常危險。更何況是去集中營

探望外國人，更是冒險之極！但鄭德音牧師為了鼓勵和支持這對年輕的宣教士，不顧生命危險，徒步至廣州。每逢嘉牧師提起這事，眼裡不禁流出熱淚來。

自從中國解放後，播道會在廣州的事工亦移師至香港，播道會亦開始在香港紮根。天泉堂、恩泉堂、道真堂、活泉堂、靈泉堂、福泉堂等先後建立，而在廣州的聖經學校亦轉至香港，即今日的播道神學院。嘉牧師夫婦亦隨大夥兒來到香港，在播道神學院事奉。

到了70年代，嘉牧師夫婦有見香港的社會轉型，中產階層崛起，這新興一族受過港式的西方教育，思想比較開放，具批判力，他們大多是中年人士，兒女都在小學、中學念書。以往的香港教會，無論在牧養上、信息上、體制上，都沒有刻意針對這個新的階層。他們所需的，是一個較開放、有討論、有理據，但同時亦要有團契、溫暖和挑戰的教會模式。

嘉牧師有見及此，便開始在窩打老道山開設查經班。起初只有婦女參加，後來更邀請了她們的丈夫參加。由於時間關係，他們便決定在星期日聚會。然而，其中有些來幫忙的弟兄姊妹，星期日要在自己的教會崇拜和事奉，在時間上便起了衝突。最後，他們決定轉會到窩福，在星期日不但有查經班，更有崇拜及兒童主日學等，如此他們整家也可以一起來參加了！當時他們是借用窩打老道山的女青年會3樓的聖堂聚會。除了嘉牧師夫婦外，還有來自恩泉堂的吳醫生夫婦，並一些美國播道會的宣教士，及數家住附近的基督徒。

由於嘉牧師是播道會的宣教士，這個查經班也順理成章地加入了香港播道會，於1976年4月正式成為播道會的堂會，名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英文是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Waterloo Hill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Chapel，後來把 Chapel 改為 Church。但教會一成立，嘉牧師夫婦便榮休返回美國。直至同年8月，我成為窩福的堂主任，那時聚會人數約20-30人，其中三分一是美國播道會來港的宣教士，三分一是兒童，其餘都是中年人士，年青人只有兩三個。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窩福崇拜時，心中極為失望。那天早上，我們一家三口一早來到女青年會3樓，那時還沒有人到，等了一陣子，一位中年婦女跑到來，看到我這個陌生人，便問道：「嘉牧師在不在？他還是這教會的牧師嗎？」我對他說：「嘉牧師已經退休了，我是蘇穎睿。剛從美國回港，負責窩福傳道事工，請問貴姓大名？」她並沒有答我的問題，掉頭就走了。我大感詫異，也感到沮喪，這是我第一次牧會遇到的第一件事，心裏並不好受。隨著崇拜開始了，台上看下去，三分一是西人，三分一是中年人，三分一是兒童，我心中想著：「我怎會答應在這樣的一間教會事奉呀？」我實在是沮喪。

窩福堂在窩山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單位，作為我們的住所兼教會辦公用。每天我從睡房行到辦公室，不消一分鐘，實在方便。但我卻「公私不分」，也沒有放工的感覺。記得有一次，兒子對他的幼兒園老師說：『我媽媽是位教師（她回港後在五旬節中學任職教師），她每天一早上班，而我爸爸則不用上班，整天都留在家中！』那位幼兒園老師覺得我們的家庭很有趣，男主內女主外，頗為新潮，真要另眼相看，終於有一次，這位好奇的老師遇上我太太接兒子放學，就忍不住問道：『蘇太太，你的丈夫是幹那一行呀！你兒子說他不用上班，整天都留在家裏！』君玉聽了，連忙解釋說：『我丈夫是傳道人，他的辦公室就在家裏！』這位老師才恍然大悟！其實現在看來這倒不是一個好的教會模式，是會影響傳道人的家庭生活。凡此種種，令我心中起了疑問，不禁自問：『難道此世界非公世界，要另走

他方？」還好，我只答應在窩福試做一年，想來我又要另覓工場了！

我在窩福事奉了一段日子，我開始發覺其中的問題：我們既沒有堂址，又沒有招牌，可算是一間頗隱形的教會，我們根本沒有和社區及未信群體有任何接觸點，既沒有接觸點，又怎可以令教會增長呢？我們只依靠會友帶朋友參加我們聚會。他們又不是太積極，而且 1/3 都是美國宣教士，他們的朋友大多是信徒，又怎可能依靠他們帶領未信的朋友來參加呢？若要有突破，我就要想想辦法去接觸那些未信的群體！

神實在是好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和浸會書院（浸會大學的前身）的校長謝志偉談起來，得悉他們需要人手在浸會書院的宗哲系教授一些通識課程，我於是便毛遂自薦義務在浸會任教，每星期兩節，第一個學期是教授 College Life；我自己編了一個課程，是針對年青人的心理、情緒、思維、人生哲學等課題。起初我班只有 40 個學生，不到一個月已增加至 70 多人，他們似乎對這些課題極感興趣。為了增加對他們的認識，下課後我經常留在學校和他們打籃球；如此我和一班浸會的同學就建立起友誼來。

我覺得時機來了，便邀請他們到我家中一同查經，查經後在我家一同吃飯。自此，星期六是我最忙的日子了，一早就要跑到街市買菜，下午預備飯菜及查經；起初只有約 10 人參加；漸漸地，君玉也邀請五旬節中學她的學生參加，再加上昔日我在銘賢書院的學生也來參加，查經班迅速增長至 30 人，非常熱鬧，其中不少也成為日後窩福堂的活躍份子，那時，他們還年輕，查完經，吃飽飯後便離去，剩下我們夫婦二人收拾殘局。還好，我在銘賢的舊學生比較成熟，經常留下幫我們洗碗及清潔。我於是邀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崇拜；誰料他們來過一次就不再來了。我追問他們的原因，他們齊聲說：『你教會全部是「中坑」，不適合我們，我們預備改往附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另一間教會了!」我心裏有點沮喪，便對他們說：「不錯，我們現在是一間「中坑」教會，但你們若願作青年先頭部隊，不久窩福便成了年青人的教會了!」他們果然接受了我的挑戰，開始參加窩福的聚會，並且把這查經班轉化為「陽光團契」，這一群的年青人也成了日後窩福的骨幹。

我總覺得查經班是領人歸主和栽培信徒一個好的途徑，每次查經前，我們有分享和禱告，跟着我們便一同研讀聖經，窩福的增長與這些查經班有着密切的關係。除了上述的青年查經班外，每逢星期三晚，我在家中亦設有一個成人查經班，起初是艱苦的經營；吳醫生看到這情形，就對我說：「不如我們信了主的人也參加這個查經班，你可以預備兩段經文，一段是福音性研經的，一段是造就性，若沒有非基督徒來到，我們便造就性查經，若有非基督徒來到，我們就福音性查經。」神使用這查經班，不少中年人士，其中包括一些生意人、專業人士也來到這查經班，並且信了主，後來更加入了窩福教會。在1977年4月，我們舉行第一次水禮，有15位接受水禮，其中一半是年青人；其餘的大多是中年人士。到了1978年初，窩福聚會的人數已超過100人了!

70年代之末期，香港有一個新興的現象，有不少人士從英、美、加拿大及澳洲學成回歸香港，在香港成為社會的特殊階層。他們在海外認識了耶穌，非常享受在那兒的校園團契生活和外國教會模式。回到香港後，發覺很困難適應香港教會的保守文化和教會模式，不少也因此失落了。我們有見及此，便積極招攬這些回歸人士，再加上我自己及窩福的領袖都是海歸人士；教會文化與模式比較開放，對這些回歸人士來說，是極吸引的。於是我就在家裏舉行數次座談聚會，分享我們的經歷和異象，最後我們就開始了我們的「就業團契」。除了這些海歸人士外，70年代的香港大學生福音工作頗興旺，不少從港大及中大畢業生也來參加我們的就業團契，

我們更蒙突破的創始人蘇恩佩擔任他們的導師，就業團契就因此迅速增長，我們於是開設第二個就業團契，他們也成了窩福的骨幹，到了1979年，崇拜人數差不多升至200人了。

窩福頭10年時間，聚會都是借用窩山的女青年會3樓聖堂作為我們崇拜的地方。這聖堂面積不大，最多可容120人，但到了1980年，崇拜人數已達250-280人，就算我們加開早堂，分散聚會人數，但擠迫的情況仍在。我們和女青年會並沒有任何合約和協議；換言之，他們可以隨時叫我們停止使用。但10年來，女青當局並沒有如此作，不過每逢星期日早上，我都懇切求神叫女青年會的員工及時回來開門，否則我們就要吃閉門羹了。事實上，有數次出現這樣的現象，但以10年計，其比率則是非常低的了！

事實上，寄人籬下是諸多不便，尤其是聖餐主日，首先我要在家中預備好一切，然後運到女青。起初人少，問題不大，但人多了問題就來了，有幸有勞一些弟兄車載一切才解決問題。所以，窩福的長執便起了建堂的念頭。但香港寸金尺土，要建一個可容納400人的堂址是需一筆頗大的數目。再者，不少擁有一個龐大的禮堂及班房的教會，往往只在星期日或星期六，才用得着，其餘星期一至星期五通常都空無一人，這豈非極度浪費資源？我們看看教會史，在教會建立的頭200年，也是教會增長至迅速的一個時期，但那時並沒有「教堂」，一切聚會都在家中舉行，這正是我們當時要考慮的因素。

最後，執委會釐定了窩福未來的策略，一方面我們仍維持現有的模式，以一個小單位作為堂址，平日聚會及辦公都在那兒進行。星期日則作「寄生蟲」，租用一些類似女青年會聖堂的地方，這方法雖然好像沒有多大的保障，但卻節省不少金錢。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只能適用於一個300-400人的教會，所以為了維持教會繼續增長，就要不住的植堂，以同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一個模式在港九新界不同的地方植堂。

這就是窩福在70年末所定下的目標和策略。我們先談第一方向；找一個單位作為基地，平日聚會及辦公都在那兒進行。在1980年，窩福購得何文田街一個單位作為基址，這地方約有1,500呎，位於窩打老道山附近，地點適中，環境亦頗為幽靜，起初我們一家都住在那裏，前舖後居。後來我和執委會都覺得這並非上策，於是我們便搬至何文田街另一個單位，作為我們的家居。而窩福有了一個較寬廣的基址，在80年代無論在量與質方面都有顯著的增長。

1979年4月加開早堂崇拜，1980年1月加設晚堂，崇拜人數躍升至300多人，每年有超過30人接受水禮。到了1980年底，我們又加開午堂，即每星期有早、中、午及晚堂四堂崇拜，到了1981年，窩福的崇拜人數已達400人。1983年增長至450人，1984年增長至500人。女青的地方實在難以再容納這麼多人，於是我們把中堂遷移至九龍塘的方方小學聚會，而這崇拜便是日後恩福堂的前身了！

在第二方面，自1981年至1987年，窩福積極發展分堂，在短短這6、7年間，我們一共開設了七間分堂，包括：

- 1981年 位於新蒲崗的**新福堂**
- 1983年 位於沙田的**康福堂**
- 1983年 位於屯門湖景邨的**景福堂**
- 1984年 位於彩雲邨的**彩福堂**
- 1984年 位於香港中環的**港福堂**
- 1986年 位於屯門山景邨的**山福堂**
- 1987年 位於九龍的**恩福堂**

早期的窩福，會友多屬中產階層、知識份子或大學生，屬草根階層的甚少。但隨著教會的增長，窩福也吸納了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士，有年長的、有住屋邨的、有工廠工人，也有從中國來的新移民。這些草根階層的弟兄姊妹，總覺得窩福的文化太西化了，10句說話中總有幾個英文字。我深信物以類聚，unity有異於uniformity，所以早在1981年，我們已經構思開設一間具有香港草根階層文化的教會了。當時，致力推行這計劃的是蘇恩佩，她是當時窩福的執事。

蘇恩佩是突破的創始人，在美國惠敦大學畢業後，蒙召投身台灣的校園福音工作。後因甲狀腺癌復發，被迫返回香港養病。在養病期間，她目睹這個城市的需要，從神領受了異象，與蔡元雲醫生並肩創辦了「突破」，致力在香港的青少當中推行福音工作。透「突破雜誌」這刊物，輔導、青少年活動與講座及電台節目，試圖把基督教信仰和價值觀滲入這個大染缸中，在80年代起了極大的迴響。她是窩福的執事，又是窩福第一位本地宣教士、職青的導師，她對社會的觸覺敏感，看到一般的香港教會多屬中產階層，草根階層人士難以融合，於是便大力鼓勵窩福開設一間「有草根階層文化特色」的教會，就是這樣，新福堂便在1981年正式成立，也成為窩福的「長子」。

然而，新福堂的增長並不理想，因為這與我們的選址大有關係。雖然新蒲崗是工廠林立的地區，但大部份的工人都不是住在附近，他們一放工就各散東西，返回自己的家了，所以凝聚力並不強。於是我們便想到一個更有效的傳福音策略，是植堂於那些草根階層聚居的屋邨。屋邨是他們居住之處，週末和晚上都擠滿了人，這正是教會的好機會。然而，屋邨地區乃政府重地，沒有私人樓宇作教會用途，唯一的途徑是透過社會服務，乃向政府申請地方作為學校、社會服務中心之用，更可以利用這些地方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作為教會的基地。然而，播道會除了設有一間兒童之家外，並不是太注重社會服務，以播道會的名義申請實在不是一件易事。但想不到神竟然在1982年為我們開了一條大路。

話說窩福堂一位會友，為紀念其丈夫，一直很想捐款興建一間政府津貼的中學。我得悉此事後，便立即與迦密中學的辦學團體興學會接觸，又知道興學會已申請到屯門湖景邨一間新中學，並且積極籌款興辦。想不到事情就這麼順利，興學會不用多費工夫便籌得款項，該會友亦得以順利興建了一間以她丈夫唐賓南命名的中學，而窩福亦在他們同意下，借用這中學來建立一間景福堂，更奇妙的，這新中學的校長竟是播道會的會友，在景福堂成立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神奇妙的作為。

雖然「硬件」是有了，但會友呢？傳道人呢？屯門又離窩福這麼遠，我們怎樣開始發展這間分堂呢？湖景邨、蝴蝶邨是屯門新建的屋邨，單是這兩大屋邨便有數萬名居民居住，他們大多是草根階層，一家大小剛從木屋區、徙置區、舊唐樓等惡劣居住環境搬到這新型屋邨居住，地方較寬敞，設備也齊全，屋租便宜，邨內設有中小學、幼稚園、康樂運動場所、圖書館、街市、醫院、商場等。1983年，窩福的弟兄姊妹及門徒訓練的弟兄姊妹，一共有800多人來到湖景邨和蝴蝶邨，進行了為期3日的「新邨新人運動」，以唐賓南紀念中學為基地服侍了數以萬計的邨內居民。

在這800人中，其中不少是專業人士，有醫生、護士、社工、教師等，也有一些來自草根階層人士。在1983年7月致窩福弟兄姊妹的家書中，我有這樣的描述：「新邨新人運動，透過服務和宣講，把福音介紹給湖景、蝴蝶兩邨的居民，這計劃由我們窩福堂及基督徒醫生團契合辦，屯門區議會資助，並有屯門政務處、醫務衛生署、警務署、社會福利署、教育司署，房屋署等為顧問。上午我們有靈修、聽道，下午及晚上則有醫療、家庭及

社區服務，幫助他們建立合群的意識及對教會的好感。在8月28日，我們更有一大型綜合晚會，一面提供文娛康樂，一面帶出福音訊息，這幾天，透過各類服務（醫療、茶會、晚會、查詢、講座），我們接觸到差不多20,000人，而參加晚會的有3,000人，決志信主的達110人。」

景福堂在「新邨新人運動」後的一個星期正式開始崇拜了，參加人數約60人，聚會地點就是在唐賓南中學的禮堂。雖然我們有好的開始，但在興奮之餘，我卻有憂慮和擔心，邨內大多是30多歲的夫婦，有2-3個幼小的孩子，丈夫早出晚歸，很多家庭主婦都面臨極大的壓力，不少兒童亦得不到好好的教養，景福堂要面臨的挑戰實在非常大，只靠兩個傳道人而沒有平信徒的支援，這實在是一樁非常艱巨的事工！

相對屯門湖景邨的景福堂，我們在差不多時間同時於沙田博康邨所建的康福堂則有所不同。80年代，香港政府銳意發展新市鎮，以廉價租給草根階層，其中以屯門和沙田為甚，每個大型屋邨都有各樣的設施—學校、老人中心、幼兒園、商場、圖書館、診所及醫院等。1983年，神為我們預備了在湖景邨的景福堂，想不到在同一年，神又為我們在沙田博康邨預備了康福堂和康福老人中心。其中早在1982年初期，我們已積極向政府申請在這些新市鎮開辦一些社會服務，剛巧那時政府正召募一些志願團體在沙田開辦老人中心，經社會福利署審核，我們便在博康邨承辦了一個老人中心，並在此開設了康福堂，在短期內，我們籌足了開辦的費用，並積極的招募社工和傳道人，並且我太太君玉亦在此負責心理輔導的服務。

談到康福堂的發展和成長，我不能不提兩個非常有趣的事工，雖然這是一個老人中心，但康福堂絕不是一個老人教會，為了發展其他年階事工，我們特別推廣「婦女事工」和「醫療事工」。首先談談「婦女事工」，我們稱之為「師奶組」，在邨內住有不少的家庭，丈夫一早便要出外工作，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太太則要留在家中照顧年幼的子女。這些婦女要面對很多家庭、經濟、空間(特別是兒女上了學)和婚姻等問題,再加上她們大多是教育水平較低,人際關係不大成熟,往往就產生很多問題。以下黃太太便是新市鎮家庭的一個典型例子。

黃先生一家五口本居住在西環的一個小單位,租貴、環境又惡劣,久候多時終於能遷居於沙田博康邨。初到貴境,看到新邨外貌美觀,空氣又好,地方也較前寬敞,而且租金更便宜得多,心中實有極大的期望。黃先生每天要往西環工作,來回時間花了3個小時,每天放工回家,除了稍稍享受一下「歡樂今宵」外,簡直沒有什麼家庭生活。黃太又如何?由於家婆住得遠,不便照顧孫兒,黃太只好辭去一份工廠的工作,專心照顧3個兒女。她要獨自為子女找學校,接送子女,料理家務,把她弄到幾乎精神崩潰。在新環境中人地生疏,遠離親友,又不敢輕易相信陌生的鄰居,丈夫早出晚歸,回家後也沒有兩句,特別遇到突發事件(如孩子生病,治安問題)更令她手足無措,日久她的脾氣也變壞,兒女常受無理的責備,結果她愛上打麻雀,索性整天在隔鄰打麻雀,不理子女與家務,令丈夫極不滿意,婚姻也因此而破裂。

上述的獅子山下故事是屋邨常見的現象,香港大部份的虐兒案件都發生在屋邨中。為了針對上問題,君玉便負起婦女事工的責任,提供心理輔導,開辦「親子」課程,繼而邀請一些有心追求的婦女參加福音性研經,神祝福這事工,不少婦女都因此而認識了主,其中也有不少還積極地參與教會的事奉。

更有趣的,她們的丈夫看到妻子自從參加了康福堂後,與麻雀絕緣,脾氣也好了許多,出於好奇,他們也來康福堂看看。我們看到機會來了,於是每個月都舉辦家庭聚會,每個家庭都帶一味小菜來聚餐,樂也融融,

但見那些丈夫們一手拿著啤酒，一手拿著聖經，身穿街坊裝，圍著一起查經，非常有趣，教會就慢慢地成長起來！

另一方面，我又要提及窩福的醫療隊。在窩福，有不少會友是醫生、牙醫、護士、社工等。我們於是設立一隊使命隊 (Mission team)，有內程 (Inward journey) 及外程 (Outward journey)，每星期都有查經分享和禱告的時間，每月一次我們會前往康福堂作義診與探訪，服侍區內的居民，分享基督的愛，這些居民不但可以免費檢查身體，更有醫生與護士親臨家中問好，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激，而這些弟兄姊妹也得到極大的鼓舞，正如一位行醫的弟兄說：「不知何解，在這裏診症比在醫院裏愉快得多！」

康福堂就這慢慢地成長起來，在傳道人黃家名牧師的帶領下，成為一所可以獨立的堂會了！

在香港的80年代，新屋邨大多是中年夫婦家庭，他們有年幼的子女，所以在這些屋邨中，設有不少幼兒園、中小學等。但在市區內的屋邨，則有不少的青年人，尤其是20-30間的青年人，他們更需一些青年中心，提供一些健康的活動，免得他們被區內一些黑社會份子吸引去！這是市區內舊屋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香港工業福音團契有見及此，乃向社署申請了位於彩雲邨的青年中心，他們就以窩福作為他們的夥伴，工福負責發展中心工作，而窩福則負責福音工作，並在青年中心內設有教會，名「彩福堂」，窩福並且聘了李成章弟兄為該堂的傳道人。

無可否認，這是一個新的嘗試，究竟這樣的模式是否可行呢？從這次的經驗中，我們發現有兩大問題存在：首先，由兩不同的機構(工福及窩福)及兩個不同的管理階層去開辦這個中心/教會，在某程度上是困難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中心主任向工福匯報，教會傳道人向窩福匯報，但大家又是同屬一家，服侍同一群體，中心同工是教會一份子，但傳道人也是中心的一份子，角色是非常混淆，雖然大家都是服侍主，不應有你我之分，但在實際的管理來說，這不是一個理想的模式。

第二方面，中心的使命與教會的使命是各有不同，青年中心當然是以青年為主，但教會卻不能只做青年的福音工作，康福堂並沒有這問題，因為老人中心是教會轄下的機構；而景福也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基本上景福只是借用唐賓南紀念中學，在管理方面，河水不犯井水，所以並沒有存在彩福的矛盾。

結果幾年後，彩福堂決定自己向政府申請開設家庭服務中心，由教會督導這個中心，模式與康福一樣，這改變果然帶給彩福新的發展機會，亦帶給彩福的成長！其中有不少窩福會友移師至彩福，成為彩福的骨幹，因為他們看到

九龍山下看彩雲，
彩雲廣廈千萬層，
曾幾何時彩雲去，
良機莫失負我神。

正當窩福積極的向草根階層進軍之際，教會一些弟兄姊妹亦同時看到白領階級人士的需要，尤其在中環一帶的商業區，每天數以萬計的白領穿梭這區，但在中環的教會卻是寥寥可數，我們就開始思想在中環開展福音工作。於1984年，教會決定租用位於中環的希爾頓酒店舉行崇拜，後來再搬到美麗華酒店，另外在中環購得辦公和聚會的地方，模式有點像窩福，並且定名為「港福堂」。起初，約有40多位窩福會友移師至港福，

其中不少是窩福的執事和活躍份子。此外，我在港島半山區開了一個「星期二查經班」，起初是為未信而開設的福音性研經，後來愈來愈興旺，儼如成為一個頗有規模的團契，他們大多是青年人，又是專業人士，他們後來也成為港福堂的中堅份子，港福堂在何志滌牧師的牧養下，發展迅速，並且先後開設了「同福堂」及「尖福堂」分堂，這些教會後來也發展成極具規模的大型教會！

我是在1985年離開香港移民到三藩市。但我離開前，正積極的籌備設立兩間分堂，一是位在屯門山景邨的「山福堂」，一是從窩福分支出去的「恩福堂」。山福堂在1986年成立，而恩福堂則在1987年成立。想到山福堂的成立，我就想到一個非常有趣且令我做醒的故事。話說1965年，那時我正在皇仁中學唸中六，父親一天對我說：「我要找一天，與你到理民府辦一點手續。」原來父親早年在大埔買了一塊農地，面積11,000平方呎，但這只能作耕種之用，他覺得自己年紀開始老了，便把這幅農地轉讓給我，我頓時成為一個年青的地主。後來父親於1972年4月病逝，我也把這事忘記得一乾二淨，記不起自己在大埔擁有這樣的一塊農地。在80年初，我偶然發現了一張地契，才猛然醒起這事，連忙到大埔理民府查詢，才知道我11年來都沒有交地稅。但這農地的稅率非常低，要付的金額也非常便宜，但想到這是一塊農地，我又怎會老遠跑到大埔種菜呢？我就只有把它荒廢了！

想不到事隔一年許，我突然收到香港政府來函，通知我政府擬在大埔發展新區，要收回我那塊農地作興建醫院之用，並願意以每方呎\$69元收購。我連忙計算一下，嘩！差不多有70多萬。是一個非常頗大的數目，那時我在窩福的月薪還不到3,000元。當時我心裏想：「我暫時不告訴家姐和弟弟，待我計劃清楚如何使用這筆錢財，再通知他們。」那個星期，我的腦袋就只有那70多萬元，連睡眠也大受影響，甚不好受。最後，我把事情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告知君玉，我們決定和家姐及弟弟商量，把這筆錢的一部份捐給窩福，在屯門山景邨開辦一間幼兒院，名為「蘇森幼兒院」以紀念我們的父親，並且在這幼兒院內辦一間分堂，名為「山福堂」，事就這樣成了；而負責牧會的陳華昌，他是早期在浸會唸書時參加我們家中的查經班信了主，並在窩福成長，畢業後，他入中神唸神學，繼而在「山福堂」當起牧職。

早在1983年，窩福堂的執事會已經開始想方法解決在女青之擁擠情況。我們構思把中堂移到在金巴倫道的播道神學院，並且借用在播神對面的方方幼稚園作為兒童主日學之用。若中堂繼續發展，我們便把窩福一分為二，在女青聚會的仍屬窩福，在播神聚會的另組一間新的教會，剛好於1985年10月弟弟蘇穎智牧師神學院畢業，回港加入窩福的團隊，負責發展中堂事工，並於1987年正式成立新的教會，初命名為「金福堂」，後改名為「恩福堂」。1990年遷至青山道秋創大廈聚會，2005年自建恩福中心大樓，樓高20層，禮堂可容1,600人，並且發展成為香港至大的一間堂會。

窩福在10年間，從一個只有20多人的教會，發展成為一間有500多人的教會，並開設了7間分堂，這也可說是一個奇蹟。究竟窩福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策略和秘訣呢？這正是一位在神學院唸書的同學，在他研究香港教會增長的課題中向我提問的問題。我答道：「老實說，我不知道！我們在開始窩福堂時，並沒有一個藍圖，然後按步就班的去完成。」當然，我們有一些大方向，如注重福音性研經、釋經講道、門徒訓練等。但我們並沒有什麼所謂秘訣。事實上，當我在最沮喪，最挫敗之際，甚至準備完成一年合約後重新另覓工場，神就給我們機會，一個一個出人意的機會，先是在浸會任教，繼而有海歸人士參與，又有不同機會在屋邨發展分堂。不過，弟兄姊妹的同心，沒有教會人事的問題，不少能幹和有屬靈深度的領袖，都是神特別祝福窩福的重要因素，當然，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如保羅

在哥林多前書三章6-7節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它生長，可見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



攝於按牧典禮。

牧師這一行

當我在窩福事奉的時候，一天接到一個小學同學來電，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埔官立小學同學聚舊的茶聚。我當然極樂意赴會。事實上，我們已經30多年沒有見面，難得有同學聯絡了十多個仍留在香港的同學相聚。

我們一見面，相見無雜言，且道自己是幹哪一行。我們彼此交換咭片，我收到十多張咭片看看，才知道我的小學同學幾乎每個都事業有成，有些當校長，有些當大學教授，有些當醫務工作。唯獨我只是個窮傳道，心裏有點兒自卑。因為我沒有咭片，有位女同學便問道：「蘇穎睿，你是幹哪一行？」我答道：「我是當牧師的。」想不到他們一聽到「牧師」這個詞，反應就非常熱烈，並且異口同聲的說道：「牧師!？」跟著以後的20多分鐘，話題都落在牧師這個行業。

「牧師的工作是什麼？」

「牧師只是講道嗎？每星期只講一次，豈不是非常得閒？」

「牧師可否結婚？牧師有沒有薪金？」

我忽然覺悟到：原來對許多香港人來說，牧師這一行是非常陌生的。他們也想不到蘇穎睿竟當起牧師來。我聽到這一連串的問題後，就對他們說：「當牧師，真不簡單啊！我小學畢業後，便往皇仁中學念書，然後考進香港大學，畢業後再前往美國攻讀神學，先在Westminster神學院畢業，繼往普林斯頓神學院深造……」正當我滔滔不絕講及我的履歷時，忽然我醒覺過來，問自己：我現在說什麼？我其實是對我的同學說：「我雖然沒有咭片也只是一個窮傳道，但你們不可輕看我，我也有著輝煌的成就」。其實，這是我的自卑感作祟。

究竟牧師這一行是怎樣的呢？牧師的工作又是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人有何需要。據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Abraham Maslow所說：人的需要可分為五個不同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有關我們肉身的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饑而欲食，寒而欲暖，人之天性。我們必須有空氣、水分、陽光、溫飽、休息才可以生存。不少的行業就是為了解決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應運而生。人不單是要滿足這肉身的需要，他更需要活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第二個層面就如一個人流落在亞馬遜森林，毫無保障，心裏充滿恐懼，就要是他有足夠的食物和食水供應，生存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安全感對一個人是相當重要。不少行業也是針對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應運而生。第三個層面是愛、支援、家庭；就如一個人流落在亞馬遜森林，雖然有食物食水、也有防身的武器，但若一個人孤孤單單在亞馬遜森林中，沒有支援，沒有同伴、沒有家人，他也是難以生存。因此，不少行業也是針對這需要應運而生。第四個層面Maslow稱為esteem need，意思是人除了上述幾個實際需要外，他還需要有人稱讚、尊重和成就感，他才有動力去生存。最後一個層面Maslow稱之為self-actualization need。所謂self-actualization是指人需要找到他的人生目的和意義，並且尋求實現這目的，正如一個人在亞馬遜森林中，原來他是要來到這裏去尋找他失去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兒子。有了這目標和意義，他生存的動力就大大不同了！

我以為宗教信仰最能滿足這些需求。正如著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說：在人的心深處，有一空間是留給神的，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之。宗教信仰可以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安全感，一種深層次的愛：使人能去愛和被愛；更能建立他的自信，看重他作為神子女的價值，更賦與他的人生意義和使命感。宗教信仰不但可以改變個人的生命，歷史告訴我們：更往往影響人的文化、經濟、政治等的發展。我蒙召作牧師，承擔這使命，實在是非常蒙福；尤其當我親眼看見一個人，因為信了耶穌而生命得以逆轉，這種喜悅和滿足感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一天，我接到一位會友來電，他告訴我：每逢星期三，他和一班要好朋友都一起打高爾夫球，他們玩完後，大談波經和時事。一天，他們談起人生意義的課題。他們都是50多歲中年人士，在社會上有成就，可是他們都正經歷中年危機，覺得人生有點空虛。雖然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子女多在外國念書。但人生過了半百，好像有點兒迷失，不知做人是為了什麼。這弟兄便向他們提議，邀請我帶領查經，討論人生意義這課題。於是，每逢星期三晚上，我們一起吃完晚飯，然後查經。想不到這查經班就此興旺起來。其中也有不少信了主，生命有所改變。表面看來，這一班人一無所缺，生活富裕；但其實心靈卻是非常貧乏。正如奧古斯丁所說：他們心靈深處空位只有耶穌才能填補。

我又認識一位40多歲的女士，他在政府部門任高官已經20多年。事業心重，沒有結婚，與母親同住。但不幸發現有末期癌病，自己也知道是絕症，命不久矣！但心有不甘，非常憤怒，難以接受，繼而抑鬱。她告訴我：此時此刻，心靈和情緒的折磨，較肉體的折磨更痛苦。她來找我傾談，我大部分時間只是聆聽。剛好那時，我剛看完Mitch Albom的Tuesdays with

Morrie，於是便提議一同查經，討論人生的問題，她一口答應了。我就這樣陪她走完人生最後的一程。這半年來，不但改變了她的人生觀及對苦難的看法，並且在她離世之前，信了主，接受了水禮。而我自己也在這次旅程中得到極大的啟迪。我開始體驗：當一個人走至最後一程，最需要的就是盼望和愛心。身懸十架的耶穌正好滿足這兩方面的需求：死亡並非絕望，而是到那更美好的家鄉。在我們軟弱、驚恐之際，我們可以隨時來到主耶穌跟前，求憐憫、蒙安慰、得隨時的幫助。這姊妹是帶著盼望和尊嚴走完她的路程。她可以與保羅同聲說：「美好的仗已打過了，當跑的路已跑盡了，所信的道已守住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摩太後書四章7節）

作為一個牧師，能夠有機會陪這些弟兄姊妹走他們最後的一程，既是挑戰，也是祝福。我又想到一位患了愛滋病的年青人故事。一天，我收到醫院的院牧的來電，去探望一位病人；因為這病人很想與一個教牧人員傾談。於是我便應約到醫院探望他。誰料他見到我時，立即轉過頭來不睬我。我自我介紹，給說明此行目的，他沒有理會我，還是轉過頭來不瞅不睬。我一時不知如何，只有坐在他的床邊默默為他禱告。過了大概15分鐘，我對他說：「我沒有興趣知道你是怎樣染上此病，但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們都是罪人，耶穌是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以致祂可以赦免我們的罪，叫我們可以從罪疚中得釋放。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大過耶穌赦罪的恩典的。我來目的，只想和你分享這個福音。」此時他轉過頭來，眼裏不住的流著淚水，對我說：「牧師可否為我禱告」。我們就一同禱告，他也開聲禱告、認罪，接受耶穌作他的救主。一個星期後，他安詳地離世，去到更美好的家鄉。我為他主持安息禮拜，參加這次安息禮拜的只有6個人，都是他姐姐和他的家人。在安息禮拜中，姐姐講述他的見證，非常感人。他信主後的6天，是他人生最喜樂的一段時刻，他從沒有想過弟弟會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有如此大的改變。

李女士是從中國大陸移民來港。她嫁給一個比他年長差不多20年的丈夫，生了兩個兒女，後來終於可以舉家來到香港與丈夫在一起；但可惜不夠兩年，丈夫病逝，剩下李女士和兩個兒女。他們住在大角咀一間散房，環境非常惡劣。一家靠政府的綜援維生。我有機會家訪他們，那個唸小學五年級的女兒告訴我，每當她路經彌敦道一家餅舖，看到那些蛋糕，都夢想一日能品嚐。我聽了便立即帶她到那餅舖，買了一打蛋糕給他們，令他們喜出望外。

自此，他們一家便開始參加我們教會的聚會，我又邀請這一對兄妹來參加一個英文補習班，是我專為一些從大陸來港的小朋友而設的；李女士亦開始參加團契，並且一家都信了主。憑著他們的努力，兄妹二人都能入讀大學，畢業後找到好的職業。他們一家申請到房署的一個單位，安居在一個政府屋邨中。李女士常常在人面前見證說：「主耶穌改變他們一家，在教會裏真的嚐到人間的溫情和友愛。」我實在為他們感謝神，作為一個牧師，能夠親眼看到如此的改變，實在是極大的福氣。

其實這些只不過我過去作牧師所見到其中例子，類似的個案，不可勝數。有些是滿腹經綸、事業有成的人士；有些是市井之徒，草根階層之輩；有些是年長的，有些是年幼的。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中，遇到風浪，面對生離死別，得失成敗，走進人生的低谷；我有機會扶他們一把，引導他們來到主的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憑著神的恩典勝過一切風風雨雨！我怎不會為牧師這職份而感恩呢？

然而，牧師這一行也有著不少的矛盾和幽暗面。有一次，一間友好的教會約我們教會舉行一場籃球友誼賽。我們教會的弟兄多是文弱書生，

可出賽者有限，於是連我這個「廖化」也當起先鋒來。球賽中，雙方爭持得激烈，但不知何故，球證頻頻吹罰我們。其中一次，明明是對方犯規，但球證卻指我犯規，我心有不甘，氣忿忿的把球擲在地上，以表不滿。球賽結束，我們輸了。賽後對方的一位球員，是我認識的一位弟兄，過來拍拍我的肩頭，笑笑地說：「牧師，你今天很勇呀！」我聽了很不舒服，也覺得有點羞愧。我明白他所謂「勇」，其實是「莽」。我頓時覺得有點內疚，怎麼身為牧師，在球賽中這樣失見證！但我回心一想，別人犯規我受罰，這樣的判決豈是公平？難道只因我是牧師，就要壓抑和否定我內心真正的感受嗎？究竟我要做一個有血、有肉、有軟弱、有七情六慾的蘇穎睿？抑或做個沒有軟弱、沒有性情、被枉罰也要笑容滿面的蘇牧師呢？我心裏為此事困擾多日。最後忍不住在同工會中分享我的掙扎，同工們異口同聲支持我做蘇穎睿，而不是失去自我的蘇牧師。

很多人對牧師都有一種特別期望，以為牧師是聖人，不可能軟弱、犯錯和跌倒。這樣的期望，對牧師們產生很大的壓力，迫使他們去扮演超級聖人的角色。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自己的軟弱、掙扎、矛盾、和幽暗面。但為了迎合會眾的要求，牧師只要能去扮演一個聖人的角色。有人稱牧師為「受薪聖人」，此語雖不中亦不遠矣！難怪我們很容易成為一個法利賽人，我們只是扮演一個牧師的角色，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牧師。

William Hume用了3個很有趣的英文字來形容牧師與會眾的關係。這3個字是 idolize, tantalize 和 scandalize。第一個階段是 idolize。會眾對初上任的牧師都帶有極大的期望，尤其是上一任的牧師因與會眾不合而離去，他們視新牧師是救星、聖人、好像神明一樣，這就是牧師的蜜月期。第二個階段是 tantalize。這個英文字源於一個希臘神話的故事。Tantalus 被天神責罰，降在陰間，又饑又渴。忽然有佳餚美酒，呈現在眼前。當他正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伸手拿取，這些佳餚美酒忽地消失了。Tantalize就是用這樣的手法去玩弄他人。會眾不是不曉得牧師也是人，絕不是毫無軟弱的聖人，但他們仍要牧師去扮演超級聖人的角色。當他們發覺原來這牧師只是個紙老虎，就開始對牧師不滿，閑言閑語，全無尊重，這就是scandalize第三個階段了。

聖經告訴我們大祭司(牧師)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希伯來書5章2至3節)。作為牧師，最大的挑戰：就是要誠實面對自己，承認自己是個軟弱人，了解自己的陰暗面，做個透明人，而不是去扮演聖人的角色。

嚴格來說，牧師不是一種行業，也非專業人士，而是一種關係。我常對人說：世上最艱辛的工作有二，一是家庭主婦，一是牧師。因為他們24小時都on call，沒有返工和放工的時間表。就如一個父親，絕不能對他的子女說：「朝九晚六、星期一至星期五，我才是你的父親。其餘就切勿視我為你的父親了，因為我已經放了工。」同樣，牧師也不能對一個會友說：「今天是我的假期，我不是你的牧師了！」正因如此，便產生極大的問題。一方面既沒有放工的快感，更嚴重的是不曉得公與私、家庭與教會的分別。明明答應子女一同旅行，但一個電話來到要開會或找為牧師輔導，就犧牲家庭的時間；這是非常危險和不智的。我以為家庭是重要過我們在教會的事奉，在我們先後取捨的次序中，也當以家庭為首。正如提摩太前書3章5節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我又記得有一次我去探訪一名會友，他一見我便說：「牧師，這麼空閒探我們呀？」我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假若我告訴他：「我不是有空才來探你，探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心裏一定會想：「原來牧師不是真正的關心我，他只是為了工作所需才來找我。」但如果我告訴他我確是比較空閒才來，這也不通，因為探訪確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又是一大矛盾。我又舉另外

一個例子：每個人都知道作為一個牧師，應該多作靜修、默想功夫。正如著名的英國神學家 A.J. Gossip 對他的神學生說：「我們作信徒的花了不少時間工作和打理其他世務，你們可以專心的在隱密處與神相交，以至星期日可以把你們從神領受的與我們分享，這實在是一大權利」。有見及此，我一早便拿著旅行袋，計劃到長洲整日靜修，靜修後到附近沙灘暢泳，享受一天的寧靜。怎料在碼頭遇到一位會友，問我說：「牧師你要往長洲講道嗎？」我對他說：「既不是講道、也不是開會、更不是假期。我只是想往長洲享受一天的安寧罷了！」他好像明、又好像不明，還好他不是執事，否則我又要在執事會費一番唇舌解釋。對一般人來說，靜修、探訪都是有空時所作的事，為了避免別人誤會，最安全的方法便是不去探訪、不去靜修、天天朝九晚五坐在辦公室裡。但每個牧師都曉得：這樣做牧師是永遠牧養不到他的羊群。

不知何解，在今日華人教會圈子，以為忙碌是一個屬靈的標記。牧師不忙，表示懶惰、不屬靈、缺乏責任感。最好表示自己是個大忙人，就是搞活動；開什麼夏令會、秋令會、冬令會、奮興會、培靈會、差傳會、職員會。總之，記事簿上填滿了會議的時間。但我作了牧師幾十年，可以說大多數的會議都是浪費時間的，就是取消這些會議，教會依然照常運作，毫無影響。我有一次在執事會提出我的疑問，結果給執事會主席教訓了我一頓，不應有如此政治不正確的思想。至於探訪、靜修、輔導、門徒訓練等牧養工夫實在太隱藏了；然而，我心裏卻存著這個矛盾：究竟我要作個過忙的 CEO，抑或作個真正的牧者呢？

牧師的工作對象是人而非計劃和事物。牧養一個人與寫一篇論文完全不同。只要花多點時間、心思、考究，論文一定有所成。但叫一個人信主、成長、效果未必與所花的時間成正比，有時甚至成反比，一點效果也沒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令人感到沮喪，以致不少牧師常背負罪疚和失敗感，更甚者是牧師的孤寂感。記得在神學院時一位教授語重心長對我們說：「牧師沒有可能在教會找到知心友。」我起初不相信這話，教會是基督的肢體，弟兄姊妹互為肢體，怎麼有可能在教會找不到一個知心友？但當了牧師這麼多年，我漸漸體會這句話的真實性，也明白到牧師忍受孤寂的嚴重問題。當他遇到困難，內心充滿恐懼、不安、引誘，他找不到傾訴的對象，因為會友不能接受牧師有如此的軟弱；就是婚姻發生了問題，也不敢找人輔導，自己隱蔽起來！難怪很多牧師出了亂子。

如果說牧師難作，他的妻子及子女更不易做！會友往往對他們另眼相看，遂成為眾矢之的，一旦行差踏錯，整個教會都會轟動！牧師為了保持好的見證，便對妻子和子女大施壓力，於是家庭問題、婚姻問題、隨之而起。不少會友對師母有一定的期望，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師母就好像是不受薪員工，買一送一。我太太常常對人說：「在聖經中從沒有一種恩賜叫“師母恩賜”，我教主日學，不是因為我是師母，而是神給我這方面恩賜和訓練；我輔導也是因為神呼召我作如此的事奉。我是嫁給蘇穎睿，並不是嫁給教會」，真是一語中的！

不過牧師最大的挑戰莫過於他與教會長執的關係。在教會的體制中，牧師是受聘的員工，不少長老執事視自己為老闆。教會通常也有人事部，監督牧師的表現，儼如僱主與僱員的關係。但聖經清楚說明牧師是屬靈的領導，是擁有權柄的職份。二者之間的關係微妙，不清不楚，於是矛盾自然存在。若我們太重牧師屬靈的權柄，教會很容易落在一個獨裁者手中，產生許多不健康的情況；若教會過份重視長執的監管責任，視牧師為員工，就容易引起牧師的反感，覺得教會的枷鎖甚大，不能發揮他的恩賜，也無心在這樣環境事奉。

談了一大堆令人沮喪的牧師問題和矛盾，或許你們會問：「你又有沒有後悔入錯行呢？」我可以肯定說：「沒有！一點也沒有！」據英國的一個調查：有兩種行業是極少人轉行的：一是醫生，一是牧師。牧師有兩大工作：教導與牧養。以弗所書四章11節把牧養與教導放在一起，這就是牧師的職份。每星期我能有機會講道、查經、教主日學，教導神的話語，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因而看見人生命的改變，心裏的滿足和喜樂非筆墨所能形容。除了教導神的話語外，又作祭司的職份，陪伴那些受傷的肢體渡過他們人生的低谷。其實，我自己何嘗不也是負傷的？但卻能透過以往的受傷經歷作個負傷的治療者。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一章4節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遭受患難的人。」美國猶太裔諾貝爾和平獎得主Elie Wiesel講過一個非常發人深省的故事，這正道出我們作牧者的心聲。

有一個猶太教的拉比，他辛勤教導神的律法，付上自己的生命去安慰和扶立那些傷痛者，日日如是，令他感非常疲累。他不是身疲，而是心疲，心疲比身疲更難受，每當他看到世上的疾苦、不平、欺詐、鬥爭，而他面對這一切一切又顯得這樣無能無助，他感非常憤怒、痛苦和沮喪。他實在忍受不了，於是便決心離開牧養的崗位，遠走他方，希望找一處寧靜的地方，在那兒他不用再去接觸這些傷痛的人士。

翌日，他脫下拉比袍，離開會堂，尋索他那個樂園。當他走到一條村落，正要在樹下稍稍休息，忽然看到對面有一位老婆婆，躺在地上呻吟。他看到這位老婆婆孤單可憐，就動了慈心，上前安慰她，老婆婆已經病入膏肓，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拉比決定陪她走人生最後的一程，那老婆婆心得安慰，就用微弱的聲音問拉比說：「先生，請你告訴我，神為什麼容讓我活在這個殘酷的世界？在我一生中，沒有半點幸福、快樂，所看到的，所經歷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儘是痛苦、不平，究竟這樣做人有什麼意思？」拉比聽了很痛苦，想不到離開自己的崗位後，竟也逃避不到這個老問題。最後，他痛苦的對婆婆說：「對不起，我沒有答案，然而，你既然已經活著，也沒有其他可選擇的，倒不如勇敢地接受這一切，勇敢地活著吧！」那婆婆聽了後好像心頭放下了大石，而帶著笑容，安詳地離開了人世間！當拉比安葬了婆婆後，心很痛，就自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是啞的，我也不願意再開口教訓和安慰人！」

又隔了兩天，拉比來到另一條村，看到一個年青的婦女，抱著一個初生的嬰孩，躲在一角飲泣，拉比上前看過究竟，才發現嬰孩氣息微弱，奄奄一息，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拉比動了慈心，料理那個垂死的嬰兒，那年青的婦人含著淚問：「先生，請你告訴我，為什麼神竟會容讓一個無辜的嬰孩這樣受苦。這位「啞」的拉比委實也無言以對，就只有搖搖頭，流著淚，默默為嬰孩祝福，然後安葬了他，帶著極沉重和痛苦的心情離開了！走前，他心裡自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不但是啞的，也是聾的，什麼也聽不到！」

最後，這位又啞又聾的拉比來到一個山洞，那兒沒有人，沒有痛苦，沒有人需要他的安慰和教導，整天只有他一個人，寧靜在山上渡日。一天，他在山洞前看到一隻受了傷的小鳥，他就動了慈心，用草藥為牠治療，醫治牠。自此小鳥常飛到山洞前，與拉比渡日，他非常快樂，以為這是世外桃源，不料一天，一塊大石從天而降，把小鳥壓死了！拉比目睹這悲劇，非常震驚和心痛，於是他自言自語說：「從今以後，我不但是啞的、聾的，而且更是瞎眼的，我什麼也說不到，聽不進，看不到！」

這位又啞、又聾、又盲的拉比，一個人自閉在山洞中，什麼也做不到。想了一會兒，他開了自己的耳、口及眼，收拾簡單的行裝，返回會堂，去繼續做他牧養的工夫！

作了牧師40多年，我是非常認同 Wiesel所講這個又啞又聾又盲的拉比的故事，所以我雖然退了休，現在仍是在牧養中！



第二十九章

重

逢

十年離亂後 長大一相逢
問姓驚初見 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 語罷暮天鐘
明日巴陵道 秋山又幾重
李 益

從九龍開出的一班火車，正要抵達廣州近郊，我心跳突然加速，腦中不絕閃出三十年前的一幅景象：火車填滿了人，我和家姐、弟弟、妹妹躲在火車一個角落。母親非常緊張地伴着我們，又不住的吩咐我們不可哭、不可出聲。火車雖然擠滿了乘客，但却是出奇的安靜。外面還隱隱從遠處傳來的槍炮聲！火車慢慢的開出，車內車外都非常黑暗，只有微弱的燈光！這正是母親帶領我們在1950年離開中國的情景。當我在1980年帶着太太與兒子第一次回鄉時，火車將駛近廣州車站，一幕一幕的走難景象又重現在我腦海中，我發覺全身都是冷汗！想不到深藏在我心裏的恐懼，一下子就好像潮水般湧上來，令我全身發顫。

1980年，我正在香港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牧會，並義務在浸會書院教授一堂哲學。一天，當我正教完書回家之際，宗哲系的秘書告訴我，收到一封從中國大陸寄來的信，上面只寫着，香港浸會書院蘇穎睿收。我覺得有點奇怪：是誰從中國大陸寄信給我？這人又怎知我是在浸會書院教學呢？我連忙拆開來看，原來

是一封沒有署名的匿名信，信內只有簡單幾行字：「如果你想尋回你所失落的妹妹，可以往廣州一德路賣麻街二號找！」

我雖然滿心疑惑，也不知信裏所寫的是否屬實，但我決定按着上述的地址去看個究竟。於是便帶着太太和大兒子回國一行。但當我們找到一德路賣麻街二號時，發覺共有9個單位是同一地址的，我們既不知是那一間，也不知妹妹改了什麼名字，更不知道她的容貌、身世及背景。但我們仍然逐家拍門查詢，說要找一個30多歲的女子，是從江村來的，按理我們既屬兄妹，或許有點相像，但仍是徒勞無功，就在這時，可能是驚動了街坊，召了一個公安來查個究竟，並且勸我們離去，不宜繼續尋索，我們只有帶着失望和疑惑的心情返回香港。

回到香港後未幾，又收到另一封匿名信，是同一個寄信人，並且說明正確的地址，是一德路賣麻街二號第二個單位。這回我沒有立即去廣州再找，而是寫了一封信給這地址，並希望「妹妹」寄她的近照給我，好讓我們往廣州相認。她很快便回信了，並且寄了她的近照給我們。我一看，便毫無疑問的確信：她的確是我們失散了妹妹蘇穎微，因為她看來是有點像家姐蘇穎儀的。

於是我和家姐，姐夫一行3人連忙坐火車去廣州。穎微和她丈夫桂凌一早便來到火車站接我們。大家相見，起初是有點尷尬和陌生，但却懷着一股興奮的心情相認。桂凌曾服役於解放軍，在越戰時負責運送彈藥與物資從廣西至河內；後來退役後便在一間國營公司任職司機。妹妹則任職一間託兒所，有兩個兒子，正在學校唸書。

到了晚上，我們一行人到荔灣吃晚飯。經過一日來的相處，那種陌生感已消逝了。席間，妹妹說：「真想不到有今天，假如爸爸媽媽仍在，看到我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兄弟姊妹能夠相認相聚，多好呀！」她還沒有說完，已經泣不成聲，而我和家姐亦禁不住哭起來，還是姐夫和妹夫異口同聲說：「這應該是個快樂的日子，不要哭了！」

妹妹講述她的經歷時，真想不到她的遭遇是這麼悽慘。自從媽媽死後，他們暫時寄住在同父異母的大家姐家中。因為父親及她的丈夫耀明沒有攜帶大家姊和子女一同逃到香港，讓她獨自兒在大陸受苦，現在還要照顧一對同父異母的弟妹，令她非常憤恨，把一切的積怨都發洩在他們身上。最後，仁慈的姑母看不過眼，就收養了弟弟穎智，而大家姐決定把妹妹穎微賣了給一家姓盧的水上人家。

這姓盧的誼父擁有一隻艇，這既是他們一家的住所，也是他們養生之工具。他就靠着這隻小艇，載貨載客來往流溪河，賺些少錢養家。穎微自小便困在這隻小艇上，既沒有機會在學校受教育，也沒有空餘時間到岸上，所以她從沒有穿過鞋。她告訴我們，直至結婚那一天，她才第一次穿上鞋子。冬天寒風刺骨，艇上通風，異常寒冷，她又缺少禦寒的被鋪，晚上只靠抱着她心愛的貓，藉着牠的體溫來取暖。有時貓在半夜撒尿，弄到她一身貓尿味道，狼狽不堪，而且還遭誼父誼母大罵一輪，聽者無不為她難過。

她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長大，後來有機會認識了桂凌，並且結婚成立他們自己的家庭。桂凌在部隊服役時，穎微獨自兒撫養兩個兒子長大。桂凌退役後，他們搬到廣州居住。因孩子們已經入學讀書，穎微亦開始在幼兒園工作，而桂凌則在一間國營公司任職司機，生活雖然清貧，但也可算是穎微有生以來至幸福的日子！

父親離世後，留下了一塊農地和森廬給我們。後來香港政府因要發展

大埔，便收了我們這物業，並且賠償了一筆可觀的數目給我們。我們兄弟姊妹，經過磋商，決定用這筆錢捐給香港播道會在屯門興建一間蘇森幼兒院及屯門山福堂記念他。其餘的款項就分給我們四兄弟姊妹。妹妹就利用父親這份遺產，在廣州買了一層樓，安居樂業，而且她與桂凌亦相信了主，恆切參加教會聚會。

1994年的聖誕，我們一家四口從美國返回香港與從加拿大回港的家姐一家，及居住在香港的穎智一家，一同來到廣州妹妹的家中，這是第一次4兄弟姊妹重聚。每家4口，一共16人，我們從早上開始，一直談到晚上，各人述說這幾十年的悲歡離合，聽到弟弟穎智和妹妹穎微的故事，我和家姐都深深感覺我們身在香港與父親一同生活，實在比他們幸福得多。但另一方面，他們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成長，仍然能出污泥而不染，也沒有放棄，他們的生命力實在是令我和家姐深感受激勵。這個聖誕節，是一個充滿淚水，但又是充滿感恩的聖誕。相信父親和母親在天上也為我們一家的團聚感到萬分欣慰！

至於那封匿名信的作者，
至今仍是一個謎！

馬照跑 舞照跳

話說1980年代，正當中英談判有關1997年後香港的前途，大部份港人都寧願維持英治現狀，不想受共產黨統治。據鍾士元回憶錄所述，在戴卓爾夫人訪北京前夕，曾有3個大型民調問港人對九七看法。先是香港革新會在1982年3月委託SRH做電話調查，發現普遍港人支持維持現狀，當時革新會認為過去北京一直容忍香港，現在於文革後，中國進行四化運動，與西方有更密切的交往，管治手法更開明務實，應該這種期望是大有可能成就的，至5-6月間，香港觀察社就再委託SRH做更詳細民調，這回更引證了革新會結果，超過八成半人希望維持現狀，6成多接受中國有主權，但治權則歸英國。然而，有趣的，在此次調查中，贊成香港獨立的也有3成多人，但9成7人表示對前途無任何準備。

中英首輪正式談判始於1983年7月12日，最後一輪（即第22輪）則於1984年9月6日結束。中英兩國終於在1984年12月19日達成協議，並共同簽訂了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1985年5月28日，《聯合聲明》得到確認，香港也隨之正式進入12年的過渡時期。

在整個談判的過程中，香港並沒有任何參與，因為中方代表團堅持港人無權加入為「第三者」參與香港前途談判。1984年6月23日，當鄧小平接見鍾士元及鄧蓮如時，公開指「只有兩腳橈」，「沒有三腳橈」，但歡迎港人以個人身份到北京來。鍾士元極表不快，他比喻這等如盲婚啞嫁，男女雙方家長討論婚事宜，

香港就無權參與。香港人既不能參與，唯一可能性是港人加入英國代表團。但1983年，中方拒絕香港新聞處處長曹廣榮以英國代表團身份參與，以為英國背後搞小動作。套用程翔的話，香港大部份人以「心裏不願，嘴裏不講」的態度面對回歸，有能力的都移民作為政治保險，即使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回歸的大學生，也提出有條件的回歸。事實上，在中英談判期間，香港市民對香港前途出現信心危機，因而觸發1982年9月恆隆銀行擠提事件，1983年9月香港搶米風潮，1983年10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以百分百外匯儲備保證，港元以7.75至7.85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勾，企圖穩定香港的經濟。雖然局勢漸趨穩定，仍出現香港移民潮，主要原因，是一般市民對中國政府不信任，就是在1996年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發表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2%的港人信任中國政府。不過，由於缺乏選擇，只能持著一種強烈的鬱悶與無奈，這是做成日後亂局的伏線。

香港市民在80年代之前鮮有顧慮香港前途問題，但香港政府卻不然，因為英國了解到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1997年6月30日屆滿，而1970年代香港籌劃多項基建，投資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所以英國一直等待時機與中國交涉。到了1979年，中國局勢開始從四人幫倒台而趨穩定，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回港後，麥理浩只轉述鄧小平說話叫投資者放心，其餘的談話內容隻字不提。然而，陪麥理浩上京的行政會首席議員簡悅強卻突然辭職，1983年更辭任貿發局主席及東亞銀行主席，不久更把手上的東亞股票轉讓及李冠春家族，完全淡出香港商界與政壇，至2012年以99歲高齡逝世。他的一舉一動帶給香港人一個強烈的信息，這更使香港人對前途感到憂慮！

在中英會談的初時，英國提出「以主權換治權」，英國放棄對香港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和九龍半島的主權，以租借方式繼續管治香港，但為中方拒絕，中方堅持主權與治權不可分開。到第5、6輪會談，英方確認不再堅持英國管治，也不講求任何形式之共管。

最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案。1984年6月22、23日在接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時說：「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我們的政策與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10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識心識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如果我們查考一下歷史文獻，我們發覺「一國兩制」構思並非為香港構想的，而是為解決台灣統一問題而提出的戰略設想。在1978年10月8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文學評論家江藤淳時提到：「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裏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

同年11月14日，鄧小平與緬甸總統吳奈温的會談中談到台灣問題時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葉劍英在向新華社記者會上更具體地指出「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參看《葉劍英選集》)

據大陸學者，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副教授閻小駿所說，中國政府對於「一國兩制」框架下未來香港政治運行的設想是「急凍式」的回歸，即快速把1997年6月30日午夜時分香港既存的社會、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動地接收過來，保持大體不變，然後再因應時代的變化擇機予以解凍和變革。80年代香港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常聽到六個字——「馬照跑，舞照跳」——就形象地表達了北京對於在回歸完成後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不同於中國內地的生活方式的設想和願景。(參看閻小駿：《香港治與亂》p.39)

閻小駿的看法可算是代表了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模式」的解讀。首先，這只是一個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所暫定的方案。他說：「當1979年3月香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首次談及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結束對越南的大規模『自衛反擊』作戰不到10天，而仍處在『文化大革命』後撥亂反正初期的中國政府，亦尚未對香港在1997年前的地位和管治問題做出深入研究，遑論做出重要的決定。」(閻小駿：《香港治與亂》p.41)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從這個解讀看來，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策略：

- 這是一個務實的決定—中國政府之所以用急凍的方式，把九七前的香港基本地，不動地「急凍」下來，保持大體不變。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當時在經濟上仍依賴香港。北京並不願意在回歸後收回一個不再繁榮和開放的「臭」港、「死」港，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共產黨長遠的利益。
- 「一國兩制」只是一個暫時權宜的策略。所謂「急凍」並不只是「永遠不變」，也有「變」的一方面。正如閻小駿所說：「這一政策有利於保證回歸期間人心安定，但卻不利於香港的長期管治。因為港英時期的一系列制度、政策乃至政府架構是因應殖民地時期的具體情況而設計、搭建和運作的，但回歸後政治社會條件改變了，『不變』只會成為施政的障礙，套用『急凍』這個比喻，急凍後必有解凍期，究竟這始於何時，則要視乎時代的變化了！鄧小平提出50年不變，似乎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承諾，而只是他以為50年應該是適當的時候了！」

所以「一國兩制」有基本矛盾的存在。閻小駿以為「一國兩制」有異於「一國兩治」。起初英國提出「主權換治權」的主張，但中方表示徹底的否定。然而在一國兩制下，雖然中方是否認了由英國以租借方式來管治香港，但卻承認由港人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換言之，照一般港人的理解，治權是屬於香港人的，香港至終可以用普選方法選出特首，香港有其獨立的司法制度，是港人治港，而不是京人治港。然而，據閻小駿解釋這並非中央的意思，中央以為中國不但對香港擁有絕對的主權，也擁有

絕對的治權。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授權香港特區按基本治管治香港，換言之，香港人擁有的權利，是中央的恩賜，而非他們應有權利。再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甚至更改香港終審庭的決定，而且人大亦有權決定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應用全國性的法律於香港。換言之，這個所謂「一國兩制」是有基本性的矛盾，難怪一方面說「是摸著石頭過河」，意思是這策略不是一個肯定的策略，為求穩健，試試看，適合與否。另一方面又說：「黃貓、黑貓、白貓，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務實主義，「好與壞」是一個主觀的決定而非客觀的標準。

我以為無論在中方或是港人，兩方面都有誤判。中方以為香港人只求「馬照跑，舞照跳」的繁榮安定，港人以為香港具有利的條件，中國是要倚賴它的，不會強硬的把大陸那套管治方式應用於香港，所以是容忍港人享有高度自治。其實，「一國兩制」是企圖把兩個不同的意識形態融滙一起：一制是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對他們來說，「法律」是管治者的統治工具(Rule by Law)是絕不能容忍任何人對這政權的威脅和危害，所以在《基本法》中有人大釋法，和23條國家安全法的立法規定，是保障中央有絕對的治權；「一國兩制」只是暫時的權宜方法，是一種務實的行政手段，但始終都是要改變的，起初以為需時50年，但事實上，過了一半就起了極大的變化！港人以一國兩制是50年不變的制度，在這50年間，香港人擁有高度的自治權，特首是由普選而產生，法律是保障人民的權利，他們所嚮往的是西方民主精神的社會，是一個3權分立的政制(Rule of Law)，中央只在外交及國際事務上有權力，河水不犯井，不少人更期待在這50年間，中國會走上民主道路，那時一國一制的一制，是類似今日香港的制度。對中國來說，這種思想是威脅著國家的安全，這意識形態的差異正是更深層次的矛盾。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199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從《中英聯合聲明》起計，共有12年的過渡期，無論香港接受與否，這一國兩制事在必行。香港人對此有何反應呢？一般來說，香港人大多抱著一個共通點「恐共」，這種「恐共心理」招至內地官員不滿，當時總理趙紫陽就反問「你們怕什麼？」結果香港股市翌日大跌。然而，香港人對前途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 持樂觀態度，相信中國是有誠意推行一國兩制，香港對中國仍是有價值的，是值得保留的，香港因此可以維持這種自治情況50年之久。
- 持悲觀態度，以為中國推出「一個兩制」是權宜之計，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是騙人的謊言。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構思就存在著矛盾，寄望共產黨履行這些諾言簡直是「與虎謀皮」。昔日的西藏，就是今天的香港，他們一點也不看好，在這無奈的境況中，唯一的選擇就是移民。自《中英聯合聲明》後，平均每年約有2萬多港人移居海外，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由1990年至1994年間共有30萬港人移居海外，其中以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及美國為主。

1982年，我有機會藉教會給我的安息年前往美國羅省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攻讀我的教牧學博士。雖然我留在美國只有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大部份時間都仍居留在港，也正是眾人關注香港前途的時刻。在這段期間，一如許多香港人，正憂慮著香港的前途和我們一家的去向，想不到父親在1949年所經歷的掙扎，我在1980年代也同樣為此問題掙扎。心裏有許多不同的聲音，整天都纏著我，究竟何去何從？我知道我一定要當機立斷！

無可否認，我的家庭背景和我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認識，是直接影響我的取向。母親的自殺，我們一家之失散，都是與中國政局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係；按道理，我會毫不猶疑舉家移民海外，避過父親昔日所遭的厄運。然而，事情又不是這麼簡單。身為教會的牧者，風浪還未來到，便逃跑！這是否太不負責任呢？在基督教的圈子，什麼「船長棄船」等污名便加諸於移民牧師身上，這不免做成很大的壓力；況且，會友亦不能接納牧師因此而離職！

當我與君玉商量這事時，我發覺她的想法與我很不同。她沒有我的背景，也沒有我的顧慮，雖然她對共產黨並沒有好感，也對一國兩制有質疑，但她始終在香港土生土長，完全沒有經歷過中國共產黨之統治，所以沒有我那種「恐共」心理。然而，她有一個心願，就是到美國攻讀心理輔導的Ph.D課程。我們回香港後，她先後在五旬節中學及浸會學院執教了數年，其後她便在中國神學院研究院攻讀心理輔導，畢業後在康福堂擔任輔導工作；但她的心願是繼續深造，並投身在心理輔導的專業。

我當時面臨的抉擇，便要考慮以下5大元素：

- 父親的經歷給我的影響與啟迪。
- 我從歷史上看到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怎麼樣的政權，我也要考慮我一家的前途，特別是一對兒女的將來。
- 我對香港作為一個福音禾場的負擔，在回港的幾年中，的確發覺這是一個極挑戰性的禾場。
- 我更要考慮君玉的願望和她進修的機會，我絕不可能因維護我的聲譽而犧牲她的願望。
- 我也要考慮經濟的能力，我若只陪君玉往美國讀書而沒有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誰來供養呢？我們一家都不會考慮一個留在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香港賺錢，一個往美國的決定，因為這一定帶來悲劇性的收場。

自1983中英談判開始，我腦海中就不絕有聲音出現，

有些是控訴的聲音：

- 你是個逃兵，是個貪生怕死的人！
- 你是個極自我中心的丈夫，只顧自己的名聲，而犧牲妻子及子女的理想和安危！
- 你是個沒有信心的人，你說是倚靠神，一切由祂主宰，何竟風浪還未來到，就不知所措？

有些是自辯的聲音：

- 逃避？耶穌的父母也帶祂出走埃及，逃過政治壓迫啦！
- 你們有像我的經歷，你們也會像我一樣，三十六著，走為上著！
- 家庭重於教會的事奉，我的決定，當然首先是想到家庭為主。
- 牧師不一定要在香港牧會才是屬靈，事奉主是不計較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的！

有些是安撫的聲音：

- 「你當剛強壯胆；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一章9節）
-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四章15-16節）

這些掙扎，焦慮和不安不但影響我的情緒、事奉，甚至我的健康，我知道我不能長期在這情況中，正如詩人說：「我的心哪，為何在我裏面煩燥不安？」又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於是一天，我獨自兒去到大埔淡水湖一安靜之處，整天禱告、默想、敬拜，這是最需要的一刻。起初，湖上一片寧靜，但我的心卻是波濤汹涌，非常混亂。漸漸地，我開始發覺我自己的問題：我對人的聲音、周圍的環境過份敏感；我的情緒完全操縱在這外面的元素，而我對神微小的聲音和祂的活現，過份的不敏感，這就是我問題之所在，保羅說得好：「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眼見。」(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哥林多後書五章7節)究竟什麼叫做「現實」？對世人來說眼所見的便是現實，但保羅卻對我們說：「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四章17-18節)

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一個是「見得到」的世界，保羅用「帳棚」來比喻這個世界，在這帳棚裏，我們歎息勞苦，生離死別，得失成敗，一切都是轉眼成空，如飛如去，套用摩西一句話：「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些歎息。」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實。保羅卻說：「我們所顧念的並不是這樣的一個現實世界。」對保羅來說，真正的「現實」是「看不見」的世界，保羅形容這個世界為「天上永存的房屋」，是神所應許那「更美好的家鄉」(希伯來書十一章6節)。我們是以信心活在這個「現實中」。

我雖然被召作神的僕人，牧養群羊，廣傳福音，但很多時我的焦點仍是放在這「帳棚」的現實中，無論是教會事奉之成敗，個人的名譽，別人的認同與讚賞，生活的安定與溫飽等等都成為我的焦點；因此對人的聲音及周圍的環境便非常敏感，因而引致焦慮不安。相反來說，對那「看不見」的

現實，卻覺得太抽象了，太離地了，以致對神的活現與聲音過份的不敏感，難怪詩人說：「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四十六篇10節)

想不到這一天的靜修帶給我突破，我相信最重的還是把我的生命與我家人的生命委身給主。我在神面前作了一個決定：我禱告神說「我現在於你面前陳說我的願望，我決定於1985年舉家移民美國，君玉可以找學校深造，我亦可以在你所預備的教會事奉。然而，若你不許，懇請祢攔阻，免得我得罪祢，懇求祢給我一個順服和平安的心。」這決定真的帶給我心裏的平靜。

1985年8月，神為君玉預備了一間三藩市的學校，讓她可以在那兒攻讀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的Ph.D.學位，我亦在三藩市唐人埠一間教會當中文部的牧師，凱頌及凱欣亦順利入讀一間在三藩市的基督教學校。至於窩福堂，則有譚偉康牧師從美國學成回港接替我的事奉，一年後弟弟蘇穎智牧師回港，負責窩福在方方小學的中堂之牧養工夫，其後獨立成為一間名叫「恩福堂」的堂會！

自1985年至2000年，我們一家都在三藩市生活，直至2000年我和君玉才回歸香港！

移民篇

第三十一至四十章



回首過去幾十年，我曾舉家數度橫越太平洋，比較印象深刻的有幾次：1972年，我和君玉只是20多歲的小伙子，毅然離鄉別井，到陌生的美國攻讀神學。當時心情既興奮，又有點兒恐慌，兩人拿著只夠一年費用的儲蓄，拍拍胸膛，懷著夢想和熱誠來到費城。現在想起來像是在昨天發生似的。事隔15年，我正是40出頭的中年人，在事業上可算有些果子，但我們決定離開香港的家人，教會，事業，舉家移民來到三藩市。當時大兒子只有10歲，小女兒只有7歲，拖男帶女，心情顯然與15年前不同了。一方面是興奮的，能有機會在新環境，新崗位事奉，但另一方面卻帶點惆悵，孩子還小，責任重大，心中有說不出來的滋味，沒有15年前那種傻氣。想到「三國演義」一首詩，蠻有意思：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江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不是英雄，更遑論成敗得失，但橫越太平洋時，眼見幾度夕陽紅，想想往事，人生就好像夢一樣，難免有點唏噓。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博士是澳洲雪梨播道會的會友。當他受浸歸入基督時，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見證，名「先入、為主」，文中有云：

自己不也是迂迂曲曲的走了許多路嗎？何況，此刻又要走八九千里的路，移民到陌生的南方大陸去。「搞中文的中年中國人，移民外邦，很難快樂。」一位早年自覺很前進，後來一轉而被視為反動的著名香港時事雜誌主編，自己也宣告移民時這樣說。同意這話的人，恐怕太多了，自己夫妻都50多歲了，從小受的，長大做的，是地域性強的粵語中文教育。兩方面都絕無兄弟姊妹親戚扶持，自己停了受薪工作，全家四口就都「食穀種」了。法律手續的紛煩，血汗積蓄的轉移，百憂薰心，萬事勞形。自己半個世紀在香港，學中文，教中文。此刻香港無家可歸，中國是有國難投，金錢上的投資，不懂。政治上的投機，不能。在寫給親友的信中自嘲：「英文不高，不懂電腦，專業不好，年紀漸老，退休恨早。」又說：「雪梨樣樣好，可惜無工做，一言蔽之，苦惱。」

但陳博士在苦惱之際，開始體驗人生的問題，也開始追求人生的意義，最後認識了主耶穌。

事實上，不少經歷過移民的朋友，都能體驗陳博士所描繪的煩惱。我比陳教授年輕，對三藩市又不是陌生，更有收入，雖是微薄，但也可足夠一家4口之生活，可算在芸芸移民中，我們是比較幸福的一家，更何況在教會中有不少弟兄姊妹的支持和照顧，這大大的幫助我們適應這轉變。不過，

移民始終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君不見在三藩市 General Hospital 的七樓，有不少病人是因未能適應移民生活的新移民，因患上抑鬱症或其他情緒病而要入院治療。

記得初來三藩市時，女兒凱欣常常晚上發惡夢驚醒。一晚，她半夜跑到我們房中，哭著說：「我發了一個惡夢，很驚。你帶我出街，在人群中你自己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所措，很驚慌！」我們聽到她這樣哭訴，心裏很痛心難過，連忙擁抱她，讓她與我們睡在一起，她才安心一點！很明顯，在新環境中，她因語言問題，常感到非常孤獨、焦慮、沒有安全感！有一次，在家長會中，她的班主任靜靜告訴我們：一天她發覺凱欣的座位濕了，才發覺她因不懂英語告訴老師如廁，便在位中撒了尿，非常尷尬。那老師真好，她沒有把這事張揚，只是靜靜的告訴我們，她更沒有責備凱欣，還替她隱瞞，並且放學後靜靜地清理她的座位。這位老師不但很有愛心，更是一位懂懂兒童心理的人，令我們非常欽佩。可惜這位老師幾年後因患上癌病而去世，但她的榜樣影響不少學生的生命，在她悉心教導下，不足一個月，凱欣已能適應美國學校生活，在短時期內已操流利的英語；功課亦名列前茅，她更參加學校籃球隊，成為隊中的台柱，這令我們放心得多。至於凱頌，因他在香港時就讀拔萃小學，是一間英文小學，所以在適應上較凱欣容易得多！

君玉的適應則更為困難。她就讀於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的 Ph.D 課程，專修家庭治療 (Family Therapy)。她起初在東灣的柏克萊上課，要獨自兒駕車前往，人生路不熟，而且上課時間往往至晚上，路程又遙遠，她又不大習慣在美國高速公路駕車，在起初的幾個月是相當困難。感謝神，經過了幾個月的時間，她已習慣這環境，而且對所學的感到極大的興趣，雖然很多時我在家中等她駕車回家，心中常有點擔心，但眼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一家都開始適應下來，心裏也安心點。然而，真想不到的，最難適應這新環境的竟然是我自己，我所指的环境，不是指美國社會、生活及文化，而是我在教會的事奉，遇上極大的挑戰，最後演變成爲「四二六事件」，因這事件，改變了我們一家以後在美國的生活。

所謂「四二六事件」是教會在「靈恩運動」這個教義上引起爭論，最後導至教會分裂。在傳統的福音派教會中，他們以爲聖經中有關若干屬靈恩賜已經隨著新約時代的結束而停止了，這些已停止了屬靈恩賜包括：說方言、說預言、行神蹟、趕鬼等。我們要留意，福音派並不是說今日沒有可能有神蹟，而是說神並沒有賜下一些信徒具有行神蹟的恩賜，如祂賜給新約使徒有行神蹟恩賜一樣；而靈恩派則以爲今天神仍賜信徒有這些超自然的恩賜，而且他們強調教會一直都忽略這真理，以致教會及信徒失去了應有的能力，這也是教會轉弱的原因。他們相信神蹟奇事是表明神的權能，勝過了邪靈的力量。世上分爲兩大勢力，一是神的勢力，一是鬼魔邪靈的勢力，而神在這 Power Encounter 中勝過邪靈的權力，所以信徒在傳福音時，是要彰顯這權能，他們稱之爲 Power Evangelism。不少靈恩派教會都定期舉行神醫大會，透過神醫，神的大能得以彰顯，人就會看到神的大能而相信耶穌。此外，他們又相信神的啟示還沒有終止，神仍直接的、個人的向祂的子女講說話。正因如此，他們對聖經有一種特別的看法，雖然他們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但聖經的功能只如一幅地圖，或是一個餐牌。單看地圖不會帶你到你所要到的地方，單看餐牌也不可以叫你得到飽足，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經歷神，經歷聖靈的能力，特別是一些超自然或神祕經歷，你才會得到真正的飽足。所以，對靈恩派信徒來說，釋經講道、研經都不是重要的，信徒經歷神的權能、聖靈的大能，如講方言，行神蹟、趕鬼、神醫才是重要的。

靈恩運動始於二十世紀之初，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星的靈恩份子活躍於教會歷史上。早期教父 Irenaeus(200A.D)及 Tertullian(200A.D.)，都曾提及過講方言的事蹟，但到了 Chrysostom(407A.D.)及奧古斯丁(430A.D.)則明顯地否定這是正確的看法。到了17世紀，法國有些基督徒，稱為 Huguenots及天主教徒稱為 Jansenists再次提及講方言的事蹟，但不為教會所接納。到了19世紀，美國的 Shakers及 Mormons也有講方言的記載，但也不是主流教會所認同的。

但到了20世紀，靈恩運動捲土重來。1901年在Kansas的一個伯特利神學院的學生 Agnes Ozman開始講方言，不少人開始跟隨她。他們不是依附於教會內，而是另組他們靈恩教會，先是成立五旬節教會，其後神召會亦告誕生。到了1960年代，美國西岸的主流教會，如循道會、聖公會、路德會及甚至天主教教會都有教徒轉為靈恩派，他們聲稱是受了聖靈的洗，能講方言，醫病趕鬼等。Jesus Movement就因此而流行起來，吸引不少青年人，他們聲稱不用藥物(如迷幻藥)，便可以享受到類似的經歷。

但影響至大的還是Vineyard的 John Wimber。他在Fuller神學院與宣教學教授Peter Wagner開始一個名叫Signs and Wonders的課程，大力推廣信心治病(Faith Healing)，而Wimber更創立了Vineyard教會，他們比較重視「驅鬼」、「智慧言語」、「治病」及「講方言」的恩賜。他們以為世界有二個相對的屬靈勢力，一是屬神的，一是屬邪靈的，彼此相爭。一切疾病，意外，壞習慣都是因邪靈得勝之故，如姦淫、醉酒、偷竊、豪賭、欺騙都是受了那些「色鬼」、「酒鬼」、「賭鬼」等操縱著，但神的能力是大的，我們可以憑信心，靠著神的能力得勝，透過驅鬼、神醫治病，可以叫人得勝，他們稱之為Power Encounter。據George Barna統計，現今每四個福音派信徒，便有一個是受靈恩派影響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所事奉的教會，其主任牧師是參加了John Wimber和Peter Wagner的Signs and Wonders課程而轉向靈恩派，並且在教會大力推廣，他開設神醫大會，邀請靈恩派牧師任講員，推廣靈恩信息，甚至開班教人學講方言，因著他的轉變，引起整個教會震動，不少信徒都反對這個運動。

這是一個歷史頗為悠久的教會，是灣區一間大型教會，會眾超過千人，這個教會共有五堂崇拜：英語崇拜，廣東話崇拜，廣東話長者崇拜，廣東話青年崇拜及國語崇拜。我是廣東話崇拜的牧師，也是人數最多的一堂，我加入這教會後，廣東話崇拜人數增多，我們再加開一堂廣東話崇拜，都是由我負責的。每一堂崇拜都有他們的牧師和執事會，負責他們堂會的牧養，而整個教會則由主任牧師和長老團負責，每堂會都有代表加入這長老團。單看這個制度，我們便曉得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行政結構，每個堂會都好像一個獨立教會，河水不犯井水，名義上是由主任牧師主領，但實際上他與會眾接觸的機會很少，因此他有一半時間在一間分堂參與的，如此他在教會的參與就更少了。當他推廣他的靈恩運動時，反對至強的是廣東話一堂，負責這一堂的執事大多是一些較年青的專業人士。

這一班執事眼見當時的情況，深覺會友有必要從聖經認識「靈恩派」的信仰是否正確，於是便提議我在崇拜講道時講解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於是我便在1987年的4月26日在廣東話崇拜中講解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有關說方言的真理。我一向有個習慣，是把我講章用英文寫下來，派給會眾，在北美地方，不少會友雖然是操粵語，但卻不懂中文，這對他們來說，這英文講章便增加了他們對真理的認識。所以，一些長老便從替我影印講章的辦公室同工得悉我講道的內容，便通知主任牧師。在4月26日前，長老團寫了一封信給我，不許我在4月26日講這一篇道，但並沒有說明原因。執事會以為主任牧師及長老團並沒有如此權力去阻止牧師宣講神的話，

假如他們以為這講章在神學上有錯誤，大可以指出及辯論，而不能如此粗暴的阻止。最後，他們決定我在那天保持緘默，在講道時間時任由會眾閱讀講章及禱告，在崇拜後我通常在副堂是教主日學的，那天我可以在主日學時間內講解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4月26日的崇拜，我們如期的舉行。到了講道的時候，我向會眾解釋我不能講道的原因，並請求會眾在自己座位上閱讀附上的講章，大約過了15分鐘，忽然有一個長老衝上台前，好像要向會眾發言，我有見及此，便馬上請會眾起立，一同領受祝福，結束了崇拜。那長老仍想要向會眾發言，但負責音響的弟兄早已停了音響的運作，而會眾亦立即離開會堂，往樓下參加主日學了。

這稱為「四二六事件」，當然轟動了整個教會。教會的長老團立即採取行動，給我3個月的假期。在假期間，我是被要求不參與教會活動，但由於我們正如火如荼的預備在7月舉行的「異鄉鄰舍情」大型社區福音外展，長老團不得已容許我負責這個大型的社區福音外展事工，而我亦十分樂意全心的帶領整個外展事工。這事工在某一程度上也減少教會的混亂和不滿，弟兄姊妹都把焦點放在這事工上，暫時把「四二六事件」置於腦後。

這個「異鄉鄰舍情」的福音外展事工，是仿效我在香港時的「新邨新人」外展事工，而三藩市的唐人埠更適合作類似的外展工作。整個唐人埠，約有5-6萬居民，是全美最大的一個華人社區，區內華人大多是操粵語，從中國或香港來的移民。到了7月的一個週末，我們早上是培靈會，邀得Dr. Walter Hendrickson講道，下午是各類的活動，包括各類的講座，如醫療講座、營養講座、法律講座，汽車保養講座等，此外還有各類遊戲，如電腦遊戲、兒童遊戲、智力測驗遊戲等，又有音樂會，及各類展覽和一些小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供應；應有盡有，猶如一個熱鬧的嘉年華會，參與的工作人員數百人，有些負責秩序，有些負責各攤位，有些負責講座，有些是專門與來觀看的街坊傾談，並邀請他們參加晚上的音樂佈道會。估計來參加這次「異鄉鄰舍情」的街坊數以千計，只見穿上「異鄉鄰舍情」紅衫的弟兄姊妹，穿梭於人山人海的來賓中，非常壯觀。

到了晚上，整個禮堂及副堂都坐滿了街坊，我們邀得從香港來的歌星黃愷欣及其夫婿一同來主持。黃愷欣的見證與歌聲打動不少人的心，最後我負責講福音信息，此次聚會中有80多人決志信主，眼見在這混亂的時刻中，神仍然看顧和祝福，叫我們滿心的感謝和讚美神；但我們心裏仍記掛著，我們如何跟進這班慕道朋友，叫他們可以在基督裏成長呢？前面的道路仍是不清楚，我們只有同心仰望神，但我心裏已經想到：我或會被教會解僱，因為從這教會的歷史看，我並不是第一個牧者遇到這情況，在我任這教會的神學實習生時，也曾親眼目睹類似的情況，結果那兩位牧師還是被解僱了！

果然在「異鄉鄰舍情」之後不足兩個星期，我便收到長老團的解僱信，理由是：我與教會incompatible。所謂incompatible是指我們彼此不合，不能共事，究竟是在那方面不合，則沒有解釋，雖然我和教會有一個5年的口頭合約，但我和太太都不想追究，這應該是離開這教會的時候了！令我們感到有點意外的，那位主任牧師亦離職，究竟他自己主動請辭，抑或被邀請辭職，則不得而知。

其實，「四二六事件」發生後，教會委派了一個4人調查小組處理這事；一位是來自總會代表，其餘都是對這教會有所認識的基督教領袖；然而，他們並沒有接觸我，也沒有聽取我任何意見，他們的商討結果是怎樣；除了是我要被解僱，主任牧師也離職外，其餘一切都不知情，廣東話堂會

的執事們也不知情！

這個時候，羅省播道會正想尋覓一個主任牧師，並且約我到羅省與他們見面；當我們正考慮應否搬往羅省時，執事們就接觸我，他們打算離開那教會；並請求我去領導他們，在華埠開始一個新的教會。我眼見這些弟兄姊妹的誠意，尤其聽到他們要設立這新教會，主要原因倒不是對舊教會極度不滿，於是憤然離開；非也！他們從「異鄉鄰舍情」的經驗中，看到三藩市華埠是一個莊稼已熟的禾場，他們極需一個新思維、新模式、新策略去發展一個社區教會，這正是我在 Fuller 神學院的教牧學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再加上在「四二六事件」艱難的日子中，這些弟兄姊妹給我們一家有莫大的支持和鼓勵。記得有一次，長老們約我去傾談，經過兩個鐘頭的答問，身，心，靈都感到非常疲乏。回到家裏，看到有30多位弟兄姊妹正在家中等候，原來在開會期間，他們不住為我禱告，又攜帶食物到我們家中一起用飯，這令我和太太非常感動；當我們決定留在三藩市，並籌備開設一個新教會，我就接觸在緬因州的嘉理信牧師，在他的安排下，我們有機會接觸到美國播道會西區的區牧，並且順利成立一間名叫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的教會，借用一間公立學校舉行崇拜，另外租了一層樓宇作為辦公室及團契活動之用；而我們的生活亦開始新的一頁！

兩年後，那教會的牧師(非從前那位已離職的主任牧師)特來找我，他以個人的身份向我道歉。其實，整件事情是與他無關的，但他這樣作，的確令我更釋懷。我感謝神，這教會始終都沒有成為一間靈恩派的教會！

第三十二章
三藩市播道會
的故事

三十年來家國⁽¹⁾
四十九里山河⁽²⁾
鳳閣籠樓連都板⁽³⁾
玉樹瓊枝遍呵囉⁽⁴⁾
幾曾識基督
一旦歸為神虜⁽⁵⁾
那怕身心消磨
最是倉皇辭廟日⁽⁶⁾
教友猶唱別離歌⁽⁷⁾
垂淚的蘇Sir⁽⁸⁾

註一：家乃是指三藩市播道會，國乃指天國

註二：四十九里乃指三藩市，因三藩市著名的足球隊名49ers.

註三：都板乃指Grant Street，三藩市華埠的中心。鳳閣籠樓指中國式的建築，但同時又是一個貧民窟。有人稱三藩市華埠是一個rich ghetto，此言雖不中亦不遠矣！
因為華埠的房產異常昂貴。

註四：玉樹瓊枝是指一些比較富裕的中產人士。

呵囉=台山話all的意思，乃指整個灣區。

註五：神虜即基督徒。

註六、七、八：指2000年我離開三藩市播道會的惜別會情景。

1987年8月最後的一個主日，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正式舉行第一次崇拜，地點是Francisco初中學校；參加崇拜人數約150人。崇拜後，我們一同吃午飯，高高興興的慶祝教會成立。

但隔了不夠數天，我們便接到Francisco中學校長

來電，說發現校舍有石棉，不宜借出外來團體使用，於是要中止了我們在Francisco聚會的合約。這消息真的把我們嚇了一跳。我們要在短短幾天內，尋覓新的地方聚會，又要通知各弟兄姊妹這突然的轉變，一時真是手足無措。但神的恩典是足夠我們使用的。祂感動了在Filbert街的Garfield小學校長仗義幫忙，借出校舍給我們使用。如此我們每星期便可在Garfield學校聚會，直至我們在1989年購得Union街新堂址為止。

Garfield小學位於Filbert街山頂，要沿經一條非常斜的馬路才能抵達。我常常鼓勵弟兄姊妹說：我們就如昔日朝聖的猶太人，往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朝聖。我們教會正是位在這錫安山上。每逢星期日，我們便上錫安山朝見我的神。起初，學校開放操場給我們，作泊車之用，後來因恐怕一些車漏油於操場就取消了！我們只有步行上山。對那些上了年紀的會友來說，我實在欣賞他們上山敬拜的心志。事實上，我們能夠使用Garfield小學關鍵人物，不獨在乎校長，更重要的是學校的校役。正如校長坦白的對我們說：若他不願意借出，我也沒有辦法了！因為開門關門都是靠他的。感謝神，這位校役先生非常樂意幫助我們，後來我們搬往Union街的新堂址時，他曾經擔任我們的堂役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也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為了維持我們與Garfield小學的關係，我每星期都到學校任義工，向四年級及五年級的學生講《水滸傳》。我是用英文講的，還記得講到黑旋風李逵的時候，那些非洲裔的同學聽得津津有味，視他為英雄。在聖誕節，校長邀請我在學校聯歡會中扮聖誕老人，分派禮物。或許他們以為我的身材適合聖誕老人這角色。

我們建立三藩市播道會並不是因為對昔日的教會不滿，而是懷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三藩市華埠建立一間以神話語為中心的社區教會。所以，當我們尋覓堂址的時候，只想到在華埠地區作為我們基址。神預備了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Garfield小學作聚會之用，又為我們預備在Sacramento街的一層樓作辦公及團契之用。我們教會的模式稱為3E模式。所謂3E者乃Evangelism(廣傳福音) Establishment(造就信徒)及Equipment(裝備信徒)。

首先談談廣傳福音這事工。我們除了有福音聚會、福音性研經、個人佈道訓練、福音營等直接傳福音事工外，我們還有不少的社區服務作為福音預工：

• 星期五英語補習班

我們借用了在Kearny街的Chinese Education Center替新移民補習英文。全盛時期，有100多個學生參加。其中有不少後來成了基督徒，而參加我們教會，成為會友。記得很多年後的一天，有一位補習班的學生從佛羅烈達州打電話給我，多謝我們教會的愛心幫助，以致他們一家可以在美國安頓。後來他們搬到佛羅烈達州居住，並且參加了當地的華人教會，我聽了很受鼓舞。其實，諸如此類的見證有很多；不少成了我們三藩市播道會的活躍會友。

• 中文學校

每逢星期六上午，我們有中文學校，幫助那些土生土長的兒童，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化。從而有機會向他們及他們的家長傳福音。在全盛時期，中文學校有100多名學生。我們中間一些會友，正是因為他們的子女參加了我們中文學校而認識了主。

• 週日學生中心

這是為了那些讀中、小學的新移民而設的英文補習班。我們除了教他們英文外，還與他們建立關係，帶他們出外露營，又帶他們

參觀UC大學，希望鼓勵他們努力讀書，進讀一些好的大學；更從而帶領他們認識主。記得幾年前，「家新」舉行的家庭營中，請了我當講員，竟然遇上從前學生中心的一些舊同學，他們都信了主，這令我感到非常鼓舞。

學生中心的一些同學，常常三五成群，在教會門前吸煙，這引起鄰居不滿，便來向我投訴。我問他們說：「你希望這些年青人到處在街上流蕩，惹事生非，還是把他們困在教會內好一點呢？」他們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不但不再投訴，更欣賞我們所作的是一件好事。

• 天南地北

每逢星期二，教會舉行天南地北。我與參與者無所不談，包括美國及世界時事分析、每週一詩、中國歷史中之風雲人物、情緒及家庭問題、健康常識等。不少退休人士及婦女都來參加。尤其那些男仕們，更喜歡參加，有些甚至遠道從 Walnut Creek 坐 BART 來的。

• 電台節目

每星期一次我和胡章釗先生在電台主持一個名叫「屋簷下」的節目，想不到這節目在灣區也頗受歡迎，更有人因此而認識神。

• 暑期學校

每年暑期我們都舉辦暑期學校，有80名兒童參加。我們有不少傳福音的機會，不但向學生也向家長分享信息，一些美國播道會的美國人也參與這事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入籍班

1980年初，由於美國經濟衰退，政府擬削減福利的開支。不少持有綠卡而尚未入籍的華僑，唯恐失去他們的福利，紛紛申請入籍。對一個不懂英語的華人來說，入籍考試並不是一件易事。入籍官會用英語考問申請者有關美國政制和歷史的問題。雖然問題不外乎預先編定的100條題目，但始終對一個不懂英語的人來說，實在是極難的事。

教會有見及此，於是便開設了入籍班，讓社區人士可免費學習和預備。我常常對那些同學說：一般入籍官都非常體諒我們華人的需要，所以他們來來去去都是問那幾條題目，只要熟讀那幾條問題的答案，應該不是太困難的。

在入籍考試中，考官通常會問以下的問題：

- 美國政府有 多少個部門？答案是Three.
- 跟著他們會問：是哪三個部門？ 答案是 Legislative、Executive 和 Judicial.

他們聽見了就驚說：這麼深，我怎能回答呀！我就笑笑對他們說：其實是非常簡單的。第一個部門是如廣東話的「拎住你條褲」，其發音與legislative是相同的。第二個部門是「X佢條褲」，這正是Executive的發音，第三個部門是「逐啲數」，這就是Judicial的發音了，就是這麼簡單！他們笑著說：「原來可以這麼簡單，真有趣！」

有一位80多歲的長者是我們入籍班的同學。入籍官問她說：美國政府有多少個部門？她立刻回答說：Three。跟著又問是哪三個部門。她又滿有

信心的說：「拎住你條褲、X佢條褲、逐啲數。」入籍官驚嘆這老人家如此厲害。於是便讀了一個句子請她默寫；這是入籍試最難的一關，因為這是無法預料的。入籍官的句子是：I have five sons。我先前幫她預備的時候，我估計入籍官的句子是：I have five children。因為我以為她有五個子女，沒想到五個都是男孩。幸好她還是寫著：I have five children。那入籍官驚嘆這長者的書寫能力，以為他以son這個字太淺了，改用了children這個字，更為適合。她就因此獲得通過、合格、入籍。她回到我們班中，分享她的經歷，還帶了點心與其他同學分享。我對這位長者說：「你還有另外一個入籍試呵！」她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試？」我對他說：「是天國入籍，是不用考的。你只要相信耶穌，你便可以入天國籍。」她笑笑的對我說：「我會認真考慮！」事實上，有些長者是透過這入籍班認識了福音、信了主的。

我們要談談造就信徒這方面的事工，主要有3方面：崇拜、教育、關懷。在崇拜方面，我們有中英文堂，後來加多了一堂廣東話的午堂，這堂是一個 Seekers Service，專為尋道者設的。講台信息則以解經和應用為主。教育方面，我們釐定成人主日學系統，希望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完成下列6個基本主日學課程。

- 福音性研經
- 成長路
- 信仰與生活
- 新約綜覽
- 舊約綜覽
- 基礎神學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除了上述6個基礎課程外，還有其他：如書卷研讀，處理壓力與情緒、基督教倫理、教會歷史、婚姻與戀愛等課程。務使人人上主日學，學習神的話語。

最後是關懷事工，我們特別強調教會應該是一個極有人情味的地方，好像自己的家一樣，不流於制度化、僵化、徒有形式的機構。我們每年都舉行培靈研經會，好叫我們有更多機會相交，和研讀神的話語。我們希望建立一個不住禱告、不住學習、和不住關懷的文化；這是我們的異象，也是我們要走的方向。

正當我們成立三藩市播道會華埠福音堂之際，發覺原來三藩市早已有另一間華人播道會。1964年2月，謝獻燾牧師在西差會傳教士梁貴文牧師鼓勵下，有鑑於三藩市新移民增多，福音工作需要極大，乃於Mason街1858號開始家庭聚會，隸屬美國播道會，為其轄下之福音基址。未幾，在謝牧師和謝師母領導下，到了1972年，教會稍有規模，乃於列治文區購得堂址，繼續發展福音事工。他們有說廣東話的，但大多都是操英語的土生華人。到了1989年4月我們兩間播道會的弟兄姊妹，有鑑於三藩市華人福音工作之需要，經過禱告和商討後，決定合併為一間教會，改名為三藩市播道會。列治文的堂址則改為教會的團契中心，崇拜地方仍在Garfield小學。由於英文堂的人數大增，除了當時我和另一位女傳道Vicky Ng負責牧養外，就沒有同工了。後來聘得三一神學院畢業生Bryan Fisher為英文堂的傳道。我們從另一間教會分出來，現在又和另外一間教會合併，一分一合，神的工作真是奇妙。

當教會開始發展，我們不住祈求神為我們在華埠預備一個堂址。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在華埠找一個合適的地方作教會之用，實在機會微乎其微。但我們一直注目一間在Union街的舊教堂；這教堂本屬

西人美以美會的物業。建於廿世紀初年，後來改為戲院，之後又改為劇院，最後租給一間名叫Daisy的託兒所使用。我們曾經與美以美會聯絡，希望購得這物業，但對方無意出售。一天，一位會友路過該址，竟然發現一張出售的廣告牌擺在屋前。我們喜出望外，連忙與業主聯絡，但可惜遲了一步，早已給一位發展商收購了！我們只能對業主說：如果買家退出，我們願意購買。

神的計劃真奇妙。不久這位買家果然退出，因為Zoning的問題，他們不得不放棄。於是，我們便順利購得這物業。然而，我們仍須解決3大問題：

- 我們怎樣處置現時的租客---Daisy託兒所？
- 我們申請重建牌照要經過公聽的程序，在三藩市，重建工程的過程是相當複雜和難以預計的，工程可能因有人提出反對而受阻攔。
- 財政方面，我們要籌備一大筆數目來購堂，並要賠償Daisy託兒所，並重建的費用。

首先談到處置租客Daisy託兒所的問題。想不到Daisy相當合作，完全接受我們給他們合理的賠償，並答應在租約還未完前搬走。

至於申請重建牌照的公聽會，我們被安排在最後的一個個案。我們約定了80多位會友，希望一早佔據了整個房間座位，令那些職業性的反對者無位可坐。我們4點半已抵達City Hall，可是等到5點15分，我們還未能進入，因為前一個個案不知何解還未完結，這令我們感到焦慮和不安了。到了5點15分，見一個韓國人，面色憤怒，跟一個白人大聲理論，其後一大群韓國人加入，這個白人眼見形勢不對，連忙逃走。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位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白人是一個反對者，在公聽會中反對韓國教會重建，於是雙方爭持起來，最後未能通過，工程也因此阻延下來。我們看到這情況連忙湧入那房間，看看全是自己人，公聽會不消10分鐘，便順利通過了。我們重建工程也可以如期進行。

最後是財政問題。我常常對弟兄姊妹說：錢絕對不是一個問題，信心才是我們的問題。列治文播道會的弟兄姊妹真好，願意賣掉列治文的物業，資助三藩市播道會購買 Union 街堂址，再加上弟兄姊妹熱心奉獻，我們所需的款項很快便籌足了。而且在幾年後全部的借貸還清，真是神極大的恩典。

1989年我們正式搬入新址，並且得黃愷欣與其夫婿同來主持一個音樂佈道會。當晚座無虛席，人山人海。我負責福音信息，那晚有數十人決志信主，那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開始。

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究竟三藩市播道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教會呢？經過教會5年來的成長，聚會人已達400人。在90年代初期，教會邀請了一位教會增長專家，來調查我們教會的情況。以下是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

當時教會聚會人數約400人，填寫問卷的有318人。

一般情況	三藩市播道會	美國教會之平均數
平均年齡	42.3歲	45.8歲
男女比例	41.5%男 58.5%女	44.2%男 45.8%女
婚姻狀況(單身)	48.4%	22.9%

一般情況	三藩市播道會	美國教會之平均數
家庭兒女數目	2.4	2.6
教育程度	13.6年教育	14.5年教育
再婚家庭	4.5%	11.0%
距離教會多遠	28.3分鐘 10.8里	12.7分鐘 6.3里
職業狀況		
白領	54.5 %	48.5 %
藍領	15.8 %	15.0%
待業	3.9%	3.0%
退休	19.7%	13.2%
其他	6.1%	20.3%
就職母親	38%	N/A
大學生比例	17.9%	8.7%
每家庭平均收入	年薪 \$34,388	年薪 \$39,973
奉獻給教會	6.2%	6.4%
屬靈情況		
· 清楚重生	94.0%	97.3%
· 慕道者	0.6 %	0.4%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一般情況	三藩市播道會	美國教會之平均數
• 不清楚信仰	5.4 %	2.3%
• 在本教會認識主	41.5 %	18.1%
• 信主年日	25.9年	17.8年
• 本年內信主比例	6.0%	2.0%

怎樣信主

• 透過主日學福音性研經	40.2%	11.7%
• 透過父母	14.1%	28.4%
• 自己尋索	10.1%	8.1%
• 透過查經班	7.8%	4.9%
• 透過電台報章	6.9%	1.8%
• 透過其他福音機構	5.2%	7.7%
• 親戚朋友	67.53%	17.5%
• 透過教會外展	3.6%	3.4%
崇拜人數	420人	100人
參加教會多久	5.4年	11.2年

72%會中表示不打算
離開教會

一般情況	三藩市播道會	美國教會之平均數
最受會眾欣賞的		
· 講道	96%	89%
· 教牧人員之熱誠	93%	84%
· 信仰純正	92%	94%
· 傳福音熱誠	88%	56%
· 崇拜氣氛	87%	84%
最需要改善的事工		
· 青年事工	42%	65%
· 單身人士 事工	42%	43%
· 婦女事工	47%	69%
· 男人事工	48%	43%
· 個人佈道訓練	48%	42%

從上述的統計來看，我們可以略知90年代三藩市播道會的強項與弱項。

- 福音工作相當不錯，41.5%的會友是在本教會信主的，比美國教會平均的18.1%高得多。
- 其中福音性研經的功效最大，有41.2%表示是在福音性研經信主的，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

- 大學生的比例亦相當高，有17.9%，而退休人士亦不少，佔19.79%。不過中年人士則為佔大多數，教會平均年齡是42.3歲。
- 普遍會友的教育程度和經濟狀況也略遜於一般美國教會。
- 教會最弱的事工是青少年事工，其次婦女事工和男人事工。
- 奇怪的，雖然大多數會友是透過教會認識主，但個人佈道是我們其中最弱的一環。

想起來，神在三藩市播道會的恩典實在大，在短短10年多，教會由150人增長至600人，並在Fremont開設了分堂。我非常欣賞弟兄姊妹的委身心志，負起各事工，無論在教導上、關懷上，行政上和傳福音的事工上，都積極參與，他們不但激勵了我，也成為我的榜樣。





第三十三章
金山客

我係台山阿伯，
五十年來金山客，
生命如煙，逝於一剎，
終到頭來，如夢一發。

年行二十三，
拖住李亞珊，
來到舊金山，
見到個老番，
捉到Angel Island坐大監，
唉！做人真不簡單！

年行三十三，
拖住一，二，三，
來到Chinatown，
見到個大班，
捉到餐館托大餐，
唉！做人真不簡單！

年行四十三，
死挨又死慳，
離開Chinatown，
搬到海狗山，
終於屋也撈番間，
唉！做人真不簡單！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年行五十三，
捱大一，二，三，
啊囉娶「老番」，離開舊金山，
去如黃鶴不再返，
唉！做人真不簡單！

年行六十三，
失去我亞珊，
返回 Chinatown，
終日孤單單，
花園角內吃兩餐，
唉！做人真不簡單！

年行七十三，
剩下我老坑，
好似煙霧散，
奈何如此，了結一生，
唉！做人真不簡單！

這首打油詩，是我探訪完一位老華僑，聽了他的故事後而寫的。在80年代末期，我在USF電台與胡章釗先生一同主持一個叫「屋簷下」的節目，我唸了這詩給觀眾聽，想不到引來極大的迴響，不少人紛紛致電該台分述他們類似的故事。

1848年，兩個華籍男子與一個女子，乘搭美國輪船Eagle號抵達三藩市，成為中國最早有記載的移民，其後，一直至1870年，不斷有華人來到美國，大部份都因尋金而來，故三藩市又稱為金山。這引起不少美國人不滿，

1882年國會通過Chinese Exclusion Act，限制華人來美，並且制定不少歧視已經來美華人的法案。事實上，這Chinese Exclusion Act是唯一的一條美國法律，專針對某一族裔移民來美而立。本來這法律只能維持10年，10年後將自動取消，但到了1892年，國會通過無限期延長這法律，到了1902年國會更通過所謂的Geary Act，不再設限期，永遠禁止華人移民來美國。這法案一直維持到1943年才被推翻，改以Magnuson Act代之，每年准許105華人移民來美，1965年再通過Nationality Act，正式廢除這種被稱為移民National Origins Formula，這Formula明顯是歧視來自非歐洲人士。

已經定居在美國的華人也受到極大的歧視，法律不容許他們提出訴訟、不能在法庭申辯、不能擁有物業權、沒有投票的權利、不能與非華裔人士結婚、不能申請家人來美國團聚、不能在政府機構工作等，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Yick Wo vs Hopkins。話說早期來美的華人，大多是尋金或是協助建築鐵路，後來他們受到極大的歧視，被迫返回三藩市，聚居在唐人埠，其中不少從事洗衣行業。在三藩市從事洗衣行業的華人，佔了全市89%。事實上，除了洗衣行業，華人很難在三藩市找到其他合適的工作。

1880年，三藩市市議會通過一條法例，禁止市民在木屋內開設洗衣舖，聲稱這是為了防止火警而立；那時，全市共有320間洗衣舖，其中95%是設在木屋內，事實上，大部份三藩市的屋宇都是木屋的，在這320間洗衣舖中，2/3是屬華人的。雖然法例聲明：他們可以向三藩市市議會申請特別牌照經營，在木屋內開設洗衣舖。當時有200個華人申請，只有一人獲得牌照，佔0.5%，而申請這牌照的非華裔人士共有80人，只有一個不獲得派發牌照，換言之，成功率達98%，很明顯，這是絕對歧視的行徑。

Yick Wo(李益和)是於1861年自中國來到三藩市，他在三藩市經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洗衣舖行業有22年之久，因他不理會這法案，繼續經營洗衣行業，結果被告，並且罰款10元，他拒付罰款，因而被囚在獄中。1885年8月24日，李益和的律師向加州高等法院申請Habeas Corpus(這是美國法律，容許在獄中的囚犯出庭作證)，這就是著名的Yick Wo vs Hopkins(Peter Hopkins是捉拿Yick Wo入獄的三藩市官員)。結果，高等法院一致裁定三藩市市政府違反美國第14條憲法而敗訴，他們明顯在執行禁令時，是帶有歧視眼光，剝奪了Yick Wo的權利。如今三藩市公立學校有一間小學以Yick Wo命名，是記念這一件訴訟事件的。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天使島(Angel Island)，它位三藩市海灣，全島約1.2平方英哩，自1905年，此島用作移民檢查站(Immigration Station)，但正式啟用要延遲至1910年，由於這站檢查的移民，大多來自中國，故稱為China Cove。自1910年至1940年，約有一百萬從中國來的移民遭拘留在這站，短者數個星期，長者達幾年之久，其目的主要是檢查他們的身份，他們要證明他們的丈夫或父親是美國公民才獲批准居留美國。在拘留期間，這些新移民受到極大的不平待遇，再加上前途未卜，心情極其惡劣，於是便把自己的情緒發洩在詩中，刻在板上，以至我們今天更清楚他們的遭遇，以下幾首是典形代表作：

獨坐稅關中，
心內豈不痛，
亦因家道貧，
遠遊不近親，
兄弟來到叫，
只得上埠行，
黑鬼無道理，
唐人要掃地，

每日食兩餐，
何時轉回返。…… 李字題.1911年9月4日

本擬舊歲來美洲，
洋缺迫阻到初秋，
織女會牛郎哥日，
乃搭林肯總統舟，
餐風嘗浪廿餘日，
幸得平安抵美洲，
以為數日可上埠，
點知苦困木樓囚，
番奴苛待真難受，
感觸家境淚雙流。
但願早登三藩市，
免得此間倍添愁。…… 過埠新娘的一首詩

牢籠躍入出無能，
無任傷悲血淚橫，
精街啣砂填夙恨，
征鴻訴月哀頻生，
子卿絕域誰憐問，
阮籍途窮空哭行，
芳草幽蘭怨凋落，
那時方得任升騰。…… 台山李銳波題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林到美洲，
進入木樓，
成為囚犯，
來此一秋，
美人不准，
批發回頭，
消息報告，
回國驚憂，
國弱華人，
歎不自由。…………… 一位不准居留者的申訴

然而，在諸多的早期華人移民中，最痛苦倒不是那些築鐵路工人，也不是被拒的尋金者，更不是在三藩市定居的人士，而是早期初被騙來美的婦女，被迫當娼，過著非人的生活。《三藩市紀事報》於1905年12月9日有這樣的報導：1905年11月一個寒冷的星期四晚上，一個名叫Mooie Qui的少女，從一個妓寨逃脫出來，見到一個警察，便把一張字條交給他，原來這字條寫上三藩市金馬倫堂的地址。這位警察便帶著她前往金馬倫堂尋求庇護，金馬倫堂(Mission House of Donaldina Cameron)是專門協助那些被騙來美當娼的少女，逃離魔掌。在20世紀初年，由於不少移民都是男子，他們離鄉別井，拋下妻兒，獨自渡洋謀生，所以三藩市的華人女性只佔10%。於是那些色販便偷運少女來到三藩市當娼，靠那些勢力強大的堂口支撐；在St. Louis Alley便有不少妓寨和販買妓女場所，每個少女值\$850-\$2,000不等。在Bartlett Alley，幾乎每一間樓宇都是妓寨，美國人Donaldina Cameron冒著生命危險，把這些少女從火坑中拯救出來，不過，不少這些妓女大都染有性病，當娼的年日不過6年就因病離世，她們的身世是非常可憐的。

翻閱昔日的歷史檔案，看到一個一個悲慘的故事，倍覺今日移居美國的華人實在幸福得多，不少新移民一到埗就取得若干福利，無論是醫療白咭、糧食券等，而且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然而，這不是說他們沒有遭遇歧視，也沒有心理的壓力，事實上，不少人抱著一個美國夢移民來到加州，誰料是一場惡夢，更有不少未能適應美國這個新環境，生活感到極其痛苦。教會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我在教會目睹有些移民的故事，正好反映移民的掙扎和困難。

李先生(假名)早期舉家移民來到美國，住在唐人埠。李先生夫婦都找到工作，辛苦的養大3個兒女。長子在加州大學巴克萊(UCBerkeley)畢業，在東灣一間中學任教。其餘二個兒女分別在大學攻讀，小康之家，生活安定。每逢週末，大兒子都返回唐人埠與家人團聚，到星期日晚才返回東灣。一天，大兒子駕著他新買的車來到唐人埠，泊在家附近的街上。晚飯前，他想起留下一些東西在車內，便離家到他泊在街上的車那兒，竟然發覺一個白人正偷竊他汽車上的收音機。他連忙上前制止。由於他自少練習功夫，孔武有力，很快便制伏這名盜賊，但他發覺在車上的收音機已受到損壞。剛好這時，住在他樓上的鄰居經過，於是便請求這鄰居代他報警。事實上，警局就在附近不遠，他等了10多分鐘，仍然不見警察踪影；他正在躊躇之際，那盜賊對他說：「我願意賠償你的收音機，請你不要報警。」他信以為真，便放了他到自己的車上，取錢賠償。誰料，他一進入車內，就開車離去，完全食言。有見及此，這青年連忙阻止，但他卻被車撞倒，當時圍觀的有差不多20多個街坊，都是華人，沒有一個人出手支援。這青年起來，返回家中，兩個小時後，發覺頭劇痛，於是家人便送他入了醫院，入院不久便因腦出血不治！警察很快便拘捕了這個殺人犯，但所有目擊證人及他的鄰居，都不肯出來作證，在毫無證人下，檢察官只有決定不控訴這殺人犯，至於他的鄰居，根本就沒有報警，也不肯作證此事，如此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就容讓這個殺人犯逍遙法外，這青年含冤未雪，這真是華人之恥！

自從中美建交後，美國對中國移民的配額亦隨而增加，這大大改變了三藩市唐人埠的文化。在1970年代，我在三藩市唐人埠教會作神學實習生，他們大多是從香港來的移民或土生的華人，尤其在青年的一輩，大多是操英語的。但到80年代後期，從大陸移民來美的數目大增，他們大多屬家庭聚合的理由而取得居留權；其中操台山話或中山話的居多，但大多數都能操流利的粵語。由於語言及文化問題，不少新移民都未必能適應這改變。陳先生是從廣州移民到美國，他失散了數十年的兄長担保他們移居美國。陳先生本來有一女一子，但在廣州的義父不肯讓其子移民，要留在中國，企圖迫使陳先生寄錢回中國。陳先生無奈，只有忍痛留下其兒子給義父照顧，只有他們一家3口到三藩市來。

他們一下機，接機的兄長便給他一張欠單，申請移民的律師費，旅費及其他費用一共1萬多元，他們一家寄住在兄長的地庫，他自己則在兄長的餐館工作，其妻子則照顧兄長一家的家務及打雜。當我探問陳先生時，他流著淚的告訴我：「我在中國時，無論是最艱難的日子，我也沒有流過半滴眼淚，但自從移民來到美國後，寄居在兄長的家庭，既沒有尊嚴，也沒有盼望，我每晚自己都流淚！3個月前，我們決定離開兄長的家，一家3口搬到田德隆區的一個散房，經朋友介紹一份三行的工作，開始自力更生，明年決定回中國把兒子接過來！」

我相信類似的故事，在三藩市屢見不鮮！不過，最令我難忘的倒是以下的一個故事：

一天，我正在教會工作，接到一位當護士的會友來電，詢問我是否認識一位移民律師；原來她有一個病人，患了血癌，需要骨髓移植，這是唯一治療之方。這病人來自中國，曾到廣州檢驗，

發覺她的骨髓與家姐和弟弟都吻合，醫生便主張他們來美進行骨髓移植的手術。誰料在廣州的美國領事，拒絕簽證，懷疑他們藉口來美，一去不回。她現在需要請一位律師寫信給領事求情，我欣然答應，以為基於人道立場，問題應該不大。怎知一個星期後，領事館的回覆是：「不許！」律師提議我去找國會議員幫忙，於是我連忙致電代表三藩市選區的國會眾議員辦公室，他們的答覆令我感到非常失望，他們推說這病人住在Oakland，不是三藩市，不便處理，並且叫我找Oakland的眾議員幫忙。當我致電Oakland的眾議院辦公室時，他們說：「他不在美國，因公事到了歐洲，不便處理這些事。」我知道他們是無心也無意伸出援手。

我忽然想到11月是選舉時期，三藩市的眾議員兩年的任期已滿，她要角逐。我靈機一觸，便再致電給她的辦公室，並且對她的助理說：「我在電台有一個節目，我知道11月是選舉，我預備在選舉前把這個故事公開，並且表明我從你們得不著任何幫助！」這一招果然奏效，不夠1天，便接到這助理來電，議員願意協助，並很快便與我聯絡。當時幼稚的我信以為真，以為很快她便與我聯絡。誰料1個星期大選過後，這議員以高票當選，但她一直也沒有與我聯絡，這就是美國政客偽善的一個明證。

但我沒有放棄，繼續想方法尋求協助，透過James Dobson的Focus on Family協助，我認識了一位在國務院工作的高官，他是一位基督徒，他致電給我，解釋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外地的領事，他們有絕對的權力准許/不准許一個外國人入境，甚至連總統也不可以在這方面命令他，然而，他會與廣州的領事聯絡，以人道立場請他們再三考慮。一個星期後，果然接到好消息，他們姊弟二人順利來到三藩市。但經醫生檢查，發覺他們的骨髓根本就與這位姊妹不配合，醫生亦無法進行骨髓移植的手術。我以為

這姊妹一定非常失望和難過；誰料，當我陪她看完醫生，送她回家的時候，她竟然對我說：「牧師，失望是有點的，但我不是絕望，多謝你，帶我認識了主耶穌，以致我有永生的盼望，對現在的我來說，可否得著痊愈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唯一担心的倒是我兩個兒女和丈夫。」她的信心和平安，實令我感到非常驚訝。在感恩節的崇拜中，她向會眾分享她的見證，聽者無不感動流涕，3個星期後，她就安然離世，去到更美的家鄉！

安息禮拜3日後，她的丈夫氣沖沖來找我，告訴我在他妻子離世後的一天，她的姐姐竟然走進他的房，跪在地上，請求他娶她為妻，因為她無意再返回大陸。他連忙帶著兩個子女離家，搬到他父母那兒暫住。我得悉後連忙去找她們姐弟，說明他們一定要返回中國，否則我會完全失去信譽，因為在某程度上，我是他們來美國的擔保人，他們非法居留，人家又怎會再信任我呢？但他們沒有聽取我的意見，以後再沒有他們的踪影了。其實，她的姐姐在中國是結了婚的，並且育一個兒子，為了居留美國，竟然不擇手段，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想到美國領事起初不批准他們來美，不是沒有理由的，後來聽聞這個女人嫁了一個比她大幾十年的老華僑，她和弟弟都居留在美國！

以上我所提到的故事，似乎都有點負面的描繪，以為華人移居美國，問題多多，一點好處也沒有！其實並非如此灰暗，美國是一個民主及法治國家，若能自愛，勤奮，忠誠，可說遍地都是機會。在三藩市播道會，我們為那些新移民開辦英文補助班，有些是少年人、有些是成年人。事隔十多年，眼見其中不少學業有成，當上工程師、教師、會計師及醫療專業，又成家立室，成為美國中產階層的一份子，實在令我感到欣慰；更難得的，其中有不少信了主，在教會成為活躍份子，更有投身於幫助新移民工作，薪火相傳，令人鼓舞！



第三十四章 失憶的一代



2019年6月3日，即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位於台灣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園內的自由廣場，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王維林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一事。（見圖）自由廣場向來是中國大陸遊客訪台必到景點，我們看到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看來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一段令人震驚和悲痛事蹟的標記！

1989年4月中旬，中國大陸高校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起悼念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並要求當局解決貪腐問題，進行民主改革。這運動持續了7個星期之久。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的學生進行武力清場行動，其後中國當局更展開大規模逮捕。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事隔了32年，六四事件仍有不少懸謎。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這7個星期中，超過100萬人曾參與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除了學生外，還有各行各業北京居民；不但如此，在中國各地400多個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以四川的成都至為注目。

事實上，在此期間，全世界各大城市都舉行大遊行，支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起初，不少人都持著希望，以為這一定帶來中國大改革，邁向民主的路程，誰料發展至1989年5月20日，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實施戒嚴，軍隊開始進城，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此時北京郊區已經發生一些零星的流血衝突，當局亦同時把這運動定性為「動亂」。在同一日晚上，颱風布倫達吹襲香港，天文台掛起8號風球，但當晚仍有4萬多港人冒著大風大雨，來到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並遊行至位在灣仔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翌日，有超過150萬人遊行，支聯會就在當日成立。遊行人士由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出發，途經新華社，最後抵達維多利亞公園。遊行持續達8小時，直到晚上10時才結束。

我那天接到香港一些弟兄姊妹來電，他們情緒都非常激動，聲淚俱下，分享他們目睹這和平集會之感受。當時他們仍然抱著極樂觀的態度，期待著一個歷史的大改變！我們在三藩市的教會也舉行特別的祈禱會，我從沒有見過教會有這麼多人參加祈禱會，而且又是這麼熱切的，心受激勵，但在我心底裏，卻存著一個極大的憂慮，總覺得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6月3日晚上，解放軍開始在天安門以實彈射擊從西側和南側進入廣場的學生，當時仍有7萬至8萬人留在廣場。到了6月4日凌晨4點半，解放軍開始四面八方逼近，而在廣場的學生亦開始撤離。據一些撤離的學生聲稱，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最後軍隊已控制整個廣場及北京市區。

6月5日，正當18輛坦克車準備駛入天安門廣場繼續清場，一名男子在長安街上隻身阻擋解放軍坦克車前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員一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該名男子攔阻，他更爬上坦克塔，並和駕駛員溝通。最後他被幾名身穿藍衣人士帶離現場。整個過程都被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攝錄下來，隨即在國際間各新聞媒體廣傳，這男子就是我們所說的「坦克人」。

究竟這男子是誰？他的下落又如何？如今仍是一個謎。有些人相信他的名字叫「王維林」（英國《星期日快報》最先報導），他是19歲的學生，在當天遭中國政府以「政治流氓」和「企圖推翻中國人民解放軍」等罪名起訴，但亦有人以為他是一名工廠工人，後來被處死。總之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他還活著，有人卻以為他已死了。吊詭的地方是：這些當事人也隨著坦克人一起消失了！可悲的是千千萬萬人的夢想，以為中國會邁向民主的路程，也隨著「坦克人」已消逝了。然而，更可悲的是：在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心中，這件觸目驚心的慘劇竟然也徹底地消失了，好像中國這一代人是集體失憶似的。不少人作調查，在今日中國境內的大學生中，能認出「王維林」坦克人這照片的不及15%，而這15%中大多數都不願再提及這敏感政治議題。著名的美籍猶太裔作家Elie Weisel曾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我有機會重返昔日家鄉波蘭，與當地人傾談，令我感到非常悲傷的一件事，這些波蘭人竟然完全忘記在不久之前猶太人在波蘭遭德軍大屠殺，他們竟忘記得一乾二淨；這一回，他們真的在腦袋中把猶太死難者再一次徹底地屠殺！這令我感到悲憤和不安！」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7年的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在六四事件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了「重返天安門」一書，這書的附題是：在失憶的共和國追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六四的歷史真相(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Tiananmen Revisited)，這書的中文版是於2019年出版，在中國是禁書。林慕蓮所採用的書名真是可圈可點。當然，她所謂「天安門」是指六四事件，而她更巧妙地描繪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失憶的人民共和國。翻開中國歷史看，天安門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廣場建於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面積44萬平方米，在這100年，發生了不少重大事件：

☞ • 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學生抗議巴黎和談有關山東省問題的決議，作為第一次大戰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竟然被迫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惹起中國人的憤怒。

- 1926年：三一八慘案。三一八慘案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一場政府屠殺學生和平民大慘案。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名《紀念劉和珍君》，並形容三一八慘案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事緣是這樣的：1926年3月12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日本軍艦掩護奉軍，駛進天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國民軍堅決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大沽口，日本竟然聯合英美八國於16日向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施的要求。這引起全國憤怒，3月18日，北京5,000多人，其中以學生為主，在天安門集會抗議，要求政府拒絕八國通牒。

集會結束後，李大釗率領隊伍，從天安門出發，經長安街，進入獅子胡同(即今日的張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門前請願，其中一位是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大學的高材生及學生領袖劉和珍。當時段祺瑞不在，軍警恐怕失控，就用武力驅散示威隊伍，並開槍射學生們，結果47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其中一名死者

便是劉和珍。在場的軍警把她的財物掠走，甚至連衣服也剝光。魯迅的文章大肆抨擊腐化的北洋政府。

時到今天，歷史學者也無法決定是誰下令開槍，雖然我們無法證明段祺瑞是幕後黑手，但這慘案肯定是與他有絕大的關連，所以當時學者，如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梁啟超、傅斯年紛紛斥責段祺瑞政府。最終一個月後，段祺瑞頂不住強大的國內外壓力而倒台。

鮮為人知，而極弔詭的地方：就是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被屠殺中，其中一名被槍殺身亡的死者是清華大學生段昌隆，段祺瑞就是他的叔祖父，家人把他葬在段祺瑞之墓旁！

-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多次接見從中國大陸各地來的紅衛兵。
- 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

”

自1991年，政府企圖改造天安門的形象，每天都讓群眾進入天安門觀看升旗儀式，每天都有2萬至3萬人觀看，節日則更多，每年國慶觀看人數都在10萬以上，以下是一個遊客參觀完升旗禮後的感想：

「我們3時許便起來，睡眠惺忪地登車前往，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在飢寒交迫的情況下(因為沒有吃早餐)，等待儀式開始。國旗及國歌是代表國家，當升國旗，唱國歌的時候，人民便會感到十分光榮，所以當激昂的國歌奏起時，心中不禁感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回想起昔日的中國，只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現在的中國已越來越強大，中國已不再被別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欺負的對象，中國人亦已站起來，已成為世界的強國，目睹國家之興盛，我們激動的心情，仍久久未能平復！」

但對一些還沒有失憶的人士來說，他們卻在廣場想起六四時被屠殺的青年人，聽到國歌時也想到作者田漢的淒慘遭遇，心中真不好受！但無論如何，政府在改造天安門的形象上是相當成功的，林慕蓮稱之為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雖不中亦不遠矣！然而，雖是面對著政府龐大的宣傳，嚴苛的政治壓力，有不少人仍勇敢地把六四的真相揭露出來。在齊有太史簡，在晉有董狐筆，在今天的中國，林慕蓮就要重返天安門，追訪一些目擊証人，喚醒那些失憶人士！

陳光是一個17歲的小兵。李鵬在5月19日宣佈實施戒嚴令後，隨著部隊進城，預備趕散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但部隊離開軍營不夠數里，便有數以千計的群眾阻擋去路，令他們的軍車寸步難行，更令陳光感到驚訝的，這些學生及市民並沒有粗暴抵抗，而是友善的與士兵講道理，內中更有一些長者，陳明他們並非暴徒，更沒有任何動機反抗政府，而是抗議國內貪腐問題，並且促使國家走上民主路程。陳光完全想像不到，這完全不是一個騷亂的場面，這些所謂「暴徒」是非常友善和斯文，與他在部隊所聽到的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部隊與群眾對峙了3、4天，明顯的，部隊司令不知所措，也不知如何處理這局面，這些士兵在軍車內，既飢餓，又疲累，起初他們拒絕接受群眾送上的食物和食水，但後來他們忍受不住，更何況那些群眾的熱情和誠懇，取得不少士兵的歡心，開始接受送上來的即食麵、麵包、生果和飲品。如此，這些本來清場的士兵，竟然好像與那些群眾站在同一的陣線。最後，上級有命令下來，所有進城的部隊都要撤回郊外的軍營。

到了6月3日，部隊士兵接到上級命令再次進城，這回他們改變策略，

所有士兵都不許穿上軍裝，而是便裝乘搭公車進城，讓群眾不知也不覺有千萬士兵暗暗地進入了天安門廣場。由於陳光身體不適，要服用抗生素，於是便被安排坐在一輛改裝了的公車上，車上的座位全被拆除，留下空位載滿了槍枝和彈藥，他發覺車內除了司機外，只有他一個乘客，路上通行無阻，沒有群眾阻止，他在下午3時30分便抵達人民大會堂，便把車內的武器轉運入內。到了6時許，部隊齊集在人民大會堂，獲派發槍枝及子彈，到了6月4日凌晨許，士兵離開會堂，在廣場進行清場工作，而陳光則被派往拍攝清場情況。此時在廣場的學生，開始撤離，他跑到屋頂，望著士兵推進，亦聽見槍聲、喊聲，但由於距離較遠，他沒有看到這些槍擊是指向人群，抑或示警訊號，但他返回大會堂時，已發現不少受了傷的士兵躺在那兒，接受護理。

到了天亮，陳光發現呈在中的眼前的是一幅戰後的場景，不少被摧毀的汽車仍正在在焚燒，黑煙冒升。士兵亦開始清除廣場物品，包括一堆一堆的帳幕、單車、橫額、個人物品、碎紙等。陳光的責任是拍攝清除的過程，忽然他看到一幅令他困擾多年的情景，他看到一輛被毀的單車之車輪上，竟然夾著一束女孩子的髮辮，還有一條紅色的絲帶束著，明顯這是一個被殺死女孩子遺體的一部份。他呆了一陣，不禁自問：「這女孩子是誰？她現在還活著嗎？」正當那些士兵放火燒毀這些時，他還嗅到秀髮被燒焦的氣味。這幅圖片竟然困擾了他以後的30多年！

1992年，陳光考入著名的北京中央藝術學院，這學院的學生正是六四廣場上民主女神像的創作人。在學院期間，他從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當兵的背景，他一直保存著一部份他拍攝到天安門事件的照片；並按著這些照片劃了不少圖畫，他沒有出售這些作品，也沒有公開，因為他知道這樣只會帶給他極大的麻煩；他只留給自己作為紀念。六四對他影響極大，這幾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十年來，他只把自己隱藏在藝術的世界中，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子女，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和他的作品。當林慕蓮問他：「在六四事件中，你有沒有其他選擇的權利呢？」他答道：「我知道我是活在罪咎之中，但我也不知道我有其他選擇的權利，對當時的我來說：上級的命令，我就必須依隨！並沒有其他選項！」

對17歲小兵陳光來說，他以為當時是沒有其他選擇的權利，但對50多歲的徐勤先少將來說，他卻毅然選擇他良心的指引而抗命，但他卻付上了極大的代價。徐勤先早在1950年便加入解放軍，並往朝鮮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他一直効力解放軍，1987年任陸軍第38集團軍軍長。當他在5月17日接到戒嚴命令，軍隊要往北京清場，他抗命，並致電政委說：「我不參與，這事與我無關。」他曾對朋友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天安門事件後，他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被軍事法院判決5年有期徒刑，在秦城監獄服刑。他在2016年病逝，前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李銳賦詩稱許徐將軍：

「懷仁博學真儒將，一代英雄硬脊梁
甘赴刑廷違上命，但求民主大興邦！」

不過，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天安門母親的精神和勇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的張先玲女士，1989年6月4日凌晨，她19歲的兒子王楠在長安街南口被解放軍射殺身亡，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王楠是一個中學生，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但卻熱衷於攝影，當他從公車上看到天安門集會，於是便決定前往廣場拍照。起初，張先玲是阻止他，怕他年幼無知，易被人利用，但王楠卻不以為然，以為學生運動目標正確，而且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到了5月中旬，王楠似乎越來越積極，並表示支持學生絕食抗議。

6月3日晚，他們吃晚餐的時候，王楠問道：「你們以為解放軍會否射殺示威的學生呢？」張先玲答道：「沒有可能，國家軍隊怎會射殺自己的國民，就是文革混亂的時候也不會如此！」到了深夜，她也不敢相信軍隊竟會射殺自己的人民，看看兒子的房間，燈是亮了的，以為他仍在家中，應該是安全的了。怎料到了6月5日早上，她發覺王楠早已離家，並留下一張字條：「媽，我要出外找我的同學！」鄰居告訴張先玲，王楠是在半夜離家的。張先玲等了整日，還不見王楠的蹤影，她真有點担心了，與丈夫到處尋覓，走遍北京24間醫院，但仍找不著，只見間間醫院擠滿了槍傷的人。直至6月14日張先玲收到王楠學校打來的電話，一具遺體看來好像他的兒子，正停放在一間小醫院內。其實他是死了10天，但所有殯儀館都沒有空位，只能把他寄放在這間醫院內。張先玲立即前往認屍，證實就是王楠。她等了足足1個星期，當局才批准她把王楠埋葬。

自此，張先玲感到非常沮喪，失落和內疚。但後來她想通了：王楠是為了把這足以影響整個中國歷史的運動記錄下來而喪失了生命，她就決定繼續她兒子的遺志，追尋六四的真相，把這歷史記錄下來，公諸於世，她先把王楠與其他犧牲者的死亡真相揭露出來，經過她不斷的明查暗訪，8個月後終於找到真相。當6月4日凌晨1時30分，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北角，解放軍開始射殺群眾，一個的士司機目睹王楠衝前拍照，突然子彈飛來，他立即倒地。當時有在旁的百姓企圖扶起他，但遭部隊警告，不准任何人接近。有些士兵把他拖到路旁，一位老婆婆在旁看見了，忍不住乞求那些士兵：「他只是一個小孩子吧了！請救救他！」其中一個士兵對她說：「他是一個暴徒，任何人企圖去幫助他，我會立即開槍！」就在此時，有兩部救傷車趕至，一位穿白袍的醫生跳出，企圖急救王楠和另外兩名傷者，但遭士兵喝令離開，任由這3個傷者躺在路旁，不住流血。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王楠死後8個月，張先玲終於找到其後所發生的事。當晚北京醫院一位實習醫生，與兩個同事自願跑到廣場協助傷者，6月4日早上2時許，他們發現王楠躺在廣場東北角的路旁，奄奄一息。這三位醫生請求士兵帶他入醫院治療，但遭拒絕。他們只能替他包紮傷口，及進行人工呼吸，但他繼續流血不止，終於在3時半斷氣，其他兩個傷者都不治死亡。這時在旁的士兵仍然禁止他們把死者運往醫院，這位醫生只能從王楠身上取出身份證和學生證；並於6時許致電王楠的學校報告死訊。學校得悉死訊，便把王楠葬在學校門前的花園下，但由於草草安葬，屍體亦開始發臭，學校當局便通知衛生局，衛生局派員查實，發現王楠身穿類似軍服，誤以為是軍人，便把他的遺體送到這小醫院中，到了1990年1月，這位醫生拿著王楠的門匙和身份證找上門來，把當時整個情形告之張先玲，她才知道王楠遇害的整個過程。

孔夫子說過：「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想不到擁有幾千年文化的中國人，到了今天竟然淪落至此：不是見死不救，而是見死不准人救，令人感到氣憤和悲痛。作為母親的張先玲，是何等的悲痛！她對林慕蓮說：「我企圖不去想這些事，每逢我一想起，我就有幾天都不能入睡，我可以想像到在他臨終前的幾個小時，是如何的痛楚，我想到他躺在血泊中，腦裏說著：『媽媽，我覺得很凍，很凍！』」說到這裏，她已是泣不成聲了！

丁子霖與張先玲都是「天安門母親」的創始人。她的兒子蔣捷連是在6月3日11時許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槍殺死亡，死時只有17歲。丁子霖與其丈夫蔣培坤都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同是天安門母親的重要成員，丁子霖更是第一代發言人。

據丁子霖在2014年所寫的一篇文章《生于多難，殤于一瞬---懷念連兒罹難25周年》一文所述：

6月3日那一天晚上，我們從電視裡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是政府有什麼行動，要求全市居民待在家裡，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兒子一聽那個緊急通告，無法安心下來了，焦急地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天安門廣場還有這麼多大學生呢？」我回答他說：「沒有別的辦法，除非北京市民傾城出動上街，去廣場，但現時不可能做到。」我勸告他：「外面太危險，不要再出去了！」但他覺得我太怯懦，他用奧運會運動員一句話回答我：「重要的不在行動，而在參與！」說罷，他轉身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頰，說了一聲：訣別吧！我萬萬想不到，這一次兒子的出走竟是我們母子的永訣。在4日的早上6點多鐘的時候，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由他父親陪同來到我們家門口，他說是我兒子的同班同學。他告訴我們：蔣捷連受了重傷，流了許多血，已被送往醫院，但不知是在哪家醫院。接著，他向我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3日晚上，他和當晚離家出走的捷連來到木樨橋頭時，看到那裡滿大街都是人，而橋西頭的大街，盡是裝甲運兵車和一隊隊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士兵，整條路都被堵塞了，車輛和行人無法通行。正當此時，部隊開槍，機槍和自動槍的掃射猛烈，突然一顆子彈射中了蔣捷連的背後，蔣捷連對他說：「我可能中彈了！你先去吧！」隨即倒臥在地，鮮血浸透了身上的恤衫。

6月4日的北京，猶如經歷了一場慘烈的戰禍，先前那响遍夜空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吶喊聲已經停息，但四處仍不斷有零星的流彈呼嘯而過；
一路上到處是瀰漫的硝煙，到處是丟棄的坦克和軍車，
到處是流淌著血污.....那馬路兩旁的樹木、花草、房屋，
所有一切，似乎都低著頭，在這慘遭災禍的古城哭泣、流淚。

這些悲痛的遭遇把天安門的母親聯結起來，據張先玲回憶說：當年總理李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六四死亡人數和名單時，稱家屬不願公佈人名，她和丁子霖聽了後非常反感，就開始聯手組織天安門母親，除了丁子霖、張先玲外，還有失去了丈夫楊明湖的尤維潔。她們要求「真相、賠償、問責」，追求公義的代價。

1994年，丁子霖和張先玲已聯終到96名死難家屬及49名因六四受傷致殘的見證者，透過香港傳媒公佈死傷者名單。1995年，她們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全國人大發公開信，要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開調查結果，向死者親屬作個案交代。

然而，尋訪難屬之路不易走，其中不少在廣場及附近被打死的人，並非北京市民，而是來自外地。她們在廣東、四川、內蒙古等8個省份，就找到了21名難屬，天安門母親至今已找到200多名難屬，並整理死難者名單，記錄家庭背景和遇難情況，直至今今天為止，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數仍是個謎。早期中國官方宣佈死亡數字是241人，包括23名士兵，後來中國紅十字會估計有2,600人死亡，這與瑞士駐中國大使所估計的2,700相近。

2016年，丁子霖收到一名神秘男子電話，聲稱會在2017年「十九大」後與家屬商討賠償，但丁子霖以他不是代表官方為由拒絕。又據尤維潔透露，更早前有警察找過一位難屬賠償，但為丁子霖拒絕，並明確拒絕這種暗箱

操作的方式。

天安門的母親如此堅持她們的使命，卻賠上不少代價。走上前線的都遭受極大的打壓。丁子霖夫婦先後被褫奪教席，她們屢次被跟蹤監視，限制出外，甚至遭到軟禁。事隔30多年，大部份這些母親已經年紀老邁，但她們的心，卻從沒有死去，正如六四死難者楊燕生的遺孀黃金平說：「31年了，我們艱難地行走在深秋的路上。陰霾擋住了陽光，我們痛得不能呼吸，不能言。但因為我們生命尚存，我們將堅持到底，砥礪前行，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只要活著。」

不過，最有效提醒我們毋忘六四的莫過於每年在香港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自1990年起，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舉辦，每年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活動，這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動，每年參加人為數萬至10萬不等，晚會內容包括誦讀六四死難者，及離世死難者家屬名單、致悼辭、默哀、獻花、播放民運人士及天安門母親的訪問影片等等。除了「平反八九民運」外，晚會還提出其他訴求，包括「追究屠城責任」「釋放民運人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等，一直維持了30年。

2020年及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以疫情為內，取消集會，2021年因國安法影響，維園集會被取締，支聯會亦告解散。我於2000年至2013年間在香港，曾數度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象非常深刻！

我曾聽過不少朋友質疑說：「追尋六四的真相有何好處？現在的中國社會不是和諧完美嗎？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中國的完美社會呢？況且，看看自1989年後，中國豈不是突飛猛進，現在已經是世界強國，在諸多的領域上都是世界的領導者。相反來說，若不是鄧小平堅定鎮壓，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消除一切影響國家穩定的反動，中國又怎會有如此的成就呢？」我相信他們的質疑或許都是發自內心，不一定是嘲諷之意，而是真誠的發問。

或許，我們要問：為什麼中國政府這麼緊張人民知道六四的真相呢？為了讓所有國民一起忘掉六四，不惜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所有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這樣作要付上的代價太大了。他們以為人民就不會記起這段歷史，但弔詭的地方是：就是中共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4年。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竟然害怕這些已經老邁的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其實，這類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注意，政府這種態度，豈不是更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另一方面，我倒覺得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一如先前引用 Elie Weisel 的話：「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猶太人被屠殺，就好像在他們腦袋中把這些死難者在他們的記憶中再一次徹底地屠殺！」魯迅在三一八慘案後寫過一篇文章，名「紀念劉和珍君」，內容是這樣的：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了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
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不但是殺害，
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瘍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是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慘象，
已使我目不忍視了；

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我懂得哀亡民族之所以無聲息的緣由了！
沉默啊！沉默啊！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魯迅這番話，既適用於六四事件，也適用於日後香港的送中運動，
為什麼我們總是沒有從歷史中學到功課呢？「失憶」「沉默」「謊言」「忘記」
便是罪魁禍首了。在基督教的神學中，「記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義和
信仰實踐！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有逾越節，記念他們在埃及為奴的日子，
及耶和華如何把他們從為奴之地領出來。新約時代，我們有「聖餐」，記念
耶穌捨身流血，建立了新約。「記念」不只是記念「過去」，也記念將來，
就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6節說：「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
是表明主的死(過去)，直等到祂來(將來)」，對基督徒來說，就是在最黑暗
的日子，我們還是沒有失去盼望，盼望主的再臨，建立新天新地！正如
邢福增教授在《為香港禱告》裡其中一篇禱文說：

“ 在看見的世界中，感悟那看不見的天國，
盼望所是，勇氣所在，信心所聚，愛心所賴，
公義所顯，真理所持！ ”

這也正是我們為六四事件的禱告！

我是誰？

身份的迷惘

1991年，君玉和我一同入籍美國，成為美國公民；這是我一生人第1次擁有國籍，在過去40多年，我都是沒有國籍的香港人。而君玉呢？雖然是擁1本BNO護照，但英國政府也不以為她是英國人。當然，我們是高興的，至少在美國法律下，我們都受到保障，並擁有投票的權利，與其他美國人無異！然而，我真是美國人嗎？

我記得在天安門事件的7個星期，天天都面對著電視機，追蹤著學生運動的發展。起初是非常興奮，心情雀躍，深覺中國會有大改革，但及至解放軍坦克入城，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我不住的流淚，非常激動，我不禁自問：「那些在天安門的學生，既不是我的兒女，又與我無親無故，為什麼我會如此激動呢？甚至夜不能眠？」我相信一句「血濃於水」並未能釋除我的疑問，我開始發覺：在我心底下，一種難以理解的民族情懷深藏在我血液中！

記得有一回，一個年青人問我：「蘇牧師，你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毫不考慮便答道：「美國人，我在香港長大，一直也沒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他感到有點詫異，便追問說：「你不覺得這是不認祖嗎？」我反問他說：「你又以為你是美國人抑或中國人呢？」他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是黑頭髮，黃皮膚，當然是中國人啦！」我反駁說：「難道所有黑頭髮，黃皮膚的，無論是來自日本、韓國、東南亞等都是中國人嗎？再者，你既然不以為自己是美國人，為什麼你又要留在美國，

而且還入了籍呢？」他無言以對，只是輕輕的說：「我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從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些問題。」

其實，這年青人所說的未嘗無理！就要是我們以為自己是美國人，在法律上也擁所有美國人的權利，但其他族裔的美國人未必認同我們是與他們無異的美國人；我並不是指在昔日Chinese Exclusion Act時代，就是在今時今日仍有些美國人帶著種族歧視眼光看亞裔人士。1996年的聖誕前數天，我往北岸區郵政局買郵票，人龍很長，我正耐心地排隊候輪，忽然一個60多歲的白人，走到我面前撞我，然後大聲喊著：「白痴！不要阻我去路！」他的行為令我感到非常憤怒，不過令我更不安的，就是站著的廿多個人，目睹這情況，竟然毫無反應，好像是一件司空見慣，見怪莫怪的事！又有一次，我聽見一個50多歲的白種女人，指著一個駕著Cadillac的華人司機大聲說：“Go back to China!”我相信在今日的美國社會中，像這樣的人大有人在。雖然我承認大多美國人都非常友善，就好像我現在的鄰居，多是白人，他們並沒有任何歧視！相反的，我們守望相助，真是遠親不如近鄰。

在Covid 19疫症前，我在三藩市唐人埠，舉目一看，真的把我嚇呆了！我發覺在唐人埠中，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遠比懸掛美國旗多。我不禁問道：究竟我是身處美國，抑或中國？我相信只有在美國才有如此景象出現！如果我們自己都不認同是美國人，又怎能期望其他美國人認同我們是美國人呢？想到這裏，我就越來越迷惘，原來我們在美的華人，身份確是非常迷糊，並非一句「我是美國人」或是「我是中國人」便能解答。

在1960年代，隨著平權運動之興起，在加州開始有人用「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s)來描繪那些來自亞洲的移民家庭及他們土生後代，包括日本裔、中國裔、韓國裔、菲律賓裔、印度裔、越南裔等。雖然他們文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背景、語言等都不一樣，但都統稱為亞裔人士，他們佔全美國4.2%，其中51%是居住在加州、紐約及夏威夷。據2002年人口普查，亞裔人士75%是居住在上述3個州，他們大部份都是於1965年才移民來美的。一般美國人都分不清楚這些亞裔人士的種族、文化背景之不同。在1982年，Vincent Chin在底特律被謀殺，是因為那殺人犯誤以為他是日本裔，而日本的汽車工業把他在底特律汽車工廠的工作奪去，因而遷怒於他。(參看U.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USCCR, 992)。同樣的1989年Jim Loo被打死，是因為那殺人犯誤以為他是越南裔，故稱Jim Loo為“gook”。我記得在90年代，我與我的同工Stephen一同前往亞特蘭大參加一個教會聚會，有些牧師看到我們，就對Stephen說：「你說的英語非常流利！」Stephen是土生土長的ABC，便回答他說：「我只懂英文，我自小在美國都是操英語的！」那牧師聽後，連聲道歉。

如果我們說第一代的移民有如此的掙扎，那麼第二代的土生土長華裔人士則掙扎更大；究竟他們要認同美國本土文化，融入他們的社會，抑或認同他們父母的文化和價值觀呢？據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的研究，78%的亞裔移民能操流利的英語，比較拉丁裔的移民，只有48%能操流利的英語有極大的差異；但在第二代的移民中，拉丁裔能操西班牙文的遠較亞裔移民能操他們原國家的語言高。換言之，拉丁裔的移民認同他們父母的文化的較亞裔移民高。事實上，在第一代的華裔移民中，69%認同他們為Chinese Americans，有18%稱自己為Asian Americans；9%稱自己為Americans。但到了第二代；似乎就有顯著的分別，45%稱自己為Chinese Americans；23%稱自己為Asian Americans，27%稱自己為Americans。

很明顯，在華裔人士中，大部份的土生都認同於美國文化和主流社群，

而不是他們父母的群體和文化。然而，當他們發現要溶入白人的社群中並非一件易事，於是認同自己是 Asian Americans 的也就越來越多了。就以我女兒的經歷為例，她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是參加學校游泳隊，其中隊員多是白人，有少部份是亞裔人，但白人有白人的圈子，亞裔人有亞裔人的圈子，彼此不大往來。亞裔人中，有華人、菲律賓人、日本人，她們曾就此事向教練投訴，結果教練為她們舉辦一個名為「種族融和」的講座。當然，這講座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

王穎在80年代及90年代拍攝了兩部非常有趣的電影，一部是「點心」(1985)，一部是「喜福會」(Joy Luck Club, 1992)。「點心」是講述三藩市的一對母女，母親譚太是第一代移民，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婦女，她的思想，生活方式是傳統的中國女性代表；但女兒紫雲卻是美國土生土長的一代，一方面她受母親的傳統思想影響，謹守孝道，但另一方面又想過獨立自主的生活，這個矛盾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紫雲的婚姻問題。作為一個傳統的母親，當然喜歡女兒出嫁，了結心事；但現實卻又告訴她，作為一個移民，又踏入年老的階段，丈夫又早死，當然有女兒陪伴是最好不過。兩個女人，就在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兩個不同的性格，兩種不同的期望，彼此交錯，引伸了相當複雜的情緒和掙扎，我想這是80年代移民家庭的一個特色！

不過，從Amy Tan(譚恩美)小說Joy Luck Club改編成電影的「喜福會」，似乎在90年代更大受歡迎，何解？因為它道中不少移民的心聲。不少移民都帶著一個美國夢來到美國，他們以為在美國生活較穩定、富裕、子女可以在一個更佳的环境成長，有更多機會在社會的階梯扶搖直上，更何況昔日在中國或香港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這可以說是人生新的一頁之開始。

「喜福會」是講述4個不同的母女關係之故事。母親是第一代移民，她們的女兒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從這4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華人在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美國的身份危機和掙扎，也看到家庭關係的重要。

- 不少第一代的移民都帶著不少創傷的歷史來到美國，或是因戰亂、家暴、政治運動、天災等離開中國，希望來到美國找到一個安樂土，讓他們的兒女可以在一個安穩的環境成長和生活。然而，這些創傷卻揮之不去，不但如此，還嚴重的影響他們的下一代！
- 一如大部份第一代移民，小說中的4個母親都希望她們的兒女繼承一些優良的中國傳統和價值觀，但作為土生土長的4個女兒，她們只希望溶入這個美國主流社會，並不看重她們母親之「老土」行徑，並以為恥。於是便帶來不斷的衝突和誤會，母親並不體諒女兒們在這個美國主流社會之掙扎，以為她們生活是如此豐裕還不知足？而女兒亦沒有體諒她們母親們過去的創傷和堅毅的精神，也沒有體會到她們來美時所經歷的艱辛，只是為女兒們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彼此期望不同，便帶來衝突和問題，其實這都是每一個從中國或香港移民來美家庭所經歷的。
- 在美國長大的4個女兒，表面上她們非常成功和如意，受高深教育，有高薪的職業，然而她們其實卻是不開心：婚姻的問題、種族的問題、家庭的問題、人際的問題、人生意義的問題一直纏著她們，直至有危機出現，母女之情才呈現在這4個家庭中，她們坦誠的溝通，苦難打開她們之間的隔膜，衝破她們面對的障礙，也讓這4個女兒不再以母親的「中國老土」為恥，而以她們自豪，因為她們都成了女兒們的負傷治療者。
- 或許最能表達移民的問題是這小說在開頭所描繪的一個比喻。一個華婦在上海買了一隻天鵝，售貨員對她說，這本來是一隻鴨，

這隻鴨期望變成一隻鵝，便把頸項伸長，誰料那頸項伸得太長了，竟變成一隻天鵝，比先前的期望更高貴。她携著這隻天鵝來美國，希望他朝一日可以送這隻天鵝給女兒作為禮物，然而，來到美國，移民局不許天鵝入境，這華婦只能帶著天鵝的一條羽毛來美。她本來預算把這羽毛送給女兒為禮物，並講出她的心願。然而，她一直拖延著，一直等待一天，她能夠用完美的美國口音英語告訴女兒時，才把這羽毛送上。

作為第一代移民，我們當然期望子女成為天鵝，但這期望永遠都是落空的，極其量只是天鵝的一條羽毛，而且要等到我們能操完美的American English才奉上，真是一個永遠落空的期望。

究竟「我是誰」？我想這是最基要問題，我常常提出3個問題來作討論：

- 假如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那麼還有沒有「我」的存在呢？沒有你，沒有他，還有沒有我呢？
- 昨天的我，是否一如今天的我；今天的我，又是否同是明天的我呢？
- 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好像我一樣，無論在樣貌、智商、年紀、身裁都是一樣的，那麼，還有沒有「我」的存在呢？

第一個問題告訴我們：「身份」(Identity)與「關係」(Relationship)是難分難解的，若沒有關係，我們稱這正是身份危機(Identity in Crisis)之時。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這關係：

- 第一類關係是我和他人的關係，這包括我與國家、民族、社群和家庭的關係。比方來說，一個無證的非法居民，沒有身份、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沒有法律的保障、又沒有家庭、沒有親戚、沒有可信的朋友，他是很難生存的。事實上，當我介紹自己給別人時，我會說：「我是蘇穎睿，我的太太是劉君玉，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五個孫兒，我是從香港來的，我在三藩市播道會當顧問牧師。」我所說的全部都是我和他人的關係：夫妻關係、父親與子女關係、爺爺與孫兒關係、社群的關係、教會弟兄姊妹關係、國家關係等等！我是從這些關係突顯我的身份。當這些關係都破碎了，身份便出現危機，不少新移民來到美國，離鄉別井，舊有的關係破碎了，在這陌生環境，人生路不熟，語言溝通又有困難，職業又不穩定，這是一段非常艱辛和困難的時期，有些人因此而患上了抑鬱症或其他情緒病，有些青年人更被誘入黑社會組織，因為在那兒他找到自己的身份，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家庭和心理的問題；我親眼看過一個移民家庭，太太患上抑鬱症，女兒自殺身亡，這個家庭在這樣的危機中，仍能捱過，是因為他們在教會中得著支持和鼓勵，給予他們一些破碎關係上之彌補，亦在基督教信仰中找到出路。

- 第二個問題告訴我們，昨日的我、今日的我與明日的我之關係，假若這個「我」不是一致，這是一個精神分裂症的特徵；這個「我」便發生嚴重的危機了！
- 第三個問題告訴我們，雖然「我」的存在有賴一個正常的關係，「我」還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身份」，就要是所有人都與我一模一樣，我還是獨特的存在；而不用倚賴「你」與「他」來扶植，何解？因為我們還有第三種關係：我們與神的關係。我們都是按著祂的形象造的，正如詩篇139章15-16節說：「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死亡」是一個人身份最大的威脅，死亡把人所有的關係都支解了，所以昔日在香港，當頒發一個身亡證之前，他們會把那死者的身份證剪去一角，表示這身份不再存在了。從神學的角度看，「死亡」並不只是最後的一口氣，而是一種分離的權勢；丈夫去世了，妻子可以再婚，因為這婚姻的關係隨著丈夫的離世便告中斷（羅馬書七章2節）然而，死亡卻不能中斷我們與神的關係，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八章38-39節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所以，信徒死了，我們稱「安息主懷」，「與主同在」，舊約稱「他們去到列祖那兒」。保羅說得好：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裏？」

然而，我們會問道：這些抽象的神學觀念，與我們的「身份」又有何實際關係呢？我是「中國人」抑或「美國人」的現實問題，又如何處理呢？這是否說：只要我是一個基督徒，這些問題便不再是問題呢？

中國內地會宣教士楊宓貴 (Isobel Kuhn 1901-1957) 講過一個非常有趣的比喻：當你一個人獨自在一個黑漆的陋室中，外面狂風暴雨，非常恐怖，室內只有一絲微弱的燭光。你在此情此境，仍是有瓦遮頭，並有少少的燭光照亮，給予你安全感，你一方面當然全力保存燭光的延續，但另一方面，你知道天一亮，這少少的燭光就微不足道，因為外面的陽光足以照亮一切。然而，在這「漫天烽火待黎明」的一刻，仍須靠賴著這少少的燭光，但這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等待卻又是充滿信心與盼望的等待。

這少少燭光便是我們在世上的關係，包括我與國家、民族、社群、家庭的關係，這少少的燭光始終都會熄滅，但在那陽光仍未出現前，這少少燭光是帶給我們安全感，肯定「我」這個身份，我知道始終會有黎明的出現，陽光或許會有被遮蔽的一刻；但始終仍是牢牢的掛在天空，發出光芒的溫暖，這就是我們與神的關係，保障「我」這個受造之物，就是「我」尚未成形的一刻，祂已經記念著「我」。

對基督徒來說，光已經來到世上，耶穌就是那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正如約翰福音一章14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然而，耶穌卻又說，現在正是黑暗掌權的時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53節)。我們處在一個既有光，又是黑暗掌權的時刻，神學家稱之為“already-but-not-yet”的末世張力時期，非常弔詭；我們現正等待著主的再臨，黎明的出現。

馬太福音十六章13-21節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文，這亦給與我們對身份的懸疑一個答案。這一段聖經記載到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一件事，這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都有重要的啟迪。這事是發生在耶穌往耶路撒冷受死之前，而發生的地點是一個外邦人為主的地方，名叫該撒利亞腓立比，這是耶穌一生唯一的一次踏足在巴勒斯坦最北的外邦人之地。這是什麼事呢？這是耶穌給祂門徒最後的一次考試！就類似我們的mock examination，耶穌的問題正是「我是誰」的身份問題：

「人說我人子是誰？」(13節)

「你們說我是誰？」(15節)

彼得的答案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是認同他的答案，不過祂卻說：「這不是血氣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隨後，耶穌講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這兩件事表面看來似乎與身份沒有任何關係，但仔細看，卻是真正而極精采的答案！

-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18節)
- 耶穌在21節首次正式宣佈，祂要上耶路撒冷，受長老祭司長、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簡言之，教會的建立與耶穌的死和復活正是「身份問題」的答案，何解？首先，我們談談耶穌的死與復活的課題。正如上述，「死亡」是威脅我們「身份」的罪魁禍首，死是一種隔離的權勢，叫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完全終止。然而，耶穌藉著祂的死和復活，戰勝了死亡，以致我們與神的關係並不會因死亡而終止，而且這更叫我們與主內的信徒之關係也不會隔絕。在新天新地裏，神要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廿一章4節）

那麼，教會的建立又與我們的身份有何關係呢？教會是什麼？她是神的子民，基督的身體和聖靈的團契。「子民」一字，是指屬於神的百姓，國民，有天國的國籍；至於「基督的身體」是指教會，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延續，是在世上屬神的群體，而且是一個非常獨特群體，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3節說：「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這個群體不區人的種族、社會地位、性別、背景，我們都是神的子民，是屬基督的肢體，一如耶穌降生，是帶著使命的，教會也同樣帶著使命，陰間的權柄（死亡的權柄）也不能勝過她，這使命就是「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20節)

還有，這個群體又是聖靈的團契，團契一字，希臘文是 *kononia*，這個字可譯作夥伴，但聖經所提到的 *kononia* 是遠超過一個夥伴，而是同屬耶穌身體的一部份，這就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所說：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26-27節)

我們可總結說，在這個 *already-but-not-yet* 的末世張力的世代中，雖然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但我們有這個這麼獨特的群體，保障了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早嚐那屬天的福份，盼望著新天新地的來臨，那時再沒有死亡與眼淚，這正是我們的盼望，或許下面的一個故事正好說明這個真理。

三藩市播道會位於唐人埠與北岸區交界處的 Union 街，在附近正是歷史悠久的金都戲院 (Pagoda Theater)。金都戲院建於 1907 年，可容 1,000 觀眾，由義大利裔的 Signora Antoniette Pisanelli 經營。1909 年改名為 Washington Square Theater。1928 年，改裝為電影院，到了 1967 年，則改由唐人經營，並改名為 Pagoda Palace Theater 金都戲院，專門放影從香港來的電影，並時有大戲公演；但到了 1994 年，金都戲院結束營業，自此金都戲院一直空置 20 多年。其間有關該址的使用引起多次爭論和訴訟，也引起三藩市政界內外的人關注。有人主張改為地鐵車站，亦有人主張建住宅，最後在 2016 年 3 月改建為豪宅，稱為 The Palace at Washington Square。

在 1999 年期間，有街坊告訴我：「我們收到市議會寄來公聽會通知，一個從紐約來的義大利人擬把金都戲院改建為一個類似紐約百老匯的歌劇院，並設有酒吧，顧客可以一面飲酒，一面欣賞歌劇。我們極擔心，

不知你可否替我們寫一封信給市議會，反對這計劃。」我也聽聞過此計劃，也覺得他們的顧慮有理。事實上，教會與附近的街坊之關係頗佳。我還記得，我們當時開辦了一些英文補習班，專門為從中國大陸移民來美的高中生補習英文，這些學生常常聯群結隊在教會門口吸煙，有女孩子經過時就吹口哨，非常輕佻。街坊見狀，就向我投訴說：「為什麼引入這麼多頑童來教會，令我們感到不安？」我就對他們說：「我想請教你們，你們以為不理這些青年人，任由他們在唐人街四處流蕩，無所事事，我們則採取敬而遠之的方法，這是否上策？抑或我們把他們所有都困在教會內，好好學習英文較為上策呢？」他們異口同聲對我說：「蘇牧師，你們做得好，沒有問題了！」正因如此，他們這次便找我解決有關金都戲院的問題。

由於教會有不少兒童出入，在教會附近設有這類的歌劇院和酒吧，確有問題的，事實上，在我們附近已經批了多個酒牌，遠超本來的城市計劃。我和同工及執事商議後，決定寫了一封信反對金都戲院計劃，工程就因此而擱置下來。但想不到自此之後，麻煩就接踵而來。起初他們採取「軟攻」，與律師一同來找我們傾談，並告訴我們這計劃對整個社區大有好處，他們更願租借給教會使用，舉辦一些大型聚會，大家謀求合作而非敵對，對整個社區都有好處！當我們不為所動，情況便有所改變，我不時都接到一些市議會議員、華埠僑領、及不知名人士的來電，有些勸我收回反對書，以免傷害義大利人和華人的友好關係，有些說話不大客氣，帶有恐嚇成份。更有人問：「牧師，你要多少錢？」有一天，我回到教會，發現教會大門有被人損壞的跡象，當然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與金都事件有何關連，但我已經感到有壓力和威脅，每逢出入教會，我都加倍留意有沒有人跟踪。那時，我其實已經預備於2000年離開三藩市，返回香港事奉，想到留下這個爛攤子給留任的同工，實在有點過意不去。最後，我與執事會商量，決定與他們妥協，希望他們應承每晚營業不超過十時半。

他們答應了，我們便收回反對書。

我本以為這事告一段落，我亦安心離開，與太太返回香港事奉。誰料，一年後返回探兒女時，發覺金都戲院仍是空置，追問之下，原來未幾前Dot Com泡沫爆破，那位老闆因而破了產，再沒有金錢經營金都歌劇院，只有放棄了整個計劃，棲身於金都戲院內的鴿子不用再搬家，直至13年後才建成新的豪宅，而金都戲院亦只在歷史文獻上才找到；但對我來說，每逢再經過金都戲院舊址，仍清楚看到聖靈之手的作為，令我不能不說：「神啊！你係得嘅！」我清楚看到：教會是神在地上所建立的群體，是神的子民、基督的身體、聖靈的團契，在地上帶著使命作光，照亮我們的社區。王怡牧師說得好，世上只有千年的教會，從沒有千年的政權。

所以，從文化而言，我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從國民身份而言，我是美國人；然而從心理和感情言，我是香港人。但這些都是短暫的、可消失的，聖經稱我們為寄居的客旅。最重要的，我是神的子民，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身份。

第三十六章
巴別塔2.0

1983年3月，蘋果創始人Steve Jobs來到紐約，會見百事可樂總裁John Sculley，希望能說服他加盟蘋果電腦、作他們的領航C.E.O。蘋果電腦的開創者，多是年青、經驗淺薄的小伙子，無論是當時的領導Mike Markkula或是Steve Jobs本人，都自覺不能勝任此職。他們以為John Sculley富有經驗，領導這群年青的開創者實在是最理想的，套用矽谷的述語，這是“adult supervision”的典型例子。然而，John Sculley並不感興趣，以為他與Steve Jobs之間最好還是保持「朋友」的關係，以朋友的身份提出他自己的意見，而不是作他們的C.E.O.，Steve Jobs聽後，停了一會兒，然後向John Sculley說：

「難道你甘心一世賣糖水，而不加入我們的陣營，改變這個世界嗎？」

就是Steve Jobs這一句話，打動了John Sculley的心，改變初衷，正式於1983年5月加盟蘋果電腦，而Steve Jobs所說的，一點也沒誇張，觀看這30年的發展，高科技的確改變了我們整個世界。

我是在1980年初葉在Fuller神學院攻讀教牧學博士學位。那時電腦還未普及，所以我是用舊式的「打字機」打我的論文。我收到教授寄回來的批閱，真是「滿江紅」，那教授真有心，提出很多值得修改的地方，於是我又要從頭一章開始再打過那修改了的論文。其實，我只不過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是修改了約10%，其餘90%原封沒有修改過，然而，在「打字機」的時代，我却要從新打過一遍，真是費時失事！

到了80年代後期，君玉在三藩市攻讀心理輔導Ph.D，80年代後期已經不再是「打字機時代」了，而是用電腦Word Star4。她不像我，修改她的論文時，不用重頭用打字機再打一遍，因為Word Star容許她隨意編改，加插內容，可謂不廢吹灰之力便達到目的，這確是一大進步。況且，Word Star有更多功能，並非打字機可以作到的，真是省了許多時間與心機。

到了2013年，我退休後再往香港大學攻讀中國近代史的Ph.D課程，情況就更不同了！我對電腦知識所知無幾，可說是一個文盲，以一個年屆70的老人家，要適應這個轉變實在不易。我記得上Research Ethics一課時，教授給了我們一個功課，是要在網上作的，我花了兩個小時才完成作業，便把作業在網上寄給教授。誰料，我一按Submit時，我所作的一切不翼而飛，既沒有寄出，連我的原稿也隻字不留。我以為自己錯誤地按錯一些東西，只能怪自己如此不小心，於是我再做一遍，我一面做一面自我安慰，這回我有機會把我的作業修改得更好，這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小心翼翼，免得我重蹈覆轍。怎料，我最後按Submit時，情形竟和上一回一樣，真把我氣壞。我致電大學的技術支援部查詢原因，那位職員聽完我申訴後，對我說：「你們教授只容許你們一個小時內完成作業，你兩次都花了兩個小時，較限定時間超出一倍，當然是無效的啦！」我反駁說：「這是沒有理由的，教授明明告訴我們，這作業至少要花兩個小時才能完成，他又怎會限定要一個小時完成呢？」那位職員聽完我的申訴後，笑笑對我說：「你只要copy and paste，其實不消數分鐘，你便完成作業了！」我心中想著：「既然教授是容許人copy and paste，他又何需限定要一個小時內完成作業呢？我真不明白他的邏輯是什麼！」然而，無論如何，我總

算完成了他的課程，而且成績也不錯！

不過，無可否認，在我研究的過程中，電腦真的給我極大的幫助。首先在搜集資料上，透過 Google Scholar，我可以從網上找到許多寶貴資料，論文，報告及學術分析等。由於我是作歷史研究，而我的論文是有關中國內地會傳教士來華的歷史，我為要搜索一手資料，要到中國大陸尋訪一些昔日與中國內地會傳教士有交往的人士，雖然為數不多，而且年紀亦相當大，但我仍可以接觸到他們，我拿著我的 iPhone，既可作導航、又可作錄音之用，更可以拍下一些可貴的資料。下圖是一幅是我在浙江省溫州市所拍攝到的一個墓碑。這個碑是紀念中國內地會宣教士蔡文才 (Josiah A. Jackson) 的妻子 Frances Elizabeth，在溫州染了霍亂病而死亡；時為 1878 年。在文革時期，她的墓碑被紅衛兵拆下來，可幸有些村民沒有把它打碎，因為他們用此碑作洗衣之用，因而得以保存下來，成為歷史珍貴文物。

此外，中國內地會有異於其他宣教機構，他們的總部是設在中國的海上，而非英國的倫敦；而內地會的檔案，宣教士的報告都儲存在上海海關的總部內。但在日本侵華及國共內戰期間，不少這些檔案都被燒毀，以致帶來我們研究中國內地會的研究員很大的阻礙。還幸不少內地會的宣教士都喜歡著述他們的經歷，並刊登在 China Millions 雜誌內，而 China Millions 是定期出版的，因此這便成為研究中國內地會歷史的主要資料來源。中國內地會把這些資料贈送給倫敦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圖書館。因著高科技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發展，其中一些資料都已經數碼化，可以從電腦上看到，而不用飛到倫敦大學的圖書館查閱。而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亦從倫敦大學圖書館購得所有China Millions的縮微膠片(Microfiche)。在未有電腦前，閱讀縮微膠片是一樁極困難的事，但有了電腦後，在電腦螢光幕上一目了然，又可以隨時打印出來，對研究人員來說，電腦的發明真是省了他們很大的麻煩。

其次是談到督導方面。自退休後，我搬回美國居住，而我的督導教授身在香港，但有了電郵等的互聯網設備，我隨時都可以找到教授，地域上的限制不再是一個問題了。當然，我每年都有數次回港，面對面與他討論我論文的進展；正因如此，我可以在3年內便完成了我的Ph.D課程。

不過，最令我感到驚訝的，就是電腦審查論文是否有抄襲的嫌疑(Plagiarism)。當我寫完論文後，最後一關是要通過電腦審查(Plagiarism Checking)。看看我的論文是否有抄襲之嫌。學術研究其中一個主要的元素就是「創新」，而非「抄襲」，所以，香港大學要求每一篇論文都要交給學校當局審查。令我感到驚訝的，這個工具竟然可以把我整篇論文列出有那一部份是抄襲別人的，並列明出處為何。當然，在我的論文中，只有很少數是抄襲，亦已在註釋上說明來源，所以得以順利通過。然而，這經歷令我大開眼界，原來電腦不但是千里眼、順風耳，更是明察秋毫，無所遁形。

事實上，電腦不但改變了我們治學的方式與效率，更是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部份。在1983年1月1日，互聯網(Internet)誕生了，整個世界也在改變，所謂互聯網，是指一個電腦可以和另外的電腦溝通、見面、傾談、分享。從此「地球村」就誕生了！在2005年，名記者Thomas Friedman，寫了一本有啟發性的書，名叫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Friedman目睹這個世界正迅速地改變，如果我們不體會到廿一世紀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我們將會被淘汰。自從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塌，整個蘇聯體系的華沙集團，像骨牌一個一個倒下來；冷戰結束了，世界就只有一個西方式的系統，而昔日阻隔東西方的圍牆也消失了，忽然間整個世界也因此而聯繫起來，正式成為一個地球村。隨著這政治上的突變，到了1995年，英國人Tim Berners-Lee開創了World Wide Web(互聯網)，讓全世界的電腦可以連結在一起。Time Magazine認為這是至大的突破，在5年之內，使用互聯網的人數由600,000增至4,000萬人，每53天便增加多一倍。透過電郵，我們可以很快很方便的互通訊息，更透過網上媒體，我們可以更快速的得到各類的資訊；透過電腦，我們可以作賣買，或作各類的商業、宗教、教育等活動；把我們這個世界帶入一個新紀元。

我是一個電腦盲，但在這個新紀元的社會，不用電腦和手機是無法生存的，無論是交稅、申請表格、購買、與他人聯絡等等，無一不是在網上進行！所以對我們這一輩的人來說，是一大挑戰，稍一不慎便會弄到焦頭爛額。記得一次，我正使用電腦預備我的講章，忽然地電腦停頓下來，螢光幕上出現一個訊息：「你的電腦發生了故障，請致電微軟技術支援部與我們聯絡。」我便依隨訊息給我的電話號碼，致電求援，對方於是問我一連串的問題，主要是有關我的個人資料，我開始有些懷疑，我發覺他竟然知道我的工咭號碼；我連忙追問他是那兒獲取，他支吾以對，我知道我的電腦已經給黑客入侵了，連忙關機。後來我問一些精通電腦的弟兄，他教導我要通知銀行，Credit Union及Credit Card公司，又要更改我電腦的密碼，凍結我Credit Union帳戶等等，真是極度麻煩！

然而，電腦的確給我們極大的幫助。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GPS(導航儀)的使用。昔日沒有GPS的時候，我要往AAA拿那些免費地圖，按著地圖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指示找目的地，對我們視力有問題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大考驗，現在有了GPS既可以看，又可以聽，導航我的去路，我若沒有聽從，行錯了路，它永遠不會罵我、怪責我，還是非常忍耐的導引我走上正路。交稅的時候，我採用Turbo Tax，只把我的資料輸入，它便可以把我的稅額計算準確，省了我很多功夫和時間；有了E.Banking後，我前往銀行的次數也少了，一切都是網上交易，就是遠在香港的銀行賬戶，我也可以在美國遙控一切，極為方便。不過，令我印象至深刻的，倒是在2017年，我要入醫院進行割除前列腺癌的手術，替我開刀的並非我的醫生，而是一個機械人，醫生坐在隔鄰的電腦房，從電腦指示機械人替我割除我的前列腺，手術精細準確，傷口又細，痊愈的時間也短了許多！

電腦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是搜集和分析數據，有了這些大數據，它便能準確的預測將來。記得有一次，我問電腦：「我今天晚餐吃什麼？」它竟然對我說：「豆腐牛肉飯！」這真把我嚇呆了，它竟然洞悉我這個公開秘密。事實上，2015年3月，電腦Alpha Go與世界圍棋冠軍Lee Sedol，在南韓的首爾進行比賽，結果以4比1勝出，在2億觀眾面前證明此創舉。何解？因為電腦擁有對手的過往玩圍棋的數據，並能準確預測他的每一步的棋法。

如此看來，電腦真好像神明一樣：千里眼、順風耳、能知過去與未來。在今日的社會，無論是教育、醫療、政治、經濟、交通、人與人之交往，商業活動、銀行體系等都與電腦息息相關。今天的戰爭，與昔日的戰爭完全是兩回事，什麼星球大戰、導彈、無人機、核能潛艇等等先進武器；越來越像在迪士尼樂園的明日世界樂園的遊戲了！然而，我們不禁問道：這是人類之福祉抑是災禍呢？一方面我看到這些高科技帶給人類的文明，發達和方便；但另一方面，當我看到個個都拿著手機，埋首於自己的世界中；

看到人人走進入在這虛擬世界中，再沒有人與人之溝通、分享；又看到在這個資訊爆炸的世界中，不知那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在社交媒體中，彼此攻擊，分化；更想到戰爭一旦爆發，後果更不堪想像，這是福嗎？更甚者，一些威權統治者，利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的監察系統，操控人民，叫他們沒有自由，更沒有獨立的思想；這是一幅相當恐怖的圖畫！

其實，這種情況，聖經一早已經洞悉，所以我稱現在這個高科技世界為巴別塔2.0，聰明的所羅門王說得好：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9節）

巴別塔的故事載於創世記十一章。創世記十一章是第十章的延續。所以，我們在研讀創世記十一章前，先看看其背景，這也是創世記第十章所講的故事了！創世記第十章提到寧錄這個人，他是含的後裔，也是被神咒詛為奴僕的一族。（創世記九章25節），然而，創世記十章8-9節却這樣形容他：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對寧錄之「褒」而非「貶」；但這只是翻譯上的問題，導致我們的誤解。在七十士譯本中，希臘文是gigas這個字，是解作「強佔」「統治」「霸權」。我相信這個翻譯是準確的，因為希伯來文「寧錄」一名其意是反叛者（rebellion, the valiant），所以聖經稱寧錄是一個反叛、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充滿暴力的霸權者。而第9節稱他為「英勇的獵戶」，「獵戶」一字希伯來文解作「征服者」(參看Jacques Ellul的The Meaning of the City, p.12)，而英勇即涵有權力和暴力之義。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寧錄，雖然被詛咒為奴僕，一個沒有權力的弱者，但他却要掙脫這詛咒；他不願臣服於神的主權，更不想當奴隸、受束縛，所以寧錄是象徵「反叛」「暴力」「強權」的標記。

他要征服些什麼呢？我們看看創世記十章10-12節：

「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如果我們看看這些名字，我們便可以看到這是一段非常精采的描繪：

- 巴別-神的門
- 以力-永恆(Time)
- 亞甲-寬濶，空間(Space)
- 甲尼-權力(Power)

他要征服時間，空間，他崇尚權勢，儼如是神明一樣，我們再看11節：

尼尼微 外來的，陌生的。

利河伯 寬濶之地和街。

迦拉 精壯，權能，強勢。

利鮮 馬韁，即勒著馬，控制牠，而馬是第一個被人類所操控的動物，從馬到原子能、電子、電腦，都為人所控制、征服。

從上述的描繪來看，我們看到今日的科技世界，其實是寧錄的翻版，我們要征服時間，空間，一切自然力量！然而，寧錄忘記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實：

- 所有這些城市都是位於「示拿」，「示拿」一字，希伯來文是含有「震動」「攪擾」「戰爭」「不安」「沒有和平」的意思。聖經給我們一個強烈的信息：人以為可以憑他們的智慧，掙脫奴隸的枷鎖，征服時間空間，帶來和平，但最終還是在「示拿」之地，處在一個亂世之中。
- 寧錄也忘記了一件鐵一般的事實，他所作的一切，都逃不過神的眼，正如v.9說：「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

如果我們說創世記是描述一個霸權獨裁者的征服故事，那麼創世記第十一章的巴別塔故事是描述人類一體化向神的挑戰，故事是這樣的：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功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讀這段經文，不少人都提出一個問題：這看來好像是古代的神話故事，究竟是真還是假？是歷史還是神話故事？我總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我們企圖用21世紀的人之眼光去分析幾千年前的作品，這既不公平，也沒有多大意義。事實上，聖經的主旨並非陳述人類的歷史，它主要的目的是陳述神救贖的計劃。所以我是從神學的角度去理解這段聖經，而非從歷史角度去理解這段聖經；其實，我們只需看看這段聖經的文體便清楚知道作者究竟是帶給我們一個什麼信息。鄭炳釗博士對這段聖經的結構有非常精細的分析（參看明道研經叢書1A《創世記》卷上p.382）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

(1) 分段 (v. 代表經節的號數)

- v.1 天下人口音一樣(A)
- v.2 往東遷移，住在一塊平原(B)
- v.3-4 計劃建城和塔(C)
- v.5 神降臨視察(D)
- v.6-7 計劃阻止建城和塔(C1)
- v.8 人分散在全地(B1)
- v.9 天下人的言語(A1)

從上述的排列看，我們至少可以找到以下特點：

- 非常工整的排列(A, B, C, D, C1, B1, A1,)
- 前部是談到人的作為，後部是談到神的作為
- 前部的中心是「治」，後部的中心是「亂」
- 神降臨視察是整段的中心，也是關鍵性的逆轉

從文體而言，這明顯是典型的希伯來詩歌體裁。

(2) 用字

- a. 天下人的言語(v.1)
- b. 那裏(v.2)
- c. 彼此(v.3a)
- d. 我們作磚瓦(v.3b)(希伯來文是lbn)
- e. 建造(v.4a)
- f. 「城和塔」(v.4b)
- g.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v.5a)
- f1. 「城和塔」(v.5b)
- e1. 建造(v.6)
- d1. 我們要變亂(v.7a，(希伯來文是nbl)
- c1. 彼此(v.7b)
- b1. 那裏(v.8)
- a1. 天下人的言語(v.9)

從上述的排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段經文之特點：

1. 有許多字彙是重覆的使用
2. 有強列的對比
3.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位在中央，而且這句的用字在整段中是唯一沒有重覆使用的。

很明顯，這是一個典型的希伯來詩的體裁，而不是敘述的體裁。換言之，作者無意敘述人類歷史的過程，而是看重人企圖與神角力。昔日，他們的科技是磚與灰泥，去建造城與塔，目的是塔頂通天，為要傳揚他們的名。如今我們企圖用高科技、機械人、電腦、大數據、太空站等去征服宇宙，大自然，甚至神自己，這巴別塔2.0較巴別塔1.0更高，更強、更快、更大。

同樣的，地球一體化又重現在今天的世界，一樣的言語 (google translate)，同樣是科技，不用什麼專家，我們也看出這正是巴別塔2.0。

然而，人的計劃徹底失敗，因為神阻止他們的計劃，變亂他們的口音，以致不能溝通。如此，這城與塔的計劃就告吹了！因為他們都是在「示拿」之地，「示拿」就是亂的意思。弔詭的地方是：他們稱這塔為「巴別」，「巴別」就是「天的門」「神的門」的意思，他們以為自己就是神，但v.9告訴我們，「巴別」不再是「神的門」，而是「混亂」「愚昧」。

Steve Jobs在2005 Stanford University畢業禮中講了一篇非常精采的演講，名為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飢，虛心若愚)。在演講時，他提到一年前，醫生發現他患上胰臟癌，以為他只可以有3至6個月的壽命，並勸他預備身後事。後來，醫生經過切片檢查，發覺原來那是一種罕見癌病，而且又能得醫治的。所以，當他演講的時候，以為自己經過手術後已經復原，並希望可以活多數十年，於是他豪言地對Stanford畢業生說：「沒有人想死，就是那些很想上天堂的人也不想死。然而，人不免有一死，沒有人可以逃避，既是如此，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看死亡。事實上，死亡是人一生中最美的事，唯有經過死亡，舊的才過去，新的才會來臨。我們的一生既短暫，亦有限，不要浪費你們的青春，也不要只活在他人對你們的期望；聆聽你心裏的聲音和指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想不到2011年時他的癌病復發，到了10月5日便離世，死時只有57歲。無論他有多少才華，有多少財富，有多少功名，面對死亡時，他最後的遺言，只是Oh Wow! Oh Wow! Oh Wow! 然而，聖經卻這樣宣稱：「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哥林多前書十五章55, 57節)

第三十七章

1997
夜幕低垂
的
大英帝國

1997年7月1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徐徐升起，中國政府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但意味著經歷百年滄桑的香港回歸祖國，同時也為那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對香港的管治畫上句號。

自從18世紀以來，英國積極擴張其帝國領土，伸延至非洲、亞洲、歐洲和美洲各地，其屬土竟佔了世界25%之土地。在1913年全盛時期，帝國的人口達412,000,000人，佔世界人口1/4，面積達13,700,000平方英里，堪稱為永不日落之大帝國，因為無論在那一個時刻，總有大英帝國某一地方看到天上的太陽。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和蘇聯崛起，並處於冷戰狀態，大英帝國的實力亦隨而削弱，再沒有足夠的財力、資源和兵力統治這個大帝國。印度在甘地的帶領下，成功脫離大英帝國版圖，獨立為一個民主國家，時為1947年。1948年，英國亦離開巴勒斯坦，以色列經過2,000多年的流徙而回歸故土，成立以色列國。到了1960年代，更多的殖民地紛紛脫離英國的統治，成為獨立國家，這包括在亞洲的馬來亞、星加坡、緬甸；非洲的蘇丹(1956)、迦拿(1957)、尼日利亞(1960)、索馬尼亞(1960)、肯瓦(1963)、桑比亞(1964)等，而香港是最後一個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的版圖。(Bermuda在1995年公投結果，以73.6%表示願意仍歸英國管治，而直布羅陀於2002年的公投結果是98.48%歸屬英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福克蘭群島則於2013年以99.8%表示仍歸英國管治。)

有趣的是，不少殖民地或屬土，當脫離大英帝國的管治時，都發生了內亂、戰爭和騷亂，像香港於1997年能順利轉移主權的，可說是非常罕見。印度獨立後隨即與巴基斯坦衝突，而巴基斯坦獨立亦發生東巴基斯坦之爭和內戰，最後Bangladesh在東巴基斯坦獨立；以色列獨立亦引來以巴衝突及與鄰近亞拉伯國家之戰爭，尼日利亞亦有內戰。其次，不少這些國家獨立時，都經過人民公投，由人民表示他們的意願，唯有香港的移交，並沒有任何公投，也沒有聽從任何香港居民的意見，只有中英兩國會議，任何香港人都被拒於談判桌外。

我一直以來都存著一個疑問：作為民主國家典範的英國，為什麼在她治理140年香港的歷史中，從沒有推行任何民主政制？總督是由英國委派的，主要官員，如財政司、布政司、律政司都是由港督任命，立法局和行政局有官守議員，亦有非官守議員，但非官守議員都是政府指定的，唯一有民選議員的，只有市政局，負責一些非政制上的事務。直至1985年，立法局才開始有選舉，選出立法局議員，但在57名立法局議員中，24位是選舉出來的，其中10位是直選，功能組別有12位，來自市政局1位，來自區域市政局也是一位。到了1993年，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主席，到1995年，則60位議員全部都是選舉出來的，一半是直選，一半是功能組別選出。

有趣的地方，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香港與星加坡，雖然二者有極多相似的地方，兩者都是Crown Colony，又是華人為主的社會，但明顯的，英政府對星加坡的管治有異於香港。早在大戰結束之後的1948年，英國已容許星加坡選舉立法會議員，雖然數目只有6個，佔整個立法會的10%；其餘都是政府委任的。然而，英國政府是有意讓星加坡自立。所以於1953年，英國再提出政制改革，立法局由32名議員組成，其中25是由普選產生的，

1955年在立法會的選舉中，左傾的Labour Front獲得大多數議席，但到了1959年的選舉中，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大獲全勝，並帶領星加坡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同是殖民地，英國竟有不同的政策呢？從今日解封的文獻來看，原來阻撓香港走上民主道路的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英國！何解？我們就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說起。1945年8月，蔣介石強力表明，日軍當將香港歸還給中國。事實上，自從日軍投降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已經積極預備收回香港，到了1949年底，在港的資產淨值約2.43億港元。而中共亦看重香港作為其基地，它需要利用香港這個特殊地位，建立廣泛的愛國統一陣線，而且亦可以作為一個避風港。1946年，投共的李濟深逃往香港，組織反對蔣介石事宜。我父親曾陪同其上司伍觀淇將軍到香港，與李濟深見面，而伍觀淇在此行中，受李濟深影響加入了共產黨。由此可見當時的香港確是非常複雜，及至其後中共取得政權，隨即發生韓戰，中國被禁運，要倚靠香港偷運軍火入中國，於是便成為中、美、英、角力的地方。

大戰結束後，英國迅速的接管香港，並委派中國通的葛亮洪擔任總督。他自己是看好中國共產黨的，他與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商討，並且訂下協議。於中國執政後，中共不會使用武力奪回香港，也不會鼓勵香港回歸大陸（參看陸恭蕙著《地下陣線》p.91），不過，他們強力警告英國：莫把香港推上民主道路，以防香港走上獨立自主的路線。

在1958年，英國殖民地大臣Kenneth Cantlie曾經寫過以下的報告，述及他與總理周恩來見面的談話內容：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有關香港事宜，周恩來想向首相麥美倫 (Harold Mac Millan) 說明，中國得知港府有些人士，擬計劃香港追隨星加坡，走上自主路線。中國視此舉為對中國極不友善的動作，中國期望香港仍然維持殖民地的地位，不宜有任何改變。」

(a) Extract from a note by Lieutenant Colonel Cantile on his interview with Chou En-lai in Peking on 30 January 1958:

"With regard to Hong Kong there was an important point he (Chou En-lai) wished to put forward personally to Mr MacMillan, or at least to his deputy. A plot, or conspiracy, was being hatched to make Hong Kong a self-governing Dominion like Singapore. This had the approval of several members of the British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He wished Mr MacMillan to know that China would regard any move towards Dominion status as a very unfriendly act. China wished the present colonial status of Hong Kong to continue with no change whatever.

到了1960年，中國高官廖承志向香港工會代表講明，若英國容許香港自主，中國絕不會手軟，武力進佔香港。維持香港現狀，這是中國的期望，也是對中國至有利的，透過香港，中國可以從事國際貿易。

and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visiting Peking (the statement was made with reference to a point raised about "self-government"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s proposed by the Americans):-

"American imperialism is our dreadful enemy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British do not like this proposal. If the work in educating and bringing compatriot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to unity were properly done, the American imperialists would never succeed. Should the proposal come from the British it would be a different matter. We shall not hesitate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to have Hong Kong,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liberated as, up to this very moment, we have never recognised Hong Kong, Kowloon and New Territories as British territory. However, the present status of Hong Kong is to our benefit. Through Hong Kong we can trade and contact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obtain materials we badly need. For this reason we have hitherto made no demand fo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You are patriots. On return to Hong Kong you should do what you ought to do. We want to get back Hong Kong in a good state and not in a state of ruin."

(/a)

但到了1980年後，英國知道中國收回香港是鐵一般的事實，英國亦開始思想到香港人的前途，在某一程度上，英國對那些受英國統治了超過100年的香港人亦有道義上的責任，所以我們看到港府在政制上開始有所改革，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正是最好的明證，而他這政改卻引起中國強烈的批評的反應，更稱他為「千古罪人」。

彭定康(Chris Patten)是香港末代港督。香港自1843年開始，一直至1997年，總共有28位港督，他是唯一的一個並非外交官，而是一位政治家。1990-1992年曾任英國保守黨主席，1992-1997年任香港總督，專門負責為香港回歸中國之準備。在他離任港督後負責處理北愛的和平進程，終於達成 Good Friday Agreement，功不可沒。

要明白彭定康的政改，我們首先要明白他所處的背景：

- 中英會談在1984年9月完成，並且發表了《聯合聲明》。此聲明表明於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歸回中國，但中國答應香港現有的制度，無論是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法律方面、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保持50年不變。
- 1990年4月，基本法委員會完成制定基本法，並獲人大通過，正式成為1997年7月1日後的香港憲法，代替了從前的Letters Patent及Royal Instructions。基本法肯定一國兩制，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一直至2047，香港擁有高度自治，但外交、軍事則由中國主理。
- 彭定康看到，英國在離開香港前，一定要加速香港的民主化，這是保持香港人民的自由，穩定和繁榮的最佳方法。然而，他一切改革都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不可能有任何違憲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修訂。我個人以為彭定康的確不愧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能精細的找出一條既合法，又能達到他目的改革方案。

彭定康於1992年10月，上任3個月後發表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要改革未來立法局選舉制度，將行政及立法「兩局分家」，以加速香港的民主步伐，這包括：

- 降抵投票年齡。由於中國、英國等都將投票年齡確定為18歲，香港也應該將選民的年齡由原來的21歲降低至18歲，如此便大大增加可以投票的人數。
- 新增功能組別選舉方式，由現時的21席增加至30席，新增的9席有：漁農礦產、能源及建造界、紡織及製衣界、製造界、進出口界、批發及零售界、酒店及飲食界、運輸及通訊界、金融、地產、保險及商業服務界，及公共、社會及個人服務界。新增的9席以個人投票取代團體投票，如此將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全港270萬工作人口中符合資格的選民。
- 強化區議會。除了新界區議會的當然議員外，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所有區議會都由直選產生。此外，又擴大區議會的職責，功能和財政預算，使其在處理區內的民生問題上更具影響力。
- 在地區直選上，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每選民一票，在一個選區內選出一名代表。
- 成立選舉委員會，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委員會的大部份委員都是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議員出任。換言之，立法會有60議席，

包括地區直選20席，功能組別30席(包括新9組)，
以及選舉委員會10席。

無可否認，彭定康的政改只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增加「民主的成份」，是絕對合法的，更是奏效的，這新9組都是一人一票產生，選民人數高達106萬，這可說是變相直選。雖然中共大罵彭定康，並施壓阻止立法會議員通過彭定康政改方案，但結果仍獲得通過。在1995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民主派佔31席，建制派佔29席。

中共的反應非常激烈，魯平更斥他是「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並宣佈「直通車」(即原來中英雙方協議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可全數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不再有效，並決定成立臨時立法會作為第一屆立法會成立前的代替。由於港英政府不承認這個臨立會，他們只能在深圳開會，直至1997年7月1日後臨時立法會需在凌晨立即開會通過多條「必不可少」的法例，當時被稱為「還原惡法。」

彭定康這次政改風波，正好反映出「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對西方式的法治精神來說，法律是清楚訂明規條，而法庭是一個釋法的機構，也擁有釋法的權柄，若沒有違背法律的條文，即視為合法了！彭定康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修改過的，所以並沒有違憲。但中國對法律的看法很不同，他們是從「動機」去釋法。他們以為彭定康的動機，是攪香港的自治，這對中國來說是大忌，因此便猛然抨擊。中國如此理解法治，什麼「香港加油」「遍地開花」「時代革命」「反對一黨專政」「投票時投白票」都可以被控違反了《國安法》，因為他們以為喊叫這些口號的動機就是分裂國家了！這樣看來，法律只不過是統治者的工具吧了！

總括來說，中共一向是反對香港走上民主政制的路，他們批評英國在

過去140年從沒有給與香港人任何民主，這是沒有錯的；不過，歷史豈不是告訴我們，幕後極力反對香港民主化的，豈不是中共自己嗎？正因如此，我們這一輩在香港長大的，都體驗到沒有民主的自由之香港特色了！事實上，1997年後，香港仍享有昔日的自由有20年之久，這似乎是超乎我的想像了！神讓我與君玉有機會在這個關鍵時期回歸香港，實在是極大的恩典，這有待下回分解了！



第三十八章
最是橙黃
橘綠時

賴恩融 (Leslie Lyall) 是中國內地會來華的英國傳教士，他於 1929 年來中國，在山西與楊紹唐牧師作傳教事工。在抗戰期間，他起初仍留在山西，在日治的地區作牧養工夫，後來轉而去到貴州大後方，在貴陽的大學做學生工作。1945 年抗戰勝利後，大部份的傳教士都持著樂觀和興奮的心情，預備戰後重建，並且大幹一番事業，他們相信蔣介石很快便會消滅共產黨，建立一個穩定的江山。但賴恩融卻有不同的看法，從他在抗戰期間所看到的國民黨軍政，認為蔣介石沒有能力重建這個潰爛不堪的國家；共產黨將會統治中國，屆時，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將再沒有機會在中國事奉。他體會到，抗戰後這幾年將是關鍵性的時期，他要好好預備中國教會，面對這將要來臨的挑戰。為此，他返回北京，專心在北京的頂尖大學作門徒訓練和福音工作。他和王明道合作，建立了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團契；這團契有幾個特色：

- 這團契全由基督徒學生自己領導，他和王明道只是從旁協助，主要是負起教導的工作。
- 這團契的組織簡單，也不隸屬當時全國性的基督徒學生團契。
- 他們主張及鼓勵學生大學畢業後，散派到全國各地，特別是邊疆之地作福音工作，其中《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作者邊雲波便是其中的一位。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在內戰期間，有不少學生從東北逃難至北京，他們就發起捐募運動，儘量照顧那些流離顛沛的學生。
- 賴恩融更與學生們研讀《彼得前書》及《彼得後書》，預備他們將來受苦的心志。

賴恩融的眼光獨到，他的預言真的應驗。從歷史的角度看，他的策略也非常成功，據專門研究中國家庭教會的王怡牧師所說，80年後中國家庭教會之所以能夠迅速增長，與北京基督徒團契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眼光」是非常重要的，中國人有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是真的。我們要洞悉我們是處在一個什麼時代，這世代的標記又是什麼。不過，我們的焦點，倒不是從社會學、政治學或經濟學的角度去看，而是從神學的角度去理解我們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世代。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54-56節講了一番非常精采的話：「耶穌又對眾人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

耶穌指斥那些猶太人，他們看到從西面(地中海)來的雲彩，就知道快要下雨了，看到從南面沙漠來的熱風，就知道天氣將會又乾又熱。他們曉得看天色，卻不曉得分辨他們所處是一個什麼時候。

聰明的所羅門王也說：「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各樣事務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傳道書八章5-6節)。所謂「時候和定理」是指 time and procedure。

到了2000年，我已屆50有5，而子女亦已成長，兒子已成家立室，有他的家庭，女兒也大學畢業，預備投考醫學院，君玉亦學有所成，也積聚了

不少臨床輔導經驗，更考獲了加州執業牌照，而我在三藩市播道會亦事奉了15年，發展至500-600會眾；我們夫婦二人都覺得：這應該是時候尋找新的挑戰，新的事奉了！再看看香港的情況；1997回歸祖國已經是事實了。有關香港的前途，大概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 一是悲觀的看法-中國與英國所簽訂的「一國兩制」模式，全是權宜之制，中國絕不會容讓香港走上民主道路，也不會容讓香港享有從前殖民地時代給予的自由、法治精神和人權的保障。昔日的西藏，將是今日的香港，所謂50年不變，是騙人的假局，或許起初中國還未有能力完全推翻香港的舊制，但這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 一是樂觀的看法-不少香港人以為中國與英國所簽訂的《聯合聲明》和實行的一國兩制模式，是創新、務實和雙贏，並可行的模式，香港始終都會有一人一票的普選，選出特首和立法會議員，香港人亦享有高度的自治，他們更以為中國漸漸和西方世界接軌，成為地球村的一份子，甚至走上民主的路線。

無論香港的前景如何，我們總覺得這是一個黃金機會，不容錯過。按我的家庭背景及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我是傾向消極的看法。雖然從表面來看，1997後的20年香港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馬照跑、舞照跳，而且好像越來越安定繁榮，但從種種的跡象看，2019年香港的巨變一點都非偶然，這一點我會稍後解釋。不過，我們決定回港，主要倒不是這個原因，而是神的話和聖靈的導引。在上文曾提及耶穌斥責猶太人，他們曉天色，卻不曉得分辨他們所處是一個什麼時候，在路加十二章前一段便有這樣的記載：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嗎？我有當受的洗，是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從今以後，一眾五個人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路加十二章49-53節)

這是一段非常奇怪的經文，它講及三樣東西：

- 我來是要把火降在地上。
-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
- 人會彼此相爭，尤其在家庭中，父與子、母與女、婆與媳，都是彼此相爭。
- 表明看來，3件事沒有多大關連，而且又似乎與下段講及「分辨這個時候」沒有任何關係，但仔細再看，我們發覺這3件事都是與時間及審判有著極大的關連。

首先，我們看看時間方面。「把火降在地上」這事，很明顯這並未發生的，是屬將來的事，所以耶穌說：「假如已經燒起來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嗎？」；其次是「受洗」，同樣的，也是屬將來發生的事，但卻與「把火降在地上」一事不同，因為「受洗」一事雖是將來，但不會是很遠的事，所以耶穌說：「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受，在這事完成之前，我還是多麼地焦急的」。最後，論及「相爭」的事，卻是現在所發生的，雖然經文仍是用將來式(esoi tai = future tense)，但卻是指立即就要發生的事。

究竟這3件事是什麼意思呢？先談談v.49「把火丟在地上」的意思。「火」是象徵神的審判，在猶太人的觀念中彌賽亞來的目的，就是審判世人，如瑪拉基書四章1節說：「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

火爐，凡狂傲的和行惡的必如碎稽，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至於「受洗」一事，這當然不是指我們所說的「洗禮」，因為那時耶穌已經是受了施洗約翰的洗禮(路加三章21節)，但怎會說：「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受」呢？如果我們看看馬可福音十章38節，便知道耶穌是指祂的死和復活，因為水禮是象徵了耶穌的死與復活，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世人的罪受了審判，完成救恩。所以，這事距離耶穌在此所說的是非常近，是屬不久之將來。那麼，現在又是什麼時候呢？這應該是指耶穌第一次來作救贖工夫，與第2次來作審判之間的時候，即神學家所說already-but-not-yet的時代，也稱為「末世的時代」。這末世時代之特徵就是紛爭。「紛爭」這個字，希臘文是diemerizo，可作「分裂」「撕裂」「分割」「分開」，是一個語氣相當重的字，簡言之，莫以為耶穌來了，天下就太平，一切都會順利、平安，非也！耶穌來了，黑暗仍是掌權，地上仍有不公不義之事，也充滿紛爭、戰爭、失散。然而，我們在基督裏仍有平安，正如耶穌說：「你們在世上有苦難，但在我裏面有平安」，是內心的平安，而非世上的太平：不但如是，現今仍是「拯救」的日子，若我們決定信主，將會得著救恩，但一旦基督再來，審判世人，這拯救的日子就過去了！正因如此，耶穌在路加十二章57-59節給我們的忠告是：

「你們又為何不自己判斷什麼是合理的呢？你因告你的冤家去見官，還在路上，要盡力跟他和解，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法官把你交給法警，法警把你下在監裏。我告訴你，就是最後一小文錢還沒有還清，你也絕不能從那裏出來。」

耶穌用這個訴訟的例子，勸我們還在路上，也即是在這個還是拯救的日子，儘快和神和好，相信耶穌。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使命就是趁著還有機會，勸人越快與神和好，免去將來的審判！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這末世觀正是新約使徒的信仰核心，也是他們之所以有如此強勁生命力的秘訣。我們的問題在那裏？我們以為天天都有明天，不曉得我們總有一天是沒有明天的。假如我們有這末世觀 (eschatological living perspective) 看人生，知道總有大限的一日，我們就曉得求神「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九十章12節)

在另一方面，中國在廿一世紀的崛起，也是引發我回歸香港另一個因素。1989年和1990年間，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往來邊界重開，東歐的共產國家像骨牌般一個一個倒下來。1991年，老大哥蘇聯解體，不少地區脫離這個紅色系統，紛紛獨立，成為共同體的國家，鐵幕突然間消失了，冷戰也結束，是來得這麼快和這麼突然！而中國呢？1989年天安門事件，不少西方國家估計中國遲早都會步蘇聯後塵，只要把中國引進西方為主導的新世界秩序，世界就太平了。正因如此，中國便於2001年12月成功加入了世貿組織(WTO)。據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有關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言論，他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其實不但是奧巴馬，在他之前的克林頓和布殊都是走這條路線的，對華的政策是開放、友善和夥伴性的。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不少美國商人都在中國設廠，利用那兒人工低、環保法律較鬆等有利因素，進行大量貿易，以致中國取得「世界工廠」的美譽，單在2018年，中國製造品佔了整個世界出產的30%，價值達US\$4 trillion。以下是一些中國製造的製品：

- 全世界80%的冷氣機是中國製造。
- 全世界70%的手機是中國製造。
- 全世界60%的鞋是中國製造。
- 大部份我們所服用的藥物都是來自中國，其中包括抗生素(80%)，hydrocortisone(91%)，ibuprofen(95%)，盤尼西林(40%)

在同一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4,190億美元，難怪在21世紀的頭20年，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而其G.D.P.是13.37 trillion，比美國少\$7.21trillion.

中國的崛起與香港的前途又有何關係呢？我初回到香港時，發覺香港不但沒有大的轉變，而且我發覺較1997年之前的香港更是繁榮和開放，而駐港的外國商會則更多更大，就以美國商會為例，是美國本土以外最大商會之一。我想這是必然的現象，當中國還是在崛起之初，香港對中國來說，無論是金融、經濟、資訊及法援方面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自然中國對香港就採取更開放和寬容的態度。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眼中，香港是中國不可缺的窗戶，但當中國開始崛起，經濟起飛，上海及深圳的地位冒升，中國還是會如此厚待香港嗎？我心裏存疑著很多疑問。但香港將來會怎樣？我無法預料，但我可以肯定的：這是香港一個黃金時期，套用蘇東坡的話：「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當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岳母的需要。自從岳父在2000年1月去世後，她獨自兒住在老人院，非常孤寂，我們都希望在她晚年之際，可以有一個整全的家，有適當的照顧，享享晚年之福，所以我們便決定回港與她同住。

「分離」真是一件非常令人傷感之事，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在三藩市播道會歡送我的聚會中，家恩團契的弟兄姊妹特別為我和太太高歌一首EFC So Sir，當眾人聽聞此歌不禁大笑，但我卻眼淚汪汪，依依難捨，尤其他們唱到最後一段：「與你說再見時，對你唱隻歌，捨不得So Sir，但願神同在，萬望阿So Sir久不久記住我，他朝相見再「嘜」過。」

在三藩市播道會事奉了15年，留下不少美好的回憶；不但如此，在這15年中，我從弟兄姊妹身上學習怎樣作一個有人情味的人，更體會我其實也是一個有缺陷，有軟弱的牧者，但藉神的憐憫，我開始學習作一個「負傷的治療者。」教會在我離開之前，決定把教會一分為三，一是在日落區成立以英語為主的Hop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在同一堂址，又成立另一間獨立的，但卻是以中文為主的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而在唐人埠中仍有中英並重的三藩市播道會。神為我們預備了一間在日落區的西人的教會，以非常的便宜價錢租給我們使用，地方寬廣，地點又好，真是神的恩典。

不過，要離開兒女，真不是簡單，兒子已成家立室，有自己的工作與家庭；但女兒凱欣卻剛大學畢業，獨自兒留在U.C. Davis, 替教授作研究助理，並預備投考醫學院。那一年，為了投考醫學院，很多時她要自己一個人，前往美國不同的醫學院面試；遠至夏威夷、芝加哥、費城、紐約，近至加州羅省，一個女孩子，獨自兒到處應考，又不知前面的道路如何。想到這裏，內心有一陣陣的傷痛，大有愛莫能助之感，只有在禱告中記念。在我們離開三藩市前一晚，她駕車從Davis來三藩市道別我們，彼此擁抱，淚流滿面，依依不捨的說：「再見，珍重」。但回想這15年來，眼見兒女們成長，如今已大學畢業，總算是完成一個階段，繼續我們人生旅程，這正是：

「馬首向何處，夕陽千萬峰。」

死
蔭
的
幽
谷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23篇4-6節)

如果說911震撼了整個世界，對我來說，913更令我感到震撼。在2001年9月11日，四架飛機在美國上空被騎劫，兩架撞向紐約的世貿大樓，一架撞向華盛頓的五角大廈，另一架在賓夕維利亞州墮毀。它們全部都被亞蓋達恐怖份子騎劫，釀成舉世震驚的恐怖慘劇，死去3,000多人。而2001年9月13日，醫生告訴我們，君玉在她的胸口有一個12 x 8 x 6cm大的腫瘤，是惡性的，起初以為是肺癌，後來證實是淋巴癌。自那一晚開始，我們的世界就不再一樣了！

我們是於2000年10月回港，經過一年多的適應，大抵都習慣了。我在窩福事奉；而君玉亦開始自己執業，作家庭及心理輔導。不料到了2001年中，君玉發覺胃不舒服，於是便進入醫院檢查，但發現一切都正常，醫生以為君玉受壓以致胃感不舒服，但君玉卻不以為然，總覺得身體是出了毛病。到了9月，一天她游泳時發覺氣喘；這是一個罕見的現象，平常她游泳總不會喘氣，何解這回游不到100碼就氣喘了？翌日，她自己到好友羅醫生處檢查，超聲波發現她的心包積水，羅醫生提議要入院詳細檢查。那晚，他拿著X光肺片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來到病房，面色凝重，然後對我們說：「X光片照到一個很大的影，位置在心與肺之間，所以導致心包積水和氣喘，希望這不是肺癌，但我們要活組織檢查(biopsy)後才能證實。」我們呆了一陣，極震驚，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經過活組織檢查(biopsy)，證明這並非肺癌，而是一種有可能得到治療的癌---淋巴腫瘤。羅醫生便轉介君玉到香港大學血科教授梁憲孫醫治。

淋巴癌(lymphoma)是什麼疾病？我們身體是有淋巴細胞(lymphocytes)，是我們體內「免疫系統」(immune systems)的重要組成部份，其中有B,T和NK細胞，各司其職，保護生命，免受外來感染襲擊。

血液中的白血球有10-30%是淋巴細胞，淋巴系統中的淋巴腺、脾臟、扁桃腺和胸腺等器官組織亦充滿大量的淋巴細胞。身體任何器官有感染或發炎現象，淋巴細胞亦會大量出現，進行一場保衛戰。正常淋巴細胞執行任務時大量繁殖，B細胞分化(differentiate)成漿細胞(plasma cells)，製造和分泌不同「抗體」(antibody)，對付外敵。

淋巴細胞繁殖，細胞核內「基因物質」需要複製再複製，但如果過程中稍有差錯，形成「基因變異」，可引發淋巴細胞產生癌變，形成淋巴癌這個病。淋巴癌有很多種，但大概可分為Hodgkin和non-Hodgkin兩大類，中國人則多屬non-Hodgkin淋巴癌。而non-Hodgkin又分為慢性和急性兩種，急性的繁殖速度非常快速，但卻較容易醫治，化療加電療是一個比較奏效的治療方法。君玉正是患上這急性non-Hodgkin淋巴癌；當我們聽到醫生說，這癌病的治癒率頗高，我們真的為此而感謝神。(參看梁憲孫教授所著的《醫言有理》一書p.116,146)但治療的過程相當痛楚和艱辛，使用多種不同的化療藥物，注射入靜脈中，引起身體極大的反應和不適。然而，在走過死蔭幽谷期間，卻又得到極大的安慰和祝福。君玉在此期間，寫了幾篇文章，講述病中點滴，以下三篇是她在病中所寫的一些經歷和感受。

病中點滴(一) ”癌病?我?”

2001年9月13日是難忘的日子。醫生發現我的肺片上有一個12x8x6cm的腫塊，經過一連串的檢查，證實是淋巴瘤，生在胸骨與心臟之間。癌病?我?怎麼會的?我不是一向生活有紀律，不煙、不酒、按時運動、飲食均衡、又懂得鬆弛、生活工作對我來說也沒有構成多大的壓力。為什麼是我患上癌症?以後的日子，我活在情緒起伏中，有時覺得在夢幻中，一點也不真實；有時又像夢醒，是真的；想到前面的日子，我很害怕。我會戰勝癌病嗎?假如藥物無效...假如化療的副作用令我擔當不起，怎辦?「噢，主啊!求你幫助我認定你是那位愛我的主，是看顧我，賜我力量的主!」

弟兄姊妹送來的慰問咭、花、水果、電子郵件、電話、小禮物、煲來的湯水、答應不間斷的為我禱告，使我得到無限的安慰和鼓勵，我開始學習不為明天憂慮，只活在今天，只走一步。猶記得1997年夏天，我與一班朋友步行至大峽谷的谷底，兩天後再步行上來。大峽谷的山勢險要，但風景美極絕倫。我走下去的時候，不小心傷了左大腿，兩天內都不好，要走上來的前一晚，我望著筆直的山，憂慮得哭起來，以我當時的境況，那來有力量走到谷頂?

但那位創天造地的主，卻幫助我完成壯舉，秘訣就是：只走一步(one step at a time)。我不求怎樣上到谷頂，只求神每步助我踏過。每過一步，便存感恩的心。今天的境況，就如那時一樣，我要學習只活在今天，每次只走一步!

病中點滴(二)只有祝福

我第一次入院做化療的時候，隔鄰的病友是位從中國北方來香港的女士，她患的是血癌，住了院三個星期，每晚都發燒發冷，白血球和紅血球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都每況愈下，常活在恐懼中。我跟她談人生，談信仰，告訴她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知道離開世界時我們往那兒去。她願意接受主，我們又為她的康復禱告。一星期後，我返回醫院做第二次化療，她知道我來了，特地出來告訴我：她三天都沒有發燒，白血球和紅血球上升到正常；她很感激我介紹主耶穌給她，使她有了人生的盼望，她又每天祈禱，又為我禱告。我欣賞神向她所施的慈愛，我欣賞神在我病中仍給我傳福音的機會，使我能成為別人的祝福。

病中點滴(三)

我第二次入院做化療的時候，今次隔鄰病友是一個19歲的女孩子，她看來十分軟弱，整天發燒發冷、咳嗽，一點東西也嚥不下，她患的是急性血癌。原來她不是本地人，是中國潮州來的。3歲死了父親，去年母親也死於癌症，死時只有47歲。母親死後，她不斷哭，不久發現自己也患上急性血癌。在大陸如果沒有錢，醫院不會醫你，也不會給你葯物，可憐的她只有回家等死。她在香港70多歲的義父見狀，申請她來香港醫治，因她不是香港人，住院的費用是每天3,000多元(香港人是88元)，她天天恐懼醫院會趕她走，真是貧病交逼。除義父外，舉目無親，幸好有一些基督徒常常來探她，煮東西給她吃。

我們知道她的情況後，馬上聯絡律師、立法局議員，請他們協助這位女孩子，他們都答應幫助她。我們又向她介紹主耶穌，她似乎得了一點點安慰。我們把這件事電郵給各地的親友，以下是其中一封回郵：

「見到你們在病中仍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使我感到十分慚愧。過去我為到神給我一個有殘障的兒子感到憤怒、埋怨，如今，我決定改變我的態度。神啊！我欣賞你的大能！其實叫我不埋怨，不憤怒的只是因你的愛！」

經過了6個月的療程，先是化療，後是放射性治療，君玉的腫瘤不見了！我們當然是歡喜若狂，但心裏常擔憂著：會不會癌病復發呢？每3個月，她要作電腦掃描檢查，恐怕癌病復發，每次等候檢查報告，總是心驚胆跳！到了2003年初，在一次電腦掃描的檢查中，發現有復發的癥狀，於是便立即再入醫院作詳細檢查。那晚我們便收到消息，君玉果然癌病復發，這對我們是一大打擊，非常擔憂。教授提議用「血幹細胞移植」(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治療，君玉因為骨髓的幹細胞正常，乃採用自體 (autologous) 移植方法；換言之，是使用她自己的血幹細胞作移植用。由於周邊血液只含極微量血幹細胞，所以先注射數天「白血球生長激素」(Haematopoietic growth factor)，把骨髓的血幹細胞趕入「周邊血液」，然後使用「細胞分離儀器」(Cell separator)，利用「離心機原理」，從周邊血液中把血幹細胞分隔出來，收集後放入超低温冷藏庫備用，這真是一個非常先進的醫療技術。

在未進行「血幹細胞移植」前，她需先接受化療，以縮減腫瘤，如此效果會比較好一點。但不幸此時，香港開始爆發沙士疫症；中國大陸稱之為「非典型肺炎」，是一種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SARS-COV)。此疫症發源於中國廣東省順德市，但由於中國當局隱瞞掩蓋，一直沒有發佈消息，更禁止媒體報導；直至2003年2月10日，中國政府首次正式公佈這疫情，但在2月時，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劉劍倫因從病人中染了SARS，來港治理，因沒有隔離或佩戴口罩，一下子便把病毒傳至香港；更在沙田威爾斯病房傳開給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SARS在香港肆虐了5個月，共1,755人受感染，299人死亡，其中6名是醫護人員。君玉就在此時要入院接受「血幹細胞移植」手術，意思是先用非常強的化療藥把整個免疫系統清洗，包括那些癌細胞和健康的細胞在內，然後再注射那預先儲藏好的健康血幹細胞，讓身體重新再建造一個健康的免疫系統；整個過程需一個月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時間，等到病人身體的白血球有一定的數目，可以作防衛之用，才可出醫院。在這期間，絕不能有任何感染，所以要住在一個完全隔離的病房中。在瑪麗醫院就只有10個這樣的病房，供骨髓移植的病人使用。

正當君玉預備入院接受化療，縮小這腫瘤，然後再進行「血幹細胞移植」手術時，忽然接到一位在醫院工作的「嬸嬸」打電話告訴我們：醫院正發生沙士(SARS)爆發，不少醫護人員都中招，並勸我們暫緩進行治療。當時我們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若不趕快進行治療，恐怕腫瘤會擴大，治癒的機會將會大減；若此時入院治療，卻又恐怕染上SARS，真是左右為難，不知作何決定。正當我們躊躇之際，醫院來電，告訴我們因SARS疫症，有些病人決定暫緩治療，現正有一間空房可以收容君玉，教授以為不用再作化療，因為她的腫瘤不算大，再縮細也沒有多大意義，既然現在有一間空房，是個難得的機會，極力贊成君玉儘早入院動手術。就這樣君玉便在3月入院，在隔離病房接受「血幹細胞移植」手術。其實，瑪麗醫院這10間病房，是全香港最不受任何病毒感染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神在這個香港正受SARS病毒肆虐期間，把君玉收藏在這隔離病房，又可以早些接受治療，真是「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唯一的問題，是我每天只能花兩個鐘頭時間，穿上全副保護衣入內探她，但至少她是受到高度的保護，因為她此時是抵抗力近乎零的時候。

經過整個星期不斷的注射強力的化療藥，把整個舊有的免疫系統清洗，她身體感到非常軟弱，口腔內都是潰瘍，疼痛異常，胃部更常感不適，每天靠注射營養素來維持身體的需要。1個星期後，醫生把先前所儲藏好的血幹細胞，注入體內，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免疫系統。每天都檢查她體內的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的數量，3個星期後，她的中性白血球已增至1.0以上，醫生認為她已有足夠的抵抗力，可以出院回家休養了！

君玉回家後幾個星期，身體仍是很軟弱，胃口也不佳。一天，忽然發覺她發燒，渾身感到極不舒服，這是我們最害怕見到的情況，對一個接受了「血幹細胞移植」的病人來說，這是危險的跡象。當日是星期日，找不到主診醫生，只有送她前往瑪麗醫院的急症室求診，醫生得悉她是剛完成「血幹細胞移植」，毫不猶疑讓她入內科病房治理。我一入這病房，真的嚇了一跳，一間大房裏面至少有30多個病人，大多是患有肺炎的，莫說是「沙士」病毒，就是一般的感冒對當時君玉的身體狀況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雖然醫生把她安置在半開放式的側房，但我總感到很不安全。君玉因為戴上了那個N95的口罩有一段時間，感到呼吸有些困難，想更換一個普通的口罩，便問一位護士的意見。她對我們說：「若你不懼怕染到「沙士」病毒的，可以隨便更換！」此言一出，我們當然不再要求更換口罩了！

到了星期一，梁教授得悉君玉入了醫院，便把她轉往血科病房，是私家房，房間比較寬濶。但經過驗血檢查，發覺她的中性白血球仍低，情況也不大穩定。那天君玉憂愁的對我說：「穎睿，我恐怕這回我真的要離開了，想和你談談以後的事宜！」我連忙對她說：「不會的，不會的，你切勿胡思亂想！」她看到我的反應，面色更深沉，對我說：「你是我世上最親愛的人，若我也不能向你透露我心中的掙扎，我還可以跟誰說的呢？」然後她哭了！她的話直刺入我的心，頓時感到非常內疚和悲痛！我真的會失去君玉嗎？那晚我失眠了，腦裏一直想著過去和未知的將來，君玉是我第一個戀人，我想也應該是最後的一個，自從我們在1971年結婚後，相依為命，她把我從一個有點自卑、不善表達感受的男孩子，轉化為一個有人性和人情的人。若失去了她，我怎樣面對前面的道路？我跪下禱告說：「主啊！你是知道我的軟弱，我恐怕失去君玉，請你醫治她吧！但懇求你賜我信心，認定你是我的神，正如約伯說：『賞賜是耶和華，收取也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耶和華，唯有耶和華的名是值得稱頌的。」

翌日再到醫院探她，她退燒了，中性白血球也開始上升，精神也恢復得多。醫生告訴我，她沒有染上SARS，只是普通的感冒，大概幾天後便可以出院了！我們聽到這好消息，心也平靜下來。然而，前面的一、兩年將是關鍵性的時刻，她就好像一個初生的嬰孩，要重新注射很多防疫針，因為昔日注射的各類防疫，都因這個手術消失了！每隔3個月，後來是6個月都要電腦掃描；看看有沒有復發的跡象。每次等候報告，都是心驚膽跳。瑪麗醫院有一個習慣，每次檢查時，他們總會這樣說：「如果有問題，我們會致電給你，若沒有來電，即是no news is good news。」然而，我們不知要等候多久，才算是安全。況且，在這期間，每逢電話響，就戰戰兢兢接聽，若非從醫院打來的，才舒了一口氣，捱到5:00p.m.都沒有接到醫院電話，心想著：這一天，應該是沒事了，至少到翌日8:00a.m.我們都可以安心，我們就懷著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捱過了一個星期。但我們心仍感不安，便決定致電醫院查詢檢查結果。護士接聽電話後，說：「我們會看看報告，然後再打電話給你們！」但這幾個小時的等候，真是渡日如年，看看時鐘，已是4時50分了，5時便放工，為什麼還沒有來電呢？終於到5:00p.m.電話響了，報上佳音，一切正常。君玉笑笑對我說：「神答應和我續約，繼續和你在一起！」想起來，這已經是差不多18年前的事了！但仍歷歷如在目前！

想起來，真如君玉所說：只有祝福。在這段期間，我學習了如何交託。女兒送了Barbara Johnson所寫的書給我。Barbara Johnson是美國一位著名作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她丈夫車禍重傷，大兒子在越南打仗，在退役前的幾個星期被打死，另一位兒子宣佈自己是同性戀，並與父母脫離關係；小兒子隻身離家出走，輾轉到了阿拉斯加，認識一位基督徒，

這基督徒帶領他歸主，他非常開心，致電母親報告喜訊，並說要駕車返回加州與父母相聚。誰料，途經華盛頓州時，被一架貨車撞到而身亡！而她自己呢？發現患上了腦部淋巴瘤，要動「血幹細胞移植」手術，面對這種逆境，她如何處理呢？她的名句是：

「在人生中，痛是無可避免，但苦卻是我們的選擇」

(pain is inevitable, but misery is optional)，她的見證與分享，幫助我不少。

苦難往往叫我們反省我們的價值觀，在平安無事的日子中，「美貌」與「地位」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病痛之際，這種價值觀卻受到重大的挑戰。首先談談「美貌」這方面，君玉在病中寫了一篇文章：外在美內在美。

「我從小就很貪靚，化療其中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頭髮脫落。雖然醫生老早就告訴我頭髮會脫落，使我有心理準備，但當事情真正發生時，情緒仍然波動；當我洗頭時，發現浴缸黑漆漆的鋪滿了我的頭髮，好像一半的頭髮都脫落了，真的感到很害怕。

漸漸頭髮越脫越多，終於沒有幾條剩下來，看看鏡子，頭是光禿禿的，臉是肥腫的(這是化療藥物的副作用)，男不男，女不女，簡直認不得自己，心裏好不難過，外子安慰我說：『我覺得你仍是美麗。』但我始終不受安慰，我跟友人打趣說：『我現在不是師母，是師姑。』

美貌對每一人來說都很重要，我們從小的時候，便知道美貌的重要，試想肥肥白白，大眼睛，漂亮的嬰孩那有不到處逗人喜愛；相反地，假如嬰孩長得醜陋，便無人會去理睬他。我們給孩子講的童話故事，如醜小鴨，灰姑娘，白雪公主等這些故事主角，都是善良和美麗的，但故事中的壞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卻是樣子醜陋的。孩子心裏便下了一個結論，美麗就等同善良，醜陋就等同心地醜惡。故此無論任何年紀和性別的人，都十分看重自己的外貌，有些人花盡金錢為要保持美貌，因為他們認為失去美貌便失去自我價值，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一文不值，十分自卑。幸好，神不是用美貌來衡量我們的價值，以賽亞記載主耶穌，並無佳形美容，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祂。(53:2)然而，主耶穌是世上最美的人，因為祂擁有內在美，祂謙卑，溫柔，忍耐，仁愛，憐恤，良善，捨己，完全順服神。外在美是會失去的，內在美才是永恆不會失去的，也是神看重的，神讓我此刻失去外在美，是要提醒我好好的栽培那有永恆價值的內在美。」

其次是談到「身份」和「地位」方面。當君玉一進入醫院，換上了病人的制服，她的身份不再是「蘇博士」「蘇師母」，而是XX號床的病人。在病房中，人人都穿上那不大稱身的制服，醫生與護士都以床號來稱呼你；忽然間，你會發覺沒有了你的「身份」「地位」，及甚至「尊嚴」。好處的是：病人與病人之間不再有隔膜，縱使病人的學歷背景，身家，社會地位或有不同；但她們都是病人，所謂「同病相憐」，很快她們便打開了隔膜，正因如此，她與那些與她背景完全不同的病友可以傾談起來。

一天，教授帶著一群實習生來巡房，見到君玉，就問道：「師母，你今天感覺如何？」教授這一招真是打破醫院的傳統，居然以「師母」來稱君玉；周圍的工作人員都感到有點愕然，教授離開後，一位實習生問君玉：「為什麼教授稱呼你是師母，你丈夫是他昔日的老師嗎？」君玉答道：「不是，我丈夫是一位牧師！」這位年青的實習生答：「哦：原來如此！」

這次的幽谷之旅，把我們一家緊緊連在一起，兒女遠道從美國送來的問候與關懷，而岳母更是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自從她得悉君玉患了重病後，十分憂心，常把自己關在房內，不敢出來，唯恐自己有傷風咳嗽，把病菌

傳給君玉；後來她更決定搬到附近的護老院暫住；但卻常常藉著電話與我們保持緊密的聯絡。當她遷到護老院那天，君玉對她說：「媽媽，真對不起，我從美國搬回香港本打算照顧你，但現在反要你擔心我！」她回答說：「不要這樣想！聖詩不是教導我們：『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我們大家都要剛強」，好一句勉勵的話。不過，最令我感動的，是君玉在窩福之聲寫了一篇文章，名叫「服侍的人生」，雖然事隔18年，現在再讀起來，也忍不住眼中的淚水：

「外子穎睿一向對我愛護備至，自從我病了之後，他更每時每刻悉心照料，陪我渡過每一個難關，每一個挑戰。雖然家裏有菲傭，但外子仍每天親自打點我的飲食，隔天便上市場買新鮮的魚，肉，蔬菜，買得多了，一天，肉店的老闆問他說：「先生，你是否替人包伙食的？」外子答道：「我替我太太包伙食！」

我日常生活所需，他都一一安排妥當，雖然他平素最怕到公司購物，但現今卻為我常到公司購買我需要的東西，從未發過一句怨言。當我失去忍耐的時候，他對我百般忍耐！當我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引導我信靠那位信實的神；當我情緒低落的時候，他聆聽我的申訴，教導我把盼望建立在主耶穌上，他剛強又細心，無微不至。把基督的話出來，教導我學像基督，我覺得我是非常幸福的人，每天都被服侍。一天，我看他臉帶倦容，心裏很難過和有點歉意，我對他說：「要你常為我操勞，真不好意思！」他說：「能夠服侍你，是我的福氣！」我只是摟著他，因為說話已不足夠表達我心中的感激和感動。

「服侍的人生」是最適切形容他生命的詞句。穎睿，多謝你！」

其實，我是受之有愧！我只能求主說：「神啊！求你使我的一生：只有祝福，沒有詛咒！」

第四十章
父親的眼淚



當我女兒凱欣還是年輕時，我問她說：「將來你結婚時，會否邀請我在你的婚禮中講道？」那時，她還沒有男朋友，但卻很快就回答：「不會！」我有點兒失望，便問：「為什麼？」她答道：「因為你會哭！」我想她是對的，我到時很有可能會泣不成聲，不知如何收科！

後來她有了男朋友，並且決定結婚。誰料她竟然改變初衷，邀請我在她的婚禮中講道，令我喜出望外。跟著她笑笑對我說：「但我有一個條件和請求，你要和我在婚宴後跳第一隻舞！」這不但是一個挑戰，簡直是一大壓力！因為我60年來，從沒有跳過舞，這豈不是叫我當眾出醜？然而，她既有如此的條件，這又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便立即接受她的邀請。我和太太商量，決定找一個教師指導我。但老師說，需要知道是什麼音樂，才可以教導我，於是凱欣便寄來她所揀選的一首歌，是 Bob Carlisle 所唱的 Butterfly Kisses。我和君玉一面聽，一面流淚。這首歌不但旋律優美，歌詞非常有意思，我把它意譯如下：

我心深知二事，
我的女兒是神所賜，
又是爹咁的小天使！
猶記得她小時，
晚上跪在床邊，
閉上眼睛，聆聽她向主耶穌訴傾；
然後，給爹咁一個蝴蝶式的親吻！

為此，我深感欣慰。
又記得她曾對我說：
爹吔，請不要離開我的坐騎，
這是我首次嘗試，好驚！」
「爹吔，我知道我焗的蛋糕，
並非上好，
但我會下一次焗得更好！」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但她仍朝朝擁抱我，
晚晚給我蝴蝶式的親吻！
她已是婷婷玉立的少女，
已愈來愈像媽媽這樣帥，
既有婦人的成熟，
又有少女的脫俗，
香水與打扮，馬尾與蝴蝶，
相映成趣！
初試啼聲，展翅飛翔，
翱遊在這世上，
她對我說：
「爹吔，你知我是何等愛你，
但我已長大，若你不介意，
我只在你臉上輕輕一吻。」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但她仍是朝朝的擁抱我，
晚晚給我蝴蝶式的親吻！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蝴蝶長大了，
成家免不了，
今天，
是她的換姓氏的日子，
我拖著她，踏出地毯的那一端，
在新娘房的一端，
凝望著她心酸酸，
她問：「爹咁，你想什麼？
我漂亮嗎？你要拖我踏上地毯上，
爹咁，不要哭！」
想來，雖然我有千萬錯，
還是得著女兒的愛，
我還渴想些什麼，
這就是父女情，父女愛！
「爹咁，不要哭！」
但眼淚卻是父女情，父女愛的珍寶！

英文歌詞是這樣：

There's two things I know for sure:
She was sent here from heaven and she's daddy's little girl.
As I drop to my knees by her bed at night
She talks to Jesus and I close my eyes
And I thank God for all of the joy in my life
Oh, but most of all
For butterfly kisses after bedtime prayer



與女兒凱欣一家合照
(2018年)

Sticking little white flowers all up in her hair
“Walk beside the pony, Daddy, it’s my first ride.”
“I know the cake looks funny, Daddy, but I sure tried.”
Oh, with all that I’ve done wrong,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o deserve a hug every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at night.
Sweet 16 today
She’s looking like her mama a little more everyday
One part woman, the other part girl.
To perfume and make-up from ribbons and curls
Trying her wings out in a great big world.
But I remember...
Butterfly kisses after bedtime prayer
Sticking little white flowers all up in her hair.
“You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Daddy
But if you don’t mind I’m only gonna kiss you on the cheek this time.”
Oh with all that I’ve done wrong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o deserve her love every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at night.
All the precious time
Like the wind, the years go by.
Precious butterfly.
Spread your wings and fly.
She’ll change her name today.
She’ll make a promise and I’ll give her away.
Standing in the bride-room just staring at her.
She asked me what I’m thinking and I said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I’ m not sure-I just feel like I’ m losing my baby girl.”

She leaned over

Gave me butterfly kisses with her mama there

Sticking little white flowers all up in her hair

“Walk me down the aisle, Daddy-it’ s just about time.”

“Does my wedding gown look pretty, Daddy? Daddy, don’ t cry”

Oh, with all that I’ ve done wrong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o deserve her love every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I couldn’ t ask God for more, man this is what love is.

I know I gotta let her go, but I’ ll always remember

Every hug in the morning and butterfly kisses..

一提起父親的眼淚，我就想到從前一幕一幕的淚景，正如我在二十章「等待」所說，君玉在懷孕10個星期時，染上了德國疹。在這個階段患上此病，很有可能孩子是殘障的；或是盲，或是聾啞，或是其他疾病，而我們又不能作什麼，只能等待著孩子的出生，再作打算！在那段等候的日子，我們不知流過多少淚水，很多時相對無言，唯有淚千行！好不容易捱到凱欣出生的日子，是1977年10月7日凌晨3時；凱欣出世了！金醫生立即替她作初步檢查，發覺無甚大碍，抱著凱欣就在產房為我們禱告，君玉哭了、我哭了、凱欣也哭了，金醫生也忍不住哭了，但這些眼淚是帶著歡欣和感謝！當然，凱欣的眼淚是一個正常初生嬰孩的表現！

事隔8年，我們決定舉家移民來到美國，在三藩市灣區定居。初來的時候，她人生路不熟，環境陌生，文化及語言有別；回到學校，一個相熟的朋友也沒有，老師及同學都是操英語，她完全不懂，適應非常困難。晚上，她常發惡夢，驚醒後跑到我床前，哭著說：「爹哋，我在夢中，見到你帶我

出街，拋下我一個人就離去，我很驚！」她哭了，我和太太也哭了；只能抱著她，安慰她！還幸她的老師是一位很有愛心的基督徒，在她循循善誘的教導下，她開始安定下來。而班中不少同學，也非常友善，成為好朋友，就是過了幾十年，她有不少小學同學仍是她如今的知己。

當凱欣在中學時，要接受一個大手術，矯正她的下顎骨，一個非常艱辛的過程。經過差不多5個小時的手術，她終於醒過來。當我看到她的樣子，真把我嚇了一跳！頭腫面腫，牙齒被連在一起，不能張開口，只見一些血水從牙齒的夾縫中流出來。醫生告訴我們，她需時6個星期才可以開口，在此期間，她只可以吃流質的食物。我們看到她的樣子，心也痛起來，眼淚水忍不住流下來。誰料，她看到我們，劈頭第一句話是：「好了，以後6個星期我可以天天都吃奶昔！」我想，她只是安慰我們，叫我們不用太擔心和難過，她就是這樣一個成熟的女孩子！

她是學校籃球隊的台柱，而我又是她們球隊的助理教練，所謂助理教練，實質是打點事務的主管，並沒有份參與教練的工作。記得有一次；她們和另一球隊比賽，雙方實力不分伯仲，爭持激烈，終場時仍打成平手，要加時比賽，加時終又再平手，球證決定採用Sudden Death的方法來分勝負，意思是：那一隊首先射入一球便勝利。雙方的啦啦隊不住吶喊，場面非常緊張，只見凱欣拿著皮球，在外圍有機會投籃，竟然命中，球證哨子一聲，球賽結束，她們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比賽一結束，凱欣跑來擁抱著我，邊哭邊說：「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這是歡欣之淚。

9年級時，她轉校在Lowell高中讀，成績也算不錯，但不知怎的，到了11年級時，她的成績開始倒退，平日精神很差，不能集中；我們是有點擔心的。有一次，我們一家到優山美地旅行，發覺她行山時有點氣促，她是一個游泳健將，代表校隊參賽的，怎會身體如此不濟呢！一天，她在學校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捐血，驗身的護士告訴我們，她的心跳很急，提議我們要帶她看醫生。經過一連串的檢查，才發現她患上了 hyperthyroidism (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甲狀腺是位在我們的頸項上，它製造 T4 賀爾蒙 (thyroxine) 和 T3 賀爾蒙 (triiodothyronine)，這些賀爾蒙是控制和調節身體之新陳代謝，以致我們身體有足夠的能量。若 T4 及 T3 過高，身體的新陳代謝的速度也加速，心跳的速度也加速，就好像一個人常處於跑步的狀態；所以 hyperthyroidism 的病癥是心跳加速，體重減輕、眼大、精神不集中、易於疲勞等。一般來說，40% 的病人可以靠藥物得到醫治，若藥物無效，則需用 RAI (Radioactive Iodine Treatment) 的治療方法。凱欣開始時是服藥，後來發覺藥物無效，醫生便決定用 RAI 治療。起初，我們一聽到「放射性治療」，便擔心起來，好像覺得是大件事。後來經醫生解釋才安心下來，而且這治療的過程簡單，一點也不覺辛苦，也很安全和有效，只不過大多數病人都要以後一生服用 levothyroxine 藥物，避免有 hypothyroidism 出現！

作為父母，每逢子女遇到疾病、失敗、患難，或其他不幸的際遇，當然是擔心，難過和悲痛。然而，最令我難忘的一幅淚景，便是「生離」。2000年，我們決定回港事奉，凱頌已經結了婚，有他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但凱欣仍是獨身一人，在 UC Davis 大學畢業後，在學校協助教授作研究工作，同時預備投考醫學院。我們離美前一晚，她駕車來三藩市與我們道別。我們互相擁抱，想到她要一個人留在美國，前途又未卜，心裏非常難過，眼中不期然流下淚來，只能在禱告中把她交在主的手中。

其實，眼淚並不是軟弱的象徵。希臘文 dakry 豈只眼淚這麼簡單，與 dakry 相連的另一個希臘文是 penthos。Penthos 是指一個受了傷或情緒受到極大波動的心靈表現，當你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時候，眼淚自然就流下來。Gregory of Nyssa 說得真好：「眼淚就好像靈魂受了創傷流出來

的血，身體受傷會流血，靈魂受傷會流淚，很多時流淚比流血更痛更深」。有時想到自己的軟弱，罪過，敗壞，不禁在神面前流淚，這是悔罪之淚。遇上生離死別，心中極受波動，忍不住流出熱淚，這是靈魂受創之淚。有時看到教會荒涼，弟兄姊妹受創，不禁灑下眼淚，這是牧者之淚。淚水並不只是象徵了負面的情緒，更象徵一些深刻的正面情緒。當君玉渡過死蔭的幽谷，從死亡的邊緣跳越出來，或是當凱欣出嫁，尋到她的歸宿，或是與分離了30多年的妹妹得以重逢，眼淚就自然湧出來，這是感恩喜樂的淚。

聖經提到基督的淚，更震撼、更動人、更不可思議。當耶穌看到祂的朋友拉撒路死了，祂要顯神的大能和榮耀，叫拉撒路復活過來。我們所看到的基督，並非昂首而出，拿著一個V字的勝利標記，好像一個凱旋而歸的大將軍宣佈說：「拉撒路，出來吧！」非也！聖經記載：耶穌哭了，甚是憂傷，憂傷一詞，希臘文是 *tarraso*，這個字原本是指一隻受了傷的馬，淒厲的喊叫。一個人，在情緒極波動時候，他就憂傷。一個萬軍之神，竟然為了祂一個朋友，憂傷流淚，真不可思議！世上一切宗教，只有基督教才有這樣的神學！

另一幅圖畫，就是客西馬尼園的圖畫，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的一晚，帶著門徒彼得雅各，約翰一同去到客西馬尼園禱告，但門徒都睡著了，只有耶穌獨自禱告，聖經形容祂甚是憂傷，幾乎要死，極其難過，希伯來書五章7-8節有這樣的描述：「祂大聲哀哭，流淚禱告。」這是一幅何等震撼的圖畫，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基督，竟然有如此的人性，就如神學家 Karl Barth 所說：「這是神的人性」(The Humanity of God)。

事實上，聖經中不少信心英雄，都是淚水汪汪的。舊約的耶利米被稱為流淚的先知，使徒保羅為到那些哥林多人多多流淚，心裏難過痛苦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哥林多前書二章4節)這種文化與我們中國人完全不同，我們中國人以為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我們不善表達我們的感受，以為流淚是弱者的表現，這種文化帶給我們中國教會一個錯誤的神學觀，當我們受壓迫、遭患難，還是強顏歡笑，以為這是屬靈的表現，把一切負面的情緒，如憤怒、憂傷、難過、憂慮視為軟弱的表現，於是加以否定，做成嚴重的傷害。

談到文化差異這課題，我就不得不提提我們這一輩的移民，所面對的「一家兩制」難題。神造的動物可分為兩大類：吃肉與吃草。如果你有機會看看 Jurassic Park 這電影，你會看到吃肉的多是惡的，吃草的多是較善良的。傳統的中國人應該屬後者了，何以見得？中國人一見面，第一句不是 How are you? 而是「吃了飯沒有？」我們從不會說：「吃過肉沒有？」所以我們自認比吃牛吃羊的匈奴人高明、仁慈，比吃蝦的「蝦夷」高貴。

所以中國人會想起「飯袋」「飯桶」「蛀米大蟲」「我食鹽多過你食米」「有飯有菜」(不是有飯有肉)「菜牌」「菜色」而丈夫更稱為「長期飯票」。中國人罵人的時候，罵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不是說「牛羊不分」！

據說，當唐明皇見到楊貴妃，他就脫口而出：「溫軟新剝雞頭肉」，這裏所謂「雞頭肉」是指一種水生植物，非常美味的素菜。但據說站在一旁的安祿山也靈感一觸加上一句：「潤滑由來塞上酥」，所謂「塞上酥」，是指塞外人的酥酪，羊奶製成品。唐明皇是正牌漢族中原人，正種中國文化。安祿山是胡人，外國人；很奇怪他們二人見到女人時，反應完全不同，唐明皇立即想起植物，安祿山卻想起酥酪，畢竟漢胡文化有別！

風水輪流轉，我們移民來到美國，我們的子女再沒有這種「吃飯文化了」！西人說：“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而不是說：“One man’s rice is another man’s poison”，若是把它譯成中文：「一個人的肉是另一個

人的毒藥」，真是「不倫不類」，「不知所謂」，這正是中西文之不同。其實，吃飯與吃漢堡飽的分別還少，但其他的分別就大了！大多數從香港來的移民，不相信一國兩制，但來到美國卻要嘗嘗「一家兩制」的味道，一是「吃飯制」，一是「吃漢堡飽」制，這令不少家長為此不知流過多少眼淚！

首先談談期望方面

- 作父母的，當然是期望子女聽聽話話，唯命是從。雖不至「父要子亡，子不亡，是謂不孝」這麼嚴苛，但起碼都要尊重和聽從父母之命。我們當然期望他們的SAT成績至少1,400，讀的是UC Berkeley, Stanford, UCLA, Harvard, Yale, Princeton等名校，不讀醫不緊要，法律、電腦工程等也收貨。將來的配偶一定要唐人，能書寫中文的則更佳。
- 作子女的，當然對父母也有期望。晚上沒有curfew，我喜歡讀什麼是我的事，不得管。切勿在親友面前論及我，也不許干涉我個人私事，包括我的男女朋友。我的房間不得進入，我的電郵不得偷看；我的髮飾，服飾不得說三道四，這是我個人的私隱！

總之，就是雞同鴨講，牛頭不搭馬嘴，看來我也有點美國化了，不再講飯和菜，而是講雞鴨牛馬了！但其實，我們與子女的生活習慣，價值觀都不相同，我們是夜晚沖涼，他們是早上沖涼；我們是慳錢一族，他們是花錢一族；我們是尊師重道，服從法紀，他們稱我們是奴才心態；他們重視個人權益，個人私隱；我們重視個人責任，他們卻重視個人權利；我們視他們為我們的子女，要有孝道，他們視我們為house-mates，要有friend道。正因如此，常常引起衝突和誤會，甚至彼此不相往來。於是，作父母的只能

嘆一句：「我們是最後一代孝敬父母，第一代孝敬子女！」真有點而無奈！

我記得有一回，我們夫婦兩人駕車下羅省，探望在羅省的女兒一家。那晚女兒凱欣要帶她女兒Liliana操練游泳，差不多九時許才回家。回到家裏，夜已深，Liliana剛洗完頭，頭髮仍濕，凱欣便叫她上床睡覺。我們見狀，連忙對她說：「Liliana頭濕濕就去睡，她會頭痛的呀！不如吹乾才上床吧！」凱欣說：「這是古老神話，全沒有醫學根據！」我們立即反駁說：「這絕不是古老神話，Common sense都會告訴我們，這是絕對真確！」她聽了很不高興，反駁說：「難道你們以為我沒有Common sense嗎？我是醫生，Mike更是腦科專科醫生，你們大可以問問他的意見，看看你們所說的是否有理？」你一言，我一語，而語氣也愈來愈重，結果大家不歡而散！Mike聽到我們的爭論，便平心對我們說：「醫學上的確沒有證據證明帶著濕頭髮睡覺，會引致頭痛，事實上，UCLA曾有學者作過這類研究，結果也如我所說的。」我們當然無話可說，但心中極之不快，我心想：「我們駕車七個小時來探你們，難道所得的待遇竟是如此！？」

隔了大概15分鐘，凱欣進入我們房中，向我們道歉說：「對不起，我態度不佳，請你們原諒！」我們3個人擁抱在一起，我開始眼濕濕了！雖然我們文化有異，但我們有同一的主，同一的信仰，同一的價值觀，是因為我們同屬一個基督的身體，無論是文化之不同，政見之相異，我們仍可以彼此接納，相信，溝通和寬恕，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了！

▶ 港民篇 第四十一至五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岳母與我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 詩經：邶風·凱風

我記得在中學時唸過這詩，但當時感受不大，或許這是因為我自少便失去母親，對我來說，「母愛」是一件非常陌生的東西。但想不到在我50多歲時，決定與君玉從美國回港事奉，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岳父過世，君玉很想回港與母親同住。在我們同住的10多年中，神補償我少時遺失了的母愛，讓我飽嘗母親的愛。岳母待我如她的兒子一樣，我自然也視她為我母親；有趣的地方，連我弟弟穎智也以「媽媽」稱呼她！

當然，要明白這首詩的意思，我們必先明白其背景。這首詩是講述慈母文瓘和她7個兒子的故事。此事發生在公元前643年，即魯僖公17年，7位孝子從齊國國都臨淄出發，徒步5,000多里，歷經半年時間送母親文瓘回歸楚國。這7個兒子後來都成為楚國的上大夫。

事緣是這樣的：春秋時期，齊桓公有管仲，鮑叔牙等出色的臣子輔政，成為諸侯中的霸主。桓公娶了周釐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女兒王姬為正妻。楚國國君楚文王欲與齊國結盟，便把自己的女兒文芊作為王姬的陪嫁，跟王姬一起嫁給齊桓公。文芊是一位美麗、端莊、賢惠的女子，王姬沒有生孩子，但文芊却連生七個兒子，因而得到齊桓公的寵愛。但文芊不敢恃寵而驕，對王姬的禮數不敢或缺，也不敢作任何逾越的事，只是盡心養育孩子，嚴加管教。但齊桓公見其霸主地位開始穩固，便越來越驕傲，而且他又是一個淫亂之君，先後娶了徐國國君的女兒徐嬴為二夫人，蔡國國君女兒蔡姬為第三夫人。雖然徐嬴及蔡姬也沒有孩子，齊桓公也不立文芊的兒子為太子，不但如此，在王姬死後，更苦待文芊，並以她在二夫人徐嬴面前無禮，貶為庶人，並驅逐她和7個兒子離開齊國。當時文芊身體軟弱，她的兒子就為她製作了一個簡單的步輦，抬著母親走了5,000多里，返回楚國。凱風這首詩，便是7個兒子在途中所寫的，並以此詩來寬慰母親悲傷的心情。其實，他們出走，未嘗不是一個變相的祝福，他們來到楚國，得到楚成王(即文芊的弟弟)熱情接待，文芊被封為世婦，7個兒子都被委任為上大夫。而齊國的情況又如何？齊桓公去世後，他有13個兒子，均為庶出，趕走了7個孝子，還有6個，除了公子雍年紀最小之外，其餘5人大打出手，拼過你死我活，沒想過給父親收屍入殮，以致齊桓公的屍體在屋裏停放了67天，屍體上的蛆蟲都爬出門外，而齊國的國勢亦一落千丈！

岳母的際遇雖然沒有文芊這麼淒慘，但她的一生也是充滿不少悲歡離合。她的名字叫葉仲愛，她告訴我，當她出世後，父母有點失望，因為她是個女孩子。昔日中國人重男輕女，父母當然希望有個長子，所以給她起名「仲愛」，意思是「還要再生」，希望生一個男孩子來，誰料一連五個都是女孩子，父母當然是極失望了！她的一生，都給病痛，死亡困擾著。君玉的哥哥，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在瑪麗醫院當實習醫生；但實習還沒有完結，就患上腎炎，在那個年代還沒有換腎手術，他就與世長辭。

他突然的離世，對君玉的一家，尤其是她的父母，打擊極大。君玉的妹妹自小患上TB腦膜炎，一生殘缺，捱了20多年的苦就離世了。岳母自己患上肺病(TB)，幾乎喪命，幸好那時出了一隻新藥，挽回性命，但她的TB卻傳了給君玉的妹妹和二哥，妹妹結果患了TB腦膜炎，而二哥也因肺病而要入院治療了半年。這一切都給她的身、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更不幸的，就在她患病之際，岳父有了新歡，並且要求搬入同住，她無奈地接受了，幸好「阿姐」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對岳母也非常尊重，她與岳父生了一個女兒，後來她和君玉及女兒搬到隔鄰一間房子居住，君玉也得到她的照顧，感情不錯。後來當我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兒子凱頌也在此時出生，她特地遠道從香港飛到美國，參加我的畢業禮，我們深受感動！然而，對岳母來說，心中始終都感到不安。

我和君玉是在2000年回港。在此之前，岳父、岳母曾住在老人院，原因是他們無法獨立照顧自己。他們本來是居住在1幢舊樓的4樓，沒有電梯，對老人家來說是極之不便，而且上落樓梯非常危險，所以他們便決定於1999年搬到老人院居住，把自己的房子租給人。君玉知道他們的決定，便立即回港，幫助他們收拾和整理房子。他們在這兒已經住了很久，堆積了不少東西，一下子要收拾一切，離家而去，是離愁，必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收拾期間，岳母總覺得每一件東西都是寶貴，是極具紀念價值，要一下子拋掉，實在捨不得。此時，母女二人，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幸好教會冇姊妹特地請了假來到家中幫助她們收拾；這點支持，對君玉來說是極大的安慰和鼓舞！

目前全港共有722間老人院，分別由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及私營機構營運，簡言之，大概可以分為4類：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津貼安老院 營運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的資助，通常設於社區服務設施或獨立大樓，床位一般不能選擇。

合約院舍 以投標形式取得服務合約，同時提供政府資助及非政府資助者宿位，營運規格大概與津貼安老院相若。

自負盈虧安老院 非牟利機構管理，同時提供政府資助及非政府資助宿位，營運與上述兩種安老院相若。

私營安老院 收費較高，需符合若干營運老人宿舍的基本要求，並需持有社署的高度護理牌照。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數字，截至2019年，全港約有33,000個政府資助宿位，但輪候人數約42,000名，大概平均輪候時間約3年半以上。此外，輪候的優先次序亦會根據長者所需的護理程度編排。而私營院舍的宿位數目較多，輪候時間相對較短，有的可即時入住，但收費却非常昂貴，政府資助的護理院，每月收費1,559元至2,060元不等，但私營院舍的收費至少6,500元起，甚至高達數萬元。

岳父岳母入住的是私營老人院，位於我們教會窩福堂樓上，他們願意付多一點宿費，住在一間半開放式的房間，其餘的人都住在大房之中，一點私隱也沒有。衛生環境不算太差，護理方面則強差人意，每日3餐供應，廁所和浴室都是公眾的，對老人家來說，非常不便，尤其晚上如廁，更覺困難。他們年紀雖大，但還可以自由行動，不用特別護理，不過，院內並沒有康樂、健身設施，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心理健康，入住的長者自由度極低，鮮有選擇的權利。老人院往往以「集中照顧」為主要營運模式，給人一個印象是：這是一間醫院，而不是家居。「被子」「枕頭」甚至「衣服」

都是統一，他們極其量只是關注長者之生理需要，而忽視了心理需要，大多數長者都不大開心，有些更患上抑鬱症，再力上「相見好，同住難」，由於院舍地方大多不夠寬濶，院友又多，彼此容易發生衝突，無論是與職員或是院友，都時有爭執和衝突。報章上時有一些「院舍長者遭虐待」的新聞。不過，大多數長者都逆來順受。還有，不少老人院的策略，一旦發現其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便立即送他們到醫院的急症室治理。記得有一次，岳母在家感到不適，我帶她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那兒的護士擘頭第一句便問我：「你是哪一間院舍來的？」我對她說：「我是她的女婿，她是住在我們的家中。」她連忙道歉，並且請我們到另一處排隊看醫生。原來他們安排兩處接待急症病人，一條龍是專為院舍病人，在那兒至少等候2、3小時才可以看到醫生，另一條龍是專為非院舍的病人而設，不消10分鐘便可以看到醫生了！原來，在醫院工作人員眼中，院舍來的病人是二等公民，他們有著不同的待遇，是誰之過呢？岳父岳母住的院舍，正是在教會樓上，所以不少弟兄姊妹常常有機會探他們，又帶他們出街飲茶，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治療性的。想到現時因Covid-19疫症肆虐，不得探訪，院舍的老人家就更慘了！岳母的適應能力較強，而岳父則不大適應。他不時只顧著睡覺，心情又欠佳，不夠1年便病倒了，入了醫院不夠兩個星期便離世。

自從岳父去世後，岳母搬到另一間老人院-靈實護養院。這老人院建於1999年，提供270張政府資助床位，讓65歲以上，又沒有身體機能嚴重缺損的長者入住。這新的院舍比昔日那間好得多，但卻沒有私人房間，每間房住4-5人。在設施方面，設懷緬閣，並提供懷舊的擺設，以刺激長者記憶力，又設有各類復康設施，空間寬敞，設花園及魚池供長者活動，又設有醫療護理，復康服務，以及心理社交，輔導等服務。然而，岳母感到非常孤單，尤其岳父的離去，令她更有失落之感，所以，她住了一陣子，便搬到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二哥家中。我們一回港，找到地方居住，便接她到我們家中。自2000年尾開始，一直至2011年1月她離世，共10年有多的日子。在這段日子，我和她建立了非常深厚的關係，從她身上，我開始體會和嘗到「母愛」之味道！

岳母是一個非常聰明和能幹的人，雖然她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識字不多，而岳父則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中英文程度都不錯，但岳母並不因此而自卑退縮。當她在70年代信了主後，常常讀聖經，寫金句，唸聖經，以致她的閱讀和書寫能力大有進步，並且可以寫信與我們溝通。她的記憶力非常強，能背誦詩篇第一篇，第廿三篇，第103篇等；在教會舉行的唸詩篇比賽中，屢屢得獎！她理解和分析能力也很高；當我返回窩福事奉時，每個月都在窩福之聲特設「猜謎遊戲」一欄，是個有獎的遊戲，她期期都參與，並且亦屢屢猜中得獎。我以為我所出的謎語也算艱深，但竟被她一一破解，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以下便是一些例子：

1

命好居然子落空，無門學問也能通，
存心就會饒人過，孔子勸恒守至終。
猜一個聖經常見的字

2

二人并合愛情增，不少良朋山下盟，
土也能興清雅閣，披衣到隊氣軒騰。
猜四字，是啟示錄常見現象

3

受任留心又久修，淘金王八盡不留，
怨垂柳下絲皆斷，記者之立要他投。
猜四字，聖經名句

你能猜得對嗎？(1)是“怒”字(2)是“天崩地裂”(3)是“愛人如己”，你是否同意？我岳母的確是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無可否認，岳母的信仰與教會生活對她有著極大的影響。在70年代，我從美國唸完神學回港在窩福事奉。岳母常來探我們，她常感胃部不適，有點擔心。於是我便帶她去看曹保耀醫生，曹醫生一見到她，稱呼她為「伯母」，又小心替她檢查，檢出她有胃下垂，情況並不太嚴重，好言安慰她，不用太過焦慮！她那晚打電話給君玉，查問君玉所帶領的查經班是何時何地，並且說曹醫生是一個好醫生。她在查經班中很投入，我見時機成熟，便去探問她，帶領她決志信主，其後更在窩福接受水禮！

岳母常常對人說：「我一回到教會，整個人都感到開心和精神。」她所說的，一點也沒有誇張，窩福有許多長者活動，每星期二我們有「天南地北」，我在「天南地北」與他們講述時事、中國歷史風雲人物、每週一詩欣賞（中國唐詩）、醫學常識等等，真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最後我還是回到聖經上去分析和理解；星期四是我們的查經班，有分享、有研經；星期日是團契時間，參加人數往往達100人。此外，我們還有郊外旅行，組織一日遊的旅行團，吸引不少未信主的朋友參加，負責長者事工的袁姑娘更有時組織旅行團到中國旅行，教會生活真是多姿多采。在教會中，岳母有不少年紀相若的姊妹，彼此關懷，就如詩篇133篇所說：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鬚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霖，降在錫安山；
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岳母另一個喜愛的節目就是每早晨與我一同到巴富街球場晨運，我跑步，她作柔軟體操！這些節目令她的身心舒暢，所以她活到90多歲，仍算是康健。然而，當她踏進95歲時，身體明顯是開始走下坡。首先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眼睛的問題，她患有青光眼，雖然經過激光治療，仍是無效；只能靠藥水壓抑眼壓，我每次帶她到瑪麗醫院看醫生，都要花至少5個小時，病人多，醫生忙，往往要等候兩個多小時才能看到醫生，看完醫生又要排隊取藥，一早出門，往往要到下午2時後才回到家裏，她已經是筋疲力倦！後來我們請求瑪麗醫院醫生轉介她往九龍的眼科醫院接受治療，眼科醫院在我們家的對面，節省了一往一來的時間，再加上眼科醫院醫生較多，輪候的時間也較短，情形稍為好轉！

岳母在她人生最後兩年，受到身體極大的折磨，身、心、靈也到極大的苦楚。她一向心肺都有問題，常常感到氣促，心跳有時低至40。有一次，我帶她往播道醫院求醫，醫生發覺她的心跳低過40，非常危險，身體的鉀(Potassium)也非常低，建議我們立即轉送她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療。後來她的情況稍有改善，但未幾又再有同樣的情形出現，她入醫院的情況也愈來愈頻密了。

我們至關注的是她晚上醒來如廁，像她這樣的情況，很容易會跌倒，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於是我們便買了紙尿片給她使用，又在她床前放上一個鈴，若她有需要，隨時可以按鈴呼喚我們。有一晚，約凌晨二時許，我聽見有鈴聲；於是便跑到她的房間看過究竟。她看到我，竟然笑笑的對我說：「我沒有什麼？只是想與你開過玩笑吧了！」「開玩笑！現在是半夜三更呀！」我正想提出抗議之際，忽然我體會到一件事，她一個人在黑漆的房間，不能入睡，心裏恐慌起來，便按鈴求救，但當她見到我；又不能道出心裏的恐慌，於是便說：「沒什麼，只是開玩笑吧了！」於是我便對她說：「沒事就好了，你平安的去睡吧！」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就連聲說：「對不起！」

又有一晚，她醒來要去廁所，於是我便扶她入了廁所，我恐怕她一個人在廁所會跌倒，所以便留在廁所，等她如廁完了才扶她上床。她忽然非常憤怒的吩咐我要立即離去，正當我想解釋：我不放心她一個人留在廁所，她就推我離去。我體會到我始終只是她的女婿，不宜在她如廁時留下，這是尊嚴的問題，我只有離開，等待她如廁後才扶她上床。

有一回，她又要再入伊利沙白醫院治療，她的心臟越來越弱，但那陣子醫院有許多病人，醫生與護士都非常忙碌，本來她已穩定下來，醫院亦通知我們很快便可以出院，吩咐我們有所預備，醫院隨時都會打電話給我們，接她回家。誰料等了一天，沒有來電，一天一天過去，一連5天都沒有電話，所以當我下午去探病時，就向當值的護士查問，我看到岳母在醫院，並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也沒有適當的護理，以致她背部生了許多褥瘡，非常痛苦。那護士對我說：「現在我們很忙，醫生沒有時間寫discharge，所以還不可以出院！」我聽了非常生氣，正想與那護士理論，岳母在旁對我說：「不要生事了！」我只有忍氣吞聲！

事實上，岳母就是這樣的人，她怕得罪別人，樣樣都忍氣吞聲，任人欺負。有一回，我帶她到伊利沙白醫院門診部覆診。本來預約的時間是2:00pm，但當我們到達診所時，護士通知我們，主診的醫生有事不能應診，改由另一個醫生負責。於是我們只有一直等護士的通知見醫生。誰料我們一直等到5:30pm，還沒有輪到岳母，看看周圍，只有岳母和另一個病人，最後我忍不住向護士投訴，她才叫岳母入內看醫生。看完病後，我就向醫生投訴，約診的時間是2:00pm，但因醫生沒有來到，就要一個97歲的老人家等足3個半小時，這是什麼道理？那醫生聽見我投訴，便詢問那位當值的護士，她立即反駁說：「我一早已經叫了她的名字，只是沒有回應！」我一聽她這樣說，就火滾了，大聲說：「你說謊！我一直聽得清清楚楚你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叫每一個名字，你是沒有叫葉仲愛這個名字！」她一聽到我的斥責，竟然哭起來！岳母見狀，立即對我說：「算了！算了！不要弄哭這位姑娘！」我心裏想：「媽咪！我們不能任人欺負呀！她真的沒有叫你的名字，你也知道的，為什麼還維護她呢？」我沒有說出口，只是心裏感到很不舒服。還是這位醫生仁慈，他在岳母的file中寫了幾句，以後我帶岳母看醫生，不再像這一次要等這麼久了！我想到岳母常常對別人說：「我一生從沒有欺負任何人，但有一個人卻是例外，他就是我的女婿穎睿，他是世上唯一一個被我欺負過的人。」我被她選上，真是我的榮幸！

話雖如此，每逢我想起她在臨終時所受的痛苦，身上長滿了褥瘡，痛苦不堪，我眼中便不期然地流出淚來，2011年1月初，她又要再入院了，這一回我和君玉決定送她入私家醫院留醫，並請了一個特別看護照顧她，雖然費用昂貴，但總比在政府醫院受苦好得多。1月1日，那特別看護不能返工，我便一個人留在醫院陪她，看到她的身體漸趨孱弱，心很難過。在中午時份，買了一些她最喜歡吃的米粉給她，她吃了兩口，咳起來，氣也非常促，醫院護士怪責我給米粉她吃，令她咳起來，我聽了很內疚，還好她很快便回復正常，也不願再吃什麼。翌日，我有要事返回美國，到了美國後，便接到君玉消息，岳母與世長辭，上帝應允了她的禱告，因為一年來，她不絕祈求神早些接她到天家，因為她在世上實在太辛苦了！

如今，岳母已到了更美的家鄉，與岳父、大兒子在一起，正如我在安息禮拜時引用保羅的話：(提後四章7節)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岳母已經安息在主懷中，她留下的模樣，見證和關愛，永遠都在我們心中。



第四十二章

又是
另一個
十年

「十年」這個名詞似乎對香港人來說，變得非常敏感。然而，我這裏所謂「又是另一個十年」，並非與周冠威等導演的「十年」有任何關係，我不是指將來的10年，而是指窩福在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個難忘的10年，親看目睹神在這10年的作為。

雖然我退休後去研讀歷史，而且又是「圈內人」，「目擊證人」，但由我執筆去敘述和分析窩福這十年的歷史，總有點躊躇，或褒或貶都有點問題，若是「褒」，總不免給人一種「自我吹噓」的感覺。若是「貶」，又似乎未必完全盡實。但想到文天祥「正氣歌」那句「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我也希望本著這種精神，分享一下我在這10年見證神在窩福的作為。

初回窩福時，發覺在過去的15年，窩福實在起了極大的變化；對我來說：大部份會友都是陌生的，因為窩福的舊會友，大多都轉會到恩福，港福或其他窩福的分堂。還記得我初回到香港，參加早堂崇拜，一位司事看到我，就說：「阿伯，你是第一次來參加我們教會嗎？」我說：「不是呀！」就在此時，一位認識我的舊窩福會友連忙對這位姊妹說：「他就是我們窩福的開山祖師蘇牧師！」這姊妹連聲說：「對不起，有眼不識泰山！」我頓時感到有些不安，而且有點壓力，原來他們對我有極高的期望。有一回，講完道後，一位青年人對我說：「So sir, 你好勁！」我一時不知如何回應，因為很久

沒有聽過這樣的評語，心中頓時覺得有極大的壓力，心想：「假如他們發覺這個So sir是平庸之輩，我豈不是令他們非常失望！」但回心一想，保羅豈不是給我一個極大的提醒：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和君玉是在2000年底回港事奉，直至2013年退休回美，我大概可以把這段時期分為3期：

- 2000年至2002年—適應期
- 2003年至2009年—沙士後時期
- 2009年至2013年—望福後時期

這3個時期，隨著政治環境，社會因素，人事變動及策略上的改變而帶著教會之改變。

首先談談適應期。自從我於1985年離開窩福，教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弟弟穎智於我離開後不久，加入了窩福同工的行列。他在美國達拉斯神學院及美南浸信會神學院畢業，然後舉家回港事奉，未幾與一班舊窩福會友植堂，開始了恩福堂。參與這次植堂事工的，其中不少是資深和成熟的會友，這對窩福的發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到了1994年，「窩福堂」的主任牧師譚偉康有一個異象，在藍田地區開設分堂，於是一些弟兄姊妹亦隨譚牧師在藍田植堂；而「窩福堂」則聘請了溫清華牧師為主任牧師，但因牧會理念與窩福一些資深會友發生了衝突；教會呈現分裂現象。最後解決的方案，就是溫牧師帶領一群與他牧會理念相同的會友，於1999年發展新堂「樂恩堂」。經歷這一連串的問題，教會元氣大傷，弟兄姊妹士氣低沉，再加上沒有主任牧師，由一位女傳道權充代堂主任，不少會友都有失落之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於是執事會主席竟然不遠千里而來，在三藩市探問我們，並邀請我回窩福事奉。

經過多次與窩福的舊會友傾談，發覺返回窩福事奉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在我過去牧會經驗中，除了在金巴倫長老會一段短暫時間外，都是我自己親手創立的堂會，不用掛慮前有的傳統制度，人事等複雜問題。如今，窩福雖是我在1976年創立，經過9年時發展至一間擁有500-600人的堂會和7間分堂；但到了2000年，窩福已經不再是昔日的窩福了。在300個會友中，對我來說：大部份都是陌生的，而在傳統，制度及文化上也大不相同，而我又沒有牧養過一個這樣教會的經驗，這確實是一個大挑戰。

我有見及此，知道一定要小心行事，既要尊重他們舊有的特色，又要大事改革一些根深蒂固的陋習和制度。於是，我便向執事提出我的要求，成立一個由羅曼華博士所帶領的「千禧新象先鋒小組」，在我未回港前作先鋒的工作。羅曼華是窩福資深會友，更是窩福開創之元老，她在Fuller神學院獲得宣教學博士，並任教於中國神學研究院，更是一位受廣大會眾尊敬的領袖。這千禧新象先鋒，顧名思義，是向前瞻多於後看，它的使命有：

- 全面了解窩福的實況，展開全面性及詳盡的問卷調查，收集各方數據，以至可以對症下藥。
- 教牧隊工的研究與配搭。
- 辦公室工作效率的研究。
- 團契小組的研究。
- 提供一些方案，配合3E模式。
- 修訂章程，配合3E模式。
- 藉通訊網頁教育及溝通3E模式。
- 舉行祈禱會，記念教會事工及轉型。

這個先鋒小組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因為這小組的成員都是窩福會友所熟悉和尊重，接納的程度相當高。而我雖是窩福的開山祖，但始終他們對我認識不多，我加入這個小組，與其他成員取得共識和默契，為我在窩福事奉鋪路，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策略。

然而，在我們回港不夠1年，也正是我開始適應了香港人的節奏和窩福的環境之際，於2001年9月13日，也即是911事件發生兩天後，醫生發現君玉患了淋巴瘤(Lymphoma)，我當時寫了一封家書給窩福的弟兄姊妹，形容這是一個非常的時期；而這時期，也正是窩福崇拜人數高達740人之記錄，較諸半年前的人數倍增，我不禁問自己：「究竟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危機抑或契機？」但事實上，自從太太病後，我忽然覺得我們與弟兄姊妹之距離近了許多，突然間整個教會好像團結起來，每個人都是這麼投入，其中有不少是我從沒有作個人接觸過的，有些更只是慕道的朋友，但他們都主動關懷，愛護備至，我們的痛就像是他們的痛，有人告訴我：「這是這近年來在窩福看不到的。」我習慣每隔一段時間，便寫家書給弟兄姊妹，分享君玉的病況。到了君玉完結治療後，她要照CAT Scan，看看還有沒有癌細胞留在體內；我們在等候報告時，心裏非常憂慮和擔心，便要求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收到報告，知道君玉沒有癌細胞的跡象，我便立即電郵通知弟兄姊妹。有一位弟兄告訴我：「當收到你的電郵，心跳速度加速，一打開電郵，看到『好消息』3個字，我高興得流下淚來，不住的感謝神。」我看到他的分享，眼裏已充滿了淚水，就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26節說：「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第2個時期是2003至2009年，我稱之為「沙士後時期」。從2003年開始，教會人數激增，2004年中已突破1,000大關，2009年已達1,500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增長率是27%。為什麼這段時期有如此快速的增長？很明顯，這與2003年3月在香港所發生的沙士疫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有極大的關係。起初，一位從廣州來港治病的醫學教授，下榻窩福對面的維景酒店，SARS病毒因他傳染給16位遊客，因而散播到世界各地，包括星加坡、多倫多等地，至於香港方面感染沙士的有1,755人，349人死亡。

在沙士期間，人人自危，尤其在醫院工作的醫務人員更是步步為營。謝婉雯醫生的去世，更引起港人的憂心和難過，面對這個看不到、測不透的敵人，香港人似乎失去了「安全感」，再加上經濟蕭條，內憂外患，香港人對「生命」問題顯得更有興趣了，不少人也在此時刻思想宗教信仰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2005年，教會數字突破1,000大關，並且持續增長。

不過，「沙士」只不過是誘因，我以為下列因素，配合這黃金機會，以致教會有如此大的成長。當窩福在1990年初購買冠華園B座的時候，沒想到隔鄰的A座是一個佛教團體，樓下全層也是屬另一個佛教團體。窩福人數多了，地方不敷應用，再加上沒有電梯，因電梯是安裝在A座，年長及坐輪椅的倍感艱辛，嚴重影響教會發展。所以，我們一直禱告神，讓我們可以購得A座，打通整層3樓，我們就不致因地方不足而阻碍教會發展。真想不到隔鄰的佛教團體竟然願意把A座售給我們，而不是售給在樓下的另一個佛教團體。而且，以當時的市價來說，算是便宜的了！而更大的神蹟，是窩福一班專業的弟兄姊妹，同心合力，齊齊建造窩福這個家，毫無保留地投身在這工程中，有時工作至深夜，任勞任怨，實在是一個好的見證。新堂設計，新穎極有創意，更難得的，其設計有濃厚的聖經寓意，極有深度，是一件難得的作品；而替我們裝修的承建商也在承辦這工程其間信了主，並且成為窩福的會友。自從2003擴堂之後，教會面積增加了一倍，但到了2005年，因增長迅速，地方又不敷使用了！

經過商討，我們決定發展星期六晚堂，而這一堂崇拜的內容對信徒和非信徒都適合，我們稱之為 seekers sensitive service，時間是下午6:00至7:15pm為了幫助晚堂的發展，我們特備了一些配套，包括：

- 設有晚飯-崇拜後，教會設有晚飯，大家散會後一同聚餐，然後參加不同的小組及主日學。這晚飯時間給予弟兄姊妹交誼時間，更可以招待新來賓，融在一起，倍感一種家聚的感覺，難怪有從中國內地來的學生說：「每星期都期待著星期六的來臨，因為只有星期六才嚐到群姐為我們所預備的家飯之風味。」
- 晚飯時間是重要，但我們安排在飯後的福音性研經，及其他主日學課程大大的幫助晚堂的增長。更重要的，我們在這一段時間，開設Awana Club，不少未信主的家長帶領小朋友參加，6時崇拜，小朋友則有他們的Awana Club，然後一同吃飯，飯後小朋友參加主日學，父母則參加福音性研經班；這竟然成為不少家庭的歡樂時光。

第3個時期是2009年至2013年，我稱之為望福堂成立後時期。我們一向堅持一個原則：不會建立一個特大的教會（Mega Church），我們的策略是廣設獨立的分堂。當教會發展至1,500人時，也正是我們要積極開設分堂的時間，到了2009年，崇拜人收已達1,400人，我們當時有星期六晚堂，星期日早上3堂，我們決定加設兩堂，一是在隔鄰的YWCA之少年崇拜，一是在附近的YMCA崇拜，後來遷至在附近的一間小學作崇拜。這崇拜，很快已發展到200人，我們見時機成熟，便決定把這堂崇拜轉化為一間分堂，稱為「望福堂」。起初，他們仍在那小學崇拜，平時聚會及辦公則在窩福。最後；他們在長沙灣購得自己的堂址，並且成為一間獨立的堂會。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望福堂的成立，對窩福是有一程度上的影響，一方面窩福崇拜人數驟然少了200多人，其中不少是來自長者團契，因為負責望福堂的傳道人袁姑娘也是窩福長者團契的牧者；所以長者團契差不多有一半人是隨袁姑娘去開設望福分堂；另一方面香港在2009-2013年發生了極大的轉變：在政治方面，於2005年特首董建華以「腳痛」為理由辭去特首職位，其實主要原因是北京不滿董建華的施政表現而被辭退，特首一職改由曾蔭權代任。到了2007年6月正式被800人選舉委員會選為特首，一直至2012年退任，而梁振英則以689票被選為特首繼任。

不過，影響這個時期至深至大的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這危機又稱「次按危機」，或「信用危機」，又稱為「金融海嘯」。因這危機，投資者對抵押證券失去信心，以致引發流動性危機，即使多國中央銀行多次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額資金，也無法阻止這場風暴，引致一連串的經濟衰退。至於香港的情況，因美國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宣佈破產，導致全球股市下滑，構成股災，而香港至大保險公司友邦保險 (AIA) 之母公司 AIG 亦瀕臨崩潰，引起全港之恐慌，再加上「三鹿奶粉污染事件」，令香港的零售業大受影響，不少公司，包括 U-Right 及泰林先後清盤，而電盈亦宣告私有化，這都引起香港經濟衰落原因。

面對著這些內憂外患，教會特別為那些在經濟受影響的弟兄姊妹舉辦一些講座，邀請一些專業人士針對香港的經濟環境提供意見，特別是那些雷曼債券的苦主。我們又舉辦查經班，從聖經教導我們如何處理和疏導我們的情緒和心結；在此年間，吸引不少未信主的朋友來參加教會，自2005年至2009年，洗禮人數達434人，平均每年都有87人，是歷史的新高。

還有二點值得一提的；自從1997年以來，來港進修的內地學生也日益增多，到了2010年，差不多香港各大學的博士/碩士生有一半都是來自

內地的。他們離鄉別井，語言溝通又有障礙，因而產生不少問題。教會看見及此，乃積極推行各院校的內地學生福音工作。先後在浸會大學，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開設福音性研經班，後來更在教會開始「普通話團契」，我們又每年舉辦一些培訓班，邀請國內一些信徒參加，我們特別訓練他們帶領福音性研經，以致他們在內地可以更有效的開展福音工作。

其次，是「恩苗團契」的成立。我曾聽過不少有自閉症小朋友的家庭，他們在教會無法立足，因為那些患有自閉症的小朋友，未能適應在普通的主日學中，令到不少老師及其他家長不滿，最後這些家庭只好不再參加教會，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教會看見及此，於是便成立了「恩苗團契」，專為這些小朋友而設的團契；並且有專人負責。其中一位小朋友講出她的心聲：「我在窩福覺得很開心，多謝天父和耶穌，還有多謝牧師和導師。」她的母親也作見證的說：「感謝天父，多謝牧師，見到有特別需要孩子的家庭的需要，在幾年前，成立為他們而設的恩苗團契，讓孩子在禮拜日上主日學，家長可以參加崇拜，團契或主日學。回想未到窩福之前，帶著女兒在不同教會尋尋覓覓，十多年前終於在窩福落腳，感覺很溫暖，就如蘇牧師一直強調-濃濃的人情味，由范姑娘、朱姑娘，到韋姑娘都用心關懷每個家庭，深深感受到天父的真實-祂沒有撇下我，也不丟棄我。」

雖然在這段日子有不少風浪，但教會卻是增長非常迅速，自2009-2013年的4年中，教會聚會人數再次遞升，由2009年的1,277人(因200人去了望福堂)，增至2013年的1,477人，若連小朋友計，則教會已達1,700人了！而洗禮人數亦達441人，平均每年都有超過100人接受水禮，這是神奇的作為。

但在2011年11月，我們家庭又發生了巨變。我們在美的媳婦，在生產她第二個小朋友時，突然難產去世。她患的是AFE(Amniotic Fluid Embolism)，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俗稱「胎水入血」，導致心臟停頓；這病是沒有先兆，防不勝防，亦難以醫治，在很短的時間內，孕婦就離去。在美國，每十萬個孕婦中，有2-8人出現這情況。媳婦去世後，醫生連忙為她剖腹，孫兒已經全身變色，不知缺氧有多少時候，他們立即用直升機把他運往UCSF醫院救治，在ICU病房住了差不多10天，竟然奇蹟地康復過來，並且腦部亦沒有受損的跡象。像他這樣的情況，90%都會死亡或傷殘，但他卻是10%中的其中一個，他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miracle baby。我們本來去美是迎接孫兒的誕生，真想不到竟然要面對這個悲劇，並要在媳婦的安息禮拜中證道，這是我一生以來最難的一篇講道。

媳婦的離世，對我們的家庭影響極大，兒子無法接受，他的一生就不再一樣了！這個陰影一直纏著他，無法除掉，他的改變對我們影響深遠，我們決定提早退休，返回美國，希望可以幫助他照顧兩個幼小的孩子。但要離開窩福，倒需要一些時間的預備，最後我們在2013年10月便結束了我在窩福的事奉，返回美國的三藩市灣區定居。

回想這段在港的事奉，可算是我們蒙福的日子，最重要的倒不是教會的增長，而是與弟兄姊妹所建立的深厚友情。正如君玉在離別時對窩福的弟兄姊妹說：「今次其實我們也不是太想離去，我自己在工作上也有一點成就，同事也捨不得我離去，而在教會裡，也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所以說這一次要面對的前路，其實缺了一點興奮，多了一點焦慮。」

在我們離開時，窩福的弟兄姊妹為我們出版了一本刊物，名《神的僕人，我們的牧者：蘇穎睿牧師和師母》。當我們閱讀弟兄姊妹分享他們的感受時，一方面我們感動至流淚，但另一方面我總覺得我並不是如他們所寫的那麼好，只不過他們包容了我不少的缺點和軟弱。但無論怎樣，當我返回美國後，遇上一些困擾，無論是在家庭上或事奉上，遭到挫折，有時有點

心灰意冷，甚至對自己的能力和價值也起了懷疑，這本書就往往給予我無比的鼓勵、安慰、肯定和提醒，叫我不放棄，不洩氣，仍勇往直前，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走完我人生的路程，以下的一篇分享是我銘賢的學生，也是窩福的會友叢校長所寫的，便是其中的一例。

So sir，我們的導師

「由窩仔街銘賢至何文田街，
由YWCA至冠華園，
追隨老師，也追隨牧者，
也許是神的旨意，還是不解的師生緣。
你博碩的文史知識，
深奧難明的希臘語法分析，
以幽默的故事緊扣我們的生活圈，
以引人入勝的軼事，和名人小傳，
再難明的章節經卷，
都化成銘骨動人的佳篇，
啟迪我們的心靈，令人留戀。

蘇sir是我們的牧者，
寧為有血有肉的導師，
不願作西乃山高不可攀的先知，
球場上發發脾氣，
偶爾衝衝紅燈，不等同破壞法紀，
就是你的胸襟，
廣納更多燥動桀敖的靈魂。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你領我們穿越黑暗，橫渡泥濘，
領我們到達高山福地，
從來不因頑冥而放棄，
教我們擁抱生，也擁抱死，
你強而有力的說理，
教眾多靈魂甦醒，
令更多會友在世俗榮華慾望前自省。

我們難免經歷人生幽谷，
但蘇sir的幽谷，總教人感觸，
母親、太太、兒媳，
憾事不絕，誰不惋惜，
在迷糊失落中，你抓緊神的訊息，
你的呼喚，你的訓勉，
如漆黑中的明燭，
引照我們，
堅走為我們祝福。

在人間的眾多美食和誘惑前，
你總為我們預備，
豆腐牛肉飯的盛宴，
你風趣生動的比喻，
是我們枯竭中的喜雨，
我們有恩有慈，
全賴你引領我們到主的寶殿，
蘇sir蘇sir，

你帶來開始，
又啟動中興，
是窩福的恩賜，

是我們的福祉，
從你的「福音性研經」，
「四季成長路」...我們學會反思，
更難忘你帶我們參與長征，
中國教會歷史，

蘇sir蘇sir，
要感激的永感激不盡，
要說的永說不完，
感激你為窩福無私的奉獻，
感激你的身教言傳，
懷緬你激情的擦拳，
懷緬你淚眼中的哽咽，
盼望你永遠爆滿的課室，
在窩福得到延展。

就讓我們的祝福和思念，
塞滿你離去的行囊，
你與師母，縱居在異邦，
我們亦必永不相忘。」

我衷心對窩福的弟兄姊妹說：蒙福的是我們，致謝的也應是我們，你們的愛和鼓勵，在我們有難時，毫無保留的相助；就是如今，雖然相隔兩岸，但你們的話永遠是我們的鼓勵和安慰！多謝你們，更多謝在天之父神！

第四十三章
風雨中的
中國教會

王志明牧師這個名字，在中國人當中，鮮為人知；但在著名的英國威斯敏斯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西大門上方，從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之塑像，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都是20世紀為信仰而殉道的信徒。其中一位便是中國大陸的王志明牧師。王志明與南非少女梅思默拉(Manche Masemola 1913-1928)，烏干達聖公會大主教魯溫(Janani Luwum 1922-1977)，俄國的聖伊底沙白(St. Elizabeth of Russia 1804-1918)，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得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波蘭神父聖國柏(St. Maximilian Kolbe 1894-1941) 等先賢同受敬仰。

王志明是居住在雲南省的苗族人士。談到苗人，這一個顛沛流離苦難的民族，其實是中國歷史悠久的老民族之一。苗族的先祖，初散居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之肥沃土地上，憑藉天時與地利，是其中最早進入農耕，又發明鐵器，率先運用律法的民族，他們其中著名的首領就是蚩尤；後為黃帝所敗，蚩尤被俘，在黎山被處死。苗族只有落荒而逃，由北走到南部。正如徐松石牧師之《粵江流域人民史》(1938第四章「苗蠻總察」有云：「威寧苗族作為整個苗族中的一個支系，是一個受壓迫最深的部落，是一個生活尤為痛苦的部落。」)

最後，他們被迫逃到雲南、貴州險惡的南地，就是在那兒，也是受到諸族的欺凌。20世紀初年，英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以其親身經歷，寫著說：「就地形而言，這是我在中國西部所見最為險惡之地，人們一聞此名，便不寒而慄。狹窄的道路，懸崖峭壁，路面不及一英尺寬。山崖之下，有奔騰咆哮的激流，路邊沒有任何保護之物。曾聞一戶人家，翻越滑沙坡時，一個12歲的男孩走在前面，不慎失足跌下懸崖，母親背著一個嬰孩，一聲恐怖的尖叫，因失去重心，也一同墜崖，父親見狀，喪魂落魄，也跟著跌下崖下之激流中，僅數秒之間，這一家全部命歸黃泉。他們就是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中。」

地是這樣，人又是如何呢？原來苗人並不只是唯一居於此地之少數民族，還有其他少數民族，如彝族。彝族就是苗族的地主，其上又有漢官，這不但是經濟的剝削，也是政治上的迫害，他們任意「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性。」正如一個英國傳教士悲忿的寫著：「任何人想到那個無知地區的山谷中，存在著如此殘酷的行為和深重的苦難時，都會陷入極度的悲痛感慨！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數千年的悲慘的經歷、艱苦的環境、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他們把貧窮、疾病、與死亡視為自己所無法逃避的命運，麻木、絕望成了他們民族的特性，只有在他們的無意識的底蘊中，強烈地渴望著可改變其命運的救星。

1906年，內地會的兩位宣教士，從澳洲來的郭秀峰醫生(Dr. Arthur Nicholls)及英國人王懷仁(George E Metcalf)從昆明騎著驢子，經過3-4天翻山越嶺，終於抵達苗人居住的村莊。剛好那年發生了瘟疫，幾乎每一家都受到影響，方圓十哩內都受感染，更因為下大雨，簡陋的房屋倒塌，那些地方人獸共住一室，衛生環境惡劣，以致傷寒疫症得以迅速蔓延，受感染的都死亡，死屍橫陳，情況嚴重；但這些傳教士不顧生命危險，明知山有虎，仍向山中行，冒死進入疫區。人家離開疫區，他們卻走進疫區，他們到了疫區，病的則醫，死的則葬，生的則協助他們重建家園，又教導他們衛生

常識，喝清潔食水，更幫助他們除去迷信的習俗。不少苗人因著他們的見證信了主，內地會亦在撒營盤鎮(Sayingpam)建立了他們的福音基地。

在內地會的教會中，其中一個信徒名叫王志明。王志明生於1907年，1921年開始在內地會創立的學校唸書，受傳教士栽培，1926年畢業，時為19歲，畢業後他任教於內地會學校，並協助傳教。在日治期間，郭秀峰等宣教士被派往另一工場，王志明便擔起教會牧養的工作。1944年並任撒營盤基督教聯會主席，在1949年時，大概有5,500信徒，這正是內地會推行本色教會的政策所得的結果。此外，王志明還編譯了苗文的「頌主聖歌」，在苗族中廣為流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有外國宣教士都被逐離開中國，王志明繼續負責牧養當地教會，並且加入了三自教會。但土改期間，他拒絕批鬥當地的地主，他以為他的雙手怎可以替人洗禮，又同時流人的血。結果他自己卻因此而被批鬥，教堂被關閉，所有聚會都受到禁止。他仍帶領會眾在山區中秘密聚會，但在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下，聚會很快便被取締，王志明亦被捕下獄，但不久獲釋。1969年，文革肆虐，王志明因反對信徒參加「三忠於」活動被捕，連同21名基督徒領袖入獄，在獄中受盡非人的虐待。1973年12月29日，66歲的王志明被判死刑，在當地萬人批鬥會上被槍決，槍決時舌頭被刺刀絞碎。在他臨死之前，當局批准他的一家最後與他會面，據王志明兒子說，父親臨終時，對他說：「你要好好聽「在上」(天父)的話，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多洗手，注意衛生，聽祂的話。」其實，這正是那些宣教士臨走時對王志明所講的一番話。1980年，大陸當局為王志明平反，並且賠償了\$1,300人民幣，又容許他的家人為他立碑於新墳上，1996年教會為王志明舉行追思禮拜，單是詩班便有2,000人，直至今日為止，教會增長至30,000人，更有百多個聚會所。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距離撒營盤鎮不遠的地方，便是英國循道會傳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所創立的石門坎。石門坎也是花苗人(苗族一支派)聚居之所。談起柏格里，是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在1985年，當時任貴州黨委書記的胡錦濤，高度讚揚他說：「公元1904年，一個名叫柏格里的英國人，來到貴州畢節地區威寧縣的一個名叫石門坎的小村，那是一個非常貧窮荒涼的地方。他帶來了投資，就在這塊土地上蓋起了學校，修起了足球場，還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併當地的老苗文，自編了「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這樣的教材，免費招收貧困的學生。後來一場瘟疫，當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卻留下來呵護他所愛的中國學生，最後瘟疫奪走了他的生命。柏格里去了，在中國一個荒涼的小村裏，留下了他的一個墓，留下了他培育出來的一代中華精英。有人統計這裏出過3個博士，培養出中共廳級幹部20名，他傳播了知識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獻和敬業精神。至今這個小村老人，儘管不識字，居然能說上幾句英語。柏格里用實踐告訴人們，進步的科學文化和艱苦創業，可以在貧困落後地區，實現教育的超常規科學發展」。

這個傳奇性的英國人，來到這個中國荒煙蠻瘴的邊陲，創下了一個奇蹟，確是一個感人的故事。柏格里出身於英國康沃爾，從小天資聰穎，本可以在英國過著非常舒適安逸的生活，但卻來中國這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邊陲，把耶穌的救恩與盼望分享給這些絕望的花苗人士。在短短的十多年間，把整個花苗族改變過來，90%的花苗人信了主，從1904年至1915年柏格里逝世的那一年，在石門坎的苗人創造了奇蹟，成為不少中國的第一：

- 出了第一個中國醫學博士。
- 第一間在中國的西式醫院。

- 第一間麻瘋病院。
- 第一間女子中學。
- 第一間設有游泳池的中學。
- 第一間的中國學校設有足球隊，其中有兩位球員曾代表中國國家隊。
- 創立了苗文字。
- 第一本苗文聖經。
- 第一本苗文詩歌集。
- 設有郵政局，所有信件，只要寫上「貴州石門坎」即可送到。

然而，自從中國解放以後，中國對基督徒採取強硬措施，直到目前為止，只剩下約5%的石門坎苗人仍稱自己為基督徒，其餘的苗人卻早已拋棄了他們的信仰了！但屬於花苗族的中國內地會所培植的教會，雖然他們同是受到壓迫，而他們的教會卻越來越興旺。到目前為止，這教會已增長至30,000人，更有個多聚會所。何竟這兩個教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呢？其實，不但雲南和貴州的苗人教會如是，我發覺整個中國也有類似的現象出現。昔日中國內地會最活躍的地方，也正是今日最多信徒的地方。何解？這是一的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更有趣的，就是在風雨中的中國教會，何竟在短短的30多年，會有如此驚人的增長？1951年，參加教會的人數約有80多萬，有2,155個牧師，8,508個傳道人，2,396個女傳道，19,497間禮拜堂，270間教會學校，262間基督教設立的醫院，40個基督教出版社。自韓戰爆發，教會開始受到壓迫，不少牧師，傳道人及信徒被囚在獄中，中國教會受到空前的浩劫，到了文革時，一間教會都不存在於中國！但奇怪的是，中國教會並不因此而死亡，其實是隱藏在山上、屋中等。1980年中國對教會稍為開放，80年代已有100萬信徒。時至今天，中國的基督徒數目竟達差不多9,000萬至1億，是教會歷史上驚人的增長。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所以，我決定在退休後，重返香港大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以我一個人屆差不多70的老人，重返校園，確實是一大挑戰。環顧周圍的同學，年紀較我的子女還要輕，而督導我的老師，亦與我子女的年紀相若，所以，首先要克服的是我心理的壓力。我肯定這是神給我一個絕好的機會，去研讀這一個有趣而有極重要的課題。我不求一定要學業有成，把研究所得公諸於世；而是盡力而為，一方面是滿足我的求知慾，一方面也希望對中國教會有些微貢獻。我這決定得到家人和弟兄姊妹極大的鼓勵和支持；我的女兒凱欣更慷慨提供經濟支援，以至我的學費有著落。有趣的是：在2016年我終於畢業了，凱欣來港參加我的畢業禮。當我們來到港大報到時，那招待我們的職員以為我是家長，來參加女兒的畢業禮。我連忙告訴她，我才是畢業生，這位是我的女兒，也是我的金主，是她資助我完成學業的。他聽了有點錯愕，半信半疑的走開了！

在研究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地方有兩方面：我不能把我研究的範圍定得太闊太廣；第二個問題是資料搜集的問題。中國內地會有異於其他宣教差會，他們的總部是設在上海而不是倫敦，一切資料、文獻、書信往來、開會記錄等都是收藏在上海的總部，但在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中，不少敏感的資料都因戰爭的緣故被毀，再加上屢次搬遷，失去了不少寶貴的檔案，以致對日後研究中國內地會歷史的人來說，起了一大問題。還幸不少中國內地會的宣教士，都喜歡把他們所見、所聞、及所經歷的記錄下來，發表在中國內地會刊物 China Millions，或是著書立說，這些書籍和刊物都在海外出版，故可保留到現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有一個部門，專收集所有有關中國內地會的資料，這給予我極大的方便。

其中薄復禮 (Rudolf Alfred Bosshardt) 的故事非常有趣，但又是鮮為人知。薄復禮1897年生於英國曼徹斯特，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華語及貴州土話，在加入中國內地會之前，曾受過兩年的醫學訓練。他在1922年

來到貴州傳道，並從事救災和收養孤兒等工作。1934年10月1日，他和一班宣教士參加完一個聚會後，在回家之際，途經黃平老城的舊州時，突然被一批紅軍第六軍團所擄。這支紅軍正是長征的第二方面軍，從湖南南入貴州，逃避蔣介石軍隊的追殺，負責領軍的是一個25歲的紅軍將領蕭克，薄復禮被擄共560天之久。

為什麼紅軍要擄走宣教士呢？中共的官方解釋是：他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者、是特務；然而蕭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卻坦言說：「我們扣留他們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考慮。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暑天行軍，傷痛日益增加，我們知道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和經費，提出的贖款是10萬元1個宣教士。」被擄的總共有7人，後來他們釋放了當中的兒童和婦女，只扣留3個宣教士，2男1女。最後又再釋放2人，只剩下薄復禮1人仍然扣留。據薄復禮所說，他常活在恐懼中。當賀龍一見到他時，劈頭第一句，就恐嚇他說：你要趕快叫你的總會提交款項及藥物，否則人頭落地，就好像我殺那兩個天主教的德國神父一樣。中國內地會一貫的政策，是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但為什麼他們又不殺薄復禮呢？原來蕭克要帶領第六軍團進入貴州去找賀龍，但他沒有地圖，貴州又山多難行，他帶領軍隊就好像盲頭蒼蠅，到處亂闖，結果只有在方圓幾里路行來行去，又被敵軍追殺，潰不成軍。後來到了石阡縣的時候，發覺在一所天主教堂內，有一幅非常詳盡的地圖，但可惜全是外文，部隊沒有一個人看得懂。他們最後詢問薄復禮，他一看便知這是法文，於是，蕭克和薄復禮兩人漏夜在一個房內，通宵把地圖的法文譯成中文。就是這樣，救了整個軍團的性命，他們不消3個星期便找到賀龍的部隊了。在那個晚上，當這兩個年青人翻譯地圖上的法文時，有機會款款深談。一個是為了基督而來到這貧窮的貴州，更被擄走，但一句怨言也沒有，這令蕭克將軍佩服得五體投地。經過了560天被擄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日子後，薄復禮終於無條件獲得釋放。臨走前，蕭克請他吃一頓豐富的晚餐，及一杯咖啡。30年後，蕭克仍然沒有忘記這位從英國來的宣教士，極力尋找他的下落。後來薄復禮把他在這560天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名為《神靈之手》The Guiding Hand的書，是第一本非常詳盡有關長征的史實，對研究紅軍長征的歷史，是有著極珍貴的價值。

在80年代，蕭克終於找到薄復禮的下落。原來他返回英國後，仍繼續向當地的華人社區中傳福音，蕭克主動為《神靈之手》中文版寫序，對薄復禮的人格和工作有相當高的評價。蕭克的命運又如何呢？他在抗日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雖然曾一度任職國防部副部長；但未幾，因被賀龍、彭德懷及毛澤東排斥，被指為「反黨不良份子」，被剝奪軍權，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勞改，生活非常艱苦；套用他的話，他的罪是「排錯隊」。1978年獲平反，但在六四事件中，因反對用坦克鎮壓天安門學生，又再被排拒。晚年，他只用心於教育事業，創辦《炎黃春秋》雜誌，企圖揭露歷史真相；但習近平上場後，《炎黃春秋》也被封口了。他所寫的一本小說《浴血羅霄》卻獲茅盾文學獎，他所編著的《中華文化通史》也是不可多得的著作。委實，他是一個又文又武的將軍。

在云云中國內地會宣教士中，像薄復禮這樣的故事，真不可勝數。包括開創者戴德生夫婦(Hudson Taylor)傳奇、劍橋七子的信心、橫越戈壁沙漠(Gobi Desert)多次，在絲綢之路各綠洲傳福音的蓋群英(Mildred Cable)、馮貴珠(Eva French)及妹妹馮貴石(Francesca French)三女俠、在雲南邊陲傣僳族的使女楊宓貴靈(Elizabeth Kulin)及她丈夫動人故事、殉道者斯達能牧(John and Betty Stam)夫婦的勇氣和忠心等。他們如同雲彩的見証人，圍著我們。不過，我對賴恩融(Leslie Lyall)特別感到興趣。除了因為他的勇氣，在日治期間，單人匹馬向日本當局抗議把教會改為妓寨，供日軍

蹂躪婦女之用，他更是中國內地會的「文士」，Michael Griffiths稱他為Mr.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因為他精通內地會的歷史。他留下不少著作，讓我們對中國內地會的歷史、策略、轉變更了解，而他自己亦是中國內地會的中流砥柱。他的睿智、勇氣、和卓見深深影響整個中國教會的發展。但可惜在學術界中，卻不受到重視。雖然他提供了不少有關中國教會歷史的資料和卓見，包括有關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和楊紹棠等中國教會領袖的生平和成就，但學術界中提到他的著作和成就真是鳳毛麟角。所以我決定研究這位身兼歷史、宣教於一身的賴恩融。我論文的題目是 *A Passion for a Greater Vision---the Role of Leslie T Lyall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 Missionary Fellowship* (熱火宏圖：論賴恩融在中國內地會/海外福音使團的歷史和扮演的角色)。

賴恩融生於1905年於英國Chester，父母都是蘇格蘭人。父親是一位傳教士，經常在印度、美國和澳洲主領培靈奮興佈道會，所以，當賴恩融還是年少的時候，已經跟父母走遍天涯，亦目睹千千萬萬的人在佈道會中決志信主。怎料，他5歲的時候，父親突然患病去世。父親死後幾個月，母親因種種原因未能照顧小孩，這創傷令他對生離死別有著一種莫名的恐懼。後來母親改嫁給Arthur Watts，Watts是一位數學天才，但他的夢想是開辦一間基督教學校，即後來的Kingsmead School。賴恩融在Kingsmead畢業後，考進了劍橋大學。在大學期間與J.B. Phillips(著名的英國新約聖經學者)一同創立劍橋的Inter-Varsity Fellowship。IVF對整個世界的校園福音工作影響極大。到了1929年，他加入中國內地會，與200個新同工進入中國傳道，一直至1951年才離開中國，但仍在內地會(改名為海外福音使團)事奉，專心從事訓練、寫作和宣教的工作。他的著作等身，其中以 *Come Wind Come Winter, 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1960),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865-1965* (1965), *God Reigns in China*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1985), *Red Sky at Night: Communism Confronts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70), *New Spring in China* (1979), *John Sung* (1954), *Three Mighty Men in China* (the biographies of Wang Mingdao, Watchman Nee and David Yang) (1973) 等。此外，他還寫了很多報告、見証、文章於 *China Millions* 上，都是極珍貴的資料。他和妻子祝美蘭 (Kathryn Judd) 育有 3 女 1 子，於 1996 年逝世，享年 91 歲。

賴恩融在中國期間，主要可分為 3 個時期：山西時期，貴州時期和北京時期。

山西省位於大漠之南，黃土之原，是中國文化發源地，歷史悠久；但因黃河屢患水災，導致飢荒出現，1875 年的水災，引至 75% 的居民餓死。然而，山西也是福音之福地，著名的中國傳道人席勝魔便是以山西為他的福音基地。中國內地會很早便來到山西，劍橋 7 子中的何斯德 (Dixon Hoste) 長期與席勝魔在山西展開福音工作。在義和團事件中，山西是一個重災區。賴恩融在山西期間，從師楊紹唐牧師，以致他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及中國人的思想有深的認識。山西也是紅軍出沒之地，在 1935 年，賴恩融及其他內地會宣教士曾受紅軍侵襲，在最後緊張的一刻，獲得營救。在日治期間，他仍留在山西牧養教會。其間所經歷的驚心動魄。

- 他的太太分娩時，遇上日軍飛機在上空轟炸，醫院周圍烽火四起，驚險萬分；但神保守了她們，母女平安。
- 日軍強奪內地會一禮拜堂，改為妓寨，供日本軍人蹂躪婦女之用。賴恩融單人匹馬，不顧生命危險，走到日軍總部抗議。想不到日本軍官卻答應歸回物業給教會。

- 有一回，有一個自稱是抗日游擊隊的人來投靠他。賴恩融發覺他並不是操山西口音，引起懷疑，拒絕請求，後來果然發現這人是日本派來的間諜來試探他們。
- 與賴恩融同工 Dr. Gordon Anderson 是內地會 Luan Hospital 的醫生，在診治病人時，不幸染上傷寒，不治離世。事實上，內地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不少都是染上傷寒而身亡。
- 但有趣的是，紅軍主帥朱德的太太患重病來內地會醫院求診，醫生把她從死亡中挽回生命。其實不少第八軍的傷兵也是得到內地會醫生的治理。朱德為了感激他們，特地送了一個古董花瓶作為酬謝，他又常請教內地會的醫生和傳教士如何處理軍中同性戀者的問題。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內地會的總幹事華福蘭 (Frank Houghton) 誤信中共對內地會友好和尊重，因而拒絕在 1950 年從中國撤退宣教士。直至 1953 年發現形勢並非如此，才決定急忙撤退，因而引起混亂，他日後的離職相信與此有關。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日本正式與盟軍宣戰。賴恩融被派往貴州的貴陽，開始他第二階段的事奉。在這個時期，中國內地會改變了宣教策略。起初的策略，是針對內地的草根階層，放棄學生工作，致使學生工作為一些自由派教會所主導。但到了 1937 年，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教師離鄉別井，來到西北大後方雲南和貴州貧窮之地，人生路不熟，語言又不通，文化亦有差異，經濟困難，在逃難中不少死於日機之轟炸、土匪搶掠、及疾病侵擾，流離顛沛，真是人間慘劇。不少內地會宣教士，包括艾得理 (David Adeney)，孔保羅夫婦 (Paul Contento) 及賴恩融等開始投身在學生工作中。不少大學生感到人生空虛，生命朝不保夕，對基督教信仰極感興趣。在不同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校園中，團契、查經班紛紛建立，短短幾年間中國學生團契成立(China Inter-Varsity Fellowship)，並發展成為世界人數最多的學生團契。賴恩融在貴陽的醫學院開設查經班、崇拜等，發展非常迅速，但在這個時期，他不幸染上傷寒，幾乎喪命。但神保守他康復過來，預備他日後在北京大展拳腳，在北京各大學推廣福音工作，大大影響整個中國。

1946年初，8年抗戰結束。一般中國人滿以為飽受了8年艱辛的抗戰，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這應該是有昇平的日子了！而當時的外國傳教士，以為可以大展拳腳，昔日中國以為傳教士是帝國主義侵略者，但在抗戰期間，英美與中國聯合抗日，成為盟友，以後應該是傳教士的黃金時期。雖然共產黨興起，但實力遠遜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民黨政府有340萬軍隊，又得美國大量支援，擁有3億人口的地區；反觀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只有120萬士兵，佔領地區只有1億3千萬人口，雙方實力懸殊，因此蔣介石當時曾經極樂觀地宣布：國民黨可以在3個月內消滅中共軍隊；但賴恩融卻不以為然，獨排眾議，預測共產黨將會勝利。因為在抗戰期間，他目睹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紀大有差別，他以為國民黨是無法在戰後管治得妥當，也未必有能力在經濟上、管治上和軍事上佔優。他更預言共產黨執政後，傳教士不再受歡迎，教會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壓迫。正因為他有如此的睿見，就積極預備這未來的挑戰。

首先他揀選最戰略性的地方作為他的根據地---北京；又揀選最戰略性的群體---北京的大學生。那兒有很多頂尖兒的大學：北大、清華、燕京、協和醫學院等著名大學做學生福音工作，因而揭起了前所未有的基督徒學生復興運動。他訓練那些有潛質的大學生，成為領袖，賦予他們領導權，在校園策劃福音工作，他又與王明道合作，從旁協助。他們很聰明，並沒有加入全國性的中國基督徒學生團契，組織也不嚴謹，極富彈性。他鼓勵

那些畢業生到邊陲之地，如雲南、貴州、新疆、蒙古等地，散佈整個中國，其中著名的《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作者邊雲波，就是一個好好的例子。他又與他們一同禱告與查考《彼得前書》《後書》，預備他們怎樣面對將來的壓迫和痛苦。他又組織學生在國共內戰中幫助從北方逃難下來的學生，招待他們食宿，領他們信主。就是因為他的眼光，為中國教會奠定一個極好的基礎，以致日後幾十年風雨飄搖之際，成為美好的見證。

由此可見，眼光是非常重要。我們要洞悉我們是活在一個怎麼樣的世代，這世代給我們什麼標記 (signs of the time)。正如耶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24節說：「你們看見西邊起了雲彩，就說：要下一陣雨；講完就有了。起了南風，就說：將要燥熱，也就有了！假冒為善的人哪，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傳道書也說：「智慧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各樣事務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時候和定理 (time and procedure) 正是每一個卓越領袖具備的先有條件。無可否認，北京的學生運動影響極深，王怡牧師以為今日中國的家庭教會，多少是受北京大學學生團契的影響所致；台灣及香港的學生工作，也是中國學生復興之延續。這是賴恩融在中國最後，但又是最具影響的一個階段。

經過了3年窗下研讀，在導師、家庭及眾弟兄姊妹的支援下終於完成學業。那麼我研究的結果又是如何？何以中國教會在風雨飄搖中有如此驚人的增長？何以內地會所建立的教會能經得起狂風暴雨的侵襲？何以在我心目中是個卓越的中國教會史作者為學術界所以輕視？我的研究結果能否給予上述的疑問一個合理的答案呢？

首先我要談談歷史與神學---一個基本的課題。很明顯，賴恩融的歷史觀是深受他的神學所影響。正如在他那本 *God Reigns in China* (1985) 的自序中有云：「這本書是根據作者的探索、記錄、經歷尋索上帝在20世紀在中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所作所為。現今中國教會之迅速增長，絕非偶然，而是神作為的結果；無論是政治或宗教的進程，一切都掌握在神手中 (page 16)」。對不少歷史學家來說，這種歷史觀難以接受。正因如此，賴恩融的著作不受到重視。那麼，我們會問：基督徒的歷史觀是怎樣的呢？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Tom Neattles贊成賴恩融的看法。他以為每一個人的歷史觀都受他的世界觀、神學觀所影響。有神論者相信神是掌管世上一切的歷史進程，無神論則相信這一切都有自己的歷史及社會因素。歷史就是歷史，神學就是神學，河水不犯井水，絕不可混為一談。但作為一個基督徒的歷史學家，又怎能站在一個無神論的立場去闡釋歷史進程呢？但不少基督徒歷史學家卻不贊同Tom Neattles這看法，Westminster神學院教授Carl Trueman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以為歷史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層面看：一是個別(particular)，一是普世(universal)。就以911事件為例，如果我們說這事件的發生，是神的作為和計劃，這就好像說：世貿大樓之倒塌純因地心吸力之故，這是極其荒謬的說法。地心吸力是普世因素，而911是個別事件，以普世原則去解釋個別事件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耶魯大學的Harry Stout教授的看法則較為客觀，他把歷史分為兩類：Mundane History (人導歷史)和Providential History(神導歷史)，所謂Mundane History是以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等因素來闡釋歷史進程，無論你的宗教信仰是什麼，你都以此為金科玉律去研讀歷史。Providential History則以為這一切都是神的導領下發生的。

其實，這問題並非這麼複雜。就如一個基督徒醫生，他既相信人的生命是操在神的手中，但作為一個醫生，他絕對不會不使用他的醫學常識與技能替病人診斷，找出病因，對症下藥，加以醫治，他的專業絕對可以與他的信仰並存。如果一個基督徒醫生，為他的病人禱告，因為他相信人的生命

始終都在神的手中，便被批評為不夠專業，這是極荒謬的。相反來說，若一個基督徒病人，因他的醫生是一個無神論者而拒絕接受治療，也同樣是荒謬的。所以，我們若以賴恩融的神導歷史觀而輕看他的著作，同樣是荒謬的。我們要問的是：究竟他著作有什麼歷史價值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

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尋找到中國內地會在過去140年一些重大策略上的改變，而這些改變是合宜的，適切的，並且帶來巨大的影響。當戴德生(Hudson Taylor)開始中國內地會時，他的焦點是傳福音，希望在最短的年日中，把福音傳遍整個中國。他大膽起用單身的女宣教士，在286名宣教士中，有120名是單身女士，他們深入內地農村、小鎮裏傳福音給婦女和她們的家庭。他的策略是針對中國內地的草根階層，而非追隨明清時代天主教傳教士，在京都的皇室中人和士大夫階層工作。前者是bottom up政策，後者是top down政策。再者，整個傳福音的動力在於外來傳教士，對本地的領袖訓練似乎是忽略了。

自從何斯德(Dixon Hoste)承繼戴德生(Hudson Taylor)後，他的重點和策略明顯地改變了。只要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便顯而易見。在戴德生(Hudson Taylor)時代(1885-1899)共建立了534個福音站，但到了何斯德年代(1927-1936)只有104間新福音站成立；然而我們若以水禮的數字來計算，戴德生(Hudson Taylor)時代共有21,000人受洗，但在何斯德年代，超過60,000人受洗；內地會教會人數達95,000人之多，佔整個中國信徒20%。這數字反映了一個現象：何斯德的重點並不如戴德生，他不只是廣設福音站，他是一個專業軍人，一如打仗，戰略要運用得宜。他一上場，便聲明要重視教會的成長，為達此目的，採取下列策略：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栽培本地信徒擔起牧會的責任，宣教士只是從旁協助。
楊紹唐牧師便是在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領袖，對整個中國教會影響甚大，他又設立「靈工團」，與內地會宣教士合作，一同訓練本地牧者。
- 內地會所建立的教會都是獨立教會，他們沒有任何計劃在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宗派。事實上，內地會是一個不分宗派的差會，他們只重視中國教會本色化，而不是把西方的宗派文化強加於中國教會上。所以我們看到貴州的苗人教會，他們有苗人聖禮、苗人聖經、苗人的敬拜方式、苗人領袖。中國學者張坦，以為這是內地會成功之道，並解釋了為什麼在邊陲的苗人地方，內地會在風雨飄搖時仍然屹立，但循道會的石門坎卻經不起暴風的來臨。（參看《關門前的石門坎基督教文化與川、滇、黔邊苗族社會》p.273-280）
- 何斯德看到宣教士的角色，並非中國教會的領袖，而是夥伴。賴恩融的那本Three Mighty Men in China (1973)列出了3種夥伴的形式：楊紹唐是代表內地會培育出來的領袖，然後與內地會宣教士成為夥伴建立「靈工團」，訓練本地信徒成為教會領袖。王明道是另一種形式，他不是內地會培育出來的牧師，但卻與賴恩融等為夥伴，在北京的大學團契負起校園的福音工作。倪柝聲又是另一類，不少內地會成立的獨立教會，要求加入倪柝聲的小群教會，成為彼此合作的夥伴。內地會亦與陳崇桂牧師作夥伴，開設聖經學院，訓練中國教會的牧者。內地會不談門戶，不排斥同路人，這是他們成功之處。

- 到了1937年，內地會看到整個中國在抗日期間的演變。總幹事華福蘭(Frank Houghton)看到學生工作的重要性，便委派艾德理牧師與趙君影牧師為夥伴，創立中國學生團契(China Inter-Varsity Fellowship)。而賴恩融更具有獨特眼光，在北京的頂尖兒大學中開始學生團契，又鼓勵他們畢業後到中國各地，特別是西北邊陲之界，散播福音。這是內地會獨到眼光，改變策略，適應時代，預備將來，這是中國教會增長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賴恩融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有獨特之處。他並不是搜羅大堆文獻、記錄、數據加以分析、研究而寫成的著作，而是講述一個一個在中國教會歷史中的動人故事；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的，並非冷冰冰的歷史數字，而是有血有淚的真實社會和教會的情況，道出他們的心聲、掙扎、受苦、喜樂、生離死別、得失成敗、有歡笑、有眼淚、有軟弱、有跌倒。這樣的歷史較諸那些所謂學術性研究來得更有人性、更為真實、更令人感動和認同。賴恩融具有堅定的立場，在諸般的攻擊中，仍屹立不疑，獨排眾議。在他那本*God Reigns in China*一書中，提及在1974年他與70多個歷史學者、神學家在比利時開會，他是唯一的福音派代表。會中幾乎所有代表都同聲讚揚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英國學者Dr. Joseph Needham更認為中國是世界唯一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國家。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西方學者才開始體會到他們是錯了，賴恩融所說的才是真相。

作為一個宣教士，賴恩融一如眾多的內地會宣教士，都承繼了戴德生的犧牲精神。他們的勇氣、信心、對中國人的熱愛、對福音的熱誠、對神的忠心，極得中國人愛戴。內地會宣教士的個人操守、犧牲精神、和儉樸生活都是內地會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非常感謝神，在退休之後仍然有機會進修，更想不到在短短3年之間便完成學業。在此期間我有機會到大陸探訪昔日內地教會牧會的老牧師及一些會友親戚，他們在風雨飄搖教會中的掙扎和成長，不但給予我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提供不少寶貴資料；我本人亦深深受感動，開啟我對中國近代史的興趣，讓我在日後有機會在電台中，文章中分享我對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教會史的認識和領受。我想到約翰本仁(John Bunyan)，在他那本名著《天路歷程》的一首聖詩，正是賴恩融一生的寫照，也是中國教會的寫照。在《風雨中的中國教會》(Come Wind, Come Weather)一書中，他的名句是：「目前的幽暗不是日暮，而是黎明前的黝黑。」對我們一班香港人來說，真是極大的安慰。

He, who would valiant be 勇敢的他
 'Gainst all disaster 戰勝一切災難。
 Let him in constancy 他始終如一
 Follow the Master. 跟隨上主。
 There's no discouragement 沒有任何事情
 Shall make him once relent 叫他氣餒
 His first avowed intent 他首要的渴望
 To be a pilgrim 就是作個朝聖者
 Who would valor see, 誰願意看到，
 Let him come hither, 讓他過來，
 One here will constant be 這裡的一個將是不變的
 Come wind, come weather. 風雨中的教會。

第四十四章
一宿雖然
有哭泣
早晨便必
歡呼！

我們繼1985年首次離開香港，移民美國，2013年又再次離開香港，橫越太平洋，返回美國加州定居。這兩次的離開，心情很不同。在我們離開前，有窩福的弟兄姊妹訪問我們，談談我們兩次的心境有何不同。我對他們說：「1985年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2013年卻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1985年，適值香港面臨97的問題，不少香港人都打算移民。在這移民浪潮中，我們決定離開香港，自然受到批評和指責，說什麼“船長棄船”。儘管面對這樣的流言蜚語，我們一家卻能“輕舟已過萬重山”，因為我們是有目的決定了這一步。我當時面臨的抉擇，就是：究竟是看重家庭，還是看重自己的名聲。當然，我毫不考慮便選擇了前者，舉家到美國，開展新的一頁。但這回卻有點不同，弟兄姊妹體諒我們的離去，是為了失去母親的孫兒，亟待我們的照顧。我們自己反而多了點掙扎，面對著未知的前景，其中一個最大挑戰，就是與兒子的相處。他太太突然離世，心情惡劣，對神極表憤怒，加上工作壓力，法律訴訟，照顧兩個幼小兒子的壓力，孤單寂寞，情緒不穩，可以想像與他相處是一大挑戰。再加上三藩市教會，這十多年來改變甚大，要從新適應，真是不易。君玉亦有同感，她說：“其實我們不是太想離去，我自己在工作上也有點成就，同事也捨不得我離去，在教會裏也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所以更加不捨。可以說：這一次缺了一點興奮，多了一點焦慮。”面對著離別之愁，難免不捨。我們知道窩福弟兄姊妹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的支持，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期望他們多多來信，彼此支援。正因如此 所以我說：這一回真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神的恩典真是奇妙！我們回美之際，也正是美國房產的低潮，但似乎開始有回起的跡象。2012年，我們為了回美作準備，特來三藩市看看住屋的情況，想不到在短短三星期內，便買得一間位在三藩市東郊Pleasanton的獨立屋，距離兒子的家不過是十分鐘的車程。回首看來，在短短這幾年間，屋價幾乎漲了40%！若是我們稍後回美置業，相信是無法負擔得起。

談到我們的新居，倒有一些趣事。我們後園種了一棵非常高的橡樹，這樹的年齡頗高，樹根蔓延很闊，恐怕大風會吹倒，這嚴重威脅我們。在此要申請砍樹，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市政府亦不輕易批准。所以我們一到步，就立即申請，想不到市政府立即派人調查，竟然批准！我們連忙聘請專人，把大樹砍下，連根拔起，整間屋也變得光猛起來。

我們隔離鄰舍都是白人，非常友善，我們很快便成為好朋友。其中一位鄰居，他的太太是我們孫兒所就讀那間小學的老師。所謂遠親不如近鄰，有如此善良的鄰居，是神給我們一大福氣。在我們家附近是一個大公園，綠草如茵，又有供兒童玩耍的鞦韆、滑梯等，這既是我們晨運的好去處，也是孫兒的樂園。起初我們帶孫兒到此樂園時，看到的大多是白人小朋友，但隔了3數年，越來越多看到從中國大陸來的家庭，他們的爺爺、嫲嫲、或公公、婆婆，帶著小孩到公園玩耍。在傾談中，知道他們是從中國來訪他們子女的父母。每期6個月，先是爺爺、嫲嫲來，後6個月是公公、婆婆來。他們的子女，多是在這幾年來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任職，需要父母從中國來照顧孫兒。我有機會與他們傾談，其中不少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對中國政府頗有微言，也不大鼓勵他們的子女回國。然而，自從

中美關係趨於緊張，忽然間這些來自中國的公公婆婆都不見了，取而代之是不少印度人。在我們這社區中，印度人佔了一大比數，我們的家庭醫生、牙醫都是從印度來的，這就是美國的特色，尤其在加州的矽谷，不少都是移民家庭。

起初，我們每星期有4天須照顧孫兒，接他們放學，在我們家中吃過晚飯後回家。後來兒子再婚，我們比較有空。君玉決定重操故業，在三藩市市中心租了一個辦公室，作心理輔導的工作。我除了寫論文外，每星期有3天返回三藩市播道會事奉，任半職的署理主任牧師。在過去的10多年來，三藩市華埠有極大的轉變。首先，整條街都是擠滿了操廣東話、台山話、中山話的新移民。記得在1970年初的時候，差不多有一半的華埠居民都是操英語的土生華人，到了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多了不少從越南及香港來的移民，但到了2000年代，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舉頭一望，發覺掛中國五星旗的較諸掛美國國旗的還要多，有一位從外州來訪我們教會聚會的美國人，笑著對我說：我以為自己是來到了中國！我們不能不承認，華埠的文化已經大大改變了！昔日華埠的香港或土生家庭，當孩子長大後，結婚生子，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大都會遷往南灣或東灣的衛星城市居住。留在華埠的，多是老華僑和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這些新移民大多不懂英語，他們的孩子在學校也未能適應美國生活，引起不少的社會問題。有些男士，因未能適應美國生活，就返回中國大陸賺錢養家，讓妻兒留在三藩市掙扎，難怪不少移民家庭都好像單親家庭一樣。

華埠的教會似乎未能適應這改變，也未能看到這些新移民的需要而伸出援手。一方面是因為人手不足，教會的年青人一旦進入大學後，大多數不再返回華埠的教會了。不少教會亦開始遷離華埠，近者遷到日落區、列治文區、Outer Mission區，遠者則遷至南灣或東灣。就以我們播道會為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英文堂遷至日落區，成立了Hop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一部份粵語堂會友，則在日落區成立Grac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此外，我們在Fremont亦成立了Fremont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又在Belmont成立恩信播道會，結果留在華埠教會的只有一半人，而且大多是長者或是從中國來的新移民。1989年，三藩市發生大地震，那條直通往華埠的480高速公路斷了，政府決定不再重建。而捷運火車(BART)及電動車(Street Cars)都不直接通往華埠，昔日從灣區各處來華埠趁墟的人士亦不在出現了！再加上華埠泊車困難，交通不方便，華埠好像與灣區隔絕了！相反來說，在南灣與東灣的亞裔人士比率激增，有不少華人超級市場、餐館、零售商店等紛紛出現，而且品質更勝一籌，如此來華埠的意欲大大減退了！當時我要面臨一個抉擇：究竟是返回華埠播道會？或是在Pleasanton發展一個新教會呢？最後我們還是決定回華埠教會，但同時在我家開始一個查經班，給附近操廣東話的人士參加。

我們在華埠播道會的情況，除了上述的因素，我們發現還有不少困難。首先是路途遙遠，由我家到三藩市華埠，自己駕車也需時3個多小時來回。每星期日，天還沒亮就啟程回教會，下午回到家裏，差不多太陽下山了！由於路途遙遠，根本上談不上什麼探訪或個人關懷。不過這倒不是最困難的地方，令我感到沮喪的是我和一些教會領袖在牧養的理念上不同。他們都是愛主的基督徒，雖然大多數都不是住在華埠，是因為異象和愛主愛教會的心，老遠跑到華埠的教會；但他們以為教會應由長執們領導，而不是牧師、傳道人領導。什麼事情、無論大小都要先得執事會同意，才可進行；甚至如水禮的主席、司琴的編排等小事，也須他們過目。我對這種牧會方式不苟認同，因而引起衝突。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對美國播道會的體制並不熟悉，不知道作為一個會眾制教會，執事會是要向會眾負責任的，會眾才是整個教會的權力核心。但他們卻把會眾分為「活躍會友」和

「非活躍會友」，凡缺席崇拜超過 50% 的，被列為非會友，喪失參加會友大會的權利。如是者，不少在三藩市以外大學讀書的年青人，或是家人有病痛未能經常參與崇拜的，都喪失了投票權。我極力反對這做法，指出這是違憲的行動。有領袖向我解釋說：「三藩市播道會有異於香港的窩福堂，他們靈程生命幼嫩，若把所有重要決定都交付在會眾手中，只能造成混亂的局面。」我對他說：「我明白不同教會有著不同的體制，我並不是論斷誰是誰非。不過，我們既然是屬播道會，是會眾制的教會，而不是長老制的教會，就當依著播道會的體制行事。」因我據理力爭，他們終於願意更改章程，但我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已打了折扣。我有見及此，便向執事會請辭署理堂主任一職，解除「僱員」與「僱主」的關係，但我仍以義務顧問牧師的身份，一如以往負起牧養的事工。

回想那一段日子，心靈不免受到創傷，甚至有一種失敗感。有時想退出，一走了之，一了百了。我們最終堅持留下，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仍看到神奇妙的恩典。計算一下，在這段時間，信了主的人也不少，其中不少是參加了我們的福音性研經班。他們有老有嫩，也有從中國來的婦女，他們都喜歡君玉所教導的主日學，我們又怎能忍心把他們拋棄呢？再者，三藩市華埠雖然有這麼大的轉變，但仍不失為一個非常挑戰性的福音禾場；每期的福音性研經班，三樓辦公室都坐滿了慕道者，這真是給人極大的鼓舞。此外，有不少仍是滿有熱誠和異象的弟兄姊妹，期望著我們再次帶領他們打這一場屬靈的爭戰，我們又怎能捨他們而去呢？每星期二，我都返教會主領「天南地北」聚會，先有拉筋運動及營養講座，然後我與他們以基督徒眼光論述當今的時事、歷史、中國文化、心理健康等等，每次都有幾十人參加，其中有不少參加了我們的福音性研經班及星期日的崇拜。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正如上述，我們在2014年開設了一個家庭查經班，邀請一些在我家附近的朋友參加。想不到參加者越來越多，在家中的客廳坐滿了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他們的教會並沒有查經班，於是便來參加。我們更在查經班後，一同聚餐，既可享受大家所預備的美食，更可以有更多的團契時間。這個查經班竟成為我們一家的支柱，當我們有困難時，他們拔刀相助，給予我們極大的鼓勵和實際扶助。雖然播道會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對我們很關心，但始終遠水不能救近火，但這查經班的弟兄姊妹卻往往成為我們支援系統，為此我們感到非常感恩。

2017年我的身體起了變化，醫生檢查我身體時，發現我患上了前列腺癌。此病屬常見癌症之一，發病率逐年上升，相信與人口老化有關。這病並沒有明顯病徵，唯一可診斷這病的方法就是檢查PSA，中文稱「前列腺特異抗原」，此乃前列腺所分泌的蛋白，正常人的PSA低於4，但我的PSA卻升致7，於是提議我照MRI，後再經活組織檢查(biopsy)時，證實是患上早期前列腺癌。大部分前列腺癌屬低毒性癌病，生長比較緩慢，不少患者確診後幾年仍未有病徵，患此病的以長者居多，我得悉此病，心裏是有點憂慮，醫生告訴我有3個可行的方法：

- 選擇定期觀察不作任何治療，一般病者在10年內都可能平安無事。
- 選擇「放射性治療」(Radiotherapy)，包括「短距離放射治療」(Brachy Therapy)及「質子治療」(Proton Therapy)，一般病者在15年內都可能相安無事，但使用這方法的，一旦復發，就不能再以此方法或外科手術治療了。
- 選擇「激進前列腺切除手術」(Radical Prostatectomy)，並使用輔助機械臂進行手術，可以更精準。一般病者可以存活多15年

以上，日後若復發，亦可採取放射性治療。

醫生以我的年紀和健康狀況來看，提議採用激進「前列腺切除手術」，在史丹福醫院進行，經過兩日留在醫院，便可出院回家休養了，6星期後，一切都似乎恢復得正常。怎料，當我參加一個夫婦營，負責講道，發覺有些氣促。起初，以為是天氣炎熱所致，並不加以理會，然而這種情況繼續沒有好轉，且有惡化的跡象，最後還發覺有微燒，於是便去看醫生。醫生從X光照片中，發現我有肺炎的跡象，便處方抗生素給我治療，但似乎沒有任何功效，便轉介我給一個胸肺科專科醫生。經過初步檢查，懷疑可能患了COP。這是一種比較罕見的肺炎病，便處方類固醇給我服用，果然奏效；但肺部仍有雜音，沒有完全康復，還是要繼續服用類固醇，但可以開始漸漸減藥。忽然一天，我感到極不舒服，氣喘、而且發燒，於是便入院治理，怎料病情急轉直下，到了晚上，我往廁所的時候，雖是短短數碼之遠，但已覺得氣喘如牛，血的含氧量降至90以下，睡在床上，不住顫抖，很不舒服。醫生連忙把我轉往深切治療室，並且處方更強劑的類固醇。感謝主，這果然奏效，我的血含氧量升至94或以上，燒也退下來，只是感到非常疲倦，因著服用類固醇之故，血糖升至300，要用胰島素壓抑血糖的高升。在醫院住了個多星期，才出院回家休養。

COP這個肺病，是比較罕見的疾病。從前稱為 bronchiolitis obliterations with organizing pneumonia，簡稱為BOOP，因支氣管、肺泡發炎所致。究竟為什麼導致炎症呢？到目前為止，醫學界仍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所以稱 cryptogenic，這個字就是「未知」的意思。是一個比較不容易診斷出來的疾病，嚴重的可導致肺部永遠受損。COP病症有：

- 乾咳
- 發燒、顫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氣喘
- 疲倦
- 體重銳減
- 失聲

我幾乎有齊上述的病徵，體重減了差不多 20 磅，唯一治療的方法，就是服用類固醇 (prednisone)。我服用類固醇有 6 個月之久，又經過 3 個月的康復運動，大致上已得到完全康復；而血糖方面，經過醫生調理及適當運動，大致上已回復正常，體重也有所增加。我記得大概經過 3 個多月的治療，在一個主日，在附近一間教會參加崇拜，突然我發覺可以開聲唱詩讚美神，我頓時不住流淚。原來能開口唱詩讚美神，是何等幸福！

回想這段日子，真是驚心動魄。這是我首次患上這樣嚴重的疾病，而且是來得這麼快。還記得那天早上，我還可以在三藩市的斜坡上山，去接受針灸治療，但到了傍晚，行幾步路都氣喘如牛，吸一口氣是這麼困難！人的生命，就是如此脆弱，真是匪夷所思！在辛苦之際，全身抖顫，拼命吸氣，無法控制，其實，那時醫生已經給了我 10 度氧氣呼吸，在辛苦之餘，不禁想著：死亡或許是一大解決。但一想到離開自己妻子及家人，就悲從中來，忍不住落淚。只有默默呼求神憐憫，把自己生命交在祂的手中。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在這幽暗的日子中，我們卻飽嚙來自神和弟兄姊妹的安慰。當我入醫院的時候，病況還未穩定，君玉只有她一人獨自在家中，既憂慮，又孤單。教會一位姊妹，竟然漏夜駕車來到，陪伴君玉，令我們感到非常感動。在我養病期間，無數的電郵、書信、電話來自世界各地，不少弟兄姊妹特別為我們懇切禱告。香港的《時代論壇》，更刊登了我患病消息，呼籲信徒為我們一家代禱。更令我們感到安慰的，是女兒凱欣特別自己駕車，從羅省來到家中陪媽媽，又與我的主診醫生

聯絡。她是一名內科醫生，對COP這個疾病頗有認識，因此更掌握我的病況，向我們解釋、鼓勵我們加油，她又買了血氧儀(Oximeter)和血糖儀(Glucose Meter)給我自我測驗。我們為到她和她的家感謝神，當然我更感謝神，賜我一個好妻子。君玉非常能幹，又能自主，但同時尊重我和關懷我。記得入深切治療病房的翌日，君玉來探我，分享說：在早上靈修的時候，看到一節詩篇，感到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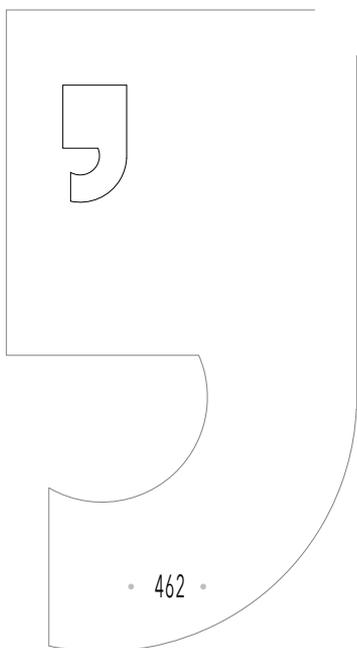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果然星期一是轉變期，醫生用強劑的類固醇注入體內，果然燒退了，呼吸也開始暢順，並且在星期二進行肺部重要測試，經過臨床觀察、電腦掃描、Bronchoscopy，認定這是COP復發的跡象；至於為什麼我有如此突然變化呢？他們以為大概是因為類固醇不夠分量及我有兩天沒有服藥所致。當醫生加重劑類固醇時，身體立時有所反應，退燒，氣促也減少。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這首傳頌千古的《水調歌頭》，是他在中秋之夜，表達對胞弟蘇轍的無限懷念，生離死別的確是人生一大悲痛。我又想到蘇軾另一首懷念他妻子王弗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面對著生離死別，有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傷感和矛盾。蘇軾曾因烏臺詩案被奸人陷害而入獄，他面對著死亡的威脅，令他難以忍受，預備服毒自殺，了結一生，但他又很想活著；蘇軾若不是皇太后曹氏及王安禮等人營救，他早已命喪黃泉。我在這次病痛中，也體會到蘇軾的如此矛盾。一方面在病痛艱難之際，真想早日離去，與主同在；但另一方面，一想到妻子及家人，又很不想死。我相信這張力是健康的。過份想死和過份不想死，都是有問題的。保羅在腓立比書說得好：「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要緊。」保羅與蘇軾之不同，是因為保羅有永生的盼望，死亡對他來說：「是與基督同在，這是好得無比。」但他為著所愛的人，更願意繼續活下去。而蘇軾只能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當我還未完全康復的時候，有弟兄來探我，我就半開玩笑對他說：我這回搖身一變，竟作了蘇軾。但請不要誤會，我不是指作了才子蘇東坡，而是指“So Sick”。我們都笑起來！但其實，我是非常感謝神，讓我經歷祂奇妙的恩典。



第四十五章
癩腿能行
瞎眼能看

上一章，我把蘇軾與So Sick相提並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蘇軾的詩詞，的確給我不少人生的啟迪，而So Sick的經歷亦給我生命力去面對人生的風風雨雨，尤其自2013年回美定居。正如我上一章所提及我患重病的經歷，走過死蔭的幽谷，嚐過神拯救的滋味。這一章，我要談談君玉在這幾年間，經歷了6次手術，及一次染上新冠病毒的驚險歷程。讓我們真正體會到耶穌所說的「癩腿能行、瞎眼能看」的奇妙恩典。

先談談蘇軾。中國有一本名叫《西湖志餘》筆記小說，其中一篇記載了蘇軾的故事。有一天，蘇軾遊西湖，看見一位名叫琴操的名歌妓。這女子不但貌美，而且非常有學問，於是這位風流才子蘇軾，便提議和琴操玩一個悟道遊戲。蘇軾首問：「湖上景色如何？」琴操即引用王勃的《滕王閣序》答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蘇軾連聲叫好，再問道：「那麼景中人又如何呢？」琴操不慌不忙，引用了李群玉詩句：「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蘇軾在驚嘆之餘，最後問道：「然之後又如何呢？」琴操啞口無言。蘇軾就替她回答，引用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無論琴操是如何美麗聰明，一想到這兩句話，頓悟到繁華過盡，總是空空如也，禁不住落淚說：「謝學士，醒黃梁。門前冷落稀車馬，世事升沉夢一場。說什麼鸞歌鳳舞，道什麼翠羽明璫，到後來還不是兩鬢盡蒼蒼，了結此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那時，蘇軾仕途仍是一片光明，雖然在他腦袋中得知人生的空虛，卻沒有如琴操那樣深的體會；但這事三年後，發生了烏臺詩案。蘇軾從徐州調任湖州，上書朝廷，寫道：「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反對蘇軾的御史台，認為他諷刺朝廷，妄自尊大；為了找出更多的證據來指控他，便遍查他的作品，數他的罪行，並堅持要處斬蘇軾，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冤案。他被捕下獄，常活在恐懼中，隨時被斬；雖然最後他逃過這次浩劫，但他對人生的看法截然不同。烏台詩案3年後，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在一個春日，與友人出遊，忽遇風雨，同行的友人拿著傘具先後離去，只有他一人放開喉嚨，吟詠長嘯，從容而行，並寫成這首《定風波》的佳作：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詞正好表達出蘇軾對人生的看法，宦海浮沉，經歷坎坷，理想不竟，抱負未果，鬱悶不爽，人還能作什麼呢？看透了，一切都是空的，也無風雨也無晴。看來好像很灑脫。「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雖然外面是風風雨雨，看透了，仍可從容而行，雖是只拿竹杖，腳中只穿芒鞋，但仍可走得比馬還輕快！那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雖然只穿蓑衣，任憑風雨吹打，還是照樣渡我一生，只是春風微涼，將酒意吹醒。且見山頂的斜陽應時相迎，卻不見有任何驚喜。見雨後天晴，也無半點歡樂。相反的，只是「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回頭望一望，在風雨走過的路，還不是一樣呢？無所謂風雨，也無所謂天晴；既沒有恐懼，也沒有驚喜。人生無論是風雨、

是天晴、總要過去！是那麼的空，是那麼的沒有意義。我並不以為這是曠遠超脫，曠達超脫，超凡脫俗。其實這是麻木、無奈、悲哀的人生觀。若與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四章8-9節所述的，真不可同日而語。

「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到了，卻不至死亡。」

「有這寶貝放在這瓦器裏，要顯明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我要談談我們 So Sick 的經歷。回首向來蕭瑟處，並不是「也無風雨也無晴」，而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這就是有神與無神的分別了。回望過去幾年，君玉曾歷經6次手術，兩次是髖關節手術(Hip Replacement Surgery)；4次是眼部手術，還有在這期間染上Covid-19病毒，真是驚心動魄，但又是何等大的恩惠。

其實，君玉向來都有髖關節的問題。早在香港的時候，她已經一直看骨科醫生，只是那時靠藥物仍可以止痛。但這情形每況愈下，記得在2018年時，他發覺藥物已經不能再有效地止痛了，到了2019年中，真是舉步維艱，便決定接受髖關節手術。髖關節手術是近代骨科界最成功的手術之一，置換人工關節，就是以人造材料來取代髖關節損壞的部分。手術相當安全。當君玉預備接受這手術前，有朋友告訴我們：「正前開」(Direct Anterior Approach)是較好的方法，較諸「後側開」(Posterior Approach)優勝得多，所以當我們前往史丹福醫院見那骨科手術醫生時，便問他是採用「正前開」抑或「後側開」的方法。他告訴我們，是「前外側開」(Anterolateral Approach)，當時我們還以為這就是「正前開」，後來才發現二者有很大的分別。一如「後側開」，此手術後恢復較慢，而且傷口較闊，也易傷及臀中肌。君玉做完手術後，需時差不多1年，才算是復原，但有時還覺得有點痛楚。在復原期間，她曾因小腿腫脹，漏夜前往急症室，檢查是否因血塊而導致腫脹，因為這是對生命有危險的。那晚深夜，很冷，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們冒著寒風，駕車到醫院，還好，醫院就在我們家附近，只需5分鐘車程。但從下車入急症室，雖只是50碼之遙，竟行足15分鐘才到達。經醫生檢查後，確定沒有血塊出現，內心才舒了口氣，但已經是一額冷汗了！

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到了2020年，君玉大致上經已復原，並預備為她另一隻腳進行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這一回，我們決定找另一個骨科醫生。剛好一個較年青及手術技巧一流的醫生，加盟我們家附近的史丹福分支醫院；在家庭醫生推介下，我們決定找他主診。他用的方法正是「正前開」，這方法不會傷及肌肉及肌腱，失血也較少，大幅減少手術後疼痛，復原也較快。她在醫院只住了一天，傷口只有上次的一半，而且大概兩個星期便復原，一個月後便行動自如，與上一回可說是天淵之別。直至現在，她一點也不覺得有任何痛楚，可說是完全康復，只不過每次坐飛機，或往迪士尼樂園安檢時，都要聲明她是做過髖關節移換手術。

然而在進行手術前3天，她要先檢查一下有沒有患上新冠狀病毒。我們本以為這只是例行公事。自從疫症爆發後，她幾乎完全沒有與外界接觸，唯一的接觸，是前往醫院作手術前的檢查，染到病毒的機率是極低。怎料，隔了一天，醫生來電告訴我們一個震驚的消息，君玉確診Covid-19，要隔離至少兩個星期，所以這次的手術也要延期。這個消息，真的嚇我們一跳！連問道：「怎會的？怎會的？」這兩個星期的等待，畢生難忘。之後，我在YouTube分享我們這次的經歷，竟然有超過3萬5千個聽眾瀏覽這見証，大大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在這見証中，我強調人生是充滿吊詭性的經歷，正如先前我引用保羅的一席話：「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到了，卻不至死亡。」無論是風雨或天晴，總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因為在我們這瓦器裏，有寶貝在其中，要顯明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當我們得悉君玉確診後，我們立即要做兩件事：首先她要隔離在房中，我要盡量不接觸她；每餐把飯菜放在門前，讓她出來拿。吃完後，她把碗碟放在門口，待我收拾。由於她沒有特別病徵，就要常常量度體溫、血的含氧量、心跳速度和血壓等。病癥一出現，尤其是含氧量低過94，就要立即致電醫院求診。其次，由於我與她有緊密接觸，我隔了兩天便去檢查，看看有沒有染上病毒。從人的角度看，90%以上我都會有陽性反應，我們同檯吃飯，同睡一室，怎可能沒有染到？誰知出來的結果是陰性，連我們的家庭醫生也百思不得其解。吊詭的地方就是：我們從沒有想過君玉會染上病毒，但事實上，她卻驗出是陽性反應；我以為我一定會中招，但卻是陰性反應。有一天，君玉忽然對我說：「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這是神答應了我們的禱告！」我不明所言，就問道：「難道你染上病毒是神應允我們的禱告嗎？我們何時求神叫你染上病毒呢？」她就解釋說：「當我們決定在8月進行髖關節手術時，女兒凱欣極力反對，她在醫院工作，專門治療那些確診Covid-19的病人。眼見不少病人垂危掙扎，她以為醫院是一個高危的地方，那時還未有疫苗，所以勸我們稍後才做手術，更何況稍為延遲，對病情影響不大，何必作此冒險呢？不如等到有疫苗後，才做手術也未晚。我們一方面覺得她所說的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我實在感得很痛楚，舉步維艱，很想快快完成這個手術。更何況醫生一再告訴我們，在手術期間染到病毒的機會很微，我們查看過在我們這區內的確診人數大約200人，醫院的Covid-19病人也很少，而且又與其他病房完全隔離，應該是相當安全的。在這兩難之間不知如何取捨之際，我們決定把這事情交給神，若祂不以為我這次入醫院做手術是好的，就請祂在最後一分鐘也要阻止！現在神豈不是答應了我們的禱告嗎？正正就是在手術前一天，我染上病毒，醫生自然就把手術期延遲。所以，我說是神答應了我們的禱告」。但我仍不明，就問道：「我們對此時入院做手術，最大的疑慮就是怕在醫院裏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染上病毒。神現在就給你染上病毒，又怎會算是答應我們的禱告呢？」她解釋說：「我身體狀況，手術前後一定有很大的分別。手術前，我的身體狀態佳，就是染上了，也有抵抗力抵抗；但手術後若染上，情況就很不一樣了！況且，我現在似乎是沒有特別徵狀，相信是屬輕微的一類，但如果在醫院做手術時染上，大有可能是較嚴重的一類。是的，這豈不是神精密的計劃嗎？」我覺得她所說的，很有道理，真是吊詭！

另一個吊詭的地方就是恐懼與愛的關係了！在這兩個星期，天天都提心吊膽，唯恐有病徵出現，或發燒、或氣促、或喉嚨痛，一旦有病徵出現，便要特別處理，嚴重的要入院。有時想到要入醫院深切治療室，插喉，又不准任何人探望，好像與世隔絕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一想到這裏，不禁大哭起來，跪在神的面前說：「我實在太倦了！我恐怕這樣是捱不下去！」另一方面，我又唯恐自己染上病毒，所以每天洗手，數以百計，以致皮膚也開始破裂，非常痛楚。我就是活在這樣的恐懼中，原來這樣的心理負擔是如此恐怖的。

但吊詭的地方是：我和君玉在這緊張時刻，卻仍然睡得好、吃得好、沒有一天失眠、也沒有一餐失去胃口。每早晨我在門外大聲問候君玉，她說：「很好！沒有任何病徵出現。」我頓時感到釋放和喜樂。更難得的是：Pleasanton查經班的弟兄姊妹，非常關懷我們，輪流不斷地供應我們兩餐，既美味、又有營養，這些愛心的款待，實在令我們非常安慰，也大大減少我的壓力，更有不少弟兄姊妹不住為我們禱告。聖經有云：「愛裏沒有懼怕。」其實原文是這樣的：「愛驅走了恐懼！」如此吊詭的真理，原來愛真是可以驅散我們內心的恐懼。

最後就是軟弱與剛強的吊詭。我常常以為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定事有所成，才可以榮耀神，或許我是受了中國儒家思想影響，考取功名，才能

光宗耀祖。世上沒有一個考試落敗的人，誇口說這是光宗耀祖。同樣，我們也不以為信心軟弱、充滿恐懼、甚至對神有所懷疑，是榮耀神之舉；但從這一回的經歷中，我才真正體會到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所說的真理：「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哥林多後書十二章9-10節)。在這兩個星期的掙扎中，不時恐慌、疲倦、孤單、軟弱、甚至懷疑；然而透過這些掙扎，才體會到自己的廬山真面目，原來我是這樣不配的，就是像我這樣的軟弱，神仍施恩憐憫，讓我嚐到祂的恩典和能力。正如保羅說：

似乎不為人所知，卻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

似乎受責罰，卻是不致喪命的。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卻是叫多人富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

這是何等真實的描述，是何等吊詭的經歷。經過這兩次的手術，君玉現在已經行動自如，甚至可以行山，真是神的恩典，叫瘸腿的能行，下一段我就要講到瞎眼的也能看。

Covid-19這個疫症，不但病毒入侵身體叫人受害，而且更影響整個醫療系統。不少醫生改用線上會診，但眼科醫生往往要仗賴儀器作檢查，以致無法在線上進行診斷。君玉一向患有青光眼，一直以來靠藥水壓抑眼壓上升，但這些藥水卻有許多副作用，其中一個叫人難以忍受的，就是眼睛癢。因疫情之故，她兩個月沒有去看眼科醫生，再有機會見眼科醫生

檢查時，發覺她的眼壓已升至30以上的危險程度，於是便立即轉介一個專科治療青光眼的醫生。專科醫生提議作一個叫做 Trabeculectomy 眼科手術，醫生在病者的眼皮後面開一個小洞，好叫眼部過多的液體流走，以保持正常的眼壓。這個手術成功率頗高，而且不用留醫，手術後可以回家養病。醫生先替他那隻較嚴重的右眼做手術，手術順利；但過了大概一個星期，一天，發覺眼部劇痛，好像眼裏有些東西阻隔著，引起痛楚。那天是星期日，醫生沒有返工，於是我們便決定往急症室求診。急症室沒有較先進的儀器，又沒有眼科專科醫生應診。那個急症室醫生替君玉量度眼壓時，發覺她的眼壓高至40，我們懷疑這是否準確，因為就是前幾日，她的眼壓只有10，非常正常，怎會一下子升到如此高呢？於是他們召了一個眼科醫生來，再作檢查。我們等了差不多3個多小時，那個醫生才來到，經細心用一些較精準的儀器替她量度，發覺一切正常，原來她的痛楚，是因為手術後遺下來的stitches磨擦而造成痛楚，並沒有什麼大礙，只是叫她盡早找回自己的眼科醫生跟進。後來看那手術醫生，醫生替她取出那些stitches，就不再感到痛楚了。

相隔大概一個月，醫生替她另一隻眼作同樣的手術。這一回，她並沒有感到任何痛楚，但因這個手術目的只是防止眼壓上升，對她的視力沒有絲毫幫助，醫生以為她要再做白內障手術，才會改善她的視力。到了2022年初，醫生為他作了白內障手術，視覺有顯著的進步，穩定後配上適當的眼鏡，相信她的視力會大有進步。

回想過去幾年的風雨，我們可以說：只有祝福。

第四十六章

治與亂 1
世界秩序

2019年在台灣大選前，台灣人選上了「亂」這個字來形容今日世界局勢。事實上，我們看看過去這幾年來發生的大事，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運動、香港的國安法、Covid-19肺炎肆虐全球，及台海局勢等真的把我們整個世界打到「亂七八糟」。我們所謂「亂」，是指我們現有的常規，無論在政制上、經濟上、醫療上、國際關係上，都似乎被打破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慣用的常規似乎未能有效地應付這些突變。我記得還未發生這場疫症前，我的女兒對我說：「作為一個醫生，在美國行醫，我認為美國現時的醫療體制完全沒有能力和預備面對一個疫症。」她這話不幸而言中，美國人以為她是全球醫療體系至先進的國家，面對這場「疫症」，美國人開始體驗到，實在太高估自己的實力了。

這種亂局，並不只限於現今疫症，雖然這一刻仍然嚴峻，我相信始終有一日它還是會終止的，我覺得真正的亂局可能是在疫症之後。今日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似乎已經受到極大的衝擊；在某一程度上是崩潰了，現在應該是醒覺的時候了。我用「治」這個字來形容更新或更改舊日的世界秩序，創立一套更有效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我並不從政治、經濟或國際關係上去描繪這個亂與治，而是從神學上去反省和探討，或許我們可以從聖經中找到一些實際治亂之方。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1 今日一個怎麼樣的世界秩序？

1989年和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往來邊界重開，東歐的共產國家像骨牌般一個一個倒下來。1991年老大哥蘇聯解體，不少地區脫離這個紅色系統，紛紛獨立，成為共和體制的國家，鐵幕突然間消失了，冷戰也告結束，是來得這麼快和這麼突然！而中國呢？1989年天安門事件，不少西方國家估計中國遲早都會步蘇聯之後塵，只要把中國引進以西方為主導的新世界秩序，世界就太平了。所以西方主導的新世界秩序，應該是「治」之良方！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秩序呢？

美國著名記者 Thomas L. Friedman 寫了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叫做 The World is Flat. 他強調世界共同體 globalization 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趨勢，由於互聯網、通訊、高科技發展等等，把整個地球也聯在一起，成為一個地球村，所以我們在美國買了一部電腦，需要技術支援，便打電話查詢及求助，聽電話的人原來是身處印度的技術員工。一部蘋果電腦的製造，是由十多個國家分別製造不同的零件，最後在某一地方滙合而成。Wal-Mart 的採購是世界性的，在全球搜購至便宜的產品，運至美國的中心，然後分派出去。Amazon 更是利用高科技，資訊進行網上採購，無論在搜購上及供應上都是全球的。這世界地球村令不少落後的國家突然強盛起來，中國也成了世界工廠便是其中一個最好例子。事實上，在今次的疫症中，我才知道美國的藥廠，醫療用具製造廠大部份都是建在中國內。所以，Friedman 揚言，凡有麥當奴之國家，一定不可能大動干戈，因為在這個地球村中，大家的生存是倚靠大家合作，若缺乏合作，這個遊戲一定會結束！

為了要保障這個地球村有規有矩的進行交易，一些世界性之法制和機構就不得不要發揮他們的作用了，於是聯合國旗下的 WHO、WTO 等等

便應運而生，聯合國的地位也漸漸提高了！

然而，要保障這個世界秩序能順利進行，硬件固然重要，軟件可以說是更重要的。我所謂「軟件」就是指我們所說的「普世價值觀」，如人權問題、平等問題、脫貧問題、性別/種族歧視問題、法治問題、民主問題、誠信問題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在某一度而言，這些都是內心道德的範疇，我相信以下的一個例子，正好說明這一點。商鞅是春秋時代的改革者，他當上秦的宰相，實施變法。作為一個法家，他總覺得一個國家一定要有規矩和法律，否則只會亂。然而，他又體驗到作為一個執法者，硬以法律為統治者的工具，缺乏人民對管治者之信任，一切都是徒然的。於是他出了一個告示，在市之南門放了一條木，不太輕也不太重，普通人人都可以拿著這木而行，告示說明若有人可以抬著這木條，從城南行至城北，他將獲得黃金十兩以為獎賞。豈料，這木條放了多日，也無人問津，原因何在？人民以為這一定是執政者「引蛇出洞」，試探那一個是貪心的然後加以對付，這是因為人民不信任政府所致；於是商鞅便把黃金增至50兩，仍無人問津。最後，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拿著這條木行到城北，商鞅果然履行諾言，給他55兩黃金以為獎賞。這一招果然奏效，人民開始信任這個政府，是一個有誠信政府，而不是騙人、欺壓人的政府。得著這人民的信任，商鞅的變法就成功了，最後秦國強大起來稱霸。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這些普世價值是治國之道，這也是西方社會，特別是精英們確信的。克林頓、奧班馬都是這信念之跟隨者。

然而，有了這些普世價值觀也未必能維繫這個世界秩序。「武力」似乎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自蘇聯解體，美國一枝獨秀，當起世界警察的角色，在過去25年來，美國先後派兵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正是以武力來維繫這個世界秩序！但這幾年的劇變，尤其美國撤兵阿富汗，想不到還沒有完全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撤離，阿富汗政府就倒台，塔利班快速重奪政權。近日，俄羅斯更出兵進攻烏克蘭；不少人都問道：究竟這個世界秩序是否行之有效呢？

2 疫症之後，何去何從？

《三國演義》第一回有云：「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中，早在这疫症未發生之前，我們已經看到「合久必分」的端倪，我們可以從二方面看這趨勢。第一是中國的崛起，據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所以在奧巴馬時代，美國對華的政策是開放，友善和夥伴性的；其實，不但奧巴馬如是，克林頓和布殊也是走這條路線。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不少美國商人都在中國設廠，利用那兒人工低，環保法律較鬆等有利因素，進行大量貿易，以致中國取得「世界工廠」的美譽，單在2018年，中國製造品佔了整個世界出產的30%，價值達U.S. \$4 trillion。我們就以Walmart為例，70-80%的產品是來自中國，在美國本土製造的只有20%。

自從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中國入口美國的貨物總值由2001年的1,000倍增加到2018年的5,500倍，同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4,190億元，難怪中國這20年來躍升為世界第2大的經濟體系，僅次於美國，而中國的G.D.P在2018年是\$13.37 trillion，比美國少\$7.21 trillion。估計到2023年，彼此相差會縮減至5.47 trillion，不久中國將會超越美國。

我們會問：為什麼中國這10年來有如此高速的增長？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人言言殊，各執一詞，所以裴敏欣(Minxin Pei)在2012年8月29日發表一篇名為《你對中國自以為是的認知，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就有這樣

的分析，我們可以用8個字來形容他們成功之道：「私營政府，公營企業」。自從中國開放後，一方面在經濟生活上開放，讓大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好叫國際社會接受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仍緊握一黨獨裁專制，權力是不放的；這種矛盾的「共產黨資本主義」便是這個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既是「市場經濟」，怎麼張教授又說是「公營企業」呢？我們說「市場經濟」是指「沒有政府干預下，買賣透過市場私下交易」，這是加入WTO必須遵守的條件，但中國模式的「市場經濟」並非如此，不少大企業都是直接或間接由政府操控，尤其是習近平上場後，這種「國進民退」的情況就愈來愈明顯了。當然一黨專政，在辦起事來，順暢得來，效率也高，所以不少人就推出了這套「中國模式」來代替西方民主模式；這是對今日的世界秩序起了一個極大的威脅。

第二個威脅這個「世界秩序」的是美國特朗普上場，他不是一個律師（以往大部份美國總統都是律師出身），是一個商人，他並不熱衷這些所謂「普世價值」，更不想美國扮演一個世界警察的角色，他的目標簡而清“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若對美國有利，他會考慮，若對美國無利，他會不理。「非法移民」便是一個好好的例子，他並不以為「人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所以他用強硬手段應付從墨西哥湧入的難民，正因如此，他不像過去的美國總統，他對中國的政策也有一個180度的轉變。他以為中美貿易逆差，是過往總統之愚昧所致，所以他就積極推動中美貿易戰；企圖把美國從劣勢中重整過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也是最威脅過去所持守的「世界秩序」。

這一次的Covid-19疫症，把這些問題完全暴露出來，在此形勢，什麼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呢？是維持現今的世界秩序？是中國模式的秩序？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是特朗普之務實治國之方?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課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就想到很多年前A. Huxley寫了一本非常精警的小說“Brave New World”,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小說得到一些啟迪。話說很多年後,英國倫敦是一個非常發達,先進和太平的城市,它成功之道有3:

- 穩定 Stability
- 社群 Community
- 身份 Identity

他們透過科技,把這3個治國之道具體地應用在新世界的政制上,所有人都是從工廠製造出來,而非從母胎而出,既沒有生育,家庭與婚姻亦無必要了,一切因家庭與分婚姻而帶來的問題與矛盾也避開了。既沒有婚姻制度,這個新世界的人對性的觀念也很開放,男女關係也只是逢場作興,沒有任何委身之必要;因為人是從試管大量生產,所以人的智商、樣貌、身裁等都可以控制,他們的樣貌和智商都是一模一樣的,完全 identical,如此就可以減少因競爭而帶來的衝突,而個人主義的觀念也完全抹殺了!既沒有個人,只有社群 (community),這個世界就容易管治了;然而,若人人平等一樣,沒分尊卑高下,這樣的一個社會是很難存在的,因為沒有等級 (order),就沒有秩序 (order),所以在製造胎兒的過程中,他們就利用生物科技,把人民分為abcd四類。屬a的是最優秀最靚的一群人,凡屬a類的都一樣聰明,一樣美麗;b類則次之,再下一級是c,最低的一級是d,為了維繫這等級,這些人民從小便接受sleep teaching,即我們今日所講的「洗腦」,叫他們自小便接受這套等級制度,不敢違抗,或許有些下等人民屢受上級虐待而導致情緒不穩時,政府就提供一些 Soma給他們服用,這些Soma就好像LSD之類的毒品,吃了之後就完全忘記一切煩惱與痛苦;但同時亦可以繼續安於低下層的位置,並幫助

這個國家擔負一些低微和卑賤的工作。這個政府就是依賴這種嚴密操控的管治模式來穩定整個社會，所以，在這個新世界裏，是沒有打仗、爭執、示威、流淚和痛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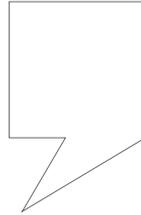
故事是講到一個屬a級的人，帶著他的女朋友來到「未開化」的墨西哥旅行。迷了路，更意外身亡，剩下他的女友被墨西哥人救起，發覺她因沒有携備避孕丸而身懷六甲，最後誕生了1個男孩，母子二人流落在這墨西哥國內。由於她對性之開放，當地人視她為妓女，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而她的兒子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傳統道德觀念的社會長大，長期在被輕看和壓迫，他唯一的安慰是聽他母親講述倫敦是一個多麼先進和幸福的樂土。所以他朝思暮想都希望返回這文明的倫敦。

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們終於被文明的倫敦政府發覺，這個名叫約翰的年青人便與他的母親一同返回倫敦。回到倫敦，發覺整個社會都非常先進，社會井井有條，很有紀律，絕無爭執。但不久，他就發覺社會的幾種等級和對下級人的欺壓，他在墨西哥長大的時候，曾經有機會唸過聖經，很嚮往聖經所說人為神的形象所造，在神眼中人人平等，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尊嚴；但在眼前的却是一個不平等和剝削的社會，他看到d級人被欺負，真看不過眼。有一天，當他看到那些d級奴隸排隊去領取Soma時，他就上前搶去Soma，大聲演說：「上帝造你們，與a、b、c是同一價值，同一重要，為什麼你們甘心作奴隸，給人魚肉？為什麼要領取這些毒藥，這都是管治者操控你們的毒藥，你們要起來反抗，爭取自由！」話還沒有說完，那些排隊領Soma的d級人仕，非常憤怒這個外來人阻礙他們享受Soma假期，就用雞蛋、番茄擲向約翰，極表不滿，約翰只有黯然離去。

後來他有機會和倫敦的首長傾談，首長對他說，我們推行這管治模式，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管治模式。我們願意犧牲個人的權利、

自由，尊嚴來成全我們整個國家之穩定、繁榮和安定。但約翰不能接受，他既不喜歡墨西哥那種傳統的管治，也不能接受倫敦之新模式管治，最後他懸樑自盡，因為他覺得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兩者都不為他所認同的。

究竟是那一種管治方式最為有效？是獨裁專制？是民主自由？Covid-19 疫症更把這個對比之優劣表露無遺。有人以為中國的一黨專制模式，在治亂上是最為有效；但亦有人以為這種專制獨裁的管治毫無人道，不看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是一種極邪惡的制度。是中國模式？是西方模式？Huxley似乎給我們的答案是：兩者皆不是！若是如此，我們當何去何從？我們在下一章嘗試從聖經角度去看看這個課題。



CC

第四十七章
「治與亂」²
的聖經觀

在上一章，我談到世界秩序的問題。自從蘇聯解體，西方主導的新世界秩序，地球趨於一體化，20年來都行之有效。這個世界似乎有著一短暫時期的太平，雖然偶爾有恐怖活動，及個別地區不穩，大致上仍可算是太平盛世；但到了2010年代，卻是風雲四起，主要威脅來自3方面。一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是中國的崛起，一是Covid-19疫情。在這一章，我們先談談特朗普總統帶來的衝擊，及治與亂的聖經觀。在下一章則談談中國的崛起與香港的突變。

特朗普是美國第45任總統，他當選時已年屆70，是美國其中一位最年長及最富有的總統，也是美國第一位沒有從政經驗的總統。在未任總統前，他是一位知名大亨、電視節目主持人、商人，在全世界經營房地產、賭場和酒店。他曾兩度競選美國總統，在2016年11月8日大選中，沒有人會想到他能擊敗對手民主黨的希拉莉，但他卻以302張選舉人票，擊敗獲232張的希拉莉，舉世震驚。在這次選舉中，我投了白票，因為我以為二者都非理想人選。在2020年的選舉前，不少人都以為特朗普的勝算較高，一方面在他執政期間，美國的經濟頗佳，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屢屢佔上風，而民主黨競選總統眾多人中，似乎沒有一個特別出色。誰料突然出現Covid-19疫症，令他措手不及，防備不足，弄至不少民怨，民望下降，結果輸了給拜登。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然而，他雖然輸了，在這次選舉中，卻獲得美國歷史上第二高的選票總量，當然對手拜登是獲得更高。所以，我們可以說：與其說是選舉總統，更確切的，是對特朗普的一個全國公投。不少美國人視他為獨裁者，令人反感的惡魔；但卻又有不少人視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美國總統，能真正帶美國再次強大。他的減稅措施、製造不少就業機會；外交上某一程度的成就，以致就是在他退位後，仍有不少人擁護這個特朗普主義。

不過令我關注的問題是特朗普使美國選民兩極化，這種情形在教會圈子裏更為明顯。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福音派領袖，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為他們認同他對墮胎的看法；但亦有不少領袖，包括著名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譴責特朗普的品格。至於華人圈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一項多種族的政治民意調查，發現只有25%美籍華人支持特朗普。然而，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政治學教授連培德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因為中華文化與價值觀跟共和黨的理念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兩者都強調家庭、知識、對社會比較有保守的看法，尤其在老一輩中，他們的美國夢，是在經濟上建立自己，送孩子到好的學校；最近三藩市選民成功地停止校區3位自由派人士擔任委員，便是一個好例子。所以連培德說：雖然調查出大部分華人仍支持民主黨，但支持特朗普與共和黨的數字有可能被低估了。

美國社會在政治上的兩極化，我並不存著一個悲觀的態度。我以為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健康和必然的現象。問題只是：我們能否彼此尊重、包容。很多華人家庭中，父母較保守，傾向支持共和黨；子女較開放，傾向支持民主黨，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但這不一定令一家不能和平相處。我覺得在基督教圈子中，最大的問題倒是把政治宗教化。我的意思是：有人以為作為一個福音派人士，就必須要支持共和黨。選舉總統時，就只看

他對墮胎議題上的看法。當然墮胎是一個要考慮的議題，但絕不是唯一的議題，只不過是眾多議題中其中一個考慮條件罷了！我們還要看看這個競選人是否具有領導整個美國的條件。所以，我以為基督徒當前的急務，是要從一個較宏觀的角度，看看聖經對治與亂的看法，究竟聖經是怎樣看世界的亂局，及治國之道。

1 創造--從亂到治

「亂與治」是聖經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聖經一開始，就描繪創世前的亂局：「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所謂空虛混沌，是指荒蕪，什麼也沒有，不適宜人居住，也無秩序、目的和意義可言。淵面黑暗是指一片黑暗，遮蓋著無底的深水，極為恐怖。一言蔽之，亂也！隨著便是神的「治理」，從無秩序到井井有條，從亂到治；神如何治理這亂局呢？「分開」是整個創造過程的一個重要動作，「分開」表示系統化，從混亂的境況中定出系統和秩序來。第1日，神把光暗分開，光為晝、暗為夜，這就是時間的秩序了。第2日把水分開為上下，製造出天空來，是為空間的秩序，因為人不但需要時間的秩序，也需要空間，作為一個活動範圍，這都是從空虛混沌中創造出來的時與空(Time and space)之秩序了。第3日，神又再「分」了，不過這次不但分，也有聚，一分一聚，正是神巧妙的工程。祂把水與陸地分隔，水為海，陸為地，他就這樣製定了界線(boundary)來，這是人與人，國與國一切關係的重要元素。沒有界線，一定造成混亂的局面。到了第4日，神又劃分晝與夜、節令、日子、年歲、四時轉替、寒暑稼穡、日夜變遷，都是循著規矩而行，這規矩是宇宙運行和人生過程的重要元素。時間、空間、界線和規矩等系統都是硬件，祂更創造生命，這生命有兩個特色：

- 能滋生---滋生是生命的延續。
- 各從其類---是界線問題，也是群體存在的必要條件。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到了第6日，神按祂的形像造人，並且派人管理這個大地。

楊錫鏘醫生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洞見。他指出神的創造，定下3個不同的秩序(order)，即物質秩序、功能秩序和道德秩序。首先談談物質秩序。所謂物質秩序，即我們所謂的自然定律。創世記二章5節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野地還沒有草木，田間還沒有蔬菜，還沒有長起來，因為耶和華神還沒有降雨在地上，也沒有人耕種。」在這裏，聖經解釋何以當時沒有草木，田間沒有蔬菜。原因有2：

- 沒有雨在地上---每顆種籽之所以能萌芽，是靠陽光、水份、和空氣，這是神的定律。或問道：「神是無所不能的，難道祂不可以在沒有水份的情況下，叫植物仍然能生長嗎？」當然可以，但神卻不喜歡這樣做，祂喜歡依著物質秩序而行。但跟著又可以問：「如此說來，聖經所說的神蹟，一些違背自然定律的神蹟，全是假的嗎？」非也，因為創世記二章4節一再說明，這是神造這個天地時所立下的定律，是這個世界的定律，離開了這個世界，就不再要依此定律而行；如在太空中，就再沒有地心吸力了！但在地上時，卻仍受這定律所限制。再者，希臘文神蹟一字是 *seimeion*，是解作標記，其重點不是超自然，而是作為一個標記的作用，顯示出神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
- 我們再看看第2個原因，沒有人耕種。楊錫鏘醫生稱此為功能秩序。沒有人耕種，就沒有蔬菜出現在田間，正如保羅說：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這就是楊醫生所說的功能秩序了。

第3個秩序，楊醫生稱之為道德秩序。所謂道德秩序，那是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你若無心向學，考試不及格，這是咎由自取，

不可以怨天尤人，此乃道德秩序。

神既在創世時定下這些秩序，就叫人去遵守，以免生出亂子，變成亂局，神學家稱這些為文化上的律例(cultural mandates)，包括工作、婚姻、和安息。在創世記二章5節提到神對人的吩咐，人要治理大地，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所謂治理，是指使之有秩序，不是混亂。而管理是指修理、管治、看顧、使之井井有條。我們的責任是要維持這個世界和諧的狀況，一切政制、管理都屬這個範疇。創世記二章24節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就是婚姻/家庭的秩序了。神不但創造社群，更創造婚姻與家庭，更提出治理家庭的藍圖，使之和諧。

- 分(離開)--- 人要離開父母。離開並不是指拋棄、不供養、不同住；而是指在心智上、情感上、思想上、行為上、經濟上各方面可以自主及獨立。聖經強調界限，我們的家庭，不是我們父母的家庭，若是混亂，問題便會應運而生。
- 合---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所謂連合，是指緊緊連在一起，永不分開的意思，更要生養兒女，並且好好的教養他們，「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二十二章6節)

最後要談談安息的律例了。創世記二章1-3節：「天地萬物都做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從創造的角度去看，安息的意思是安息舒暢。(出埃及記三十一章17節)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叫我們身體得以舒暢，是神給我們保持身、心、靈康健之法；然而，安息日還有另一個層次的意義，從救贖的角度看，這是守約的證據。(出埃及記二十一章16節)我會稍後再討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總括來說，聖經給我們一個非常清晰的訊息：創造是從亂到治，神不但創造這個世界，更定立了秩序，並且吩咐我們去遵行，保持這些秩序，免得混亂。

2

墮落：從治到亂

然而，當人犯罪後，整個世界都變了。首先，「天起了涼風」。(創世記三章8節)其後，「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人必汗流滿面，才得餬口」。(創世記三十八章19節)這都是物質秩序開始出了亂子，不但如是，家庭也受到衝擊，夫妻二人，彼此推卸責任，後來更演變成家庭慘劇，該隱把他兄弟亞伯殺了。(創世紀三章8節)

面對著這個亂局，人如何面對呢？創世記第4章告訴我們，當神判罰該隱流離飄蕩在地上，毫無安全感，他就走到挪得之地，在那兒作了兩件事：生了1個兒子，又建造了1座城；並且給他兒子及那城名為「以諾」。「以諾」的意思，希伯來一字解作「第2次創造」(second creation)這表示該隱拒絕了神的創造，自己當起創造的主來，與神原本的創造對衡。兒子以諾乃是象徵永恆：父生子、子生孫、子子孫孫，無窮盡也！這是人製造出來的永恆。以諾城則象徵該隱拒絕了神的保障，自己創造人為的保障；但他沒想到：他的兒子及他所建造的城，都處在挪得之地，「挪得」(Nod)一字正是流離飄蕩的意思。在流離飄蕩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永恆和保障，終到頭來，還不是流離飄蕩。正如第三十六章所提到的寧錄和巴別塔，人企圖用他們的科技，去建造那個巴別塔，用人的方法去治理這個亂局，最終還不是一片混亂。

3

救贖---從亂局到新天新地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42-46節是一段非常有趣的聖經。保羅在這裏比較

兩種不同的生命，一是血氣的身體，簡言之，是指神創造亞當及其後裔的一族。一是靈性的身體，是指末世時我們因信耶穌而得以復活的一族。保羅比較這兩族之不同：

血氣的身體(創造)	靈性的身體(復活)
必朽壞	不朽壞
羞辱的	榮耀的
軟弱的	強壯的
血氣	靈性

我們要注意：這裏所謂血氣的身體，是指人未犯罪前的狀況，因為十五章45節是引用創世記二章8節來描述血氣的身體之一族，而非人墮落後情況。然而，當人犯罪後，這血氣身體的一族就更不濟，更是嘆息勞苦！（羅馬書八章22節）我們在這個世代，一定有得失成敗，生離死別等苦楚。套用所羅門王的話，「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但末日主再來的時候，在新天新地，我們都要改變，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必死的變成不死的。在那裏，再沒有分離，也沒有眼淚，更沒有死亡，這正是我們的盼望，也是真正的平安和永恆的秩序。

4

現今世代的挑戰

不少人有一個錯覺，以為基督教是消極、離地的信仰。人生毫無眷戀之處，就只有消極的等候那更美的家鄉早日來到。難怪馬克思稱宗教為人民的鴉片，在痛楚之際，有麻醉之用。非也！我們是看透這個「血氣身體」，既朽壞、軟弱、暫短、又是空虛、艱辛和痛楚；但神卻吩咐我們要好好治理大地，愛惜家庭、保養身體、並且盼望將來復活的改變。正如所羅門王所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人莫強如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吃喝快樂，在勞碌中享福，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分。(傳道書三章11-12節)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吊詭性的真理：雖然人生有生有死、有喜有悲、有聚有離、有愛有恨、有戰爭之苦、失敗之痛、風風雨雨是難免的，看來好像很灰暗，但神卻以為這是美好的。雖然我們不明白這個吊詭真理，正如所羅門王所說：「神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但我們既然知道這是神給我們的分，就好好治理這大地，享受神給我們的分。(傳道書三章1-15節) 論到這分，各有不同，有些人以為神呼召他們從政，在政治上治理社群，他就要忠心，盡力而為，只是不欺詐人民，不要以強暴待人，自己有糧，就當知足。(約翰福音三章14節)

然而，我們若要明白現今世代的挑戰，我們就要明白聖經對安息的闡釋。一如上述，從創造的角度看，安息是保持我們身心舒暢之律例，但安息卻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我們更可以從救贖的角度去看。救贖是屬末世的範疇，換言之，安息這律例是概括了創造之始與救贖之末 (protology and eschatology)。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四章1-11節有著非常精闢的闡述。他提到安息，是有著幾個不同的層次和意義：

- 首先是創造之後的安息3-4節「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論到第七日，又一次說：到第七日，神就歇了祂一切的工」。這裏所謂安息，是指神歇了一切創造之工，這也正是猶太人對安息的了解，意思是：不是不作所有的工，只是不作創造性的工。我記得往以色列旅行時，發現每逢星期日，酒店升降機都會自動每一層停下來開門。何解？因為他們要守安息日的規條。安息日是不作創造性的工，所謂創造性的工，是指「從無到有」的工。當我們乘搭升降機，按鈕的時候，燈便亮起來，從沒有光到有光，這便是創造性的工了。

所以猶太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預設升降機在安息日，停泊每一層，而不用乘客因按鈕而犯了安息日的規條。

- 希伯來書提到另一種安息，是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又稱為安息之地。3節「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這是指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時，他們反叛神，神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安息。這個安息是指今日的巴勒斯坦地；然而這個安息卻只是一個預象、一個影兒，有另外一個拯救，另一個安息。創世記二章3節稱安息日為聖日，而非休息日，或是與其他6日所稱甚好之日。聖者，分別也，重點是分別出來的一個日子。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把自己分別出來，去到這個安息地，也稱為聖地，就是安息的意思。而這只是一個預象、一個影兒，就如希伯來書四章8-9節說：「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一個安息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
- 究竟希伯來書所指另一個安息是什麼呢？這裏我們便看到一個吊詭真理。3節「我們相信福音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換言之，我們信主的信徒，已經進入了這安息。但在同一段9節卻說：「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留存。」意思是說：我們已信主的人還未得著這安息日的安息，還是在將來。那麼，我們如何去理解這個矛盾呢？我們要明白，耶穌是分兩次來臨。第一次來，是為了拯救我們，捨身流血，為我們贖罪，凡信祂的，必得著永生；並且，祂還應許我們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十一章26節）正因如此，希伯來書4章3節說，我們信福音的人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得以進入安息。然而，耶穌將會再來審判世人，建立新天新地，永恆的安息。這就是希伯來書四章9節所說另一個安息了。

我們現在的世代，是一個 already-but-not-yet 的世代，也稱為「末世張力」的時代。我們既已得安息，但還沒有完全得著安息，這就是我們今日世代的吊詭。

5

結論

我們是活在一個混亂的世代，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生離死別、得失成敗、戰爭、瘟疫、死亡，自有信史以來，這個世界都是如此，面對著這個亂局，人企圖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理；但歷史卻告訴我們，這似乎都是無濟於事，仍是虛空的虛空，仍是捕風捉影。然而，基督徒面對這種情況，不是看破紅塵，四大皆空，避世躺平，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積極的作光作鹽。所謂鹽者，昔日是用作防腐之用。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這個社會裏面作防腐功能，免得我們居住的社會發臭。正如法國神學家 J. Ellul 說：「雖然我們明知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這個世界仍會是一片混亂，但我們仍不放棄，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使命。」其實，人問題的癥結，乃在我們的罪。Philip Yancey 曾訪問一位前蘇聯真理報主編，他說：「我們共產黨徒就好像你們基督徒一樣，目睹這個世界，充滿不公、不平、不義。我們就發起革命，企圖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誰料經過70多年的實驗，我們國家竟然製造有史以來最殘暴的政權。我的結論是：我們無法用政制、革命、戰爭去解決這個亂局，因為人心不改，一切都是徒然。」這真是至理名言。

前 Fullerton 播道會牧師 Charles Swindoll 都講過一個故事：一位父親放工回家，正準備稍稍休息，但他那位5歲大的兒子，卻嚷著和父親玩。父親不想推辭，但又不想放棄休息機會。這時，他看到枱上一本雜誌，其中

一頁是一幅世界地圖。他靈機一觸，便把這頁世界地圖撕下來，剪成十多片，然後對兒子說：「讓我們玩砌圖遊戲吧！看看你能否在半小時內砌成這幅世界地圖。」他以為兒子年紀細，不知世界地圖為何物，一定要費很多時才能完成。如此，他便可以休息了。誰料兒子不用3分鐘就成功地砌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圖。這一回，父親真是嚇了一跳，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是這樣的一個天才！便問道：「兒啊！你如何懂得世界地圖呀？」兒子把這幅地圖的後頁給父親看，原來後頁是一個人像，他對父親說：「我是根據這個人像砌成的」。父親恍然大悟，大聲說：「對呀！若我們能治理人的問題，整個世界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If you can fix the man, you can fix the whole wide world!)耶穌給我們在另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把福音傳遍天下，作祂的門徒。

無論在這個世代遇到什麼風風雨雨，因著我們的信仰、盼望和使命感，我們能勇往直前，因為我們知道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哥林多前書四章16-18節)





第四十八章
香港的
突變？

香港作家陳冠中在2008年寫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名叫《盛世：中國，2013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這本小说看來好像是一個科幻小说，但其實是一本有關中國崛起及其所倡議的新世界秩序預言。這故事講到一位長期定居北京的台灣作家老陳，買了樓房，生活安穩無憂，心情極佳，感覺到非常幸福。他覺得中國很棒，比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2008年金融海嘯後，西方國家屢次陷滯脹期，災禍延及全球，無一倖免，未能爬出谷底。唯中國能獨善其身，不僅改寫了國際經濟的遊戲規則，簡直是改寫了西方的經濟學；更重要的不像西方國家，中國的社會沒有動亂，而是更和諧，極了不起。（p.217）

事隔14年，陳冠中在2008年所預言的，是否正確呢？經過了這一場Covid-19疫症後，有更多的中國人深信，中國的制度及所推行的新世界秩序，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醫療上都站在世界前緣，不知不覺間，至少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是處處領先的。反觀西方社會，看看近期美國的大選情況，社會動盪不安，國內四分五裂，豈不是證明了中國的新世界秩序更為有效。套用小說中老陳的一席話：西方國家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予的；但在中國，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給予的。誰勝誰劣，有目共睹。

那麼我們會問道：究竟中國式的世界秩序是怎樣的呢？陳冠中在這本小說(p.120)提出了十項國策：

- 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
- 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
- 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
- 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
- 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
- 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
- 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
- 單民族主權的多族群共和。
- 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
- 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

這10項國策，看來真極具吊詭色彩，不禁使人想起George Orwell在1984這書中所講的一句非常精彩的話：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戰爭即是和平，自由即是奴役，無知即是力量)。但想不到，這近乎荒謬的話，竟然得到不少中國人，甚至是在香港長大，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青睞，何解？

我相信在過去這幾年，香港所發生的突變，正好說明這兩種不同世界秩序的角力和優劣：一是中國式的威權主義，一是西方式的民主政制。可惜，陳冠中《盛世》一書所預言的，不少不幸而言中。首先我們要問：究竟這幾年香港的轉變，是依著中國定下的劇本而行，抑或是環境的改變而作出一連串的治亂行動？我是在2000年回港，直至2013年返回美國，目睹香港在這段時間的改變；雖然表面上，香港仍是馬照跑、舞照跳，但深看一層，香港已經不再是一樣的了。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不難看出中共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有一定的策略，無論是50年初接管整個中國，或是統戰西藏、蒙古、新疆等地，都有他們的藍圖，在這方面，中國是極富經驗的；但在另一方面，中共對香港的策略也因環境、人事和時機等因素有所調校。正如在大陸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劉少奇遠赴莫斯科，向老大哥蘇共總書記斯大林，匯報了東亞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

「我們採取隱蔽的、不作聲的、合法的方式進行活動。在10年的時間內，我們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們在解放以前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漢、香港、廣州等大城市中、建立了鞏固的秘密黨的組織及強大的革命群眾組織。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偵探，無法破壞這些組織。這些組織後來對我們軍隊去攻佔城市及佔領後接收和管理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關於東亞民族革命運動策略問題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1949年7月至1950年3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40頁。」

劉少奇這番話，豈不是告訴了我們，早在中共立國之前，已經心裏有數，定下了接收和管治香港的策略了。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訓斥香港記者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冷靜地想一想，江總書記的批評對極了！不認識中共，就不認識中國，更不認識一國兩制。今回，我就以這 simple and naive 的頭腦，企圖去理解這幾年香港突變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

2012年台灣香港相繼換屆選舉，馬英九以689萬票當選總統，梁振英則以689票贏得特首，港人稱他為689，真夠幽默！不知道稱梁振英為689的原作者，是否語帶相關，暗地裏比較另一個689的馬英九呢？而更有趣的，在競選期間，長毛梁國雄曾大聲質問梁振英是否共產黨黨員，對內地作家許知遠來說，這是一個絕大的荒誕事。香港回歸祖國15年，作為中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卻如幽靈一樣的存在於香港，雖然它的影響已經

是無處不在，但又從不表明自己的身份。還有一個更荒誕的事，在梁振英宣布參選特首的造勢大會上，嚴正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時，全場幾百名支持者，掌聲雷動！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想大陸人永遠都不會明白的。其實梁振英並非唯一一個如是，吳康民、曾鈺成、曾德成等所謂左派領袖也是如此。他們都拒絕表明身份，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自己是黨員。我想唯一例外的，是早年移居加拿大的梁慕嫻，在她那本《我與香港地下黨》，表明自己是共產黨員。

這件看來是荒誕的事，卻又表明一個真相。共產黨這個名字，帶給香港人的是一種恐懼的回應！這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數香港人是因為恐懼而逃難到香港，只不過他們一直都沒有察覺到這幽靈已經一直漫遊在這東方之珠上，就是在2017年之前，那些 simple and naive 香港人還未察覺到吧了！

面對著那些「恐共」，又「受西方思想洗腦」的香港人，究竟中國怎樣管治這東方之珠呢？更何況香港是一隻會生鑽石蛋的鵝，對中國關係重大，不容有失，正如總理朱鎔基說：「內地三分之二的出口都是通過香港，那裡發生一點問題，都會不得了！」所以，在回歸前後，中國都採取一個較務實的政策；在97年後的20年，中國好像都尊重一國兩制的承諾。然而，若我們以為這是中共從威權主義漸漸轉向西方的管治模式，那是大錯特錯了！在這20年中，其實香港已經起了不少變化，只是這些變化是比較隱藏的。

影響香港改變的一個重要人物是許家屯。在1983年至1989年，他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也即是今日中聯辦的前身。他來到香港，知道在80年代中期香港約有6,000名共產黨黨員，一半為香港本地人，一半來自中國內地；（陸恭蕙在她那本《地下陣線》一書，則估計1997年香港約有2.8萬中共黨員）。大多數所謂「土共」都是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屬草根階層人士，正如梁慕嫻在她那本《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中有云：「我要告訴香港市民，香港有個地下黨，它不只是存在中資機構、工會、紅校，而是藉著反英抗暴大量地發展到大專院校及其他各種機構。我要告訴香港人，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們不再受騙了。」

許家屯是明白到，要這些土共負起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責，是不大可能的，更何況他們亦不為香港人所接受，所以他一改昔日的策略，把統戰的對象轉移到香港的工商界人士。他與李嘉誠等富豪成為親密戰友，自然引起一些土共人士的不滿，適值中國大力發展深圳特別經濟區，吸引香港人北移，又用很多利誘吸引香港工業界在深圳特區投資及設廠。以下的數字，可見這政策的影響甚遠甚大：

1991年與1997年香港就業人士之改變

(參看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91,1997)

	1991	1997	
• 紡織業及成衣製造業	294566	100682	-65.8%
• 機械製造業	64821	34381	-47.0%
• 電子產品	53176	27790	-47.7%
• 金屬品製造業	48621	20623	-57.6%
• 塑膠產品	42736	12404	-71.0%
• 印刷	39120	45844	+17.2%
• 食品飲料及菸草	24011	22188	-7.6%
• 化學原料及產品	8293	6511	-21.5%

這只是第一波，自1997年後香港的製造業一個一個的淪陷，就是印刷業也遷移到北面的深圳了。隨著工廠轉移陣地，漸漸地不少支援工業的行業，無論是會計、管理、市場業務等都隨著北上，以致香港轉型為金融中心。我們在百貨公司，很少見到香港製造的商品，取而代之是中國製造的產品。如是，香港的工商界都依附了祖國，因為這是唯一生存之道。從前我們在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時，看到什麼商會都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但到了20世紀之末，我們再看不到這情景，在同一旗桿上卻掛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旗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策略是相當成功的。這不但使深圳有著驚人的經濟發展，帶給中國財富，在政治上也成功地統戰了香港工商業界人士。

工商界在香港固然是重要的統戰對象，教育界也是重要的一環。在港英時代，不少香港的學校都由教會辦理，在22間傳統名校的中學，基督教佔了10間，其餘的都屬天主教會主辦的。事實上，在香港眾多的非政府中學，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學校佔了大部分，這些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多多少少都受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薰陶，所以，對管治香港的政權來說，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中共和特區政府想出一個絕世好計，這個就是所謂「校本條例」了。早在1998年4月，梁錦松被任命為一個名為「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負責人，研究這個方案，套用梁錦松的話：「這是一個翻天覆地，且沒有回頭路的教育改革。」這也是說，他們決心要推翻幾十年來行之有效的香港教育制度。

按此條例，校董會不再是由辦學團體委任，而是加入教員校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獨立校董等成員。教員校董乃由全體教員投票選出，校友校董則由校友會選出，家長校董則由家長會選出。校董會成立後的持份比例為教員、家長、校友、和獨立人士等合共40%。而辦學團體可委任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其餘60%的成員，這法例在2004年7月8日在立法會通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

為什麼我說這是絕世好計？表面看來，這一條例比先前的制度民主和透明得多。教師、家長及社區人士都有權參與學校的決策，他們代表著學校各方面的聲音，而且不少是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自然較昔日辦學團體獨攬大權民主和開明得多。正因如此，當在2002年推出此條例的草案時，引起不少辦學團體關注和反對，特區政府就批評立法會民主派議員，豈能支持昔日這樣一個獨裁和不民主的教育制度，結果在2004年7月8日，校本條例在立法會以8票之差獲得3讀通過。天主教教區就校本條例提出司法覆核，指條例有違基本法，法庭裁定教區敗訴。教區於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在2011年10月15日，終審法院駁回教區上訴申請，天主教樞機主教，已屆8旬的陳日君，於敗訴後進行3天的絕食，以示對法院判決之不滿。

究竟特區政府推出這條校本條例的目的何在？是推行香港民主化嗎？當然不是！這一招可說是 divide-and-conquer 的高招。昔日天主教教區轄下數十間學校，全歸教區管理，政府若要推行什麼國民教育，天主教管理層一句NO，就胎死腹中，不能推行；但校本條例通過後，一夜之間，天主教教區完全失去它的話事權，因為話事權是歸於每一間學校的校董會。或許會問道：校本條例給予辦學團體60%的席位，是有相當大的權力，怎可以說是奪權呢？我們可以想一想，天主教教區要委派全香港天主教學校的校董，若以每間有6個議席來算，全港共有208間天主教中小學，便合共1,248個校董的議席了！這是沒有可能完成的事，正如天主教代表黃修女說：「辦學要有著共同信念，總不能常持著校董會內有6成代表，便在議決時以6成投票去壓到另外4成的聲音，辦學是要一心一德的。」

事實上，當我們比較一下事後特區政府如何推動國民教育，便知道校本條例其實是為國民教育鋪路的。校本條例的用意並不是民主化，而是獨裁化，這正是「一黨領導的民主專制」典範，這是假校本，真集權於教育局的手段。不要忘記，這新法例賦予教育局極大的權力，學校的管理若不令人滿意(not satisfactory)或「無法以適當方式促進學生教育」(not in a proper manner)的情況下，教育局有權空降校董進入校董會，甚至完全取消學校註冊。況且，對教會學校而言，校本條例也是一個去宗教化的有效手段，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極高明的策略。

第3，我要提到傳媒和資訊方面的挑戰。在英國統治了超過100年的香港，回歸的時候，已形成它獨有的社會及文化特徵，與國內的一套截然不同，所以才有所謂一國兩制的出現。在經濟上香港是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出現了代議制的雛型，司法上以英國普通法為藍本。在這些保障下，香港人有採訪、編寫、給散播消息的新聞及資訊自由，每一個香港人都享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集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與中國的情形很不一樣。中國的媒介一直為官方控制，是政府的宣傳工具。而香港則以私營報業為主導，媒介的觀點，不須順從官方。相反的，傳媒被視為有監視政府的職責，可以批評政府及其施政。

面對著這樣的一個香港，中國如何扭轉這個局面呢？表面上，在2013年前香港，仍享有新聞及言論自由；但實際上，已大不如前了！首先中國大量投資在香港的傳媒市場上，最著名的有鳳凰衛視。鳳凰衛視的前身是香港衛星電視旗下的中文台；於1991年開播，其後，衛星電視被英國傳媒大亨梅鐸的新聞集團收購，隨即進行改組。鳳凰衛視中文台於1996年3月30日成立，從組織架構看，鳳凰衛視的高層幾乎都曾在中共黨政宣傳部擔任過重要職務。如行政總裁劉長樂、副總裁王紀言、常務副行政總裁崔強，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都是在加入鳳凰之前有中共體制內的履歷。劉長樂也曾表示：央視是大哥，我們是小弟，所以是一家人。已故民主派元老司徒華評價說：鳳凰衛視不只是中共資助控制的媒體，而其裏面的主要負責人，都是有國安背景的。由於北京中央電視台越來越沒有人相信，所以他們更利用鳳凰來打壓異己。

其實，鳳凰衛視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抗衡本港傳媒所發的新聞消息。比方來說，2004年香港7月1日，有兩個遊行：一個是50萬人參加的民主大遊行，一個是6萬人參加慶祝回歸活動遊行。鳳凰衛視只報導慶祝回歸活動的新聞，50萬香港人民民主大遊行，竟隻字不提。我想，這是因為他們主要是報導給防火牆內的大陸觀眾看；但對觀看鳳凰衛視的港人來說，是有一定的影響，我有一個朋友，從前他對中共沒有多大好感，但現在卻是一個藍絲的擁躉了！

我要談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這是一間擁有114年歷史的香港英文報章，也是在2013年2014年度獲逾160個獎項的名報紙。2015年12月，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以20.6億港元，收購了南華早報及旗下的其他媒體資產。自此之後，南華早報生產大量有關中國的文章，不少是試圖把一個中國正面的形象呈現給世界看；這給人一種感覺，它已經不再是獨立新聞，而是一種宣傳工具。中文大學新聞學高級講師陳婉雯說：「南華早報管理層，直白地說出：它的目標是講述關於中國更正面的故事，並發表招致非議的報道，從而破壞了最初讓南華早報有價值的那些特性。」

然而無論是鳳凰衛視，或是南華早報，對大部分香港市民影響並不大。傳統左派報社報紙，如大公、文匯、連那位建制派的李國章也承認這都不是被港人接納的報章，中國若要統戰整個香港的星斗市民，就不得不去影響廣泛受港人接納的明報和香港無線電視(TVB)了。1995年，馬來西亞

華僑張曉卿收購了明報的控股權。他與中國有極多生意來往，那時，不少人都懷疑明報可否仍然保持編輯自主權特色。於2014年，總編輯劉進圖被辭去職位，自此，明報也被視為傾向親建制派的報紙了！

至於無線電視，在2015年4月，有中國梅鐸之稱的黎瑞剛，入股26%股權。雖然無線電視及其他傳媒機構是否落在中資財團手裡，仍是一個謎。但這些傳媒機構，愈來愈染紅，卻是無可置疑的。其實，我個人以為中共在控制媒體上，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社會上製造一種恐懼的心理，令傳媒人士不得不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新聞從業員認為批評中國是有顧忌的，為避免有麻煩，內容上避免觸礁和得罪中央，為安全計，還是禁聲好了！

第4是有關港英栽培下來的公務員。若要管治香港，就不得不依賴差不多擁有17萬以上的公務員團隊。無可否認，在香港管治架構中，17萬多名的公務員群體，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直接影響整個香港的繁榮與安定。當然，領導公務員團隊的政務官AO便是關鍵性人物了！他們都是港英政府培育出來的精英，在理念上與中國那一套相差很遠。所以曾在梁振英政府擔任新聞統籌專員的馮煒光，接連撰文批評香港政府AO是香港最大反中政黨；換言之，這個「港英遺物」可能是中國要管治香港一頭痛的問題。早在董建華時代，他與陳方安生之間的矛盾便是一個明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行政長官董建華連任第二屆(任期2002年7月1日開始)推行一個叫做「高官問責制」的改革。其主要內容有：

- 將所有司長和局長職級，由公務員職位改為由行政長官任命，以合約方式聘用，並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
- 將局長向司長負責的制度，改變為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 政務司司長只負責行政長官直接委派的工作。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原有的公務局局長，改稱為常任秘書長。職責是帶領屬下公務員執行問責局長的政策，及代表局長回答立法會的質詢。
- 將局的數目由16個合併為11個，並不分決策局和資源局，通稱為決策局。

從上述看來，很明顯是削減昔日AO的權力，把大權合於行政首長一身。不少人都認為這是由於董建華跟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不咬弦而引申的改革。從此，政務司司長的權力被削弱，統領眾局長的權力被削去，變成無兵司令。我記得當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被委派為清潔香港街道大使，成為香港人茶餘飯後的談笑話題。這高官問責制員是一種 accountability 制度；但這只是向行政長官問責，而非向香港市民問責。削減AO權力，卻引起一些壞影響，一位AO朋友告訴我，大部分同事都沒有港英時代那種被重視及拼搏的精神，他們大部分時間花在處理市民投訴事宜，昔日公務員的效率似乎漸漸地消失了。

最後，我要談談第23條立法及人大釋法兩大殺手鐮，這正是中共對香港管治的最後防線。基本法有這樣的條文：「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這條法案是中共全面管治香港的殺手鐮，也是牽涉兩地對法律的不同看法。一方面，這是有關一國（中國）事宜，什麼「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等」都是直接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全，按理可照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的相關條例作為香港的法律。然而，基本法卻說明，第23條法案應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自行立法，而香港法律有異於國內法律的體系。在立法時要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定的最低標準相符，並且要與《基本法》中保障香港居民基本權利第17及34條吻合。如此，第23條法案的立法便成為兩地法律體系的角力。對中國而言，法律是政權管治人民的工具，即所謂 Rule by Law；香港普通法體系卻認為法律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即所謂 Rule of Law。這正是「一國兩制」之兩制不同之處，於是便成為兩個不同陣營的角力。一方面，特區政府想推行一個與中國法律為基礎的《國安法》，但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存著懷疑不信任的態度。2003年，香港政府於立法會提出《國家安全法》草案，不少香港人認為該草案侵犯人權，破壞言論自由，激發起50萬人於七一大遊行反對。7月9日，政府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夕，行政會成員田北俊辭職，並表明自由黨在立法會將投反對票。香港政府被迫最後暫時收回，暫停立法，其後亦沒有再提交，直至2020年中國政府用《基本法》附件三的中央政府預留權力，由人大用「全國性法律機制」，兜過香港立法會，頒布香港的《國安法》。由此可見第23條《國安法》立法，是中國一早預訂全權管治香港的手段，只不過沒想到香港市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對吧！

人大釋法這一招亦是中國法制與香港法制角力的另一個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4條第4項，人大常委會職權包括解釋法律；而香港《基本法》第158條亦列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1997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5次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第1次和第3次由香港特首提出，第2次及第5次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只有第4次由香港終審法院提出。其中從第1次及第5次的人大釋法，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人大釋法」其實是中國全權管治香港的一個手段。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就「吳嘉玲案」宣判，指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是否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親生時父或母是否已經成為香港居民、都擁有居港權。」保安司葉劉淑儀估計，10年內會有167萬人從中國內地移居香港，這對香港社會帶來沉重的人口壓力，於是在1995年5月18日，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尋求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會在1996年6月26日作出了解釋，只有獲批單程證的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才享有居港權，若出生時父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則沒有居港權，如此，便把來港人數減至27萬。這次人大釋法有兩大疑點：

- 此次釋法並非由終審法院提出。這與《基本法》158條列明應由終審法院提出的條件不符，一般香港居民恐怕這開了先河，摧毀了香港法治，可不依法律而行事。
- 終審法院雖然定了案，原來卻不是終審的，人大釋法可以否決終審法院的決定，以至終審法院的權力受到嚴重的衝擊。在普通法的法制下，解釋法律是法院獨有的權利。這次釋法是行政干預司法，破壞了香港司法獨立。

第5次人大釋法發生於2016年10月12日，這次是人大常委會主動提出的，同樣是沒有經終審法院提出。事緣於2016年10月12日，民選的梁頌恆和游蕙禎兩位立法會議員，在宣誓時涉嫌有侮辱中國的行為，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裁定宣誓無效，但容許他們再次宣誓；特區政府卻要求司法覆核，剝奪他們立法會議員資格。雖然代表港府的大律師余若海也認為不需人大釋法，可由香港法院自己決定，但於2016年11月5日，人大主動就《基本法》104條自行釋法，指明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職人員，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宣誓，並謹守誓言，因而取消兩位議員的資格。其後，於2017年7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依人大釋法而否定了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及梁國雄4人的立法會議員資格。

由此看來，人大在香港法庭正進行解決這宣誓事件之際，就主動自行釋法，這表示既不信任，也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程序，反映出中央是不信任香港的法院，並且更利用人大釋法這缺口監控管治。

我們可以作個結論，中共對香港的管治是有一套策略的，依據他們所預定的藍本進行統戰及干預。然而他們沒有想到，香港人並不是只醉心於馬照跑、舞照跳這樣低層次的渴求，其後所發生一連串的遊行、運動都表明中國是低估了，香港人其實是有更高層次的渴求和理想的。



第四十九章

港式大遊行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7日，城牆就倒塌了」
(希伯來書十一章30節)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這節經文講述了一個以色列人耳熟能詳的故事，也是以色列歷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戰役。當以色列人進攻迦南地，第一個要攻破的是耶利哥城。那時，耶利哥城是一個非常堅固的城邑，在戰略上也佔了一個極重要的位置，因為它是通入迦南地的門戶。以色列人採取的戰略，是一個非常不正統的方法，我稱之為「遊行法」。他們不是用武力進攻，而是照著耶和華的指示，「繞著耶利哥城走了七天」，持兵器的士兵，和7個祭司，拿著他們的約櫃為頭陣，一面吹著羊角，一面圍著城遊行一遍，並有眾百姓隨後一同圍城遊行，一連6天都是如是。在遊行期間，不發一箭，不呼喊，不出聲，只是默默圍城遊行。到了第7天，他們照樣的這樣遊行，不過這回是繞城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眾百姓就大聲呼喊，城牆就倒塌了。以色列人便上去進城，輕而易舉將城奪取過來。(約書亞記第六章)

這是一個非常古怪的戰術，那些在耶利哥城的守軍，看到這一班以色列人來進攻，但又卻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實際軍事行動，只見他們穿著一些古怪的祭司袍，拿著那古怪的約櫃，吹著羊角，而其他人卻不發一聲，繞城遊行。這樣的戰術，真是莫名其妙！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非常精簡的一句話來形容這場戰役：



反修例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中文聖經把這節聖經錯誤翻譯。原文中並沒有「以色列人」這一句。換言之，不是因以色列人的信心而導致城牆倒塌；若非他們的信心，又是誰的信心呢？原文的意思似乎是直指耶利哥的城牆而言。這真叫人摸不著頭腦，怎會是耶利哥堅固城牆的信心呢？難怪和合本的譯者譯作「以色列人因著信」，但細讀這節聖經，作者肯定不是這個意思。首先我們要明白中國人對「信心」的看法，與聖經對「信心」的看法截然不同。當我們拍著胸膛，激昂大聲說：「我們應有信心，打敗耶利哥人，攻陷城牆！」這樣的信心，其實是自信心，對自己的能力和實力滿有信心，足以打敗敵人。但聖經所謂「信心」，是指到一顆謙卑的心；當我們看到自己的無能、無力、無助，就全然倚靠那全能的神。「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所以對基督徒來說：硬實力(城牆)並非我們倚靠的對象，唯有耶和華才是真正的掌權者。所以，一如十字架，耶利哥城下之遊行，看來是愚拙、無能、軟弱，但卻是神的大能。耶利哥城牆的倒塌，不在乎約書亞率軍有謀，也不在乎他們的兵力，更不在乎領軍的約櫃(因為日後那些以色列人抬著這個約櫃出戰非利士人，大敗而逃)，甚至也不在乎遊行的戰略，乃在乎耶和華的應許和幫助。所以當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因著信，城牆就倒塌了！」他是要強調這是神的應許和大能。

我們暫時撇開基督教神學的問題，談談「遊行」這一個策略。耶利哥城的故事，給我們兩個重要的啟迪：

- 硬實力(堅固的城牆)並不是一定可靠的，它一樣可以倒塌。
- 當百姓萬眾一心，持著信念去遊行，其所發揮的作用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歷史上的事例，屢見不鮮。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我們看看著名的五四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中國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盟國，德國是戰敗國，理應在大戰後，作為戰勝國的一份子，中國當收回昔日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但參與各國，竟然決定把這權益讓給日本，惹起中國人極其憤怒。北京學生發起上街遊行，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其後發展成為一連串活動和遊行，自北平一隅，擴展至全國角落。商人、工人、學生等，紛紛以罷工、罷市、罷課響應，終於北京政府讓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罷免，中國代表團於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名。1921年5月20日，中國與德國共同簽署《中德協約》，德國願意放棄山東權益，包括膠澳租借地。1922年2月4日，在美國調停下，中日簽訂條約，將膠澳租地及膠濟鐵路交還中國，同時，所駐守的日軍也要撤離。山東問題算是圓滿解決，看來，這遊行的確是起了作用。

自此之後，中國有不少學運，包括1931年「九一八學潮」及南京的「珍珠慘案」，學生遊行抗議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中沒有向日本宣戰；又1935年北平學聯發動之「抗日救亡運動」；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等。據歷史學家Jeffrey N. Wasserstrom研究，認為學生遊行對整個中國的政局有著重大的影響，因為他們都是知識份子，將來社會的棟樑，他們大多數來自較富裕的家庭；在校園的自由環境中，組織較為容易。這些大學生目睹國家的腐敗，紛紛起來抗議，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參看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0)

我以為影響香港至大的，倒不是發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學運，而是1980年至2010年代的「顏色革命」和2010年至2012年代的「阿拉伯之春」運動。所謂「顏色革命」，是指1980年至2010年代中亞和東歐等國家，舉行全國

選舉後，由於選舉不透明，舞弊而引起人民大規模遊行抗議。這運動是主張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手段，促使本國政權和政治體制發生變更，並且走向歐美的民主政制，追求他們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一連串運動，是對極權政府的挑戰。它之所以被稱為「顏色革命」，是因為發展這個運動的團體，一般都會拿著一種顏色，或一種花卉，作為自己的標記。因此「顏色革命」，亦稱為「花朵革命」。烏克蘭的革命稱為「橙色革命」；因為尤先科用橙色的栗子作為表示抗議的顏色；喬治亞的稱為「玫瑰革命」，是因為薩卡什維利每次出來遊行都拿著一朵玫瑰花；突尼西亞稱為「茉莉花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稱為「鬱金香革命」。美國學者Gene Sharp在他那本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用非暴力抗爭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所謂「阿拉伯之春」，是指2010年12月突尼西亞一名28歲小販，不甘官員羞辱，引火自焚，引爆「茉莉花革命」。迫使掌權超過23年的獨裁者阿里流亡海外。隨著來的，是一個個革命浪潮，席捲中東和北非地區，包括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截至2020年3月，這革命浪潮已經成功推翻了6個國家政權：突尼斯時任總統阿里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埃及的穆巴拉克宣布正式下台；利比亞成功推翻卡扎菲政權，其本人則被殺；也門的總統薩利赫退位；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尼卡正式辭任；掌權達30年的蘇丹總統巴希爾被政變推翻。但這些極權被推翻後，這些國家卻沒有得享自由、民主、經濟興旺，不少這些國家仍處於內戰中，更引起一些極端的武裝分子興起，四處攻城掠地，人民苦不堪言，而經濟更損失重大，高達6,140億美元之多，所以遊行也未必一定帶來正面的改變。

所以，我們看到：從1980年開始，一直到2020年，整個世界都瀰漫著示威遊行；不過香港的遊行似乎是最具特色的，我稱之為「港式大遊行」。首先，我要談談528大遊行。1989年5月28日，北京朝陽似火，在高溫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悶熱下，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日漸虛弱。這一天，世界各地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聲援天安門的學生，而香港那天的遊行，竟達150萬人之多！不但人數眾多，整個遊行歷時8小時，但秩序井然，締造了香港歷史。這次遊行由支聯會統籌，當日2時，由遮打街行人專區出發，一直沿電車路行至維多利亞公園，聲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不少人以為這是中國一個大突破的時刻，也是一黨專政結束的契機。那時我還在三藩市，收到一位好朋友從香港致電給我，他剛從遊行回家，心情極度興奮，一面講述他的感受，一面不住流下淚水。他從沒有想像到，香港各界人士，無論是什麼階層、什麼政治背景、都一同湧到街上，高呼口號，做夢也沒有想到，連極左的工聯會，也有參加遊行行列，這真是歷史的一刻，永世難忘。我聽了也極其興奮，因為我們在三藩市的教會，不住為天安門學生禱告，出席祈禱會人數打破歷年的紀錄，人人都感到非常振奮；但誰料到短短的一個星期後，解放軍的坦克進入天安門，踐踏在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震驚了整個世界。這場大遊行，不但沒有導致天安門的城牆倒塌，相反的卻似乎越來越堅固，令不少人都感到沮喪、無助和憤怒。

有人說：香港人是善忘的，這句話是有點真實。自六四後，不少香港人都開始打倒「昨日的我」，否定他們昔日對六四的看法，改為一面倒的支持中國政府的止暴制亂手段。然而，亦有不少香港人沒有忘記這歷史的一刻，每年支聯會都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晚會程序，包括誦讀六四死難者的名單，致悼辭、默哀、播放民運人士及天安門母親的訪問片段、並高唱民運色彩的歌曲。第一次於1990年6月4日在維園舉行，參加者有15萬之眾；其後每年都有舉行，其中2012年、2014年及2019年的悼念晚會，赴會者均超過18萬人。當我還在香港的時候，幾乎每年都有參加這燭光晚會，印象深刻。可惜到2020年，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公共衛生問題為由，首次禁止這活動，到了2021年，因著《國安法》，支聯會

遭解散，不少活躍分子被判入獄，這燭光晚會也成為歷史陳跡了！

2003年7月1日，適值香港主權移交6週年之際，60萬(有紀錄以為是50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抗議港府執意就《基本法23條》(即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這是繼1989年5月28日的大遊行後，是其中最多人參加的一次遊行，聲勢浩大，遠超預期，令全球震撼，發起這次遊行的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為「民陣」。2002年9月，政府宣布就基本法23條立法，這引起不少港人關注和憂慮，這法例的草案，是把當時香港法律中不同的條文，加入「推反中國政府、反叛國家、偷取官方機密等條文」列為刑事罪名。香港人批評這法例鉗制香港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並以言入罪，更甚者，是中央政府企圖直接插手香港事務，有違一國兩制，正如今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形容這法例「就像有把刀放在頭上」。再加上2003年沙士疫情爆發，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不安的情緒瀰漫著整個城市，終於觸發起大規模的遊行。雖是如此，起初港府仍然堅拒撤回立法，泛民隨即發動在7月9日包圍立法會，在龐大的壓力下，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於7月6日宣布辭去行政會議職務，該黨8名立法會議員，亦同時宣佈反對草案恢復二讀，港府最終於7月7日宣布撤回23條立法。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特首董建華隨後亦因「腳痛」下台。這一回，23條立法的圍牆真的倒塌了。我記得這一次大遊行中，雖然太太患了重病淋巴瘤，我仍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參加這次遊行，眼見數以萬計的香港人，面對著「失去自由」和「失去健康」的威脅，跑到街上，用遊行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我總覺得，鄧小平以為香港人只顧「馬照跑、舞照跳」，是太低估香港人了！

2012年8月30日，由香港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發起反對國民教育科，進行遊行與集會；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援。在9月7日，集會人數達12萬，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其中有3名學生絕食56小時抗議，當中教協理事韓連山更絕食長達171小時，此行動續至9月9日才宣告結束。查看這國民教育科之內容，的確是引起不少香港人的疑慮，內容偏頗，一面倒的歌頌祖國；有關中國近代史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如八九六四事件，隻字不提，大部分都是歌頌中國在這10多年來的經濟成就，使人質疑此科是推行「洗腦教育」。9月8日，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等召開記者會，宣佈作出讓步，包括將3年的開展期取消；開課與否由各學校自行決定；並應承檢討課程，又承諾在5年期內不會再推動國教科獨立成科。很明顯，這只是拖延手法，其實並沒有撤回。這遊行可算是局部成功，但這已經引起中共當局認真想想：如何管治這個一國兩制的香港呢？

不過，最震撼的遊行，是發生在2019年6月9日及6月16日的「反送中修例大遊行」。6月9日的遊行，有100萬人上街抗議。6月16日，更有200萬人遊行抗議，這兩次遊行破了歷來的人數紀錄，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更難得的，這兩次遊行都大致和平進行。事緣於2018年2月，一個20歲的香港少女潘曉穎，與男友陳同佳前往台北遊玩，潘曉穎遭陳同佳殺害棄屍，陳同佳隨即逃回香港。此案發生在台灣，而港台並沒有引渡協議。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樁難以解決的疑案，因為台灣無法將陳同佳引渡回台受審，香港政府又聲稱此案並非發生在香港，所以無法用殺人罪起訴陳同佳，香港保安局有見及此，乃於2019年2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草案。

據路透社報道，該草案是由中共中紀委倡議的。查看香港原有的「逃犯條例」，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他部分(包括台灣、澳門等)，因為在1992年制定此法例時，強調這法例只能和那些司法制度、刑罰制度、人權狀況相若的國家建立這個引導關係，由於中港法制不同，故此「逃犯條例」並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根據中國的理解：台灣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所以此法例便不適用於台灣了。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大漏洞，造成香港成為一個逃犯天堂，他們以為這是一個黃金機會去填補這個漏洞。這修例草案建議移除原本逃犯條例對中國、澳門、台灣的地理限制，使香港可以利用「一次性」或「專案」或「特設的協議」把疑犯交至中國各地，因此，香港人稱之為「送中條例」。移交申請的單位是法院與行政長官，排除了現行立法會的審議和監督權。行政長官作出移交命令的決定可受司法覆核，逃犯也可以沿著一般法律途徑上訴至終審法院。然而，香港法院在審理這些法案時，只能對申請引渡國家所提出的文件證據和要求是否符合逃犯條例的規定程序，進行審查，也沒有權力審查被移交的人是否實質上犯了罪，更不得審查國家的人權與司法水準是否給予當事人得到國際認可才可的基本保障。

這修例引起香港人廣泛的反對和抗議，認為港府或北京當局會藉此將政治犯引渡到中國受審。6月9日的遊行過程大致和平，不過晚上遊行結束後，數百名民眾與警察爆發衝突，部分民眾突破警察放置的鐵馬，企圖闖入立法大樓，被警方動用警棍和胡椒噴霧阻止，有百多人被捕，港府在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6月12日將如期恢復二讀辯論。

6月12日，一些市民於金鐘、中環一帶集合，要求港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又再引起警民衝突。警方發射了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鉛彈，數發橡膠子彈鎮壓，有80多人受傷，立法會宣佈延後會議。到了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例，並且表示相關工作並沒有時間表，但卻不肯撤回此草案。

到了6月16日，有200萬港人參與反修例大遊行，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並要求林鄭下台。這一次大遊行最深刻的印象，是參與遊行的市民之多元性，有年長的、年幼的、中產的、藍領的、商人、學生及教徒。正如天主教輔理

主教夏志誠說：「此次行動，許多香港的天主教、基督教徒都積極參與，是回歸以來最多教會人士參加的一次社會運動。」

7月9日，在社會強大的壓力下，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宣佈逃犯條例「壽終正寢」，並用英語說：The bill is dead，但卻堅拒使用「撤回」的字眼，到了2019年9月4日，她透過錄像發表談話，正式撤回逃犯條例。

表面看來，這些大規模的港式大遊行真的引起極大作用，從23條立法議案，繼而是國民教育科的推行，最後是反送中條例，都迫使港府讓步。然而，這些遊行的成功，卻引致香港日後迅速的「淪陷」。因為中國看得清楚一個事實：港人無法有效的治港，港法也沒有可能治亂，於是他們便採中國式的「止暴製亂」和「依法管治」這兩大法寶來完善香港的管治，徹底解決香港深層次的問題，下一章我將會詳細討論。



第五十章
止暴制亂？
依法管治？

陳冠中在他的小說《盛世》中，提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有什麼秘訣可以讓老百姓心悅誠服的接納一個專制的威權政府，中國式的一黨執政？陳冠中以為只有大危機才能讓一個專政的威權政府成為暴力的唯一合法壟斷者。何解？所謂「大危機」是指一個亂局，甚至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得不著保障，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反而主動願意在一隻並不可愛的巨靈前面跪下，因為只有這隻巨靈才可以保障他們的生命和財產，而這巨靈之所以能夠解除這「亂局」的手段，就是一定要先嚴打，敲山震虎，止暴制亂，實施峻法，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就以1816年，英國出現經濟大衰退的危機為例，當時英國國債是GDP的2.5倍，更因於1815年印尼發生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火山爆發，全球灰雲蓋目，導至翌年歐洲農作全面失收。當時首相是利物浦，他的顧問就是鼎鼎大名的經濟學家李嘉圖，眼看大衰退將要引起社會大亂，他們就果斷的用了一招危機處理法：就是取得國會同意，廢止Habeas Corpus，即英國的人身保護令，誰鬧事誰不聽話，政府可以不按法律不依程序，抓起來就關進監獄。換句話來說，就是拋棄了民主法制，改用威權主義方式去統治，政府可以隨意踐踏人權。結果如何？在整個大衰退期間，英國的刁民都不敢鬧事，過一年後經濟就恢復了，真是神奇！換言之，唯有這種威權政府的統治方式，才可以幹大事。但若要有心悅誠服屈服於這威權統治，「大危機」或「亂局」是必要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條件，「嚴打」也是唯一治亂的手段。(參看《盛世》217-218頁)

我以為另一個例子便是2020年的 Covid-19 疫症危機。中國所採取的政策，叫做「動態清零」，這政策正是中國一向處理危機的手段。所謂「動態清零」，是指一旦發現一例傳染病確診病例，是用「嚴打」防控的方法，隔離密切接觸人員，控制病毒的影響範圍。所以在2020年1月23日，為了盡快防堵病毒擴開，中國當局突然對武漢和湖北省其他城市實施嚴苛的封城措施。官員在社區大門貼上封條，禁止居民外出，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許多居民絕望地憑窗呼救，儘管受到嚴密審查，甚至有些患長期病患的人士，因家人染了 Covid-19 被強制隔離，在無人照顧下而在家中死亡，情況是非常惡劣的。但到了四月份，官方發佈的每日確診人數降低為個位數，而且不再有死亡的病例，疫情受到控制了！所以，對整個國家來說，武漢之幾萬幾千人，放在全國14億人民來說，這些犧牲是值得的，正如官方所說：「武漢必勝，湖北必勝」，因為「中國必勝」。反觀歐美國家，他們注重個人權利、自由，不戴口罩是憲法保障的權利，不打疫苗是我個人的選擇，導致全國大部份人都染上病毒，死亡人數無數。所以不少中國人，包括當權的精英，力挺中國的「動態清零」的策略遠勝歐美之「與病毒共存」之策略，公共安全先於個人自由，中國式的世界秩序遠勝過歐美的世界秩序！他們更指出，在疫症期間，中國是唯一保持增長的經濟體，這就更證明中國式的世界秩序的優勝！

所以，亂局(大危機)的出現，也正是鞏固一黨專政體系的黃金機會；對香港來說，「亂局」是中國直接全權管治香港的契機。但究竟香港的亂局是怎樣出現的呢？我們就要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開始說起，這又稱為「雨傘運動」的，如何啟開了香港新的一個局面。

2013年，香港大學法律系前教授戴耀廷發表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一篇文章，提出以違法佔領道路的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之後聯同香港社會學者陳健民和牧師朱耀明共同成為佔領運動發起人，他們被稱為「佔中三子」，「佔中三子」本來的計劃只是希望幾千人在中環和平佔領，等候被補，並且把這個運動正名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但對一些年青的學生來說，這樣的運動似佈道大會多於政治運動，不大認同。在另一方面，前傳媒人周融等亦發起「幫幫香港出聲行動」，明言自己是正，佔領中環是邪；所以這個運動尚未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三大派別，一是「和理非」派，主張以和平方法去訴求「普選」；一是較激進的一派，稱為「勇武派」；一是反佔中派，也是建制派，他們彼此在網上攻擊，這是埋伏了日後的亂局種子。

2014年8月31日，人大通過提名門檻十分高的普選特首框架，戴耀廷等表示不能接受，並稱將會發動「佔中」，但他們還沒有公布佔中日期，那些年青的學生已經開始有所行動。9月26日，學生發起罷課，晚上並到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集合，警方清場，並拘捕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會秘書長周永康，及前秘書長岑敖暉等人，這更引起市民不滿。入夜後，集會人數漸多。9月28日，凌晨1時40分，戴耀廷宣佈佔中正式開始，但此舉卻引起爭議，部份示威者以為他們的和平佔領運動已被激進的學生騎劫而離去。其後，更多學生進入夏慤道一帶，佔領區更蔓延至銅鑼灣，旺角等地，他們以雨傘阻擋警察所使用的胡椒噴霧，因此外媒使用「雨傘運動」、「雨傘革命」來形容，代替了「和平佔中」。正如戴耀廷說：「現時是雨傘運動，不是和平佔中」。這個「雨傘運動」自2014年9月28日開始，一直至12月15日警方全面清場為止，共有兩個月兩週又3天，佔領地區包括中環、金鐘、灣仔、旺角等地，參與遊行，佔領、罷市、罷課、絕食、靜坐抗議等共有120萬人；而警察動用了7,000警力，而反佔中遊行亦有19萬人。警方採用催淚彈，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胡椒噴霧，布袋彈等驅散人群，超過400多人受傷，有955名佔領人士被捕，有47個反佔中人士被捕，亦有8名警察被捕。佔中三子於12月3日自首，於2019年4月9日，香港法庭裁定佔中三子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成，判囚16個月，朱耀明獲緩刑2年，與他們3人一同被判罪成的還有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浩銘及李永達等人。

究竟這次的佔中事件對整個香港有何影響？首先，我們看看一些民意調查。2014年11月19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5成半受訪者反對「佔中」行動，而支持者則只有28%；另外，83%的人認為應該停止「佔中」行動，認為應該繼續的人只有13%；68%受訪者以為香港政府所採取的清場行動是對的。由此可見，「佔中行動」似乎並未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認同，對民主運動似乎是打了折扣。香港市民之反對佔中，其中一個原因是帶來直接經濟損失，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琮指出，在此期間，中環、金鐘、銅鑼灣及尖沙咀等區的銷售額全線報跌，生意平均急跌10%至45%，由於來港的大陸遊客銷費減少，2014年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首次黃金週(國慶一週)零售額下降，或許香港人似乎還是著眼看「錢」多於「民主」！

無論我們怎樣看這次的「雨傘運動」，有幾個事實是無可否定的。首先，這是「亂局」的序幕，隨之而來的，我們看到更多的「亂局」出現；其次，學生是整個運動的主幹，今日如是，日後也是如是。我在2013年至2016年重返香港大學唸中國近代史的博士學位，雖然我在校的時間有限，而且接觸的都不是本科生，但身處校園的環境中，多多少少也看到香港大學生真貌之一麟半爪。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 2018-2019年 自殺的學生有31人，其中11個是大學生，其餘為中學生。
- ◆ 2019-2020年 自殺的學生有6人，其中2人是小四學生，卻沒有大學生。
- ◆ 2020-2021年 自殺的學生有10人，其中大學生佔2人，其餘為中學生。
- ◆ 2021-2022年 自殺的學生有7人，其中只有1個是大學生。

自2015年(即雨傘運動後)，至2019年(即反送中條例前)，有接近155名學生自殺身亡。單以2017年，全年自殺死亡人數為36人，較2016年的24人多5成。(上述資料乃根據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引述)

從上述的數字來看，2015年是關鍵的一年，學生自殺人數冒升，但到2019年，學生自殺人數卻又突然驟降，而2019年是「反送中運動」的開始。在這兩個重要政治運動之間，正是香港學生有史以來自殺數字突升的時期，我們不禁問道：「為什麼？」

或許以下的一個真實故事可以給我們一點啟迪。Crystal於1997年出生於香港，2003年幼兒園畢業，也正是23條修例，50萬人參與七一大遊行反對立法的一年，她媽媽也有帶她去遊行，跟著每年六四她也有與家人前往維園悼念六四的死難者。2003年也是SARS爆發，她說：「戴口罩就是

從幼兒園就習慣了。」2009年，她小學畢業，香港發生了「豬流感」(H1N1 新型流感)，那年，香港共有22,000宗確診個案，15人死亡。2014年，她中學畢業，準備考大學，「雨傘運動」開始了，超過120萬人參與這運動，她跟朋友在中學發起罷課，結果被老師逐出班房，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之久。事後，她決定離開香港，到台灣唸大學。到了台灣後，發覺對香港有著深厚的感情，以為有許多人人生目標只想在香港實現。雖然她是在1997年5月出生，依英國規定，可以辦英居留，但她自嘲說：「沒有BNO，她只能快裝VPN，作翻牆之用。」

我總覺得97後的一代香港人，是真正失落的一群，正如一個在97年7月1日出生的青年人說：「我看不到這個城市的未來」。他們大多數都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反而對香港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但眼見這個舊香港，瞬息間就會逝去，在諸多的政治運動下，愈來愈感到無望，無前途，不少寄情於「打機」中，或成為自閉的宅男宅女；更有不少患上抑鬱症，這情形於2014年「雨傘運動」後尤甚，他們更覺無望無助，所以我們看到自殺的數字冒升。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不少學生，抱有理想，仍不忘初衷，以為中國應實踐她「50年不變，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承諾；但要達此目的，港人不能當個順民，而要爭取；就是犧牲也是值得的。2019年的反送中條例的遊行中，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 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 撤回「暴動」定性
- 釋放被捕者，且撤回控罪
-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暴的問題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台，並實現「雙普選」，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均由香港市民直接選舉產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這次運動給予這些年青年人新的動力，新的意義，他們覺得這是人生的意義，所以我們看到2019-2020的自殺率驟降！

2019年的「反送中條例」運動，使香港的亂局急轉直下，以下是簡述這亂局的演變過程：

• 2019年6月12日的612警民衝突

港府預備在6月12日在立法會進行「送中條例」二讀，上萬人包圍立法會，要求停止二讀，撤回修例。下午3時，警民衝突升高，港警使用胡椒噴霧、煙霧彈、布袋彈、橡膠子彈趕散示威者，並定性為「暴動」，因警方大舉反撲，多人中彈浴血。至凌晨示威者才散去，這啟開了較嚴重之衝突。

• 2019年7月21日血濺元朗

7月21日，43萬人上街反送中第6次大遊行。結束後，逾千名示威者集結在西環中聯辦門口，用噴漆塗黑中國國徽，警方向人群連續開了36槍，55枚催淚彈，5粒橡膠子彈，數量創新高，震驚社會。

那一晚，一批身穿白衣者現身元朗，持棍無差別追打市民和示威者，並且進入元朗西鐵月台，在車廂內襲擊乘客。暴行持續2小時仍不見警方到來制止，造成記者和民眾36人受傷送院，4人重傷，1人一度命危。不少人認為這是有勢力人士故意製造混亂，並且得到警方包庇。

• 2019年8月31太子站之亂

8月31日，被視為這次運動的重要日子，鎮暴警察與速龍小組衝入太子地鐵站，在月台上，車廂中，無差別的毆打乘客，又不讓媒體及醫護人員進入，引起不少人抗議，並流出有些人死亡的

傳言，民眾與警察之衝突愈加劇烈，警察愈加嚴打，民眾對警察的憎恨就愈大，情況非常惡劣。這更引起世界關注，外國政府指斥香港處理不當，美國國會更預備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取消香港之「獨立關稅」地位，並且制裁一些剝削香港人權及民運人士之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

- 到了11月，情勢更惡劣，科大生周梓樂不明原因墜樓身亡，一般人以為他的死與防暴警察有關，港人要求獨立調查。再者，警察三度實彈開槍傷人，其中一名更是生命危殆，警察又衝入中文大學校園，示威的學生以汽油彈回擊，引起極大的混亂。於11月16日，理工大學更發生圍城戰，學生死守校園，警察發射催淚彈等驅逐示威者，卻遭校園內學生以汽油彈及弓箭回擊。單以18日計，警方發射了1,458發催淚彈，橡膠子彈1,391發，布袋彈325發，共有1,100人被捕。
- 到了11月24日，香港四年一度的區議會選舉，因反送中運動引起市民對政府及建制派不滿，登記選民人數突增至413萬，投票率更達71.2%，是香港選舉之新高。在這一次選舉中，民主派人士大勝，從本來的125席躍升至388席，建制派則從299席跌至59席；這一次明顯對港府投下不信任票，這亦給中央政府看到一件事實：港人無法治港，港法無法治亂。終於中央當局主導制定的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實施，「完善」整個香港法律制度及更嚴打反對人士；實際上，中國是提前終結了北京承諾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

究竟這《國安法》是什麼呢？何以它可以扭轉整個局勢呢？原來此法賦予北京直接在香港增設國安機構與人員，一些案件可以由北京派遣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人員直接在香港偵察，檢控及審判在內地進行。

(1) 中央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 可直接立案偵查，並由內地的檢察機關和法院進行檢控與審判，完全繞過香港的執法 and 司法制度。
- 在執行任務時，不受香港執法人員檢查、搜查及扣押，享有特區法律下規定的其他權利及豁免。
- 與中聯辦、外交部駐港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合作。
- 管理外國和國際組織駐港機構，外國及本港的NGO及新聞機構。

(2) 中央特派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

- 首任顧問為中聯辦主任。
- 他既是顧問，就有權提供意見
- 列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3)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 特區本身亦設有國安委員會。
- 主席為特首，成員包括政務司長、財政司長、律政司長、海關關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國安部門負責人、入境處處長、保安局局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 此委員會工作不受香港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公開，不受司法覆核。
- 警務處設安全部門，配備執法力量，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命，但需書面徵求駐港國安署意見。
- 律政司設國安罪案檢控部門，負責檢控工作。部門負責人由特首任命，但得徵求國安公署意見，而檢控官則由律政司委任，但得徵求國安署意見。

(4) 《國安法》涵蓋四類罪行

- 分裂國家罪
- 顛覆國家罪
- 恐怖活動罪
-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罪

當起初推行這個《國安法》時，特首林鄭多次保證只是針對一小撮人；但事實上，觀其內容及推行之後的結果，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傳媒、教育幾乎無一領域不受沖擊，紅線無處不在，面目全非。事實上，香港其實已開始了「第2次回歸」。不錯，表面上，這種「完善」各種制度的手法，好像已達到「由亂變治」的效果，但所付出的代價卻是非常巨大，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香港已不再一樣的了，社會瀰漫著恐懼、不安與哀愁。我們看看以下的一些實例：

- 《國安法》生效1年，已經有117人被捕，包括95男22女，年齡介乎15至79歲，其中64人被檢控。
- 當中被捕的，不少人是只因持著一面旗，或一張貼紙；如一個15歲的少女，揮動「香港獨立」旗幟而被捕，又有一名拿著一面「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而被控。
- 《國安法》鼓勵告密，自2020年11月5日開設舉報熱線，至2021年5月10日，共接獲超過10萬則舉報事件。
- 《國安法》亦成為打壓反對派的政治工具，至2021年2月28日止，有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尹兆堅、林卓廷、楊岳橋、譚文豪、朱凱迪、毛孟靜等。

- 不少被捕人士不獲保釋，被還押受審，猶如「未審先關」，其中不少已經被關了一年多，但他們雖未定罪，但已經失去自由年多！
- 不少被捕的人中，包括傳媒記者，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務使在香港的立法會再沒有反對派的成員；香港的傳媒，也沒有反對的聲音。
- 自《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便爆發了移民潮，事隔一年多，已超過20萬港人離開香港；其中以移居英國的人最多，其次是加拿大、澳洲、台灣等地，不少都是專業人士，而且這種情形會不住加劇。

究竟香港的前途會是怎樣的呢？留待下一章再討論！ - - - -



第五十一章

新常態的
香港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閻小駿在他那本《香港治與亂》一書中，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詞句來形容香港的未來——新常態的香港。他說：

「從2014年9月28日開始的「佔領運動」到2015年6月18日「特首普選制度本地立法」失敗的時間帶，構成了回歸後香港的政治分水嶺。在佔領運動和政改爭議結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這也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香港政治的新常態。即曰新，那麼這一治理狀態肯定與過往的治港經驗之間存在實質差異；即曰常，則自然表示這一治理狀態，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期內逐漸穩定下來，成為日常化的管治狀態.....新常態的「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的「常」意味著相當穩定。在新與常之間，蘊含著香港政治在過去18年裏所發生的潛移默化的變遷，以及其後政治走向的塑造力量。」(p.229)

究竟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新常態呢？閻小駿列出有3個可能性的局面出現：

- 第1個局面，就是香港與北京之間已經重建高度的政治互信。換言之，在這個新局面，香港人將會完全相信國家的主權、治權和管治的方法，同時香港也成為中央權力完全信賴的政治邊陲。唯有這樣，「一國兩制」不但可以得以保存，更可得到巨大的擴展。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第2個局面，是香港人仍存著「反中」「抗中」心態，中國的主權和治權得不到香港人的認同，國家的利益仍在香港得不到保障，北京與香港之間彼此信任的程度很低。如此香港始終都要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實行統一管治的一線城市。
- 第3種局面是香港的政治態勢進一步惡化，社會更為撕裂。年青的一代不斷激烈化、暴力化，甚至主張港獨。閻小駿以為這是一種自殘的行動，若是如此，一國兩制必會提前結束，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派員管理的一線城市。

閻教授在中國長大、受教育，雖然曾在美國留學哈佛，又是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精英，但他還是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場上闡論香港的前景，他以為香港唯一的前途就是完全認同和擁護國家在香港的主權、治權和利益。正如他說：「中央權力在香港所擁有的主權和治權也將越來越彰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政權安全、領土統一和核心利益的關注，將成為香港事務上最優先事項.....其重要性恐怕將是壓倒一切的。」

或許我們會問：「基本法豈不是確定了香港是港人治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嗎？難道所謂港人治港，並不意味著港人擁有治權嗎？」閻小駿強調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國兩治，50年不變亦不是50年不管。主權與治權是分不開的，中國是享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這權力既可以由北京直接行使，亦可以授權予特區政府行使。換言之，香港特區政府的治權完全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既可授予，亦可收回。主權完全操於北京政府手裏。在回歸初期，中央給予香港不少政治上的優容、經濟上的扶植，這只是一種特別的恩惠，而非常態。北京對香港事務的處理，逐漸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發展、穩定才是中央政府的目標。

然而，閻小駿卻說得對，問題的關鍵乃在乎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是因為他們或他們父母不信任中共政權而千方百計逃至香港，並且以香港作為他們的家，要他們完全信任中國政府，這是否不切實際呢？對那些香港精英分子或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以為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及《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下，香港人仍可以享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香港人還可以一人一票選出他們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香港一直沿用的普通法仍是香港的法律，行政不會干預立法及司法，政治不會凌駕法庭的審判，香港的法治精神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正因如是，他們反對「送中條例」，並出來遊行抗議。

其實信任的問題，倒不是在乎香港人，而是在乎中央政府。在威權政府的管治下，尤其在2019至2021年一連串的運動中，政府用強力壓制、未審先判、以言入罪等方式，這只會令香港人活在恐懼中，又怎會信任如此的一個政權呢？不過，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就是政府的誠信，用謊言、虛假大外宣及含糊的語言偽術等手段出賣了自己的真誠和信實，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我們就以「新常态」這個詞語為例：新是意味著改變，去舊是迎新的一個必需條件，所謂新常态，即是說昔日的常態已不復存在，已成為歷史陳跡了。那麼「新常态」又是什麼意思呢？當我們說一切如常，是表示沒有改變，昔日如是，今日也是如是，這就是如常了。除非我們說昔日的常態不再有了，現在新的常態取而代之，這才是合邏輯的說法；然而，閻教授一方面說是新，既曰新，即是變，但怎麼他又說在這個新常态中，「一國兩制」不但得以保存，而且與1997相比將得到巨大擴展；香港的特首和立法會均照循序漸進的路程實現了全民普選，香港的法治傳統得到維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得到加強，北京對香港的管制減低到最小程度，香港既屬中國，又面向世界，變成為一個高度自治的理想化自由都市呢？這樣的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邏輯思維真叫我大開眼界，這種語言偽術在今日的香港真是司空見慣，可媲美George Orwell在“1984”所說的名句：「戰爭即是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是力量。」

其實人生無常，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正如聖經雅各書四章13-15節說：「噫！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去，在那裏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不但個人際遇如是，世界局勢更是如是，千變萬化，那有「常態」這回事？蘇東坡說得好：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無論是那個英姿瀟灑、睿智不凡、頭戴綸巾、從容地搖著羽扇，在一片笑聲中，指揮水軍，將曹營萬艘軍艦，燒為灰燼的周瑜；或是那個神奇妙算，料事如神，借助東風的諸葛亮，這些英雄豪傑，還不是如長江滾滾大水向東流，一去而逝，消失於影中。這一切一切，都如雲霧，在歷史瞬息間消逝！

然而，基督徒的人生觀，卻又不是消極地等候末日來臨，在世無欲無求，只採取「躺平」的態度。在路加福音十二章56節，耶穌講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話：「你們知道分辨天地的氣色，怎麼不知道分辨這時候呢？」意思是：世人往往懂得利用他們的智慧去分辨世事，預測未來；正如猶太人能分辨天氣，刮起南風，便知道天氣將會非常燥熱，吹起西風，便知道將會

降雨、天氣也開始清涼；又如今天的專家，分析世界局勢，預測時局的發展。但耶穌卻警告我們：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分辨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什麼時代呢？不是從國際關係、時事分析、經濟走勢等去預測未來，而是從神學的角度去看清楚：我們是活在一個怎麼樣的時代！

2022年3月，俄羅斯揮軍進佔烏克蘭，但俄軍屢攻不入，更是傷亡慘重，普京不惜採用超音導彈，襲擊烏軍及平民，以致不少無辜的烏克蘭平民遭受殘害與暴殺，引起世界公憤；更有超過400萬難民逃往鄰國。俄羅斯更聲言要啟動核武機制，用以恐嚇西方插手，一時局勢緊張起來，恐怕會發生第3次世界大戰。有些基督徒更以為這是象徵著世界末日將至，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這一切都催使我們要認真從聖經的角度，去看看我們今天究竟是處在一個怎麼樣的時刻。馬太福音第24章是一段非常適切的經文，就讓我們詳細看看。

表面看來，這段經文充滿了矛盾，前後不一致，難以理解。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矛盾：

- 前言不對後語的矛盾----在32至33節，耶穌說：「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桑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耶穌這句話不難明，當我們看見那無花果長出嫩葉時，就知道夏天近了。換言之，嫩葉的出現，就好像是夏天快要來臨的徵象。同樣的，當我們看見「這些事」出現，就知道基督將要來臨了，因為「這些事」的出現就是基督來臨的徵兆！然而，在36節，耶穌跟著講了一些幾乎與此相反的話：「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嗎？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 我們再看「那些事」，即是那些基督來臨徵兆的「那些事」。

在v.5-31，耶穌提到一連串的事來回答門徒的提問：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

- v.5—有好些人冒耶穌的名說：我是基督，並且迷惑多人。
- v.6—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 v.7—多次有饑荒、地震等天災。
- v.9—信徒為了主的名被殺害和恨惡。
- v.10—許多信徒跌倒。
- v.11—有假先知出現，迷惑多人。
- v.12—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愛心也漸漸冷淡。
- v.14—福音傳遍天下。
- v.15-22—走難
- v.24—假基督、假先知出現。

一般信徒都以為這是主再來的預兆，因為耶穌是解答門徒在v.3的提問：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但當我們仔細看看這些所謂預兆，其實並不似主再來的預兆。何解？只要我們查看由新約時代開始，直至今日，有那一個時代不是有人冒耶穌的名？有那一個時代不是沒有飢荒、地震、打仗、信徒跌倒、假先知、假基督教、假聖徒出現呢？我就用個比方，若問我：「你何時會返回香港作長期居留？」我的答案是：「當你看到香港有人吵架、有人跳舞、有人唱K、有人被警察拉、有人入醫院，你就知道我返香港的日子近了，就在門口了！」請問：有那一天香港是沒有人吵架、沒有人跳舞、沒有人唱K、沒有人被警察拉、沒有人入醫院呢？所以，這樣的說法是沒有意思的，它們根本就不是預兆，已是見慣見熟、每天都發生的事。有人反駁說：「這是指程度而言，當主再來前，這些事

會發生得特別頻密。」但若如是，標準又在那裏呢？怎樣才算是頻密呢？這是非常主觀，難以估計的！說了好像沒有說過一樣。

若要明白這段經文的意思，我們先要明白3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1. 猶太人對「主降臨和世界末了」的觀念。舊約聖經裏提到「彌賽亞降臨」的預言，他們稱之為「主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如(約珥書二章30-31節，以賽亞書十三章10-13節)。主的日子有以下幾個重要觀念：
 - 這是神審判的日子，也是祂彰顯憤怒的時刻。所以當約翰出來傳道的時候，他說：「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路加福音三章7節)
 - 這同時也是拯救的日子；對神的子民而言這是拯救的日子，但對那些非神的子民而言，這卻是審判和咀咒的日子。
 - 這也是末世的日子。

正因如此，門徒把「主降臨」和「末世的日子」混為一談。

但主耶穌來了，卻把這觀念分開，主降臨是分兩次的：第一次基督降臨是為了拯救我們，耶穌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贖了我們的罪，只要信祂就必蒙拯救。耶穌第二次來是為了審判世人，我們稱之為「主再來的日子」。

所以當耶穌初出來傳道的時候，祂在會堂講道，引用了以賽亞書六十一章1-2節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17-18節) 如果我們比較這一段聖經與以賽亞書六十一章1-2節時，發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以賽亞書的一句「報仇的日子」，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耶穌卻提也不提。祂只講救恩、釋放、醫治、完全沒有提及審判。原來耶穌對末世的看法與猶太人很不同，這裏所謂「末世」並非一點，是一個時期，而且是頗長的一個時期。耶穌第一次來，就啟開了末世的時代，一直到主再來的一刻才告結束。我們稱這末世時代為一個 already-but-not-yet 的時代。

2. 第2個背景是有關猶太人的歷史。二十四章1-2節：

「耶穌出了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希律大帝重建聖殿，工程相當宏大，石與石間鑲有黃金，太陽反照，非常悅目。所以門徒就指著聖殿給耶穌看；但耶穌卻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嗎？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大多數解經家都認定這是指69 A.D.所發生的事。那一年，猶太人作反，企圖從羅馬人手中奪回耶路撒冷，重建他們的猶太王國，提多將軍率領羅馬大軍，重重圍困耶路撒冷城。在那場戰役中，據猶太歷史學家 Josephus 所記述，有超過一百萬的猶太人捐軀，是歷史慘劇，非常震撼。所以耶穌說：「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二十四章21節)

3. 第3個背景是有關這段經文的上文下理。第24章的出現，絕不是無緣無故，一定有前因後果的。馬太福音16章是整本福音書的分水嶺。這裏，記述耶穌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所發生的事。首先耶穌向門徒發出兩個問題：「人說我人子是誰？」

「你們說我是誰？」他們回答說：「有人說是施洗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一位。」但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聽到彼得的話，就講述兩件事：

- 其一：耶穌說：「我要把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教會」這個名詞，首次在福音書出現，耶穌說，「教會是祂所建立的，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 其二：耶穌又預言祂的死，說：「人子必須上耶路撒冷，受長老、祭司、文士許多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這是耶穌首次明言祂要受死。門徒當然不能接納，因為既為彌賽亞，祂來是要審判，絕不能被審判，是拯救，絕不是被殺。所以彼得說：「千萬不可以如此，這是不能到你身上。」耶穌轉過身來，斥責他：「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此事以後，路加就講述耶穌上耶路撒冷受死。講完上文，要說下理了。二十五章是一連串的比喻，全部都有同一的主題：耶穌吩咐我們要好好預備祂的再來，祂來是要審判這個世界，並且分別出忠僕和惡僕。

明白了這些背景，讓我們再看看這段經文。有3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值得我們留意：

1. 第3節是本章的中心。門徒向耶穌提問：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耶穌在第4節就這樣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所以，我們清楚知道，耶穌在這裏絕不是滿足門徒的好奇心，解答什麼時間是世界的末日，而是叫他們做醒，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第二十五章的比喻也同樣有這樣的一個主題。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2. 第2段是v.5-28。這一段 有好幾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 猶太人以為主降臨的日子也即是末日之時，既施行拯救，同時也執行審判。對他們來說，這應是一個榮耀的日子，他們會脫離束縛，更擁有權柄作榮耀的管治。但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錯了！不是榮耀的管治，而是受苦」。
(It is not the time to reign in glory, but the time to suffer)。
所以，耶穌講出一連串所謂的預兆：打仗、飢荒、苦難、被殺害、內憂外患、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和憎惡、愛心冷淡、假先知和假基督的出現。然而，弔詭的地方，就是在這艱難時刻，福音卻因此而廣傳，教會也大大增長，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作她。這正是這個 already-but -not -yet 時刻的特色。
- v.15-27 指出舊約的時候到此為止。v.15 提到但以理書一句非常奇怪的話：「那行毀壞可憎」。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沒有人知曉，但明顯這是指著耶路撒冷的聖殿而言。此句出自但以理書十二章11節，不少解經家以為這是指170 B.C.，敘利亞皇帝Antiochus Epiphanes強迫猶太人獻豬於聖殿的祭壇上。這是極盡侮辱之能事。170 B.C.所發生的事，正好預表了69 A.D.聖殿被拆毀一事而言。舊約的宗教以耶路撒冷為中心，聖殿不存在，也象徵了舊約時代的結束，新約時代啟開了。耶穌說：「我就是聖殿，被拆毀後三日重建起來。」當然，耶穌是指著祂的死和復活。有形的聖殿沒有了，但因著耶穌的死與復活，教會就建立起來，這就是教會時代，也稱為新約時代了！

3. v.27-31是第3段。在此，耶穌談到主降臨的預兆；所有這些預兆與先前所提及的預兆很不同，先前的預兆是地方性的，主要是以猶太人、猶太地為中心。但在這一段，這些預兆都是普世性的天象，也從沒有在歷史上出現過的；包括日頭變黑、月亮不放光、眾星墜落、天使震動。此外，v.30更提到地上的萬族，從四方招聚來的選民，很明顯這是描繪主再來的圖畫。人子有能力、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又有號筒吹響的聲音。我們見到這些預兆，就知道主耶穌要再來了！但我們卻不知道那日子是在那時刻，所以我們要做醒，正如v.42-44說：「所以，你們要做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做醒，不用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香港的前景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個世界仍是一個亂局，神亦沒有答應我們天色常藍，耶穌說：「你們在世上有苦難，但在我裏面有平安」。在日光之下，我們仍然看到很多不平、不公、不義；信徒仍會遭受逼迫。我們不禁問神：「你為什麼掩面不看這些罪惡呢？」一如先知哈巴谷所說：「耶和華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要到幾時呢？我因強暴哀求你，你還不拯救？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你為何看著奸惡而不理呢？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又起了爭端和相鬥的事，因此律法放鬆，公理也不顯明，惡人圍困義人，所以公理顯然顛倒。」（哈巴谷書一章2-4節）

我太太君玉曾經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回，一班志同道合的弟兄，攀山越嶺，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他們來到一條河，一位弟兄不慎失足，跌入河中；更不幸的，他的泳術不精，只見他在河中拚命掙扎，一浮一沉，情況不佳。隊中有一位是救生員，眾人當然望著他，期望他立即跳入河中，把這位

弟兄拯救上岸。誰料，他動也不動，但在旁觀看，有些人實在忍不住了，就大聲催促他下水救人，他仍然沒有反應。但見這位在河中掙扎的弟兄，氣力越來越衰退，更有下沉的跡象。正在危急之際，這救生員立即跳入河中，輕而易舉把他拯救上岸。其後，眾人問他，為什麼不立即下水救人呢？他回答說：「當這弟兄仍是有氣力，若我在此時跳入河中，他一定拼命與我掙扎，這只會增加拯救的難度。但當他氣力衰退，無法靠自己時，他自然會全然倚靠我，非常合作，我就可以輕易把他拯救上岸。」這就正如傳道書三章11節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在等候神出手的時刻，我們不是躺平，而是按神給我們的分，好好治理這個亂局。中國內地會傳教士Elizabeth Kuhn講過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晚上，一個人獨自在簡陋的屋內，只有一支蠟燭，發出微弱的光輝，給這位仁兄少少安全感。外面漆黑一片，然而他知道黎明一到，照亮整個房間，這微弱的燭光就微不足道了；但在太陽還未出來的時候，還是要竭力保持這燭光，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同樣的，在主還沒有來之前，我們仍要竭力盡我們的本分，務使我們居住的社群安穩，這是神給我們文化上的使命；但我們知道，人基本的問題是內心的問題，人的罪性是社會亂局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耶穌給我們的使命，是把福音傳遍天下，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這正是我們在這個時刻的目標和意義了！但我們深信，漫天烽火後便是黎明，主再來的時候，建立新天新地，在那兒，再沒有眼淚、死亡、不義。這就是真正的新常态了！

我的香港夢

「終」是一個很古老的漢字，早在商朝甲骨文時代，這個字已經出現了。起初，「終」是這樣寫的「𠄎」，後來才演變成「終」的寫法。有些文字學家，把「終」這個字解釋為「像繩端終結之形」；昔日以結繩記事，當繩末結上一個結時，就表示終結了。有些文字學家，對此卻有不同的理解，以為末端的兩個符號，是一種敲擊樂器，當音樂終結的時候，兩者相碰，鏗然一聲，然後歸於死寂，這就是「終」了。

無論是繩端終極之形，或是音樂終結之象，「終」這個漢字的確極有詩意。兩種不同的解釋，都同樣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莊嚴感，但同時亦有點神秘、傷感的意味。想到杜甫《閣夜》這首詩，真能把這個「終」描繪得淋漓盡致：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野哭幾家聞戰伐，兒歌數處起漁樵。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所謂「歲暮陰陽催短景」，是指年終的時候，倍覺光陰過得特別快，很催逼似的。「嘩！又一年了！」來匆匆，去也匆匆。「天涯」就是指天的終極，天邊的雪在天涯的寒夜也終止了，這正是「天涯霜雪霽寒宵」。夜之際，五更時分，軍中戰鼓之聲又響，配上三峽急流之水聲，特別悲壯。但最慘的，倒是戰伐之聲一到，人的生命就終結了！無論是聰明睿智的臥龍先生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諸葛亮，或是躍馬稱帝的公孫述，最終還不是歸於黃土！正所謂「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反觀聖經對「終」的看法，有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涵義。新約聖經是用希臘文寫的，希臘文 telos 這個字非常有趣，在新約聖經，這個字出現過 42 次，其中不少是指世界的終結，俗稱為「世界末日」，但同時亦有解作人生命的終結。然而，telos 與漢字「終」很不相同，可解作「完成」「達標」「新的時代來臨」，就如蕭條的冬天過後，便是充滿生機的春天，世界之終結，也就是新天新地的開始。這個字帶給人盼望，多於傷感和悲哀。就如使徒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是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章 7-8 節）這是凱旋之歌，並沒有傷感。

在過去 60 多年中，我從難民的身份開始，漸漸培植了獨特的香港基因於我體內。就是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後，香港仍保持著她本有的特色，中央也貫徹一國兩制的承諾。我們有著同一的語言、文化、電影、音樂、人生哲學、生活習慣、法制和歷史；雖然我們沒有民主，但卻享有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學術自由。我們既有傳統的中國文化特色，同時也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響，這種中西合璧的文化，與其獨特的地位，以致香港這彈丸之地，竟可置身在世界舞台中，顯其光輝。查看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的成就確是驚人，令香港人引以自豪：

- 經濟方面 --- 香港有 87 個億萬富翁，香港人在 2010 年代平均收入是 US\$58,420，排名世界第 10 位，香港的 GDP 是 4,143 billion 美元，世界排名第 7，也是全世界第 2 個最有錢的城市。

- 教育方面--- 在2019年，香港有48%人口完成中學教育，大學畢業的佔25%，有70%香港青年有機會就讀專上/大學，是世界最先進的地方之一，香港大學排名世界第22位，亦有兩個香港人得諾貝爾獎。 這都是驕人的成就。
- 醫療方面--- 據Bloomberg 2016年報，香港的醫療系統是世界第一，得分89.9；較排名第二位的星加坡(84.2)高得多。
- 治安方面--- 據2015年的報告，香港全年只有22宗謀殺案，是世界其中最安全的一個城市。

但自2019年後，香港已大大改變了！2022年的經濟收縮了6.1%，這大幅的收縮是前所未有的，不少外資都持續退出香港市場，美資跌了一成，日資跌7%；再加上大批專業人士移民離港，整個香港，無論是醫療、教育、商業、都大受影響。更令人心痛的，眼見香港人昔日所享有的自由，在《國安法》的陰影下，似乎失去不少，反對者被囚下獄，未審先判。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被封，負責人被控，令香港人活在恐懼中，哪有「港人高度自治，50年不變」這回事？其所謂「優化」香港昔日制度的，與港人的期望很不一樣。有人說舊的香港已死了，此言雖不中亦不遠矣！難怪在過去2、3年來，已有幾十萬港人移民離港。我不禁問道：我所認識和認同的香港，是否已成為歷史陳跡呢？

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說，一直以來，我都不大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也不以香港人這個身份自豪；但自從「反送中運動」以來，我的心態改變了許多，我不再以自己為香港人而自卑，而且心底裏有著從沒有過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再者，我能夠在香港長大、受教育、工作和作傳道人，是神給我莫大的恩典和福氣。雖然在2013年後返回美國，但「香港人」這個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身份，已經深深地植根在我心底裏。眼見這幾年香港的突變，覺得心痛、難過、低落，情緒往往隨著香港發生的巨變而低沉下來，腦海中一幅幅百萬人上街抗議的圖畫，就是在夢中也揮之不去。

然而，在新冠狀病毒肆虐期間，有較多時間去思考、回顧、默想、讀經、禱告，我的心態也有點改變。我開始漸漸體會到，這是一個歷史難得的時刻，也是神給我們這代的香港基督徒一個契機。耶穌的一句話提醒了我：「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章24節)原來聖經對死亡、終結有著一個完全不同的詮釋。漸漸地，我的腦海出現了一個「香港夢」，引發我有這樣的一個夢，是有幾個誘因。

第一個誘因是有關北美廣東話教會的衰落。自從我們在2013年返回美國後，一直都參加三藩市播道會聚會。這幾年來，我們看到一幅令人沮喪的圖畫，就是教會漸漸式微。在1990年代，三藩市播道會聚會人數約有600人，英文堂佔200，廣東話堂佔400；但時至今天，廣東話堂約只有200人，英文堂亦已遷出華埠，在日落區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教會。在這200人會眾中，大多是是年長的一輩，中年及青少年人很少。原因有三：

- 教會的青年人，一旦大學畢業後，找到工作，成家立室，大都遷離三藩市，自然也不再返回來華埠的教會了。
- 這十多年來，從香港來美的移民、學生銳減，取而代之的大多是從中國移民來的家庭；但自從中美關係惡化，從中國來的移民和學生也銳減了。
- 華埠的情況也有極大的改變。30-40年前，住在三藩市華埠的大多數是操英語的土生華人，或是從香港來的移民；但如今差不多

七成的華埠居民，是從中國來的移民。雖然他們都是操廣東話或台山話，文化上與昔日的華埠已很不一樣。有一次我在華埠舉頭一望，發現掛著五星旗的較美國旗的還要多！而教會呢？無論是傳道人或是長執，大多是有香港背景的，教會似乎未能適應到這改變，在福音工作上並不理想。再加上1989年地震後，再沒有高速公路直抵華埠，而泊車又是極為困難，越來越少會友願意每星期駕車回來聚會，剩下的大多數是年長的弟兄姊妹。而那些土生華人，他們有他們獨有的文化，並不容易融入在一個香港化的教會，他們大多遷往其他Asian-American教會，我們發覺這類的教會在美國漸漸興旺起來。

其實，這種情況不限於華埠的教會，整個北美洲的華人教會也呈現這種情況。簡言之，海外廣東話教會的前途是相當暗淡的。我以為這是自然的死亡(natural death)，時也！勢也！

第2個原因是有關香港的突變。因著政治環境的改變，在短短一、二年之間，有超過30萬香港人移民海外，其中以英國、加拿大、澳洲、及台灣居多。移民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他們不再聚於一個同文化、同言語、同生活習慣彈丸之地的香港，如今卻要散開至世界各地，要適應一個不同文化、歷史、語言和生活習慣的陌生地方，又要擔心經濟問題、生活問題、居留問題等等，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若是孤立無援，無親無戚，又沒有信得過的朋友共處，則問題更是嚴重。相反的，若他們得到支援、關愛和扶立，大大減輕了他們的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如此，當地教會若能扮演這個角色，即將會成為他們的避風塘、支援系統和實際幫助。聖經豈不是這樣教導我們：「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希伯來書十三章1-2節)事實上，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不少在加拿大、澳洲及英國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都積極進行這些善工。我想到猶太人的JCC(Jewish Community Center)組織，他們的異象是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聯絡起來，幫助新移民適應新的環境，這是值得我們借鏡。

第3個原因是新冠狀病毒大疫症。自從2019年疫症爆發，直至2022年4月，全球共有505,973,036人染上這病，而累積死亡人數竟達6,203,315人，一個驚人的數字！其實這個疫症不但影響世界的醫療體系，整個世界的經濟、民生、精神狀況及國際關係都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不少人內心充滿恐懼、焦慮、抑鬱、憤怒，無助感，這些無形的壓力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然而，弔詭的地方，就是這疫症卻又帶給我們新的契機。在過去兩年多，教會大部分時間都關了門，取而代之是網上崇拜、網上主日學、網上查經班、網上團契等。就以我們三藩市播道會為例，發覺參加教會網上聚會的，不但人數沒有減少，反而倍增。我感到驚訝的，在過去兩年，我在三藩市播道會網上崇拜講解啟示錄信息，並且把這52講的訊息透過Johnson Ng的YouTube Channel播放，每一講都有8,000人收看，這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因此之故，我和太太便開始了我們YouTube Channel，名為「心靈雞湯系列」，把我們的領受與網友分享；同時又開始「So Sir天地」的網頁，把我和君玉的文章、講道、分享放在網頁上，希望透過這個平台，能與眾人分享。

但事情卻又不是這麼簡單。當疫情稍為和緩時，觀看YouTube的人數也開始大減，甚至Netflix也宣佈當疫症稍為和緩，他們便失去很多客戶。自然，上網參加我們崇拜的人數也減少了很多。我開始體會到，所謂網上教會並非常態，人始終都希望有實體的聚會，彼此扶立，這似乎是人與生俱來的需要。希伯來書十章25節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

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了，就更當如此。」這裏所說的「聚會」，希臘文是episynagogue。這個字是由兩個字組成，一是epi，意思是：「在上」、「附加」(in addition to)，一是synagogue，意思是會堂。猶太人自從被擄到巴比倫，聖殿被毀，他們便在巴比倫設立會堂，每逢安息日往會堂聚會，聆聽拉比的話。猶太人規定，只要那地有10個男人，便可以在哪兒設立會堂了。所以自此之後，幾乎所有凡有猶太人的地方，都有會堂出現。拉比在聚會時，仍然採用希伯來文講解舊約聖經，以致猶太人雖然亡了國2,000多年，仍然可以保持他們的信仰和言語。在中國的開封，早在宋朝的時候就已經有猶太人的會堂，並且有猶太人的群體。所以，我以為希伯來書所講的聚會，是類似猶太人會堂聚會，是實體崇拜，希伯來書的作者警告我們，不可停止這樣的聚會。

我的香港夢是什麼呢？曾有一個時期，我以為香港真的可以50年不變，而中國亦會有50年大變，香港不會大陸化，但中國卻會香港化。始終這是癡人夢話，如今夢醒了，夢裏不知身是客，原來我只不過是世上的客旅，「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現今你們竟然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書四章14-17節)這裏給我們一個吊詭性的真理，一方面我們只是無能的寄居者，若以為自己可以闖出新天地，這未免是張狂誇口了。但另一方面，若我們以為既是如此，就躺平，消極地等候那日子來到，「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是罪也！

我覺得未來的30至40年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時刻，也是作為香港人的信徒一個特別的挑戰和契機。為什麼這30至40年呢？因為我們這一輩是末代的香港人，當我們移居海外，我們要承認一件事實：我們的子女並

• 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 •

沒有香港人的基因，我們的家正是一家兩制，無論在語言上、文化上，生活習慣上、價值觀上都與我們大有不同。我們是末代的香港人，獨有的一族。從日光之下的角度看，我們有責任保存著我們這一代的歷史、文化、藝術和其他香港獨有的特色。從日光之上的角度看，我們有責任分享基督教的信、望、愛。信者，乃委身給耶穌為我們人生領航；望者，仰望那位賜永生的基督；愛者，學效那為我們捨身流血、救贖我們的主，去關愛我們的鄰舍。不少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各散東西，流落異鄉，常常懷念著舊香港，每逢聽到羅文所唱的「獅子山下」，或是關正傑所唱的「東方之珠」，都有莫大的感受，甚至落淚。我們這一群在殖民歲月中長大的香港人，也正是失落的一群，我稱之為 Diapora 的香港人。雖然香港已失去了昔日的色彩，一國兩制也名存實亡，但是舊香港的文化、歷史、價值觀仍存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心底裏。我的夢想，正是與我們這一代被稱為末代香港人的身份有關的。

我非常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香港長大，受教育，更有機會在退休後修讀中國近代史。我更感恩的，是認識和相信了耶穌，並且有機會接受神學訓練，蒙召傳道。在我退休之年，我不禁問：在我人生最後的一程，我還可以作什麼？正如上述，這幾年所發生的事，讓我孕育出我的香港夢。從文化使命這方面來說，我有下列的計劃：

- 撰寫有關我父親蘇森的故事，名為《更美的家鄉》。陳述他在中國、秘魯和抗戰期間從軍的經歷，以及逃難至香港，寄居在這殖民地。從他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這個世紀的巨變。在2021年，這本書終於出版了！
- 撰寫有關我的故事，名為《一個港人自講的故事》。這一章，正是這本書最後的一章。希望透過這個故事，分享我對香港在

過去70年來所見所聞。

- 我亦預備在電台、YouTube分享我過去幾年來所撰寫「百年神州、風雲人物」。在這個節目中，我分享了中國這100多年來180個風雲人物的故事。

我們這一輩在殖民歲月長大的香港人，沒有機會接觸中國近代史，在中學期間，中國歷史的課程到清末為止。在港大讀書的時候，我是主修中國歷史的，學校也沒有設中國近代史這個課程，以致我們對中國這一百年所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事實上，因著兩岸歷史學者對中國近代史有著很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不少是政治宣傳多於歷史事實，可信程度不高。再者，史料的蒐集也不容易，令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更為困難。但自從蘇聯解體，不少昔日無法接觸的檔案得以面世；再加上1980年後一段時期，中國政府稍為開放，不少昔日無法接觸的歷史資料面世，對我們研讀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更是難能可貴。不少歐美、澳洲的歷史學者，都出版了不少有份量和較客觀的著作，其中前香港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馮客 Frank Dikotter，更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所著的三本書：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The Cultural Revolution—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都是非常難得的作品。當然，我所寫的並不是學術性的著作，我的目的是把我所認識的中國近代歷史，以故事形式寫成，與人分享。

從福音的使命來說，我有下列的計劃：

- 繼續透過YouTube、網頁、灣區電台、報章和出版書籍等平台，分享神的話語，包括講道、研經、神學課題、教會歷史、心理健康、時事評論等。

- 透過Zoom的平台，開辦成人主日學課程，希望能給予一些缺乏師資的廣東話教會一些幫助。
- 透過Zoom平台，開設福音性研經班，希望帶領一些真理尋索者認識基督教的信仰。

眼見這張清單，這些夢境，我不禁自問：「我有何能力，完成這個夢想？」我的答案：不可能。但我希望藉此，有更多香港人，認同這異象，投身成為其中一個造夢者，或許，這就是香港人所說的「時代革命」。但我深知：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作這事，或作那事。願榮耀歸給創天造地的耶和華神！





攝於小學畢業時(1959)



攝於中學時代(1964)



君玉攝於中學年代(1964)



攝於新界祖屋(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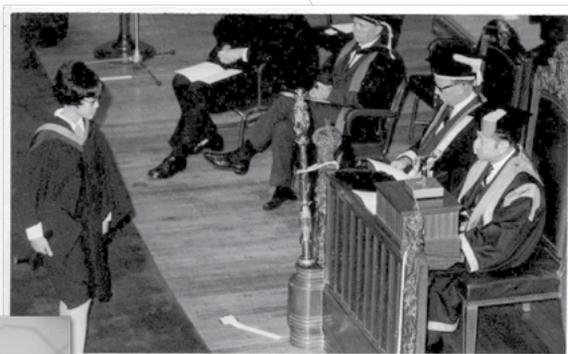
君玉攝於新界祖屋(1971)



與君玉攝於
新界祖屋(1971)



與青年會夜中學
學生合照(1969)



君玉畢業於香港大學
(1969)



與太太君玉的婚照(1971)



與君玉攝於美國費城(1973)



與君玉攝於美國波士頓(1973)



君玉攝於波士頓(1973)



君玉畢業於Westminster Seminary (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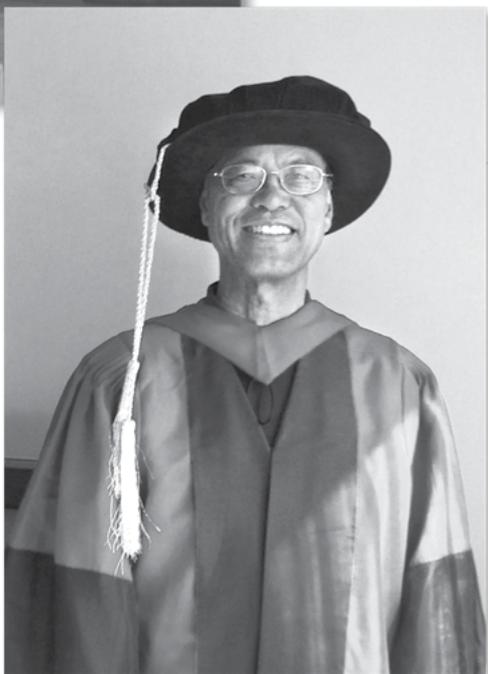
與君玉和凱頌攝於荷蘭(1976)



按牧(1981)



按牧典禮祝福(1981)



香港大學頒發博士學位
(2016)

作者 蘇穎睿

封面設計 林希慇

出版人 蘇穎睿

2023年初版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非賣品



